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高等学校图书馆学系列教材

LIBRARY SCIENCE

第三版

中国图书和图书馆史

谢灼华 主编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LIBRARY SCIENCE

高等学校**图书馆学**专业系列教材

内容提要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图书馆，是读书人乐于徜徉的天堂。中华文明的载体——书籍是如何经过书写、刻印、抄传，以至铅火之炼，发展到现代的大众传播工具；古代藏书楼演进到图书馆又经历了哪些聚散悲欢的故事，这本书都可能会给你带来有趣和实用的系统知识。

本书可作为高等学校图书馆学专业、档案学专业的教材或教学参考书，亦可作为图书情报机构管理者和业务工作者的进修读物。

■ 责任编辑 / 詹　蜜　　■ 责任校对 / 刘　欣
■ 版式设计 / 詹锦玲　　■ 封面设计 / 罗　π

ISBN 978-7-307-08136-9



定价: 38.00元

丛书书目见内文末页

高等学校图书馆学专业系列教材

第三版

中国图书和图书馆史

▶ 主　编　谢灼华

▶ 编著者　谢灼华　查启森　王子舟　刘　青
　　　　　赵燕群　程焕文　黄慎玮　赵纪元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图书和图书馆史/谢灼华主编．—3版．—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10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高等学校图书馆学系列
ISBN 978-7-307-08136-9

Ⅰ.中…　Ⅱ.谢…　Ⅲ.①图书史—中国—高等学校—教材　②图书馆史—中国—高等学校—教材　Ⅳ.①G256.1　②259.2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77582号

责任编辑:詹　蜜　　责任校对:刘　欣　　版式设计:詹锦玲

出版发行：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cbs22@whu.edu.cn　网址：www.wdp.com.cn)
印刷：通山金地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20×1000　1/16　印张:25.25　字数:449千字　插页:1
版次：1987年9月第1版　2005年10月第2版
2011年10月第3版　2011年10月第3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7-08136-9/G・2277　定价:38.00元

前　　言（第三版）

《中国图书和图书馆史》修订本于2005年出版后，经过几年的教学实践和征集的读者意见，编写者认真作了分析，从2010年开始，对教材又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校读，修改和补充，现在出版的称为第三版。

让我们简略回顾一下有关书籍历史的研究进展（包括中国文献产生、发展所经历的出版、印刷、流通、收藏、传播与交流诸方面）。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社会文化领域出现了许多值得注意的现象，为了建设学习型社会，各级政府花大力气发展社会文化事业和繁荣文化产业，支持国家文化教育设施改善条件、提高服务水平，支持基层文化建设、装备农村书屋，提倡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倡导和推进城市读书运动。这样，全社会的读书、学习和藏书、利用图书馆成为青少年以及各阶层读者的普遍要求。所有这一切，促进了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对现实的文化现象进行思考与研究。正是这样的社会气氛和文化要求，奠定了对图书和图书馆历史研究的社会条件。传统意义上比较冷僻的版本目录，变成了人们耳熟能详的事物，一些好像比较专业性的学术问题，也成为人们关心和讨论的热点。有关书籍、藏书、珍本秘籍，四库七阁，一样样进入了平常读者和专家学者的视线，我们认为，社会焦点问题，必然会引发相关课题的讨论，进而促进学术的繁荣。因为这样的研究，满足了社会需要，同样也促进了学术研究的深入和发展。图书编辑、出版、印刷和发行、收藏、传播与交流，是整个图书文化从源到流的过程，也是社会文化传播和文化发展的重要内容。

图书出版印刷方面的研究，新世纪以来有了长足的发展。由于全行业的支持和有关领导机关的规划，有计划有步骤的出版，印刷等行业史料征集和整理成绩斐然；在充分调研和专题研究基础上，集行业精英与专家之力而成的《中国出版史》，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属于地区、行业、企业、出版人和按时期、按出版类型的专门研究也相当多样；重视重大事件和重要题材的研究，如活字印刷研究、造纸研究、宗教出版物和宗教人物、单

位的研究，丰富了图书出版、印刷方面的内容，出版印刷史作为学术发展史的一部分备受关住。在如过去研究甚少的古旧书业，也取得可喜的成绩。与此同时，由于相关学术成果的带动，如考古发掘与研究，使我们对简帛等书籍有了更全面的认识。电子出版物的冲击，技术与产业的急剧变化，更是人们关心的焦点。我们觉得，改变一些急功近利的研究课题，强调立足专业、面向未来的研究目标，把研究视野从编辑、出版、印刷、发行等扩大到作者群体和读者群体研究，或者说从社会史、文化史等方面综合研究，将会使图书出版史研究迈向新的台阶。

这里再谈谈图书的最后落脚点——藏书的研究进展。图书报刊出版的目的，是提供人们的精神食粮。精神食粮的供给，无非两种：一种是快餐式的阅读与利用，一种是长久使用的收藏与利用。所以，研究书籍发展史，要研究书籍的“源”——如何写作、编辑、印刷与传播，也要研究书籍的“流”——阅读、交流、收藏与整理。关于古代藏书与近现代图书馆史的研究成果也是可圈可点的。新世纪开始，读者接受到两本藏书史的重头之作，即《中国藏书通史》、《中国藏书楼》，看看学界近年来的研究成果多样可以说明它们的影响；关于地区性藏书史、重点馆史的出版，推动了藏书和图书馆史研究的深入，并为我们了解和认识20世纪中国图书馆发展提供了相当具体的印象；重点藏书家、图书馆重要人物和相关人物研究相当活跃，出版了《文献家通考》等著述，重点藏书家如江南丁氏、鲍氏、马氏、缪氏等都纳入了人们的视线，一些人物研究比较客观、全面，有利于读者认识历史，以史为鉴；系列研究现象非常值得赞赏，如对清、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图书馆学术思想的研究，开拓了一个很重要的研究课题。同时，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是部分中国古典文献研究、中国历史研究专业博、硕士研究生，加入到古代藏书、近代图书馆的研究行列。而一些专家学者研究民族史、地区文化史、学术文化史等方面，也非常自然地引入藏书家的学术贡献，专题性的如进士群体藏书家研究、宗教学校图书馆研究等，也进一步说明藏书研究是一种学术史研究，也证明中国藏书文化与学术文化的密不可分。当然，藏书史研究和图书馆史研究还是要进一步深入内容和扩大视野，希望从学术发展与文化繁荣的角度去探讨和研究。

面对学界如此丰硕的研究成果，我们当然是抱着认真学习和仔细分析的态度，并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吸取学界的最新成果。但是，教材是学科内容最基本的最系统的知识体系，应该反映最新的学术成果，而教材内容的稳定性又是基本要求。同时，教材编写和修改还要根据实际与可能。我们这次对教材的修订与补充，大致从下面几方面进行的：(1)利用学术界最新研究

成果调整原版内容，如用潘吉星关于造纸的论述内容；(2)补充原书的缺失部分，如补写了宋至清的宗教藏书部分内容；(3)调整原书的部分篇章，使之更适于阅读；(4)纠正了原版中的引用错误和解释不全面之处。最后，我们还校读全书，核对引文，校正了一些技术性错误。总之，编写者希望读者看到的是一个新的版本。

本书主要编写者查启森先生，不幸于2010年秋去世。查先生十分关心教材的修改，可惜他来不及看到此书的第3版，这是使我们感到非常遗憾的。

编写者衷心感谢武汉大学出版社的长期热心支持和本版责任编辑詹蜜女士。同样也热忱欢迎读者的批评指正。

编者

2011年8月

前　言（第二版）

《中国图书和图书馆史》是高等学校图书馆学专业和相关专业的基础课教材，曾列入“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系列出版和使用。十多年来，该教科书受到高校师生和广大读者的欢迎，并迭经印刷多次。这次重新修订付印，正是考虑教学需要和读者阅读的要求，相信会受到大家的欢迎。

书籍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产物。当人们感到靠口耳相传已经不能达到交流思想、传播信息的时候，逐步创造了运用图像、笔画以至文字记录于各种载体上的这种可称为文献的东西，既方便于交流，也有利于传播。它的出现和流传，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当然也是书籍出现的必要条件，人类历史绵远流长，人们运用各种材质记载文字和图像，制成各种形态的文献和书籍，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记录和保存思想、经验，提供日常阅读和查考，并积累下来，为以后长期使用。所以，一部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包含着人类运用各种手段来创制文字、记录事物，制造载体，改进形制，保存文化和财富的丰富内容，也就是人类进行编辑、出版、流传、阅读、交流、整理、利用书籍的历史进程。书籍史的丰富，扩大了人类文明史的画面，加深了人类文明史的内容。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都可发现中国人的积极参与和卓越贡献。中华文明能够延续数千年而熠熠生辉，成为世界唯一没有断裂的古代文明，其中传承浩如烟海的书籍是重要因素。中国的文字发明和运用，已有三四千年的历史；中国发明纸张并传播于东西方各国，促进了文明进步，扩大了信息交流；中国发明了印刷术，直接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程，积累和创造了人类文化财富，中华民族为世界文明积累和创造了巨大精神财富，正在变成世界人类共享共用的伟大宝库。因此，对于记录和说明中国书籍的历史著述和文章，一直为世界文化学术界所关注，如何正确地阐述中国书籍的产生、演变和发展的历史进程，如何全面地说明中国书籍文化，从而使人们了解中国在世界文明进步中的作用和地位，这应该是我们的共同历史责任。

书籍产生以后，一定会出现收集、整理、利用等社会活动，这样的结果是扩大了书籍的传播，进而促使人们不断写作，并进行编辑、印刷，使书籍品种更多，数量更大。没有书籍，便不会有藏书活动，如果没有藏书活动，书籍的发展就会受到影响，书籍的寿命也会受到损害。因而，关心书籍的命运，必然关心到藏书活动和图书馆。读书、藏书是人们生活的必要内容，个人的书房、书库、书楼，公有的图书馆是人们的精神家园，是信息的交流站。人类的藏书活动是千差万别的。藏书习惯和藏书意旨不同，会产生不同种类的藏书家，因服务目的和收藏内容的差异，也会产生不同类型的图书馆。无论什么情况的藏书活动和基于什么需要建立的图书馆，他们都以收集图书、利用资源、掌握知识、交流信息和提供各种信息服务为目的。就是到了现代社会，提倡以社会公平占有信息资源为目标的文献信息服务机构，同样也是以推进文明进步、服务社会人群为号召。所以，现代文明社会都以图书馆建设和发展作为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我们以图书和图书馆结合成一个整体来研究，一方面是看到它们的发展是社会的一种重要条件，同时也是基于图书和图书馆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方面考虑的，研究方法的切入点就是书籍的产生与流传和书籍的保存与利用。

这次修订工作，基本上按初版设想和体系安排，即从中国文化史发展的基本线索上，从中国图书(经籍、典籍、图书)和图书馆(藏书、馆阁、图书馆)发展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上加以说明，修订本大致从下面几方面作了努力：一、内容调整、补充，把中国文化发展(也是书籍材质和形态上变化)划分为几个阶段，每个阶段分为图书生产过程和表现形态，图书内容发展和品种演变，藏书的整理和利用三个层面展开，从而说明中国文化发展的脉络，叙述中国文化遗产的积累与传承；一些特殊的专题则集中于一处说明，如宗教刻书藏书、书院刻书藏书等；二、删繁就简，反映新成果，多讲一些比较成熟的研究成果，多介绍一些基本知识，使之更有可读性，更突出一部专史的内容，这也是吸收教学过程中的意见修改的；三、改正原本的错失。参加这次修订工作的成员，基本上是原编写组的同志。其分工如下：

(一)绪论、第一章　谢灼华

(二)第二章　查启森　第三章　谢灼华

(三)第四章、第五章　查启森　第六章　谢灼华　第七章　王子舟

(四)第八章、第九章　查启森　第十章　谢灼华

(五)第十一章、第十二章　查启森　第十三章　谢灼华　第十四章　刘青

(六)第十五章　黄慎玮　第十六章　程焕文

(七)第十七章、第十八章、第十九章　赵燕群　第二十章　赵纪元

这次修订工作，得到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有关同志的支持，也得到武汉大学出版社严红副编审的大力帮助，谨此致谢。同时，值此书出版之际，再一次热忱地欢迎读者的批评指正。

编　者

2005年3月

目　录

绪　论 ………………………………………………………………………… 1

第一编　典籍的产生和收藏

第一章　典籍的产生和藏书的起源 …………………………………… 11
　第一节　典籍的产生 ……………………………………………… 11
　第二节　商周史官制度与典籍保存 ……………………………… 16

第二编　简帛书时期的图书和藏书(先秦—两汉)

第二章　简帛书与著述 ……………………………………………… 23
　第一节　简书与简书的形式 ……………………………………… 23
　第二节　帛书和帛书的形式 ……………………………………… 30
　第三节　春秋战国时期的著述 …………………………………… 34
　第四节　两汉的著述 ……………………………………………… 37

第三章　官府藏书制度的建立 ……………………………………… 39
　第一节　春秋战国时期的官府藏书 ……………………………… 39
　第二节　秦王朝的官府藏书 ……………………………………… 43
　第三节　两汉官府藏书制度 ……………………………………… 45
　第四节　私家藏书的初始发展 …………………………………… 54

第三编　写本书时期的图书和藏书(魏晋—隋唐五代)

第四章　纸的发明与写本书的形式 ………………………………… 61
　第一节　纸的发明与传播 ………………………………………… 61
　第二节　写本书的产生与发展 …………………………………… 63

第三节 写本书的形式 …… 66

第五章 写本书时期的著作 …… 71
第一节 官府编书写书机构与著述 …… 71
第二节 各类著作概观 …… 74

第六章 官府藏书和私家藏书的发展 …… 78
第一节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官府藏书 …… 78
第二节 隋代官府藏书 …… 81
第三节 唐代官府藏书 …… 83
第四节 写本书的兴盛与私家藏书的发展 …… 88

第七章 佛道典籍的传播与收藏 …… 93
第一节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宗教藏书 …… 93
第二节 隋唐时期宗教藏书 …… 96

第四编 印本书兴起时期的图书和藏书(宋—元)

第八章 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 …… 103
第一节 印刷术在人类文明史上的地位 …… 103
第二节 雕版印刷术的起源和早期印书 …… 106
第三节 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及早期印书 …… 115
第四节 册叶制度 …… 117

第九章 印本书兴起时期的著作 …… 124
第一节 宋辽金元官府的编书与印书 …… 124
第二节 宋辽金元私人著述与印书 …… 133
第三节 宋辽金元的坊间印书 …… 137

第十章 宋辽金元的官府藏书 …… 140
第一节 北宋官府藏书 …… 140
第二节 南宋官府藏书的重建 …… 146
第三节 辽金元官府藏书 …… 149
第四节 宋元私家藏书的发展 …… 150

第五编　印本书发达时期的图书和藏书（明—清）

第十一章　印刷技术的改进与印本书的继续发展…… 159
　第一节　明清时期印刷技术的改进与创新…… 159
　第二节　线装书的装订…… 166
　第三节　印刷术的外传…… 168

第十二章　明清官私印书的兴盛…… 172
　第一节　明代的官府编书与印书…… 172
　第二节　清前期的官府编书与印书…… 175
　第三节　明清的私人著述与印书…… 178
　第四节　明清的书坊印书…… 183

第十三章　明清官私藏书全面兴盛…… 188
　第一节　明代官府藏书…… 188
　第二节　清代官府藏书…… 193
　第三节　明代私家藏书…… 199
　第四节　清代私家藏书的发展…… 203

第十四章　书院和宗教刻书与藏书…… 212
　第一节　宋元的书院刻书与藏书…… 212
　第二节　明清的书院刻书与藏书…… 215
　第三节　宋元的宗教刻书与藏书…… 219
　第四节　明清的宗教刻书与藏书…… 226

第六编　机械印刷兴起时期的书刊和图书馆（1840—1911）

第十五章　近代书刊的出现…… 235
　第一节　铅印术的采用与图书出版…… 235
　第二节　西书的译介和报刊的出现…… 238

第十六章　近代图书馆的兴起…… 242
　第一节　西方传教士在上海的图书馆活动…… 242
　第二节　学会与学堂藏书楼…… 256
　第三节　清末新政与公共图书馆运动的兴起…… 265

第七编　机械印刷发展时期的书刊和图书馆(1912—1949)

第十七章　民国时期的书刊出版……277
第一节　民国初期的书刊出版……277
第二节　书刊出版法令法规的制定与执行……286
第三节　抗战前后的书刊出版……289

第十八章　民国时期的图书馆……298
第一节　民国初年至抗战前的图书馆……298
第二节　抗战时期和战后的图书馆……318
第三节　图书馆事业的杰出人物……335
第四节　西方列强侵华对图书馆事业的影响……341

第十九章　图书馆学研究与图书馆学教育……347
第一节　中华图书馆协会……347
第二节　图书馆学研究……352
第三节　图书馆学教育……354

第二十章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苏区、解放区的图书和图书馆事业……362
第一节　中央苏区的图书与图书馆事业……362
第二节　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的图书和图书馆事业……368
第三节　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的图书与图书馆……383

主要参考文献……388

绪　论

中国人民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由于积累实践经验，保存有价值的材料，反映各种研究成果，不断创造和发展了各种类型的知识体系，以达到交流和传播知识、信息的目的。记载这些知识体系的文化典籍，构成了一个民族的文化成果，并在民族发展中产生巨大的作用。研究文化典籍的形成和发展，它们的积累和传播，各个历史时期表现的特点和内容，不仅能使我们更加全面地认识民族文化的面貌，而且对今天文化财富的继承和利用等，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

图书是一个包含内容相当宽泛的词，就中国图书而言，作为历史时期的名称，因记录文字的载体不同，形态各异而古称简帛、纸写本、拓本、印本；泛指记载文字的实物则称典册、典籍、方策，或称书、图书、经籍。我们这里讲述古代书籍发生发展时期的各种著述和出版物，比较多用典籍两个字包容它们。讲述近代书籍发展时期的图书、报刊等出版物，一般用图书两个字包容它们。

人类有了文字以后，才能用文字记载知识和经验，积累文化成果，从事文章和著作的编撰。我国文字起源可上溯到夏代，这已经为出土实物和考古发现所证明。史载夏太史令执“图法”谏桀，这种“图法”是否就是典籍、史事档案，尚无法确定。到了商代，我国有了记载文字的实物，开始了我国古代文献记载的历史。殷墟甲骨所记载的知识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它是我国早期文字的主要载体。考古发现商王朝对甲骨的制作、刻凿和积累、收藏，明确地说明使用甲骨记载文字的目的性、连续性和制度化，而《尚书·多士》称“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册、典，可理解为用竹木制作的记载文字的简策，也可理解为记载了文字并积累起来的甲骨。当时典、册是记载社会

生活事件的工具，有典册，就必有专司典册的官吏。所以，商代典、册的制作、保存、利用的过程，基本符合作为典籍必须经过写作、流传、保存、利用的规律。因此，从图书必须有记载的内容，有一定的形制，可以用来考查和阅读等诸种因素来考察，典册可看做是我国书籍的起源。现在发现商代遗留的甲骨卜辞，就是我国图书的雏形，而商周简策实物迄今尚未发现，只是因时间久远，没有保存下来的缘故。

关于图书的概念，一般认为，凡不以传播经验，传授知识，供人阅读为目的的文字记录都不能称为书籍，有的同志认为甲骨文不是书籍，而简策才是正式的书籍。但是，我们应该看到：第一，早期档案、典籍是不可分离的，甲骨文是商代档案，但也是当时的典籍，因为它能起到记载知识，传播信息，提供查考的作用，提供查考就是阅读。甲骨文既称为档案的起源，也应是典籍的起源。第二，一种事物的产生要经历由简单到复杂的漫长过程，有了王室的文书保管，才产生了档案，又因为有了档案，并经整理汇编，也就转变为典籍，这是必然的过程，最初是同源发展，而后分流，也是客观的事实。第三，各种事物是互相联系、互相影响的。早期的记事，实际上就是一种著述活动，而后发展成著作的写作过程。在当时作者可能只局限于记载经验，但通过保管人的管理，或更大范围的人阅读，就起到了传播知识的作用。只有阅读才能起到传播的作用，而阅读总是有一定范围的，由一人写作到多人传播，本身就是经历了阅读的过程。所有这些，都证明商代甲骨或简策起到了图书的作用，虽然当时的传播范围很小。

我们认为：凡是有目的地用文字记载知识，积累经验，有一定的载体形式，并能用以传播，起到了社会作用的材料，即具有图书的功能，故就可称为早期的图书。如果从历史的角度对图书下一定义，那就是有目的地用各种手段把文字记载在一定的载体上，其内容能提供多人阅读和多次使用的各种著作或材料汇编。

早期藏书，一般为官府（王室）的典籍收藏。典籍的产生，为古代藏书提供了基本条件。随着王室政事的日益复杂，要查考遗留的政令文件，必然注意积累典籍。这种典籍包括本朝保存的，先朝积累遗留的，本土范围和相邻封国的各种文件、条约，构成了王室藏书的多样性。因此从这些典籍的时间范围看，已跨越一定年代；从空间范围看，已涉及当时统治领域或相邻城邦或属国；从内容来看，也涉及政治、军事、宗教和商业活动各方面。这些王室典藏已远远超越作为一批文字材料的集合的概念，已是诸种典籍的积累与保管，藏书的意义十分鲜明。

同时，我们还必须看到古代藏书制度形成的基本事实是由于国家的建

立，官吏制度的分工等，为保藏典籍提供了基本条件和创造了典籍整理、保存、利用的可能。王室建立了藏书系统，又委任官吏保存和整理，并在不断地提供使用中制定了固定的工作制度和内容。我国古代藏书正是在这种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背景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因此，从历史角度看，古代藏书处（古代图书馆）即是为一定的目的积累典籍（图书），有专门人员负责保藏、整理，并提供使用的藏书处所。

（二）

从历史发展的渊源来看，图书和藏书（图书馆）的发展是紧密相连的；从现实意义来看，图书和图书馆的知识是我们从事图书出版、流通、收藏和利用等工作必须具备的基本知识。

图书是图书馆工作的物质形态，是图书馆对读者服务的基本条件，图书的出版与流传，为图书馆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赖以工作的基础。图书馆的建立和开展的各种工作，扩大了图书的影响，促进了图书的传播，提供了发展文化学术的条件，保存了大量图书财富，图书馆是推动图书发展的重要力量。

图书和图书馆之间的互动与依存，并不会因时代的变迁而变得生疏和隔离。从下面几方面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图书和图书馆的关系。

第一，典籍的丰实与多样必然促进图书馆发展。历史上是如此，人类社会发展到现代社会，同样是有了图书，才会出现保存图书、供人长期使用和多人利用的图书馆。作为保存文化、传播知识和信息的图书，在大量生产和传播过程中，必须依赖图书的积累和交流。图书馆具有重大的关键性作用。而当社会生产巨量文献和图书时，从保存和利用角度上，图书馆又承担了选择和推动的作用。同样，文化的发达、文明的进步、文献的增长都会引发图书馆的发展和进步。

第二，图书馆的发展，必然进一步加快图书市场发展和提高图书质量。图书馆丰富馆藏和高质量的服务，引发和促进作家与学者的研究和制作，出版的繁荣自然充实和丰富了图书馆的收藏。图书馆业务工作和推广工作基本上围绕书籍进行，图书馆具有庞大的读者队伍，图书馆相对稳定的经费等因素，都是影响图书市场的主要因素，图书馆是图书市场的主要催化剂。

因此，通过总结图书和图书馆发展相互促进、相互推动的历史经验，探讨我国各个历史时期图书的编制、整理、出版和图书馆对图书的收集、整理与利用，阐明它们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诸因素影响中的发展特点，从而

说明文化发展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影响，就是研究中国图书和图书馆史的目的。通过学习中国图书和图书馆史，对学生进行本专业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的训练，“以史为鉴”，提高文化素质，扩大专业知识，加强职业修养，总结历史规律，就是学习中国图书和图书馆史的要求。

鉴于以上的目的和要求，中国图书和图书馆史研究的内容范围如下：

(1)图书的形式。图书的材料、形制的变化，各个历史时期书籍的形式，影响图书材料、形制变化的社会经济方式和生产力水平。

(2)图书的流传。图书发展过程中的不同生产、流通渠道，各种重要著作的社会影响，以及不同生产和流通方式的社会状况、文化发展条件。

(3)图书的收藏。历史上各种藏书类型，建立藏书的步骤与方法，管理藏书的机构，近代图书馆的发展和工作特点。联系政治、文化发展，了解不同条件下的图书馆形态及其社会功能。

(4)图书的利用。各种历史人物对图书的重视和利用图书的方式。藏书聚散的社会原因。图书对政治、经济、文化科学领域的直接影响。

(三)

文化典籍记载了人类在自然斗争及社会斗争中的认识，积累的经验，研究的成果。从人类文化发展的表现形式来看，有实物的和文献的两种形式。自有文字以后，文献记载的材料成为人们研究历史的最直接、最详细的材料，其中最可宝贵的是典籍(包括文书、档案、图书等)。我们研究它们，可以对我国文化发展史有一个全面的认识。

中国文化有几个比较大的发展阶段。战国以前，属奴隶制文化，战国至清末，属封建主义文化。春秋战国，实际上是中国文化汇集、交流的第一次大变动时期，这时的图书形制——竹木简牍，制作方便，又可提供阅读。官府藏书由原来官守其书的状态逐步分散到其他诸侯国，私家藏书也开始出现。一个明显的事实表明：当时制造文化典籍的人，也是管理文化典籍的人。诸子百家争鸣的局面，不仅促进了当时社会文化的繁荣，而且也为我国文化典籍的积累打下了基础。当时写书、收集保管图书以至整理图书的风气极盛，功绩最大者首推孔子，这些都是文化发展史上的大事。

秦汉是我国封建社会确立和发展的时期，也是我国文化发展史的第二个时期。秦统一中国，汉代罢黜百家，但文化的发展却呈现一种特殊的现象，秦焚书，国家藏书并不焚烧，对先秦文化还是保留的；汉罢黜百家，诸子百家却保留着，道家之书也不废，刘歆《七略》就保存了这些典籍，证明当时

官府藏书中也保存了这些东西。从文化史的角度看，当时正是利用了简策的形式，保存了先秦文化遗产。有了汉代官府藏书的发展，才使尊儒的局面影响中国封建文化近两千年，文化典籍的整理也影响中国文化发展近两千年。

中国文化发展的第三个时期，即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这一时期各种文化交融的现象是很明显的，官府藏书中保存儒家经典、诸子百家、史书记传；私家藏书中也注意儒、道、佛各种书籍的保存，如阮孝绪《七录》所载可以证明。寺院中既有佛教经典，也有道教经典，他们用最好的纸张最好的墨来抄写。所有这些，看起来是矛盾的，但又是统一的，统一在文化的统一之上。文化学术的活跃归功于当时秘书省的发展。各种类型的藏书机构承担了文化遗产的保存和文化典籍的流传的任务，同时，这些保存图书的机构也担负着图书采集、整理、利用的任务。官府藏书的殿阁，私家藏书的处所，寺院藏书的寺观，对各种图书都加以保存和传播。社会文化的发展，促进了当时图书的制作，促进了藏书系统的发展。

宋元以后，中国文化进入第四个发展时期。封建文化得到了高度发展，图书制作方式发生了变化，图书流通渠道更加广泛，文化传播的形式也变化了。但是，作为官府刻书和藏书，传播儒家思想和保存文化典籍的目的始终是没有变化的。从图书编纂活动来看，范围也扩大了，如类书、政书、诗文总集的编纂，都是在官府图书整理的机构里进行的。也就是说，政府藏书机构对封建文化的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书院成为文化学术中心，程朱理学得以传播。收集、整理、编纂、刻印、利用的结合，这又是当时学术文化发展的重要条件。此外，私人藏书家中既藏书又刻书的也很多，尊经重道也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因此，图书与藏书的发展是文化发展史中的一部分，与文化发展是紧密相关的。

从中国历史的发展来看，先秦到汉代，官府控制了文书制作、文件发布、档案保存，并利用保藏的典籍供政事参考，作为巩固统治的手段。春秋战国时出现私家藏书，但无论数量、品种和管理制度，都不能与官府藏书相比较。因此，讲图书史、藏书史，甚至讲档案史，从先秦到两汉这一段，都是围绕同一课题，即典籍的产生、保藏、利用问题。魏晋以后到隋唐五代，书籍的发展进入了写本书的阶段。这一发展阶段很重要的特点，是书籍编写（作为官府组织的）、书籍制作和书籍保管，都由政府机构统一进行，即使对书籍的整理工作，即我们现在所说的校勘工作，也由官府在官府藏书处所组织进行。官府整理历代遗留的典籍，定出正式的儒家经典，如《五经正义》；编纂官修史书，如南北朝各代史书。进行经史著作的注释和编纂，最主要的是利用官府藏书。

图书的制作形式，决定了图书馆的保藏和利用方式。我国宋代以后，印刷术的发展促进了文化学术的繁荣，也根本改变了图书的制作、加工和流通过程。这个改变带来了以下几个特点：有各种版本的图书流通，印本与钞本在官府、私家藏书中占有同样重要的地位，这是一。官藏机构在编纂政府主持编写的著作中，也是编纂、利用、流通相结合进行的，如宋代的《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册府元龟》，明代的《永乐大典》，清代的《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等都是如此。官府藏书与编书活动相互结合，使图书的发展与藏书的发展互为影响，互相促进，这是二。封建社会自宋代后，书院兴盛，私家藏书发达，他们一般也是将编纂、刻印、收藏、利用结合在一起，书院既是学术的阵地，又是文化传播中心，同样也是刻书、藏书的基地，私人藏书家中收书、校书、刻书、藏书合为一体的大有人在。这样，又促使了图书的编纂、印制、收藏和利用的进一步结合，这是三。

（四）

我们把公元1840—1949年划定为中国近代史时期。中国近代历史是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历史。由于帝国主义入侵、封建社会逐步解体、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斗争，中国近代历史是丰富多样的。近代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诸因素引起的社会变革，直接或间接影响到文化教育领域的变革。中国近代报刊的出现、图书内容和形式的巨变，中国古代藏书楼的逐步衰落与近代公共图书馆的兴起、学校图书馆的普及，深刻影响社会生活和民众心理。近代图书和图书馆的发展是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事件。

西方铅印技术为标志的近代印刷技术的发展，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是相当深远的。西方印刷技术传入中国后，首先在沿海城市推广。当这种新型媒介形式出现后，立刻在全国迅速传播。商业的运营和广大市场的需求，使报纸、刊物和书籍编辑出版、发行逐步成为一项重要的社会文化产业。长期以来，主要以经、史、子、集为内容的图书得以改变，以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人类文化科学内容的书刊被社会各界人士所接受，图书市场以线装书为中心的局面也被精装、平装和包背装等图书、报纸、刊物所充实补充。新的科学内容，崭新的流通形式，近代书刊成为时代的号角，社会进步的晴雨表，也是推动社会进步和发展的主要工具。

公共图书馆是近代文明进步的产物。公共图书馆和学校图书馆的出现是伴随着人类文明进步的脚步前进的，我国长期发展的宫廷藏书、国家机

构藏书、书院、寺观和私家藏书，它们的利用都是有局限的，近代西方社会的公共藏书机构，最早为国人介绍推广，正是因为它的开放性。同样，近代书刊的出版和传播，也迫切要求社会机构的充分支持。处于急剧变化中的社会文化遗产和文明成果，也需要像图书馆、博物馆等类公共机构的保存与传播。所以，近代图书馆成为承先启后的文化基地，也是开启民智、保存国粹的场所，更是普及文化、提高民族素质、促进社会文明的学校。

近代书刊出版发行已是一个独立的文化产业。同样，近代图书馆也是以一个独立的文化机构出现，这是社会的必然分工。但是，书刊出版发行与图书馆事业的关系是天然不可分离的。

近代书刊和报纸的内容包含着十分丰富的自然和社会知识、实践的经验和人类积累的各个历史阶段的文化财富。这种人类的精神产品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更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之一。近代图书馆由于历史的变革，不仅保存和继承了人类历史遗留的丰富遗产，更由于近代书刊出版发行的特点，使图书馆的收藏与管理迈向更新更全面更深入的阶段，成为人们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文化享受与财富积累的重要阵地。

图书馆的丰富馆藏使图书出版扩大了品种，增加了资源、拓宽了市场。图书馆的广大读者及时反馈信息和充分利用书刊，这既是图书出版发行业的活水源头，也是出版发行界的衣食父母。近代社会的繁荣与发展，与图书出版发行和图书馆的发达是同步的。

人类社会进入20世纪以后，社会经济发展迅速，民族民主革命风起云涌，帝国主义为争夺战争资源，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世界战争。作为人类信息交流与传播的媒体迅速发展，报纸、刊物成为人们生活的必需品，而电影、广播等传播媒体日新月异。总之，世界的信息传播、文化交流成为人类交流的重要渠道。

20世纪以来，我国经历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重大政治、军事事件。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标志着中国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的结束，新的社会制度在中国大地建立和发展起来，中国人民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五）

我们把中国图书和中国图书馆的发展，划分为古代与近代两个阶段。基本序列为七编：

一、典籍的产生和收藏
二、简帛书时期的图书和藏书(先秦—两汉)
三、写本书时期的图书和藏书(魏晋—隋唐五代)
四、印本书兴起时期的图书和藏书(宋—元)
五、印本书发达时期的图书和藏书(明—清)
六、机械印刷兴起时期的书刊和图书馆(1840—1911)
七、机械印刷发展时期的书刊和图书馆(1912—1949)

第 一 编

典籍的产生和收藏

第一章　典籍的产生和藏书的起源

第一节　典籍的产生

一、劳动创造了文化

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社会形态——原始公社，是一个十分漫长的历史时代。就生产工具的制造和使用而言，原始社会经历了旧石器和新石器两个不同的时代；就社会的组织和结构而言，则经历了母系氏族公社和父系氏族公社两个不同的阶段。在旧石器时代，人们用粗劣的石器捕鱼打猎，共同劳动所得，仅可以提供社会成员的最低生活需要。因而，他们在生活中需要特别加以记忆的东西是很少的。所以，当时既没有文字，更没有记载文字的典籍出现。

当人类社会进入新石器时代，特别是进入父系氏族公社阶段以后，随着生产工具的不断改进，社会生产得到了发展，首先是“游牧部落从其余的野蛮人群中分离出来——这是第一次社会大分工”。接着又“发生了第二次大分工：手工业和农业分离了”。① 在这种社会生产日益发展和社会分工日益复杂的条件下，原始社会的各种意识形态，如宗教观念、道德观念、审美观念也随之形成，出现了游戏、唱歌、舞蹈以及其他各种口耳相传的文化教育活动，形成了我国原始社会的文化。这些，都为文字的发明创造了基本条件。

---

①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M]//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60，163.

二、文字的发明

在原始社会后期，由于知识的积累和传播，靠口耳相传的方法远远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人们学会用结绳、刻木来帮助记忆，表达思想和交流。但是，结绳和刻木离开了制作人和保管人，他的内容往往使别人不能准确了解，因而也不能达到预定的目的，于是，人们一直摸索一种用来记录思想、积累经验，并能为大家使用、传之久远的符号，所以，文字就在人们不断的探索下出现了。

我国的文字是从原始社会的刻画符号与图画演变而来的。根据考古发现，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遗址陶器上的符号，临潼姜寨的多件陶器上的刻画符号，引起人们的极大兴趣。特别是山东莒县陵阳河大汶口文化遗存的陶尊上的刻画符号，人们对其有两种意见：一是认为，这就是中国文字的开始；另一种认为，这不是文字。1991—1992 年，出土于山东邹平丁家村龙山文化遗址的刻字陶片，被人们认为就是中国文字的起源。这些考古发现，说明我国文字的起源很早，并被刻画在陶质载体上。

我国古代有许多文字起源的传说，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仓颉造字说。仓颉是传说里黄帝的史官，《韩非子·五蠹》中说："古者仓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仓颉造字还被神化了。《淮南子·本经训》说："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不过，也有人实事求是地指出，文字是大家共同创造的。如荀况说："故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荀子·解蔽篇》)文字是大家创造、约定俗成、共同使用的工具。从考古发掘的材料证明，我国文字流传的时间是漫长的，要确切说明是哪个人发明是困难的。此外，文字一定要记录在一定的载体上，才能保存下来，并不断积累不断传播，成为大家共同使用的工具。记载有各种文字的物件，如古代的文书、档案，或者是成文的文稿、著述，我们称为文献，有些时候也把这种文献称为典籍。

钱存训对中国文字记录的特点和它对世界文明的贡献作了高度评价，他说："中国文字记录的一个重大特点，便是它独有的持久性和延续性。这一特点使得世界上一个有创造性的远古文化，得以继续传播，延绵至今。中国文字除了一般文字通有的音、义以外，还有其特殊的形体，这种具有特殊形体的文字，超越了时间上的变化和空间上的限制，团结了中华民族，更造成了世界上一个最伟大的文化整体。"①中国文字记录的历史是非常久远的，中

① 钱存训. 中国古代书籍纸墨及印刷术[M].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2.

国文字应用于书写和由此产生的大量文稿，中国积累的大量写本、印本和各种出版物是中华民族的辉煌成就，也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

三、典籍的产生

人类发明文字，主要目的是帮助记忆，但帮助记忆的过程，既可借助于手、脑，也可借助于其他工具。人类初始寻找记载文字的载体首先是随时可取之于自然的自然物，如木材、石块、泥板等。其次是自然物加工的物件，如陶器、骨甲、皮革等。再进一步则是金属的铸件。当然，这些物件因为不同的地方和不同的使用者，其选用是随意的。人类利用文字记载事务、交流信息、帮助记忆、扩大智慧，如果把这些载有文字的材料，加以散发，或者积累下来，就能推动人类进步，发展社会文明。所以，进步的思想家，把人类文字的发明及应用于文献记录，视为人类文明进步的新阶段，即人类由野蛮时代过渡到文明时代的标志。

典籍是一个发展的概念。我国早期文明发展中，出现可称为文献的物件，因为不同的角度，有时把它称为档案，有时则把它称为典籍。文献组成有几种基本要素，无论它们是宗教的，或是世俗的，或是经济契约、战争文书，还是歌咏和传说，总之，有可利用的、有保存价值的文字或图像，也就是所记载的内容，这就称为文献的第一要素。同时，任何文字或图像都必须依附于一定的物质上才能记录下来或表现出来，并得以保存和传播，这就是被称为文献第二要素——载体。此外，种种记录文字或符号的载体，都会有一种形态，因为人们要利用它、保存它，要不断地对它加以改进和完善，所以，人们又把这种文献的不同形态称为文献的第三要素。因为有不同的内容，记录在不同的材质上，而且因保存和使用的不同，因而出现有不同的形制，不同的形制直接联系到文献的生产和加工，这就是文献组成的第四个要素——生产方式。人们把文献记录的内容、文献的载体、文献的形态、文献的生产方式，称为文献的四要素。

下面介绍我国较早出现的几种文献形态：

石质文献　旧石器时代石块是人们进行捕猎的生产工具，以后还把石块加工成装饰品。我们发现先民在石壁和岩洞涂饰一些动物，绘画一些祭祀、狩猎事件，或者是一些像图形一样的壁画，这些只能理解成是一种符号。只有到了铁器的广泛使用后，才能有大量的刻石文献。石质文献质坚厚重，加工不易，但它可以长期保存，并容易复制，因此成为保存文献的重要选材。

泥质文献　泥质文献包括用泥土烧成板块刻字，或者是在用泥土做成的各种陶器上写字。我国考古发现的在陶器上刻画的符号，一些学者将其称为

文字，有些学者则认为这些符号不是文字。但是，出土于山东邹平的丁公文化遗址的陶片文字，一些研究者认为是我国最早的文字。泥质文献取材方便，制作简单，但保存不易，因此，为坚硬的龟甲、兽骨和石质材料所代替。但是，泥质文献在文献发展中仍然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甲骨文献 我国殷商时崇尚鬼神，曾经选用经过加工的龟甲和兽骨，作为祭祀活动的文字记录，以后，龟甲和兽骨变成记录文字的常用载体。先秦古籍中多次提到这种记事的方法，如《易・系辞》称："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又《尚书・序》称伏羲氏"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这就说明，用镌刻的方法在龟甲和兽骨上记录文字，是古代记录文字的方法之一。甲骨文献虽然取材不易，刻写困难，但保存期长，因而成为王朝记事的一种重要手段。20 世纪河南安阳殷墟出土大量甲骨文献，陕西岐山周原出土甲骨文献，都是重要的历史文献。

竹木文献 根据古籍的记载，我国远在殷商时可能就有用竹木材料记载文字。如《尚书・多士》篇称："惟殷先人，有册有典。"《礼记・中庸》篇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这里的"方"，就是用木头制成的方块，这里的"策"，就是用竹子削成的薄条，用绳子编织成可以书写的材料。布在方策，就是用木板、竹条作为书写的载体。现在，我国出土大量的木牍、竹简，为我们研究春秋战国以至两汉历史提供了非常丰富的材料。有人分析，未能发现商和周时代的竹木文献，可能是因为时代久远，竹木容易腐朽，所以未能保存下来。竹木文献因为取材方便，制作也不困难，书写容易，并可根据需要添加，这种文献还可携带，便于传播。因此，竹木文献成为我国早期的重要文献形式。

青铜文献 我国早在奴隶社会的夏代，就会运用冶炼方法炼制青铜器。殷商时，开始用青铜铸造礼器、兵器、日常用品等。西周时，青铜器非常兴盛。为了在青铜器上记录其所有者或收藏者，进而在青铜器上铸造各种条约、法令、文告等，这些铸有文字的钟鼎等器物，实际上就成为传播信息的一种媒介。一般情况是，一种金属的器物上，有几十甚至上百字的，清末出土的西周的礼器毛公鼎铭文达 497 个字，所以，青铜文献是我国殷、周以至春秋时期重要的文献形式。但是，青铜文献制作不易，故较多是王室的各种文件。

丝质文献 传说我国在远古时代就曾经发现蚕丝可以织成丝绸，长期以来，丝织材料作为贵族的衣料得以发展。丝织材料面宽、平展，且长度可随意裁制，所以它也作为文字和书画的材料被广泛使用。考古发现，长沙马王堆的一批帛书为我们留下了大量儒家经典、医药方书和地图等重要文献。

《隋书·经籍志》称："是以大道方行，俯龟象而设卦。后圣有作，仰鸟迹以成文。书契已传，绳木弃而不用。史官既立，经籍于是兴焉。"这里，他们把中国文字发展的经过大致分为图画、象形、刻木、结绳，以至在各种载体上刻写文字。这说明，开始摸索和创造文字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过程。而由选择各种不同载体记录文字到比较成文地刻铸在一种便于流传的载体上，也要经过相当的时日。真正成为人们可以阅读的材料，而又轻便和便于制作，成为广大公众的一种共同财富，那就可以称为典籍了。但是，各种不同载体的文献，它们都具有物质性、记录性、传播性、共享性等特征，它们都在记录文明进程、传播先进文化、保存文化遗产、推动文明进步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四、典籍的保存与利用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当记录文字的各种文献数量增多以后，肯定会有一个如何保存的问题。而社会管理、国家统治、生产和教育的需要，又必须以大量的文献作为参考，这样，典籍的保存就出现了。古代典籍的保存在人类文化发展中，曾经绽放着奇异光彩。

典籍是人们表达思想、保留经验、传播知识、记载事物的工具。典籍的内容虽然多种多样，载体五花八门，但它的社会作用取决于内容，因为只有通过内容的传播，才能传播知识、交流信息，成为人们在相互交往中不可或缺的材料。典籍包括相互依存的两个方面，即内容和形式。典籍的核心是它的知识，就是内容的系统性和可阅读性，它是人类社会活动的记录和认识的总结，包括对事物的具体说明和描述，也包括对整个社会和自然的抽象概括，以及人类思想、行为、观念和感情的描述与抒发。同时，因为保存了这些知识和经验，对后人有可利用和参考的价值，就必须有一种可以记载文字的载体，这样就使得典籍又成为可利用的材料。正是因为这种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使得典籍成为文化积累和文明进步的基石。

典籍作为一种记录知识的形态，是人类文明的结晶，所以它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典籍不仅是同时代人表达思想、交流经验的重要工具，更重要的是它为后人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知识，使他们在认识社会和自然，并在同社会和自然互动过程中得以发展和进步，所以，典籍是人获得知识的重要源泉，也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工具。这就是为什么人们除了阅读典籍还考虑如何保存这些典籍的原因，藏书的观念和行动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

藏书的出现应该有如下几种重要的因素：

只有有了典籍才会有藏书的举动。人类文化的活动，总是有一种明显的

目的性，保存典籍的目的就是使典籍的一次使用变为多次使用，短期使用变成长期使用，少数人使用变为多数人使用，因此，只有社会生产的发展，文化的进步，使典籍有了积累的可能，这样，藏书才得以出现。

只有典籍的利用多样才会有藏书的需要。人类文化的活动总是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因此，人类对信息的需求总是越来越多，呈现多样性和复杂化，这样，典籍内容的可参考性就为人们提供了便利。典籍的保存既可保证人们暂时的需要，也为人们提供长期使用的可能，这就是藏书制度必然之路。人们对典籍的需求，使得藏书行为成为可能。

只有国家机构的建立才能使藏书制度化。由于政治统治的需要，产生了大量的文件，为了保存这些文件，以备以后的查阅，就会有保存这些文件的机构，还要有专门的人员进行管理，这就是我们看到的最早的档案保存机构。当时文献的主要种类是档案，当然也包括记录文字的各种文献，保存这些材料，进行必要的整理，提供多次的使用，这就是早期的藏书活动。所以，我们追溯到档案的保存，正是因为它和典籍的保存都是同样的一种收藏举动。

第二节　商周史官制度与典籍保存

一、商代史官与典籍保存

商代(公元前16世纪至前11世纪)在我国历史上是强盛的奴隶制国家。当时农业生产已占主要地位，木、石生产工具大量采用，并已经有了青铜器具，因此，农业产品比较丰富了。国家机构的设置，主要是加强奴隶主贵族的统治，而众多的官吏和一部分从事宗教活动的所谓卜、贞人，以及从事文化活动的史官，他们既是创造文化财富又是垄断文化财富的人。商代文化是很发达的，文学、艺术、医药和天文方面都有较高水平，汉字在商代后期，使用的单字在4 500个左右，文字构成和语法组织已经严密有序，这就为开展文化活动，进行文字记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商代迷信神权极为严重，统治者用神权巩固统治，维护奴隶主贵族利益。《礼记·表记》称："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奴隶主贵族的统治是由商王实行的，他假借传达天意、沟通人和神的是巫和史。商代有卜、贞等宗教职务的官吏，还有作册等史官。他们或偏重鬼神事，或偏重人事，大至国家大典、征战、祭祀、王权，小至打猎、出游，以至风雨、年成，都得卜问鬼神，以定吉凶，决定行止，为了保证以后可查验，他们把向

鬼神问卜之事记录下来，逐步加以积累，为以后参考利用。他们记录文字的材料是龟甲和兽骨，甚至有把文字刻铸在青铜器上的。

100多年来，位于河南安阳小屯村的殷墟，出土了大量的刻写有文字的甲骨。其收藏的穴窖分布情况和保藏方法，又为我们了解商代后期档案(典籍)的收藏与管理提供了范例。

殷墟是商代盘庚到纣270多年的都城遗址。可以想见，当时这个都城是相当大的。围绕王室中心有居民点、手工业作坊。而从甲骨收藏处所的多处发掘来看，有几个朝代的甲骨集中于一个穴窖里，也有一个朝代的甲骨存储于一个穴窖中，证明这种收藏是有意识的。例如，1936年春季，中央研究院第13次发掘，发现在村北YH127圆坑中层堆积的灰土与甲骨中，就有大量龟甲，当时编号共17 088片。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71年在小屯西地发掘了堆积有序的21片牛肩胛骨，其中有16片刻有文字，最多的一片60多个字。1973年，小屯南地的发掘中，发现了7 000多片卜骨和卜甲，其中有刻辞的达4 800片。其中64个穴窖中，出土卜用甲骨4 795片，占出土总数的61.1%，刻有卜辞的有2 836片。①

根据考古发掘和考古研究的结果，我们大致可以勾画出殷商时档案(典籍)收藏的情况。首先，由从事王室记事的史官，或是从事宗教事务的巫师，收集各种甲骨，然后进行磨制加工，成为可以进行占卜用的甲骨。其次，每逢王事、征伐、祭祀和农作等活动，人们进行占卜，然后把卜辞刻写在甲骨上，再把这刻写有卜辞的甲骨收藏起来，待有灵验征候时补写卜辞。最后把这些有刻辞的卜骨收藏起来。从考古发掘情况看：(1)有些是包含一个朝代的甲骨，加以累积归档。(2)有些是没有刻辞的甲骨积累在一块，这可能是保存备用的。陈梦家说："一个穴窖，倘然只包含一个朝代的甲骨，才是真正的有意的储积，不管它是归档，储藏或是埋藏，它可能是在某一个时期把同期甲骨存入的。一个穴窖，倘若包含一个以上的朝代的甲骨，那么它可能是某几个时期由不同时期甲骨累积的。在穴窖以外的版筑中、灰土中或穴窖以内零散的甲骨，它们是和别的东西一道堆积，不是专门存储甲骨的所在。"②研究者发现，这种有意识收藏的甲骨中，有些甚至还刻有占卜人的名字，有些甲骨上刻有经管的卜官的名字，说明当时已经有专人管理。以上情况说明，这些甲骨是有意识的收集和保管，又有了专门的收藏地点，而且

① 文物编辑委员会编．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M]．北京：文物出版社，1979：276.

② 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6：9.

是集中一个朝代的甲骨，这就是把一个朝代的文献集中地加以整理和保管，或是把几个朝代的文献集中收藏，这种保存制度，既便于当时随时抽取，进行查阅，也考虑了长期保存，永久使用，表现出来的存档和立案是非常典型的档案管理。那么，如果把这些商代记载有社会生活、农业生产以至朝廷事务、军事征战、王位继承等内容的甲骨也看做是典籍，这种典籍的收藏、管理和利用，也应该看成是当时藏书的活动。

现存古代典籍的记载，也证明了殷商典籍保存的真实性。《尚书·多士》称："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册、典二字可在甲骨文中找到，册作䇙；典作𠕋。考古学者对典册的字形加以对比，得出结论说："吾人既知商人贞卜所用之龟，其大小长短曾无两甲以上之相同者，又知其必有装订成册之事，则此龟板之一长一短，参差不齐，又有孔以贯韦编，似册字之形状，而册当然为其象形字也。"①册像参差不齐的龟甲片叠在一块，再用绳子捆扎，犹如现在的书页的装联，典像双手捧着册，或者像把册放在几上，犹如现在把书插放在桌子上，典、册两字的象形是十分明显的。文字的象形主要是形象地描绘实物图形，如果那时没有装联成像书册样的甲骨，或者是使用竹木薄片联结成册的样子，那是很难凭空创造出典、册两字的。

当时史、卜等类文化人都是官吏，文化学术是垄断在官府的。《吕氏春秋·先识览》称：夏之将亡，"太史令终古出其图法，执而泣之"。殷之将亡，"内史向挚见纣之愈乱迷惑也，于是载其图法，出亡之周。"这就说明，夏时有图法，而商朝也有图法，这里的图法可以理解为档案文件，也就是当时的典籍。作为当时保管文件的史官，他当然十分珍惜这些材料，故有"出奔如商"，"出亡之周"，这实际上就是把文件转移出去。

二、周代史官与典籍收藏

西周(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8世纪)是我国历史上高度强盛的奴隶制国家。周武王伐纣得天下后，全面建立奴隶制的新秩序，采取分封诸侯的办法，加强了奴隶主对奴隶的统治。国家机器完备，宗法制度严密。农业生产规模更大，生产工具也更为先进。所以，周代文化发展超越前代。

周王朝建立后，为了处理政治、军事、外交、宗教的各种事务，分别设置多种职责不同的官吏。其中，有一种称为史官的，与典籍发展关系甚大。

---

① 李孝定. 甲骨文字集释：第2集[M]. 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1970：663-664.

西周史官见于记载者，有太史、内史，或称作册、作册尹等。他们的职责是在国家各种文化活动中协助周王处理日常事务，备顾问，记录史事，保管文书档案，《尚书·洛诰》称："王命作册逸祝册"，说明史官担任册书的撰写和言论的记录。

史官要从事文字的记录和史实的撰写，当然要找到一种记录文字的载体，他们沿用商殷时史官用甲骨记录文字的方法，同时也采用青铜器作为载体记录文字。利用竹木等材料记载文字，则还没有出土的文物作证明。

从出土文物的情况来看，也可以充分说明西周典籍的保藏与利用。1976年，陕西岐山凤雏村发现一组大型西周建筑基址，1977年，在此处一个窖穴中，发掘出1万多片西周时期卜甲，其中将近200片是有字的。在扶风召陈村也发现大型西周建筑基址。1976年，扶风庄白村发现包括史墙盘在内的103件铜器窖藏，墙盘铭文长达284字。此外，考古工作者还在西周都邑丰、镐遗址，出土一批铜器。河南洛阳地区和其他地区发现西周墓葬，也出土大量铜器。可以看出，西周是承继商代的记录文字的方法，把文字铸造在各种铜器上。这些出土的卜甲和铜器，为我们了解西周历史提供了直接的材料。考古学家郭宝钧指出："商周铜器自早商二里头、二里岗的无铭，经过晚商的简铭，发展到西周的长铭，可谓达到了极盛点。东周以后，书帛简册通行，文字的应用极繁，琢之盘盂，终不如书之简册的容易，故春秋战国又返于简单的自作体而铭刻复少。"①从现在出土的大量西周的青铜器来看，一般在铜器上附有花纹，这是为了增加美感。而铜器附有铭文，是为了便于识别。文字的长短与铸造技术有关，当然也反映了时代风尚。

先秦的文献，为我们了解西周和春秋情况增加了材料。如《左传》僖公五年云："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为文王卿士，勋在王室，藏于盟府。"又《左传》定公四年云："其载书……藏在周府，可复视也。"又如《孟子·告子下》说："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庙之典籍。"又如《墨子·鲁问》中说："攻其邻国，杀其民人，取其牛马粟米货财，则书之于竹帛，镂之于金石，以为铭于钟鼎，传遗后世子孙。"这种说法，为我们列举了人们用于记录文字的各种载体，并说明当时藏书的地方。当时，除了应用钟鼎器皿铸造文字，还有用竹帛等记录文字。

周代史官的收藏，曾被学术界认为是藏书的起源。唐代魏徵等编撰的《隋书·经籍志》认为，史官是收藏典籍的官吏，并已有按专题分工。元代马端临编的《文献通考·经籍考》称："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则国家

① 郭宝钧. 商周铜器群综合研究[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160.

之所职掌者。"清代周永年在《儒藏说》谓："守藏之吏，见于周官，老子为柱下守藏史，固周人藏书之官也。"到了近代，学者在研究中国图书馆起源时，也把周代史官作为官府藏书的起源。其实，商周两朝都设有史官，他们都担负着相同的工作，即为王室备顾问，保存档案，记录史事，都是属于文化方面的官吏。如果说商史官的保藏偏重于档案，那么，周代史官保存的文献类型更加多样，并有把这些文献加以利用的情况，这种情况称为藏书的行为就更加典型了。由周代收藏有各种文献并把这些文献加以利用，文献的收藏也有一定管理制度来看，我们认为，如果把商代甲骨文献的收藏称为古代藏书的萌芽，则周代是古代藏书成型时期的说法，应该是可以接受的。

第二编

简帛书时期的图书和藏书
（先秦—两汉）

第二章 简帛书与著述

第一节 简书与简书的形式

一、简书

汉代许慎《说文》称："著于竹帛谓之书。"学术界有些学者认为：我国最早的正式书籍是简书。简书又称简策，是指写在竹木材料上的文字记录。将竹木进行加工以后制成的竹、木片称为简，竹简和木牍是我国最早的书写材料。一篇较长的文字或一部著作必须连续写在许多片简上，为了防止散乱，以便有次序地阅读，必须将这许多简有顺序地编连起来，这种编连起来的许多简便成为策（通"册"）。所以古人说："简谓据一片而言，策是编连之称，……是简者，未编之称。"（唐贾公彦《仪礼注疏·聘礼》）简还有许多称谓。《尔雅·释器》说："简谓之毕。"晋郭璞注："简，札也。"《说文》说："简，牒也。"故简又称毕、札、牒。

已发现的制简的材料有竹、木两种。用竹制的称为竹简，用木制的称为木简。

古人制简的方法，据王充《论衡·量知篇》载："截竹为简，破以为牒，加笔墨之迹，乃成文字。大者为经，小者为传记。断木为椠，析之为板，力加刮削，乃成奏牍。"这段话是说制简的方法是先把竹子裁截为竹筒，然后再劈开竹筒削成竹片——牒，也就是简。最后按不同的文字内容，分别写在大小规格不同的牒上，如经书写在较长的简上，解释经书的传记文字则写在较短的简上。这是竹简的大致制作方法。至于版牍，已发现的木牍材质多选用当地出产的色白、质轻、易于吸收墨汁的木类，例如白杨木、柳、柽柳、松等。

就竹简而言，上述过程只是叙其大要，其实竹简制作，为了防止虫蛀和霉烂，在书写之前，还需进一步加工处理，这一道工序叫“杀青”或“汗青”。

据《太平御览·文部二十二·简》转引《风俗通》的话说：“刘向《别录》云杀青者，直治竹作简书之耳。新竹有汁，善朽蠹。凡作简者，皆于火上炙干之。陈楚间谓之汗。汗者，去其汁也。吴越曰杀，杀亦治也。”

杀青或汗青是制简的一道重要工序，所以至今人们还借用这一术语，以表示写作完成或书籍定稿。汗青，又作书籍和史籍的代称，亦称“青史”。青，即新竹。文天祥《过零丁洋》诗曰：“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亦如人们所常说的“青史留名。”

由于木的体积比竹大，可以制成版，版，又称为方。每一块版上较之竹简，可以容纳更多的字，不必编连，可单独使用。写上文字的版，则称牍。所以古代的许多文字记录称为“版牍”或“方策”。《礼记·中庸》上便有“文武之政，布在方策”的记载。

古代的版牍与简策即方与策有以下区别：超过一百字以上的长文，写在简策上，不到一百字的短文便写在版牍上。《仪礼·聘礼》：“百名以上书于策，不及百名书于方。”大事记在简策上，小事记在版牍上。晋杜预《春秋左氏传序》说：“诸侯亦各有国史，大事书之于策，小事简牍而已。”

据古书记载及近现代考古发现的实物证明，写在木板上的文字，大多是官方文书、户籍、告示、信札、遣册和图画。由于作用不同，各有专名。如用在军事上称为“檄”。《汉书·高帝纪下》颜师古注：“檄者，以木简为书，长尺二寸，用征召也。”用于告示，称为“榜”。用于信札，又有不同的名称：信札的内容写在木板上，然后覆盖一板，叫“检”(相当于信封)；在检上写寄信人和收信人的姓名、地址叫“署”，再后用绳子将两块板合好捆扎叫“缄”，在打结的地方涂上黏土，上盖阴文印章，在黏土上显出凸字，这就是“封”，使用的黏土便称为“封泥”。由于写信用的木板，通常是一尺长，所以信札又称“尺牍”。古代的地图绘在帛和木板上，至今仍把一国的疆域称为“版图”。从“檄”、“榜”、“检”、“版”、“牍”，各字从木(片即半木)来看，写在木板上的文字，主要是属于文书性质的。另外，还有专用于练字或日常记事的版牍，叫做“笘”、“籥”或“觚”。许慎《说文解字》释：“笘：颍川人名小儿所书写为笘。”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说：“笘谓之籥，亦谓之觚。盖以白墡染之，可拭去再书者，其拭觚之布曰幡。”苏鹗《苏氏演义》更说得具体：“觚者，学书之牍，或记事。削木为之，其形或以六面或以八面面面皆可书，以有圭角，故谓之觚。”专用于起草文稿的板片则称为“椠”。它是一种未经加工的粗糙板片。



简策流行的时间，根据记载并不比甲骨文和金文晚。据历史学家郭沫若的推测，简牍可能在殷代已经出现。他说：“殷代除甲骨文之外，一定还有简书和帛书。《尚书·多士》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甲骨文也有册字和典字，正是汇集简书的象形文字。但这些竹木简所编纂成的典册，在地下埋藏了三千多年，恐怕不能再见了，帛书也是一样。”①不过，从现代考古发现的实物来看，只限于战国和战国以后，而且相沿很久，从上古直到公元3世纪或4世纪，一直作为书写的主要材料和图书的载体。直到东晋末年以后才逐渐为纸所替代。

二、古代简策的考古发现

简书的最早出现目前还缺乏准确考证。迄今为止只能从考古挖掘中获得一些认识。

关于古代的发现有文献可征的共有9次，其中最主要的有两次是两批竹简：

第一次发现是在西汉武帝末年，鲁恭王破孔子宅，在宅壁中发现了一批战国时代的竹简(见《汉书·艺文志》、《尚书正义序》)。内容是战国时代人抄写在竹简上的儒家经典，即用古文写的《尚书》、《礼记》、《论语》、《孝经》等数十篇，因与当时的传本不同，故称为“古文经”，从而引起了一场长期的经书今古文经的争论。

西晋太康二年(281年)，一说是西晋咸宁五年(279年)，有名叫不凖的人在汲郡(今河南汲县)盗发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书简数十车，凡75篇，十多万字，经过当时学者荀勖、束皙等人整理，写成当时文字的书16种，统称“汲冢书”。流传至今的有《逸周书》、《竹书纪年》、《穆天子传》、《琐语》四种，但都不是原本，是后人辑佚的。

20世纪初到新中国成立前在我国西北新疆、敦煌、居延等地区共有8次发现。多是汉晋时期的木简牍，地址均在西北地区，其内容多为古文书、信札及簿册等，图书有《论语》、《尚书》、《仓颉篇》、《急就篇》、《牛子》及日历、方书等。其中值得特别一提的是1930年西北科学考察团在今甘肃额济纳河流域黑城附近，发现汉代木简1万多枚，因该地区原属汉代张掖郡居延县，故称居延汉简。这是新中国成立前出土最多的一批，内容涉及西北边塞地区的行政、边防、邮驿、屯田及戍卒的日常工作和生活等许多方面。虽然不涉及图书，但其中有一份由77根木简编连成策的东汉和帝永元年间的

① 郭沫若．奴隶制时代[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196．

兵器簿，出土时原简编缀形式保存完好，从而可以了解当时的编简形式，也证实“册”字造字的原始，成为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装订完整的“书”。这一实物现存放在台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出土的古简更多，除原西北一带之外，沿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及沿海一带均有所发现，而且数量远远超过以前的发现。仅1996年9～11月在湖南长沙走马楼22号古井内清理出十几万枚三国时期的吴国简牍，其总数超过全国历年出土简牍的总和。不过长沙走马楼简牍主要是档案文献，不包括图书。20世纪50年代以来发现的简策中的古书主要有：

1959年，甘肃武威磨咀子6号墓中出土汉简480枚，包括《仪礼》简460枚，日忌杂简11枚；同时在18号墓中出土“王杖十简”。其中《仪礼》简，是现存“经书”的最早者。为《仪礼》的版本、校勘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1972年，在甘肃省武威旱滩坡的一座东汉早期墓葬中出土了92枚医药简，基本上是一部方书，保存医方30多个，包括了临床医学、药物学、针灸学的丰富内容，内载有100种药物，其中约有22种为《本草》所未载，为迄今发现的最古而较完整的医方著作。

1972年在山东省临沂银雀山一、二号汉墓中发现4 900枚竹简，一号墓竹简内容为《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六韬》、《尉缭子》、《晏子》以及不少军事、政治和阴阳杂占等佚书；二号墓竹简内容为《汉武帝元光元年历谱》。这些竹简的出土，对有关古籍的校勘、辑佚和辨伪等工作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孙膑兵法》与《孙子兵法》的同时出土，结束了长期以来关于这两部书的一些悬而未决的争议。《汉武帝元光元年历谱》的迄今最早最完整的我国古代历谱。它的发现，使得汉初历日得以考证确实，纠正了过去推算上的错误。

1973年，在河北定县40号汉墓中出土了大批竹简，竹简炭化成块，残损严重，经整理，共有以下几种内容：《论语》、《儒家者言》、《哀公问五义》、《保傅传》、《太公》、《文子》、《六安王朝五凤二年正月起居记》、《日书·占卜》。这批简书对于辑佚、校勘、订正古籍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1975年，在湖北云梦睡虎地11号秦墓中出土了1 150枚竹简，内容为《编年纪》、《语书》、《秦律十八种》、《效律》、《秦律杂抄》、《法律答问》、《封诊式》、《为吏之道》、《日书》甲、乙种等，为研究秦国和秦朝的法律制度提供了珍贵资料，弥补了文献记载的匮乏。

1977年，在安徽阜阳双古堆一号汉墓中，出土大批木简，损坏严重，清理出十多种古籍，包括《仓颉篇》、《诗经》、《周易》、《年表》、《大事

记》、《杂方》、《行气》、《相狗经》、《辞赋》、《刑德》、《日书》等。

1983年，在湖北江陵张家山三座汉墓出土了2 787枚竹简，内容为《律书》、《奏谳书》、《盖庐》、《脉书》、《引书》、《算数书》、《日书》、历谱、遣册等，其中《算数书》是我国最早的数学著作，这些为研究汉代的法律制度、数学和历法等提供了极其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1993年冬，在湖北荆门郭店一座楚墓中，出土了大量竹简，其内容都是典籍。包括：道家著作有《老子》甲、乙、丙三组，均系摘抄，不相重复，丙组简附有《太一生水》是对《老子》的解说引申；儒家著作分为两组，第一组有《缁衣》、《五行》、《成之闻之》、《尊德义》、《性自命出》和《六德》共六篇，第二组有《鲁穆公问子思》、《穷达以时》两篇；还有《唐虞之道》、《忠信之道》两篇，近于儒学，强调禅让。另《语丛》四组，杂抄百家之说，大约是教学用书。这批简书，对于研究先秦时期的学术发展脉络意义重大。

除上述直接来自考古发掘外，另1994年上海博物馆也从香港购藏了一批战国竹简。内容包括：《易》、《孔子诗论》、《性情论》、《缁衣》、《子羔》、《孔子闲居》、《彭祖》、《乐礼》、《曾子》、《武王践阼》、《子路》、《四帝二王》、《颜渊》、《乐书》、《卜书》等80余种古籍。其中《孔子诗论》记载了不见于世传的孔子言论，还有一些不见于《诗经》的古诗，极有学术价值。2008年7月，清华大学收藏海外捐赠简策2 388枚。经测定该批简策年代定为战国中期，内容包括《尚书》和编年体史书等经史文献，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有多篇《尚书》的佚篇和周武王时的乐诗，具有重大价值。

三、简书的形式

长度　竹简的长度，据文献记载，似有定制。王国维《简牍检署考》说："古策有长短，最长者二尺四寸，其次二分而取一，其次三分取一……周末以降，经书之策皆用二尺四寸。"又说："《盐铁论·贵圣篇》：'二尺四寸之律，古今一也。'则律书之制也。此上所云尺寸，皆汉尺，非周尺。周尺二种，一以十寸为尺，一以八寸为尺。……其以八寸为尺者，汉之二尺四寸，正当周之三尺，故《盐铁论》言'二尺四寸之律'，而《史记·酷吏传》称'三尺法'，《汉书·朱博传》言'三尺律令'……盖犹沿用周时语也。"①但从出土实物来看，有合的也有不合的。以经书而言，如武威出土的汉简《仪礼》有三种本子，其长短则不一，甲、丙两种，其长度在55.5～56.5厘米，相当于汉尺二尺四寸，而乙本则不足。再以律书而言，睡虎地的秦律长度仅

① 王国维著. 简牍检署考校注[M]. 胡平生，等注.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14-23.

23~27.8厘米，若以23.5厘米为汉尺一尺的话，最长的只有一尺二寸，仅及二尺四寸的一半，其余诸简也皆长短不一，如历谱，银雀山出土的汉元光元年历谱长69厘米，将近汉尺三尺，而敦煌出土的汉元光三年历谱、汉神爵三年历谱，其长度不及前者的一半，且这都是汉朝的，相殊竟如此之远。即使在同一墓中，同一性质的简，其长度也不一致，如长沙马王堆三号墓所出之200枚医简，就有三种长度，分别为22.4厘米、23厘米、29.8厘米。这有待于进一步研究。现在我们只能说，简书长短一时有定制，较长时期则无定制。

字数与字体 竹简是一种长而窄的材料，长度已如上述，其宽度文献上无具体记载，从发现的实物来看，有0.6~1.2厘米不等，故通常只书写一行字，间亦有两行以上的。每简字数少的只有几个字，一般在四五十字上下，个别有多达123字的(如武威出土的《服虔》第17简)。看来字数多少，并无规定，主要依据简的长度以及书写中字形的大小和字间疏密来决定。书写顺序是从上到下，从右至左直行排列。这一直影响着我国历代的书写习惯和阅读顺序。直到现代才逐渐改为从左到右的横行书写和排印。

简上的字体因时代而有所不同，先秦古简多用古文、篆字，秦统一中国后，通行隶书，故秦汉简多为隶书。

书写 在简书实物发现以前，人们根据古书上"笔削"的记载，曾误认为简上的字是笔写后再刀刻上去的，实物证明是用毛笔写上去的，而非刀刻。所谓"削"是将写错的字，用刀削去错字以便重写，故有"笔削"之说。书写和刮削所用的工具与简书也有同时发现的例证。如在河南信阳长台关一号战国墓中就同时发现有笔、笔筒和铜削刀；湖北云梦睡虎地的秦墓中也有笔和削刀；湖北江陵凤凰山的西汉墓中也有笔、墨、砚和青铜削刀。这些有力地说明了古代简书的书写情况。

编连 如前所述，一篇较长的文字，必须写在许多简上，为了方便阅读，不致发生错乱，必须把许多简编连起来，这就成了"策"，合成简策。策是册的假借字。册的写法很多，如"筴"、"笧"等。"册"本身是一个象形字。《说文》说："像其札一长一短中有二编之形。"甲骨文写作𠕋或𠕁。这是通常的情况。出土实物证明，此外还有三道编(如睡虎地秦简、银雀山《孙膑兵法》和马王堆医简)，四道编或五道编(如武威《仪礼》、银雀山汉元光元年历谱)，也有少于二道编的，如凤凰山117号汉墓的74枚木简，只有一道编。看来编连的多少也无定制，大约是依据简的长度而定。

编连用的材料，通常用的是麻绳、丝绳或绸条。丝绳的编连，古代文献中多有记载：如晋荀勖《穆天子传序》说："《穆天子传》者，太康二年汲县民

不准，盗发古冢所得书也，皆竹简，素丝编。”唐虞世南《北堂书钞》引刘向《别录》说：“孙子书，以杀青简，编以缥丝绳。”至于麻绳，则有甘肃居延等地出土的实物为证。

另外，还有一种据《史记·孔子世家》中的“韦编三绝”而来的“韦编”。过去释家多据《说文》对“韦”的解释是“兽皮之韦”，而引申为“用熟牛皮编简”，即认为熟牛皮绳也是一种编简的材料——这是传统的说法，至今没有实物发现。当代有人认为“韦编”的“韦”，为“纬”的初字。应读为横线的“纬”(wěi)，不读兽皮的“韦”(wéi)，指出“韦编”即“纬编”也就是竹简上的横编。①

至于简策是先编后写，还是先写后编呢？从对实物的考察分析，两种情况都有。但一般说来，作为书籍，多数是编好后再写的，例如武威医简上的第三道编痕上有空白，《仪礼》在编绳编连处也空白无字，证明是先编后写的。可以设想，写好再编一则容易错简，再则编绳也容易遮盖简上的字，是会影响阅读的。但簿记性的东西，则采用先写后编。如《永元器物簿》，简上的编绳遮盖了简上的字迹。证明是先写后编的。

结构　策的开头，常有两枚简是不写字的，称为“赘简”。因为简书是卷放的，露在外面的赘简是作为保护有字简之用的，如《武威医简》。可以说，这是现在书籍中“护叶”的开端。有些在其背面标有篇题。第一枚写篇名，第二枚写书名。如武威出土的《仪礼》和银雀山出土的《孙子兵法》与《孙膑兵法》皆是。简书的舒卷是由后向前卷起的，赘简背面的篇题，恰露在外面，开卷之前便可了解到全篇的内容了。

简书有时称篇，“篇”是按内容起讫自为长短，有时称卷，而“卷”则是竹简编联成册的一种长度规格。② 一部书常有许多篇，为了集中保管，便加上一层竹制或帛制的外衣包裹起来，而成为一帙。帙就是书衣；或用口袋盛着，而成为一囊。囊，即口袋，因此，“书帙”、“书囊”，成为一种专门的术语，有时作为图书的计量单位。在我国古代藏书目录中，从《晋中经簿》开始，直到《隋书·经籍志》，就有帙数的著录，由此形成图书的许多异称，如囊箧(箧，一种盛书的箱子，在居延简中就有“书箧一”的记载)，“卷帙”、“缥帙”(一种青白色的书衣)、“缃帙”(一种浅黄色的书衣)、“缥缃”(泛指各种颜色的书衣)和“缥囊”(一种青白色的书袋)等。

---

① 商承祚．“韦编三绝”中的韦字音义必须明确[G]．大公报在港复刊三十周年纪念文集，1978：105-108.

② 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M]．北京：三联书店，2004．119.

简策是我国早期的书籍形式，其间绝大部分著作是写在简策上的。简策制度对后世书籍的影响也很深，就是现代的许多出版物中，也有许多东西是因袭简策制度的。在纸发明和普及以前，竹木既是比较方便书写，又是易获得和易加工的材料，所以简策的出现是促进写作的一种力量，提供了写作的条件。

第二节　帛书和帛书的形式

一、帛书

帛书是指以缣帛为书写文字的载体的一种文献。缣帛是丝织品的通称，其中包括帛、素、缯、缣等可用于书写者，所以帛书有时也称缣书、素书和缯书。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植桑养蚕和织造丝织品的国家。传说在公元前3000年嫘祖已发明养蚕织丝了。从甲骨文中已有丝、蚕、帛、桑等字看来，至少说明殷代已有了养蚕和丝绸织造。但最初这种丝绸织物是做衣料和装饰品用的，至于什么时候用来写字作书便不可考了。《论语·卫灵公》中有“子张书诸绅”，以及《周礼·夏官·小司马》中有“凡有功者，铭书于王之大常”的记载。“绅”，指腰带；“大常”，即大旗，都是用丝织品制成的，证明春秋时代已有文字书其上。又《晏子春秋·外篇第七》说：“晏公谓子曰：‘昔吾先君桓公，予管仲狐与谷，其县十七。著之于帛，申之以策’。”这又证明春秋时代已把缣帛作为书写材料了。到战国时代则比较普及，如《墨子》一书中多次提到“书于竹帛”，《韩非子·安危篇》也说：“先王寄理于竹帛。”说明战国时代使用缣帛作为书写材料已经比较普及。一般认为帛书晚于简书出现，但至迟也在这个时候。

缣帛质地轻薄，幅面宽阔，容易书写和携带，并且可以根据文字的长短任意剪裁，舒卷方便，易于保藏和阅读。所以帛书实际上克服了简策所存在的种种缺点，是书写材料的一大进步。但缣帛毕竟是一种贵重的丝织品，并非一般人所能制备和拥有的，所以有“贫不及素”之说。因此帛书的出现，并不能完全代替简书，作为主要的书写材料仍然以简策居于主要地位。

缣帛之用于书写，至迟在公元前六七世纪，其后延续使用，几近千年。秦汉时帛书已不少。据应劭《风俗通》说：“刘向为孝成皇帝典校书籍二十余年，皆先书竹，为易刊定，可缮写者以上素。”到东汉末年，朝廷所藏帛书已为数不少。据《后汉书·儒林传序》所言：“及董卓移都之际，吏民扰

乱，自辟雍、东观、兰台、石室、宣明、鸿都诸藏，典策文章，竞共剖散，其缣帛图书，大则连为帷盖，小乃制为滕囊。”及至晋代，虽然纸已开始普及，但帛书继续存在。《隋书·经籍志》载：晋荀勖整理《晋中经簿》时“盛以缥囊，书用缃素”。此后随着纸的进一步普及，帛书才逐渐减少。

二、古代帛书的考古发现

由于帛的贵重，作为书写材料自然比不上竹木使用的普遍，加上缣帛更易损坏，不易保存，所以古代帛书实物能流传下来的极少，考古发现远没有简书那么多。就目前所发现的帛书中大致有三种类型，即信件、绘画和书籍。

1. 信件：至目前为止共有两次发现

1907 年，斯坦因在甘肃敦煌所发现的两件：一件为 9 厘米见方；一件长 15 厘米，宽 6. 5 厘米。其内容是内地与边疆的通信。信上没有注明日期，据同时出土文物考证，系公元 15 年至 56 年间之作，即西汉末至东汉初期的帛书实物。另一次发现是在 1990 年至 1992 年间在甘肃省敦煌与安西县之间的甜水井悬泉置遗址中发现的帛片信件，共 10 行 370 个字，是目前已知西汉时期最完整和文字最多的私人信件。同时发现的还有 2 万余枚汉简。

2. 绘画

截至 20 世纪 70 年代为止共有六次发现，计战国时期 3 件，汉代的 6 件。其中除一件为山东临沂外，其余均发现于湖南长沙。它们是：1942 年在湖南长沙子弹库的楚墓中发现一件帛书，通称“楚缯书”，宽 47 厘米，长 38. 7 厘米。此缯书主文分为三段，一直书，一倒写，各分 8 行及 13 行，共约 750 字；四周有以彩色绘成的图像，各有标题及说明文字，共约 250 字。图像中有树木、鸟兽及奇形怪状的人物。树木分置四隅，各以青、朱、黑、白四色绘成，表示四时；四周有神像十二，代表十二月，各种像下标有神名及职司，并记载该月忌宜。据专家考证其月名与《尔雅》所载大致相同。这增书上的文字和图画，与古籍所载，尤其与《山海经》中的神话相符，是十分珍贵的古代帛书，可惜流落在美国。

1973 年，湖南省博物馆对该墓再次发掘和清理，又发现了一件人物御龙帛画，细绢质地，金白粉绘，长 37. 5 厘米、宽 28 厘米、画中有一男子，手执缰绳，驾驭一条巨龙，龙尾上站立一鹤，昂首仰天，下角有一条鲤鱼。据称这是迄今发现用白描粉彩画法的一件最早的作品。

1949 年，在湖南长沙陈家大山的一座楚墓中出土一幅高 28 厘米、宽 20

厘米的帛画，画面为一侧面蜂腰妇女，向左而立，长衣曳地，头上有髻，髻上有冠，合祷做祈祷状，其顶有一鸟及一兽相搏斗。据称鸟为凤，兽是夔。凤是生命、婚姻、幸福之象；而夔则是死亡、饥馑、邪恶之征，象征着生命与死亡的斗争。

1972 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中出土一件覆盖在棺木上的彩绘帛画，画幅全长 20.5 厘米，上部宽 9.2 厘米，下部宽 4.8 厘米，成 T 形，用朱砂、石青、石绿等矿物颜料绘成。画面大致可分上、中、下三个部分，分别表示天上、人间和地下的景物，或系传说，或系生活的写实，或系想象。

1973 年，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又发现了彩绘帛画四幅，其中有一幅“车马仪仗图”，在一个画面上描绘出几百人物、车马检阅出行的场面，是我国目前所能见到的第一幅大型、完全写实的作品。

1976 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墓中，也出土了一件长 200 厘米、宽 42 厘米的帛画，据称是随葬的旌幡。

3. 书籍

1973 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有大批的帛书发现，共 26 件，12 万余字。内容包括《周易》、《丧服图》、《春秋事语》、《战国纵横家书》、《老子》甲乙种、《九主图》、《黄帝书》、《刑德》甲乙两种、《五星占》、《天文气象杂占》、《篆书阴阳五行》、《隶书阴阳五行》、《木人占》、《符箓》、《神图》、《筑城图》、《园寝图》、《相马经》、《五十二病方》、《胎产书》、《养生图》、《杂疗方》、《导引图》、《长沙国南部图》、《驻军图》等。

其中有两部《老子》抄本，分别定名为《老子》甲本和《老子》乙本，每部上下两篇，次序与传世的本子相反，今本《道经》在前，《德经》在后，故《老子》又称《道德经》；而新发现的帛书，则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在“甲本”卷后和“乙本”卷前，还分别各抄有四篇佚文，近 3 万字，经研究认为“乙本”卷前的四篇佚文，可能是西汉初期黄老思想的代表作；“甲本”卷后的四篇佚文，则对研究儒家的五行学说很有价值。

《周易》比今本多出 4 000 余字，且 64 卦顺序也与今本不同。

还有被定名为《战国纵横家书》27 篇，是记载苏秦、苏代等人的言行，共 11 000 余字，其中 11 篇见于今本《战国策》和《史记》。关于战国时期游说之士的活动，特别是关于苏秦的史料，《史记》记载有许多讹误，即所谓“世言苏秦多异，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史记·苏秦列传》)。此书的发现，可以补充大量的历史资料。

《五星占》是一部有关科技方面的佚书，它记录了 2200 多年前(秦始皇

元年至汉文帝三年，前246—前177年），人们对五大行星运动经过长期观察所作的历象记录，其中有对行星运动的描述和数据，反映出汉初天文学方面所达到的高度和水平。

《五十二病方》收集有医治50多种疾病的近300个医方，涉及内、外、妇、儿、五官等科各种病症的多种疗法。还有一幅《导引图》（导引，呼吸运动和躯体运动相结合的一种医疗体育方法），分别描绘出44个男女的各种运动姿态，以及主治病症的名称。它反映出我国体育健身运动也有悠久的历史。

《长沙国南部图》和《驻军图》这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的古代地图，比我们此前所能见到的《华夷图》、《禹迹图》石刻（1136年）还要早1000多年，它反映出当时测绘和制图水平是相当高的。

这次发现非常重要，帛书内容涉及战国及西汉初期政治、军事、思想、文化及科学等各个方面，不仅提供了大量佚书，作为研究的新资料，也反映了一些与今本不同的古本，给校勘和版本研究提出了许多研究课题，同时也为帛书的形制提供了实证，弥补了文献记载的不足与缺失。

三、帛书的形式

关于帛书的形式，古籍中还未曾见到过详细的记载。《后汉书・襄楷传》中说："顺帝时，琅琊宫崇诣阙，上其师干吉于曲阳泉水上所得神书百七十卷，皆缥白素、朱介、青首、朱目，号《太平清领书》。"缥素，即以淡青色的素作质料；朱介，以红色作界行；青首，以青色作卷首；朱目，以红色书写标题。又唐徐坚《初学记》卷二一载："古者以缣帛，依书长短，随事裁之。"这说明帛书的长短，是依内容长短来决定的。帛可以根据需要截取，而且装饰也很漂亮，中画界行（也有预先织成的），其用红色者称为"朱丝栏"（朱介），黑色的称为"乌丝栏"。文字写在行格之内，马王堆帛书上都是用朱砂或黑墨画上浅色的行格（也有没有行格的）。整幅帛书行格宽7.8毫米，半幅的行格宽2.3毫米；高度，整幅帛为48厘米，半幅为24厘米，与二尺四寸及一尺简相当，每行字数六七十字，也与简相近；有的分上、下两栏也像简的编绳，所以有人说，界行是仿简形而制的，感觉这是偶然的巧合，其实界行之设，应是为了方便书写。不过说帛书的内容是由简书转录而来的，倒是可信的。因为人们发现帛书中有抄错抄漏之处，错漏的字数，往往是一枚整简的字数，便是明证，再者前文中我们已引用过的刘向校书"皆先书竹，改易刊定，可缮写者以上素"已经说得明白不过了。至于说到帛书的题记方式与简书的题记方式相同，都写在每篇末行空白的地方，这也是当

时的习惯或格式。

过去说到帛书，想到它易于舒卷，以为只有这一种形式。在马王堆发现的帛书中，的确存在着这样的卷轴式，仅限于写在半幅帛的那种，即用一根竹条作轴从后向前舒卷成一束，与简书卷存一样，不过由于简书本身坚挺，不必加轴而已。马王堆帛书中的另一种形式则是整幅帛书折叠成长方形存放在漆仓内存放，可见帛书并非完全是卷轴。

另外帛书轻柔，幅度可长，容纳的内容较多，所以一幅帛书的内容可以容纳简书的几篇；甚至一幅帛上，当一书抄完有余幅时，有时再写上其他文字附于后。马王堆帛书中，也出现过这种情况，在一幅帛上抄有几种书，为了区分是不同的书，在每种书的起首一行的上端，涂有一个墨钉作为标识，表示一书的开始，而书名则写在正文后面，并标以字数。

帛书在书籍发展史上，曾经起过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就卷轴制度而言，它充分发挥了本身易于舒卷的优点，承袭了简书中卷存的方法，并依据本身的特点加轴而卷，而形成卷轴制度，并且传继于以后的写本书；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它促使人们努力去寻找一种既有其优点，而又价廉易得便于书写的新材料。以后，终于发现和发明了这种新的书写材料——用植物纤维制造的纸，从而导致图书史上，乃至整个人类文化史上的一场大革命。

第三节　春秋战国时期的著述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大变革时期，即奴隶制度开始瓦解并逐步向封建社会过渡的转型时代。

春秋以前，“学术统于王官”，一切典籍，都归统治者所专有，由史官所掌握，用以为统治阶级服务，用以传授贵族子弟作为延续他们统治的工具，而被统治的奴隶阶级和平民均无权受用。到了春秋时代，社会发生了剧烈变化。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和奴隶不断起义的结果，导致社会形态开始变革，新的生产关系在逐步形成，产生了新的阶级和阶层，尤其是“士”的分化，促成了“学术下移”，知识不再为奴隶主阶级及其史官所垄断。春秋末年，私人讲学风气兴起，由于讲学的需要，而从事文献的整理，并由此而发生这一时期的著述。

孔子(前551—前479年)首开私人讲学之风，他用以教育学生的课本，就是经他整理或编定的“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中，除《乐》失传以外，其余“五经”是我国现存最古的著作。

《诗》，是一部两周时代的诗歌选集。据说当时有3 000篇，孔子选取了

其中305篇，学者取其成数，称其为《诗三百》与《三百篇》。汉以后，又尊它为《诗经》。按其来源和性质，分为风、雅、颂三大类。

风——是来源于民间歌唱的诗，是反映民情风俗和疾苦利弊的，以下再按地域分为15小类(二南和十三国风)，共160篇。

雅——是朝廷歌唱的诗，分大雅和小雅，是朝廷的“正乐”。大雅，用于国家大典仪式；小雅，则用于一般朝廷宴会，共105篇。

颂——是宗庙祭祀的颂诗，是赞美祖先功业的。按时代分周颂、鲁颂、商颂三类，共40篇。

《诗》不仅是我国文学宝库中的一枝奇葩，而且又是研究殷周社会颇有价值的文献史料。

《书》，又称《尚书》或《书经》。“尚”同“上”，对“尚”的解释有三种：一曰指上古，二曰指崇尚，三曰指君上。“尚”字是后来加的，如“经”一样，非原有之名，其原名只称为《书》。荀子曰：“书者，政事之纪也。”(《荀子·劝学》)因此，《书》的性质是政事的记录。刘知几说：“孔子观书于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乃删其善者，定为《尚书》百篇。”(《史通·六家》)据说原有2 240篇之多，孔子节取了其中100篇，按时代编次(虞、夏、商、周)。它是我国上古时期的历史文献汇编。其中包括：典(五帝之书)、谟(谋议)、训(教说)、诰(告示)、誓(誓师之词)、命(命令)等。

现存《尚书》有今、古文之分。今文《尚书》是秦始皇焚书后由汉初经师所保存，用当时通行的隶书写的；古文《尚书》是汉武帝时陆续发现的古本，是用古文写的。今存《尚书》58篇，除30篇为今古文《尚书》所共有，其余的一般认为是东晋人所伪造，所以称《伪古文尚书》。

《礼》，指《仪礼》，又称《古礼》，是古代一部礼制的汇编。其中记载了统治阶层中冠(成年之礼)、昏(婚姻之礼)、丧(丧事之礼)、祭(祭祀之礼)、朝《朝觐之礼》、射(射击之礼)、乡饮酒(尊长之礼)诸礼仪。它和战国汇编的《周礼》、西汉时汇编的《礼记》合称“三礼”。

《乐》，今失传。一说本经经秦焚书而亡佚；又说无本经，就是《周礼·大司乐章》，或仅指古人演奏的乐谱，无记录。

《易》，即《周易》。原是古代卜筮之书，分经和传两部分：“经”由卦、爻两种符号和卦辞、爻辞构成；“传”有十篇，又称“十翼”。相传孔子经过长期钻研之后“序易传”。

“易”是简易的意思。是说筮法比卜法简易，它保存和反映了我国古代的一些朴素的辩证法思想。从历史事实和人生经验中，总结了若干条对人对事的原则，涉及了自然发展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的问题。可以说是我国最早

而完整的哲学著作。

《春秋》，是根据当时鲁国和国史删订整理而成的一部编年史。记载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至鲁哀公十四年(前480年)242年的史事，全书按鲁国编年记事，但记事范围则普遍涉及诸侯各国的历史。

春秋后的战国时代，社会形势变化的结果，出现了史称的“百家争鸣”时期。在政治上和学术思想上产生了许多代表人物，形成了各种学派。如：儒家、墨家、道家、法家、名家、纵横家等政治哲学派别；农家、方技、阴阳及杂家等各种专门学术思想。他们纷纷著书立说，涌现出一大批著作，后世称为“子书”。除儒家著作如《论语》、《孟子》等列人“经书”外，先秦诸子著作，重要的有《管子》(管仲)、《邓析子》(邓析)、《墨子》(墨翟)、《老子》(李耳)、《文子》(老子弟子)、《关尹子》(关尹喜)、《列子》(列御寇)、《杨子》(杨朱)、《商君书》(商鞅)、《申子》(申不害)、《尸子》(尸佼)、《公孙龙子》(公孙龙)、《庄子》(庄周)、《慎子》(慎到)、《尹文子》(尹文)、《荀子》(荀卿)、《鹖冠子》(楚人)、《鬼谷子》(纵横家)、《亢仓子》(庚桑楚)、《韩非子》(韩非)、《孙子兵法》(孙武)、《孙膑兵法》(孙膑)、《吕氏春秋》(吕不韦)等。这些诸子著作，虽然并非诸子亲著，有的是他们弟子的记述，但多出自战国时期。

史学方面也有进一步发展。如为《春秋》作传的就有三家——《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和《春秋左氏传》，对《春秋》做了大量阐发和增补。《国语》和《战国策》也是这一时期有名的史学著作。《国语》还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国别史。

文学方面产生了伟大的史诗——“楚辞”，特别是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的《离骚》、《九歌》和《天问》，更是对后世诗歌产生巨大影响的名篇。

自然科学方面，最早出现的是农书。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战国时期就有《神农》和《野老》两种，已失传，在《吕氏春秋》的《上农》、《任地》、《辨土》、《审时》中，保存了先秦的农学片断，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农学著作。医药方面的《黄帝内经》和《神农本草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医典、药典。《内经》中还记载了我国最早的人体解剖知识，在世界上最早提出血液循环理论。相传为战国时期著名医学家扁鹊所著的《黄帝八十一难经》是中医名著。天文学方面，有甘德的《星占》和石申的《天文》(合称《甘石星经》)，比较精确地记载了120颗恒星的方位和距北极星的度数，是世界上最古的恒星表。数学方面有《周髀算经》和《九章算术》也是我国最早的数学著作。此外，如《周礼》中的《考工记》是论述铸造的，《礼记》中的《月令》是讲物候的，《吕氏春秋》中的《精通》是讲物理的，《尚书》的《禹贡》是讲地理和土壤分类的。

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山海经》，不仅是一部我国著名的神话集，而且是一部我国最早的地理名著。

第四节 两汉的著述

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后，在文化方面采取了两项相反的措施：积极方面是实现“书同文”，即进行了统一文字的工作；而另一方面采取“焚书坑儒”的政策，破坏了文化的发展与继承。它不但使战国时期一度出现的“百家争鸣”的学术繁荣局面被扼杀，而且使得先秦以前的大批著作，几乎不传，这是我国文化史上，也是图书史上的一场浩劫。在这种情形下，汉朝初建，先是鼓励著作，继而废止秦之禁书律令，开创汉代著述之风。据《隋书·经籍志》载：“汉氏诛除秦、项，未及下车，先命叔孙通草绵蕝之仪，救击柱之弊。其后张苍治律历，陆贾撰《新语》，曹参荐盖公言黄老，惠帝除挟书之律，儒者始以业行于民间。”民间藏书开始陆续出现。武帝继位，第一次由政府下令在全国征集图书，继而“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随后开始有计划地进行整理，从而产生了我国第一部图书分类目录——《七略》。《七略》不仅是我国目录学、校勘学的开端，而且可以说是我国古代一部极珍贵的文化史、学术思想史著作。

由于汉武帝采取了“独尊儒术”的政策，结果儒家学说在西汉时期也有了新的发展。儒家著作被奉为经典，“五经”——《诗》、《书》、《易》、《礼》、《春秋》及解释“五经”的著作，如伏生《尚书大传》、毛公《诗训诂》、韩婴《韩诗外传》以及“春秋三传”等都在此时写成定本。后世根据其解释儒家经义的《尔雅》(唐宋时列为“十三经”之一)，也在此时编定。《尔雅》是我国最早解释词义的专著。到东汉时，注释经传的著作也有发展，出现了不少注释大家，如郑玄、何休、贾逵和服虔等。

两汉时除整理古籍和发挥“五经”文字外，时人也写了不少有名著作。

哲学方面有陆贾《新语》、贾谊《新书》、刘安《淮南子》、董仲舒《春秋繁露》、扬雄《法言》和《太玄经》、王充《论衡》等。其中《论衡》更是一部富有唯物主义思想的哲学名著。

史学方面，司马迁《史记》(原名《太史公书》，或《太史公记》)是我国文学上、史学上不朽的篇章，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开纪传体史书之先河。班固《汉书》是继《史记》之后的我国又一史学名著，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另外还有编年体史书《汉纪》(荀悦著)、地方志史书《吴越春秋》(赵晔著)和《越绝书》(作者佚名，亦说袁康)。

文学方面，主要是赋、散文和民歌组成的乐府诗。贾谊《吊屈原赋》、《鹏鸟赋》，枚乘《七发》，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扬雄《羽猎赋》等都是汉赋中的名篇。散文除司马迁《史记》这类最早成就作品外，还有贾谊、晁错等人的政论文字，如《陈政事疏》、《过秦论》、《论贵粟疏》等。乐府诗如《古诗十九首》是五言诗最早的代表作品。东汉末年"建安七子"的诗歌创作，更是我国文学史上的辉煌成就。

文字学方面，除辞书《尔雅》之外，东汉时还有许慎《说文解字》，是我国第一部分析字形和考究字源的字书。此外还有扬雄《方言》、刘熙《释名》、服虔《通俗文》等许多训诂专著。

科技方面，农学专著有《汜胜之书》，医学上如张仲景《伤寒杂病论》、《金匮要略》，天文学方面，如张衡著《灵宪》、《算罔论》，作浑天仪等都代表了当时最高成就，对后世科技发展有重大的影响。

此外，西汉末年，还开始了佛经的翻译工作，在我国文化史上第一次系统地输入了外国思想，并逐渐融合成我国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早期翻译佛经的是由西域来汉的僧人。他们将发源于印度的佛教经典，传入我国，丰富了我国图书的内容。

第二章　官府藏书制度的建立

第一节　春秋战国时期的官府藏书

西周末年，战火连年，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日益尖锐，幽王被犬戎灭于骊山，平王在一些贵族的护卫下东迁洛邑，史称东周，亦即春秋（前770—前476年）。

春秋时期是我国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阶段，当时各地区经济有了较大发展，农业上铁器的使用，牛耕的推广，水利灌溉的出现，使农业生产有了迅速的发展。平王迁都洛邑后，赐土地给立功诸侯，宗周只收纳朝聘，使各国诸侯在国内发展自己的势力，“私田”逐渐出现，奴隶制开始迅速崩溃。由于生产关系的改变，人们的思想意识也有了改变，“士”的阶层开始出现。“士”是由没落贵族的知识分子、小私有者上升起来的知识分子组成的，他们有一定的知识和文化，又迫切要求参与政治和军事活动，而诸侯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往往也招聘“士”，于是逐渐形成了学术下于私人的局面，有利于文化的传播，也有利于王朝典籍的转移。我国在春秋时代以前，文献典籍集中于官府，由有关的官吏掌管。到春秋以后，诸侯藏书逐渐普遍。

东周王室和鲁、宋、楚等国是春秋时的文化中心，所以保存典籍最多。现据古代典籍记载分述如下：

一、周王室藏书

周代史官制度是延续商代的，“史”主要负责文字书写方面的工作。因此，诸王室的史官担负着文字书写的工作，涉及如计历数、筮卜、算数、作册命、书大约剂等方面。史官的种类和人数是变化的。春秋时，诸王室的史官主要有太史、内史，太史协助周王处理政务，记录时事。内史主要受王命

作册书，宣王命。一句话，史官的任务是收集资料、保存资料，从这个意义上说，史官和收藏典籍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老子为周守藏室之史的故事，往往被人说成是当时的图书馆馆长。《史记·老庄申韩列传》称："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阳，谥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这说明，老子曾任周代史官，就是担任收藏典籍的史官。《史记·老庄申韩列传》司马贞《索隐》称："按：藏室史，周藏书室之史也。"他引《史记·张苍传》称老子为柱下史，即藏室之柱下，因以为官名，更明白地解释藏室为藏书室。老子身为藏室之史，可充分利用其藏书，故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撰成《道德经》，成为道家学派之祖。《庄子·天道篇》也称："孔子西藏书于周室。子路谋曰：'由闻周之征藏史有老聃者，免而归居。夫子欲藏书，则试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见老聃，而老聃不许。"按《庄子》所记述，孔子往问礼于老子，则学术上的交流是存在的。

值得注意的是，史官设置除周王室外，诸侯国也有史官，同样担负着收集资料、保存资料的任务。如鲁国有史官克、固、左丘明、掌恶臣，并有阙名者；晋国有史官伯黡、辛有二子、史赵、史龟、董狐、屠黍、史苏、史墨，并有阙名者；楚国有倚相、史皇，其他如郑、齐、宋等国，也都有史官。① 《左传》记载，鲁昭公十五年(前527年)，周襄王曾与籍谈说：你的先祖伯黡曾经管理过晋国的典籍，故称籍氏。教育籍谈不应该忘记自己是史官的后人。司马迁在谈到自己的家史时说："司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间，司马氏去周适晋。"(《史记·太史公自序》)这些都说明，春秋时史官与典籍发展的关系。

二、鲁国藏书

鲁国藏书也很丰富。鲁国史官保存的典籍成为诸侯各国查考和学习的材料。如《左传》记载：昭公二年(前540年)"春，晋侯使韩宣子来聘，且告为政而来见。礼也。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据此记载，大史是当时掌管典籍的主要官员，故别国来使，主要由大使接待，韩宣子往鲁国观礼，阅鲁《春秋》和《易》，最后感叹周礼尽保存于鲁，说明鲁收藏典籍是丰富的，对保藏也是很重视的。

现在留存的先秦典籍《左传》、《国语》，相传都与鲁国史官左丘明有关。

① 刘节. 中国史学史稿[M]. 郑州：中州书画社，1982：30-31.

唐刘知几称："又按哀三年，鲁司铎火，南宫敬叔命周人出御书，时于鲁文籍最备。丘明既躬为太史，博总群书，至于梼杌、纪年之流，郑书、晋志之类，凡此诸籍，莫不毕睹。"(《史通·申左》)这段史料说明，鲁国的史官左丘明不仅负责管理本国的史料，而且也管理其他诸侯国的文献，他还利用这些文献史料进行著述活动。

鲁国孔子(前551—前479年)是春秋时收藏典籍和整理典籍最著名的人物。孔子是春秋时教育家、思想家、文献学家，他进行教学，传授六艺，当然必须有先代典籍作参考，而教授弟子，必须有比较正确的本子，这又促使他整理旧籍。孔子对商周文化典籍的整理，是我国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

孔子首先曾广泛搜集鲁国、宋国和周王室的典籍。"昔孔子受端门之命，制春秋之义，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记》、得八十二国宝书。"(《春秋公羊传注疏·隐公第一》)子路等建议孔子问礼于老聃，《礼记·曾子问》记载孔子论礼，数次提到"闻诸老聃"，可见是充分利用了周王室的藏书。"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庄子·天运》)孔子是整理过《易》、《书》、《诗》、《礼》、《乐》、《春秋》六种典籍，还只是整理过其中的某些书，这是可以深入研究的问题。在整理《尚书》时，孔子比较集中地利用了周王室藏书。《史通·六家》称："《尚书》家者，其先出于太古。《易》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故知《书》之所起远矣。至孔子观书于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乃删其善者，定为《尚书》百篇。"在整理《诗》时，孔子也比较多地利用了周王室藏书。《汉书·艺文志》称："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零五篇。"《尚书》记载各代遗文旧典，如果不利用前代遗留的图书，是不可能整理的。《诗》载有风、雅、颂等部分乐章，风诗来自各诸侯国，是先王采诗之官从各地收集藏于官府的。雅、颂诗是王室乐章，自然必须采之于周王室保留的资料，从这也可以看出当时藏书之利用。有文献记载，《春秋》一书，孔子曾参与编定。文献又称，《礼》也是孔子整理的。这些记载说明，孔子当时参与了这些典籍的收集、校正和整理等工作。孔子曾有文献不足的评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论语·八佾》)如果不是亲自参与文献的整理，或是进行史书的著述，或对历史问题作探讨，他就不可能有这种文献不足的感叹。

三、楚国藏书

据《左传》记载，昭公十二年(前530年)，楚灵王在朝廷中指着左史倚

相说："是良史也，子善视之！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所谓三坟、五典、八索、九丘，注云，皆古书名，又称这些书是上世帝王遗书也。无论是时人所言、后人所注，都说明一个事实，其时楚国所藏典籍是相当丰富的。不然史官也无从阅读，而楚灵王也不会称赞这位史官了。

楚国强盛以后，足与诸国抗衡，故周之宗室与士等争相投奔。《左传》记载，昭公二十六年(前516年)："冬，十月丙申，王起师于滑。辛丑，在郊，遂次于尸。十一月辛酉，晋师克巩。召伯盈逐王子朝。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宫嚚奉周之典籍以奔楚。"说明王子朝曾经带了一批人和大量典籍投奔楚国，这是东周文化最大的一次迁移。从此，楚国文化得以发展起来。

四、战国时各国藏书

春秋末年，经过长期的兼并战争，形成了齐、楚、燕、秦、韩、赵、魏七雄并立的局面，我国进入到战国时期。战国时期(前475—前221年)一般称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开始阶段。

战国时期各国的藏书，则可从考古发掘和文献记载中略窥一二。

公元281年(一说279年)，有人在汲冢发现魏襄王(前312—前296年)时竹简，通称"汲冢竹书"。史载：此年冬十月，汲郡人不准掘魏襄王冢，得竹简小篆古书数十车，十余万言。朝廷把这批竹简古书收于皇家藏书中，并先后派出荀勖、和峤、卫恒和束皙等整理、写定，流传至今的有《逸周书》、《竹书纪年》等。汲冢竹书的出土，不仅在当时充实了晋朝的官府藏书，而且提供了战国时典籍的原始内容，部分学者"参而求之"，推动了学术研究，这件事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战国时魏国官府藏书的盛况。

战国时，各国国君出于维护封建法令的统一，曾采取过不准民间藏书只准官府藏书的措施。这种措施到了封建社会高度中央集权国家建立时，如秦、汉等朝，愈演愈烈，成为封建社会文化发展的重大障碍。

战国时，就有查禁焚毁典籍以巩固王朝统治的做法。有明确记载的是秦孝公时，曾采取"燔诗书而明法令"的举动。韩非子称："商君教秦孝公以连什伍，设告坐之过，燔诗书而明法令，塞私门之请，而遂公家之劳，禁游宦之民，而显耕战之士。孝公行之，主以尊安，国以富强。"(《韩非子·和氏》)商鞅提出燔灭诗书，是与坏井田，开阡陌，及耕战之赏的经济措施以及采用连什伍，设告坐之道的政治措施相表里的，目的是反对当时一些引《诗》、《书》旧籍反对变法的朝臣。从统一政令、国以富强这一点来看，当时曾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作为建立一种新的制度而必须摧毁旧的经济关系

的政治措施，这当然是必要的。但文化的继承与发展是有紧密联系的，燔灭《诗》、《书》旧籍，并不利于新的文化发展。所以，秦孝公的挟书禁令的措施，只能说是封建统治阶级落后性的表现。

第二节　秦王朝的官府藏书

一、秦的统一和宫廷藏书的建立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灭六国，结束了春秋至战国长期的诸侯割据局面，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封建中央集权制度的统一帝国。自秦朝起，我国历代基本上是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统一国家。文化上的发展也体现了这一点。汉族文化在封建经济、封建政权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并积极与国内各民族文化进行交流，发展了中华民族的光辉文化传统。藏书必须有固定的处所，充裕的经费以及比较稳定的社会政治经济条件。由于封建社会官府藏书类型逐步多样，藏书内容逐步丰富，管理制度渐趋完善，因而，它在社会政治和文化学术发展中起着明显的作用，古代藏书的社会地位日益提高，影响日益显著。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巩固这个前所未有的统一国家。战国时封建割据的局面，即“田畴异亩，车途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必须改变，不然就无法确立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和施行经济、文化措施，当然，也无法巩固封建帝国的统治。因此，秦始皇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如制定各种适合地主经济发展的措施，实行郡县制，加强中央政府的行政机构，迁富户至咸阳，以至统一驰道、度量衡和货币等，从而加强了对全国的统治。在文化上，秦始皇采用战国阴阳家的始终五德说，来维护秦朝的法统，使皇权神秘化；此外，还统一文字，废止各种字体，颁行《仓颉篇》于天下。这样，构成了秦始皇集中全国书籍，挟书禁令与焚书互为表里的文教政策的主要内容。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除了利用战国时各国遗留的典籍以外，还建立了多处宫廷和政府机构的藏书。这些藏书形成了王朝官府藏书的体系。《史记·太史公自序》称：“秦拨去古文，焚灭《诗》、《书》，故明堂、石室、金匮玉版图籍散乱。”《史记·六国年表》又称：“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据此，秦王朝官府藏书有称明堂、石室，又有称金匮的，唐司马贞《索隐》：“石室、金匮，皆国家藏书之所。”当时的藏书不仅是我们现在理解的典籍，而且还包括一般公文要件。一种典

籍有正本，亦有副本，分藏于各处。如秦律令，正本藏中央禁室，如有擅发、偷视，以至削禁令一字者，则判为死罪。副本则藏宫廷中，由少府遣派专司管理，随时准备查阅。丞相御史等处亦有副本，供民间查阅。前引“玉版图籍”，是一种用玉石材料书写的用于永久保存的正本。至于存在各处的一般公文，都是用竹木简制成。秦始皇揽大权，“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史记·秦始皇本纪》)。这说明通行的公文以竹木简策为多。

秦代官制沿用前代，但有所变更，执掌图籍的官员是御史大夫。《汉书·百官公卿表上》称：“御史大夫，秦官，位上卿……在殿中兰台，掌图籍秘书。”御史大夫是御史之长，主要做皇帝的秘书工作，如掌管文书、图籍，记述皇帝言行，起草文件等。秦时御史张苍“主柱下方书”，是掌管秦宫廷藏书的官员。正因为有阅读使用众多图书的便利，所以他无所不通，尤善律历，“明习天下图书计籍”(《史记·张苍列传》)。这些都可说明秦时丞相、御史等掌管图籍，并有备学习、查问之责。有人称是当时官学的一种，即负有教育的职能。

二、秦始皇焚书

秦统一全国后，统治阶级内部存在着中央集权还是分封诸侯进行统治的争论，这种争论导致了“焚书坑儒”历史事件的发生。统治阶级焚书禁书，在中国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但都可以追溯到秦的焚书，其影响是相当深远的。

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年)某月某日，秦始皇大宴群臣，博士官淳于越主张师古法，分封诸侯，回复到贵族统治的割据局面。他说：“殷周之王千余岁，封子弟功臣，自为枝辅。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无辅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当时，李斯反对这种倒退的做法，他认为“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政治措施的不同，皆因时代的发展使然，他痛斥一些儒生不师今而学古，语皆道古而害今，这样，不利于中央集权的统治和皇权的加强，所以，主张禁绝《诗》、《书》、百家语。他建议：“臣请史官非秦纪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建议，焚《诗》、《书》，禁私学。现在要知道秦始皇采取焚书措施，全国究竟烧了多少书，当然是困难

的，历代学者视这次焚书为我国文化典籍的一大损失。因为，我国先秦时，典籍的书写是用笔写在竹简上，由于制作困难，数量不多，所以，民间藏书是不普遍的。秦始皇焚书是对先秦典籍的严重摧残。同时，焚烧典籍，禁绝私学，也是对春秋战国时学术文化自由发展的遏制和压抑，它严重影响中华民族的进步和发展。

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年），术士侯生、卢生等诽谤秦王。秦始皇又"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益发谪徙边"（《史记·秦始皇本纪》）。这就是坑儒事件。秦代历史上修驰道，筑长城，修阿房宫之功过议论甚多，而"焚书坑儒"事件更是笔舌之战两千年，成为人们议论、研究、评论的中心议题。

秦皇朝官府藏书损失最严重的事件是秦末楚汉相争中阿房宫的焚烧。公元前206年，楚王项羽攻入咸阳，"乃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其宫室，火三月不灭"（《汉书·陈胜项籍传》）。这次项羽的烧杀，自然给秦代宫廷藏书造成重大的损失。刘邦进入咸阳，萧何也只能向当时的政府机构收集文献了。

第三节　两汉官府藏书制度

一、汉代官府藏书系统的建立

秦始皇和秦二世的残暴统治，对人民的压迫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陈胜、吴广等农民起义一举推翻了秦王朝。秦末农民大起义的胜利果实虽然被地主阶级篡夺，但刘邦统一全国，还是适应历史潮流的。汉代社会生产的发展和封建制度的巩固，直接促进了作为文化事业的重要部分——官府藏书的发展。汉代确定了封建社会官府藏书的类型，完善了工作内容，充实和配备了管理官员，因此，我们称汉代是封建社会官府藏书的确立时期。

1．汉初官府藏书的建设

汉高祖刘邦鉴于秦亡的教训，同时在秦末战争中也认识到人民的强大威力，在各种政策上对农民作了一定的让步。经济上减轻徭役和赋税，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所谓"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因此，社会生产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文化上鉴于秦代愚民政策的失败，也采取对战国以来各种思想流派和学说不加禁止的措施，这对先秦遗留典籍的保存有积极作用。加之长期战争，对兵、刑类书籍的重视也是十分必然的。总之，汉初统治者采取了

放松查禁与积极收藏相结合的藏书政策。

汉初，刘邦首先注意典籍的收集。《汉书·高帝纪》称：高帝元年(前206年)冬十月，“萧何尽收秦丞相府图籍文书。”又《史记·萧相国世家》称：“沛公至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萧)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沛公为汉王，以何为丞相……汉王所以具知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图书也。”

其次，汉高祖还着手建立宫廷藏书处，《太平御览》卷一百八十四引《三辅黄图》称：“未央宫有石渠阁，萧何所造，其下砻石为渠，若今御沟，因为阁名，藏入关所得秦之图籍。”“天禄阁，藏典籍之所，萧何所造。”《汉宫殿疏》亦称：“天禄阁、麒麟阁，萧何造，以藏秘书、画贤臣。”据此可知，石渠阁、天禄阁、麒麟阁是当时宫廷藏书的处所。这些殿阁虽不完全是藏典籍之处，但收藏的主要是图书，故为典籍之所。

还有，汉高祖还注意对流传典籍的整理。如《史记·太史公自序》称：高帝令“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汉书·艺文志序》称：“汉兴，张良、韩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删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汉初，统治者对军事、政治(包括律令、礼仪)等方面的书籍，首先进行整理，是汉初军事发展和总结秦末军事的需要，同时也是进一步强化中央集权制度，巩固封建秩序的需要。当然，经过初步整理，也充实了宫廷藏书的内容，方便了皇帝和朝臣的使用。

汉惠帝四年(前191年)，朝廷正式解除挟书禁令，民间藏书才成为合法之事。原来，秦朝是严禁民间藏书的。汉初，刘邦曾提出废除秦代各种法令，如汉高祖元年冬十一月，召诸县豪杰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吾与诸侯约，先入关者王之，吾当王关中。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汉书·高帝纪》)但是，这只是上台时的许诺，立国后并未解除挟书之律，加之秦始皇焚书的余烈，故仍视藏书为非法。惠帝解除挟书禁令，不仅使秦遗留典籍得以收集于朝廷，而且也使图书的抄写和传播得以发展。《隋书·经籍志》谓：“惠帝除挟书之律，儒者始以其业行于民间。”

西汉末，刘歆对汉初藏书发展影响情况作了评述。他说：“汉兴，去圣帝明王遐远，仲尼之道又绝，法度无所因袭。时独有一叔孙通略定礼仪，天下唯有《易》卜，未有它书。至孝惠之世，乃除挟书之律，然公卿大臣绛、灌之属咸介胄武夫，莫以为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晁错从伏生受《尚书》。《尚书》初出于屋壁，朽折散绝。今其书见在，时师传读而已。《诗》始萌芽。天下众书往往颇出，皆诸子传说，犹广立于学官，为置博士。”(《汉

书·楚元王传附刘歆传》）这段话，说明汉初高祖时藏书不多，解除挟书之律以后，各地图书才逐步得到收集，因得以立学官，故博士官增多，这就为汉武帝采取独尊儒术的政策提供了条件。

2. 汉武帝独尊儒术与官府藏书

汉初经过几十年的休养生息，社会经济得以发展，封建统治秩序渐渐巩固，黄老之术、无为而治的思想，当然不适应政治、经济的需要。所以，皇朝大统一，有所作为的思想开始成为政治的主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便应运而兴。

思想上要罢黜百家，达到用儒家思想统治天下，首先要树立皇帝的绝对权威。所以武帝建元元年（前140年）儒生董仲舒运用《公羊春秋》立说，认为人君受命于天，即代表天的意志统治天下，这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但是，如果社会上各种学说并行，人们的议论五花八门，不能统一在一种思想观点上，这样，统治者就没有办法实行统治，老百姓也不知道守法度。因此，他提出：“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计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以矣。”（《汉书·董仲舒传》）此后，武帝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尊崇儒家学说，如设置五经博士，罢黜“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的贤良，任用好儒术的人为丞相，优礼延聘儒生，使儒家学说成为代表统治阶级利益的正统思想，也使儒家经典充斥学官。

汉武帝时，宫廷藏书处虽收集了各种图书，但是因为长期没有整理，故“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就是收集的各种图书，也因学说不同，观点差异，不利于独尊儒术的政策要求。所以，汉武帝采取了收集藏书、整理图书，以充实宫廷藏书和政府机构藏书的措施。首先，广开献书之路，借以鼓励把流失的典籍上送朝廷，并规定设置太史，“命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各地呈送的文件、档案和各种统计资料，充实了宫廷藏书的内容。此外，武帝“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广泛地收罗天下图书，充实了皇家藏书。“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国献之。”（《汉书·艺文志》）这是皇室藏书中补充了《古文尚书》的事例。

武帝时宫廷藏书和中央政府机构藏书，大致如《汉书·艺文志》注：“如淳曰：刘歆《七略》曰：外则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则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太常，汉九卿之一，掌宗庙礼仪，兼掌选试博士。太史，掌起草文书，记载史事，编写史书，兼管国家典籍、天文历法、祭祀等。汉代太

史令比较集中掌管史事编纂活动。博士是汉代学官，汉武帝时博士兼教授生员，负责某一经典学派的知识传授。由此可见，当时在中央政府各个机构中都收藏典籍。

3. 汉成帝加强藏书管理

汉武帝以后，经汉昭帝、汉宣帝、汉元帝几代，到汉成帝时(前32—前7年)，官府藏书有了很大的发展，主要表现为官府藏书的整理和系统目录的编制。

汉成帝政治上仍然采取独尊儒术的政策，不仅建立儒学博士官，教授生员，培养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的接班人，而且，独尊儒术的政策，也要求有统一的课本，故整理旧的典籍，定出新的书籍，就成为官府藏书工作的重要内容。汉成帝首先注意图书收集工作，派谒者陈农出使四方，求遗书于天下，广泛收罗散于民间的新旧图书。同时，命刘向、刘歆等典校藏书，对先秦学术文化作了一个总结，并且通过整理藏书，定出适合统治思想的新儒家经书，颁行各地，这也有利于学术文化的发展。

汉成帝时，官府藏书数量是不少的。刘歆《七略》说："百年之间，书积如山丘。"《七略》著录图书38种，603家，13 319卷。天禄阁可能已成为专藏律令图书的处所，具备作为国家藏书的规模。而刘向、刘歆和一批学者校书20年，校正的书籍内容是标准的，编连是统一的，这些本子入藏于国家藏书楼。西汉末，王莽败亡，宫殿曾遭焚毁，如范晔《后汉书·儒林列传》谓："昔王莽，更始之际，天下散乱，礼乐分崩，典文残落。"隋代牛弘亦称："汉兴，改秦之弊，敦尚儒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屋壁山岩，往往间出。外有太常、太史之藏，内有延阁、秘书之府。至孝成之世，亡佚尚多，遣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刘向父子雠校篇籍。汉之典文，于斯为盛。及王莽之末，长安兵起，宫室图书，并从焚烬。此则书之二厄也。"(《隋书·牛弘传》)当时，宫廷尚存的少量图书被刘秀搬到了东都洛阳。

4. 东汉官府藏书的重建

西汉末，王莽篡权，改国号曰新。不久，四方刘氏宗室起兵讨王，农民起义军更彻底地摧毁了王莽统治，地主武装从农民起义的血泊中重建了汉王朝统治，史称东汉。东汉官府藏书承袭西汉藏书的制度，但在新的形势下有了发展。官府藏书机构的管理官员的设立是有重要意义的事件。

东汉光武帝刘秀为了建立新的皇朝，在征战中比较注意网罗儒生博士，并"采求厥文，补缀漏逸。先是四方学士，多怀挟图书，遁逃林薮。自是莫不抱负坟策，云会京师"(《后汉书·儒林传序》)。这些都有利于新王朝典籍的积聚。据称："光武迁还洛阳，其经牒秘书载之二千余两。"可见当时已收

集到不少典籍。光武以后，汉明帝、汉章帝采取各种方式采集遗书，故《隋书·经籍志》谓："光武中兴，笃好文雅，明、章继轨，尤重经术。四方鸿生钜儒，负袠自远而至者，不可胜数。石室、兰台，弥以充积。又于东观及仁寿阁集新书，校书郎班固、傅毅等典掌焉。"由此可知，政府机构藏书有兰台、东观等处，当时还设立兰台令史等掌管，而仁寿阁则属皇室藏书。其后，有辟雍、宣明、鸿都等政府机构藏书，石室可能是档案文件保藏之所。官府藏之丰富，为当朝学者称道，时称东观为"老氏藏室，道家蓬莱山"。

官府藏书建立后，东汉王朝依西汉故事，不断派员清理校点图书。据记载，汉明帝时，有班固、贾逵等校书东观。汉安帝时，刘珍、马融等曾校书，蔡伦监典其事。汉顺帝时，伏无忌与黄景曾校书。汉灵帝时，蔡邕等曾校书东观、兰台。

他们的校书活动都涉及官府藏书的各部类图书，并重新整理出定本，以作为儒生的标准读物。由于当时书写条件的限制，故汉灵帝熹平四年(175年)，由蔡邕主持并书写经书刻石立于太学门外，"碑始立，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两，填塞街陌"。熹平石经的竖立，一方面是官府藏书流传的一种方式，另一方面也是官府藏书整理校正的成果，如果没有长期的整理和校订藏书的活动，这种标准经书的颁布是很困难的。

东汉末年，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尖锐，农民起义风起云涌，逐步形成了汉末军阀割据、战乱连年的局面。官府藏书在统治阶级的直接控制下，平时管理不善，战乱时被劫持散失，到汉末，由西汉以来逐步建立的宫廷藏书和政府机构的藏书，大多遭到严重的损失。如汉献帝初平元年(190年)，董卓奉汉献帝从洛阳返回长安，"移都之际，吏民扰乱，自辟雍、东观、兰台、石室、宣明、鸿都诸藏典策文章，竞共剖散，其缣帛图书，大则连为帷盖，小乃制为滕囊。及王允所收而西者，裁七十余乘"。而王允在半道上，"复弃其半矣"(《后汉书·儒林传序》)。汉代近400年积累的图书，经东汉末的战乱，基本上湮灭殆尽。故后代史家，如范晔称东汉末的图书散落是"符策典籍，略无所遗"。牛弘谓此次图书散失是继秦代焚书、西汉末王莽之乱以后我国图书的第三次厄运。《隋书》则称此次战乱，使长安和洛阳的图书"扫地皆尽"。

二、汉代官府藏书种类和管理机构

1. 两汉官府藏书种类

汉代官府藏书是很兴盛的，因为放置地点的不同，往往也显示了功能的不同，首先有宫廷藏书，即属于宫廷中专门藏书的处所，这些藏书处收藏典

籍的质量高、数量多，只供皇朝家族和施政时查考，一般外人是很难利用的。由于有几个藏书处所，所以会在其中选择一处或两处作为朝廷的藏书中心，这个地方的藏书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高，所以有人称为国家藏书。其次，有中央政府机构的藏书，即属于朝廷中各职能部门的藏书处所，这些部门的藏书是朝廷文化财富的集中地，可以提供整理、著述，也是朝廷保藏图书典籍的地方。但是，由于汉代的藏书系统是初创的，所以要把宫廷藏书和政府机构的藏书完全分开也是困难的。宫廷藏书和中央政府机构藏书整理工作，有时是合作进行的，如编写藏书目录。所以，这种官府藏书的分类，也只是一种功能不同的划分。据《汉书》记载，西汉时，藏书处所有所谓“外则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则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又《后汉书·儒林传序》称：“及董卓移都之际，吏民扰乱，自辟雍、东观、兰台、石室、宣明、鸿都诸藏，典策文章，竞共剖散。”综合各种文献的记载，两汉官府藏书处所有如下数处。

石渠阁 据《三辅黄图》记载，石渠阁是汉初萧何所造，专门收藏入关时秦遗存之典籍，以后石渠阁成为朝廷中重要的文化学术活动之处所，如汉宣帝时，曾于此地君臣共同讨论《五经》异同，也就是在这里召开学术讨论会，并最后确定官定的经典。

天禄阁 据《三辅黄图》记载，天禄阁是“藏典籍之所”。刘向等校书时就是集中于天禄阁进行的。此后，扬雄等也校书于天禄阁。

麒麟阁 据《汉宫殿疏》云，“天禄、麒麟阁……以藏秘书”。其他文献记载也有把天禄、麒麟、石渠阁并称，这可能与麒麟阁收藏典籍有关。但记载不详，无从确证。

兰台 《汉书》记载有“谶书，藏兰台”，颜师古注曰：“兰台，案：典籍之所。”

温室 《隋书》记载有刘歆“乃徙温室中书于天禄阁上”。但仍有记载不详之憾。

石室 《史记》称司马迁为太史令，“紬史记，石室金匮之书”。索隐称“案：石室、金匮，皆国家藏书之处”。

东汉建都于洛阳，《隋书》称：“光武中兴，笃好文雅，明、章继轨，尤重经术。……石室、兰台，弥以充积，又于东观及仁寿阁集新书，校书郎班固、傅毅等典掌焉。”按此记载，洛阳所设官府藏书处所甚为多样。

东观 官府藏书中职能比较明确的藏书处。即中央政府藏书处。多种文献记载说，东观藏书非常丰富，李尤所写的《东观赋》就极为赞赏东观的藏书，东观还有专门的管理官吏，如刘珍、蔡邕等曾在东观整理过经典，也曾

有学者黄香、张衡等在东观读书之事。

兰台 据史籍记载，兰台，掌图籍秘书。班固、傅毅曾任兰台令史，杨终、贾逵等人曾任校书郎。

石室 《汉书》记载，高祖"与功臣剖符作誓，丹书铁契、金匮石室，藏之宗庙"。唐朝杜佑注称："汉中丞有石室，以藏秘书图谶之属。"

宣明、鸿都，都是内宫藏书之处。

2. 东汉官府藏书管理机构的设立

西汉初年，官府藏书管理人员无常制，沿用秦代制度，用御史大夫等典掌秘籍，就是到了西汉末年，刘向、刘歆等校书，仍称是御史大夫兼事校书。东汉以后，由于国家机构藏书和宫廷藏书的增加，而且校书和著述国史的事务日益繁多，自然要求设立专门机构和管理人员，统一管理图书典籍和历史著作编写等事宜，这样，藏书管理机构正式在朝廷官制中出现，并逐步在管理事务上完善起来。

据《后汉书》记载，汉明帝永平五年(62 年)，班固任校书郎，又升迁为兰台令史，这是关于官府藏书管理官员的最早记载。兰台是正式的官府藏书机构，兰台令史为官府藏书机构的管理官员，校书郎是实职，从事书籍校正勘误等工作。

汉桓帝时，正式设立秘书监，这是我国有藏书管理机构的正式记载。《初学记》引《东观汉记》称："桓帝延熹二年(159 年)初，置秘书监，掌典图书，古今文字考合异同。"所谓秘书，即管理禁中图书秘记，隶属太常，可知当时设立秘书监，是作为朝廷的文化事务方面的官吏考虑的。秘书监的负责官员，也称秘书监，六百石，下有校书郎中、校书郎。校书郎中、校书郎此前也有设置，如马融曾"拜为校书郎中，诣东观典校秘书"(《后汉书·马融传》)。但这里作为官府藏书管理机构中的校书郎中，可能他的职责范围更大了。

三、汉代官府藏书的整理与编目

汉代建立的中央政府机构藏书、宫廷藏书，经常进行校书工作，校书是对藏书的整理与利用，因当时集中校书，主要是在官府藏书楼进行，故当时校书工作的内容，就是官府藏书工作的内容。我们比较集中分析刘向、刘歆等在西汉末的图书整理与编目活动，以见封建社会官府藏书工作内容之一斑。

1. 图书整理工作的组织

西汉末，刘向、刘歆等整理藏书工作的组织，主要是区分门类，按各类设置专门人员进行。据《汉书·艺文志》记载："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

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师古曰：占卜之书)，侍医李柱国校方技(师古曰：医药之书)。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据此可知，当时整理图书，按图书内容和性质分成六组，任宏、尹咸、李柱国各管理一个组，最后由刘向总其成。当时参加工作的还有刘歆、杜参、班斿、王龚等人。古代图书整理与目录编制都是学术性很强的工作，特别是对图书内容的整理、删定和订正，更非有专门家不可。故兵书、数术、方技类都是由军事长官、史官和御医等专门家担任。应该说，这种按学科门类组织整理藏书的办法是十分可取的。

2. 图书整理工作的程序

刘向、刘歆等人整理图书的工作程序大致有四个阶段：一是搜集众本。刘向等整理图书时，首先把中央政府机构藏书和宫廷藏书集中，同时广泛收集私人藏书。据称：当时宫廷藏书和中央政府机构藏书种类繁多，而且各种不同的版本(实际是各种流传不同的本子)也很多，因此，一定要首先集中这些图书。如《战国策》一书，曾有《国策》、《国事》、《短长》、《事语》、《长书》、《修书》等名。可见，一种书的各种本子不少。再者，各种本子内容也有多有少，篇章也有参差。因此，首先做好复本的集中，是当时整理图书的第一步。二是校正字句。刘向等收集了各种本子的著作以后，接着从中选出内容最多、篇章完整、字句较准确的底本。然后将各本对勘，从中校出字句差误、篇章脱落之处，比较异同，选定某篇某章某句某字是最为准确的。这件工作学术性很强，通过互校，才能产生出一种比较理想的本子。三是排定篇章。刘向等在校正一书后，进一步把全书重新整理，确定一书前后篇章次第，如《礼经》定为十七篇，编定《士冠礼》第一，《少牢下编》第十七；《礼记》定为二十三篇，编定《乐本》第一，《窦公》第二十三；同时，有些书还统一书名，如前引《战国策》，有各种异名，刘向称："臣向以为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宜为战国策。"(《刘向・战国策叙录》，见《快阁师石山房丛书・别录佚文》)至此，一种书的整理工作基本完成。四是写定正本。刘向叫人按校正的著作重新抄写出一种新的本子，用素丝、缥丝、青丝等编连起来，就是一种新的著作，可以收入官府藏书中。

图书编定后，如何提供使用是很重要的，刘向等把官府藏书整理后，接着又按各种图书的内容和该书的宗旨、作者的情况等写成一种图书题解性的东西，这种题解汇编成册就是《别录》。各种图书的题解大致包括：(1)该书篇目。(2)校书经过。说明该书来源，校雠过程中用了哪些书参校，各种本子的错误程度。(3)描述著作大意及参考价值。编写这种图书提要的目的是

提供皇帝参考。当然，这种图书提要也是全面揭示学术源流、考证学术派别的一种工具。刘向死后，刘歆继承刘向的遗志并利用编就的提要编成分类目录《七略》。以上就是官府藏书的编目工作。

班固《汉书·艺文志》保留了《别录》和《七略》的基本内容，主要是删削《别录》对各种著作的提要，编成在《汉书》中可以容纳的篇幅，同时加入若干《别录》、《七略》以后的著作，也就是说主要做了简化的工作。这样，据《汉书·艺文志》一书，大致可以看出汉代官府藏书目录的基本轮廓。

《七略》基本类目为：辑略——总序；六艺略——易、书、诗、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小学9种；诸子略——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10种；诗赋略——屈原赋之属、陆贾赋之属、孙卿赋之属、杂赋、歌诗5种；兵书略——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4种；数术略——天文、历数、五行、蓍龟、杂占、形法6种；方技略——医经、经方、房中、神仙4种。

综合6类、38种，共著录图书596家，13 269篇(卷)(《汉书·艺文志》)。这个数目已不是当时《七略》原来著录的数目，《七略》是已经整理成新本的图书目录，也不是全部藏书的记录，但当时目录的体系和类别已可见其大略。

3. 官府藏书的利用

汉代官府藏书的建立，本来就是朝廷政事的一部分。故宫廷内或中央机构有专门藏书处所，也有专门官员进行校书活动，其最后成果，即将整理好的典籍，分别作出提要，送呈皇帝参考，或用藏书目录，作为保存典籍的根据。故有“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旨意，录而奏之”，又有“刘歆总群书而奏其七略”的说法。从汉代官府藏书利用情况看，大致是两个方面的工作。

提供皇朝政治事务的参考。刘向在《战国策》的叙录中说：“臣向以为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宜为战国策。”称此书“皆高才秀士度时君之所能行，出奇策异智，转危为安，运亡为存，亦可喜，皆可观”(姚振宗《快阁师石山房丛书·别录佚文》)。从中可以看出，刘向等所作的叙录，其主要目的是提供给皇帝一定的信息，从学术流派到术士奇谋，结合汉代的治理国策，说明哪些是可以参考的。对于管子、晏子的书，刘向等指出其中的内容，“可以晓合经义”，“皆合六经之义”，他向皇帝建议，“可常置旁御览”，也就是说这些书的参考价值高。而列子之书，他指出其中“多寓言与庄周相类”，明确地表示参考价值不大。作为封建朝廷的藏书机构，直接利用典籍为统治阶级高层服务，充分发挥了官府藏书的积极作用。

利用典籍和资料编纂史书。我国历朝均有史官，因为史官记言记行，执

掌典籍，具有十分特殊的地位。西汉时，司马迁任太史令，“司马氏世典周史”，其父在汉亦任太史令之职，故司马迁“紬史记，石室金匮之书”，“网罗天下放佚旧闻”，并经过实地调查研究，写成《史记》。《史记》所依据的文字材料有先秦以来的典籍和保存下来的档案资料，没有这些文字材料，他是无法写作的。东汉时班固任过兰台令史、校书郎，曾校书东观，“数入读书禁中”，班固既有像司马迁那样的家学渊源，世代史官之家，又身为官府藏书的官吏，故他有条件写成记载西汉 200 多年史事的《前汉书》120 卷，成为继《史记》以后重要的纪传体史书。唐代刘知几在《史通・采撰》中说明了《史记》、《汉书》之利用典籍的情况：“司马迁《史记》，'采《世本》、《国语》、《战国策》、《楚汉春秋》。至班固《汉书》，则全同太史，自太初以后，又杂引刘氏《新序》、《说苑》、《七略》之辞，此皆当代雅言，事无邪辟，故能取信一时，擅名千载。”我们必须注意的是，在我国秦汉至魏晋之世，书籍的主要来源就是世代相传，如果哪个作者要进行写作，就必须直接到保存典籍的藏书处，当时官府藏书处就是书籍的基本保存单位。所以，官府藏书成为写作最重要的地方。

第四节　私家藏书的初始发展

春秋末年，经过长期的兼并战争，我国形成了齐、楚、燕、秦、韩、赵、魏七雄并立的局面。各国在不同的政治变革中，确立了封建地主所有制的生产关系，社会生产有了迅速的发展。在政治斗争和学术文化发展中成长的“士”，或从小私有者上升起来的“士”，都从自己的阶级立场出发，从不同的角度试图为新兴的封建政治制度和封建秩序寻求新的纽带。他们对宇宙万物，对政治、经济的变革都提出了一些看法，并以此游说人君，企图达到采用自己的政治主张的目的。有些人则用自己的理论来说明社会生活，表达自己的立场。他们的互相争论和批驳是很激烈的，因此，形成了我国历史上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局面。

“士”这一阶层很复杂。一部分“士”是从贵族没落的。他们由于掌管典籍的方便，熟悉先王旧籍，使学术文化的传统得以传播开去。一部分由小私有者上升的“士”，有可能把吸取的民间文化带进大雅之堂，与传统文化进行融合。他们招收门徒，讲学论道，有必要用教材教学，故必须收集典籍；他们要批驳对方，游说人君，进而著书立说，也必须收集典籍以做参考。这样，藏书成为研究的需要，私人藏书的发展是很自然的了。

一、私家藏书的出现

从现存的先秦古籍，可以发现私家藏书的记载。《墨子》称：“今天下之士，君子之书不可胜载”，“言语不可胜计”。又记载墨子自己载书甚多：“子墨子南游使卫、关中，载书甚多。”(《墨子·贵义》)墨子不仅自己藏书，而且利用藏书以做参考，故多有“尚观于先王之书”，“征于先王之书”，“先王之书，自亦见之”的记载。《庄子·天下篇》记载：“惠施多方，其书五车。”《战国策·秦策》中亦记载苏秦游说失败，回家后“陈箧数十，得太公阴符之谋”，故《史记·六国年表》谓：“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剌讥也。《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这些记载都说明当时“士”这一阶层的藏书是很普遍的。

20世纪50年代以来，我国南北各地大量出土简策，其中属于战国时期楚国墓葬出土的简策和帛书也反映了南方楚国的典籍状况。1978年，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竹简240多枚，这些竹简是战国早期的。1975年，河南信阳长台关楚墓出土的竹简117枚。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在湖北江陵、荆门等地楚墓出土大量战国竹简，其中，1993年荆门郭店楚墓出土竹简703枚。这些墓葬的主人，有些是诸侯王，有些则是一般的士，他们都收集有不同数量的典籍，后来，这些典籍被随葬于地下。这些典籍，既可使我们看到其内容与通行典籍之不同，从而研究文化学术的演变，又可使我们了解战国时私家收藏文献典籍的状况。

战国时，民间藏书甚多，韩非出于法治观点，历数民间收藏各派学说之书，有碍法令统一，“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而国愈贫，言耕者众，执耒者寡也。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而兵愈弱，言战者多，被甲者少也”(《韩非子·五蠹》)。又称：“藏书策、习谈论、聚徒役、服文学而议说，世主必从而礼之。”(《韩非子·显学》)韩非甚至埋怨说：“今学者皆道书箧之颂语，不察当世之实事。”(《韩非子·六反》)这里所说的“书箧”、“书策”，就是先秦遗留的和当代的典籍。

诸子在学术上有相互渗透的一面，也有互相扬弃的一面，学与学之间，家与家之间，都不能不互相学习和参考。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业”，说明墨子是受孔子的影响。孟子承袭宋熹学说，韩非师事荀卿，集法家之大成。这种又继承又发展的情况，说明当时利用典籍之普遍，以及典籍对学术文化的促进作用。

春秋时，还没有私人专门著述的风气。但到战国时，私人著述成风，一种情况是发挥自己的学术见解和政治主张的私人著述，一种情况是由门人笔

记而编辑成书，再者则是总结前人生产技术和学术研究的成果成书。总之，他们是在继承前代文化传统，发扬学派主张的基础上形成的。至于编辑先代遗文成书，也使当时著作日益增多，学者使用方便。战国时著述之多，促进了当时学术文化的繁荣，也为我们保留了古代典籍，其功绩是显著的。

秦始皇以严峻法律进行残酷镇压，自然使全国的书籍焚灭不少，但是，当时有不少私人藏书家把书籍藏在墙壁、山洞中，拒不上缴。如《汉书·艺文志》称："古文《尚书》者，出孔子壁中。"师古曰："《家语》云：孔腾字子襄，畏秦法峻急，藏《尚书》、《孝经》、《论语》于夫子旧堂壁中。"孔安国也谓："至鲁共王，好治宫室。坏孔子旧宅，以广其居，于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书及传、《论语》、《孝经》。"(《尚书正义·卷一》)《资治通鉴》载："魏人陈余谓孔鲋曰：秦将灭先王之籍，而子为书籍之主，其危哉！子鱼曰：吾为无用之学，知吾者惟友，秦非吾友，吾何危哉！吾将藏之以待其求；求至，无患矣！"(《资治通鉴》始皇三十四年)这些记载说明当时私人藏书是不少的，故司马迁很有感触地说："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史记·六国年表》)

二、两汉时期的私家藏书

汉代私家藏书继承战国私人藏书的传统，一些官吏和学者结合自己的教学与研究，积累藏书自用，由于当时书籍抄写困难，得之不易，故藏书数量是很少的。

汉惠帝解除挟书禁令后，民间藏书得以合法，秦朝藏书家埋藏于故室的图书重见于世。如鲁共王坏孔子旧宅，得古文《尚书》及其他书数十篇。武帝时开献书之路，建藏书之策，百年之间，书积如丘山，说明各地藏书是陆续出现的。武帝时河间献王刘德藏书宏富，《汉书·河间献王传》称："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由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者，故得书多与汉朝等。"所收的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又说："是时淮南王安也好书。"

汉代经传书籍因传授不同，地域有别，往往学派林立，当时一些博士官和朝廷官吏出于诵读和讲解的需要，也有自己的藏书，如刘向《别录》中提到的"大中大夫臣圭书"、"臣富参书"、"射声校尉立书"、"臣向书"等，都是作为私人藏书提供本子供官府校书时使用，这也说明当时私人藏书是普遍

的，特别在学术研究上私人藏书的利用是很经常的。如《汉书·董仲舒传》称，董仲舒“孝景时为博士，下帷讲诵……三年不窥园”。《汉书·楚元王传》记载刘向“积思于经术，昼诵书传，夜观星宿”。又如《后汉书·杜林传》记载：“(杜林)少好学沉深，家既多书，又外氏张竦父子喜文采，林从竦受学，博洽多闻，时称通儒。”从以上这些材料说明，西汉私人藏书家较多是王室、史官、经师和校书官吏，东汉私人藏书家范围有所扩大，除了上面所举的，一般的读书人也有条件收藏图书了。

由于官府和私人所藏的书籍可以互相借抄，得来比较容易，加之东汉时简策的利用比较方便，所以，也出现了私人赠送典籍的情况。如蔡邕是东汉的大学者，曾校书东观，家中藏书极富，他在对众宾客称赞王粲时说：“吾家书籍文章，尽当与之。”(《三国志·魏书》)曹操接见蔡文姬时，曾称“闻夫人家先多坟籍”，蔡文姬答曰：“昔亡父赐书四千许卷。”(《后汉书·列女传》)可见蔡邕家中藏书甚多。

我国古代就有以书籍作为陪葬的风气，在生前喜欢读书的官吏和学者的墓葬中，常常把墓主人喜欢的书籍放入墓中作为陪葬。前举战国时魏襄王墓陪葬竹简出土是一例。汉代，由于简帛利用之普遍，私人藏书非常普及，所以，出土的汉代墓葬竹简和缣帛就更多了。20 世纪出土的汉代简帛，比较典型的为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简帛、山东银雀山汉墓出土简策等。墓主社会地位各异，有些是贵族，有些则是从事经书教学的知识分子，或是军事人员，有些则是医药方面的专门人员。虽然他们从事的职业不同，社会地位也有高下之别，但是，他们的随葬物品中都有典籍，有些数量还是很大的，甚至有些可以称为专门的收藏。这从侧面反映了汉代私人收藏典籍是相当普遍的，典籍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也越来越大了。

由于书籍需要量逐渐增大，西汉末年出现了“书肆”，即卖书市场，这对一些学者的藏书积累是有好处的。史书记载，王充到洛阳书肆，凡所阅看的书，辄能忆诵。但是，由于当时收书困难，藏书家皆珍秘所藏。范晔的《后汉书·王充传》引袁山松书记载：“充所作《论衡》，中土未有传者，蔡邕入吴始得之，恒秘玩以为谈助。其后，王朗为会稽太守，又得其书，及还许下，时人称其才进。或曰：不见异人，当得异书。问之，果以《论衡》之益。”

第三编

写本书时期的图书和藏书
（魏晋—隋唐五代）

第四章　纸的发明与写本书的形式

第一节　纸的发明与传播

在纸发明以前，我国书籍的载体普遍使用的是竹木和缣帛的材料。但由于“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后汉书·蔡伦传》)，于是促使人们努力去寻求一种既轻软而又廉价易得的新材料来作为书籍的载体，从而导致了纸的发明。

纸的发明是我们祖先对人类所作的伟大贡献之一，是图书载体上的一场大革命，是图书发展史上一个巨大的里程碑，为知识信息的保存与传播提供了更为方便的条件，从而大大地促进了文化科学事业的发展与进步，成为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千百年来，纸一直是图书最理想的载体，现今即使新型的书籍载体(如胶质材料、磁性材料)已经出现，依然无法取代它的地位。

一、纸的前身

我们现在所指的纸是以植物纤维为原料制成的，包括麻类、树皮、竹子、稻草和木材、芦苇、蔗渣、稻麦草(前四种是古代造纸主要原料，后四种是现代造纸主要原料)。但在植物纤维造纸以前，纸的名称已经出现，即“其用缣帛者谓之为纸”(《后汉书·蔡伦传》)，即缣帛也叫“纸”。又有“方絮曰纸”(《通俗文》)。方絮是指漂絮时的副产品絮片，因漂絮所用的竹席子(古代称为“箈”或“箫”)通常是方形的，故所得絮称为“方絮”。这些都是以动物纤维为原料的，但纸的得名却是由此而来的。所以许慎《说文解字》谓：“纸，絮——箈也，从系氏声。”因此近代学者胡朴安指出：“古之所谓‘纸’者，由与今(纸)有别也。”(《朴学斋丛刊·纸说》)古纸，是指动物纤维的织

物或漂絮物；今纸，即指植物纤维所造的纸。

二、植物纤维纸的发明

据《后汉书·蔡伦传》记载："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者谓之为纸。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伦乃造意，用树肤、麻头及敝布、渔网以为纸。元兴元年(105年)奏上之，帝(东汉和帝刘肇)善其能，自是莫不从用焉，故天下咸称'蔡侯纸'。"这是古书记载用植物纤维造纸之始。据此，长期以来，"蔡伦发明造纸"从而得到肯定，并且以蔡伦献纸那年，作为造纸发明的年份。

纸的出现是社会生活发展之所然，作为文字记录的载体仅仅是纸的一项功能，当然这并不低估纸的出现在社会文明中的历史作用，有人曾认为纸的使用是人类文明的第二个里程碑。蔡伦和他的工匠们发明一套完整的古代造纸工艺技术，在前人造纸术的基础上，对原材料、工艺进行了改进，为以后广用各种植物纤维造纸提供了条件。蔡伦发明的造纸术奠定了他在世界造纸史上的不可替代的始祖的地位。

纸的出现到蔡伦造纸术的发明之间，有一个发展过程。对于公元105年，即蔡伦向汉和帝献纸那一年之前，关于纸的记载，在一些史籍已出现，如《三辅旧事》、《汉书·赵皇后传》、《后汉书·贾逵传》。

关于纸的出现时间，由于考古工作中的新发现产生不同的推断。1933年，已故考古学家黄文弼在新疆罗布淖尔地区发现了一片西汉中叶古纸，是一片麻纸，长约40厘米，宽约100厘米，纸面可清晰见到麻。1957年，在西安市东郊的灞桥出土了比新疆罗布泊的纸还要早约一个世纪的西汉初期的古纸，而且有数十张之多，灞桥纸主要由大麻和少量苎麻的纤维所制成。1973年在甘肃居延汉代金关遗址出土了西汉时的麻纸"居延纸"，1978年在陕西扶风中颜村汉代窖藏出土了西汉时的麻纸"扶风纸"。也有人认为居延金关纸、陕西扶风的中颜纸仅仅是纸的雏形。

1979年在敦煌汉代烽燧遗址中掘出"马圈湾纸"，1986年，在甘肃放马滩古墓出土了西汉初年文、景二帝时期(公元前179—前141年)的绘有地图的麻纸"放马滩纸"。经专家考证，这张古纸产生在西汉早期，比东汉蔡伦造纸的历史早了300多年。1990年，在敦煌甜水井西汉邮驿遗址中发掘出了多张麻纸，其中3张纸上还书写有文字。2002年，甘肃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了200多片纸文书残片和麻纸，定名为蔡伦前纸——悬泉置纸。这些古纸主要用麻织物和很细的丝织物制作，用于书写文件、信件及包裹物品。这些出土古纸有人统称"西汉纸"。

目前考古工作者、文史学家和造纸技术研究人员对于我国纸的出现时间有不同观点，但是比较普遍地认为：20世纪的考古新发现不能否定蔡伦发明造纸术的贡献。因此，中国造纸学会于1987年9月11日在北京科学会堂召开了纪念蔡伦发明造纸术1882周年大会，大会一致肯定和赞扬了蔡伦发明造纸术的历史功绩。同时也得到了国际上的承认：国际纸史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Paper Historions，IPH)第20届代表大会于1990年8月18日至22日在比利时南部城市马尔梅迪举行。与会专家一致认定蔡伦是造纸术的伟大发明家，中国是造纸术的发明国。

三、纸的传播

纸是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重大发明之一，是我国对世界科学文化发展作出的卓越贡献。纸是以我国为中心向四面八方的整个世界各国传播的。在东方，开始是我国抄在纸上的写本书在2世纪时即传入朝鲜，经过朝鲜，中国写本书在3世纪时传至日本。然后大约在4世纪末叶朝鲜人学会了造纸，并于公元610年3月，由朝鲜僧人昙征和法定二人，东渡日本，又把从我国学到的造纸术传到日本。

在南方，3世纪时传入越南，7世纪前传入印度。在西方，3世纪时传入中亚，8世纪时传入西亚。唐玄宗天宝十年(751年)唐朝与大食国发生战争，唐兵败，有士兵被俘，其中包括制纸工匠，他们被送到撒马尔罕建立造纸工场，帮助阿拉伯人造纸。后经巴格达(794年)、大马士革(795年)，一直深入到非洲的埃及(900年)、摩洛哥(1100年)。直至摩尔人征服伊伯利安丰岛后，他们把造纸术传入西班牙(1157年)、法国(1348年)、意大利(1276年)、比利时(1320年)、瑞士(1350年)、德国(1390年)、英国(1495年)、俄国(1576年)、挪威(1698年)，以及整个欧洲大陆。由欧洲而传入美洲——墨西哥(1575年)、美国(1690年)，再传入加拿大(1803年)，最后传入大洋洲。到19世纪初叶，造纸术已遍及世界。在传播过程中，各国劳动人民又不断对造纸术进行改进与发展，纸的质量得到提高，品种不断增加，从而极大地促进了世界科学、技术与文化的传播、交流与发展。①

第二节　写本书的产生与发展

纸的发明与推广使用，使我国图书由简帛时代而逐步进入以纸为载体的

① 参见潘吉星著．中国造纸史．第九章、第十章[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写本书时代。

虽然纸在东汉时期已经发明和生产，但在此后的2—4世纪，纸并未能完全取代简帛，而是处于与简帛并存的时代，甚至在这一时期，简、帛仍是书籍的主要载体。这一方面固然可能由于纸的产量还不够多，满足不了写书的需要，纸的质量也许还不够高，一时还不能适应人们的要求；另一方面，作为一种新生事物，还没有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出于保守思想，使其未能推广，而乐于去接受它。有两则故事说明初期纸还没有取得应有的地位。《北堂书钞》记载了东汉人崔瑗(字子玉)，送给他的朋友葛龚(字元甫)纸抄《许子》书一事，崔瑗随书附有一张便条："今送《许子》十卷，贫不及素，但以纸耳。"这说明人们对帛的重视，对纸仍然轻视，只是因为它价廉，于用不起帛的人，才不得不用纸。三国时魏文帝曹丕"以素书所著《典论》及诗赋饷孙权，又以纸写一通与张昭"(《三国志·魏志·文帝纪》)。由两人的地位不同，可以看出纸书仍不如帛书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

随着造纸术的不断改进和提高，造纸规模的不断扩大，纸的优越性不断地显露出来了，到两晋南北朝时，纸张已成为主要的书写材料，写本书取代了简帛书。

晋代，纸的优越性已经充分地被人们所认识，还有人写诗赋称颂纸。如傅咸在《纸赋》中说："夫其为物，厥美可珍。廉方有则，体洁性贞。含章蕴藻，实好斯文。取彼之弊，目为此新。揽之则舒，舍之则卷，可屈可伸，能幽能显。"左思写《三都赋》，"遂构思十年，门庭藩溷皆著笔纸，遇得一句，即便疏之"。大为时人推崇，"于是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晋书·左思传》)。及至东晋末年(404年)，桓玄称帝时曾下令"古无纸，故用简非主于敬也，今诸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太平御览·部二十一纸·桓玄伪事》)这里所说的"黄纸"是经过黄孽汁染过的麻纸，其色黄，故称为黄纸。这种加工染纸的方法称为"入潢"。黄纸用于书写，入潢主要为了防止虫蛀，足见纸书出现不久，已开始注意保护了。从此，包括简牍文书在内的长达十几个世纪的简牍时期结束，完全进入纸的写本时代。

隋唐是我国写本书的全盛时期。无论是官修书籍，还是私人著述，全赖手抄流传。当时抄书已成为一种专门职业，"佣书"、"经生"之类就是专门从事抄书的。当时的公私藏书，也都是这些写本书。仅以隋代西京(长安)嘉则殿一处藏书即高达37万卷之多，唐太宗命魏徵、虞世南、颜师古为秘书监，请购天下书，选五品以上子孙善于书写者组织抄书，藏于内库。唐玄宗特设修书院专掌抄校图书，每月由国家供应四川麻纸5 000张，每季给上谷(今河南省北部)墨360锭，每年给河间、景城、清河、博平四郡兔皮

1 500张的制笔材料(《新唐书·艺文志》)。足见其抄书之规模。

虽然印刷术发明以后，抄书之风仍然不衰，这些传抄的写本书，仍受到藏书家和学者的重视，一般认为旧抄本比较接近原本，比流传的刻本的价值还要高，且其中多有秘籍。所以清代学者黄丕烈曾说："勿以世有刻本而薄抄本。"

但是古代流传下来的写本书，其实很少，特别是唐宋以前的写本书。其中有着诸多原因，首先是政治的变动，兵祸战乱以及保管不善的原因，使其散落毁灭不少；其次是写本书本身也存在着不可克服的弊端，因为全赖手抄，得书不易，每一书的复本数量很有限，在流传中容易散失毁灭。

我国早期的写本书，现在发现最早的是三国魏甘露元年(256 年)用六合纸抄写的《譬渝经》。这是东京书道博物馆所藏最早附有年份的写本之一。其次是西晋元康六年(296 年)写的佛经残卷。这是在清朝末年，由日本人大谷光瑞和他的学生橘瑞超从我国新疆吐鲁番发现并盗走的。此外，1924 年在新疆鄯善县出土了一份晋人写本《三国志·吴志》残卷，存 80 行，1 000 多字，也被日本人盗走，国内只有影印本。1956 年又在新疆吐鲁番一座佛塔遗址中发现了一份晋人写本《三国志》残卷，存 40 行，500 多字，内容是《孙权传》。这两份《三国志》都是用隶书书写。经考证是陈寿成书不久后传抄的，即公元 4 世纪时的抄本。除此之外，目前可见到的写本书主要是原藏于甘肃省敦煌县鸣沙山千佛洞里的卷子。敦煌卷子始于东晋十六国时期，盛于隋唐时期，而止于北宋。它是 4—10 世纪历代写本(也包括印本)。由于战争的缘故，莫高窟佛寺僧人在出走时，曾将经卷、佛像诸物藏于石洞之中，加以封存，得以保存下来。直到公元 1900 年(清光绪二十六年)5 月，才被道士王圆箓无意发现，但当时并没有引起清政府的重视。1905 年 10 月，沙俄帕米尔地质考察队的勃奥鲁切夫曾率先来到此地，盗走了大批卷子。1907 年后，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先后两次来到这里，采取各种手段盗走了古写本万余卷，藏于大英博物院中。法国人伯希和于 1909 年又盗走了 1 500 多卷写本书，藏于巴黎国民图书馆中。1914 年，另一俄国人鄂登堡也来到这里进行盗取，加上勃奥鲁切夫所盗均藏于原列宁格勒东方研究院，计万卷之多。此外，日本、德国、美国也盗取了不少。还有一些流入我国私人手中。直到 1909 年(清宣统元年)，清政府学部发出"行陕甘总督请饬查检齐千佛洞书籍解部并造像古碑勿令外人购买电"，才把劫余的 8 679 卷运到北京，庋藏学部图书馆，1929 年移交北平图书馆。

这些写本书中，以佛经为最多(占 90% 以上)，此外有道经、儒家经典，以及语言文字方面的韵书、字书，文学方面的诗文集、词曲、俗讲变文、小

说，史地方面的史书、地志、传记、墓志、表册、日历，医药方面有本草、脉经、药方，宗教方面除佛经、道经外，还有摩尼教经和景教经，此外还有一张唐代抄写的题为《进奏院状》，经学者研究认为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报纸。上述写本中所用文字主要是汉文，但也有西夏文、西藏文、梵文以及古代中亚一带的文字，如粟特文、康居文、古和阗文、古回鹘文等。

第三节　写本书的形式

纸张的大量使用，使书籍在形式上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写本书的形式，先后出现了卷轴装、旋风装和经折装。

一、卷轴装

早在帛书流行时期，卷轴装已经出现。因为纸与帛在某些方面有相似之处，所以早期的写本书也就继续采用了卷轴的方法。

卷轴装书由四个主要部分组成，即卷、轴、褾、带。

卷又称卷子，因可以舒卷而得名。通常是指写本书。

卷子的长度是依一篇文字的长短而定的，长的可达二三丈，短的仅数尺。卷子是由两幅以上的纸粘接而成的。从对敦煌卷子的研究来看，每幅纸在各代都有不同的尺寸，越往后纸幅越大。两晋时小纸直高 23.5 ~24 厘米，横长 40.7 ~44.5 厘米，大纸直高 26 ~27 厘米，横长 42 ~52 厘米；南北朝时小纸直高 24 ~24.5 厘米，横长 36.3 ~55 厘米，大纸直高 25.5 ~26.5 厘米，横长 54.7 ~ 55 厘米；隋唐时小型纸直高 25 ~26 厘米，中型纸直高 27 ~29厘米，大纸直高 30 ~31 厘米，横长数值一般为 36 ~55 厘米。①

卷子中间用朱、墨(或用铅)画成直格，分成许多行，这些线条叫做“界”，唐人叫做“边准”，宋人叫做“解行”，又叫“栏”。红色的称“朱丝栏”，黑色的称“乌丝栏”，四周的栏称为“边栏”。这是沿用帛书的名称，因为帛书的栏是用色丝织成的(也有用朱砂或铅画上的)。

卷子的书写格式是：每卷起首空两行，这是古代“赘简”的遗风，是留着写篇名(小题)和书名(大题)的。所以卷子开头也是先写小题(本篇篇名)，后空数格再写大题(全书总名)。正文通常用墨书写，如果一书中有正文也有注解，就往往用朱书写正文，用墨书写注解；或者正文单行大字，注解双行小字。也有用同样大小字体写注解的，另起一行低于正文一格。这些

---

① 潘吉星．中国造纸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166，222.

后来也都在雕版印书中保留下来了，如用不同颜色分别书写书中不同作用的文字，可以说是后来朱、墨套印的起源。正文以后，卷末又留一行空纸，用做题卷、统计篇章和字数。

轴的主要作用是便于舒卷卷子的，但同时也用以区分书写的价值及门类，某些材料的轴甚至还能起防潮避蠹的作用。

轴可以用各种材料制成。有普通竹木的，也有琉璃、玳瑁、象牙、珊瑚等物制成的。

《隋书·经籍志》说："炀帝即位，秘阁之书，限写五十副本，分为三品：上品红琉璃轴，中品绀琉璃轴，下品漆轴。"——这是用轴的材料和颜色来区分图书之价值。

《玉海》载："唐开元时两京各聚书四部，列经史子集，四库皆以益州麻纸写，其本有正副，轴带帙签皆异色以别之：经库钿白牙轴，黄带，红牙签；史库钿青牙轴，褾带，绿牙签；子库雕紫檀轴，紫带，碧牙签；集库绿牙轴，朱带，白牙签。"——这是以轴带签的制作材料及颜色来区分图书的门类。

《画史》说："檀香辟湿气，画必用檀轴有益，开匣有香而无潮气，又避蠹也。"——这说明檀轴可以防潮避蠹。

轴一般要比卷子的直高要长，两头露出卷外，以便展卷。露出的部分称为"轴头"。轴和卷一样，也是古书的计量单位，所以明胡应麟说："凡书，唐以前皆为卷轴，盖今所谓一卷，即古之一轴。"(《少室山房笔丛·经籍会通》)

卷子因经常翻阅，为了避免边缘破裂，往往在卷子背面裱上一层衬，称为"褙"或"装背"。衬所用的材料通常是纸，也有用不同颜色的绫、罗、绢、锦的。如徐氏《法书记》载：唐太宗时所装的都是紫罗褾，梁朝所装的为青绫褾，安乐公主用黄麻纸褾。这种在卷子的两端和上下装裱，称为"褾"、"玉池"或"装褫"，俗称"包头"或"包首"。

带，是用做捆扎的。在卷子卷起后，为防止松散，便于卷端置一带。带通常是丝织品，有分色的，如前述唐开元四库藏书，分别用黄、褾、紫、朱四色带。

卷、轴、褾、带是卷轴书的四个主要组成部分(如图 4-1 所示)

卷轴书在书架上排列起来，称为"插架"(如图 4-2 所示)。平放叠置于书架上，其轴头的一端向外，为了便于识别、存取，就在轴头上系一个牌子，简单地标明书名、卷次等记号，这就是"签"。签也有用牙、骨、玉等材料制成的，有时还用不同的颜色区分其门类，如唐开元四库藏书，分别用

红、绿、碧、白四种颜色的牙签以区分经、史、子、集。韩愈诗云："邺侯家多书，插架三万轴，一一悬牙签，新若手未触。"又朱子诗云："老翁无物付孙儿，楼上牙签满架垂。"便是生动的写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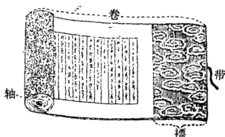


图 4-1　卷轴书的形式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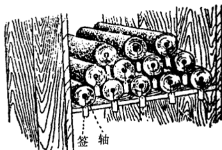


图 4-2　卷轴书插架示意图

二、旋风装

唐代是写本书最盛时代，也是著作兴盛时代。唐诗更是在我国文学史上被称为诗歌的黄金时代。诗歌的发展，特别是近体诗的发展，要求有典有韵，于是便促成了两方面的著作——类书和韵书的产生。类书和韵书都是大型工具书，如果仍采用卷轴的形式，查阅起来是非常不方便的，于是便发生了卷轴形式的变革，从而产生了旋风装。

宋欧阳修在《归田录》中说："唐人藏书皆作卷轴，其后有叶子，其制似今策子。凡文字有备检用者，卷轴难数卷舒，故以叶子写之，如吴彩鸾《唐韵》、李郃《彩选》之类是也。"

清钱曾《读书敏求记》也说："相传彩鸾所书《韵》，散落人间有甚多，余从延陵季氏曾睹其真迹……逐叶翻看，展转至末，仍合为一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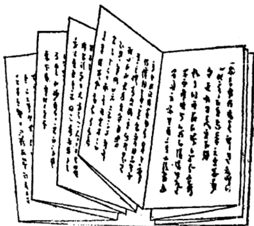


图 4-3　旋风装(旧说)示意图

庆幸的是故宫博物院现藏有《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是这种装帧。其具体装帧形式是以一长条纸作底，首叶单面书写，全幅裱于底纸右端。从第二叶起，双面书写，将每叶右侧无字边缘部分，鳞次相错地粘裱于前叶下面右侧的底纸上，打开时，形似龙鳞，所以称龙鳞装，收卷时，书叶鳞次朝一个方向旋转，宛如旋风，所以又称旋风卷，或旋风叶卷子(如图 4-4)。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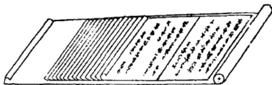


图 4-4　旋风装(新说)示意图

旋风装仍未脱离卷轴装的母胎，但比卷轴装有了明显的进步。它保留了

① 李致忠. 中国古代书籍史[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160-167.

卷轴装有利于保护书页的长处，也表现了缩小版面，便于翻阅的优点，可以说旋风装是对卷轴装的一种改良，是使书籍由卷轴制度过渡到册叶制度的一座桥梁。

三、经折装

高士其在《天禄识余》中说："古人藏书，皆作卷轴……此制在唐犹然。其后以卷舒之难，因而为折……以便检阅。"在唐及唐以前的书籍，包括佛经在内，普遍采用卷轴装形式。卷轴装形式的最大缺点是不便检阅。尤其对于佛教徒来，诵经是每日必修的功课，这种不便尤其突出，于是书籍装帧的改革，便在佛经中首先出现。其方法是将本是长卷的佛经，从头至尾依一定的行数或一定的宽度连续左右折叠，形成长方形一叠，再前后各粘一张厚纸封皮，加以保护，所以又称折子装。因先从佛经开始采用，故称经折装。又有人称它为梵夹装(或写作"梵筴装"，筴通策)。梵夹装来源于印度。印度因无纸，佛经原是抄在贝多树叶上，称为贝叶经，上下用木板夹紧，称为"贝编"。也许在外形有某些相似，或者经折装受到了它的启发，故有此称。实际二者是不完全相同的。

经折装首尾封皮原是不相连的(如图4-5)。后来也出现了用一张褾纸将首尾连接起来(如图4-3)，不少人误会它是"旋风装"，过去的许多书史著作多取此说，其实只是经折装的另一种形式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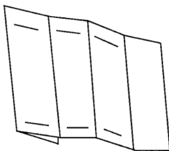


图4-5　经折装示意图

经折装与旋风装的根本区别在于：旋风装是双面书写，仍保留卷子的形式；而经折装是单面书写，已变化为折子形式。这预示着卷轴制度向册叶制度的转变，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第五章　写本书时期的著作

第一节　官府编书写书机构与著述

魏晋南北朝时期在我国历史上是一个国家分裂，战争频仍，政权更迭频繁，社会动乱的时期。在这种情况下，典籍所受到的损失也很严重，书厄不断发生。所以每一个新政权的建立，往往需要重新进行典籍的搜集、校理和抄写，来建立自己的藏书。所以也就相应地产生了进行这些工作的藏书管理机构。

东汉桓帝时，开始正式设立的秘书监，以后历代相沿，成为官府管理藏书的管理机构，除管理藏书外，兼有著作、典校和抄写的任务，虽然其管理体制屡有变革，但是这些职责依然存在。

东汉末年遭董卓之乱，汉代藏书遭受了严重破坏，继之曹魏，不得不“采掇遗亡，藏在秘书中外三阁”(《隋书·经籍志序》)。到魏明帝时，秘书郎郑默，对其加以校订整理，“考核旧文，删省浮秽”，并编写出一部官府藏书目录《中经》(《魏中经簿》)。这是一次颇有成效的整理，使得当时官府藏书“而今而后，朱紫别矣”(《晋书·郑默传》)。曹魏不仅对藏书进行校订整理，而且在建国初，魏文帝(曹丕)由于爱好文学，不仅自己进行著述，在其“自所勒成垂百篇”的基础上，“又使诸儒撰集经传，随类相从，凡千余篇，号曰《皇览》”(《三国志·魏书·文帝纪》)。——这是曹魏官府机构所编的一部类书，也是我国古代的第一部类书。

西晋时期，由于“汲冢书”的发现(参见本书第二章)，“武帝(司马炎)以其书付秘书校缀次第，寻考指归，而以今文写之”(《晋书·束皙传》)。计16种，总共75篇。当时参与整理的有中书监荀勖、中书令和峤、著作郎束皙、镇南大将军杜预等。荀勖还参与了《中经新簿》(《晋中经簿》)的编订，

并亲自参与“十余万卷书的复校与整理”。《中经新簿》是西晋官府藏书目录，它第一次采用了甲乙丙丁为四部的次序的分类标识符号。

西晋末年“刘石乱华”，再次发生严重书厄，东晋就曾搜集图籍，但已无法恢复西晋时期的规模，并且显示“典籍混乱”，极需整理，于是著作郎李充，“删其烦重，以类相从，分作四部，甚有条贯”。并且编制了《晋元帝四部目录》，其以五经为甲部，史记为乙部，诸子为丙部，诗赋为丁部，确定经史子集的四部顺序，后世“秘阁以为永制”(《晋书·李充传》)。

进入南北朝时期，由于国家处于分裂状态，朝代更迭频繁，政权不稳定，影响了经济、文化诸多方面的发展，图书收藏屡兴屡废，政府已无暇顾及著述与修书之事，不过抄书之事，不乏记载。如：在宋文帝元嘉年间“使秘书监谢灵运“整理秘阁书，补足阙文”(《宋书·谢灵运传》)。“补足阙文”的方法，就是通过抄写来补足；在南齐永元末，当时“后宫火，延烧秘书，图书散乱殆尽。(王)泰为丞，表校定缮写，(梁)高祖从之”(《梁书·王泰传》)；在梁武帝天监年间，诏令张率等将四部郡书全部抄录一遍，另外也编有类书《华林遍略》700 卷(《梁书·张率传》)；南陈时，武城人张讥著述甚丰，“后主尝敕人就其家写入秘阁”(《陈书·儒林传》)。以上为南朝。

北朝以北魏从事藏书的搜集最为得力，三次大规模搜集图书并加以整理，重新抄写。天兴四年(401 年)十二月辛亥，太祖道武帝“集博士儒生，比众经文字，义类相从，凡四万余字，号曰《众文经》”(《魏书·太祖道武帝纪》)；献文帝时，高谧为秘书郎，“谧以坟典残缺，奏请广访群书，大加缮写，由是代京图籍，莫不审正”(《魏书·高谧传》)；世宗宣武帝时，秘书丞孙惠蔚，入东观，见典籍未周，于是上疏请求整理藏书，提出：“臣今依前丞相卢昶所撰《甲乙新录》，欲裨残补阙，损并有无，校练句读，以为定本，次第均写，永为常式。其省先无本者，广加推寻，搜求令足。”(《魏书·孙惠蔚传》)这是一次有计划的整理和抄写图书。

北齐从文宣帝天保七年(556 年)“诏定校定群书”开始，直到后主天统、武平年间还是“校写不辍”。武平三年(572 年)二月，后主还命撰《玄洲苑御览》，旋改名《圣寿堂御览》，当年八月成书定名《修文殿御览》。北周明帝时，更是“集公卿已下有文学者八十余人于麟趾殿，刊校经史”(《周书·明帝纪》)。

隋朝的统一，结束了自魏晋以来长达 300 多年的分裂局面，虽然隋朝享国日浅，但对图书事业非常重视，官府抄书藏书的规模特别宏大。隋开皇三年(583 年)，隋文帝采纳秘书监牛弘的建议，派员到各地搜访图书，实行“每书一卷，赏绢一匹，校写既定，本即归主”。开皇九年(589 年)平陈之

后，发现太建时书，“纸墨不精，书亦拙恶”，经“总集编次”之后，“存为古本”；又“召天下工书之士，京兆韦霈、南阳杜頵等，于秘书内补续残缺，为正副二本，藏于宫中，其余以实秘书内、外之阁，凡三万余卷”。

隋炀帝即位以后，“秘阁之书限写五十副本，分为三品：上品红琉璃轴，中品绀琉璃轴，下品漆轴”(《隋书·经籍志》)。如此大规模抄书，历史罕见。使隋初藏书从15 000卷，陡增至37万卷，达到了历史上官府藏书的最高纪录。还不计官府的佛道专藏。

隋末，爆发了大规模农民起义，太原留守李渊乘机反隋，建立唐朝。但隋代遗书并未全部由唐继承，其间损失不少。早在建国之初，即高祖武德五年(622年)，令狐德棻“奏请购募遗书，重加钱帛，增置楷书，令缮写。数年之间，群书略备”(《旧唐书·令狐德棻传》)。太宗贞观年间，又“命秘书监魏徵写四部群书，将进内贮库。别置雠校二十人，书手一百人。徵改职之后，令虞世南、颜师古等续其事，至高宗初，其功未毕。显庆中，罢雠校及御书手，令工书人缮写，计直酬佣，择散官随番雠校”(《旧唐书·崔行功传》)。前后历时30余年，抄写不辍。唐玄宗开元年间也多次进行抄写补充藏书。开元五年(717年)，褚无量“以内库旧书，自高宗代即藏在宫中，渐致遗逸，奏请缮写刊校，以弘经籍之道。玄宗令于东都乾元殿前施架排次，大加搜写，广采天下异本。数年间，四部充备……开元六年驾还，又敕无量于丽正殿以续前功”(《旧唐书·褚无量传》)。开元七年(719年)曾“诏公卿士庶之家，所有异书，官借缮写”(《旧唐书·经籍志》)。由是开元年间“凡四部库书，两京各一本，共一十二万五千九百六十卷”《旧唐书·经籍志》，这些都是当时官府的抄书。安史之乱后，“乾元旧籍，亡散殆尽”，搜书已是不易。直到文宗时，“郑覃侍讲禁中，以经籍道丧，屡以为言，诏令秘阁搜访遗文，日令添写。开成初，四部书至五万六千四百七十六卷”(《旧唐书·经籍志》)。

唐代的编书写书机构除秘书省外，还有弘文馆、集贤院、史馆、崇文馆等。这些机构中都配备有专事抄写的书手，据张九龄《唐六典》记载唐玄宗时，集贤院有书直及写御官100人，装书直14人，选笔直4人；秘书省有校书郎8人，楷书手80人，熟纸匠10人、装演匠10人、笔匠6人；著作局有楷书手5人；太史局有楷书手2人，装书历生5人；弘文馆有楷书手75人，笔匠3人，熟纸装演匠8人；司经局有楷书手25人。足见其抄书规模之庞大。

这些机构除了藏书、抄书之外，还有编书的任务。我国唐代以前所修史书，主要是私人撰著，自唐代正式设立史馆以来，纪传体正史基本上是官

修。唐朝官修史书有：

一、正史类：《晋书》130 卷，《梁书》56 卷，《陈书》36 卷，《北齐书》50 卷，《北周书》50 卷，《隋书》85 卷。

二、典志类：《唐六典》30 卷，《稽典》130 卷，《唐典》70 卷，《永徽五礼》130 卷，《开元礼》150 卷，《大唐姓族系录》200 卷，《大唐氏族志》100 卷，《唐律疏议》30 卷。

地志类：《括地志》550 卷，《元和郡县图志》40 卷，《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40 卷。

类书类：《艺文类聚》100 卷，《北堂书钞》160 卷，《初学记》30 卷。

儒家经典在封建社会中历来居于重要地位，贞观四年(630 年)，太宗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讹谬，诏前中书侍郎颜师古于秘书省考定“五经”，随后，又诏命颜师古、孔颖达等“撰定五经疏义，凡一百八十卷，名曰《五经正义》”(《贞观政要》卷七)。

唐代官府机构在编书方面所取得的成绩也是显著的。

第二节　各类著作概观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是我国写本书的主要时期，纸发明以后，在这一时期中得到了普及和提高，在物资方面提供了方便条件，促成了更多人来从事写作，导致各类著作产生。因此这一时期的著作比此前为盛。据有关资料统计：三国时期有 1 122 部，4 562 卷；两晋时期 2 438 部，14 887 卷；南北朝时期 7 094 部，50 855 卷；隋唐时期 10 036 部，173 324 卷；五代时期 770 部，11 750 卷，总计 21 460 部，255 378 卷。

就著作内容来讲，这一时期的著作，不仅承继了以前各种学术，而且还扩大了学术范围，开创了许多新学问。

这一时期史学特别发达。西晋陈寿的《三国志》和刘宋范晔的《后汉书》，都是纪传体断代史名篇，与《史记》、《汉书》并称“四史，(“四史”中原有《东观汉记》，失传后，才由《后汉书》取代)。北齐魏收的《魏书》、梁沈约的《宋书》、萧子显的《南齐书》以及唐代官修的《晋书》、《北齐书》、《周书》、《梁书》、《陈书》、《隋书》和李延寿的《南史》、《北史》，都被后代列为“正史”。正史之外，别史中如唐杜佑的《通典》是有名的典志体史书。在人物传和地方史志方面也出现了一些重要著作。人物传如梁释慧皎的《高僧传》，记有从东汉到南北朝时期的 252 僧人的生平(附见者又 200 余人)，是研究佛教史的重要史料。地方史志如东晋常璩的《华阳国志》，记载了从远

古到东晋穆帝永和三年(347 年)期间的巴蜀史事，比一般史书更为详备，是研究我国西南地区的重要史地。

在地理学方面，最著名的作品有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唐代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和玄奘《大唐西域记》。

《水经》一书原是我国第一部记述河道水系的专著，旧题汉代桑钦著，据清代学者考证，认为大约是三国时的著作。书中记载我国河流水道共 137 条，郦道元为之作“注”，补充记述河流水道增加到 1252 条，每条河道一一穷源究委，记述了河流所经之地的山川城镇、历史古迹、风土人情以至神话传说等，极大地丰富了原书，成为我国第一部最全面而又系统的综合性地理著作。

《洛阳伽蓝记》是一部城市地理专著。伽蓝是梵语佛寺的音译。以北魏时期洛阳城内外佛寺的兴隆现象为线索，兼及宫廷变乱，诸王的废立等北魏孝文帝以后的一些史实，包括对外文化交流的一些有关记载。

《元和郡县图志》是一部现存最早、比较完整的总志(北宋时图佚，改名为《元和郡县志》)。它按唐贞观十三年(639 年)规划的 10 道为纲，以当时 47 节镇为标准，分镇记载所辖府、州、县及户数、沿革、山川、道里、贡赋等项。

《大唐西域记》是一部记述外国地理的名篇。玄奘为了学习佛法，到西域取经，曾留居西域 17 年，本书以亲身经历，记载了西域 100 多个国家的山川、城邑、物产和民俗，是研究古代中外交通的重要参考资料。

由于史书的增多，于是研究史学的著作也产生了，其中最著名的是唐朝刘知几的《史通》。它对唐以前的史书详加评审，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史学评论著作。

文学方面，在这一时期最有成就的是诗歌。早期的如曹氏父子(曹操、曹丕、曹植)和建安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唐瑒、刘桢)特别在五言诗方面都有很高的成就，文学史上称为“建安风骨”。以后东晋时代的陶渊明，被称为田园诗的鼻祖。至唐代则发展到我国古典诗歌的顶峰，产生了如李白、杜甫、白居易这样伟大的诗人，一部《全唐诗》的作者多至 2 300 多人近 5 万首诗歌作品。

在诗歌发展的同时，记述怪异传奇和文人轶事的小说也逐渐盛行起来。东晋干宝的《搜神记》是志怪小说的代表作，刘宋临川王刘义庆的《世说新语》是轶事小说的代表作。这些对后代笔记小说的发展，产生过较大的影响。尤其是唐代传奇文的发达，更是后世笔记小说的模范。又有“变文”、“俗讲”等民间创作，不久成为“评话”，替后世章回小说开辟了道路。

由于文艺作品的兴盛，关于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的理论也随之发生，魏文帝曹丕的《典论》，西晋陆机的《文赋》，梁刘勰的《文心雕龙》和钟嵘的《诗品》，都是中国文艺批评史上的重要著作。

文学作品积累的丰富，文艺批评的发展，促成了文学总集的编选工作。东汉以前的文学作品都是单篇流传，东汉时才产生个人文集(别集)，三国以后才逐渐增多。由别集进而产生总集——即编选多人著作而成书。除《诗经》和《楚辞》之外，西晋挚虞编选的《文章流别志》据说是最早的总集。但其书已失传，现存最早和最有影响的是梁昭明太子萧统所编选的《文选》(亦称《昭明文选》)。《文选》选录了自先秦至梁代七八百年间的诗文辞赋约700余篇，很多都是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唐代李善为之作注，使得它保存的资料更丰富，影响更大。陈徐陵编选的《玉台新咏》是继《诗经》、《楚辞》之后的又一部诗歌总集，选录了自汉魏至梁代的诗歌769篇，其中包括古代民间叙事诗——《古诗为焦仲卿作》(即《孔雀东南飞》)这样著名的作品。

除文学作品的结集之外，这一时期还产生了类书——采撷前人著作中的有关资料，按其内容经过分类编辑整理的一种工具书。类书的产生，说明图书多了，无法普遍阅读，需要一种采集精要便于寻检的工具书。我国最早的类书，便是产生在这一时期的《皇览》。《三国志・魏志・文帝纪》:“帝(曹丕)好文学，以著述为务，自所勒成，垂百篇。又使诸儒撰集经传，随类相从，凡千余篇，号曰《皇览》。”全书分40余部，每部有数十篇，共800余万字。惜已失传。继《皇览》之后，南北朝时期编纂类书一时成为风尚，特别是南梁和北齐更为盛行。据《隋书・经籍志》著录的类书，从《皇览》至《书钞》计11家2 012卷。其中较著名的有《华林遍略》(梁徐勉等撰)和《修文殿御览》(北齐祖珽等撰)等。隋有《长洲玉镜》等。唐代则更盛，据史志和私家书目记载，隋唐五代官私所撰类书近万卷。见存的有:《艺文类聚》100卷(唐欧阳询等奉敕撰)，《初学记》30卷(唐徐坚等奉敕撰)、《北堂书钞》(唐虞世南撰)及《白氏六帖》(唐白居易撰，一名《白氏经史事类》或《事类集要》。后与宋孔传撰《后六帖》30卷，合称《白孔六帖》60卷)。这些都是我们查阅唐朝以前资料的重要工具。

类书之外，还有韵书的发生。由于在翻译佛经时注意到文字的声韵，产生了声韵字。魏李登的《声类》，晋吕静的《韵集》，齐周颙的《四声切韵》和梁沈约的《四声谱》，都是早期的韵书。隋陆法言的《切韵》是最重要的一部韵书，唐长孙讷言为之作笺，王仁昫为之刊谬补缺，最后由孙愐在此基础上编写出《唐韵》，使韵书逐步臻于完善。

哲学方面也有许多名著。魏晋之间，老庄思想大为流行，阐述老庄的著

作很多，而魏王弼《老子注》和晋郭象《庄子注》都是后世有影响的著作。这时还产生了我国古代杰出的无神论著作——晋代阮瞻的《无鬼论》和梁代范缜的《神灭论》，这是我国哲学史上非常有影响的具有唯物主义观点的作品，在当时条件下大放异彩。

当然儒家思想仍处于正统地位。这时所谓"义疏"之学大兴，它的体例是"引取众说，以示广闻"(皇侃《论语义疏·序》)这类著作从公元5世纪初到6世纪末，风起云涌，至为繁杂，客观上需要一种简约易杂的本子，唐初便出现了所谓"正义"。它是"正前人之疏义，奉诏更裁，定名曰正"(黄承吉《刘文淇左传旧疏考证序》)。唐初修《五经正义》，是在最高统治者领导下进行工作的，其目的在于义定一宗。在唐代官修的称为"正义"，私撰的便称为"疏"。"疏"是对"注"而言的，是对注的进一步解释。像贾公彦《周礼疏》、《仪礼疏》，便是当时的代表作品。于是儒家经典有注有疏。经、注、疏构成了儒家经本三个鲜明的严谨层次，成为后世《十三经注疏》的组成部分。

至于科技方面，有刘宋祖冲之的《九章注》和《大明历》，这在数学史和天文史上都是很有影响的著作。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农学著作，也是一部总结我国农业知识极有价值的科学名著，被称为"农业的百科全书"。医药方面，晋代王叔和《脉经》、皇甫谧《甲乙经》是关于脉理和针灸方面具有总结性的专著。外科专著有南齐龚庆宣的《刘涓子鬼遗方》。方书有晋葛洪《金匮药方》，刘宋陶弘景《补阙肘后百一方》，唐孙思邈《千金要方》、《千金翼方》。药物学方面有陶弘景《本草经集注》，北齐徐之才《药对》和刘宋雷敩《炮炙论》。它们分别对于药物的分类、采制、用量等都有高度的总结，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药物学专著。唐高宗时，对陶弘景集注的《本草注》几经修订于显庆四年(659年)而为《唐本草》，这是世界上第一部国家药典，比西方最著名的1542年颁行的《纽伦堡药典》要早883年。

第六章 官府藏书和私家藏书的发展

第一节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官府藏书

一、三国时期官府藏书的建立

东汉末年，由于封建王朝对人民的残暴统治，政治黑暗，土地兼并。公元184年爆发了声势浩大的黄巾农民大起义，为了镇压农民起义，东汉王朝广设州牧，利用地方势力镇压农民起义。

三国之间的战争连绵不断，由于战争的需要，各国一方面实行屯田，借以发展农业，恢复经济，安定社会；另一方面又采取笼络士大夫政策，招贤纳士，故而文化教育得以发展，官府藏书逐步恢复和发展。

在东汉末年军阀大混战中，董卓逼汉献帝由洛阳迁都长安，原存于洛阳各藏书处所之藏书，一部分在西运途中散失，还有一部分则在战乱中焚毁，故史家称东汉末年典籍之散失为中国自秦焚书后的又一次大厄运。

曹操素称文雅之士，多方收集典籍。建安三年(198年)，曹操破吕布，让众官兵收集战利品，其中有袁涣独取书数百卷，深得曹操赏识。其后袁涣任郎中令，行御史大夫事，曾建议曹操应及时收集典籍，他说："今天下大难已除，文武并用，长久之道也。以为可大收篇籍，明先圣之教，以易民视听，使海内斐然向风，则远人不服可以文德来之。"(《三国志·魏书·袁涣传》)建安五年(200年)，曹操在官渡之战中，尽收袁术典籍珍宝。正是由于曹氏父子不断收集典籍，并设置官吏掌管藏书秘籍，致使东汉末一度衰败的藏书有了初步的恢复。

魏国魏文帝曹丕，集中朝中文士，利用官府藏书编制了一部类书《皇览》，对中国文献积累影响深远。曹丕爱好文史，深感写作上必须取材经史

百家，故令秘书监王象等人汇集经传诸子，按四十余类别编排，每部数十篇，史称此书“千余篇”、“八百万字”，最后定名《皇览》。《皇览》藏于秘府，但未能传留下来，当时能编集此书，说明官府藏书数量甚多，种类也多样。魏明帝时，秘书监郑默编制了官府藏书目录《中经》。

蜀国位于西南，该国也曾设立东观收藏典籍，并派郤正担任秘书郎、东观令，又有许慈等也曾参与东观的整理工作。

吴国地处江东，也设立东观典藏典籍，曾有韦曜、华覈等担任过校书官职，他们在东观整理旧有典籍，并编制目录以供朝廷君臣阅读和查考。

二、两晋时期官府藏书的发展

公元265年，司马炎篡魏，建立了晋朝。公元280年晋灭吴，从而结束了三国鼎立的分裂局面。统一的中国出现了短暂的安定的社会环境，因而社会经济、文化得以发展，历经丧乱的典籍也在这种条件下得以恢复，并相应得到发展。

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年)三月，西晋将军王浚攻入吴国都城建邺，孙皓降，王浚收其典籍，这样做的结果，使晋承继了曹魏的官藏基础，又添加了孙吴的遗书，从而建立了晋的官府藏书系统。

公元274年，晋任命荀勖领秘书监，与张华等按照刘向整理藏书和编写目录的方法整理官府藏书。晋武帝太康二年(281年)，汲郡人不准盗掘魏襄王墓，出土竹简数十车，多为战国时各种典籍，朝廷命令束皙等加以整理，最后用当时的文字写成新的典籍，收藏于官府藏书中。这些书有《纪年》、《易经》、《穆天子传》等共16种75篇。此后，荀勖根据郑默的《中经》编出一部新的目录——《中经新簿》，著录有29 945卷，这从汉末至两晋时期官府藏书数量和质量都堪称首位。荀勖自称，当时“复校错误十万余卷”，可见当时官府藏书规模是可观的。晋惠帝永熙元年(290年)朝廷发出划分秘书与中书职能的命令，别置秘书监，管理中外三阁藏书，这就是说，秘书监成为朝廷的一个部门，不再属于宫廷的一个部分。不久，爆发了“八王之乱”，史称：“惠怀之乱，京华荡覆，渠阁文籍，靡有孑遗。”(《隋书·经籍志》序)三国以来所积聚的各种典籍遭到毁灭性破坏。

公元316年，匈奴刘曜夺得长安，晋愍帝出降，西晋灭亡。公元317年，司马睿在建康称帝，建立了东晋。北方则有五胡混战，干戈相扰，开始了十六国统治时期。就在东晋建立之初，统治者也曾力图恢复西晋的官藏，如著作郎李充整理旧籍时，对比荀勖所记，只存留下3 014卷。但是，处于江南偏安局面的东晋，社会环境的相对稳定，江南纸张制品不断增加，为官

府藏书的发展提供了条件。至晋孝武帝宁康元年(373 年)著作郎徐广校理秘阁书籍，数量又达 36 000 卷。

与东晋对峙的北方十六国，由于兵火不断，社会文化备受摧残，故有史家称其时是“宪章礼乐，寂灭无闻”，亦有人称：“文教之盛，苻、姚而已。”417 年，刘裕平定姚时，收取典籍仅 4 000 卷之数。总的看来，北方各朝官府藏书的数量和质量都处于低水平状态。

三、南北朝官府藏书的发展

公元 420 年，刘裕建立宋朝，后经齐、梁、陈等朝，因建都于南方建康，故称南朝。此时，北方最终统一于北魏，经北周、北齐，通称北朝。南方与北方出现对峙局面，直至 589 年，隋统一中国。

刘宋的官府藏书主要是承继东晋官府藏书的主要部分，并收集了部分散落于民间的书籍。宋文帝元嘉年间，秘书监谢灵运整理秘阁藏书，编了一部四部目录，当时统计官府藏书有 14 582 卷。此后，殷淳为秘书丞时，就秘书阁藏书撰有四部目录，官府藏书继续不断得到整理。

齐的官府藏书，基本上承继刘宋官府藏书的遗留，并由当时学者沈约、王亮等校勘藏书、编出目录，官府藏书处于一种低水平的发展状态，藏书数量上并没有大的增加。

公元 502 年，萧衍建立了梁，是为梁武帝。萧衍是一个喜爱典籍的统治者，平东昏侯时，命吕僧珍勒兵封府库及典籍。此外，出于对佛教经籍的爱好，专设华林园收藏佛典，藏书达 23 106 卷。又有文德殿收藏经籍和其他图书，刘孝标编撰《文德殿正御四部目录》，术数一类另为一部，藏书在目录中著录达 23 106 卷。此外，官府藏书不断整理编目中，秘书监任昉等还注意把私人藏书中为官府藏书所无者，通过抄录副本，补充于官府藏书，故梁朝拥有的典籍，无论从数量和质量上都超越前朝。公元 552 年，梁元帝克平侯景，把原有官府典籍运至江陵，据称数量就达 7 万余卷。

梁元帝据守江陵。公元 554 年，镇守襄阳的萧詧引西魏攻江陵，梁元帝惧怕宫廷藏书遭到散失，于是，“入东阁行殿，命舍人高善宝焚古今图书十四万卷”。这次焚书的损失，不仅是梁朝藏书的毁灭性打击，也是汉魏以来历代遗存书籍的重大损失。

陈建国后，不断有收集图书的举动，但官府藏书并无大的变化。宫廷藏书中续有编目之举，如陈文帝天嘉六年(565 年)，就编有《寿安殿四部目录》、《秘书阁图书法书目录》、《德教殿四部目录》、《承香殿五经史记目录》等目录，分藏于各藏书处所的典籍是很有特色的。

处于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北魏、北周和北齐，他们在藏书政策上表现出向南方汉族政权互相交流的倾向，并大批吸收汉文典籍入藏，这都有力地促进了民族文化的交流，也体现了中华民族丰富多彩文化的发展风貌。

北魏建国初年，就曾着力做好官府藏书的工作。北魏太祖道武帝吸收秘书监李先建议说，自古以来，典籍繁杂，征集费时费力，但如果通过行政力量，即由各地州县搜集，然后集中于京都，还是可以使经籍不断充实和完善的。故魏太祖道武帝采纳了李先的意见，曾广泛征集过经籍。到了魏高祖孝文帝时，曾向南朝齐借书抄录，并号召各地献书，一直到北魏世宗宣武帝时，还颁布法令，“重求遗书于天下”。通过这三次的征集书籍的举措，北魏官府藏书略具规模。

北魏末年，分裂为东魏和西魏，官府藏书规模很小。此后，北齐代替东魏，北周代替西魏，官府藏书没有进行重大的整理，典籍也无法增加，官府藏书逐步衰落。

第二节　隋代官府藏书

公元581年，杨坚夺北周政权，建立了隋王朝，中国长期分裂的局面开始消失，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的建立，对中国中古社会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公元589年，隋一举消灭南朝陈，中国重新统一。隋朝统治时间很短，但在历史上是很有影响的，就官府藏书而言，它继承魏晋南北朝的典籍，又为唐朝官府藏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隋建国后，采取了一些安定社会秩序，发展社会生产的措施。如实行均田制，推广租庸调法，相对减轻了对农民的负担，缩短了徭役的时间；开发通道、运河，便利了南北交通，隋打败了突厥人，巩固了国势；在政治上采取开科取士，废除魏晋以来世袭的九品中正制，有利于王朝统治，而且也促进了文化教育的发展。手工业的造纸、书籍装帧有了发展，书籍数量和质量都有了提高。这些都为隋代官府藏书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一、隋文帝对典籍的收集与整理

隋初，藏书很少。隋文帝开皇三年(583年)，诏准牛弘之请，收集天下图书，规定凡献书一卷，赏绢一匹，校写既定，本即归主，也就是用赏赐以补偿藏书之人，鼓励民间献书，曾经收到一定的效果。当时，曾派遣专使到各地搜集异书，因此，民间典籍逐步汇集于京师，朝廷编《开皇四年四部目

录》。当然，所收典籍也有质量问题，刘炫“伪造书百余卷，题为《连山易》、《鲁史记》等录上，送官取赏”。与此同时，隋文帝也积极收集前朝遗书。隋文帝开皇九年(589 年)，陈朝灭亡，隋尽收其典籍充实官府藏书，只是这批书籍“纸墨不精，书法拙恶”。于是，隋文帝又令天下工书之士如京兆韦霈、南阳杜頵等，在秘书省内补续残缺，每种著作分别写成正副两本，藏于宫中，其余分别藏于秘书内外，约计藏书达 3 万余卷，比之开国时 15 000 约增加一倍之数。

二、隋炀帝与国家藏书和宫廷藏书建设

好大喜功的隋炀帝即位后，规定秘阁藏书每种写五十副本，分为三品，上品红琉璃轴，中品绀琉璃轴，下品漆轴，分别收藏于各藏书楼中。东都洛阳有观文殿，分东西两厢构屋，东屋藏甲乙，西屋藏丙丁。宫廷中还有妙楷台，收藏古迹，即书法方面的珍品。又有宝台，藏古画，并建有内道场，收集佛经、道经典籍。其余副本分藏西京、东都宫省。根据记载，隋代西京嘉则殿，收藏图书 37 万卷，除去重复猥杂，实有正御本 3.7 万卷。这些经过整理的书籍，保存在东都修文殿。

当时的西京、东都各宫省都有藏书，《旧唐书·经籍志》谓：“炀帝好学，喜聚逸书，而隋世简编，最为博洽。”后人也曾称赞说：炀帝“藏书之富，冠绝古今”。

隋文帝时期，秘书省官员有秘书监 1 人，秘书丞 1 人，秘书郎 4 人，校书郎 12 人，正字 4 人，领著作曹、太史曹。到了隋炀帝时，原职不变，增加官吏，如增儒林郎 10 人，掌明经待问，唯诏所使，即负责皇帝政事参考，增文林郎 20 人，掌撰录文史，检讨旧事，即负责著作典籍和利用典籍作参考，还有校书郎 40 人，楷书郎 20 人。

隋炀帝时，宫廷藏书的设备是极为华丽的。《文献通考》载，当时每种图书分写五十副本，分三品，分别按部类收藏。“藏书皆装翦华净，宝轴锦标。于观文殿前为书室十四间，窗户床褥厨幔，咸极珍丽。每三间开方户，垂锦幔，上有两飞仙，户外地中施机发。帝幸书室，有宫人执香炉前行，践机则飞仙下，收幔而上，户扉及厨扉皆自启，帝出则复闭如故。”

隋代末年，藏书尽失，宋代王明清引唐代杜宝之《大业幸江都记》云：“炀帝聚书至三十七万卷，皆毁于广陵，其目中并无一页传于后代。”(《挥麈后录》卷七)毁于广陵，此谓隋炀帝自焚典籍。实际上，唐初，魏徵编《隋书》，《隋书·经籍志》序称，“今考见存，分为四部，合条为一万四千四百六十六部，有八万九千六百六十六卷。其旧录所取，文义浅俗，无益教理

者，并删去之。其旧录所遗，辞义可采，有能弘益者，咸附入之。”按此说法，当时隋留下的典籍数量还是不少的。

第三节　唐代官府藏书

公元618年，唐高祖灭隋，建立了统一的封建中央集权的唐帝国。唐开国后，接受农民起义的教训，在统治政策上，对农民作了一定的让步，如实行均田制和租庸调法，有利于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对外消灭割据，征服边地，因而国力强盛，版图辽阔，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封建帝国。文化政策上，承继隋代，采取科举取士笼络知识分子，同时，从思想上加强统治，如订定《五经正义》，颁行天下。到了唐代中叶，文学艺术极为繁荣，唐代诗歌成了我国文学史上的辉煌成就。文化教育的繁荣，促使典籍的增多和流传方式的改进。唐代是我国官私藏书的兴盛阶段。

一、唐代官府藏书的发展

1. 唐高祖和唐太宗对典籍的收集

唐高祖武德三年(620年)平王世充后，尽收隋东都洛阳观文殿书籍，命宋遵贵载书运往长安，经三门峡中流砥柱之处，船翻书多漂没，连目录亦被濡浸，史称，十不得一二，约为8 000余卷。唐高祖武德五年(622年)准秘书监令狐德棻奏请，朝廷访求天下遗书，当时称“重加钱帛”，证明收集是下力的。与此同时，从高祖到太宗年间，秘书监内增设楷书手，缮写传抄图籍。太宗时令魏徵写四部群书时，有雠校30人，书工百员，又称“贞观中，魏徵、虞世南、颜师古继为秘书监，请购天下书，选五品以上子孙工书者为书手，缮写藏于内库，以宫人掌之”。经过这一系列的措施，唐初官府藏书是很多的，据称武德九年(626年)改修文馆为弘文馆，聚书达20余万卷，而唐太宗时魏徵等编写《隋书·经籍志》，删去文义浅俗，无益教理者，著录为14 466部，89 666卷。“群书大备”是写实的说法。

2. 唐玄宗对国家藏书和宫廷藏书的整理

开元三年(715年)，唐玄宗开讲经书，言及经籍，秘书监马怀素等谓，当时宫廷藏书和国家藏书数量虽多，但质量很差，而且“什乱无序”，唐玄宗就曾说“内库皆太宗高宗先代旧书，常令宫人主掌，所有残缺，未遑补缉，篇卷错乱，难以检阅”。所以，唐玄宗就命令马怀素着手整理图籍，以后逐年不断派专使，增置官员和书手，全面地整理和建设了宫廷藏书和中央机构藏书。现试列举如下：

开元五年(717 年)，东都乾元殿写四部书，以马怀素为修图书使，褚无量等校正。

开元六年(718 年)，改丽正修书院修书官为丽正殿直学士，褚无量等继续修书。

开元七年(719 年)，朝廷要求公卿士庶之家所有异书都要借给官府抄写，元行冲综理秘书省，丽正殿写四库书，弘文、崇文二馆置校书郎。

开元八年(720 年)，丽正修书院加文学士及修撰、校理、判正、校勘等官。

开元九年(721 年)，元行冲等奏上《群书四部录》200 卷，分经、史、子、集四部，著录 2 655 部，48 169 卷。

开元十年(722 年)，张说负责丽正殿修书事，徐坚为副，张悱充图书括访异书使。

开元十三年(725 年)，改集仙殿为集贤殿，丽正殿书院为集贤殿书院。

玄宗开元间，官府藏书建设规模很大，《唐六典》称：开元五年，秘书令、秘书监、弘文馆、史馆、司经崇文馆皆有图书。集贤院收藏皆御本，分四部。而开元六年，唐玄宗自洛阳还长安，曾从秘书省、昭文馆、礼部、国子监、太常寺、诸司官借写图籍，这时，宫廷藏书和中央政府机构藏书是很丰富的。且集贤书院，即属国家藏书楼，两京皆有。《新唐书》称集贤书院“学士通籍出入”，说明图籍可以利用。

3. 安史之乱后官府藏书的恢复

公元 755 年，安史之乱爆发。756 年，两京陷落，叛军大肆抢掠烧杀，宫室、六省焚烧无遗。所以，官府藏书必然遭受重大损失。史家曾称：“禄山之乱，两都覆没，乾元旧籍，亡散殆尽。”(《旧唐书·经籍志》)

安史之乱后，唐肃宗唐代宗相继下诏求书，重建官府藏书，如肃宗时于休烈奏请收集散失的兴庆宫所保存的国史、实录、起居注等文献，建议各地收得这类文献，如送上一书，则送官职一，如送上资料一篇，则奖励绢十匹。但经过数月的征集，也只获得一两篇，可见安史之乱时典籍损失之严重。

唐代宗广德二年(764 年)元载为宰相，以千钱购书一卷相号召，且命拾遗苗发出使江淮搜访图书，但收获也不大。

德宗贞元时，曾对官府藏书进行整理，如贞元二年(786 年)曾在秘书省整理藏书，校正《九经》，并编有《贞元御府群书目录》。至文宗时，经籍略有增加，开成二年(837 年)郑覃曾说：秘阁图书，分藏十二库，数量达 5 万多卷。

唐代末年，社会阶级矛盾激化，农民起义风起云涌，黄巢起义军曾攻进长安，官府藏书有所损失。如史家曾称：“广明初，黄巢干纪，再陷两京，宫庙寺署，焚荡殆尽，曩时遗籍，尺简无存。”(《旧唐书·经籍志》)但这种说法也有史学家认为当时烧书并不是黄巢，而是各地勤王兵焚烧宫室的结果。

二、官府藏书的管理与利用

1．官府藏书系统

唐代宫廷藏书和中央政府藏书处：

秘书省　秘书省是朝廷掌管国家典籍之机构。据徐松考证，此机构在京师长安城内承天门街之西，内有监院、后堂和校书院。监院东侧有书阁重复，贮古今图书。秘书省曾称兰台，麟台。秘书省，负责官员叫秘书监，“掌邦国经籍图书之事”，1人，从三品；秘书少监2人，从四品上；秘书丞1人，从五品上。下设二局，一曰著作，二曰太史。下有秘书郎、校书郎和正字、主事等官。具体从事书籍整理的令史、书令史，以及典书、校书和楷书手、装潢匠等因时而有增减。总之，秘书省实际上担负着：其一，负责典籍征集、校勘、抄录、编目工作；其二，提供政事参考。

弘文馆　曾有称昭文馆、修文馆者。按唐制，弘文馆设置学士，掌详正图籍、教授生徒，并参与朝廷政事、礼制等问题的讨论。弘文馆在朝廷属门下省领导。弘文馆设学士，设定学生30人，并有校书郎和典书等官吏和工作人员，有时担负校勘典籍的任务。据《唐会要》称弘文馆聚书20余万卷，并有天下贤良文学之士如虞世南等经常在馆讲论文史、商量政事，可见弘文馆在朝廷施政中的特殊地位。

史馆　唐代设立史馆是专责修撰国史，因为要编写史书，自然要集聚前代经籍图书，还包括过去编写的实录、日历，以及朝廷中政事、军事、礼制和外交的文献资料。故史馆收藏文献典籍质量颇高，颇似专业藏书处所。史馆官吏较少，这是因纂修国史一般均委派高官或饱学之士担任。

崇文馆、司经局　这两个部门都属于太子东宫机构。崇文馆藏书供皇族及相关人员学习和研讨之需。崇文馆设置学士、直学士、学生和校书等官，并有令史、典书和书手、装潢匠等工作人员。司经局专门管理藏书、校勘典藏，也是为太子等皇族提供服务。

集贤殿书院　集贤殿书院是唐玄宗开元时重要的宫廷藏书处所。因唐分东都和西京两处，故集贤殿书院也有两处，该院因集中了皇朝保存之重要典籍，同时担负着培养、选拔人才并提供皇室之参考，故藏书质量和数量均是

一流的。如《唐会要》称，唐玄宗开元十九年(731 年)，集贤院四库书达 8 万卷之数，经库 13 752 卷，史库 26 820 卷，子库 21 548 卷，集库 17 960 卷。集贤院设学士 1 人，知院事 1 人、副知院事 1 人，判院 1 人、押院中使 1 人和侍读学士、修撰官、校理官等官吏，并有其他工作人员。《旧唐书·职官志二》称："集贤学士之职，管刊缉古今之经籍，以辨明邦国之大典。凡天下图书之遗逸，贤才之隐滞，则承旨而征求焉。"而《新唐书·百官志》说：集贤殿书院的任务"凡图书遗逸，贤才隐滞，则承旨以求之。谋虑可施于时，著述可行于世者，考其学术以闻。凡承旨撰集文章，校理经籍，月终则进课于内，岁终则考最于外"。据此，集贤殿书院是宫廷中专为皇帝使用的藏书处所，并征集、整理图籍，或专门抄录、装潢典籍，使之成为皇室中珍藏。同时，集贤殿书院还参与朝廷事务。这样，它就是宫廷藏书之首位藏书处。

2. 官府藏书的规模与设备

唐代官府藏书经过多年的积累与整理，典籍数量不断增加。开元九年(721 年)，元行冲等编成的《群书四部录》统计，藏书 2 655 部，48 169 卷。开元十九年(731 年)，东都集贤院四库书，经库 13 752 卷，史库 26 820 卷，子库 21 548 卷，集库 17 960 卷。开元二十四年(736 年)，唐玄宗回长安曾命令东都藏书三分之一留下，三分之二的藏书运往长安。天宝三载(744 年)六月，清点四库书计有：经库 7 777 卷，史库 14 859 卷，子库 16 287 卷，集库 15 720 卷。从天宝三载至天宝十四载，四库续写书又 16 843 卷。以上是宫廷藏书数量的变化。如果加上中央机构如国子监等机关的藏书，当时官府藏书的数量是相当大的。

集贤殿书院的典籍，由朝廷供给抄写材料，并选书手抄写，专门官员校勘，工匠装潢。所以，藏书的质量是很高的。如《新唐书·艺文志》记载：集贤院抄书时，"太府月给蜀郡麻纸五千番，季给上谷墨三百三十六丸，岁给河间、景城、清河、博平四郡兔千五百皮为笔材"。

《旧唐书·经籍志后序》记载："开元时，甲乙丙丁四部书各为一部，置知书官八人分掌之。凡四部库书两京各一本，共一十二万五千九百六十卷，皆以益州麻纸写。其集贤殿御书，经库皆钿白牙轴，黄缥带，红牙签；史书库钿青牙轴，白缥带，绿牙签；子库皆雕紫檀轴，紫带，碧牙签；集库皆绿牙轴，朱带，白牙签以分别之。"从以上记载，可以知道当时官府藏书的装帧是相当讲究的。

3. 官府藏书的利用

唐代官府藏书系统是比较完善的，因此，为数不少的宫廷藏书、中央政

府机构的藏书处，在朝廷政事咨询、修撰史书和类书以及提供书籍教育皇室子弟，甚至专供皇帝阅读参考等方面，都曾起过重要的作用。

首先，从官府藏书的管理机构和官员设置看，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官府藏书的重要性。唐代沿前代旧例，设置秘书省，秘书省与尚书、门下、中书、殿中、内侍共为朝廷六省。殿中、内侍省纯属管理帝王内属之事，而尚书、门下、中书是负责朝廷国家政事执行、纠核、审议等事务，秘书省与它们同列，说明"邦国经籍图书之事"，是与国家政事同样重要的。三公之下，秘书省官员中秘书监为三品，秘书少监为四品，与朝廷尚书、门下、中书省首长并列，可称是高位显爵。当时担任秘书监职的官吏，有时能受到皇帝的特别优待。马怀素在开元初，"三迁秘书监兼昭文馆学士。怀素虽居吏职，而笃学手不释卷，谦恭谨慎，深为玄宗所礼，令与左散骑常侍褚无量同为侍读。每次阁门，则令乘肩舆以进。上居别馆，以路远则命宫中乘马，或亲自送迎，以申师资之礼"(《旧唐书·马怀素传》)。

其次，官府藏书为朝廷政治事务发挥了积极作用。唐初，唐太宗在处理政务时，充分地利用宫廷藏书。如利用秘书监官吏，编纂有关典籍，或直接组织他们参与朝廷事务。《新唐书·肖德言传》记载："太宗欲知前世得失，诏魏徵、虞世南、褚亮及德言，裒次经史百氏帝王所以兴衰者上之，帝爱其书博而要，曰：使我稽古临事不惑者，公等力也。"这里讲的就是唐太宗对当时先后住秘书监的魏徵、虞世南和弘文馆学士肖德言等所编《群书治要》的反应。《新唐书》上也记载着唐太宗重视书籍的借鉴。李世民即位前，"锐情经术"，常召十八学士"与议天下事"。即位以后，"殿左置弘文馆，悉引内学士番宿更休，听朝之闲，则与讨古今，道前王所以成败。"(《新唐书·儒学传》)除了组织专题性书籍的编写，唐代还十分重视史书的编撰，把历史经验教训作为统治阶级的借鉴。而且，编写前代史书，也是适应皇朝大一统的需要，即政治、经济、军事统一以后，必须有统一思想的措施。总之，希望通过史书达到考论得失，惩恶劝善的目的，其资政的意图十分明显。

再次，官府藏书实际上是朝廷的文化学术中心。如集贤殿书院，除了征集典籍，校勘整理，编制目录，提供官吏使用等有关经籍事务，它还负责组织典籍的编纂工作，或协助其他著述单位完成编撰任务。(1)汇纂类书。武德五年(622年)，欧阳询与裴炬等编纂类书，他们是充分利用官府藏书来进行的，其书名为《艺文类聚》，共有100卷，包括经史百家，也有诗词文句，是提供人们查考阅读的。贞观十五年(641年)，有高士廉编纂的类书《文思博要》，武则天时编纂的《三教珠英》，这两部类书篇幅达1 200卷，包括众多的学术门类和多样的文献资料。一直到唐玄宗开元十五年(727

年),朝廷又组织编写了《初学记》,供诸王子查找事类和辞藻之用。这些类书的编写,必须广泛地参考和引用各种文献,都必须依靠官府藏书。(2)校订经典。唐初,“太宗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讹谬,令师古于秘书省考定五经,师古多所厘正,既成奏之”(《旧唐书·颜籀传》)。颜师古校定儒家经典,唐太宗将校定的经书定名为《五经正义》,这种做法实际上是说明这些书籍是经过朝廷审定的文本。一方面,这样做是为了把魏晋以来各种注经解经之说加以统一,消除不利于皇朝统治的说法;另一方面,也是为科举考试颁布一种标准的读本,为士人诵习、研读和应考提供方便。唐文宗太和元年(827年),朝廷又仿照汉末立石经的故事,把五经文字刻石立于国子监,因完成于开成年间,故称开成石经。唐秘书省的官吏,始终参与了儒家经典的考订和传播。(3)编纂典籍。唐初,在秘书省内修史,以后唐太宗设立史馆,史书的编写工作,始终是和官府藏书密不可分的。贞观三年(629年),唐太宗命姚思廉编纂《梁书》、《陈书》,李百药编纂《北齐书》、令狐德棻编纂《周书》,魏徵等编纂《隋书》,由魏徵总监诸史。贞观十年(636年),这五代史书修成。贞观十五年(641年),唐太宗又命于志宁等补修各史的“志”。贞观二十年(646年),房玄龄重修《晋书》。除了官府组织修史,私人也撰写史书,如李延寿撰写《南史》、《北史》,而杜佑编纂《通典》、吴兢编纂《唐书》,他们都利用了在官府藏书处所工作的便利,或者是利用官府藏书的资料完成其著作。

第四节　写本书的兴盛与私家藏书的发展

一、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私家藏书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也就是一般称为中国中世纪时的私家藏书,往往具有不同于其他时代的特点。

学术的繁荣是私家藏书的重要条件。由于汉代文化学术的积累,三国两晋时期的文化学术也是相当繁荣的。史学界重视著述的多样,不仅新著、续补大量史书,如汉代史书就有多种,而且,分裂割据局面的出现,属于地方性史书也有不少著述。此外,地理著述、家族谱系著述也是很多的,甚至可以编成达百卷以上的著作丛书。文学、艺术、诗歌、绘画的著述也非常之普遍,促成了新的著作类型,如总集、别集、类书等大量涌现。因此,一般著述家都有相当丰富的典籍收藏,而收藏丰富必然促进创作和编撰活动。这反映了学术与藏书的紧密关系。

三国两晋时期私家藏书的发展与当时典籍制作条件的改善也有重要关系。我们知道，我国从东汉开始生产纸张以后，由于纸张生产材料不够普遍，生产技术要求较高，一段时期内纸张不能普及于民间。进入东晋以后，南方经济相对发展，造纸技术逐步普及，民间造纸方法不断提高。这样就使纸张应用日趋普遍起来。如东晋范宁在浙江做官时，曾经规定文书不用土纸，而用藤角纸。又王羲之曾送给谢安府纸9万张。一直到东晋末年，桓玄下令禁止不用竹简，要求官府公文一律用纸张书写。应该说，纸张这种新载体，正在逐步取代笨重的、书写不便的、保存不易的竹简，纸张成为社会政治生活、经济事务、文化活动、学术研究上不可缺少的工具。正因这种原因，私家藏书出现了崭新的局面。

此外，我们还应该从地域性上分析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私家藏书。魏晋两朝交替时，未经过战火，西晋是承继魏政权而建立起来的，因此，西晋的统一为私家藏书创造了发展的条件。东晋建国以后，据有南方。宋、齐、梁、陈诸朝，依靠南方比较丰厚的物质资源、庞大士族形成的写作队伍，以及取用方便的纸笔，所以南方逐步成为我国中古世纪文化的先进地区。南方是全国私家藏书最为集中的地区，无论从所藏书籍的数量和质量上看都是最突出的。但是，当时北方地区私家藏书情况就不同。从西晋末年以来，屡次兵火之灾，大都是集中于中原地区。东晋灭亡以后，形成南北朝对峙的局面。北方一般都是少数民族贵族统治，一方面出于军事统治的原因，对文教事业未予重视，另一方面也因为整个社会文化的落后，无法提供大量的典籍，私家藏书的发展必然缓慢。

三国时，根据文献记载，魏国有王粲，曾得到汉末大学问家蔡邕的赠书，有称其数量达万卷之数。又有王弼，也曾得到别人赠与的典籍，据说也有万卷之数。而地处西南的蜀国，史载有向朗，积累的典籍也是闻名于时的。但总的来说，三国时期私家藏书尚为数不多。

两晋时，私家藏书得到较快的发展。如史载的藏书之家就有范平、范蔚的家族藏书。史载：张华“雅爱书籍，身死之日，家无余财，惟有文史，溢于几箧”。并称，迁居时，“载书三十乘”。束皙也有藏书。还有如张嶷、刘正舆、傅敷三人，张湛《列子序》称他们三人“永嘉南行，并有所载”。这就是说，他们在永嘉之乱时，曾把自己的藏书迁徙南方。此外，史载晋代郗俭之、殷允，都是多书之家，官家曾借抄其家。这些情况说明，晋代私家藏书有所发展，并在社会生活中起过一定作用。

南北朝时私家藏书发展较快。《隋书·经籍志》称：“梁武敦悦诗书，下化其上，四境之内，家有文史。”江左文献，于斯为极盛。梁时私家藏书最

值得注意的是梁宗室诸王的藏书，他们享有优越的政治地位和充裕的资金，加上交流广泛，可以多方面积累典籍，故而，梁宗室诸王成为南朝时私家藏书之翘楚。如昭明太子萧统，称东宫有书3万卷。又有萧绎，后来就位称梁元帝。未登基时，曾任宁远将军、会稽太守，荆州刺史。萧绎自称："自聚书四十年，得书八万卷。"（《金楼子·聚书篇》）又有萧劢，史称其"聚书至三万卷"。梁朝还有部分学者和官吏的藏书也值得称道。如任昉，"家虽贫，聚书至万余卷，率多异本"。又如沈约，"聪明过人，好坟籍，聚书至二万卷"。张缵，"有书万卷余"。王僧儒，"好坟籍，聚书万余卷"。以上这些人，都是按照自己学术研究的需要积累典籍，所以成为有名的藏书家。梁朝还有陶弘景、阮孝绪，这些是称之为处士的藏书家，阮孝绪更因编著《七录》而闻名于世。

南方的宋、齐、陈各朝，都有一些有特色的藏书家，如宋朝之刘穆之、谢弘微、沈亮，齐朝之王昙首、王俭、褚湛之和褚渊、陆橙和陆少元、沈骥士、刘善明、崔慰祖，陈朝之孔奂、许亨、江总、徐伯阳等。加上前列梁朝的藏书家，可见南朝藏书之盛。

处于北方的北魏，家有藏书者，一般也是朝廷文史官吏和显宦名臣，如李顺、平恒、宋繇、阳尼等。北齐则有李业兴、邢子才、辛术、魏收、颜之推。北周有贺拔胜、黎景熙等人。

综而论之，三国两晋南北朝时的私家藏书，就他们积累典籍和利用以及这些藏书家在社会文化学术发展中的贡献而言，都是值得称道的。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私家藏书的发展处于我国私家藏书发展的早期，因社会动乱，连年典籍散失频繁，早期纸张载体得之不易，故各家藏书的数量不多，品种也不繁富。

由于藏书家藏书目的的单纯，大多为自己读书和做学问而藏书，故对藏书能公开借抄，甚至有个别藏书家优待读书人为之办饮食。至于私家藏书与官府藏书互相借抄的事实更是屡见不鲜，这种藏书公开的做法对中国封建社会私家藏书的发展影响至深。

由于典籍主要靠传抄，因而私家藏书为了增加藏书品种，往往向别家借抄，或向官府藏书借抄，官府也有向私人借抄书籍或借书校勘的。这样，促进了官私所藏典籍的交流，也保证了文化典籍得以传承和保存。

二、隋唐时期的私家藏书

隋建国后，长期分裂的中国走向统一，公元6世纪至公元10世纪初，中国在世界上以国力强盛、文化发达而称雄。隋唐两代的私家藏书，由于充

足的社会资源，私家藏书的发展条件比较具备。整个社会对典籍需求的迫切和社会上流传典籍的便利，为数众多的读书人和爱书人逐步积累了丰富的典籍而成为著名的藏书家。而典籍数量增多、品种多样和装帧形式不一，又使藏书家讲求藏书校勘、编目和收藏。这表现于隋唐时代的一些私人藏书家的藏书数量和品种超越前代，这些藏书家逐步追求藏书的特色，致力于形成自己的特藏。同时，为使阅读和查考方便，又着力于编写藏书目录。

隋朝统治时间较短，见于记载的藏书家为数不多，比较值得注意的有：许善心、明克让、崔儦、姚察、柳顾言、陆爽、牛弘等。一般说来，这些藏书家，或是朝廷管理典籍的官员，如柳顾言、牛弘，他们均任过秘书监之职，收藏典籍亦是出于爱好所至。也有部分读书人出于对典籍的珍爱，承继并整理前代遗留下来的典籍而成为藏书家。

唐代承继隋代的统一局面，因为有比较发达的经济基础，浓郁的文化氛围，加之交通相对发达，在西京长安和东都洛阳，以及南方的一些大都市，都出现一些藏书大家。王子舟统计称：隋唐时全国各地藏书家 119 人，其中长安 55 人，洛阳 10 人，其他地区 50 人，长安、洛阳的藏书家占全国的 55.5%，两地万卷以上的藏书家 14 人，占全国万卷以上藏书家总数的 48.3%。① 藏书家队伍中，有担任过秘书省、史馆官职的官吏，他们有机会接触典籍，也有可能补充自己的藏书。还有一些文学家和诗人，他们出于写作的需要，也积累藏书。还有是分封于各地的诸王，以及任职各州的地方官吏。唐初，一些高官，因为工作关系，能够接触官府藏书，自己也爱好典籍，如魏徵、颜师古等就是藏书大家。李氏宗室诸王也有好些积书甚多者，如邓王李元裕，韩王李元嘉、琅琊王李冲等。唐高宗至玄宗时，担任过秘书省和史馆官职的元行冲、韦述、吴兢、杜暹等成为著名藏书家。此后，又有李承休、李泌父子，其藏书知名度颇高。至唐宪宗、文宗时，又有文人学者型藏书家，如柳公绰、柳宗元、韦处厚、白居易、牛僧儒、段成式等。晚唐时，这类读书人藏书的风尚也盛，史料中相关记载也不少，说明唐代在高度文化发展中，不仅为社会提供了更多的文化财富，也因文化积累成就了不少藏书之家。

私藏中藏品质量提高、数量增多是唐代私藏家的显著特点。唐代苏弁"聚书二万卷，手自校定，史称与秘府埒"（《新唐书·苏弁传》）。王涯"家书多于秘府侔"（《新唐书·王涯传》）。又如韦述"蓄书二万卷，皆手校定，黄墨精谨，内秘书不逮也。古草隶帖、秘书、古器、图谱无不备"（《新唐

① 傅璇琮，谢灼华．中国藏书通史[M]．宁波：宁波出版社，2001：226-228.

书・韦述传》)。又如颜师古家"多藏古书画、器物、书帖"(《新唐书・颜师古传》)。由收藏典籍扩大到收藏法书名画，这是很自然的。唐时，典籍是由手抄而成，由于这种原因，进而崇尚名人手迹，以及流传下来的碑版文章，这样的收藏丰富多彩，品种多样。

多样的书写装帧材料，为藏书家装潢自己的藏品提供了保证。因为人们获得的材料容易，因之所藏典籍可以按用途不同分成等级，如柳公绰、柳仲郢"家有书万卷，所藏必三本：上者贮库，其副常所阅，下者幼学焉"(《新唐书・柳仲郢传》)。有些藏书家甚至用不同颜色区分图书种类，既便于收藏，也便于利用。如李泌藏书3万卷，经用红牙签，史用绿牙签，子用青牙签，集用白牙签。诗人韩愈曾写诗称赞李泌的藏书："邺侯家多书，插架三万轴，一一悬牙签，新若手未触。"

当时，流行的典籍因来源的不同，内容可能有所差别，所以，藏书家对自己所藏的典籍都要进行校正、整理，而有些为了使用的方便，也要对某些书籍进行重新抄写。甚至有些把藏书分类归纳，重新组织，以便阅读和利用。柳仲郢"厩无名马，衣不熏香。退公布卷，不舍昼夜。九经三史一抄，魏晋以来南北史再抄，手抄分门三十卷，号《柳氏自备》。又精释典，《瑜伽》、《智度大论》皆再抄，自余佛书，多手记要义。小楷精谨，无一字肆笔"(《旧唐书・柳仲郢传》。

正是由于私人藏书数量和品种的变化，特别是唐人喜欢在收藏典籍之余，也收藏法书名画，所以，唐代藏书家注重藏品的保护问题。首先，某些藏书家开始建设自己的书楼。李泌，有人称其曾"构筑书楼"，田弘正"于府舍起书楼"。专门藏书楼舍的建设，说明了某个藏书家收藏典籍的增加，不建书楼就无以容纳，同时，专门的书楼也有利于典籍的保藏和利用。其次，史载唐时私人藏书家有用印章施于典籍上的做法，这样，既增加了美观，又说明了藏书为谁所有，如果遇到外借他人和散失也可帮助查找。从此，我国私人藏书家对于所收藏的图籍、名画、法帖等都十分重视藏书印。而据《渑水燕谈录》记载，杜暹藏书，其书之跋皆有自题诗句："清俸买来手自校，子孙读之知圣道，鬻及借人为不孝。"这个故事说明，唐代藏书家由于收集典籍困难，非常珍惜自己的藏书，所以，对于把藏书出卖或者借予别人，都认为是不可取的行为。

第七章 佛道典籍的传播与收藏

佛教发源于古印度，大约在两汉之交传入中国。道教则产生于中国本土，由古代巫术、神仙方术逐渐演化而成，时间在东汉后期。汉魏六朝时期，佛道两教由肇发转繁盛，佛道经典也由少增多，广被于世。

第一节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宗教藏书

一、佛教译经的兴盛与佛教藏书

据三国鱼豢《魏略·西戎传》记载，最早传入中国的一部佛经是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年)“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受《浮屠经》”(《三国志》卷三十裴注)。佛经的大量译介，是从东汉桓帝建和二年(148年)开始的。安息国的太子安清，字世高，于此年到达洛阳。他在中土的二十余年里，所译佛经35部，41卷。安世高是历史记载的第一位译经外僧。在他之后，佛经的翻译日有所增。据唐释智升《开元释教录》所载，到南北朝末，一共有译经1 913部，4 575卷，与现存的汉译佛典1 482部，5 702卷①的数目相比，仅相差1 000余卷。

当时的佛经翻译，主要依靠西域来华僧人。经从东汉桓帝建和二年到南朝宋文帝元嘉末年的300年间，来中国的西域僧人有60多人②。中国僧人也有赴西域求法的。三国朱士行是民间西去求法的第一人。他于魏高贵乡公甘露五年(260年)出家为沙门，行万里路到达于阗国，“写得正品梵书胡本九十章，六十万余言”(《出三藏记集》卷七)。但是，汉魏六朝外出求法的中

---

① 赵朴初. 佛教和中国文化[J]. 法音，1985(2).

② 蒋维乔. 中国佛教史[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

国僧人毕竟是少数。

早期佛经翻译的特点：首先，佛经出传，主要是通过口授。如果一人传言，一人笔受，翻译过程就是两人的对译。东汉灵帝末年，安玄在洛阳与沙门严佛调共译《法镜经》，安玄口译，严佛调笔受。其次，翻译方法主要是直译。再次，译经没有选择性、系统性。因为当时能熟通梵汉两种语言的僧人不多，译经活动本身无组织无规律，偶然性极大。从东晋开始，由于统治阶级对佛教非常重视，佛教典籍的翻译才由个人私译转入集体进行的官译形式，出现了译场组织。东晋庐山般若台、建业道场寺、姚秦长安逍遥园、北魏洛阳永宁寺、北凉姑臧闲豫宫、刘宋柢洹寺、萧梁华林园等，都是有名译场。《出三藏记集》卷八《大品序》记载鸠摩罗什于后秦弘始五年(403 年)在长安逍遥园译《大品般若经》说，鸠摩罗什法师"手执胡本，口宣秦言，两释异音，交辩文旨。秦王躬览旧经，验其得失……与诸宿旧义业沙门释慧恭……五百余人，译其义旨，审其文中，然后书之"。当时的译场，已有主译人，笔受则员无恒定。西来僧人也开始携带梵本佛经，多是贝多罗树叶制成。从翻译技巧看，水平也大为提高，有意译的尝试，而且非常重视译经的选择性。东晋以前小品居多，许多是摘译。东晋以后，大部头的经典也开始翻译过来。

随着译经的增加，佛教的广播，中土开始有佛学著作。现存东汉后期牟融的《理惑论》可能是最早一部弘扬佛法的论著。梁释僧祐编的《弘明集》是最早一部中国佛教论著的总集，牟融的《理惑论》有赖于斯，方才保存下来。此外，经序、目录、史传等，都相继出现。《出三藏记集》载经序(包括译经后记)120 篇，类似后代的目录提要，对经本来源，译经的时间、地点、人物多有涉及。佛经目录就更多了，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中所记仅隋以前的佛经目录就列出 38 种之多。较有名的如：东晋释道安的《综理众经目录》，梁释僧祐的《出三藏记集》，梁释宝唱的《众经目录》。史传，指的是僧人传记，梁释慧皎的《高僧传》是最早的一部僧人传记，记录后汉至梁初 257 人的史实(附见者又 200 余人)。

佛教典籍的收藏，是伴随着译经事业开始的。史载东汉明帝感梦遣使，赴西域求法，于大月支写回佛典《四十二章经》，藏于兰台石室(见《理惑论》)。东汉末丹阳人笮融大起佛寺，集众奉佛，读经受道(见《三国志・刘繇传》)。说明在东汉晚期，官府与民间都有佛书收藏。从晋代始，佛教典籍的收藏渐渐集中到寺院。

东汉末年始兴建寺院，如洛阳的白马寺等，但为数尚少。晋代开始，各地佛寺大增。唐释道宣《释迦方志・教相篇》载：西晋两京有寺 180 所，译

经73部；东晋立寺1 768所，译经263部。仅隔100余年，到了江南陈朝，旧寺尚有1 232所，又新增1 700所。《舆地图》云："表塔相望，星罗揭辇，经像之富，不可殚言。"北方元魏170年，国家大寺47所，王公等寺839所，百姓造寺3万余所，总度僧尼200余万，译经49部。佛教东流，此之为盛。寺院是译经之地，也是传经之所，所以造立经像，搜检卷轴，成为一时风尚。六朝几十部佛经目录，基本上是在寺院里整理藏经写成的，数目远较同时期汉文正史目录、官私藏书目录多得多。东晋时期佛教藏书的重要处所主要有襄阳(今襄樊市)的白马寺、檀溪寺(释道安曾在此整理藏书、编写经目)，梁钟山定林上寺有佛经1 370余部，2 830余卷，文学家刘勰曾经帮助定林上寺编制过经藏目录。

除了寺院藏经外，佛经也入官藏。东汉末年，虽然民间也有佛经流传，一般只在上层社会里，所以很容易为政府秘阁收致。到了晋代，荀勖依郑默《中经》更著新簿，包括佛经目录两卷。刘宋王俭的《七志》，佛道附见。梁阮孝绪的《七录》，专设《佛法录》，收佛典5 400卷。当时"尚书阁内，别藏经史杂书，华林园又集释氏经论"(《七录》序，转引《广弘明集》卷三)。魏晋六朝皇室收藏佛教典籍是一个普遍现象。

二、道教典籍的出现、传播与收藏

汉代神仙方术很流行。《汉书·艺文志》专为神仙方术设类，所录图书，可看做是道教典籍的先驱。人们一般认为，东汉顺帝永和六年(141年)张陵在四川鹤鸣山创立的五斗米道，为中国道教定型的标志。五斗米道奉老子为教主，以《老子五千文》(又称《道德真经》)为主要经典。

汉末三国，道书逐渐丰富。到了晋代，见于葛洪《抱朴子·遐览篇》所载的道书有1 298卷，分为道经、纪、图、符诸类。《抱朴子·释滞篇》云："道书之出于黄老者，盖少许耳。率多后世之好事者，各以所知见而滋长，遂令篇卷至于山积。"这说明道教典籍的大量出现，与后人恣意增写有关。北周武帝天和五年(570年)，玄都观道士上《玄都经目》云："道经、传记、符、图、论，六千三百六十三卷。二千四十卷有本，须纸四万五十四张，其一千一百余卷，经、传、符、图；其八百八十四卷，诸子、论。其四千三百二十三卷，陆修静录有其数目，及本并未得。"(甄鸾《笑道论》，见《广弘明集》卷九)《玄都经目》录6 000余卷道书，其中4 000余卷不见其书，只有2 040卷有书，这2 040卷中，诸子杂家就占800余卷。该目录不但设虚目，而且还有大量不属道教的典籍。道教徒把道书范围尽量划宽、多多益善的做法，一是想与佛教互争高低，一是受到统治者崇信，遂增附图籍以示弘扬。

道教典籍的内容，早期多为炼丹服食及符图之说。道教的主要思想是达到羽化登仙的境界。所谓“道藏”，指的是道教经书的总集。刘宋陆修静于宋明帝泰始三年(467 年)在建康崇虚馆广收道经，进行整理，集成经书、方药、符图等 1 228 卷，分为三洞(三大类)，奠定了道藏的基础。他编撰的《三洞经书目录》是最早的一部道藏书目。

道教典籍的收藏，最初也是官府、民间兼而有之。东汉顺帝时，琅琊宫崇上其师干吉所得《太平清领书》170 卷，“皆缥白素、朱介、青首、朱目”(《后汉书・襄楷传》)。《太平清领书》又称《太平经》，是道教早期的一部重要经典。当时除了朝廷有此书外，民间也有，太平道的创始人张鲁就藏有《太平经》。由于民间道书多集中在道士手里，道士私藏形成魏晋时期道教藏书的特点。晋人葛洪曾师道士郑隐，他说：“余晚充郑君门人，请见方书……乃先以道家训教戒书不要者近百卷，稍稍示余，余亦多所先见……又许渐得短书缣素所写者。积年之中，合集所见，当出二百许卷。”(《抱朴子・遐览篇》)道士私藏，素所珍秘，轻不示人。葛洪还说：“天地之大德曰生。生，好物者也。是以道家之所至秘而重者，莫过乎长生之方也。故血盟乃传。传非其人，戒在天罚。先师不敢以轻行授人，须人求之至勤者，尤当拣选至精者，乃教之。”(《抱朴子・勤求篇》)道士秘书，由此可见。道书早期没有普遍流于世间，固然与其内容大部分玄奥、荒诞有关，但道士秘藏其书，也不能不算是重要原因。

延至宋、齐时期，道教祀神、作法事的道馆多起来，并且由僻地深山渐渐发展到都市。《仙鉴》卷二十四《陆修静传》：“先生既至阙，帝设崇虚馆通仙台以待之。”泰始三年，陆修静于崇虚馆整理道藏 1 200 余卷，是道馆藏书的名例。此后，道馆藏书转盛。齐的兴世馆，梁的华阳上下馆、朱阳馆等都富有藏书。道书收藏最盛的，要属北周的通道观。北周天和五年玄都观收藏的道书已有 2 040 卷，建德中(572—578 年)通道观建成，收集众经，犹及万卷。北宋张君房《云笈七签》卷八十五载道人王延史迹云：“又敕置通道观，令延校三洞经图，缄藏于观内。延作《珠囊》七卷，凡经传疏论八千三十卷，奏贮于通道观。由是玄教光兴。”

第二节　隋唐时期宗教藏书

一、佛教译经的鼎盛与佛教藏书

佛教进入隋唐，到达全盛时期。大乘八宗、小乘二宗，教派完全形成，

而且译经事业也发展到顶峰。这一时期译经的特点：首先是译经规模庞大。以往的译场组织发展到隋代，变成了翻经馆。长安大兴善寺和洛阳上林园都设有翻经馆，广招道俗从事译经事业。据《开元释教录》统计，隋代所出经论及传录等，共64部，301卷。唐代的佛经翻译集中在贞观至贞元(627—805年)年间，以玄奘取经回国后在长安的译经活动最为突出。贞观三年(629年)，玄奘赴西域求法，历经110余国，于贞观十九年(645年)回国，携带梵本经典520筴，657部。回到长安后，先在弘福寺译经，后又移住慈恩寺和西明寺，最后又住玉华宫，前后19年，译出大小乘经律论(律：出家佛教徒所守所戒。论：经律之阐发)共75部，1 335卷。太宗曾为玄奘译经在大慈恩寺专设翻经院(太宗时，西京弘福寺也有翻经院。武后时佛授记寺也有翻经院)。玄奘以后，义净、不空诸人皆为著名译经僧人，所译佛经都在百部以上。隋朝的翻经馆、唐代的翻经院，是常设的译经机构，其规模要比六朝诸寺译场大得多。据统计，李唐一代译经372部，2 159卷①。其次，译经制度更完善。宋人赞宁《宋高僧传》第三及志磐《佛祖统纪》第四十三所述，唐代译场分九职执掌译事：(1)译主，主掌译事，通晓梵汉语言，宣读贝叶经典原文，并讲其义；(2)笔受，受所宣译之义而为文。亦曰“缀文”，员无恒定；(3)度语，当译主为外国僧人，不通华语时，担任翻译，亦名“传语”；(4)证梵本，校所宣出，反证梵本；(5)润文，对译文从修辞上加以润饰；(6)证义，证已译之文所诠之义，审其有无差殊；(7)梵呗，是主持正式译事之前的宗教仪式，类似唱诗班；(8)校勘，校译好经文，以期完善，即翻译后校阅工作；(9)监护大使，由朝廷高职充任，监阅译经，一俟完成，由其上奏朝廷。故唐代译经有官业性质。

隋唐时期，中国僧人的佛教著述也是有增无减。唐释道宣的《广弘明集》是《弘明集》之后第二大部头的中国佛教诗文总集，共收130余人的作品。此外，道宣还著有《续高僧传》30卷(又称《唐高僧传》)，自序言有331人入正传，160人入附见。这也是继前世之作。佛经的目录，著名的有隋代费长房的《历代三宝记》15卷，唐释智升的《开元释教录》20卷。佛经注疏此时也层出不穷。唐代还出现了佛教类书《法苑珠林》100卷，引用佛教以外的典籍就达140余种，内容分类编排，共设640多个类目。

隋唐时期佛教藏书也有新的特点。

第一，隋代政府为了增加社会的佛典藏量，用官费从事写经事业。“开皇元年(581年)，高祖普诏天下，任听出家，仍令计口出钱，营造经像。而

① 中国佛教协会. 中国佛教(第1册)[M]. 北京：知识出版社，1980：64.

京师及并州、相州、洛州等诸大都邑之处，并官写一切经，置于寺内；而又别写，藏于秘阁。天下之人，从风而靡，竞相景慕，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隋书·经籍志》)仅文帝时期，写经就达 138 080 卷(见《释迦方志》)。这些佛经主要分藏在寺院里。隋代写经风尚一直延至唐。炀帝时，国家藏书处东都观文殿专设内道场“集道、佛经、别撰目录”(《隋书·经籍志》)。这是继梁华林园的又一壮举。总的看来，隋代佛典收藏以寺院为主。《释迦方志》、《法苑珠林》记载，隋代有寺 3 985 所，僧尼 23 万众。

第二，唐代寺院藏书制度非常精密，而且佛寺不仅有佛经，还广受其他内容的书籍。入唐以后，全国寺院有增无减。武宗会昌五年(845 年)毁佛运动中，被拆毁的寺院僧舍 4 600 余所，长安、洛阳只留四寺，各州一所，僧尼 260 500 人悉令还俗。可见在此之前，寺院无处不有，林立天下。武宗以前，诸大寺院的藏经非常丰富。如高宗显庆三年(658 年)创立的西明寺，有 10 院，4 000 余间屋。该寺专门编有寺藏大藏经的《入藏录》，共收 800 部，3 361 卷。后来高僧道宣应诏入寺，写经数年，至龙朔初年(661 年)左右，藏经已达 5 000 余卷。寺院藏书随着数量增多，制度也日趋精细。庐山东林寺为东晋所建，翻译之事累代不辍，有很多藏书，“纲维主持，一切诸经及以杂集，各造别藏，安置并足。知事守固，禁掌极牢。更相替代，传授领数，虑后法灭知教全焉”(《法苑珠林》卷一百)。“知事守固”，说明东林寺藏书有专职人员严格管理。元和七年(812 年)李肇《东林寺经藏碑铭》载浮槎寺僧义彤整理东林藏书，云该寺有藏书 1 万卷。龙门香山寺的藏书，由白居易创建，凡 5 270 卷，分作六藏保管在寺西藏经堂，日间“启闭有时，出纳有籍”(白居易《香山寺新修经藏堂记》，见《全唐文》卷六九六)，也有严格的借阅制度。东林寺、香山寺除了收藏佛经，还收藏其他汉籍。白居易的文集在东林、香山两寺都有寄藏。丹阳南牛头山佛窟寺，刘宋初刘司空造，建立经藏，贞观十九年(645 年)焚毁，其藏书也十分丰富，除了佛典以外，还收藏道书、俗经史、医方、图符等类书籍(《续高僧传》卷二十六)。

第三，隋唐时期佛门图书还采取秘藏方式。唐以前，佛经多是写本，毁佛事件发生，多有焚亡。如北魏泰武帝、北周武帝两次灭佛(佛徒称“法难”)，废寺焚书，不计其数。佛教徒为了避免经籍的损失，采取了两种方法来处理佛典：一是于深山洞窟里凿刻石经。石刻佛经始于 6 世纪后半叶的北齐，现存山东泰山经石峪的《金刚经》，河北武安北向堂山的《维摩诘经》等，都是早期石刻代表作。隋代石刻佛经规模甚大。著名的房山云居寺石刻佛经始刻于隋大业年间，历经千年，共刻 15 000 余石，近千部佛经。二是把典籍藏于佛阁密室之中。敦煌石室藏书，即为防此焚亡而设的专藏。

二、道教典籍的渐增与宫观藏书

隋代崇尚佛道两教，文帝开国，道士出力赞持，所以隋初道教备受崇信。开国年号“开皇”就有道教意义。开皇初，文帝下令“重修楼观宫宇，度道士一百二十人”（王松年《仙苑编珠》卷下引《楼观传》），并亲幸道场，又先后为道士建造天长观、清虚观、清都观、至德观等。炀帝时，政府更大造道观。道教典籍仅《隋书·经籍志》记载，就有377部，1 216卷。唐代各朝帝王也多信奉道教，高宗李治封道教太上老君为太上玄元皇帝。玄宗李隆基以老、庄、列、文为“四子真经”，开科取士，并以道士女冠隶于正宗，等同皇亲。历朝公主、嫔妃多人道为金仙、玉真。朝中名臣贺知章，名士叶法善、孙思邈、李德裕等人，皆奉道教。武宗灭佛，道士多有谋划。初唐时，政府所藏道书主要为前代遗留，约2 000余卷。这个数目到玄宗时也没有多大变化。先天年间（712—713年）太清观主史崇玄谓京中道经有2 000余卷。安史之乱，道书焚毁不少，但是几年之后，肃宗上元年间（760—762年）政府就又收道书6 000余卷。至代宗大历年间（766—779年），经过缮写，道书增至7 000卷。

隋唐时期，道教藏书依然以宫观为主。南北朝后，道馆多改称观，人唐后，又名为宫。唐代从开国至中和四年（884年），所造宫观约1 900余所，度道士15 000余人，其中亲王公卿士庶舍宅庄为观，不在其数（杜光庭《历代崇道记》，见《全唐文》卷九百三十三）。另外，隋唐两朝，前代道观留存许多，又经过修葺扩充。如北周著名的玄都观曾广有藏书，入隋后藏书未减。唐代长安的太清宫，不但藏有“道藏经”，而且把经目刻成石碑。《类编长安志》卷十六：“唐太清宫道藏经目录碑，秦守正书，赵盈篆额。”

这一时期的藏书特点是，注重道书的整理和传写，不过分追求数量，一反前代动辄添增道书数目的风气。先天年间，为使道书能传于世，玄宗特敕太清观主史崇玄为大使，领昭文馆、崇文馆诸多学士，及太清观、玄都观、东明观、宗圣观、东都大福唐观、绛州玉京观诸大德、法师，“集见在道经，稽其本末，撰其音义，然以运数绵旷，年代迁易，时有夷险，经有隐见，或劫初即下，劫末还升；或无道之君，投以煨烬；或好尚之士，秘之岩穴。因而残缺，紊其部伍。据目而论，百不一存。今且据京中藏内见在经二千余卷，以为音训，具如目录。余经义传论疏记等，文可易解者，此不详备。其所散佚，伫别搜求，继冀修缮，用补遗缺……今之著述，或所求晤。中间缺疑，用俟能者。名曰《一切道经音义》”（史崇玄《妙门由起序》，见《全唐文》卷九二三）。玄宗亲为《一切道经音义》作了序。经过这次整理，不

但道书精华得以保留，而且由于两馆学士、诸观大德对道书细论精研，使道教学说得以在教俗中更加深入。应该看到，《一切道经音义》的成书，是在诸观及皇室道藏的基础上完成的。

唐代还有一次著名的道藏整理活动，也是发生在玄宗一朝。开元年间(713—741 年)，玄宗发求道之使，远令搜访道书，详加刊校，修纂成“藏”，凡 3 744 卷(一说 5 700 卷，一说 7 300 卷)，史称《开元道藏》。玄宗亲撰目录，名曰《三洞琼纲》。《文献通考》卷二二四引《宋三朝国史志》云：“唐开元中，列其数为藏，目曰《三洞琼纲》，总三千七百四十四卷。”天宝七载(748 年)玄宗又下诏：“令内出一切道经，宜令崇玄馆即缮写分送诸道采访使，令管内诸道转写。其官本便留采访……”(谢守灏《混元圣纪》卷九)开元二十一年(733 年)，全国行政区分十五道，道下设州。道经遍行诸道，这是宫观道书走向民间的一个重要步骤。统治者对道教的重视，道书由统治者的重视而繁盛，玄宗一朝是最好的说明了。

至于道教宫观藏书，李唐一代已成制度。《类编长安志》卷十云：“开元二十九年(741 年)始诏西京及诸州各置玄元皇帝庙一所，依道经醮口。”“依道经醮口”是指按道经所说从事坛祭活动。这表明开元时，天下诸州都有道书的收藏。玄宗天宝二年(743 年)三月，改天下诸郡玄元庙为紫极宫(《旧唐书·玄宗本纪下》)。此年，西京有太清宫，东都有太微宫，诸州皆名紫极宫。不管道观改什么名称，其宫观藏书不废。

安史之乱以后，虽然道书曾一度恢复原有数量，但穆宗以后，逐渐衰减。

第四编

印本书兴起时期的图书和藏书
（宋—元）

第八章 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

第一节 印刷术在人类文明史上的地位

一、印刷术发明的意义

印刷术，这个人类赖以传播知识和文化信息的重要手段，是我国最早发明的。这一发明，对于社会的发展和科学文化的进步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在发展过程中所作出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贡献。所以马克思把印刷术的发明称为“最伟大的发明”，“科学复兴的手段”和“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①] 印刷术的发明，使得书籍能够大量出版，知识得以广泛传播，并且有利于保存和流传。

在印刷术发明以前，所有书籍全凭手抄，相当费时费力，一次只能抄一部，生产量是很有限的。这样就很难有较高的复本，没有足够的复本，也就限制了它的传播范围。因此，在古代对于书籍是处于“人不多有”、“人以藏书为贵”的境况。这对于知识的传播和文化的交流是很不利的；尤其是在遇到战争和自然灾害的情况下，也很容易使书籍失传，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历史上这种情况简直是太普遍了。如马端临在《文献通考·自序》中指出：“《汉志》所载之书，以《隋志》考之，十已亡其六七。”造成这种图书严重失传的原因，正是由于当时图书全凭手抄、少有复本的缘故，难以抵御包括战争和自然灾害(水、火、虫灾)以及人为破坏等种种“书厄”。但自印刷术发明以后，情况便完全不同了。苏东坡说：“余犹及见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时欲求《史记》、《汉书》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书，日夜诵读，惟恐不

① 马克思. 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67.

及。近岁市人转相摹刻诸子百家之书,日传万纸,学者之于书,多且易致如此。"(《东坡全集·李氏山房藏书记》)这说明印刷术发明和使用后,书籍生产较易,产量增多,满足了读书的需求,使文化知识得以普及,同时也提高了抵御各种灾害所造成损害的能力。尤其是由于书籍生产容易,也调动了许多文人学者著书立说的积极性,促使许多著作产生,促进文化学术的发展与交流,公私藏书由是而明显增多,这些都是印刷术的发明所带来的成果。印刷术的发明在人类文明史上有着它重要的作用和地位。

二、印刷术发明的条件

任何一项发明的产生必须具备三个方面的条件,即社会需要、物质基础和技术基础。我国印刷术的发明完全具备了这三个条件。

第一,以社会需要来说,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很长时间里国力一直强盛,经济文化繁荣,科学技术发达,曾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由于文化积累深厚,著述不断增多,单靠手书,已远远不能满足人们对知识的渴求;随着知识水平的提高,学者队伍扩大,他们的著作也希望尽快地、更好地、更广泛地与人交流;藏书家也要求能不断地补充自己的藏书;尤其是佛教传入中国以后,佛经经过大量翻译,信教的人很多,佛经需求很大,手抄无法满足需要……凡此种种,都表现出社会对于图书生产方式改革的需要。

第二,即物质基础。作为印刷术发明的物质基础,除了经济实力之外,汉代发明的造纸术,首先为印刷术的发明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可以说,没有纸的发明,就不可能有印刷术的产生。其他的物质基础,还包括木材和墨。印刷术最先发明的是雕版印刷,其雕版使用板材便是梨枣等坚木,这是天然产物。说到墨,这也是我国的一项发明。墨的发明更早,传说始于黄帝之时的田真造墨,或周宣王时邢夷作墨之说。新石器时代陶器上的图案花纹已有很多是墨描绘的。殷代的甲骨文中,也有些是先用墨写后刻的。近代出土的战国、秦、汉竹木简,也都是用墨书写的。就是先秦时期写在玉石片上的文书,如《侯马盟书》也有一部分是用墨写的。可以肯定,早在先秦时期已经有了人造墨,广泛地用于书写。汉代宫廷中,已有专门掌管纸、笔、墨、印泥的官员,做官的每月可得隃麋大墨、小墨各一枚。郑众说"九子之墨藏于松烟",曹植诗谓"墨出青松烟,笔出狡兔翰"。因此可知,汉代已经发明了松烟墨。后来制墨技术愈来愈精,达到了"一点如漆"的地步。这些都为印刷术的产生奠定了物质基础。

第三,即技术基础。印刷术发明的技术基础,即是印章的雕刻技术与拓

石的捶拓技术两者的有机结合。

印章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考古学家在河南安阳殷墟中曾发现三方商玺，周代大量出土青铜印，秦汉时印章空前兴盛。

古时没有印的名称，卫宏《汉书仪》说："秦以前民皆用方寸玺。"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始称天子用的印叫"玺"，普通官、私用的印才开始叫"印"。汉代用印封检章奏，所以叫印章，俗称戳子或手戳。

印章上的文字有两种刻法：一是凹下去的阴文，另一种是凸起来的阳文。无论阴文或阳文，字都是反刻着的，印出来的才是正字。印章通常只刻三、四个字，一般情况下只刻姓名或官职，所以很小，最初是盖在简牍上封泥用的。所以，秦汉以前多用阴文印章，秦汉以后多用阳文印章。到魏晋南北朝时，开始出现了多字印。如在东晋时期就出现过《抱朴子》一书所记载的四寸见方、容纳 120 字的大木印——黄龙越章之印。与雕版印刷的版片很接近。若是印在纸上，便是一张小型印刷品了。所以，清人李元复在所著《常谈丛录》中说："书籍自雕印之法行，而流布始广，亦借以永传。而创之者初不必甚难，以自古有符玺可师其意，正无待奇想巧思也。"这正说明印章对雕版的启示作用。

雕版刻字采用了印章阳文反字的雕刻方法。具体地说，雕版刻字就是印章刻字的扩大化。由于印章的体积小，刻字少，其用印的方法是：用手持印，将纸放在下面，由上往下压，即可获得清楚的印字，所以称为"盖印(章)"、"钤印"或"捺印"。但这种方法并不适合于版面大、字数多的版刻印刷，因为这会造成用力不均，而出现的印品字迹浓淡不一，得不到清晰的效果。后来的雕版印刷采用了和它相反的方法，将印版和纸面倒置，即将印版置于下，纸面覆盖于印版之上而进行印刷，这样不需用很大的力气，就可以产生清晰的效果。而这一效果的取得，却来源于拓石的启示。

我国很早就有了石刻文字，将石刻文字转录到纸上的方法称为"拓石"。据王国维考证，这种方法在公元 4 世纪时就已经出现。具体的方法是：将一张浸湿了的纸，铺在石碑上，轻轻拍打，使纸在碑凹下的部分也凹下去，然后用蘸着墨汁的布团、再全面轻轻拽捺，凹下去的部分碰不着墨，文字就不失真地留在纸上了。这一操作过程叫"拓"。用墨汁叫墨拓(墨色深墨有光的叫"乌金拓"，淡而匀净的叫"蝉翼拓"，又名"蝉衣拓")，用红颜色叫朱拓。单幅叫拓片，装连起来叫拓本。

这是印刷术发明以前，一种有效的复制文字的先进方法。它不仅可以代替抄写之劳，而且还可以传真，避免抄写之误。但它和后来的印刷物效果不同，印出的纸呈阴文(即黑底白字)，虽然其阅读效果不及雕版印刷物，但

是它给印刷术带来了非常重要的启示—将这种拓的方法和印章的雕刻方法结合起来，可以得到更佳的效果，从而构成雕版印刷术发明的重要技术基础。

第二节　雕版印刷术的起源和早期印书

一、雕版印刷术的起源

如前所述，从技术基础条件来讲，印章的雕刻技术和拓石技术，可以说是印刷术的基础。其中拓石的前提是石刻。所以我们讲雕版印刷术起源时，不能不追溯一下石刻的历史。

在我国古代文献中，如《墨子》一书中，曾有“镂于金石”的记载。从安阳殷墟发掘出土的石段断耳、玉器等考古材料中已有雕刻文字证明，我国石刻文字的萌芽时期是在商代，到春秋战国时期，刻字较多的石刻开始出现。河北平山中山国遗址出土的《公乘得守丘刻石》①，陕西凤翔县出土的秦献公时的《石鼓文》，秦武王时的《诅楚文》，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石刻有了较多的运用，歌颂秦德政的七种石刻(峄山刻石、泰山刻石、琅琊台刻石、芝罘刻石、东观刻石、碣石刻石、会稽刻石)，就是在这时建立的。这充分证明了石刻已从萌芽阶段进入发展时期，开始被统治阶级正式作为宣传的手段。自此以后，历代刻石之风不衰。

刻石因其形状不同，又有摩崖、碣、碑的区别。

所谓摩崖，是指利用天然石壁，把记事文字直接刻在上面，故又称“天然之石”。传说这种刻石早在夏商时期就有了，指的是贵州安顺县的“红岩石刻”，这有待于进一步考证。现有实物和记载可考的，较著名的摩崖石刻，汉朝有10余种，魏晋南北朝有20余种，隋唐有十来种，宋以后也有一些，总计约50种。

碣，是一种外形在方、圆之间的上小下大的石柱状的石刻文字。如上述《石鼓文》即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石刻实物(现存北京故宫博物院)。它在唐代初年发现于天兴县(今陕西凤翔县)三畤原，被称为“陈仓石鼓”(因天兴旧称陈仓)。石鼓共有10个，上面刻的文字是籀文，文体是四言诗。它的产生年代，历来意见分歧，概括起来，共有五说，即：周、秦、汉、后魏、北周

---

① 参见河北文物管理处．河北省平山县战国时期中山国墓葬发掘报告[R]．文物，1979(1)．

五个朝代。过去的周代说占优势，现代以秦代说盛行。秦代说中，郭沫若主张秦襄公八年(前770年)，罗振玉、马叙伦主张秦文公时期(前765—前716年)，唐兰主张秦献公十一年(前374年)。这里我们根据北京图书馆金石组《古代石刻叙录》的评论，采用唐兰的说法。

碑，是把文字刻在特立的一种长方形石板上的称谓。这是最常见的一种刻石。刻文记事之碑，最早见于东汉。宋欧阳修《集古录》云："后汉以后始有碑文，欲求前汉碑终不可得，是则冢墓碑自后汉以来始有也。"

上述三种刻石，虽然形式不同，而记事的内容，除部分为政府文书外，大多是纪念性质的，或纪念某一种事业的功绩，或纪念某次特大活动，或纪念某一个人物的生平作为。总之，多数是为统治阶级歌功颂德的，相沿下来，故有"树碑立传"之说。

此外，尚有另一种类型的刻石——石经。它的功用与上述刻石便不相同。

"经"是指儒家经典。把整部儒家著作刻在石头上供人阅读，这一创举发生在汉灵帝熹平四年(175年)。《后汉书·蔡邕传》说："邕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谬，俗儒穿凿，贻误后学。熹平四年，乃与五官中郎将堂谿典，光禄大夫杨赐，谏议大夫马日磾，议郎张驯、韩说，太史令单飏等，奏求正定《六经》文字。灵帝许之。邕乃自书册于碑，使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于是后儒晚学，咸取正焉。"这就是后世所称的"汉石经"，也称"熹平石经"。由于它是用当时流行的隶书写的，隶书即今文，故又称"今文石经"，或"一字石经"(一字指一种字体，即今文)。

熹平石经，为我国有石经之始，于当时于后世都产生很大影响。它为儒家经典树立了首个标准文本，成为校勘经书的依据；同时这一作法不断为后世所仿效，另刻新的石经，先后出现了魏"正始石经"(用古文、小篆、隶书三种文体刻石，故又称"三体石经")、唐"开成石经"(正文始用楷书，标题仍用隶书)、后蜀"蜀石经"(又称"广正石经"或"成都石经")、北宋"嘉祐石经"用篆、隶二体刻石，故又称"二体石经"或"开府石经")、南宋绍兴御书石经"，清"乾隆石经"等。

石经的镌刻，在印刷术发明以前，确实起到了校正经书文字的作用；在印刷术发明和使用以后，便失去了这个意义，而成为封建统治者装饰门面的点缀品而已。

在儒经刻石的影响下，两晋隋唐时期也出现了佛经与道经的刻石。

由刻石而导致"拓石"技术的出现，再由拓石结合印章雕刻技术，从而引出雕版印刷术的发明—这就是印刷术的起源。

二、雕版印刷术的发明时间

印刷术发明包括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两个部分，一般存在争论较多的是雕版印刷的发明时间问题。大致归纳起来，有东汉发明说、晋代发明说、六朝发明说、北齐发明说、隋代发明说、唐代发明说、五代发明说等六七种说法。之所以出现不同的说法，只是对于早期文献中几乎可以作镌刻讲又可以作印刷讲的关键名词解释不同而已，如对早期文献中出现的“刊”、“刻”、“雕”和“镂”，有些学者把它们解释为刊印、印刷；如对一些木材原料，如“梨”、“枣”、“梓”，有些学者把它们理解为印行、刻印；就是“雕版”、“版行”、“梓行”这些字，也曾不同地用来指镌刻和出版。其实，现存文物中，没有早于8世纪的。这样，我们这里比较集中地介绍唐代发明说的情况。

唐代从公元618年开国至907年灭亡，历经290年之久。这一时期有关雕版印刷的文献记载甚多，其中也发现了一些实物，因此从不同角度出发，便出现了初唐、中唐、晚唐三种意见。

持“初唐论”的，有清人郑机及当代张秀民、庄葳，他们根据明人邵经邦《弘简录》的记载，提出“唐初贞观说”。

《弘简录》卷64说：贞观十年(636年)“太宗后长孙氏……遂崩，年三十六，上为之恸。及宫司上其所撰《女则》十篇，录古妇人善事……帝览而嘉叹，皇后此书足垂后代，令梓行之”。于是有人认为“梓行”即雕版印行之意。清人郑机据此以证热明“梓行书籍不始于冯道”。庄葳《中国书的历史》①一书，甚至肯定地说：“最迟在唐朝初年，我国雕版印刷术就已经发明了。”李致忠甚至还说：唐太宗“令梓行”的《女则》，当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内府刻本。②

但《弘简录》这一记载，“梓行”一论，并不见于正史的新、旧《唐书》，而且“梓行”一词是否为“雕版印行”亦待商榷。

持“中唐论”的有清代赵翼、王国维等人。其依据为元稹《白氏诗集序》有云：“至于缮写、模勒衒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赵翼对其中“模勒”的解释是：“模勒即刊刻也，则唐时已开其端欤。”(《陔余丛考》)王国维也说：“夫刻石亦可云模勒，而作品鬻卖，自非雕版不可，则唐之中叶吾浙亦已有刊板矣。”(《两浙古刊本考》)问题在“模勒”是否作“刊

---

① 庄葳. 中国书的历史[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② 李致忠. 历代刻书考述[M]. 成都：巴蜀书社，1990：4.

刻”解。

首先提出晚唐说的是宋人叶梦得。他在《石林燕语》卷八中说：“世言雕版印书始冯道，此不然。但监本五经版，道为之耳。柳玭〈训·序〉言其在蜀时尝阅书肆，云字书小学，率雕版印纸。则唐固有之矣。但恐不如今之工”。柳玭在蜀的时间是中和三年(883 年)，属于唐代晚期。宋朱翌《猗觉寮杂记》卷六也说：“雕印文字，唐以前无之，唐末益州始有墨板。”此外，清朱彝尊、王士禛、叶德辉等人亦持此说。

以上问题的提出多据文献记载，加以个人体会判断，其中文献的真伪，理解正确与否，都关系到史实真实与否。这也是历来对此问题争论不休的原因。笔者以为这些说法之中，五代说，由于考古实物的发现，已为事实所推翻。至于东汉说，除了所指论据不足外，其发明的物质基础和技术基础尚不具备。就物质基础来说，离纸的发明时间不久，作为书写材料尚不普及，何谈印刷？就技术基础来说，拓印技术尚未出现，雕版印刷无由产生。其他晋代说依据无考，六朝说、北齐说属于想当然。隋朝说，有的理解有误，有的难于肯定。其中唐代说，尤其晚唐说，记载比较准确，可信度比较大。特别是现存有实物作证。

所谓实物，是指敦煌发现的唐咸通九年(868 年)印制的《金刚经》(全称《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现藏于英国图书馆)和乾符四年(877 年)及中和二年(882 年)的两本历日(现藏法国巴黎图书馆)，以及 1944 年在成都唐墓中出土的一张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卞家印的梵文《陀罗尼经咒》(现藏四川省博物馆)，它是国内现存最早的印本，刻印于唐肃宗至德二年(757 年)。证明唐时刻版不仅能刻汉文而且还能刻外文。另据《全国善本书总目》检查组在陕西获悉：该省曾于 20 世纪 70 年代修水库过程中从唐墓中出土一片经咒，是雕版印刷品。此件中间是彩绘佛像，四周为回文咒语，与 1944 年成都出土的《陀罗尼经咒》很相似。出土时，还有墓志一通，因管理不善，墓志已失。所以此墓的下限很难详考了，但经咒的印纸都完好地保存了下来①。

其中特别是《金刚经》，它是现在世界上最早有确切日期的印刷品，而且是一部首尾完整的卷子，长约一丈六尺，高约一尺，共用七张纸缀合而成，第一张扉画印着释迦牟尼佛在祇树给孤独园长老须菩提说法的情形，以下是经文，最后刻有“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玠为二亲敬造普施”一行题记，指出了刻印日期。无论从图画和文字来看，都显示出它的刻工优美，印制精良。这说明我国的雕版印刷术在 9 世纪 60 年代已经发展到了高度的水平，

① 李致忠．历代刻书考述[M]．成都：巴蜀书社，1990：13.

绝非是处于发生时期的作品，因而印刷术的发明一定比这个时期更早。可惜我国国内尚未发现比这更早的实物，而深受我国文化影响，并由我国直接输出印刷术的东邻日本和韩国却另有发现，亦可作为旁证。

日本在公元764年平定惠美押胜之乱时，称德天皇用大约六年时间制作了100万个高13厘米的三层小木塔，塔下钻有手指般小洞，把100万张陀罗尼经分别放入每个小塔内，所以这次印的陀罗尼经都冠有“百万塔”字样，称《百万塔陀罗尼经》。它是公元770年(日本宝龟元年，相当于我国唐代宗大历五年)的印刷品。日本人曾经自豪地认为那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印刷品，此印刷品在20世纪80年代在韩国也有发现。① 一般学者，包括日本学者在内，认为印刷的方法是从中国传去的。这就说明，我国印刷术的发明，当比此时间更早。

1966年10月14日在韩国庆州佛国寺释迦塔，也发现了一卷《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经国外学者研究，此经刻于公元704—751年，也就是唐武后长安四年到玄宗天宝十年间刻印的。比咸通本《金刚经》要早117—164年，比《百万塔陀罗尼经》也要早数十年，这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刻本。它虽然不是在中国本土发现的，但当时朝鲜和日本的文化几乎全部都是由中国流传过去的。如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印刷史研究专家富路特(L. C. Goodrich)就这一发现所说的“这新发现的经卷，在印刷史上意义重大，如果将印刷史比作一幢大厦，这次发现就是为它添上了一块重要的砖瓦，但它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座大厦的面貌，我认为，所有这一切，仍然说明中国是最早开始发明印刷术的国家，印刷术是从它那里传播到四面八方的，佛教是主要传播媒介之一。当时僧侣是游访各地的人物。看来完全有可能是一个或几个中国或朝鲜的僧侣在新罗王朝时采用了这种技术，而几年之后则由另一些日本或中国或朝鲜的僧侣把它传到当时的日本首都奈良”②。而国内学者经研究却认为：“这卷印本佛经可能是8世纪初唐朝长安印本，而不是新罗自己刊印的。”③这就有力地证明了印刷术至少在8世纪中叶以前，即唐朝中期已经发明了，不会晚于这个时期。至于究竟是什么时候发明的，唐代以前发明的诸说，不是不可能，这是因为，在古代的条件下，从一项发明到实际应用，要经过漫长的过程，早一百年到数百年也不足为怪，一项技术开始总是粗糙而后逐渐精密的，我们从韩国本《大陀罗尼经》和咸通本《金刚经》比

---

① 据《东亚日报》1982年1月9日报道(1982年2月17日《参考消息》转载)。

② [美]富路特. 关于一种新发现的最早印刷品的初步报告[R]. 书林，1980(3).

③ 张秀民. “南朝鲜”发现的佛经为唐朝印本说[J]. 图书馆研究与工作，1981(4).

较中就可以看出这种变化。但是这也是一种理论的推测，至少唐以前发明诸说尚未有足以说明的理由让人信服。这里我们只好提出它的下限。它的上限我们认为是印章雕刻技术和拓石技术的结合作为雕版印刷术的先驱。具体时间实难界定，因为它不是在某一个早晨由某一个人一蹴而就的；当然也不是不可捉摸的。社会需要、物质基础、技术基础就是它产生的条件。据此，我们认为印刷术的发明时间应以隋唐时期为妥。

三、早期的雕版印书

1. 唐代印书

雕版印刷术产生以后，在唐代首先为民间采用，其中尤以佛教信徒捷足先登，故早期的雕版印刷品多为佛经及民间日常用书，如历书、阴阳占卜之类杂书及字书、韵书等。

目前世界上现存最早的印刷品，即1966年在韩国发现的《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是公元704—751年的刊印品，即当唐武后长安四年至玄宗天宝十年之间。我国有学者认为：它是“唐朝长安印本”①。另日本学者长泽规矩也所著《和汉书之印刷及其历史》(日文)一书中曾言：日本藏有我国吐鲁番出《妙法莲华经》1卷，内容为功德品第七，黄麻纸，每行19字，经文中有武则天时所创制字，长氏断为武则天(684—705年)时的印刷品。因未见实物，未被采信，但当韩国佛经印本发现后，张秀民先生认为可信②。两者时间相当。

据唐司空图《司空表圣文集》卷九有《为东都敬爱寺讲律僧惠礭化募雕刻律疏》一文，说到唐武宗时(841—846年)禁奉佛教“乃焚印本”，说明当时已有印本佛经。

1944年在成都一座唐墓中发现标明“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卞家印卖咒本”的梵文本《陀罗尼经咒》——这是国内现存(存四川省博物馆)的最早印本。据《中国版本图录》讲：“唐肃宗至德二年(757年)，成都改称府，因推知经咒板行，当在是年以后。”无独有偶，20世纪70年代，陕西省曾于修水库过程中从唐墓中出土一片经咒，系雕版印刷品。此件中间是彩绘佛像，四周为回文咒语，与1944年成都出土的《陀罗尼经咒》很相似。③

佛经镌印还包括咸通九年(868年)王玠刻印的《金刚经》(见前文)和唐

---

① [美]富路特．关于一种新发现的最早印刷品的初步报告[J]．书林，1980(3)．
② 张秀民，“南朝鲜”发现的佛经为唐朝印本说[J]．图书馆研究与工作，1981(4)．
③ 李致忠．历代刻书考述[M]．成都：巴蜀书社，1990：13．

宣宗天祐四年(907 年)之前“西川过家真印本”的《金刚经》。

以上为唐代佛经的镌印。

佛经之外，当推历书。历书是农业生产和人民日常生活之中的必需品，它的需要也很大。所以印刷术应用之初，历书的镌印也很普遍，如“剑南、两川及淮南道，皆以版印历日鬻于市。每岁司天台未奏颁下新历，其印历已满天下”(《全唐文·冯宿禁版印时宪书奏》)，由于此举“有乖敬授之道”，于是在“太和九年(835 年)十二月丁丑，(唐文宗)勅诸道府不得私置历日版”(《旧唐书·文帝本纪》)。尽管皇帝下令也不能禁绝，直到乾符年间(875—879 年)“僖宗入蜀，太史历本不及江东，而市有印货者，每差互朔晦，货者各征节候，因争执……”而打起官司来(王谠《唐语林》卷七)。敦煌所出有乾符四年(877 年)及中和二年(882 年)有“剑南西川成都府樊赏家历”两种。

此外，还有韵书、字书、小学书及其他杂书的印行。

由于诗歌的兴盛，为了适应创作诗歌的需要，所以相应地又有了韵书的印行。咸通年间，在长安留学的日本僧人宗睿，于公元 865 年回国时，便携带印有“四川印子”的《唐韵》一部五卷，《玉篇》一部三十卷(见载《新书写请来法门等目录》)。说明四川当时已刊行有此类韵书和字书出售。唐僖宗中和三年(883 年)柳玭在成都还看到有“阴阳杂记、占梦、相宅、九宫五纬”以及“字书、小学”之类的印本书出售。说明印书的内容已相当广泛。此前，在唐宣宗大中年间(847—859 年)纥干臮集方士所著《刘宏传》“雕印数千本，以寄中朝及四海精心烧炼之者”(见范摅《云溪友议》卷下)。唐末，还刻印了徐夤著《斩蛇剑赋》、《人生几何赋》等诗赋著作。自云：“拙赋偏闻镌印卖，恶诗亲见画图呈”(《全唐诗》卷七百一十一)。

从上述引文和实物资料来看，唐代的印书有如下几点值得注意：

从刻书地点上看，除了首都长安之外，主要是长江上游的剑南、两川及长江中游的“江南西道”和“淮南道”，尤其是四川成都一带是印书最多的地方。这也不是偶然的，成都位于四川盆地，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素有“天府”之称，且盛产竹木，为制版和造纸提供了丰富的天然资源，历来造纸业就很发达。且唐代中期以后，黄河流域连年战争，而四川不但没有受到影响，反而在安史之乱、黄巢起义两次动乱中两度成为临时首都，成为唐代另一个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使得文人汇集，促成其成为我国出版的发祥地。

从刻书内容上看，出版最多的是佛经和历书，韵书、字书及阴阳杂记、占梦、相宅之类的书，都是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大量需要的读物，说明社

会的需要对刻书内容具有很大的影响。

从刻书数量上看，少的“八百纸”，多的“数千本”，乃至“其印历已满天下”，已具有一定规模。

从质量上看，既有“浸染不可晓”的粗拙印品，也有“精美异常”的像《金刚经》那样的精品。说明印刷术在不断提高。

从刻书者来看，除部分佛经为寺院所刻外，大部分为民间坊刻，这说明印刷术创始于民间，是人民群众为了满足自己对图书的需求而发明创造了这一先进的技术。当时并不为统治者所重视。所以就唐代的图书事业来说，写本书仍是它的主流。作为一个历史朝代来说，可以这样认为，唐代是印本书的起始时期，也可以说是由写本书向印本书的过渡时期。

2. 五代印书

唐灭亡之后，继之的五代是中国历史上最混乱的时期之一。当时国内四分五裂，军阀割据，历史上又称为“五代十国”。

五代历史并不很长，仅 53 年。但五代的雕版印书，比起唐代却有所发展。这主要表现在刻书地区的扩大，刻书者及刻书数量的增多以及刻书内容的进一步丰富。

就刻书地区而言，由南方扩展到北方，除南方的成都、杭州两个发祥地外，北方的汴(今河南开封)成为重要的刻书发达地区。刻书者由民间而进入上层统治阶层，又出现私人刻书和政府刻书，内容由杂书而进入大部头著作，包括儒家经典著作，类书以及诗文集等，从而开始形成了坊间刻书、私人刻书和政府刻书三者并存的格局。

就在唐朝灭亡的第二年(908 年)前蜀任知玄自出俸钱，雇赁良工，开雕杜光庭的《道德经广圣义》30 卷，五年内雕成 460 余版，藏在龙兴观，印造流行①。这是五代时最早的刻书，开私人刻书之先。刻书由民间走向统治者上层人物。其中最著名的当推毋昭裔。据宋委心子《新编分门古今类事・毋公印书》载：毋昭裔贫贱时，尝从人借《文选》及《初学记》，人多难色。公浩叹曰：“余恨家贫，不能力致。他日稍达，愿刻板印之，庶及天下习学之者。”后仕蜀为相，遂践其言。《宋史・毋守素传》说，他“在成都令门人勾中正、孙逢吉书《文选》、《初学记》、《白氏六帖》镂板”。又《爱日斋丛钞》说：“自唐以来，所在学校废绝，蜀毋昭裔出私财百万，营学馆，且请版刻《九经》，蜀主从之，由是蜀中文学复盛。”此外，还有著名文学家和凝“平生为文章，长于短歌艳曲，尤好声誉。有集百卷，自篆于版，模

① 王欣夫．文献学讲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144.

印数百帙，分惠于人”(《旧五代史·和凝传》)。前蜀乾德五年(923年)昙域和尚检寻其师父贯休的诗稿一千首，“乃雕刻板部，题号《禅月集》”(《禅月集·后序》)。

重要的是雕版印刷术不仅为上层人士个人所接受，而且影响到了政府，使其着手进行儒家经典著作的刊印工作。后唐宰相冯道指出，“尝见吴蜀之人鬻印版文字，色类绝多，终不及经典”，他认为“如经典校定，雕摹印行，深著于文教矣”(《册府元龟》卷一百五十)。于是于后唐长兴三年(932年)以中书门下名义，奏请依石经，刻九经印版，“敕令国子监集博士儒徒，将西京石经本，各以所业本经句度，抄写注出，仔细看读。然后雇能雕字匠人，各部随帙刻印版，广颁天下”(《五代会要》卷八)。这是儒家经典的第一次开雕，也是官方采用雕版印刷术刊印书籍的开始。印刷术由民间而进入官府，印刷范围由杂书上升到经典，提高了它的地位，因而更有利于它的发展与推广。

五代的国子监，是政府设立的学校兼出版机构。由于冯道的建议，于后唐长兴三年(932年)开始校刊《九经》(包括《易》、《诗》、《书》、“三礼”、“三传”)，后来扩大到《论语》、《孝经》、《尔雅》，附以《五经文字》、《九经字样》。所刊经数与“唐石经”(即《开成石经》)同，并增加了注文，采用了经文用大字，注文用双行小字的古代经注写本的旧式。这一空前未有、规模巨大的出版工作，中经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四个朝代，历时22年，直到后周广顺三年(953年)才全部完成。其后于后周显德二年(955年)别刻有《经典释文》30卷。由于这些书是由国子监负责刻印的，所以称它为“监本”。五代监本，宋人称之为“旧监本”或“古京本”，是监本书之始。

此外，南唐(937—957年)还刻有刘知几《史通》和徐陵编选的《玉台新咏》等文史著作，后晋天福五年(940年)张荐明刻印有《道德经》(见《旧五代史·后晋·高祖本纪》)。

佛经的刊刻有后晋天福十五年(950年)曹之忠刻印的《金刚经》，吴越王钱俶于显德三年(950年)和开宝八年(975年)刻印的《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箧印陀罗尼经》(简称《宝箧尼经》)，印数各84 000卷。

由上可知，五代刻书已经达到一定规模，刻书数量大增，然而现存的很少。仅有敦煌发现的“《唐韵》、《切韵》二种，为五代细书小板刊本”(罗振玉《鸣沙石宝秘录》)和天福十五年刻的《金刚经》及各种佛像(以上均为伯希和所盗，现藏法国巴黎图书馆)，钱俶所刻《宝箧尼经》，显德本于1917年在浙江湖州天宁寺石刻经幢象鼻中发现过两三卷，曾藏于吴兴县图书馆，现不知所在；开宝本则是1924年杭州西湖雷峰塔倒塌时从中发现的，浙江省

博物馆和浙江省图书馆各藏一卷。这是国内仅存的五代刻本了。①

第三节　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及早期印书

一、活字印刷术的起源——泥活字及其印书

继雕版印刷术发明之后，我国对世界文化的又一巨大贡献是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是印刷史上一件划时代的大事。它把印刷事业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不像雕版印刷术的发明那样无文献可征，难以界定具体的时间，而是有可靠的文献记载。这就是宋人沈括所著的《梦溪笔谈》。该书卷十八载："版印书籍，唐人尚未盛为之。自冯瀛王始印五经，以后典籍皆为版本。庆历中，有布衣毕昇又为活版，其法：用胶泥刻字，薄如钱唇，每字为一印，火烧令坚。先设一铁板，其上以松脂蜡和纸灰之类冒之。欲印，则以一铁范置铁板上，乃密布字印，满铁范为一板，持就火炀之。药稍熔，则以一平板按其面，则字平如砥。若止印三二本，未为简易；若印数十百千本，则极为神速。常作两铁板，一板印刷，一板已自布字，此印者才毕，则第二板已具。更互用之，瞬息可就。每一字皆有数印，如'之'，'也'等字，每字有二十余印，以备一板内有重复者。不用，则以纸贴之，每韵为一贴，木格储之。有奇字素无备者，旋刻之，以草火烧，瞬息可成。不以木为之者，木理有疏密，沾水则高下不平，兼与药相沾，不可取。不若燔土，用讫再火令药熔，以手拂之，其印自落，殊不沾污。昇死，其印为予群从所得，至今保藏。"

这是活字印刷术发明后第一篇用文字详细记录印刷术的重要史料，它明确指出：发明人是布衣毕昇，发明时间为庆历中，即公元1041—1048年，造字材料为胶泥，每字一印，刻好烧硬；且用木试过，未成。储字方法，依韵排列，检字时依韵检字。可反复使用。但毕昇生平不详，只是1990年初，在湖北省英山县发现毕昇墓碑，据此中国印刷博物馆标出："毕昇，北宋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家，今湖北英山人。"

毕昇的发明，在今天看来，显得比较原始，但它的基本原理和环节（刻字、排版、印刷）和现代印刷术是相同的。他的这一发明，当时并未得到推广，当初用这种方法所印的书籍也没有能流传下来。但这一记载是完全可信

① 张秀民．中国印刷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46.

的，除了沈括与毕昇是同时代人这一点外，以后历代仿用此法印书的不乏其人。如在南宋绍熙四年(1193 年)周必大在潭州(今湖南长沙)利用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所介绍的毕昇泥活字印刷法(所谓“沈存中法”)刊印自著《玉堂杂记》。① 元初，姚枢教学生杨古用“沈氏活版”印刷了《小学》和《近思录》、《东莱经史说》等书。清代李瑶于道光年间，用“仿宋胶泥版”印《南疆绎史勘本》和《校补金石例四种》。又泾县翟金生以 30 年心力造泥字 10 多万个，先后印出了翟金生《泥版试印初编》、黄爵滋《仙屏书屋初集》、翟廷珍《修业堂集》等书。这些证明此法是可行的。

此外，据称俄罗斯圣彼得堡东方研究所和我国甘肃省武威市博物馆分别藏有《维摩诘所说经》上中下三卷，是西夏文活字体，并且可能是活字印本。此经名后有西夏仁宗尊号题款，推测该经最早应是仁宗年间(1140—1193年)印本，也就是现存世界上最早的泥活字印本，距毕昇发明泥活字仅 100多年。②

二、木活字的产生及其早期印书

继泥活字发明之后，我国又出现了木活字。本来毕昇曾经用木试制活字，由于木质“文理有疏密，沾水则高下不平，兼与药相沾，不可取”，故而弃之而采用胶泥为字。但不久便有木活字印书出现。此木活字印书为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所藏之西夏文《吉祥皆至口和本续》(九册)和俄罗斯圣彼得堡东方研究所所藏西夏文《三代相照言文集》。前者于 1991 年 8 月发现于宁夏贺兰县拜寺沟方塔废墟中，经研究认为是 12 世纪下半叶木活字印本。距毕昇发明泥活字约一百多年，是目前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木活字印本。后者是 20 世纪初由俄罗斯的科兹洛夫率领的蒙古一四川探险队在中国的西夏黑水城遗址(今属内蒙古额济纳旗)发现的包括此书在内的大批西夏文献。重要的是此经发愿文末有西夏文题款，其中明确记有发愿者姓名及“活字新印者”姓名字样。故可断定为活字印本，有人判断为木活字印本。③

至于汉文木活字印书，比目前所知晓的西夏文字活字印书要晚一些，出现在元代。

---

① 台湾发现南宋活字印刷史料[N]. 文汇报，[1985-01-21].

② 史金波. 现存世界上最早的活字印刷品——西夏活字印本考[J]. 北京图书馆馆刊，1997(1).

③ 史金波. 现存世界上最早的活字印刷品——西夏活字印本考[J]. 北京图书馆馆刊，1997(1).

元代著名农学家王祯在元贞元年至大德四年(1295—1300 年)，任安徽旌德县尹时，很关心农业，并积累了丰富的农业知识，写了一部颇具科学价值的《农书》，为了印制这部著作，他亲自设计，花两年时间请匠人刻制了3万多个木活字，用于先试印本县县志。在不到一个月时间内，印出了约计6万余字的《旌德县志》100 部，取得了成功。他特别为此写了一篇《造活字印书法》附录在所著《农书》后，介绍了这种“为印书省便之法”。《造活字印书法》一文，是我国活字印刷史上的一篇重要文献。

王祯所造木活字印书法是这样的：“造板木作印盔，削竹片为行，雕版木为字，用小细锯锼开，各作一字，用刀四面修之，比试大小高低一同，然后排字作行，削竹片夹之。盔字既满，用木榍榍之，使坚牢。字皆不动，然后用墨刷印之。”王祯不仅改进了印刷刻字，还创造了“转轮排字盘”，把木活字依韵分板，按号排列在两个木制的大转盘内。拣字时，排字工人可以坐着不动，只需转动轮盘，就可以拣到所需要的字。

王祯用所创造的木活印刷的《旌德县志》一书，是目前所知的第一部汉文木活字印书。

王祯是制造木活字印书的实践者、经验总结者和传播者。在此 20 多年后，浙江奉化知州马称德，“活书板镂至十万字”，于元英宗至治二年(1322年)，用所镂活字印成《大学衍义》43 卷等书。明清以后木活字印书又有发展，并且出现了锡、铜、铅等金属活字印书，我们将在相应篇章中叙述。

第四节　册 叶 制 度

我国书籍制度随着书籍载体和生产方式的改变，由简策而卷轴，又由旋风装、经折装的过渡而进入册叶制度。

册叶制度是随着雕版印刷的产生而出现的。雕版印刷使书变成一叶一叶的单叶，然后再把每一单叶顺次装订成册而成一本本书，所以人们把这种图书的形式称为册叶制度。

这里我们就印刷的古籍形式作些介绍。

一、版式

古籍是由一叶一叶印页双面折叠组成，每一印页都有一定的格式，就叫版式。印页上的每一事项都有特定的名称，包括有：

版面：一块版所占的面积称为“版面”，或“匡郭”。版面四周的黑线叫“版框”，也叫“边栏”或称“栏线”，简称“线”。四周单线印的称为“单栏”或

"单边";四周双线印的叫"四周双边"或叫"双边栏"。双线一般是一粗一细(外粗内细),故又称"文武边栏"。还有一种仅左右印双线的,叫"左右双边"或"左右双夹线"。此外,还有一种总称为"花边"的,有"卍字栏"(四周由卍字花纹图案组成,如明金陵富春堂刻的《娣袍记》、《白兔记》等)、"竹节栏"(四周用竹节花纹组成的图案线,如清刻的一种《陶渊明集》)和"博古栏"(四周用多种古乐器花纹图案组成,如清刻《词坛雅玫》等)。板框上下距离称为"高",左右距离称为"宽"或"广",用以表示版框尺寸大小。

界行:版面内分行的直线,叫"界行",又叫"边准"。界行和栏线有朱墨两色,红色的栏线叫"朱丝栏",黑色的叫"乌丝栏",也有不分界行的,称为"白文"。

版心:版面的中心,有较窄的一行,叫"版心",也称"版口","书口",或"中缝"、"中折行"。鱼尾、象鼻居其中。

鱼尾:在版心中间,距离上边约四分之一的地方刻有一个像鱼尾似的图案称为"鱼尾"。有时版心下方与上方对称的地方也刻有鱼尾。只刻一个的称为"单鱼尾",刻有两个的称为"双鱼尾"。双鱼尾中又有"顺鱼尾"(方向相随)和"对鱼尾"(方向相对)之分。其中黑色的称为"黑鱼尾"(▛▜),空白的称"白鱼尾(冂),由两线组成的称为"线鱼尾"(⽍),带有花纹的称为"花鱼尾"。元末刻书多用花鱼尾,通常以黑鱼尾居多。鱼尾将版心分为三个部分:中间一般用来题写书名、卷次、叶数;上面原是刊刻叶数的,后来把中间书名移此,也有刊刻出版家名称的;下面原记刻工姓名,后多记出版家名称或丛书名。

象鼻:鱼尾上下到版框之间的部分叫"象鼻"。象鼻中印有黑线的称为"黑口",黑线较细的称为"细黑口"(或"小黑口");黑线较粗的或全黑的称为"粗黑口"(或"大黑口"、"阔黑口"、"宽黑口")。上面的黑口,称为"上黑口";下面的黑口称为"下黑口";上下都是黑口的称为"上下黑口"。其中刻有文字的称为"花口",或称"口题"。没有黑线和文字的,则称为"白口"。宋版书多是白口或小黑口,元版书多是大黑口或花口。版心中的黑线和鱼尾是折叠书页的标号。

书耳:在版框两边边栏外的上角,有时有一小方格,称为"书耳"或"耳子",或称"耳格",简称为"耳"。书耳上多记书中的篇名(小题),相当于现代铅印书直排本的"中缝",横排本中的"书眉"。其在左的称为"左耳题";在右的称为"右耳题"。这是为阅读时方便翻检而设的,多见于宋元版书中。

天头、地脚:每张印纸上,版面以外的部分,在上面的称为"天头",在下面的称为"地脚",合称"天地头"。左、右部分各称"边"(如图 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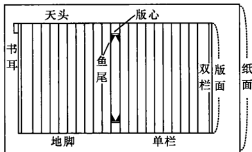


图 8-1　版式

二、行款

行款，又称行格，是指正文的行数与每行的字数。通常以半叶（即印刷的半个版面）为计算标准。同一种书，在不同时期、不同刻家刻印时，其行格中的行数与每行的字数，往往是不相同的。因此行款也是区分版本的一种依据。江标、刘肇隅编有《宋元行格表》可以据之考证宋元各种版本。宋元旧刻行数自 4 行至 20 行，字数自 8 字至 27 字不等。字之中又有大小及双单行之分。故版本学中有“大字本”、“小字本”之分。所谓双行，是指每一行格中印两行字。著名的有明活字“兰雪堂双行本”。一般是单行字。

行款只是鉴定古籍版本的一项依据，并不能作为唯一的依据，因为许多翻刻本可能与原刻本的行款是一致的。

三、字体

版片上的字，是经人手写而后摹刻的，所以各具一格。宋时刻书的字体，早年多仿欧阳询体，后来渐流行颜真卿体（蜀本、建本居多）和柳公权体（浙本居多）。元代赵孟頫书法盛行。刻书又多仿赵体（又称吴兴体，因赵家居吴兴而得名），一直流行到明初。这些都属于楷书范围，且多为名家书手所写。赶到明代万历年间（16 世纪下半叶），才出现了一种非颜非欧非赵的横轻竖重的肤廓字样，因由专业刻工所发明，故称“匠体”，又称“宋体”。清钱大镛《明文在・凡例》说：“古书具系能书之士各随其字体书之，无所谓宋字也。明季始有书工专写肤郭字样，谓之宋体。”其实，这里所谓“宋体”

并非宋版书中所用的字体，实际上是一种“明匠体”。康熙十二年(1673 年)敕廷臣补刊经厂本《文献通考》的序文中，才规定：“此后刻书，凡方体均称宋体字，楷书均称软字。”所以，这两种字体被固定下来，至今仍沿用。宋体，今称为“老宋体”，是常用的印刷字体；楷书即今之正楷书，常用于少儿读物、教科书和诗歌、按语及其他读物标题等。

四、装订

所谓册叶制度，就是将一叶一叶的单叶装订成册的方法。册叶制度也是不断发展演变的。最初是蝴蝶装，其后又出现包背装，又有线装，以至今日普遍流行的“平装”和“精装”，都属于册叶制度的范畴。这里我们仅就宋元时期出现的蝴蝶装”与“包背装”作简要介绍，其余见相关章节。

蝴蝶装，简称蝶装，因书叶展开似蝶形而得名。其装订方法是先将每一印叶，由书口向内对折(有字的纸面对折起来，与后来线装对折的方式恰相反)，然后将每一书叶背面的中缝粘在一裹背纸上，再装上硬纸(有时用布或绩锦裱背)作封面，便成一册书。这就是早期的册叶装订形式(如图 8-2)。其特点是版心向内，单边向外，便于保护书心，边角污损可以裁去，而不影响文字内容。再者它用糊粘，没有穿孔，易于改装，这些都有利于保护图书。《明史·艺文志》说：“秘阁书籍皆宋元所遗，无不精美，装用倒折，四周外向，虫鼠不能损。”此即蝴蝶装也。张直《疑曜》卷五称“今秘阁所藏宋版诸书……谓之蝴蝶装，其经数百年不脱落”。据说其糨糊是用楮树叶、飞面、白芨末三种物品特制的，粘接纸缝，如胶漆之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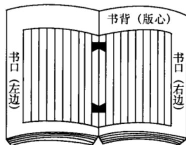


图 8-2　蝴蝶装

宋版书的装订形式多是蝴蝶装。1974年在山西应县所发现的辽刻《蒙求》也是蝴蝶装。这说明宋辽时期此一装订形式盛行于我国南北，以后元版书也采用之。

蝴蝶装由于用硬纸作封面，故放在书架上是竖立排架，书口向下，书背向上，书根向外。为了便于寻检，因此常把书名及卷次写在书根上，从书背到书口成一直行。国家图书馆所藏宋本《欧阳文忠公集》、《册府元龟》等书书根上就有这样的题字，书口处还有摩擦的痕迹，可以证明这种排架法。

蝴蝶装虽然在保护图书方面有它的优点，但在阅读时却带来不便。由于书叶都是单面，有字面容易粘连，翻阅时往往都见纸背而且每读一叶，必须连翻两叶才能继续读下去，常生厌烦，这就是它的缺点。针对它的缺点进行改进，于是便出现了包背装。

包背装始于南宋，流行于元代和明代前期。因用一张原纸作书包裹书背而得名。

包背装与蝴蝶装显著不同的是：由书口向内对折，改为向外对折，使有字的两面外露，使书叶两边的余幅向着书背。早期包背装是直接粘连在背纸上的，后期则在余幅上打孔穿纸捻，再加书衣包背。包背装使书口向外，克服了蝴蝶装每读一叶必须连翻两叶的麻烦。

包背装在元代很流行，国家图书馆藏有元刊本原装的《汉书》和《文献通考》。明清也还有包背装这种形式。如著名的两大部写本书《永乐大典》和《四库全书》的原装也采用的是包背装这种装订形式。

包背装版心变化为书口，不宜竖立排架，而改为平放，于是封面也用硬封面改为软封面(见图8-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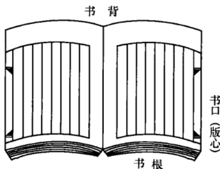


图8-3　包背装

五、结构

古籍的结构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外在形式结构和文字内容结构。

外在形式结构主要包括：

书衣：即书的前后封皮，所以又称“书皮”或“护封”。现在称作“封面”（古籍的封面另指，见下说）。它用的是一种较有硬性的纸，是为保护书的内容而附加的，不算在全书之内。以往的藏书家对书衣的颜色和质量是很讲究的，一般用栗色或瓷青色纸作书衣，也有用绩绢等丝织品的。如清《四库全书》用绿、红、蓝、灰四色书衣，以区别经、史、子、集四部。

书签：书衣的书名，往往是用另纸（或嫌帛）写上，贴在书衣左上方，这就是书签。除题写书名外，有时还题写册次及题签人姓名。因为是贴上的，所以又称“浮签”，以区别于卷轴书的“挂签”（“标签”）。

护叶：又称“副叶”。指书衣内所加的一张空白衬纸，是为保护书叶不受损害的。《藏书记要》：“副页用‘大史连’前后一样两张。”有的地方常采用一种特制白纸，如广东多用万年红纸，既防虫防潮，又美观。

封面页：古籍的“封面”，是在护叶之后的，即今之书名页，也叫“扉页”、“内封”或“内封大题”。其上题有书名，常为名家手笔。书名页的形式有整幅（两面）和半幅（一面）两种形式。除写有书名外，有的还署作者、出版者、出版时间等。

书脊：指书的背脊，也称“书背”，即一本书装订的一边。

书口：与书脊相对的一边。即可翻开的那边。

书脑：指各页钻孔穿线的空白处。

书首：也称“书头”，指书籍最上端的切口。

书根：也称“书足”，指书籍最下端的切口。卷帙浩繁的书，常在书根上写或印上该书书名、卷数、册数及本书册次，以求便于检索。

文字内容结构，包括：

正文：一书的主体文字。

序跋：“序”亦作“叙”，或称“引”，是说明书籍著述或出版意旨、编次体例，作者情况等方面的文字。由作者本人所写称为“自序”，由他人所写的称为“他序”，一般置在书前；若置在书后，则称为“跋”，也称“后序”。“序”和“跋”相当于现代图书中的“前言”、“后记”。

凡例：说明著作内容和编辑体例的文字，又称“例言”或“发凡”，一般放在正文之前。

目录：指该书的目次，是一本书标目的汇集。置于正文之前，序文及凡例之后。

注释：解释和说明正文的文字。在古书中通常采用夹注形式，多用小字双行注记在正文之中。

卷末：古籍中除正文之外，还有一些附录文字，常把较多的附录文字编集在一起，附于书后称为“卷末”。

第九章　印本书兴起时期的著作

第一节　宋辽金元官府的编书与印书

一、两宋的官府编书与印书

经过五代纷争之后，宋王朝统一了中国。宋代是封建经济普遍发展的时期，在生产过程上，有圩田水利的开辟，冶金矿业的发展，军器织造的分工，陶瓷业的进步，印刷业的发达。军事、政治和财政权力的高度集中，使工商业得到高度发展；科举名额增多，书院讲学的创始，音乐、戏剧、美术水平普遍提高，理学、禅学、文学、史学都有发展。这些都为宋王朝的编著和刻印图书提供了充分的物质基础和文化条件。

1. 四大类书的编纂

宋初官府编书，以《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和《册府元龟》四大类书为最著。当时编纂四大类书的意图是什么呢？据王明清《挥麈后录》卷一说："太平兴国中，诸降王死，其旧臣或宣怨言。太宗尽收用之，置之馆阁，使修群书，如《册府元龟》、《文苑英华》、《太平广记》之类，广其卷帙，厚其廪禄赡给，以役其心，多卒老于文字间云。"又《隐居通议》卷十三也说："如宋初编《文苑英华》之类，尤不足取，或谓当时削平诸僭，降臣聚朝，多怀旧者，虑其或有异心，故皆位之馆阁，厚其爵禄，使之编纂诸书，如《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之属，迟其年月，困其心志。于是诸国之臣，俱老死于字里行间，世以为深得困老英雄法，推为长策。"可见这四部类书的编纂，是有其政治意图的，但客观上，却也反映了宋代文化事业发展的一面，同时也为后代保存了许多失传的古籍，给研究工作和编辑工作提供了方便。

下面我们简单地介绍这四大类书大体情况和内容。

《太平御览》是在太平兴国二年(977 年)春，宋太宗赵光义命令大臣李昉等编纂的。到太平兴国八年十二月(984 年 1 月)完成，历时七年。初名《太平总类》。它是从包括经史子集在内的 1 694 种图书中摘录汇总而成，全书分 55 部，5 363 类(有些类又有附类，总共 63 个附类，合类与附类共5 426 类)，共成千卷。当时被认为是包罗万象，总括群书的综合性巨著，所以称为《太平总类》。“太平”是指修书时太平兴国年号。据说书成之后，“帝(宋太宗)每听政之暇，日读《御览》三卷，有故或缺，即追之，虽隆冬景短，必及其数”(《国朝会要》)。整整花了一年工夫读完。因此改称《太平御览》。

《太平御览》是一部大型类书，由于其征引古书很多，保存了不少已佚的资料，如其中汉人传记 100 余种，旧方志 200 余种，都是当今不传之书，则赖以保存，并且从中辑佚出不少失传著作，如《范子计然》、《氾胜之书》等即是。从这一点来说，它就具有很大的价值。

《太平广记》是与《太平御览》同时受命编修的，历时仅一年多即成。它与《御览》所不同的在于它专收汉代至宋初的野史、笔记、小说等书内的故事，汇编成 500 卷，另有目录 10 卷，全书按题材分类 92 大类，150 多个小类，小类之下又分若干目，总数约 3 000 多个细目。引用图书共 475 种。可以说，它是《御览》的一种外编。郑樵说：“《太平御览》别出《广记》一书，专记异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古来轶闻琐事，僻籍遗文咸在焉，卷帙轻者往往全部收入，盖小说家之渊海也。”它为以后研究戏曲、小说的人提供了大量资料。据记载，南宋时的“说话人”，从小都得学习《太平广记》。宋元时人编的话本、杂剧以及明清时人写的小说、戏剧，很多都取材于这部类书。鲁迅先生所编《唐宋传奇集》，汪辟疆先生所编《唐人小说》，多从书中辑出。

此书编成后，即奉敕送史馆，不久又奉敕刻版。因被认为是小说家言，非学者所急，刻好的墨版被封存，当时未予印刷。

《文苑英华》是宋太宗时所编纂的第三部大类书，也可以说它是一种诗文总集。它是梁昭明太子萧统所编《昭明文选》的一个续编。《文选》所收止于梁初，而《文苑英华》所收，则起自梁末而至于唐，采录梁、陈、隋、唐各家诗文 23 000 余篇，共计 2 200 余人的作品，按文体分诗赋、杂文、表、檄、论等 38 大类。这部书从太平兴国七年(982 年)开始编修，雍熙四年(987 年)修成，历时五年，全书共 1 000 卷。书中保存大量古代诗文，为历代所编总集所取材。如宋真宗时姚铉所编《唐文粹》，明代编的《古诗纪》以及清代所编的《全唐诗》、《全唐文》等皆取材于此书。

《册府元龟》是一部史料性类书，以历代名臣事迹和治乱兴衰汇为一编。宋太宗时已有意命儒臣编修，但由于连纂以上三部类书，不暇顾及，直到他的儿子宋真宗赵恒继位，再授命编修，始于景德二年(1005 年)，至大中祥符六年(1013 年)书成，原名《历代君臣事迹》，由真宗亲自题名《册府元龟》。“册府”指本书有如书府一样的丰富内容；“元龟”即大龟，含“龟鉴”之意。其意是指本书的丰富内容皆可作为君臣的鉴戒。可见当时编是书的目的，在于吸取历代统治的经验，作为楷模。因此，其取材极为严格，只限于“正经”、“正史”和部分子书，凡非正史的小说，人物传记等一概不入。全书共分 1 000 卷，另有目录和音义各 10 卷(现音义已失传)，分 31 部，1 104 门，卷数虽与《太平御览》相当，但实际分量超过它一倍。这是宋代最大的一部类书。取材从上古到五代，包括帝王、宗室、外戚、幕府、陪臣等，几乎概括了全部十七史，其中记唐五代史实尤为详细。故陈垣先生认为它“可以校史，亦可以补史”(见 1960 年 6 月中华书局影印明本序)。

2. 经、史、医书的校刻

宋代官府除重视编印新书之外，也重视对古书的校刊，对经、史及医书尤为重视，而且取得了很大成绩。以经、史而言，宋承唐之旧，以五经、三史列于科举，以之取士，所以对其特别重视。加上五代以来，古籍散失很多，其幸存者，亦难免讹舛，因此宋代君臣上下，都努力于经史书籍的校刊工作。经书如太宗端拱元年(988 年)，敕令司业孔维等校正孔颖达的《五经正义》，着国子监刊行，后又几经复校，至真宗咸平二年(999 年)才校毕。咸平三年至四年(1000—1001 年)又校刊《七经疏义》，仁宗天圣八年(1030 年)又校《经典释文》。南宋高宗时期国子监又复刻北宋本诸经义疏。史书如太宗淳化五年(994 年)选官分校《史记》、《前后汉书》并下杭州刊刻。这是两《汉书》第一次经过官方校订并经过雕版印刷的本子。以后真宗、仁宗朝都再经复校，并编成刊误文字多卷。真宗咸平三年至五年(1000—1002 年)评校《三国志》、《晋书》、《唐书》，乾兴元年(1022 年)十月校定《后汉书》，仁宗天圣二年至四年(1024—1026 年)校《南北史》、《隋书》，嘉祐五年(1060 年)中书省奉旨下杭州镂版《新唐书》，嘉祐六年(1061 年)《宋书》、《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后周书》依《唐书》例，旋付送杭州开版。《新五代史》也约刻印于熙宁五年(1072 年)以后，至此北宋时期十七史全部经过校勘颁行，还刻印了《资治通鉴》等史书。

除校刻经史外，宋代官府对校刻医书也很重视。太祖开宝六年(973 年)校刻《卢氏评定本草》，太宗淳化三年(992 年)校刻《太平圣惠方》，仁宗天圣四年(1026 年)，命校理晁宗悫、王举正等校定《黄帝内经素问》、《难

经》、《巢氏诸病源候论》和《铜人腧穴灸图经》，于五年四月命国子监摹印颁行。仁宗庆历年间，刻《庆历善救方》。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置校正医书局于编修院，补注《本草》、《修经图》、《千金翼方》、《金匮要略》、《伤寒论》等，均镂版刊行。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校刻《外台秘要》和《甲乙经》。哲宗元祐八年(1093年)校刻《黄帝针经》。徽宗政和四年(1114年)八月校刻《政和圣济经》。高宗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复刊《太平惠民和济局方》。

3. 佛、道藏的刻印

佛教经典的结集称为佛藏(亦称“大藏经”或“大藏”)；道教经典的结集称为道藏。

佛藏的结集始于南北朝，而其刊印则始于宋初，这就是著名的“开宝藏”。据《佛祖统记》卷四十三载，“宋太祖开宝四年(971年)敕高品，张从信往益州雕大藏经版”，“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年)，成都先奉太祖造大藏经，板成奉上”。历时12年。此藏系根据唐智升和尚的《开元释教录》编排，共1 076部，5 048卷，计480函，经版13万多片。这是宋代最早的官府刻书，也是佛藏的最早刻板。它是在四川刻成的，所以世称《宋开宝蜀刊本大藏经》，简称《开宝藏》或《蜀藏》。

《开宝藏》的编排按大、小乘分列，然后分别按经、律、论分三个部分。“经”是佛祖释迦牟尼的讲说；“律”是记载僧众宗教生活的规章制度；“论”是大德的著作，用以诠释经文，发挥经义。这三部分皆译自梵文，其余中土撰述，主要是经文的注疏和论著。

道藏的汇集，始于六朝，辑写成“藏”，则在唐开元中，是为《开元道藏》。凡3 744卷。那是抄写的。宋初，太宗诏徐兹、王禹偁等校订道教图书，得3 700多卷，缮写送呈宫廷。真宗大中祥符年间(1008—1016年)，命王钦若等将道经运到余杭，依照旧目刊补，计得4 365卷，题为《宝文镜录》。徽宗崇宁间(1102—1106年)，又命刘道元校定道藏，增至5 387卷。于政和六、七年间(1116—1117年)送福州万寿观，命福州知州黄裳招工雕版，运送京师汴京，名《万寿道藏》。这是最早的道藏刻本。该藏共540函，5 481卷。

4. 官府刻书及其机构

宋代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机关、教育机关都重视刻书，也刻有不少的书。无论中央或地方机关所刻印的书总称为“官刻本”。

宋代中央刻书的单位很多，国子监、崇文院、秘书监、司天监、刑部、太史局、礼制局等都刻过书。其中以国子监刻书最多，

它是宋代中央官刻的主体。国子监是国家最高教育机关，除行使教育职能外，兼事刻书。其所刻之书称为“监本”。

国子监刻书很多，其规模和发展速度很快。景德二年(1005 年)夏，宋真宗亲临国子监阅书库，询问当时的国子监祭酒邢昺经书版片有多少。邢昺回答说："国初不及四千，今十余万，经传正义皆俱。"(《宋史·邢昺传》)宋朝从 960 年建国到 1005 年，才 40 多年的时间内，国子监仅雕刻经书版片就增加了二三十倍，可见其刻书速度之快，数量之多。

国子监刻书的内容极广，经史子集四部皆备，其中经、史、医书最多。

靖康之后，高宗在杭州建立了南宋王朝。旧存国子监书版，全遭毁弃，新建国子监难以为继，只好依靠地方力量，搜集一些旧监本书籍翻刻。因此宋代官府刻书，北宋时期以中央为主。南宋时期参与刻书的地方官府机构名目繁多。南宋地方行政管理机构分路、州(府、军、监)、县三级，各级机构均有刻书。如路一级官署刻书，今存有所谓安抚使司、转运司、茶盐司、漕台、漕司、仓司、计台等刻本；府州军一级刻书，有的经题某某府刻或某某郡斋刻本；县级刻书多著录为某某县斋刻本；另外宋代多级地方机关普遍设立公使库。所谓公使库，相当于现今之招待所，以供应来往官员膳宿费用，允许其经营获利，他们也从事刻书；宋代在地方普遍设立官学，官学有学田的收入，也有余资刻书。官学包括：州学、府学、军学、郡学、县学、县库、学宫、舍等。

二、辽金夏的官府编书与印书

公元 907 年，辽太祖耶律亿(阿保机)称帝，在北方建立了契丹国家，公元 947 年灭后晋，建都大梁，改国号为大辽。公元 983 年至 1064 年间，称大契丹，公元 1125 年为金所灭。前后共 219 年。辽与北宋对峙，是统治中国北方的一个王朝。

契丹人虽有自己的文字，但使用范围较窄，仅在贵族文人中流行，汉字仍是其文化的主要传播工具。汉文书籍仍在辽流播。辽统治者使用一批汉人知识分子，如康默记、韩延徽、韩知古等人，为其出谋划策，帮助辽国制订了一系列典章制度，受他们的影响，儒家思想也成为辽国统治者的正统思想。据《辽史》记载：圣宗开泰元年(1012 年)，"那沙乞赐佛像、儒书，诏赐……《易》、《诗》、《书》，《春秋》、《礼记》各一部"(《辽史·圣宗纪》)。清宁元年(1055 年)十二月，"诏设学养士，颁《五经》传疏"(《辽史·道宗纪》)。这也说明，既然有书颁赐，必为官方所刻。但据沈括《梦溪笔谈》卷十五载："契丹书禁甚严，传入中国者法皆死。"所以辽之刻书传世甚少，几乎是我国书史上的一个空白。所幸 1974 年 7 月在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塔内发现了《契丹藏》及其他印经，填补了这一空白。

《契丹藏》又称《辽藏》，此书久佚。这次发现的共有12卷，其中有一卷《称赞大乘功德经》，首尾完整，其尾纪年辽圣宗统和二十一年(1003年)。其距宋《开宝藏》刻成，仅迟20年。

辽代设立了印经院，有专人负责佛经雕印。辽刻《释摩诃衍论通赞疏卷第十》和《释摩诃衍论通赞疏科卷下》有题记云："燕京弘法寺奉宣校勘雕印流通……印经院判官朝散郎宗太子中舍骁骑尉赐绯鱼袋臣韩资睦提点。"辽僧觉苑《大日精义疏演密钞序》说："洎我兴宗玉宇，志弘藏经，欲及遐迩，敕尽雕镂，须人评勘。"又说："清宁五年(1059年)敕镂《大日精义疏》版流行。"是以证明为官刻。其后辽屡次以藏经赐高丽。《三国遗事》卷三有高丽僧慧照市藏经三部归之语，说明辽刻藏经传播很广。《佛教圣典概论》引《东文选》卷一百一十二所收释宓庵丹本《大藏庆赞疏》谓："念兹大宝，来自异邦，秩简部轻，函盈于二百，纸薄字密，册不满于一千，殆非人工所成，似借神巧而就。"由此可见辽刻藏经的刻印是很精致的。

在山西发现的辽刻中，有明确年代记载的以圣宗统和八年(990年)雕印的《上生经疏科文》为最早；《涅槃义记第八》为最长，原八十纸，现存总长3331.4厘米，行款字数都有一定规格。大多数经版刻有经名、卷数、译撰者、版码及千字文编号。字体秀丽，书法遒劲，刀法圆润有力，行款疏朗，纸墨精美。纸质大部分为硬黄纸(皮纸)或麻纸入潢，至今无一虫蛀，足见防蠹技术水平之高，也说明辽代纸质精良。装帧以卷子装为主(42件)，也有蝴蝶装4件，刊刻地点以燕京(辽的南京，即今北京)为最多，除官刻之外，也有私刻和坊刻在内。

因为此次发现于寺院，故以佛经为最多(总数61件中，佛经占47件)，包括久已失传的佛家经疏。另有杂刻8件，其中有一件是坊刻的儿童启蒙读物《蒙求》，是这部著作现存最早的刻本，而且是唯一有音义的版本。此外还有六幅版画，其中有三幅彩色《南无释迦牟尼佛像》。彩色佛像的发现对研究我国套版印刷史有特别的意义。

继辽之后，金在北方兴起，公元1115年，女真族完颜部落首领阿骨打创建金国，太宗天会年间先后灭掉辽国和北宋，与南宋对峙，统治中国北方达120年之久。

早在破宋之前，金太祖天辅五年(1121年)十二月下诏："若克中京，所得礼乐仪仗图书文籍，并先次津发赴阙。"(《金史·太祖纪》)后于"靖康丙午(1126年)冬，金人既破京城，当时下鸿胪寺取经版1 700斤，是时子砥实为寺丞，兼是宗室，使之管押，随从北行。丁未(1127年)五月至燕山府(《三朝北盟汇编》卷九十八·赵子砥《燕云录》)。这说明金对宋之图书蓄谋

已久，破城之后。掠去大量图书及印版。这些后来是金本的底本。同时金朝官方也组织刊刻图书。金之官方刻书以国子监为代表。据《金史》记载：金国子监印本有经史 29 种及《老子》、《荀子》等书。此外还有《东坡奏议》、刘迎《山林长语》等。除了刻印汉文书籍外，还设立译经所将汉文图书翻译为女真字印行。据史载：世宗大定二十三年(1183 年)八月，“以女直字《孝经》千部付点检司，分赐护卫亲军”，九月译经所进所译《易》、《书》、《论语》、《孟子》、《老子》、《扬子》、《文中子》、《刘子》及《新唐书》……命颁行之”(《金史·世宗纪》)。又章宗明昌二年(1191 年)，四月，学士院新进唐杜甫、韩愈、刘禹锡、杜牧、贾岛、王建，宋王禹偁、欧阳修、王安石、苏轼、张耒、秦观等集二十六部(见《金史·章宗纪》)。五年(1194 年)置宏文院译写经书(同上)。

金的刻书中心在平阳(今山西临汾)。据《金史》记载，太宗八年(1130 年)立经籍所平阳刊行经籍。金之官刻书也是在平阳刊行的。

在宋辽金对峙期间，在我国西北地区又出现了一个由党项族人创建的国家，国号为大夏，公元 1038 年，李元昊称帝始，至 1227 年为蒙古所灭，共 190 年。史称西夏。

西夏与宋经济、文化联系极为密切，部分政治制度仿宋，汉文图书广为流传。西夏也创有文字，不仅有西夏人自己的著作，流传至今的有：《文海》、《文海杂类》、《回音》、《杂字》、《要集》、《番汉合时掌中珠》、《贞观玉镜统》、《圣立义海》、《贤至集》、《三世属明言集》、《新集锦合辞》、《西夏诗集》、《到贤》等西夏文本；也有将汉文著作翻译成西夏文字，有《论语》、《三国志》、《十二国》、《贞观政要》、《类林》、《德行记》、《汉文典籍摘译》、《孙子兵法三注》、《孙子传》、《六韬》、《黄石公三略》等。这些主要是从 20 世纪初以来陆续从内蒙古、宁夏、甘肃等地出土发现的，现存于国内外的有 500 种以上，数千册传。主要藏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东方研究所。它是 1909 年由俄罗斯的科兹洛夫率领的蒙古——四川探险队在中国西夏黑水城遗址(今属内蒙古额济纳旗)所发现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西夏文献中，有多种活字印本。包括泥活字印本和木活字印本，距北宋毕昇的泥活字发明的仅距 100 多年(参见本书第八章第三节)，是现今世界上最早的活字印本。

三、元代的官府编书与印书

公元 13 世纪初，我国北方少数民族蒙古族兴起，取代金，南侵宋，远征欧亚大陆，建立了一个版图辽阔的大元帝国。

蒙古原是一个尚武的民族，文化较落后，但随着其政权在全国逐步确定，也意识到文治的作用，先后采取了尊经重儒，兴学立教，科贡并举，举贤招隐及保护工匠等一系列措施，来巩固其统治，所有这一切为元代图书出版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学术、物质和技术条件。

元代的官府编书不是很多，较早的有《元秘史》15卷，再就是宋、辽、金三史，《元典章》、《经世大典》、《农桑辑要》及《大元一统志》等书；另一方面就是译书。将认为有益于其统治的汉文书籍译成国字（蒙文），以供蒙古王公贵族学习。大德十一年（1307年）八月“中书左丞孛罗铁木儿以国字译《孝经》进，（武宗）诏曰：‘此乃孔子之微言，自王公达于庶民，皆当由是而行。’其命中书省刻板摹印，诸王而下皆赐之”（《元史·武宗纪》）。至大四年（1311年）“帝览《贞观政要》，谕翰林侍讲阿林铁木儿曰：‘此书有益于国家，其译以国语刊行，俾蒙古，色目人诵习之’”（《元史·仁宗纪》）。仁宗为太子时，“有进《大学衍义》者，命詹事王约等节而译之，帝曰：‘治天下，此一书足矣’。因命与《图像孝经》、《列女传》并刊行，赐臣下”。故仁宗于延祐四年（1317年）四月以《大学衍义》译国语。（《元史·仁宗纪》）。延祐五年（1318年）八月，复以江浙省所印《大学衍义》五十部赐朝臣。”（《续文献通考·经籍考》）。元代的官府刻书数量相当多。在其入主中原之前，于太宗八年（1236年）六月“立编修所于燕京，经籍所于平阳，编集经史”（《元史·太宗纪》）。至元年间此二所先后并入宏文院。忽必烈攻下南宋都城临安（杭州）之后，将宋官印局及江南所有书版都运往北方，更促元代刻书事业发展起来。

元代中央的官府刻书机构有兴文署、广成局、太史院、太医院、司农司等。

兴文署是中央刻书的主要机构。初建于至元十一年（1274年），“兴文署掌雕印文书，交属秘书监”（元《秘书监志》卷八）。至元十四年（1277年）并入翰林院。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与国子监“皆属集贤院”（《元史·百官志》）。至元二十七年（1390年）正月“复立兴文署，掌经籍版及江南学田钱谷”（《元史·世祖纪》）。“朝廷于京师创立兴文署，署置令、丞并校理四员，厚给禄廪，召集良工剡刻经、子、史版本，流布天下，以《资治通鉴》为起端之首。”（《天禄琳琅书目》卷五）。

文宗天历二年（1329年），立艺文监，“专以国语教译儒书，及儒书之合校雠者俾兼治之”（《元史·百官志》）。艺文监下属有两个机构：一是管理藏书的艺林库，另一个则是“掌刻经籍及印造之事”的广成局。广成局是一个蒙古文翻译出版机构，除翻印儒书外，还负责元统治者的“祖宗圣训”之类书籍的印制。

除兴文署、广成局外，元代国子监虽不及宋朝国子监那样为主要刻书机构，但偶尔也有刻书，如延祐三年(1316 年)国子监曾刻小字本《伤寒论》，以及在(后)至元六年(1340 年)谍呈中书省批准，下浙东道宣尉使司都元帅府分派庆元路儒学招工镌刻了《玉海》200 卷、《汉书艺文志考证》10 卷、《通鉴问答》5 卷等。太医院也刻医书，如大德四年(1300 年)刻《圣济总录》。司农司也刻农书，如至元十年(1273 年)撰刊《农桑辑要》7 卷，至元二十八年刻印《桑杂令》。太史院印历局，专门掌管历书的印刷。后三者可以说是专业书籍的刻印机构。

除上述外，元代官刻书籍最主要、最大量的还是由各机关辗转下达各路儒学、书院、郡庠、郡学、儒司所刻的书籍。诸路所刻书，以大德间九路所刻十七史为最著。所谓九路是指江东建康包括的宁国路、徽州路、饶州路、集庆路、太平路、池州路、信州路、广德路、铅山州。现在国家国书馆收藏的有大德九年由太平路儒学刊印的《汉书》(仅有 47 卷)，宁国路儒学刊印的《后汉书》(仅存 30 卷)、《志注补》(仅存 14 卷)、饶州路儒学刊印的《隋书》(系明正德十年(1515 年)重修本)、信州路儒学刊印《北史》(仅存 36 卷)，大德十年(1306 年)池州路儒学刊印《三国志》(仅存 5 卷)。

除九路诸史之外，见于记载的地方官刻还有：至正五年(1345 年)江浙、江西行省刻印的《辽史》、《金史》，至正六年(1346 年)又刻印《宋史》，至治元年(1321 年)刻印王挥《秋涧先生大全集》，至正八年(1348 年)江浙省刻印宋褧《燕石集》、延祐二年(1315 年)和至顺三年(1332 年)刻印《农桑辑要》各万部，(后)至元六年(1348 年)庆元路儒学刻印《玉海》、《辞学指南》、《诗考》、《地理考》、《通鉴问答》、《汉书艺文志考证》，顺帝至元五年(1339 年)扬州路儒学刻印马祖常《石田先生文集》。至正二十五年(1365 年)刻印鲍彪注《战国策》，大德九年(1305 年)无锡州学刻印的《白虎通德论》大德三山郡庠刻印的《通志》，至正四年(1344 年)保庆路儒学、溧阳州学、溧水州学合刻的《金陵新志》、吴郡庠刻印的《通鉴总类》等。

另外，值得特别提到的是元代的书院刻书。书院是集藏书、刻书与讲学于一体的文化、教育与学术机构。元朝政府对书院采取积极创办、鼓励发展的政策，在经济上予以支持，在管理上加以控制，使得元代书院逐渐趋于官学化。所以我们把元代书院刻书列入官府刻书的范畴。据统计元代新建书院 143 所，修复书院 65 所，改建书院 19 所，共计 227 所①，其中从事过刻书

① 曹松叶．宋元明清书院概况[G]//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编．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第 10 集．第 111-115 期．1929 年 12 月—1930 年 1 月．

活动，并有书籍流传下来的约50家。最著名的有大德广信书院刻《稼轩长短句》、泰定西湖书院刻《文献通考》、武溪书院刻《新编古今事文类聚》、宗文书院刻《五代史记》、象书院刻《北史》等。

第二节　宋辽金元私人著述与印书

一、两宋私人著述与印书

历史进入北宋时代，在儒、释、道合流，以儒家思想为“正统”的总趋势下，形成儒家的新学派——道学，或称理学、宋学。其代表人物是周敦颐、程颢、程颐，最后由南宋朱熹集大成，使其更加系统化，也称“程朱理学”。周敦颐的著述有《周濂溪集》、程颢、程颐的著述有《河南程氏遗书》，朱熹著述颇多，有《朱子全书》、《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续集》、《别集》、《朱子语类》、《名臣言行录》、《论孟精义》和《四书章句集注》等。被列宁称为“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的王安石，也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文学家，他的著作有《临川集》。文学方面，有列为唐宋八大家的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曾巩、王安石和南宋的爱国诗人陆游和辛弃疾等。他们的诗文著作对后世影响很大。史学方面有最著名的编年史——司马光《资治通鉴》和典志体史书——郑樵《通志》。考古方面，这一时期开辟了金石学的研究，有欧阳修《集古录》，吕大临《考古图》、赵明诚《金石录》等。科学技术方面也有很多成就，数学著作如刘益《议古根源》、秦九韶《数学九章》、杨辉《详解九章算法》，在世界数学史上也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医学、农艺、建筑诸领域也有不少名著。其中包括沈括《梦溪笔谈》，涉及天文、历算、气象、地质、地理、制图、物理、化学、生物、水利、建筑、农艺、医药等自然科学技术，也涉及典制、法律、军事、考古、语言、音乐等人文科学的内容，被誉为“中国科学史上的坐标”。

以上所举仅为两宋时期最重要的和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和著述。

宋代除官府刻书之外，也有私家刻书。所谓私家刻书，是指凡不以卖书为业，而由私人出资刻校的书。这些书称为“家刻本”、“家塾本”或“宅塾本”。刻书家，往往为学者兼藏书家。两宋的私家刻书很多，仅据叶德辉《书林清话》所记就有40多家。其中北宋时期，有仁宗宝元二年(1039年)临安进士孟琪所刻姚铉《唐文粹》，仁宗庆历六年(1046年)京台岳氏《新雕诗品》，英宗治平三年(1066年)建安蔡子文东塾之敬室刻邵子《击壤集》，徽宗宣和元年(1119年)寇宅(寇约)刻寇宗奭之《本草衍义》等。北宋私家刻

书传世的很少。南宋私家刻书较之北宋为多，其中尚有传世之本。著名的如：廖莹中世彩堂刊刻的《昌黎先生集》、《河东先生集》(国家图书馆有藏)，周必大刊刻的《文苑英华》、《欧阳文忠公集》(国家图书馆有藏)，楼氏家刻本《攻媿先生文集》(北京大学图书馆有藏)，崔尚书宅刊刻《北硐文集》(国家图书馆有藏)，眉山程舍人宅刊刻《东都事略》(台湾省“中央图书馆”、日本静嘉堂文库有藏)，安仁赵谏议宅刊刻《南华真经》(台湾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有藏)，王抚干宅刊刻《颐堂先生文集》(南京图书馆有藏)，临安锦溪张监税宅刊刻《昌黎先生集》(日本宫内厅书陵部有藏)，祝太傅宅刊刻《新编四六必用方舆胜览》(同上)，鹤林于氏家塾栖云阁刊刻《春秋经传集解》(国家图书馆有藏)，饶州德兴县银山庄溪董应梦集古堂刊刻《重广眉山三苏先生文集》(北京大学图书馆、台湾省“中央图书馆”有藏)，邵武东乡朱中奉宅刊刻《史记》(日本武田科学振兴财团杏雨书屋有藏)等。

以上所列仅限传世的版本，而还有一些名家刊刻而未能直接传世的版本，据文献考证，应当提到的还有著名学者朱熹，爱国诗人陆游父子，文坛名家洪氏三兄弟，他们也有不少刻书。①

朱熹(1130—1200年)，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别称紫阳。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人，侨寓建阳(今属福建)。朱熹一生在学术上颇有建树。他不仅是一位著名学者，而且是一位杰出的出版家。他先后刻印过“四经”(《周易》、《尚书》、《诗经》、《春秋左传》)、“四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礼书》、《论孟精义》、《近思录》、《南轩集》、《献寿记》、《永城学记》等。此外他还帮别人刻过不少书。

陆游(1125—1210年)字务观，号放翁，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南宋著名爱国诗人。他一生酷爱藏书、读书，也校书、印书。他先后刻有：《陆氏续集验方》、《钓台江公奏议》、《世说新语》、《刘宾客集》、《新刊剑南诗稿》(自著)、《岑嘉州诗集》、《皇甫持正集》、《高常侍集》、《南史》、《花间集》、《春秋后传》等。

陆游的儿子陆子虡、陆子遹继承了其父藏书刻书的传统，尤其是陆子遹刻书尤多。陆子遹出仕以后，也刻了不少书，其中以《渭南文集》最为有名。此书于嘉定十三年(1220年)陆子遹任溧阳县令时刻梓于溧阳学宫。此本今国家图书馆有藏(不全)。又刻《剑南诗稿续稿》及《老学庵笔记》三者皆是其父陆游的著作。此外，他还主持刻印了石介《徂徕集》、魏野《钜鹿东观集》、

① 参张丽娟，程有庆著．宋本·宋代刻书家举隅[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

潘阆《逍遥集》、杨朴《东里集》、杨亿《西昆酬唱集》、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以及其曾祖陆佃所著《尔雅新义》、《陶山集》、《鹖冠子注》等。陆游另一个儿子陆子虡则刊印了其父《剑南诗稿》和《遗稿》。陆游父子所刊印的这些书籍都是在为官任上所刻，故一些著作中有把其列入官刻本，而不列入私刻本。洪氏三兄弟的刻书也属这种情况。

洪氏三兄弟，鄱阳(今江西波阳)人。早年入仕，更以文学而知名，被称为“鄱阳三洪”。他们不仅著作丰富，而且各自主持的刻书也不少。除刻自己的著作外，也刻亲友及先贤的著述。

洪适(1117—1184 年)字景伯，号盘洲。著有《隶释》、《隶续》和《盘洲文集》，都曾自刻，还刻印有其父洪皓的著作《鄱阳集》和《松漠纪闻》以及刻王充《论衡》、元稹《元氏长庆集》和《大宋登科记》、《五代登科记》、《重编唐登科记》、《文房四谱》等。

洪遵(1120—1174 年)，字景严，号小隐。著有《泉志》、《小隐集》，并编有《翰苑群书》、《洪氏集验方》等。刻书有《翰苑群书》、《洪氏集验方》、《伤寒要旨》、《药方》，继其兄后重刻其父著作《松漠纪闻》，并增加《补遗》十一事。

洪迈(1123—1202 年)，字景卢，号容斋，别号野处。著有《容斋随笔》、《夷坚志》，编有《万首唐人绝句》。其中《夷坚志》曾两次付刻，《万首唐人绝句》，先刻于任上未竟，离任后“乃雇婺匠续之于容斋”，至少有一半是私刻。

一般来说，私宅刻本，由于非为牟利，所以可以不惜工本，达到较好的刻印质量。又因为其刻书目的主要为发扬学术，保存和传播文化，或刻印自己或祖辈著作，或校刻经典著作，或为家塾学子学习之用，所以在校勘方面比较认真，受后世所重。然不尽如此，如历来被作为私家刻书的代表黄善夫家塾刻本，虽然刊印精美，据现代学者研究，黄刻本文字内容中错误比比皆是，其校勘质量很差。

二、辽金元私人著述与印书

辽的文化事业本不发达，加上朝廷的不重视，乃至禁锢，所以私人著述甚少，正如沈括《梦溪笔谈》所言：“辽制，书禁甚严，凡国人著述，惟听刊行于境内，有传于邻境者，罪至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四十六・史部二)所以传世的私人著述甚少，私家印书传承至今的更是少之又少。1974 年 7 月在山西应县佛宫寺所发现的辽刻中，除官府印书外，也有私家刻书，如其中《妙法莲花经》即是。它是由国子监祭酒兼监察御史冯绍文“抽己分之

财，命良工书写雕成《妙法莲花经》一部，印造流通”。

代辽而起的金，较之辽在文化上有了很大的发展，人才辈出，“魁儒硕士，文雅风流，殊不减江以南人物，如虞仲文、徒单镒、张行简、杨云翼、赵秉文、王若虚、元好问辈，或以经术显，或以辞章著，一代制作，能自树立”(龚显增：《金史艺文志补录·序》)。虞仲文“七岁知作诗，十岁能属文，日记千言，刻苦学问”(《金史·虞仲文传》)。徒单镒著有《弘道集》，张行简著有《礼例案》，杨云翼著有《大金礼仪》和《周礼辨》，赵秉文著有《易丛说》、《中庸说》、《资暇集》《滏水文集》、《孟子解》等，王若虚著有《慵夫集》，元好问著有《遗山集》、《中州集》、《续夷坚志》、《唐诗鼓吹》等。

金代的家刻有苏伯修刻的《补正水经》，朱抱一刻的《重阳教化集》，王宾刻的《道德经取善集》，常氏刻的《校补两汉策要》，苗君瑞刻的《琴辨》，孙执中刻的《素问玄机原病式》等。

可以纳入私刻的还有著名的《金藏》，因刻于金代而得名。因此“藏”原藏于山西赵城县广胜寺，故又称《赵城广胜寺藏》，简称《赵城藏》。相传为山西潞州女子崔法珍断臂募刻，创刊于金天眷年间(1138—1140年)，至金大定十三年(1173年)前后完成。全藏共682帙，约7 000卷。施主多为平民，总其成者为解州天宁寺开雕大藏经版片。此“藏”1933年才被发现。此前未见文献记载，亦不见公私目录著录。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从日本侵略军铁蹄下抢救运出，新中国成立后提交北京图书馆保存，当时仅4 330卷，经多方搜求，国家图书馆所藏总数已达4 813卷。尚有少数零卷分别藏于国内各地及日本。此外，20世纪80年代山西省图书馆还发现了《大方广佛华严经合论》第六、第四十一两卷，也是难得的金代早期的民刻书实物。

除佛藏之外，金章宗明昌元年(1190年)起，历时两年，在北京天长观，刊印道藏《大金宝都宝藏》凡6 455卷。

元代在个人著述方面，以关汉卿、马致远、郑光祖、白朴为代表的“元曲四大家”，成为文学的主流，关汉卿所作的杂剧有60余种，现存有《窦娥冤》、《救风尘》、《拜月亭》、《调风月》、《望江亭》、《单刀会》、《蝴蝶梦》、《玉镜台》、《金线池》、《谢天香》、《绯衣梦》、《西蜀梦》、《哭存孝》13种；马致远所作杂剧15种，现存《汉宫秋》、《荐福碑》、《岳阳楼》、《任风子》、《陈抟高卧》、《青衫泪》等；郑光祖所作杂剧今知有18种，现存《倩女离魂》、《㑇梅香》、《王粲登楼》、《周公摄政》、《三战吕布》等；白朴所作杂剧今知有16种，现存《墙头马上》、《梧桐雨》、《东墙记》3种，另有词集《天籁集》。被称为“四大名著”的《水浒传》和《三国演义》也是这时产生。

科学方面，郭守敬等的《授时历》和王祯的《农书》也很著名。

元代私家刻书，据叶德辉《书林清话》所记，亦有40多家。著名的刻书如陈忠甫宅所刻《楚辞诸子集注》，成都彭寅翁崇道精舍刻《史记集解索隐正义》，孙存吾如山家塾益友书堂所刻《范德机诗集》，麻沙刘通判宅仰高堂所刻《纂图分门类题注荀子》，李璋所刻《九经》、《四书》，刘贞所刻《大戴礼记》、《逸周书》、《韩诗外传》等。其他如根据旧题记误为宋版实为元私刻本的，有相台岳氏荆谿家塾所刻《春秋经传集解》，东平丁思敬家刻本《元丰类稿》，是至今仍存的著名元代私刻本。

元代私家刻书中，有不少质量是很高的，甚至超过宋本。如平阳梁宅元贞丙申(1296年)刻本《论语注疏》，即比宋十行本好；平水曹氏进德斋大德三年(1299年)刻的《尔雅郭注》(巾箱本)，胜于明吴元恭所从出之宋本；张伯颜刻的《文选李善注》胜于南宋尤袤本；叶曾南阜书堂延祐七年(1320年)刻的《东坡乐府》，胜于宋绍兴辛未(1151年)曾慥刻本。

第三节　宋辽金元的坊间印书

所谓坊间印(刻)书，又称书坊印(刻)书。书坊是古代卖书兼刻书的店铺，是一种具有商业性质的私人出版发行机构。它是由书肆发展而来，据文献记载，早在两汉时期就出现了从事书籍销售的书肆，那时的书籍是以抄录为特征的。印刷术发明以后，首先为民间所采用，于是出现了书坊刻书。书坊的称谓不一，也有称为书林、书堂、书棚、书铺、经铺经坊，或书籍铺、经籍铺、经书铺和文字铺的。凡他们所刻印的书则被称为坊刻本，书坊本或书棚本。

两宋坊间刻书特盛，尤以建安余氏和临安陈氏最为著名。据叶德辉《书林清话》考录，其他见教于诸藏书家志、目、题记者，福建有建宁府黄八郎书铺等七家，浙江有杭州大隐坊等五家，江西有临江府新喻吾氏一家，四川有西蜀崔氏书肆等两家，余陕西、山西各一家，不详其地者有箓斐轩、葛氏传椟书堂两家。

建安余氏是福建著名的出版家，世代刻书，绵延数百年之久，现在可考的宋代余氏刻书者有余仲仁万卷堂，余恭礼、余唐卿明经堂，余腾夫、崇川余氏、余彦国励贤堂等，其中以余仲仁万卷堂最为著名，刻有《尚书精义》、《春秋公羊经传解诂》、《春秋穀梁经传》、《事物纪原》、《礼记注》、《周礼注》、《尚书注疏》、《陆氏易解》、《尚书全解》、《王状元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等。

余氏刻书地点设在建阳县崇化镇，因建阳古隶建安郡，故常以建安称之。距崇化不远又有麻沙镇，建阳所刻之书多在此销售，故世人遂以所出之书以“麻沙本”称之。朱熹《嘉禾县学藏书记》说，“建阳版本书籍，上自六经，下及训传，行于四方者，无远不至”，除经传之外，供科举夹带用的书又“百倍经史”，可见其产量之多，行销之广。因而建阳是宋代三大出版中心之一，更是坊刻本的集中之地。

宋代另一出版中心是杭州。杭州古称临安。临安是南宋建都之地，书铺林立，其中临安陈氏又是其中最著者。陈氏主人为陈起，陈起，亦名陈彦才，字宗之，号芸居，人称陈解元，是南宋临安著名出版家。他的书坊建在棚北大街睦亲坊。其名号有称陈宅书籍铺、陈宅经籍铺、陈解元书籍铺、陈道人经籍铺的。陈起之后，其子续芸继承父业，开肆刻书。陈宅书籍铺所刻书，见于记载和流行至今者，大致可分为三类：唐诗别集、子部杂著和南宋江湖诗集。

现存陈刻唐诗别集，国家图书馆所藏原刻本有：《甲乙集》10 卷，《唐女郎鱼玄机诗集》1 卷，《王建集》10 卷，《周贺诗集》1 卷，《唐求诗集》1 卷；台湾“故宫博物院”藏《常建诗集》2 卷，《于渍诗集》1 卷，《韦苏州集》10 卷；台湾“中央图书馆”藏《唐僧弘秀集》等。据估计，陈刻唐诗别集总数当在 50 种以上。子部各本八种为《画继》、《图画见闻录》、《宾退录》、《湘山野录》、《续世说》、《挥麈录》、《剧谈录》、《灯下闲谈》，另有《释名》一种。南宋江湖诗集的刻印是采取随编随刻的办法，据《永乐大典》所录的有《江湖集》、《江湖前集》、《江湖后集》、《江湖续集》、《中兴江湖集》之名。

与北宋对峙的辽，其出版中心位于燕京，除了官刻的《契丹藏》外，在山西应县佛宫寺所发现的实物中，也有坊刻本的佛经。如《上生经疏科文》题记“燕京仰山寺前杨家印造”，《妙法华莲经》题记“燕京檀州街显忠坊门南颊住冯家印造”。杨家、冯家等是燕京私人经坊，其所刻此二经，当是坊刻本无疑。另一册《蒙求》也是书坊所刻儿童读物。

与南宋对峙的金，其刻书中心在平阳，平阳书坊荟萃，但迄今可考者不多。据历代藏家书目的著录题跋，有书轩陈氏刻宋王惟一《新刊补注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平水中和轩王宅刻《道德宝章》；平阳张氏晦明轩刻《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平水刘敏仲刻《尚书注疏》等。除平阳之外，还有嵩州福昌孙夏氏书籍铺印行的《经史证类大观本草三十一卷附本草衍义二十卷》；见住燕京县角头郑州王家雕印之《草书韵会》(金张天锡撰)等。见存实物据《中国版刻图录》定为金平水坊刻本的有《南丰曾子固先生集》、《重编补添分门字苑撮要》、《萧仙老人明秀集注》、《新修累音引证群籍玉篇》和《刘

知远诸宫调》(以上国家图书馆有藏)。其中《刘知远诸宫调》是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由俄考古学家柯支洛夫在甘肃张掖黑水城一座古塔中发现的，曾被劫往俄国，1958年被送还我国。原书12卷，现仅存5卷42页，是一种民间说唱文学作品。此外还有现藏于圣彼得堡博物馆的《四美人图》和《关羽图像》，分别为平阳姬氏和徐氏所刻，为不可多得的珍贵人物版画，不仅艺术精美，而且代表着中国版画艺术由神像到人像的一大转折，有着重要意义与价值。

入元之后，元代之坊刻本数量也很多。叶德辉《书林清话》说："元时书坊所刻之书，较之宋尤夥，盖世愈近则传本多，利愈厚则业者众，理固然也。"元代书坊刻书主要集中在平水、建阳。平水是金时刻书中心，也是坊刻集中的地方。金时书坊，如中和轩王宅、张氏晦明轩等一些书坊，入元以后，仍继续从业。如中和轩王宅所刻书见于著录的就有元成宗大德十年(1306年)刻《新刊韵略》5卷；张氏晦明轩于蒙古宪宗三年(1253年)刻《增节标目音注精义资治通鉴》等。曹氏进德斋更是元代平水著名书坊，其所刻有巾箱本《尔雅》、《翰苑英华中州集》、《中州乐府》等。此外还有高昂霄尊贤堂刻《河汾诸老诗集》等。

建阳是南宋刻书中心。书坊荟萃之地。元时亦盛。如建阳余氏刻书世代相继，始于南宋终于清康熙间，持续500多年。元代余氏书坊有勤有堂、勤德堂、双桂堂等。其中以余志安勤有堂刻书最多。仅现在国家图书馆所藏就有《分类补注李太白诗》、《集千家注分类杜工部诗》、《书集传辑录纂注》、《三辅黄图》、《唐律疏义》、《国朝名臣事略》、《四书通》、《四书集注通证》等。刘君佐翠岩精舍，也是刻书世家，由元绵延入明，所刻有《周易传义》、《诗集传附录纂疏》、《书集传辑录纂注》、《韩鲁齐三家诗考》等，国家图书馆均有收藏。刘锦文日新堂所刻有《伯生诗续编》、《韵府群玉》等。陈氏余庆堂刻有《宋季三朝政要》、《续资治通鉴》、《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等。虞氏务本堂，始建于宋末，延及明初，元时刻书有《增刊校正王状元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赵子昂诗集》、《新编四书待问》等，另建安虞氏以刊刻平话出名，其所刊刻平话现存有：《新刊全相平话武王伐纣书》、《新刊全相平话乐毅图齐七国春秋后集》、《新刊全相秦并六国平话》、《新刊全相平话前汉书续集》、《新刊全相三国志平话》5种。郑氏宗文书堂也是一家由元入明的建阳著名书坊，刻书较多，著名的有《静修先生文集》、《春秋经传集解》、《大广益会玉篇》等。建于元末的叶氏广勤堂，主要刻书在明朝，而元时所刻的《新刊王氏脉经》为最著。

第十章　宋辽金元的官府藏书

第一节　北宋官府藏书

宋代是我国封建经济发展较快的时期，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为社会经济的繁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国雕版印刷术在宋代非常发达，活字印刷也发明于宋代。手工业书坊兴盛和商业交通发达，为书籍的刻印与流传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因此，宋代官私藏书超越前代，达到我国中世纪的高峰。

一、宋初对图籍的收集

宋太祖、太宗两朝，处于立国初期，他们在削平诸国的军事征战中，注意收集各国遗留图籍，用以充实官府藏书。乾德元年(963 年)平荆南，收高氏图书，以充实三馆。乾德三年(965 年)平后蜀，右拾遗孙逢吉赴成都收后蜀图书 13 000 卷。开宝八年(975 年)平南唐，令太子洗马吕龟祥至南唐京城金陵，收其图书 20 000 余卷。吴越钱俶来朝，又收吴越图籍。太平兴国四年(979 年)平北汉，由左赞善大夫雷德源入太原，点检书籍图画。据《玉海》记载：宋初皇室有书万余卷，通过对五代十国图籍的征集，图书数量激增，开宝中(距建国十余年)朝廷图书即增至 8 万卷之多。

不仅如此，宋太祖等还广泛地收集民间藏书，充实馆藏。乾德三年开始征集遗书，四年又继续征集，当时规定，凡有书来献者，视其书籍价值，如为馆阁所无，则将献书人送学士院试问吏理，堪任官职者俱以名闻。如《三礼》涉弼、《三传》彭干、学究朱载三人献书 1 228 卷，并赐科名。

二、北宋官府藏书系统

1. 崇文院

宋太宗即位后，到原三馆馆址巡视，看到三馆馆址"湫隘卑庳，仅蔽风雨，周庐徼道，出于其旁。卫士驺卒，朝夕喧杂。每受诏撰述，皆移他所"。太宗曾感叹地说："若此之陋，岂可蓄天下图籍，延四方贤俊耶。"即决定在左昇龙门东北旧车辂院别建三馆。当时"其栋宇之制，皆亲所规画"，并"命中使督工徒晨夜兼作"。不到一年，国家藏书的专门处所便建设起来了。太平兴国三年(978 年)二月正式赐名崇文院(《文献通考·经籍考》)。崇文院建成后，采取了下诏征集图书，公布缺书目录，收集公私新撰图书和政府出版物充实馆藏等方法，使图书数量和质量都有了很大提高。崇文院建成之后 15 年，宋太宗到秘阁巡看，"观群书整齐，喜形于色"。谓侍臣曰："丧乱以来，经籍散失，周孔之教，将坠于地。朕即位以后，多方收拾，抄写购募，今方及数万卷，千古治乱之道，并在其中矣。"(《麟台故事》卷一《储藏》)

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 年)四月，宫中火灾，馆阁图书毁失。另在右掖门外安置崇文院，故称崇文外院。当时派王钦若等抄补书籍。九年(1016 年)冬，新作崇文院，馆阁复而外院废。景佑元年(1034 年)，令张观等对馆阁藏书复校。二年，上奏经史 8 427 卷；三年，上奏子集 12 366 卷。到庆历初年时，编成《崇文总目》，著录图书 30 669 卷。元丰五年(1082 年)，崇文院改为秘书省，经籍图书由秘书郎主管，编辑校勘由校书郎主管。此后，朝廷征书、校勘等事，持续到北宋末年。

崇文院的建设在宋代朝廷建筑中是很突出的。《玉海》称崇文院"轮奂壮丽，甲于内庭"。全院布局是"东廊为昭文书库，南廊为集贤书库，西廊为史馆书库，凡六库，分经、史、子、集四部。正副本凡八万卷"。六库书籍皆用雕木为架，青绫帕幂之。馆内藏书原无定制，后来为便于出借和保藏，编定图书一律用黄纸写成大字本册。沈括曾称，秘阁藏书怕人们借书不还和盗窃，故用黄纸大册本，使私人再不敢收藏。

2. 秘阁

北宋除崇文院外，还建立有秘阁。秘阁始建于宋太宗端拱元年(988 年)，分三馆书万余卷藏之。宋太宗淳化三年(992 年)八月增修秘阁。秘阁新建后，崇文院与秘阁统称馆阁，即三馆与秘阁之合称。宋仁宗时，秘阁藏书达 36 200 卷。

秘阁亦可称作国家藏书的特藏书库。秘阁收藏图书大致有三类，一类是

原三馆的真本，即经过校订的图书，有精本的意思；二类是书画真迹；三类是天文占候等方术之书，即朝廷当时的禁书。宋太宗端拱元年(988 年)，秘阁中有三馆真本书万余卷，天文占候等类书 5 012 卷，古书画有 114 轴，这些书画包括有晋王羲之、王献之，唐代唐太宗、唐明皇、颜真卿、欧阳询、柳公权、怀素、怀仁的墨迹，顾恺之、韩干等的名画，可见秘阁藏品质量之高。

3. 宫廷藏书

宋代宫廷藏书甚多，设置这些藏书殿阁的目的是提供皇帝使用，即所谓“退朝之遐，聚图书以自娱”。同时，这些殿阁也是纪念性的，即收集前期皇帝的遗物和遗作，加以保存。宫廷藏书中收集的藏品有：(1)前朝皇帝的诗文、诏令等集子；(2)正经、正史等常用书；(3)古画书法真品。宋宫廷藏书有：

太清楼　宋太宗于太平兴国四年(979 年)自建宫廷藏书处，专门收藏“御制及墨迹石本九百三十四卷轴，四部群书三万三千七百二十五卷，其后群书增及一万一千二百九十三卷，太宗御集、御书又七百五十三卷”(《玉海》卷一百六十四)。此后，楼内藏书不断有所增加。

龙图阁　宋真宗纪念宋太宗的专门宫殿，建于宋真宗咸平初，阁内图书计有“太宗御制御书并文集，总五千一百一十五卷轴册，又有御书素扇数十。其下列六阁：经典阁，总三千三百四十一卷；史传阁，总七千三百五十八卷；子书阁，总八千四百八十九卷；文集阁，总七千一百八卷；天文阁，总二千五百六十一卷；图画阁，总七百一轴卷册；图画阁一本作瑞物阁，奇瑞二十三，瑞木十六，众瑞一百一十三，杂宝一百九十五”(《玉海》卷一百六十三)。可见，龙图阁藏书相当丰富。宋真宗经常到龙图阁观书。如咸平五年(1002 年)十月十七日，真宗观书龙图阁，并到崇和殿，据称殿之后阁收藏大量本朝名臣的文集。祥符三年(1015 年)八月八日，观书龙图阁，并有设宴和写诗唱和之举。

天章阁　此阁建于宋真宗天禧四年(1020 年)。宋仁宗即位后，成为纪念宋真宗的专门宫殿。阁内收藏大致是图籍、符瑞、宝玩之属，此处还存放国史、宗正寺所进属籍(《宋史・职官志》)。

此外还有：宝文阁，是纪念宋仁宗而建；显谟阁，是纪念神宗皇帝而建；徽猷阁，是纪念哲宗皇帝而建；敷文阁，是纪念徽宗皇帝而建。以上四阁连同龙图阁、天章阁，称为六阁。南宋时，宫廷内也先后建立一些纪念性的建筑，其功能也是收藏御制文集及其他图籍，但其规模远不如北宋时的六阁。

三、官府藏书的补充和整理

宋太宗建立了崇文院及秘阁后，还不断采取各种措施充实官府藏书并进行多次校理，使藏书逐步丰富，管理制度不断完善。此后，各朝皇帝依此故事，使官府藏书逐步发展。

太宗雍熙元年(984年)，为使三馆藏书逐步充实，曾下诏天下，征访阙书。当时是以《开元四部书目》为准，检阅该书目所无，即为阙书，提出以亡书300卷来上者，分别才质(智)高下加以录用，并据征书卷帙之多寡加以奖励，如书籍不愿送者，可以送官抄录，然后归还书主。至道元年(995年)，宋太宗又派裴愈往江南两浙诸州，访求图籍。真宗景德三年(1006年)诏求遗书，仁宗嘉祐五年(1060年)又诏求遗书，嘉祐六年(1061年)，搜访遗书，编有《嘉祐搜访阙书目》一卷，作为搜访根据。到北宋末年，宋徽宗亦曾诏求四方遗书。徽宗宣和四年(1122年)诏令郡县访遗书，曰："令郡县谕旨访求，许士民以家藏书在所自陈，不以卷帙多寡，先具篇目，申提举秘书省以闻，听旨递进，可备收录，当优与支赐。或有所秘未见之书，有足观采，即命以官，议加崇奖，其书录竟给还。若率先奉行，访书最多州县，亦具名闻。"(《文献通考·经籍考》)诏令颁布后，宣和五年(1123年)张颐进书221卷，李东进书162卷，皆系阙书，两人均得到赏赐，张赐进士出身，李补迪功郎。

官府藏书的整理是持续不断进行的，宋太宗在建立崇文院后，就曾命人进行藏书整理。如端拱元年(988年)命孔维等校《五经正义》，真宗咸平二年(999年)，命邢昺等校定"七经义疏"。各种经书校定后，分别加以刻印。如真宗咸平四年(1001年)给州县学及聚徒讲通之所各赐"九经"一部；邢昺重校完"七经义疏"后，对官府藏书的整理工作更是频繁。如太宗淳化二年(991年)秘书监李至进新校御书380卷；真宗咸平五年(1002年)择官于崇文院校勘书籍，动用官吏多人；景德元年(1004年)直秘阁黄夷简等上校勘新写御书24 162卷。进行这些工作时，不仅选录官员要经吏部考核，而且校勘官员有朝廷供给膳食，完成后还重加奖励，并迁升官职。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欧阳修任职秘书省时，曾说到嘉祐元年，朝廷曾经对秘阁图书进行补写、装潢，但实际效果不佳，"今馆宇阒然，尘埃满席"。所以他建议要选请官员，把秘阁书目与《崇文总目》核对，如有缺失，应从三馆借来抄校，并复校、装潢，最后入藏秘阁。

崇文院的藏书是允许出借的，咸平年间，宋真宗曾说："近闻图书之府，甚不整齐，假借之余，散失尤多。"朝臣朱昂等奏称：四部书为朝臣所

借者凡460卷。真宗要主管官员“严行约束，杜绝因循”，并促还馆内(《宋会要辑稿·官职》十八之五)。宋仁宗嘉祐时吴及上言内臣等借出书籍，亡失已多(《宋会要辑稿·崇儒》四之八)。这些都说明，当时馆内图书借阅流通较多。

根据文献记载，崇文院藏书都可借出使用。但宋哲宗元祐以后，规定只集贤书库藏书作为借本书库，其余不得借出。借书管理不仅有专人(称“库子”)，而且书籍出入书库，也有检查制度。如宋徽宗政和四年(1114年)蔡攸奏“今来已降指挥，书籍出入，并监门具单子搜检出入等”(《宋会要辑稿·职官》十八之七)。说明当时带出书籍需经“监门”根据单子放行。

四、馆阁藏书的利用

宋代的馆阁藏书，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利用：

第一，公开借阅流通。馆阁的读者有：皇帝及其近臣、官吏，特许在馆读书的人，政府高级官僚，殿试科举考生。这些人利用藏书目的不同，而进修学业和从事编纂活动则是主要的方面。

第二，为公私著述提供资料。宋太宗时编纂《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宋真宗时编纂《册府元龟》，都是利用崇文院的藏书。如司马光编《资治通鉴》时，就曾于崇文院设馆，借阅龙图阁、天章阁和三馆、秘阁书籍；沈括、欧阳修等从事科学、史学的研究，也曾充分利用了馆阁藏书。

第三，编制朝廷藏书目录。如景祐至庆历间组织编撰的《崇文总目》，政和年间纂修的《秘书总目》等。这些朝廷藏书总目，是集合三馆、秘阁等书籍统一编成，既可供读者借阅时参考使用，也是皇朝文治盛事的记录，都是由馆阁组织编纂的。

第四，提供正本用于出版。馆阁藏书不时校勘整理，书籍的内容错误较少，所以，凡官方出版图书，往往以馆阁校勘的定本作底本刻印。

五、宋代秘书监和馆阁制度

汉魏以来，朝廷设秘书监管理图书典籍事务。秘书监在朝廷中有显要地位，官员亦待遇隆厚。唐代藏书设立集贤院、弘文馆等，按馆、阁分别安排官员管理，秘书监退于次要地位。宋代基本上承袭唐代旧制，虽有秘书监，但三馆、秘阁和六阁等都分别配置官员各司其事，秘书监只是徒有其名而已(但个别时候也有例外)。馆阁职务是一个“肥缺”，地位颇高，是晋升高级官僚的重要途径，也是进行学术著述和个人进修的好场所。北宋到南宋，一

些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大多侧身馆阁。

宋代馆阁设立与秘书监职能的变迁，大致经历了几个阶段。其一，北宋至元丰改制，朝廷中秘书监依然存在，但因崇文院和秘阁陆续建立，并设立专门官员，故秘书监职能削弱，秘阁官员代替秘书监职能。“淳化元年，诏秘阁次三馆，秘书省仍隶京百司。时秘书虽有监、少监、丞、郎、校书郎、正字、著作佐郎，皆以为寄禄官，常带出入。郎官至秘书监，有特令供职者，有以他官兼领者，有以判秘阁官兼判者。凡邦国经籍图书悉归秘阁，而秘书所掌，常祭祀祝版而已。”(《文献通考》卷五十六)其二，元丰改制至北宋末，恢复秘书监职能，改崇文院为秘书省，罢馆职，三馆职事由秘书省统一领导，设立秘书监、秘书少监以至正字等官，并规定校领他局，专管图书典籍之事。其三，南宋时期，仍设立秘书监、少监和其他官员，管理图书典籍事宜。

现把北宋馆阁职务说明如下：

各馆阁设立专官，官员为大学士，如集贤院大学士、昭文馆大学士。秘阁领阁事，兼领者居多。三馆秘阁中还有直昭文馆、直秘阁、集贤院直学士，是直接负责馆阁事务的官员。此外，还有校理，称集贤校理、秘阁校理，负责图书编纂校勘事务，升迁即为直昭文馆、直秘阁等官。下级官员则为正字、检阅等。以上统称为馆职。

元丰改制以后，秘书省设秘书监、少监、丞、郎等，其具体职务分工是：秘书监统管朝廷图书典籍事务，与前举各馆阁大学士相当；秘书少监及秘书丞，掌参领书籍国史天文历数之事，与前举各馆阁之直学士相当；秘书郎掌校图书分贮，与秘阁校理职务相当；校书郎或正字掌校雠典籍，刊正讹谬，为具体从事图书校勘的官员。南宋沿袭秘书监的设置，有时人员有所增加。宋代馆阁职位是很优越的，洪迈曾称“国朝馆阁之选皆天下英俊，然必试而后命，一经此职，遂为名流”(《容斋随笔》)。这是由馆阁在朝廷中的地位决定的。宋英宗也说过“馆职所以育俊才”(《麟台故事・选任》)。说明建立馆阁“延四方贤俊”，也就是培养和储备统治阶级高级人才。因此，担任馆职，既可利用藏书进修提高，又较易获得封建统治者的重视和信任。

馆职选任是很严格的，一概在科举高第或现任官员中挑选，且必须经过考试，如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 年)，王钦若、陈彭年等抄写校勘三馆秘阁书籍，朝廷为了补充馆阁人员，命吏部挑选送京官与地方州县官有才学者，先初试挑选，然后送学士院试诗赋论，合格后才能担任三馆秘阁的低级官员。担任馆职后还要接受考核，成绩优秀者才得以升迁。但真正担任要职的究属少数，大量的是经过一段时间考核，另行派往地方任职。欧阳修在宋

仁宗庆历年间曾说:"臣窃见近年外任发运转运使、大藩知州等,多以馆职授之。"但是,馆阁中也不断发现一些人假冒成果,希望得到重用,或者本人是贵家子弟,并无真才实学,滥竽充数。故欧阳修提出,对馆阁人才也应量才录用(《欧阳修全集·论举馆阁之职劄子》)。

宋代皇室藏书最著名的是龙图阁、天章阁、显谟阁、徽猷阁等,阁中分别设立大学士,如龙图阁大学士、天章阁大学士等,是一种荣誉很高的兼领衔头,下设阁直学士、待制等官,具体做一些文字整理及典籍保管等工作。

第二节　南宋官府藏书的重建

一、南宋馆阁的重建

1127 年,赵构于浙江登位,是为建炎元年。因建都南方,故称南宋。从 12 世纪初至 13 世纪后期,北方有金、北辽、西辽和西夏等国,一直与南宋对峙,南北各方分别建立有自己的官府藏书体系。

"靖康之难,而宣和、馆阁之储,荡然靡遗。"(《宋史·艺文志序》)当时,朝廷南迁,政府更迭,加之遭受兵火之灾,官府藏书遭受损失是极大的。所以,宋高宗以后的几代皇帝,继承北宋重视典籍传统,都曾采取一系列的措施,重建官府藏书系统。第一,重建秘书省。据文献记载,绍兴元年(1131 年),赵构在越州驻跸时"始复秘书省"。绍兴二年(1132 年),则在杭州安置秘书省,放置从北方迁移至此地的图籍。绍兴十三年(1143 年),新建秘书省落成。绍兴十四年(1144 年),迁入新省。在秘书省这组庞大的建筑物中,有秘阁书库,又有分经史子集的藏书库,还有印本书库等,保存着秘书省所属机构的珍贵典籍、古书画珍品和所编印的出版物。秘书省成为典籍文物保存之所和国史、著作的修纂之所。第二,厚奖献书者。北宋建国初,有重奖献书者之政策,南宋仍然继续执行。绍兴三年(1133 年),曾提出凡献书者,酬以厚奖。绍兴十六年(1146 年),新的秘书省建立后,为征集藏书和珍贵藏品,提出凡献出晋唐墨迹珍本者,或献出秘阁缺书善本及 2 000 卷,不及 2 000 卷以上者,献出者可以得到官职,或给以金钱补赏,这种政策出台后,也曾收得一些珍贵书画和珍本秘籍。第三,补写典籍。绍兴十四年(1144 年),秘书省内设补写所,补写所在北宋时,是抄写求访到的书籍,南宋时,其任务是书写校勘黄本书籍,总之,是补充朝廷需要的重要典籍。第四,访求遗书。南宋朝廷针对当时典籍收藏的具体情况,多次访求遗书,如有针对性地找一些故家大族、名臣显宦征集图书。绍兴二年访得贺铸之子正在出售

所藏的书籍，秘书省得以买下人藏，贺铸之子还献上藏书5 000卷。又有福州前故相余深等人所藏《国史》，秘书省也予以征集。绍兴十三年(1143年)，又访得陆游之子所藏家书3 000卷。此后还有多次征集图书之事。方建新估计：南宋期间，中央政府主动征集到的图书有4万余卷。①

南宋秘书省的规模相当大，陈骙《南宋馆阁录·省舍》记载：秘书省在清河坊糯米仓巷西，怀庆坊北，通浙坊东。有右文殿、秘阁、道山堂、石渠等一组建筑“东廊凡四十二间……次三间为秘阁书库(内设绿橱八，藏秘阁书)。……次五间为子库(内设绿橱七，藏书)。次五间为经库(内设绿橱七，藏书)。……西廊凡四十三间……次二间为秘阁书库(内设绿橱八，藏秘阁书)。……次三间为印版书库(内设绿橱七，藏诸州印版书)。……次五间为集库(内设绿橱七，藏书)。次五间为史库(内设绿橱七，藏书)。”此外，还专有收藏圣政、会要、日历、御制御折等的专门书库，保存古书法名画的图画库。按此记载，秘阁书库有3组共10间房，经、史、子、集库4组24间房用于藏书。其数量，秘阁有御札607轴，35册，5道。《太上皇帝圣政》61册，《日历》1 002册。经、史、子、集四类13 506卷，3 958册。……御前书经、史、子、集四类2 502卷，614册(附秘阁东西库)。四库书经、史、子、集23 583卷，6 512册。续搜访库经、史、子、集23 145卷，7 456册。诸州印板书6 098卷，1 721册。(《南宋馆阁录·储藏》)

二、南宋馆阁之管理

秘书省，它的工作范围是相当宽泛的，如编写实录、国史，还有编辑、印刷各种图书，及图书的征集、整理、校勘、编目，提供朝廷官吏学习和参考等。所以，这里只就典籍管理方面谈谈。

1. 重视藏书校勘

校勘图书是官府藏书最重要的工作之一。作为朝廷藏书中心机构之秘书省，不仅要校勘本省所藏典籍，而且要提供典籍给其他藏书机构之用，所以，校勘工作是经常性的。南宋秘书省对于校勘，还有一套严格的工作程序。如吏部选定校勘人员，以保证人员的水平和工作稳定。派遣官吏评定正本，按《校雠式》的要求进行。每官点完书籍，分别署名，并及时上报等。这样就保证了所校书籍的质量。

2. 严格出借制度

可能是出于靖康之变，图籍散失严重的教训，南宋馆阁所有书籍，严格

① 傅璇琮，谢灼华主编．中国藏书通史[M]．宁波：宁波出版社，2001：321.

控制借出。如绍兴元年(1131 年)，朝廷规定秘阁书除供禁中外，不许本省官及诸处关借，“虽奉特旨，亦不许关借”。绍兴二十七年(1157 年)，秘阁之书仍不准外借。但是，秘书省之书和秘阁之书在利用上有所区别，秘书省之书允许本省官吏就省阅读。

3. 严格书库管理

当时规定有：(1)每月由秘书省官员上阁检阅，这主要考虑阁内收藏有大量重要典册，必须经常检查。(2)每月由秘书省官员入阁检视书籍。(3)借出书籍，“许从监、少置簿，有欲关文籍为检阅校正等用，即先批簿，以凭请取。俟还本库，随与点收。或借出已久，亦需检举，以察隐遗”(《南宋馆阁续录·储藏》)。(4)有“供校御前书簿”、“诸库关书簿”等把书籍流通之情况记录在案，以备查阅。

4. 定期曝书制度

“入夏曝晒书籍，自五月一日为始，至七月一日止。”以后又定每年七月七日为曝书之日，由秘书省官员集中举行仪式，把所藏典籍清理晾晒，如遇雨则改期。为保证此举，朝廷每岁必拨付经费，曝书会还赠来宾《太平广记》、《春秋左氏传》各一部，秘阁、石渠碑二本。

秘书省官吏很多，首有秘书监、少监，又有秘书丞、著作郎、秘书郎、校书郎和正字等官。具体工作人员有都孔目官、孔目官、四库书直官、书库官、楷书等。从这些官员名目看，南宋秘书省设置的官吏，是延续北宋元丰改制后秘书省之官制而定的。

三、南宋馆阁之利用

南宋秘书省的设置，受到朝野上下的重视，南宋历朝皇帝沿用祖宗旧制，把秘书省的建设当做一件大事来做。如绍兴十三年(1143 年)，下诏求书时，宋高宗曾说：“国家用武开基，右文致治……朕虽处干戈之际，不忘典籍之求。”更重要的是南宋秘书省建立后，曾经在社会政治、社会生活和文化学术等事务中担负着重要角色。如：(1)供皇帝检阅，一般皇帝到秘阁巡视，亦对修撰典籍、提倡阅读等事给以鼓励。(2)集中对典籍校勘整理。(3)编写目录，淳熙五年(1178 年)《中兴馆阁书目》编就，嘉定十三年(1220 年)《中兴馆阁续书目》完成。(4)参与朝廷事务，如朝廷殿试时，馆阁提供书籍入殿供参考，又有朝廷中关于政令、礼制、典故、官制等各方面问题的研究，秘阁都参与讨论。(5)接受青年士子读书，如王克勤、陆特之、沈省曾都是官宦之子，特许他们于秘书省利用藏书。馆阁中对于朝廷国史、实录的修撰，对于朝廷编纂典籍之参与和协助，则是秘书省的经常工作。

第三节　辽金元官府藏书

一、辽朝

辽早在契丹耶律亿(阿保机)时，就曾着手图书的收集。当时，他购买汉文图书1万余卷，并命人创造契丹文字，翻译了一部分汉文图书。辽太宗耶律德光(927—947年)灭后晋，尽收后晋藏书北运，皇室藏书得以补充，以后屡加充实。辽道宗时(1055—1101年)，皇室藏书亦具有一定规模，并下诏求书刻书，命儒生校定经籍，从此，皇室藏书成为辽统治区内藏书最丰富的地方。

辽朝廷设秘书监管理图书典籍事宜，下有秘书郎、校书郎、正字等官，又有昭文馆，设昭文馆直学士。

二、金朝

金于公元1125年灭辽，尽收辽皇室藏书。金太祖天辅五年(1121年)时，完颜阿骨打就曾说："若克中京，所得礼乐仪仗图书文籍，并先次津发赴阙。"(《金史·太祖纪》)说明其早对图书典籍的收集有所重视。金太宗天会四年(1126年)，完颜晟等攻克北宋都城开封。天会五年(1127年)，掳获宋徽宗赵佶、宋钦宗赵桓并皇族宗室400多人，并将宋皇室大批图书文物押运至北方。后来，金与南宋议和，公开提出索取三馆、秘阁图书。南宋朝廷派鸿胪卿康执权、少卿元当可、寺丞邓肃押运佛经道经书版，校书郎刘才、邵溥宿、国子监主簿叶将、博士熊彦诗、上官悟等五人，押监书印版，并馆中书籍送给金廷。当时，金对"明堂九鼎观之不取"，"止索三馆文籍图书，国子书版"(《靖康要录》卷十五)。这样，宋代馆阁藏书，逐步被金索取而去。这些书籍北运时，也有损失。

金不仅收集宋朝藏书，还通过各种方式征集图书，规定购买民间之书，适当给偿价值。如有藏书家珍惜所藏不愿售卖则由官府抄写后，发还本人，仍给书价之一半，以资鼓励。此外，还设立译书院等翻译儒家经典，这样皇室藏书得以大量增加。

金还设立秘书监管理朝廷图籍之事，职官有秘书监、秘书少监、秘书丞、秘书郎等。

三、元朝

公元13世纪初，我国北方少数民族蒙古族兴起，取代金，南侵宋，远征欧亚大陆，建立了一个版图辽阔的大元帝国。蒙古贵族在中国本土所建立的政权，政治上残酷镇压汉族人民，经济上也使长期发展的封建经济遭受巨大的摧残，但元代统治者鉴于历代帝王统治的经验教训，对儒家经典和文化教育的发展，仍给予一定的重视。因此，官府藏书在承袭金代遗留典籍和掠取宋朝藏书的基础上，有了较大发展。

元太宗时(1229—1241年)，曾在平阳建立经籍所，编纂经史。太宗五年(1233年)，掠取金的皇室藏书。元世祖至元十二年(1275年)，在南宋王朝灭亡之际，又多方掠取宋官府藏书。据载，至元十二年二月，得督府图籍。九月，以玉昔帖木儿为御史大夫，搜刮江南诸郡书及临安秘书省《乾坤宝典》等。宋军败走时，伯颜曾追杀，得宋船2 000余艘，收罗了大量军器及图籍符印。至元十三年(1276年)二月，伯颜派员收集宋朝宫廷官府诸藏，如命内侍王埜人宫，收宋宫中图籍宝玩，命焦友直收秘书省禁书图籍。三月，伯颜如临安，命郎中孟祺等收秘书省、国子监、国史院、学士院、太常寺等机构的图书文物。

此外，元统治者还广收各地图书，如命湖南卢挚收江南诸郡四库精善书，运至大都，藏于兴文署。又有福建等处送书至朝廷。至元十五年(1278年)四月，准集贤大学士许衡奏，遣使至杭州等处，取在宫书籍刻版至京师。经过接受前朝遗书，收罗四方典籍，特别收集到南宋的刻印书版，元官府藏书数量大增，当时，藏书处如奎章阁、崇文院等藏书都很丰富。元代的藏书量是很多的，但官府藏书不注意管理，也没有组织校勘整理，因此，藏书质量不佳。其藏书数量，据至正二年(1342年)统计，在库书，经121部，1023册；史79部，1 724册；集57部，1 724册；道书303部，402册；医书14部，171册；方书8部，152册。又有先次送库书12部，478册。后次发下书1154部，10 634册。续发下书642部，7 510册。

元代设秘书监管理朝廷图书典籍事宜。官员有秘书监、秘书少监、秘书监丞、秘书郎等，宏文院、集贤殿亦各设有官员分别管理各机构的藏书。

第四节　宋元私家藏书的发展

我国自唐初发明雕版印刷技术以后，普及于民间，乃是在晚唐至五代时期。北宋建国后，印刷技术非常发达，一方面，全面接受、整理前代文化遗

产，文化学术相当繁荣，所以，各种著作充斥市场；另一方面，因为典籍易得，藏品可求，这必然促使藏书风气盛行，藏书万卷的藏书家并不少见。因此，我国私家藏书在宋代出现了崭新的局面。

当然，私人藏书的发达，也有赖于社会经济文化的高度发展。宋代私家藏书出现世代藏书、家族藏书的重要现象，是因为作为封建社会最重要的基层单位的家族，藏书是面向全家最重要的基本建设，积德、育才是家族的重要投资。如果没有雄厚的财力支撑，私人藏书是难以维持的。同时，交通的发达，市场的开放，文人学士的需要，也是发展藏书的基本条件。但是，这些都有赖于比较安定的社会环境。北宋末年的金兵干扰，中原大地屡遭战火之灾，所以，“靖康之变”是南北私人藏书发展的重要分界。

宋时，陆续有藏书家记载士大夫的藏书故事，为我们了解宋代私人藏书的情况提供了直接的材料。南宋末，周密在《齐东野语》一书中说：“宋承平时，如南都戚氏、历阳沈氏、庐山李氏、九江陈氏、番易(禺)吴氏、王文康、李文政、宋宣献、晁以道、刘壮舆，皆号藏书之富。邯郸李淑五十七类二万三千一百八十余卷，田镐三万卷，昭德晁氏二万四千五百卷，南都王仲至四万三千余卷，而类书浩博，若《太平御览》之类，复不与焉。次如曾南丰及李氏山房，亦皆一二万卷。”他又介绍其居家所在地吴兴的藏书家，“故家如石林叶氏、贺氏，皆号藏书之多，至十万卷。其后齐斋倪氏、月河莫氏、竹斋沈氏、程氏、贺氏，皆号藏书之富，各不下数万余卷”。周密所提到的全国各地的藏书家，也只是他了解的一部分。方建新以潘美月所著《宋代藏书家考》所列128人为例，对宋代藏书家的地区分布作了分析，他说：北方的河南16人，河北6人，山东5人，安徽(长江以北)7人，江苏(长江以北)7人，山西2人，陕西1人，共44人。南方的浙江31人，江西15人，福建12人，江苏(长江以南)8人，四川7人，湖北3人，湖南2人，共78人。总的情况是，南方多于北方近一倍。其中以浙江最多，河南第二。① 宋时，北方以河南开封为都城，南方以杭州为临时都城，作为皇朝都城，有充分的物质资源，有繁荣的书市，有众多的官吏和文人学者，必然会出现藏书群体。与此同时，南方经济的发展，造纸业的兴盛，印刷技术的发达，出现有所谓浙版、闽版和蜀版，也就促成了这些省份出现不同的藏书群体。以下分别从北宋和南宋分时期介绍私人藏书的发展情况。

① 傅璇琮，谢灼华主编. 中国藏书通史[M]. 宁波：宁波出版社，2001：354(按：文中有6人未统计).

一、北宋私家藏书

北宋初年，江正曾在江南越州、安陆等地当官，最后在安陆定居。江正任越州刺史时，曾得到钱氏时之书，以后到江南各地也收到不少图书，故藏书达数万卷。又以王溥、李昉、杨徽之和宋绶、宋敏求父子尤为突出。宋绶首先得到杨徽之的赠书，以后又收得毕文安的藏书，家藏图书达万卷以上。其藏书“择之甚精”，“校雠精审胜诸家”。宋绶子宋敏求继承父志，致力于藏书，其藏书达3万卷，特别是唐人诗集最多。藏书皆校雠三五遍。朱弁称宋家藏书可供士子阅读，人们争相住于春明坊他家附近，致使此地房价高于他处(《曲洧旧闻》)。

宋仁宗时，藏书家遍及南北各地。王洙、王钦臣一家藏书颇多，徐度《却埽编》称：王钦臣藏书达43 000卷，像《太平御览》等类书还不包括在内。他是这样积累藏书的：“每得一书，必以废纸草传之，又求别本参校，至无差误，乃缮写之。”每册书以鄂州蒲圻县纸缮写，每本三四十页，厚薄适中，这个本子是提供外借或子孙阅读的。又另写一本，尤精好以绢素装背，号为镇库本，这种镇库本约有5 000卷之数。北宋藏书家群体中，有部分是皇族子孙的藏书家。如昌王赵宗晟，“好古学，藏书数万卷，仁宗嘉之，益以国子监书”(《宋史·宗室传》)。又有荣王赵宗绰，藏书7万卷。其书传至赵仲糜时，有人发现，仅其家藏目录的一部分，就记录其藏书除监本外，写本、印本书就有22 836卷。

北宋众多藏书家中，其中有一部分是文人学者型的藏书家。如史学家司马光，《资治通鉴》的编写者，家藏文史类书籍万余卷，他保护图书的措施一直为后代藏书家所称道。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时的助手刘恕，也是著名藏书家。刘恕积极向别的藏书家借阅传抄，一方面解决研究中的疑难问题，另一方面也补充了自己藏书之不足。又如文人姚铉，藏书甚多，颇有异本，他编辑的《唐文粹》100卷，正是他对唐代文献进行选择的文章总集。又如词人晏殊，人称其藏书都经过他亲手校雠，所以，除去重复外，连注解类文字亦加剪裁，故其藏书堪称善本。他的儿子晏几道也是一个藏书家。词人贺铸，人称其藏书万卷，手自校雠，无一字脱误，传至其子时，值南宋秘书省征集图书，他把书献上，此举对于秘书省图书的补充很有好处。庐山李公择，聚书9 000余卷，藏于庐山五老峰下白石庵，以供士子利用。他的这种做法，受到苏东坡的赞扬。

北宋末年，靖康之变，官私藏书遭受重大损失。私人藏书因兵火之灾，加上迁徙时搬动不便，或因家道中落等不可抗拒的原因，藏书散失非常严

重。正如陆游在《跋京本家语》中所说的："收书之富，独称江浙，继而胡骑南鹜，州县悉遭焚劫，异时藏书之家，百不一存，纵有在者，又皆零落不全。"这里只列举几家经历丧乱、藏书散失的藏书家的情况，据此可以了解战乱对于典籍的影响。叶梦得，原居住于吴兴，"余家旧藏书三万余卷。丧乱以来，所亡几半。山居狭溢，余地置书无几，雨漏鼠啮，日复蠹败。今岁出曝之，阅两旬才毕"(《避暑录话》卷上)。赵明诚，"后连守两郡，竭其俸人以事铅椠，每获一书，即同共校勘，整齐签题"。李清照记述他们藏书散失的情况。"建炎丁未(1127 年)春三月，奔太夫人丧南来，既长物不能尽载，乃先去书之重大印本者，又去画之多幅者，又去古器之无款识者。后又去书之监本者，画之平常者，器之重大者……建炎己酉(1129 年)夏五月……时犹有书二万卷，又金石刻二千卷……冬十二月，金人陷洪州，遂尽委弃。所谓连舻渡江之书，又散为云烟矣。"(《金石录后序》)从李清照的叙述中，可以看到一个藏书家藏书散失的惨痛经历。

二、南宋私家藏书

南宋时，浙江福建两地，藏书家颇多。而四川一地也有不少藏书家。晁氏一家，原住京师，传到晁公武时，避乱入蜀，尽得蜀地之书，且得到井度之旧藏，家藏书达 34 500 卷。晁公武对所读典籍写成提要，因时在荣州郡斋，故名为《郡斋读书志》。又浙江有江南三家，左丞陆氏，即陆佃、陆宰、陆游之家族藏书。又有尚书石氏，即石公弼之藏书。又有进士诸葛氏，即诸葛行仁。由于他们均是藏书世家，故南宋初建秘书省时，曾进献或折卖数量达千卷之图书给官府，有力地补充了秘书省藏书。

处于海滨之江苏、浙江、福建，当时因书籍比较容易购置，且藏书家之间也可相互交流，故藏书之家颇多，如福建有郑樵，又有莆田人方氏、林氏、吴氏等，都为陈振孙、周密所提及，可见积累至富。江苏无锡人尤袤，藏书至多，李涛称其好书，且勤于抄书和校勘，除自己抄录外，还叫家人一起抄书，也就是把读书、抄书当成一种爱好。其所谓之：把典籍"饥读之以当肉，寒读之以当裘，孤寂而读之以当友朋，幽忧而读之以当金石琴瑟也"。反映了宋时读书人藏书之情趣，也是藏书家终生努力，珍护所爱的表白。浙江有陈振孙，曾任地方官吏和宫廷中宝章阁待制。特别在浙江、福建任官时曾得到散出之书和借抄部分藏家之书，故所藏达 5 万余卷。他编写的书目称《直斋书录解题》，该书目一直受到后人重视。南宋末，浙江吴兴之周密亦为藏书之家，他曾说自己家族之藏书："吾家三世积累，先君子尤酷嗜，至鬻负郭之田以供笔札之用。冥搜极讨，不惮劳费，凡有书四万二千余

卷，及三代以来金石之刻一千五百余种。庋置书种、志雅二堂。"（《齐东野语》）从这里可以看出其藏书之大概。

辽金时，因地处北方，本土著作不多，典籍得来不易，没有比较有影响的藏书家。诗人元好问，家藏书甚多，经兵火之灾，存留仍有千余册，他的藏书受到很好的保护，并得到充分的利用。元统一全国后，民族压迫深重，一般士人藏书、读书极为普遍。当时南方比较著名的藏书家有苏州张雯，家中"构楼蓄书其上，上经史子集，下逮稗官百家之言，无不备"（《侨吴集》卷十二《张子昭墓志铭》）。又有庄肃，家居松江，"性嗜书，聚至八万卷"。北方则有赵孟頫，家富有藏书，明清时藏书家和官府藏书都曾收藏赵之遗书。又有清河张文谦，"家惟藏书数万卷"。济南张炤，"购书八万卷，以万卷送济南府学，资教育"（《元史·张炤传》）。至于元明之际，又有倪瓒、孙道明等，也号称藏书之家。

三、宋元私家藏书的特点

宋元时期私家藏书是中国藏书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正是由于这一阶段的不同社会因素，形成了宋元私家藏书发展的显著特色。

我国雕版印刷技术唐代初年发明以后，经历了一个较长时期的技术准备，到了五代至北宋初年大大地发展起来，成为社会文化、学术和教育生活的重要内容，又因为把唐及唐前积累的文化遗产通过印刷出版，加以继承和发扬，故此，宋代私家藏书是承先启后的重要载体。发展文化学术和积累文化财富，宋代私家藏书功不可没。

正是由于社会需要，如科举考试需要阅读，学术研究需要典籍，又因为印刷技术的普及，得书容易，积书便利，故宋时藏书家的积聚行动和藏书公开意识大大进步。藏书已经成为一种社会风尚。有些认识已经为读书人逐步接受，如认为收藏典籍犹如积累财富，而典籍比之金银财富更有用处，更有价值。如有了典籍，可以自己阅读，自然也可以借给别人阅读。史载宋敏求家、王明清家、李公择等藏书公开出借屡见不鲜。到南宋以至元代，一些家族性的藏书出现，就是藏书公开的典型事例。

我国官私藏书重视典籍收集，更重视典籍校勘、整理，这是长期以来藏书质量提高的保证。宋代私人藏书家重视抄录，以扩大藏书内容，或者增加复本。同时，很多藏书家本人校书究日，丹黄不辍，使所藏典籍的错误、缺失得以纠正，使藏书质量不断提高，也给藏书家自己阅读带来便利。这种抄、校、藏一体的做法，成为我国私家藏书的优良传统，它在中华文化传承上的贡献也是功不可没的。

宋代私家藏书编制目录形成风气，宋时，藏书家为了便于利用，易于检索，一般都自编藏书目录。当时，著名的私藏目录有李淑《邯郸图书志》，董逌《广川藏书志》、秦氏的《秦氏书目》、吴秘《吴氏书目》、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尤袤《遂初堂书目》、郑寅《郑氏书目》(见《直斋书录解题·目录》)。其中以《郡斋读书志》和《遂初堂书目》最为有名，因为这两个书目或以版本记载见长，或以提要著明书籍内容和价值，富有参考作用。陈振孙学习晁公武的做法，也对私藏作了提要，著录版本，编成《直斋书录解题》，同样成为宋代著名的私藏目录。

第五编

印本书发达时期的图书和藏书

（明—清）

第十一章　印刷技术的改进与印本书的继续发展

第一节　明清时期印刷技术的改进与创新

明清时期的印刷，是在前代印刷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除了雕版印刷外，还出现了多种不同的印刷术，使原有的印刷术得到改进、提高，出现了印刷业的繁荣局面。

一、明清木活字印刷术的兴盛

明清以前的木活字印刷书，已知的只有少数几种西夏文印经和一种地方志及一部《大学衍义》，显然很不普遍，尚处于初始阶段，但到了明代，“明人用木活字版印书，风乃大盛”。据清人龚显曾说，有书名可考的就有百多种，遍及苏州、杭州、南京、福建等沿海地区，而且发展到四川、云南等偏远地区。其中包括藩府、书院、书坊和私人都采用过木活字印书。印书内容也较广泛，除史书和先秦子书外，最多的是诗文集。弘治年间碧云馆活字版《鹖冠子》一书曾被《四库全书》采作底本，清乾隆皇帝曾直接在该书上题诗，现藏国家图书馆。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自崇祯十一年(1638 年)起，朝廷开始用木活字排印《邸报》，这是我国报刊史上报纸印刷的开端。另外，用木活字印家谱也在一些地方流行，如国家图书馆所藏《东阳卢氏家乘》，便是嘉靖年间的木活字印本。

清代的木活字印书，更是普遍。无论官私及坊间，多采用木活字印书，甚至有的书坊直接取名“活字印书局”或“聚珍堂”。摆印最早而又最精要的要数雍正三年(1725 年)归安汪亮采南陔草堂摆印的《唐眉山诗集》(唐庚撰)

10 卷。但规模最大的要数《武英殿聚珍版丛书》的印行。

乾隆三十八年(1773 年)为了刊印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已失传的宋元古籍，清高宗弘历采纳金简的建议，花费了 2 339.75 两银子，刻成大小枣木字 233 500 个，并配置了相应的印刷设备，先后印了《武英殿聚珍版丛书》138 种，300 多卷，是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木活字印书活动。

所谓聚珍版，就是木活字版，因乾隆皇帝嫌其名不雅驯，而改用此名。后来金简把印造《武英殿聚珍版丛书》的经验写成《武英殿聚珍版程式》一书，详细地说明了木活字的制造和印书方法的程序，是介绍活字版印刷术的重要文献。清代武英殿的木活字印书较之王祯造活字印书法，又有了改进与发展。例如：(1)从造字方法来说，王祯是在整块板上刻许多字，然后再用细小锯锼开，各作一字，而聚珍版则是先做好一个个单独木子，再行刻字。(2)栏线制作方法也不同，王祯法是“排字作行，削竹片夹之”，即以竹片作行线，可以自由去取；而聚珍版的栏线是刻在槽版上的，需先刻制和刷印套格，然后对准排在槽版内的正文文字进行套印。(3)储字方法不同，王祯法是把字按韵储在两个活动转盘里，而聚珍版则把字储放在 12 个大小字柜内，每柜有 200 个抽屉，每个抽屉分大小八格，每格存放大小活字各四个，每个抽屉上都标明某部某字和画数。(4)拣字所用人数多寡不同，王祯法只需二人，一人按韵喊号，一个就盘取字；而聚珍版需六人，其中四人按四声分别管平上去入四声之字，二人按书向管字者要字摆字。此后全国各地纷纷仿效，木活字印书更加普遍。据称河北、河南、山东、江苏、浙江、江西、福建、湖北、湖南、广东、陕西、甘肃等 14 个省都有木活字印书。估计流传至今的清代木活字印书约有 2 000 种。内容涵盖经史子集，其中以诗文集最多，有 200 多种，丛书也有 20 余种，另外鼓词、弹词、宝卷、唱本、戏曲、小说等民间文学作品也不少。例如《红楼梦》的二次印本，即程甲本和程乙本，就是乾隆五十六年和五十七年由萃文书屋排印的木活字本。

木活字印书，是我国古代活字印刷中使用最广的一种，主要也是在明清时期。

二、明清金属活字的推行

我国的活字印刷除上述的泥、木活字之外，还采用了以锡、铜、铅做原料的金属活字。

王祯在其所著《造活字印书法》一文中说：“近世又铸锡作字，以铁条贯之作行，嵌于盔内界行印书。但上项字样，难于使墨，率多印坏，所以不能久行。”这说明元初已有人用铸造锡活字来印书，只是由于技术未过关，没

能推广。这是最早关于锡活字的记载，也是最早的有关金属活字的记载。明弘治三年（1490年）无锡华燧会通馆以活字铜版印刷《会通馆印正宋诸臣奏议》，为国内现存最早的金属活字印本。过去说它是铜活字印本。但南京图书馆潘天祯先生根据明清两种《华氏传芳集》与清代《勾吴华氏本书》所载："既而为铜版、锡字以继之"，"为铜版、锡字翻印以行"等文字，从而认为会通馆所印"活字铜版"之书，并不是"铜活字板"，实际上活字本身是"锡活字"，而"铜板是指摆活字所用之板"，就像最初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实际上是"泥字铁板"一样。① 此说如确，则《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中所载会通馆活字铜版印书十数种，当是锡活字本。但这些只是推论，有关锡活字的明确记载出现在清代。19世纪中叶，美国人卫三畏曾记载广东佛山有一唐姓书商为了印刷当时最为畅销的赌博彩票——"闱姓票"和"白鸽票"，从道光三十年（1850年）开始铸造锡活字，共花了1万多元，前后铸成三套不同的锡活字，一套是漂亮的扁体字，一套是长体大字，另一套是作为正文小注用的长体小字，共20多万个。除了印制彩票外，他还于咸丰元年（1851年），用以印刷了元代史学家马端临的名著《文献通考》348卷，共19 348面，订成120大册，② 这是明确的锡活字印书。

铜活字在我国金属活字中使用最多。过去有人把宋岳珂《九经三传沿革例》中提到的"天福铜板"，说成是铜活字，认为最早的活字是铜活字，早在毕昇之前的五代天福年间（936—943年）就出现了。这种说法没有确实的依据。此外还有起源于宋、元的说法，甚至于有说是邻国传入的。我国的铜活字印书是从15世纪末，即明代弘治年间才开始盛行，而且主要在弘治至嘉靖时期。以地区而论，主要分布在江苏、福建、浙江、广州一带，其中尤为著名的是江苏无锡的华氏和安氏。

华氏一门四代从事活字印书，华珵、华燧、华坚、华镜是其主要代表。其中华燧以"会通馆"名义印有《宋诸臣奏议》、《锦绣万花谷》、《容斋随笔》、《九经韵览》、《正辑补古今合璧事类》（《前集》、《后集》、《续集》、《别集》、《外集》）、《记纂渊海》、《音释书经》等，被《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标为活字铜版印书，而有的学者根据有关文献的记载认为是锡活字而非铜活字（见前述）。华珵是华燧的叔父，印有《渭南文集》、《剑南续稿》等。华坚是华燧之侄，华镜是华坚的儿子。华坚父子的"兰雪堂活字铜版"书有《白氏长庆集》、《艺文类聚》、《蔡中郎文集》、《春秋繁露》、《元氏长庆集》等。

---

① 潘天祯．潘天祯文集[M]．上海：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2002：59.

② 张秀民，龙顺宜．中国活字印刷史话[M]．北京：中华书局，1979：18.

由于兰雪堂本在每一直行内排印两行字，所以被称为“兰雪堂双行本”，别具一格，历来颇得藏书家好评。

安氏名安国，字民泰，号桂坡，以号为馆名，称“桂坡馆”。安氏是无锡当地巨富，人称“安百万”。据称上海图书馆藏有安国后裔安希范撰《安氏家乘拾遗》稿本载：“翁(指安国)闲居时，每仿古书中少刻本者，悉以铜板(“板”字墨笔圈去，旁书“字”字)翻印，故知名海内。”现存并收入《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安国活字印书有：《吴中水利志》、《古今合璧事类备要》、《颜鲁公文集》、《重校鹤山先生大全文集》。此外还有《正德东光县志》、《初学记》、《春秋繁露》、《五经说》、《石田诗选》等，其中以《正德东光县志》最早，印于正德十六年(1521 年)，是我国唯一铜活字本方志。

安氏活字印本质量较好。清初钱谦益曾据所印来校金陵本《春秋繁露》，校出金陵本中数百处错误。黄丕烈在《士礼居藏书题跋记》中也说：“古书自宋元版刻而下，其最可信者，莫于铜版活字，盖所据皆旧本，刻亦在先也。”足见后人对此的重视。

明人铜活字印书，除华、安两氏之外，尚有弘治金兰馆所印《石湖居士集》、《西庵集》，弘治碧云馆之《鹖冠子》，丽泽堂《璧水群英待问会元》，五云溪馆《玉台新咏》等。

清代铜活字印书，传本中有康熙二十五年(1686 年)吹黎阁印的《文苑英华律赋选》四卷(钱陆灿选，刘士弘订)，是清代最早的铜版活字印本存世之作。清代规模最大的铜活字印书是雍正四年(1726 年)内府印制的《古今图书集成》。这是一部我国现存的最大类书。全书 1 万卷，目录 40 卷，共印 64 部，每部 5 020 册。其卷帙之富，排印之精，史无前例。可惜这批铜活字在印成《古今图书集成》之后，“铜字被窃缺少，司事惧得咎，值乾隆初年京师钱贵，遂请毁铜字供铸”，这批铜字就这样轻易地被销毁了。

清道光年间，福建人林春棋，从道光五年(1825 年)起，用了 20 年时间，花费 20 多万两银子，雇人刻制大小铜活字 40 多万个，用来印书。因林的原籍为福清县的龙田，所以把所刻铜活字定名为“福田书海”。他用这批铜活字印了顾炎武的《音学五书》中的《音论》和《诗本音》及《军中医用备方》等。就此他还写了一篇《铜板叙》说明他造铜字的原因和经过。这是我国有关制造金属活字仅有的文献。此外，还有台湾总兵武隆阿于嘉庆十二年(1807 年)曾制铜活字，印成《圣谕广训》一种；又常州有咸丰八年(1858 年)印的《毗陵徐氏宗谱》，是家谱中唯一的铜活字印本。

在金属活字方面，除了锡活字和使用最多的铜活字之外，据文献记载，在西方铅印术传入我国以前，我国也曾使用过铅活字。明代陆深在正德初年

所著《金台纪闻》中曾写道："近日毗陵（今常州）人用铜、铅为活字，视板印尤巧便，而布置间讹谬尤易。"这说明在16世纪初，常州除了有铜活字外，也有用铅活字印书的，可惜这些印书未能流传下来。在清人著作中，也有关于铅字的记载。道光十四年（1834年）魏菘在其所著《壹是纪始》中说："今又用铜、铅为活字。"这些都说明，自明代以来，我国是有过铅活字印刷的，但可惜都没有流传下来和继续发展。鸦片战争以后，由西洋传入的铅印术代替了我国固有的印刷术，反而成为近代印刷术的主流。但是，作为印刷术（包括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的发源地，我国的发明和创始功绩，永远是不可磨灭的。

三、明清套版印刷的发展与创新

套版印刷的发明是印刷术的又一大进步。普通雕版印书，一次只能印出一种颜色，称为"单印"；而用套版方法印出来的书，则具有两种或几种颜色。它是在规格完全一样的几块版面上，分别在不同的部位着上不同的颜色，重复叠印而成，所以叫"套版"，或叫"双印"，这一套技术就叫做"套版印刷术"。用这种方法印出来的书，称为"套印本"。一般双印多用红黑两种颜色，这样印出来的书称为"朱墨本"，用三种颜色的称为"三色本"，依照用色的多少类推，又有"四色本"、"五色本"等。不过在同一块版面上的不同部位，分别涂上不同的颜色，也可以得到类似的效果，这只是初始阶段采用的方法，像下文将要提到的元顺帝至元六年（1340年）中兴路（今湖北江陵）资福寺刻印的《金刚经注》就是在一块版上经文着红色，注解着墨色而成的套印。包括其卷首的灵芝图。它一度被认为是最早的套版印本。这是套印的初始阶段，叫做"敷彩印法"。至于它是什么时候发明的，则很难详考。这部《金刚经注》是1941年被发现的，1947年为南京中央研究院购藏，后被携到台湾，现藏台湾"中央研究院"。它是迄今为止，我国现有最早的利用印书的普通版片套色印出来的书籍。

1974年，在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塔内又发现了三幅彩印的《南无释迦牟尼佛像》，有说是木板彩印，有说是丝漏印刷。据同时发现的其他文物印证，其印刷时间当在辽统和年间（983—1012年），与上项发现相比，又早了300多年。它在彩色套印史上无疑具有先导的地位，是目前已知的最早的套印品，比欧洲第一本彩印的《梅因兹圣诗篇》（*Mainz Psalter*）早400多年，套版印刷技术在我国也是居于世界之先的。

虽然套版印刷术创始的确切年代还不能断定，但追溯其渊源，可以说是导源于朱墨写本。我国很早就用朱墨两色分写一书的原文和注释。古代著作

流传既久，后人难免有不易读懂的，于是便产生了传、注之类解释古书的体例。这类解释往往和原文字写在一起，若不注意，容易混淆、难以分辨。最好的办法是用不同的颜色来区分。相传早在东汉时期，贾逵和董遇等人，就已经用朱墨二色分别来写《春秋》的经文与传注。以后也曾有人将《神农本草》与陶弘景的《本草集注》抄录在一起，用红色抄原文，用墨色抄注解。唐代的陆德明在注《经典释文》时，也是用墨色写经文，用朱色写音义。他说，这样做的原因和目的在于“先儒旧音，多不音注。然注既释经，经由注显，若读注不晓，则经义难明，混而音之，寻讨未易。今以墨书经本，朱字辨注，用相分别，使皎然可求”(《经典释文·序录》)。当然写本书要做到这一点是比较容易的。在套版印刷产生以前，一般印本书在只能印一种颜色的情况下，只好采用阴文、墨围、另行和小字双行等办法，以区别经注，方便人们阅读，但究竟不如用颜色来区分那样鲜明醒目。于是，便促成了套版印刷的产生。

明朝末期套印盛行。我国现存最早的明代套印本，是万历三十年至三十五年间(1602—1607 年)安徽歙县印刷的《闺苑》一书。其中以“吴兴望族闵氏、凌氏其最著者也”①。

闵氏一门有：闵齐伋、闵光瑜、闵昭明、闵元衢、闵绳初、闵齐华、闵无颇、闵振业、闵振声等都刻过书。其中以闵齐伋最著名，从万历四十四年(1616 年)起刻印朱墨本《左传》，以后又陆续刻印了《东坡易传》、《老子》、《庄子》、《列子》、《楚辞》、《陶靖节集》、《韦苏州集》、《王右丞集》、《孟浩然集》、《韩昌黎集》、《柳宗元集》和《花间集》等朱墨本，以及三色本《孟子》、《战国策》、《杜子美七言律》，四色本《国语》等。此外，闵光瑜刻有朱墨本《邯郸梦》，闵齐华刻有朱墨本《九会元集》，闵昭明刻有朱墨本《新镌朱批五经七书》，以及闵绳初刻有四色本《文心雕龙》等，故有“世传朱墨字版，五色字版，谓之闵版”(《乌程县志》)的说法。

凌氏一门有凌濛初、凌稚初、凌澄初、凌瀛初、凌汝亨、凌弘宪、凌启康、凌杜若等人。其中以凌濛初最著名。凌濛初是著名的小说戏曲家兼出版家，著名的短篇小说集“二拍”(《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以及杂剧《虬髯翁》、《北红拂》等便是由他编著的。他刻印的书，以戏曲、小说为多，并且多用套印和插图。传世的有《琵琶记》、《绣襦记》、《幽闺记》和《南柯记》等。也刻有朱墨本《韩非子》、《吕氏春秋》、《孟浩然集》等，并与凌瀛初合刻有三色本《古诗归》、《唐诗归》等。此外，凌汝亨刻有朱墨本《管

① 顾廷龙，潘承弼. 明代版本图录初编卷十[M]. 上海：开明书店，1941：1.

子》，凌瀛初刻有四色本《世说新语》，凌启康刻有四色本《苏长公集》等。

闵、凌两家所刻套印本比较多，据统计共约 140 种，包括经书、子书、史抄及诗文集以及小说、戏曲等，内容相当广泛。两家中闵刻以经书较多，凌刻以戏曲小说较多。两家刻书版式都是周围有版框，中间无行线，便于在天头处作眉批，行格间加圈点。就质量而言，闵刻比凌刻好，时人谢肇淛曾评说："吴兴凌氏诸刻，急于成书射利，又悭于倩人编摩，其间亥豕相望，何怪其然。"(《五杂组・事部》)除闵、凌二氏外，明代可考的出版家还有一贯斋、庆云馆、苏之轼、版筑居、唐建元、茅映、程氏滋兰堂、张少吾瑞云馆等。

套印技术在清代有所继承和发展。据杨绳信《中国版刻综录》著录，清代套印出版者计有 40 余家，其中包括官刻、私刻和坊刻，官刻包括内府及地方官书局。官刻套印本有清初顺治年间五色本《劝善金科》，康熙年间四色本《唐宋文醇》、《唐宋诗醇》及朱墨本《曲谱》等，雍正年间朱墨本《朱批谕旨》等，乾隆年间五色本《昭代萧韶》、《西湖佳话》等；私刻则有道光年间涿州卢坤六色本《杜工部集》、松滋谢氏朱墨本《碎金词谱》，咸丰年间蒋立昂朱墨本《六朝文絜》等；坊刻本有道光年间广东叶云龛五色本《杜工部诗集》等。

套印书比之单印书来说自然精美醒目，但投资费用也大。故叶德辉云："刻一书而用数书之费，非有巨赀大力，不克成功。"①

套印术不仅施之于文字，也可施之于图画。把套印技术与版画结合起来，便产生了彩色版画印刷术。

叶德辉曾说道："吾谓古人以图书并称，凡书必有图。"所谓"图文并茂"，这是对一本好书的称道。且不说雕版印刷术以前，只说雕版印刷术发明以后，一开始的雕版印书便有插图出现。如现存最早的有确切日期记载的唐懿宗咸通九年(868 年)王玠施刻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简称《金刚经》)的卷首扉画，是现在世界上最早的版画，其雕印技术已显得很成熟，这也是我国印本书中最早的插图。以后于经史子集各书中屡见不鲜，不过在元明以前雕版印刷的图书，都是用单一墨色印刷的。元明以后，特别是明季以后，版画印刷采用套印术则出现了彩色版画，更提高了版画的艺术效果。最初如文字书一样，是在一块版上分别着色一次印刷的，如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安徽歙县程大约刻《墨苑》里的《天姥对庭图》，凤凰用红、黄二色，竹子用绿色，就是这样印成的。稍后，就发展为分色分版的套印方法，称为"饾

① 叶德辉. 书林清话[M]. 北京：古籍出版社，1957：215.

版”。所谓饾版，是因其形似饾饤而得名，饾饤是一种五色小饼，做成花卉禽兽珍宝的形状，盛于盒中。饾版的制法，是把整块版分成若干大小不同的分版面的小块，这些分版面是依据画稿的彩色画面而划分的。其堆砌拼凑，有如短灯，故称短版。其分版非常细致，能分出颜色深浅，背光受光，远山近水，表达出民族艺术的特点。

彩印版画最早传本为明天启六年(1626年)金陵吴发祥印制的《萝轩变古笺谱》2卷。同时吴发祥还创制了“拱花”方法——即用凹凸两版嵌合使纸面拱起，相当于现代钢印效果——多用于印画中花叶的脉纹和山间的流水行云，使人产生立体感。这种方法在《萝轩变古画谱》中与饾版结合使用。崇祯间，徽州胡正言用饾版法印制了《十竹斋画谱》，随后又用饾版与拱花两种方法印制《十竹斋笺谱》。刻版套印都十分精致，把版画艺术推到了一个空前发展的高度。

李于坚曾称：“十竹斋诸笺汇古今之名迹，集艺苑之大成，化旧翻新，穷工极变。”(《十竹斋笺谱·小引》)1934年鲁迅和郑振铎曾翻印，后又收入《中国版画史图录》。郑振铎说：“余收集版画书二十年，于梦寐中所不能忘者惟彩色本程君房《墨苑》、胡曰从(按：胡正言字)《十竹斋笺谱》及初印本《十竹斋画谱》等三伟著耳。”中国刻版印刷术在明代发展到十分完美的地步。清康熙四十年(1701年)刻印的《芥子园画谱》，也是采用恒版法印制的，流传较广。

第二节　线装书的装订

书籍进入册叶制度以后，先后出现了蝴蝶装，包背装，显示出各个时期书籍的形式与风格。蝴蝶装盛行于宋，包背装盛行于元及明前期。明中叶以后至清朝又出现了一种新的装订形式——线装(见图11-1)。

线装基本来源于包背装，是对包背装进一步的改进。主要改进有两点：一是包背装用整纸作书衣包背，而线装则采用封面封底单独各加书衣，取消包背；二是包背装是用纸捻打孔装订，而线装则改用打孔穿线装订。

线装书的装订程序十分讲究，每一步骤都有特别要求，现简介如下：

1. 折页：折书页要看准版心正中，不能歪斜。要求折得直，压得久，捉得齐。

2. 分书：折页之后，再依次排之，称为分书，亦曰排书。即依卷页顺序分为若干册。分书时要注意厚薄得宜。

3. 齐线：分好的书页，天头、地脚不一定整齐，必须逐页对准中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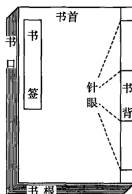


图 11-1　线装书

使其整齐，所以又称作“齐栏”。

4. 添副页：“副页”就是每页书衣内的空白页，前后各两张。副页的功用，一是保护内页不受损伤，所以又名“护页”；二是避免潮湿。在我国南方装订的书，护页有用一种特制的“万年红”纸的，既增美观，又可防蠹。

5. 草订：书页经过齐线、添副页之后，就要草订，免使走动。每本用绵纸钉三条，每条要挽一结，不用糊。

6. 加书面：书面，也称书衣，今称封面。按书面有布、纸两种。颜色多为栗色（普通书）或瓷青色（佳本）；绢料、绫料，多用黄色，但也有用红、绿、蓝、灰四色的，以分经、史、子、集。

7. 截书：即用刀把书口之外的三边切齐。

8. 打磨：切好的书难免有刀纹，还要用砂纸磨光，使其光而平。

9. 包角：珍贵的书多用绫绢包其订线一侧的上下两角。取其坚固，并增美观。但包角不透风，易生虫，且用糨糊，易引鼠咬。此非必要程序。

10. 钉眼：即打引线之孔。打在靠近书背处，依据书本的宽窄，确定钉眼的距离。打书眼要打得正而小，否则容易伤书脑，日后再订则会带来许多麻烦。通常是四眼或六眼，也有用八眼的，要依书本大小、书背宽窄而定。

11. 穿线：又叫订线。线要用清水白绢线双根订结，线的长度一般为该书长度的 7 倍左右（依书的厚度而定），要求“钉得牢，嵌得深”方不脱而紧。穿线随钉眼，有四、六及八眼订法。

12. 贴签：即在书衣贴上书签。书签要款贴整齐，长短宽窄相宜，上下左右不得歪斜。

如此一来，线装书表现出两个方面的优点：一是比包背装结实，不易脱落；二是书本旧了可以重装；达到整旧如新的目的。不过重装的次数多了，针孔也多，书脑容易受损，接脑相当麻烦，对原书会造成一定损失。

第三节　印刷术的外传

像纸和造纸术的外传一样，我国雕版印刷术发明不久，印本书和印刷术也首先传入东邻的朝鲜和日本。

1966年在韩国庆州佛国寺发现的一卷《大陀罗尼经》，被证实是公元704—751年的刻本，这是目前世界上现存最早的印刷品。它比在中国本土所发现的实物还要早100多年，它的印刷方法和中国发现的唐咸通九年(868年)印刷的《金刚经》是一样的。通过与中国和日本刊印的其他佛经比较，美国的印刷史研究专家富路特(L. G. Goodrich)认为："所有这一切，仍然说明中国是最早开始发明印刷术的国家，印刷是从那里传播到四面八方的，而佛教是主要传播媒介之一。当时僧侣是游访各地的人物，看起来完全有可能是：一个或几个中国或朝鲜的僧侣在新罗王朝时采用了这种新技术，而几年之后则由另一些日本或中国或朝鲜的僧侣把它传到当时的日本首都奈良。"①这段话的最后是指日本在公元770年所印制的《百万塔陀罗尼经》，也是一部比中国本土所发现的还要早的印刷品。在此之前，曾一度被宣称是"世界最古的印刷品"。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朝鲜和日本，此后将近300年，都没有再出现印刷的事，所以我国有学者认为："这卷印本佛经可能是8世纪新唐长安印本，而不是新罗自己刊印的。"②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都可以说中国印刷术发明之初，就很快向东方近邻的朝鲜和日本传播。因为中国和这两个国家不单地理毗邻，而且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都有密切的联系，历史上往来不绝，首先传到这两个国家是很自然的了。活字印刷也是这样。从高丽时代起，朝鲜半岛就出现了活字印刷术。公元1234年，高丽高宗二十一年，李奎报代晋阳公崔怡《新序评定礼文跋》云："遂用铸字，印成二十八本，分付诸司藏之。"③这里说的铸字印成的《评定礼仪》28本，为世界最早的金属活字印本。公元1298年，高丽活字印成《清凉答顺宗心要法门》，为存世最古金属活字印本。自此之后，从高丽至朝鲜时期，活字印刷术不断

① ［美］富路特. 关于一种新发现的最早印刷品的初步报告[R]. 书林，1980(3).

② 张秀民. "南朝鲜"发现的佛经为唐朝印本说[J]. 图书馆研究与工作，1981(4).

③ 张秀民. 中国活字印刷史[M]. 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135.

发展，曾用木、陶、瓢、铜、铁、铅等各种材料制造活字。据张秀民先生统计，仅1376年至1895年，已知雕造木活字28次，1403—1863年铸造金属活字34次，其中铅字2次，铁字6次，余皆为铜活字。朝鲜是第一个采用铅活字的国家，早在1436年“范铅为字以印《纲目》”。这本《通鉴纲目》(又名《思政殿训义》)是世界上最早的铅活字本(铅字与铜字混合排印，正文用铅字，铜字作小注)，朝鲜还发明了铁活字，公元1729年印有铁活字本《西坡集》。另外瓢活字也是朝鲜所特有，如北京大学图书馆即藏有朝鲜瓢活字本《论语集注大全》。与我国不同的是，活字印刷是朝鲜的主流印刷方式。但它发生在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之后，是受到毕昇发明的影响的，这一点古代朝鲜学者也承认。如15世纪朝鲜学者金宗直(1432—1492年)曾说：“活板之法始于沈括，用铸字印书，凡经、史、子、集，无家不有。”①虽然这里把毕昇误会为沈括，但说明《梦溪笔谈》早已传入朝鲜半岛，并为其所熟知。

日本的活字印刷开始于16世纪末期，当时传入日本的活字印刷术，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由西方传教士带入的，主要印刷的是欧洲文字的天主教宣传品，日本人称它为“切支丹本”或“切利支丹本”(意即耶稣教会本)，只在九州长崎局部地区流行，而且时间很短，对日本的活字印刷几乎没有影响；一是经由朝鲜输入的，这是日本活字印刷术的重要来源。

日本天禄元年(1592年)大举侵略朝鲜，就在这次战争中，日本从朝鲜掠去了大量的图书和活字及印刷工具，把活字印刷术带到了日本。次年，日本用这些抢来的活字及印刷工具，印成了《古文孝经》，这是日本第一部传统活字印本。1597年，日本木活字印本《劝学文》称“此法出自朝鲜”。日本人把木活字称为“一字版”、“植字版”或仿中国称“聚珍版”。日本的铜活字也是从朝鲜传入的。庆长十二年(1607年)，直江兼续印行《六臣注文选》，岛田说：“庆长活字，实为朝鲜所铸。”山井重章跋《群书治要》说：“元和二年(1616年)命金地院崇传及林道春用征韩活字印刷。文字不足，命汉人林五官增铸，又招刷工于京师，召五山僧掌校正。”这说明日本最早的铜活字印本所用的活字，是直接从朝鲜掠夺来的，不足的部分是在中国铸字工人参与下完成的。

日本的活字当初只有木活字和铜活字这两种，19世纪中叶以后，才改用西方的铅活字印刷。

朝鲜的版画也深受中国影响，最早出现于11世纪的《三礼图》，就是依宋本翻刻的；《宋岳鄂武穆王精忠录》4册，第一册全为木刻图，也是据“唐

① 张秀民. 中国活字印刷史[M]. 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133.

板”入梓的。另外，据说朝鲜也有套印书，未能见到。

日本最早的版画是宽元四年(1246年)《佛制比丘六物图》，五山版中有《十牛图》，后来又有庆长本《帝鉴图说》、《孔子圣迹图》，天文本《八十一难经》以及佛像扉画。这些都是中国画的翻刻。到17世纪才出现一种写实的“浮世绘”，起初只是墨印，后来有用手染上颜色的。1742年，开始红绘，除基本墨色外，又加印红色的朱墨套印。1764年，画工铃木春信与刻工金六，仿照中国五彩套印本，完成一种多彩的套版浮世绘，日本人称它为“锦绘”。这些都直接受中国十竹斋、芥子园与苏州版年画的影响。

此外，我国雕版印刷术大约在13世纪中叶传入越南，15世纪越南开始大量印刷中国儒家著作。1712年印制的《传奇漫录》则是现在所知的越南较早的木活字印本。越南也有与我国相似的彩印年画。

我国发明的印刷术不仅向东方各国传播而且也像纸的西传路线一样，由新疆经波斯而传入埃及，再传入欧洲。

1902—1907年，普鲁士东突厥斯坦发掘团在我国新疆吐鲁番发现大量的回鹘文、汉文、梵文、唐古特文(西夏文)、蒙古文以及西藏文等印刷的佛经及木刻佛像，这些印刷物被证明是我国元代初年的雕版印刷品。1930年，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也在该地访得几件同期的古维文雕版印书。这些印本不论属于何种文字，其页码都是汉文的。这就证明，在13世纪时，雕版印刷术已推广到新疆及中亚一带。在13世纪初，波斯在蒙古伊儿汗国统治之下，曾仿照元朝的“至元宝钞”发行纸币，上面印有阿拉伯文和汉文两种文字；甚至当时国王印玺中也刻有汉文。现存在巴黎档案库中1305年伊儿汗国王致法国国王的书札上，就盖用了这种有汉文的印玺。另外，当时伊儿汗国的宰相拉希德丁在1310年完成的《世界史》一书中，对中国的雕版印书曾经作了详细的介绍，他写道：“中国人喜欢宣扬古书。在选印时，总先叫些书法好的人，在木板上抄写原文，经过慎重核勘，然后才叫有雕刻技术的人刻字；刻成之后，每板依次编号，封存于政府，以便人民申请拓印。”①这是当时外国人记述我国印刷术早期的文献，证明中国的印刷术已经传到了那里。

1880年，在埃及发雍地方发现印刷品50多件(实物存于维也纳国立图书馆)，是公元900—1350年的实物，内中有一佛像，与我国新疆的发现很

① 程溯洛. 论敦煌、吐鲁番发现的元朝时代维文木刻活字和雕版印刷品与我国印刷术西传的关系[G]//中国科学技术发明和科学技术人物论集. 北京：三联书店，1955：234.

相似，以此可证明埃及的印刷也受到中国的影响。

欧洲14世纪末，才在德国纽伦堡出版雕版印刷的宗教画。1423年圣克利斯多福造像(St. Christopher)这是现在可以见到的欧洲最早的雕版印刷。后来又出版了雕版文字的书籍或印叶，它所受中国雕版印刷术的影响，表现在以下的相似和一致："那时的雕版也是在每一块板上印两面，印好把纸对折，空白的两面向内，和中国办法相似。纸固然是中国的东西，所用墨也和中国产品相同。印时先在板上刻阳文字画蘸墨，然后铺纸用刷子刷印，也无不和中国的印刷术相合。"①这当然不是偶然的巧合，正如卡特(T. F. Carter)所指出的："不单在使用纸张一事中可以看出中国人的影响，并且在欧洲雕版印刷的肇端中，中国影响实为最后的决定因素。"②

关于活字印刷，在欧洲认为是谷腾堡(J. Gutenbeug)在1450年左右发明的，其时较毕昇的发明已晚了400年，距王祯对木活字的改进也迟100多年。在谷腾堡"发明"活字之前，即公元12、13世纪，欧洲和中国已经在中东一带有频繁的接触，从伯希和在敦煌所获几百个元代的古维文木活字中，可以看出中国活字传入欧洲的脉络。古维文和拉丁文同属拼音文字，都是腓尼基字母的"后裔"，谷腾堡是否从中受到启发，也不是没有可能。这样说，并不是要抹杀谷腾堡的功绩。因为古维文活字并不是单个字母活字而是单词活字，谷腾堡将其改用字母活字，也是一种进步，并且使用了一种简单的印刷机，为印刷机械化开辟了道路。

谷腾堡所处的时代，正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所以这种印刷术适逢其时，受到了社会的欢迎，在欧洲首先得到了发展。随着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发展，又为印刷术的改进创造了条件，因此欧洲的活字印刷术有了长足的进步，而居世界领先地位，逐步向世界推广。

---

① 周一良. 纸和印刷术——中国对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G]. 中国科学技术发明和科学技术人物论集. 北京：三联书店，1955：18.

② 吴泽炎译. 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57：180.

第十二章　明清官私印书的兴盛

第一节　明代的官府编书与印书

一、《永乐大典》的编纂

明太祖朱元璋借助元末农民起义的威力，推翻了元朝，于1368年建都南京。为了适应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统治的需要，立国后，朱元璋加强对文化的控制，兴办国子监及各府州学，教授《四书》、《五经》，广开科举之路，笼络知识分子；同时，又加强思想统治，剪除异己，杀戮开国元勋与不合作的文人，采用镇压与怀柔相结合的手段。明初广泛收集典籍，建立皇朝藏书，编纂大型政典与工具书，都是朝廷整个文化教育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明代的官修书中，《永乐大典》是最著名的一部大书。它不仅是我国最大的一部类书，也是至今被世界所公认的最早最大的一部百科全书。明成祖朱棣命令儒臣编纂此书，是有其政治意图的。据《春明梦余录》称："至靖难之举，不平之气，遍于海宇，文皇借文墨以销块垒，此系当日本意。"又说："宋太宗既平列国，所得降臣至多，恨无地以处之，于是设为六馆，修三部大书。……永乐靖难后，复修《永乐大典》，亦意许。"就是说明成祖修《永乐大典》与宋太宗修《太平御览》等三部大书的目的有相似之处。总之，朱棣通过一场王室内部的争权斗争取得胜利后，有许多人不服，为了转移他们的视线，笼络士大夫而编此书。

永乐元年(1403年)七月，明成祖便急急命令翰林院学士解缙等人负责编修，一年后便草草编成，题名《文献大成》。成祖嫌其简略，又增派姚广孝等主持重修，于永乐五年(1407年)十一月奏进，改赐名《永乐大典》。参加该书编纂和谱写工作的共2 167人，从七八千种图书中辑成22 877卷，凡

例、目录60卷，装成11 095册。因工程浩大，未能刻印，全部由手工书写。初藏南京文渊阁。永乐十九年(1421年)迁都北京，《永乐大典》亦随之入藏北京文渊阁之文楼。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又派员摹写《永乐大典》副本，至隆庆初完成，副本存皇史宬。明末文渊阁失火，正本被毁。清乾隆年间，北京皇史宬所藏副本亦缺失千多册。以后由于管理不善，丢失甚多。光绪二十年(1894年)清点时仅存800余册。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时，该书大部分被焚，其余被抢掠运走，散藏于多国图书馆和私人手中。

《永乐大典》内容及编排体例，据郭伯恭《四库全书纂修考》说："自书契以来，凡经史子集百家之书，以至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全行采入。以《洪武正韵》为纲，每字之下，详列各书，或以一字一句分韵，或析取一篇，以篇名分韵，或全录一书，以书名分韵。元以前之佚文秘典，往往全部收入。故能分门排纂，凑合成部，各自为书。"清修《四库全书》时，在《永乐大典》中辑出古代书385种，4 926卷，清嘉庆时徐松从中辑出一部《宋会要》，编《全唐文》时也从中辑出不少唐人著作。由此可以看出《永乐大典》保存我国古代文献的功绩。

据统计，现存于世的《永乐大典》约近800卷，1960年中华书局将当时征集到的730卷影印出版，随后又从国内外征集到67卷，前后共计797卷，一并缩印为16开精装本，共10册。但现存数量不及原数的3%，可以说是我国文化史上的一大浩劫。

二、明代的官府印书

袁栋《书隐丛说》谓："官书之风，至明极盛，内而南北两京外而道学两署，无不盛行雕造。""官司至任，数卷新书，与土仪并充馈品。"这说明明代官府刻书是很普遍的。

以中央而言，沿历代旧制置国子监刻书。明国子监有两处：一为南京国子监，简称南监或南雍；一为北京国子监，简称北监或北雍。

明代建立之初，搜集了大量宋元版片，集中于南监，继而又收集了不少明代各地所刻版片。明代南监印书，多是以所藏宋元旧版和地方刻版印成，所以出书甚多。据明周弘祖《古今书刻》著录，其先后刻印图书计270种。其中大量为用前代版片略事修补后重印的，即后世所称的"三朝本"，以《十七史》为最著名。自刻书不多，有《杜氏通典》、《新五代史》等。

北监，是迁都以后所建。北监刻印书不及南监之多，仅据清《钦定国子监志》所附《明太学志载书籍版片名目》著录，北监刻书约有147种，其中经部39种，史部59种，子部37种，集部12种。其中以《十三经注疏》和《二

十一史》最著名。

对于明代国子监刻书，数量虽多，质量却不高，后人多有非议。如叶德辉在《书林清话》中评论说："明两监书版，尤有不可为训者。如南监诸史，本合宋监及元各路儒学版凑合而成，年久漫漶，则罚诸生补修，以至草率不堪，并脱叶相连亦不知其误。北监即据南本重刊，谬种流传，深可怪叹。吾不知当时祭酒司业诸人，亦何尸位素餐至于此也。或谓当时监款支绌，不得不借此项收入，略事补苴，且于节用之中而见课士之严肃，其立法未为不善。虽然，南监板片皆有旧本可仿，使其如式影写，虽补版亦可自贵。乃一任其版式凌杂，字体时方时圆，兼之刻成不复细勘，致令讹谬百出。然则监本即不毁于江宁藩库之火，其书虽至今流传，亦等于书帕坊行，不足贵重矣。"

明代中央刻书还有经厂。经厂是内府司礼监内负责刻印书籍的专门机构。经厂规模很大，据记载，嘉靖十年(1531 年)时，仅各种匠人总数即达 1 275 名之多，还不包括各类管理人员。其刻书数，据明刘若愚《酌中志》和明周弘祖《古今书刻》两书的统计，总数在 177 种以上。其中包括经书，如《周易大全》、《书经大全》等；史书，尤其注重明代史志，如《大明会典》、《大明一统志》等；祖训、圣训，如《御制大诰》、《皇明祖训》等；小学书，如《洪武 正韵》、《广韵》等；乃至儿童课本，如《百家姓》、《千字文》等。此外，还有佛、道、番藏等。其所刻印书虽然多是大字巨册，纸墨刻工也相当精妙，但因其出于太监之手，不为后世所重。

此外，中央各机关如礼部，每三年刊行一次《登科录》与《会试录》，兵部刊行历科《武举录》，钦天监每岁奏准印造《大统历日》等有关职责的图书。

明代的官府刻书中，以藩府刻书别具特色。明代采取分封同姓制度，皇族子孙多分封到各地为王。他们官高位显，富有财力，并不具体治事，所以他们有能力从事著述和刻书。他们有丰富的藏书，其中有不少是御赐的宋元善本，是刻书所依据的底本；他们有足够财力，选取最好的纸墨材料，选用最好的书手刻工从事写版、刻版；他们拥有足够的人才，包括他们自己，有的就是学者。所以藩府的刻书一般说来都很讲究，校勘精当，纸墨精良，版印精湛，是明代官府刻书中最好的，多为学者和藏书家所珍视。藩府刻书，统称藩刻本。根据有关书目著录，诸藩刻书可考的 326 种，其中弋阳王府 56 种，蜀藩 38 种，楚藩 26 种，周藩 23 种，宁藩 22 种，赵藩 20 种，辽藩 18 种，庆藩 13 种，益藩 12 种，沈藩 11 种，唐藩、秦藩、德藩各 8 种，鲁藩、晋藩各 7 种，吉藩、徽藩各 6 种，代藩、衡藩各 5 种，伊藩 4 种，崇

藩、潞藩、襄藩各3种，淮藩、郑藩、韩藩、靖藩、肃藩各2种，荆藩、汝藩、岷藩、荣藩各1种。其中有许多佳刻。如嘉靖年间(1522—1566年)晋藩所刻诸总集，万历年间(1573—1620年)吉藩所刻诸子书，崇祯年间(1628—1644年)益藩所刻诸茶书，都很有名，号称藩府三大杰作。顾廷龙在《明代版本图录初编》中指出："明时藩邸王孙袭祖宗余荫，优游文史，雕椠之业，迈轶前朝，今可溯者殆十数家。蜀府最先，自洪武迄万历，传本不绝；宁藩自号臞仙，所刊多道家养性保命书籍；他如唐藩之《文选》、吉府之《贾子》，于今传诵；余则代崇肃三府各有垂典，并为世覩。此成化以前藩邸之概略也。嘉靖以下，晋府最著，淹雅奕世，载灵光启前业，其所署有宝贤堂、志道堂、虚益堂、养德书院诸称，循名可觇其实，其所刊有《文选注》、《唐文粹》、《宋文鉴》、《元文类》、《初学记》诸书，浩瀚卷帙，为诸藩之冠；次则秦藩之《史记》、德藩之《汉书》、赵府之《诗辑》、益府之《玉篇》，并得擅美济武。而郑藩之通音律，所刊《乐律全书》尤为审音家所推重，不独以雕版著艺苑也。其他诸藩，曰周、曰徽、曰沈、曰伊、曰鲁、曰楚、曰辽、曰潞，一二精椠，更仆难数，河间衡阳无与为盛。"

藩府之外，明代地方官府上至督府下至县令，几乎都有刻书行世，这与明朝官场的风气有关。据顾炎武《日知录》称："明朝官吏，奉使出差，回京必刻一书，以一书一帕相馈赠，世即谓之书帕本。"明代的"书帕本"很泛滥，而且大多粗制滥造，敷衍了事。

第二节　清前期的官府编书与印书

一、《古今图书集成》与《四库全书》的编纂

清朝政府以满人入主中国，为了消灭汉人的反抗，一方面采取残酷的高压统治手段，大兴文字狱直接进行镇压；另一方面利用八股文科举取士，以及大搞图书编修笼络人心，企图清灭民族意识。

在历代封建王朝中，清朝政府是编纂图书最多的。康熙时，内平三藩叛乱，外除葛尔丹威胁，使清统治得到进一步巩固，生产文化也都得到了发展。康熙本人对于图书特别重视，常将古人著作加以审阅，有时还作批注和修改，这些书便成为"钦定"的著作。其范围涉及经书、历史、辞章、农艺、天文、历法以及文学等各个方面，并影响到以后的各代皇帝。因此清朝的钦定书很多，仅见于《四库全书总目》著录的就有147种之多。其中工程最大、影响最深的是两部大书：《古今图书集成》和《四库全书》。

《古今图书集成》(原名《古今图书汇编》)是我国继《永乐大典》之后，又一部大型类书。由于《永乐大典》的散佚，它成了我国现存最大的一部类书。国外称之为《康熙百科全书》，居世界百科全书之冠。原编纂人为陈梦雷等，初稿完成于康熙四十五年(1706 年)。雍正时，又命蒋廷锡等重新增订。全书1 万卷，目录40 卷，分6 汇编，32 典，6 190 部。在组织体系和编纂体例上远胜过以前的类书，其中还有许多精美插图。雍正四年(1726 年)第一次以铜活字排印(图用版刻)。至雍正六年仅印成64 部，故流传不广。光绪十年(1884 年)，上海点石斋之图书集成局铅印1 500 部，但脱叶错字多。光绪十六年，同文书局又石印100 部，是照殿本原式影印的。1934 年，中华书局又有影印铜活字本。1986 年中华书局与成都巴蜀书社联合重印1934 年本，改为16 开精装。

《四库全书》是我国最大的一部丛书。乾隆三十七年(1772 年)十二月开始编纂，先后参与编纂的人员达360 人，其中有不少当时著名学者，如纪昀、戴震、邵晋涵、周永年、姚鼐、翁方纲、朱筠、金榜、王念孙等参与其事。负责缮写的书工多达3 826 人。花十年工夫，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 年)十二月完成第一部的抄写。接着一年内完成第二、三、四部的抄写。分藏于故宫文渊阁、圆明园文源阁、盛京(沈阳)文溯阁、热河避暑山庄文津阁。以上称为内廷四阁，即北四阁。从乾隆四十七年(1782 年)七月至五十二年六月，又抄了三部藏于扬州大观堂文汇阁、镇江金山寺文宗阁、杭州圣因寺文澜阁，以上称为江南三阁，即南三阁。每部《四库全书》装订为36 300 册，6 752 函。共收书3 578 种，79 337 卷①。四库底本来自六个方面：一是勅撰本，即清初至乾隆时钦命编纂的计147 种；二是内府本，即自康熙以来宫廷收藏的，计存书326 部，存目367 部；三是《永乐大典》本，即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各书，计存书385 种，存目100 余种；四是采进本，即由各省搜求缴进的，计12 154 种；五是进献本，即由私人藏书家献出的；六是通行本，即社会流行的。经过审阅、整理、删改，收入《全书》的，仅如上数(存书)，未收入而仅记录的，则有6819 部，94 341 卷(存目)，同时，被查禁毁版的还有3929 部(据姚觐光《清代禁毁书目四种》)。

“全书”之外，又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200 卷，其著录的书收入《四库全书》中的有3 461 种，79 309 卷；存目6 793 种，93 550 卷(据中华书局影印《四库全书目录》出版说明)。后又删存目和提要，编为《四库全书简明目录》。

① 胡宜柔. 四库全书知多少[J]. 新华文摘，1981(2).

清廷编纂《四库全书》的目的，表面上打着“稽古崇文”的幌子，实际上包藏着“寓禁于征”的目的。因此，这部书的编纂，一方面整理并保存了文化典籍，另一方面也摧毁了一部分具有爱国思想的文化典籍。章炳麟曾在《哀焚书》中指出：“自满洲乾隆三十九年既开四库馆下诏求书，命有触忌讳者毁之，四十一年江西巡抚海成献应毁禁书八千余通，传旨褒美，督他省摧烧益急。自尔献媚者蠭起，初下诏时切齿于明季野史，其后四库馆议，虽宋人言辽金元，明人言元，其议论偏谬尤甚者，一切拟毁。……然隆庆以后，至于晚明，将相献臣所著，靡有孑遗矣。其他遗闻轶事，皆前代逋臣所录，非得于口耳传述，而被焚毁者，不可胜数也。”鲁迅更进一步指出：“雍正、乾隆两朝的对于中国人著作的手段，就足够令人惊心动魄。全毁、抽毁、剜去之类也且不说，最阴险的是删改了古书的内容。乾隆朝的纂修《四库全书》，是许多人颂为一代之盛业的，但他们却不但捣乱了古书的格式，还修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内廷，还颁之文风颇盛之处，使天下士子阅读，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的作者里面，也曾经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病后杂谈之余》）。

二、清前期的官府印书

清朝前期的官府刻书主要集中在内府。初时主要由明代经厂的原有工厂承办，其刻书风格与经厂本大同小异。如顺治十二年(1655 年)所刻《资政要览》和十三年(1656 年)所刻《内则衍义》，有大字宽栏、行格疏拙的特点。康熙十九年(1680 年)于内务府设立武英殿造办处，“以亲王领殿事，而设总裁、提调、总察、纂修、协修等官，以下则为校录之士、收掌人员，若剞劂、装订工匠尤夥”(章乃炜《清宫述闻》卷三)，从事编书和刻书工作。此后内府书籍，如实录、圣训、御制诗文、御纂经典、会典、方略等，统由武英殿刊版印行。故有“殿版”之名。殿版书籍，以康、乾时期最精。其刻写之工致(字体有软字和宋字两种)，用纸之优良(开化纸)，墨色之光泽，以及校勘之精审(由翰林词臣负责校勘)都达到很高的水平。嘉庆以后就比较差了。

康熙年间刻书有《日讲易经解义》、《日讲书经解义》、《日讲四书解义》、《御纂周易折中》、《御纂性理精义》、《御纂朱子全书》、《御制耕织图诗》、《词谱》、《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幸鲁盛典》、《万寿盛典初集》、《亲征平定朔漠方略》、《钦定清凉山新志》、《清文鉴》、《孝经衍义》，《御选四朝诗》等。另外，还有不少实际上是由一些官员出资而用武英殿名义刻印的书，如江宁织造曹寅所刻的《全唐诗》，苏州织造兼两淮盐差李煦等所刻的

《佩文韵府》，詹事府詹事陈元龙所刻的《御定历代赋汇》，翰林院编修高舆刻的《佩文斋咏物诗选》，翰林院编修陈邦彦刻的《历代题画诗类》，司经洗马王奕清刻的《历代诗余》，候补主事王世绳等刻的《佩文斋书画谱》，吏部尚书宋荦刻的《御批通鉴纲目》，河南道监察御史刘灏刻的《佩文斋群芳谱》，内阁中书郭元釪刻的《全金诗》，翰林院检讨马豫刻的《御定历代记事年表》，翰林院侍读陈世馆刻的《康熙字典》等。

雍正年间刻书，有《御定骈字类编》、《圣谕广训》、《世宗上谕八旗》、《圣祖仁皇帝庭训格言》、《钦定训饬州县规条》、《圣祖仁皇帝御制文四集》、《御制朋党论》、《大清会典》、《钦定书经传说汇纂》、《清汉文孝经》、《御制律历渊源》、《御定音韵阐微》、《悦心集》等。另外还用铜活字摆印《古今图书集成》64 部。

乾隆一朝，刻书最多。据陶湘《故宫所藏殿版书目》统计，乾隆年间所刻书多达百余种，其中以《十三经注疏》、《二十四史》为最著，另外《钦定武英殿聚珍版丛书》也很有名。

嘉庆年间刻有(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钦定兰州纪略》、《高宗德皇帝圣训》、《钦定全唐文》、《钦定明鉴》等。嘉庆以后，武英殿刻书便日渐衰落，进入晚清已是名存实亡。

清内府刻书除采用传统的雕版外，还采用铜版(如康熙五十二年印的《御定星历考原》，乾隆三十八年印的《内府皇舆全图》)、铜活字《钦定古今图书集成》、木活字《钦定武英殿聚珍版丛书》、乾隆十五年彩色套印《御选唐宋诗醇》等印刷形式。

清朝的地方官府刻书主要是印地方志，其他书籍则刻印很少。

第三节　明清的私人著述与印书

一、明代个人著述

明代初期，由于封建统治者采取残酷的统治方针，大兴文字狱，严重威胁知识分子；同时也利用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来引诱他们，因而此时的学术思想主要限制在程朱理学范围之内，显得缺乏生气。但到了嘉靖以后，由于经济的发展，出现了工商业发展的新兴城市，自发的资本主义经济因素已逐渐萌芽。反映在文化上，市民意识逐渐发生，为了满足这种需要，于是小说、戏曲空前发展，《三国演义》、《水浒传》在此时定型，并且产生了《西游记》、《金瓶梅》这样的长篇名著，并且一再刻版印行。随之短篇小说也相继

出现，“三言”、“二拍”代表了明话本小说创作的辉煌成就。以徐渭《四声猿》为代表的杂剧和以汤显祖“四梦”（《邯郸记》、《南柯记》、《紫钗记》、《还魂记》——又名《牡丹亭》）为代表的传奇剧目，是我国戏剧史上的重要篇章。这些通俗读物的渐次出现，在实质上意味着追求个性解放和对封建制度的冲击，表现了平民文化的一个方面。另外在思想意识方面，也表现出了对程、朱、孔、孟的抨击。晚明的思想家、评论家李贽就是一位杰出的代表人物，他先后写了《藏书》、《续藏书》、《焚书》、《续焚书》、《四书评》等，以大无畏的精神和不凡的勇气，对传统封建思想进行挑战。科学技术方面也产生了许多具有重大价值的著作。其中最著名的有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收载药物 1 892 种，验方 11 091 则，其药物中，包括有矿物、植物和动物种种，是一部空前的伟大药学著作。它曾被译为拉丁、日、英、俄、法等多种文字，流传世界。被著名生物家达尔文称为“1596 年出版的古代中国百科全书”，也有人称它为“东方医学巨典”。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则是一部农业百科全书。是他“常躬执耒耜之器，亲尝草木之味，随时采集，兼之访问，缀而成书”（陈子龙语）。这说明他是经过亲自实践检验的。徐光启不仅是一位著名的农业科学家，而且是一位著名的翻译家，他与来华传教士合作翻译《崇祯历书》、《几何原本》（前六卷）、《泰西水法》、《同文算指》、《测量法义》、《勾股义》、《测量异同》等。宋应星的《天工开物》系统地记述了明代和明代以前的农业、手工业的生产技术和经验。作者经过实地观察研究，对生产技术成就进行了总结，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上述三部著作中，有几项共同的特点：一是参考并引用了大量的文献；二是重视自身的实践；三是附有大量的插图。所以它们都具有很高的科学价值和实用价值。此外还值得提到的是《徐霞客游记》，这部书记录了作者 21 年来在考察全国 16 省的过程中关于地貌、地质、气候、植物等方面的研究成果，是一部学术价值很高的地理学著作。

二、明代私家印书

明代的刻书中，私家刻书所占的比重最大，质量也最优。著名的刻书家很多，且有不少精品，为历来藏书家所珍赏。

明初，刻书不多，风格仍承宋元，无甚变化。正德以后，私家刻书渐多，特别是嘉靖以后，私家刻书尤为风行，翻刻旧本之风大盛。如震泽王延喆，以摹刻宋黄善夫本《史记》而著称于世。孙庆增谓：“惟有王板翻刻宋本《史记》之类为最精。”（《藏书记要》）吴郡袁褧嘉趣堂，刻书多而精，尤其《六家文选注》60 卷，为一时之代表。据袁氏跋云：“余家藏书百年，见购

鬻宋刻本《昭明文选》有五臣、六臣、李善本、巾箱、白文、小字、大字，殆数十种。家有此本，堪称精善。而注释本以六家为优，因命工翻雕。匡郭字体，未少改易。刻始于嘉靖甲午岁(1534 年)，成于己酉(1549 年)，计十六载而完。用费浩繁，梓人艰辛。今摹榻传播海内，览兹册者，毋徒曰：'开卷快然也。'”吴元恭太素馆所刻《尔雅注》也很著名。阮元《尔雅注疏校勘记》说：“明吴元恭仿宋刻《尔雅经注》三卷，嘉靖十七年(1538 年)秋七月，东海吴元恭校刊……绝无私意窜改处……为经注本之最善者，必本宋刻无疑。”其他如陆元大刻《花间集》，沈与文(辨之)野竹斋刻《韩诗外传》，吴县顾春世德堂刻《六子全书》，苏献可通津草堂刻《论衡》，徐时泰东雅堂刻《韩昌黎集》，郭云鹏济美堂刻《柳河东集》等，都是摹宋的精刻本，足与宋刊媲美。另外，无锡安国桂坡馆所刻《初学记》、《颜鲁公文集》，顾元庆所刻《顾氏文房小说》、《明朝四十家小说》(丛书)，也很有名。

万历以后，私家刻书更多，在士大夫之间一时蔚为风气。著名的有吴勉学、陈仁锡、胡文焕、汪廷讷、毛晋等。毛晋是明代晚期最著名的刻书家兼藏书家，江苏常熟人，室名有汲古阁、绿君亭等。自明万历迄清顺治，40 余年刻书 600 多种，积 10 多万块书版，其中以《十三经注疏》、《十七史》、《文选李善注》、《六十种曲》、《六十家词》、《津逮秘书》及《说文解字》等最为著名，流传也最广。毛氏所刻书，世称“毛刻本”或“汲古阁本”。

明代的私家刻书，就地域而言，主要在江、浙两省，这两地是私人藏书家聚居之地，许多藏书家亦多从事刻书。藏书家参与刻书，由于有精良的版本作底本，再加上他们精于校勘，因此明代私家刻书的质量是很高的。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版刻之外，明代的活字印书特别发达。尤其私家印书活字印本很多。明代木活字本，可考的百余种，如吴门刊有《文心雕龙》、长洲韩氏印《曹子建集》、丽泽堂印《璧水群英待问会元》、虞山荣荆堂印《慈谿黄氏日抄》、海虞黄美中校印的王世贞《凤洲笔记》、赵用贤印《十子》、太仓赵枢生印《含玄先生集》，张溥印《百三家集》、上海顾从德顾氏芸阁印《松筹堂集》、福建朱仁儆印李备《新刻史纲历代君断》、云南印陈善《黔南类编》等，皆是私家摆印。唯独官府印书中，除崇祯十一年(1638 年)用木活字排印《邸报》外，它未与闻。仅藩府印书中尚有数种，远不及私家之多。

铜活字印书在明代更是发达。最著名的是无锡华家和安家；套版印刷也在明朝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应用，吴兴闵氏和凌氏的套印书以及金陵吴发祥、徽州胡正言印制的“画谱”、“笺谱”，都是私家出版的范围。因已见前述，兹不再赘。

三、清前期个人著述

清朝统治时期，一直充满着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清王朝为了从思想上控制人民，大力提倡程朱理学，并一再兴起文字狱，以压制人们的反清思想。在提倡程朱理学的背景下，便产生了像陆陇其、李光地、徐乾学等一批程朱理学的鼓吹者和像《通志堂经解》这样的集宋元以来理学家著作之大成的经注。在一再兴起的文字狱的压迫下，另一批学者则选择了逃避现实埋头古书的考据和校勘。像清初的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他们反清未成，而潜心著述，从经世致用出发，写出了《明夷待访录》(黄宗羲)，《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顾炎武)，《读通鉴论》(王夫之)等，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和民族压迫。这在当时是无法立足的。于是考据学由“经世”而转入“避世”，考据学由要求社会改革，转入“为考据而考据”。代表人物有阎若璩和胡渭。阎著有《古文尚书疏证》，以比较的方法证明《古文尚书》是伪书；胡著有《禹贡锥指》、《易图明辨》等，在辨别古书真伪和提倡疑古精神上有其贡献。由考据学而带动校勘学、版本学、辑佚学、音韵学、文字学、训诂学的产生。戴震的《声韵考》、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王念孙的《广雅疏证》是音韵学、文字学、训诂学的代表作。王昶的《金石萃编》、毕沅的《关中金石记》、《中州金石记》、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赵翼的《廿二史札记》、章学诚的《文史通义》都是史考名著。章学诚的《校雠通义》，更是校勘学和版本学的名篇。清代的辑佚书也不少。著名的有余萧客的《古经解钩沉》、任大椿的《小学钩沉》、黄奭的《汉学堂丛书》(又名《黄氏逸书考》)、马国翰的《玉函山房辑佚书》、严可均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等。

文艺方面的著作主要是戏曲、小说：戏曲方面著名的有洪昇《长生殿》、孔尚任《桃花扇》等；小说方面，著名的有蒲松龄《聊斋志异》、吴敬梓《儒林外史》、曹雪芹《红楼梦》、李汝珍《镜花缘》等。

四、清前期私家印书

清代由于考据学的发达，带动版本学的兴起，使学者们认识到图书版本的重要，于是学者争先刻书，力纠误本弊病，视刻书为一种功德无量的事业，“积善之雅谈”(张之洞《书目答问·劝刻书说》。这些学者们大多也是藏书家，他们通过刻书以达到图书的交换来补充藏书，所以清代私家刻书特别兴盛。刻书家不胜枚举，著名的有歙县鲍廷博知不足斋、昭文(常熟)张海鹏从善堂、吴县黄丕烈士礼居、金山钱氏和南海伍崇曜粤雅堂等。其中金

山钱氏是刻书世家，从乾隆三十六年(1771 年)开始延至光绪年间，其刻书时间最长，刻书数量也最多。

清代私家刻书除新刻和翻刻不少书籍外，最突出的特点是丛书出版最多。仅据张之洞《书目答问》及叶德辉《书林清话》所记有 130 余种之多。其中最著名的有鲍廷博《知不足斋丛书》、黄丕烈《士礼居丛书》、卢文弨《抱经堂丛书》、毕沅《经训堂丛书》、孙星衍《平津馆丛书》、张海鹏《学津探原》、钱熙祚《守山阁丛书》等。此外还有一种专门刊印某一地方前人著作的“郡邑丛书”，如赵绍祖刻(《泾川丛书》、宋世荦刻《台州丛书》、祝昌泰刻《浦城遗书》等。

清代私家刻书的另一特点是辑佚书不少。如卢文弨《群书拾补》、黄奭《汉学堂丛书》、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等。

除版刻之外，清代私家印书还采用活字及套印技术。据叶德辉《书林清话》称：“嘉道以来，民间则有吴门汪昌序嘉庆丙寅(1806 年)印《太平御览》一千卷，璜川吴志忠嘉庆辛未(1811 年)印五代邱光庭《兼明书》五卷、元遒贤《河朔访古记》二卷、《洛阳伽蓝记》五卷，朱麟书白鹿山房嘉庆壬申(1812 年)印《中吴纪闻》六卷、高似孙《纬略》十二卷，张金吾爱日精庐嘉庆己卯(1819 年)印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五百二十卷，成都龙燮堂万育嘉庆十四年(1809 年)印《天下郡国利病书》一百二十卷，道光三年(1823 年)印《读史方舆纪要》一百三十卷、《形势纪要》九卷，京师琉璃厂半松居士印《南疆绎史》二十四卷、《摭遗》十八卷、《恤谥考》八卷、《南略》十八卷、《北略》二十四卷，留云居士印明季稗史十六种，共二十七卷……凡此皆以木刻活字印书者也。”①至于铜活字及套印书、画，已见前述(第十一章)。

清代私家刻书，颇重质量。不仅选择最好版本作底本，而且校勘精审，不少刻家迎聘著名校勘学者专门为其校勘。如著名学者顾广圻(字千里)因家贫，无力刻书，便先后为黄丕烈、孙星衍、秦恩复、胡克家、张敦仁、吴鼒、汪士钟、洪莹、汪喜孙、廖宾、沈恕、顾之逵等人的刻书进行校勘。经他校刻的宋元本书，多且精。其中给黄丕烈校刻的宋本《国语》、《战国策》、《隶释》、《易林》、《舆地广记》；给孙星衍校刻的宋本《古文苑》、元本《唐诗疏议》，给汪士钟校刻的宋本《仪礼疏》，给张敦仁校刻的宋本《仪礼注疏》，给吴鼒校刻的宋本《韩非子》等，皆很有名。每书刻毕，他又综合书中考订语，写成“考异”和“校勘记”附于卷后，成为校勘的典范，极便后人研读。

---

① 注：引文仅节录 1840 年以前。见叶德辉. 书林清话，卷八[M].

清人私刻不仅校勘精审，且写刻精工，其中不少刻家聘名书手为其写版，号为“写刻本”或“精刻本”。如倪霱为薛熙写《明文在》，林佶为王士祯写《渔洋山人精华录》、《古夫于亭杂录》，为汪琬写《尧峰文抄》，为陈廷敬写《午亭文编》，林佶所写的这四部书被誉为“林氏四写”；黄仪也为王士祯写《渔洋续集》，都很有名。林、黄等人并不是普通的佣书手，而是著名学者、藏书家，他们参与写刻图书，更为清椠增色。另据徐康《前尘梦影录》载：“乾嘉时，有许翰屏以书法擅名。当时刻书之家，均延其写样。如士礼居黄氏、享帚楼秦氏、平津馆孙氏、艺芸书舍汪氏以及张古余、吴山尊诸君，所刻影宋秘籍，皆为翰平手书。一技足以名世，询然。”①除了请人写样外，还有作者自书刻版的，如汪士钟书自著《巢林集》，江声用小篆写自著《尚书集注音疏》、郑燮自书《板桥诗集》，黄子云自写刻《长吟阁诗集》，杂以行楷，陆钟辉用行书写《放鸭亭小稿》，张敦仁草书《通鉴补识误》等。这些书皆独树一格，各有千秋。

总之，清代私家刻书很多，由于学者及藏书家纷纷参与刻书，因此不少书质量很高。这对于古代文献的整理和保存，贡献是很大的。

第四节　明清的书坊印书

一、明代的书坊印书

明代的书坊印书是在宋元书坊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弘治以前，闽、浙、蜀三地，承袭宋元仍然是明代坊刻的中心。其中又以闽为最兴盛。闽之书坊又主要集中在建阳之麻沙、崇化两地。这里书坊林立，其中不少是世代相因，历史久远，如余氏刻书始于南宋，到了明代后辈数十人同时从事刻书，其中以余象斗的三台馆和双峰堂为最著名。他以编刊《四游记》、《列国志传》、《诸葛孔明异传》、《英烈传》、《唐志传》、《岳王传》、《东西晋演义传》、《新刊皇明诸司廉明奇判公案》等通俗小说著称于世。他不仅刻书，而且编书，像《皇明诸司公案传》及《四游记》中的《南游记》及《北游记》都是他自编的。他所刻的书中，特别着意于插图，上图下文，图文并茂。其他百年以上的老坊，还有郑氏宗文堂，由元大德六年(1302 年)一直刻到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 年)共 298 年；刘氏日新堂，由元顺帝至元四年(1338 年)一直刻到明嘉靖八年(1529 年)，共 191 年；杨氏清江书堂由明代宣德六年(1431

① 叶德辉. 书林清话，卷九[M].

年)一直刻到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 年)共 122 年；刘氏安正堂由明代弘治十七年(1504 年)一直刻到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 年)共 107 年。足见其坊刻之兴盛。据《嘉靖建阳县志》卷五书所载坊书目收录有 385 种之多，戏曲小说之类尚未列入。《重修建阳县志》则称坊书达 451 种。杭州坊刻中刻书较多的有容与堂，以刻李卓吾评点的小说、戏曲为著名，其刻字体隽美，为明代杭刻的代表；此外，徐象秐曼山馆刻有《古诗选》九种、《国史经籍志》、《国朝献征录》、《东坡先生尺牍》、《五言律祖》、《玉堂丛话》、《唐荆川先生纂辑武编》等；以及段景亭读书坊刻有《怡云阁浣纱记》、《孔子家语注》、《古今诗话》79 种、《徐文长文集》、《昭代经济言》、《名山胜概记》、《关尹子注》、《扬子法言注》、《证治医便》、《五经纂注》等。嘉靖以后，四川坊刻已不多见，浙江刻书也式微，逐渐为徽、苏两地所代替。万历到崇祯数十年中，由于湖州、歙县刻工移居金陵、苏州一带，因此，南京、苏州、常熟书坊又盛极一时。金陵(南京)书坊，可考者 93 家。其中唐姓书坊为最多，有 15 家；次为周姓书坊，有 13 家。仅万历年间唐姓各家所刻之经书、医书、文集、尺牍、琴谱及戏曲小说等就有数百种，其中唐对溪世德堂(一名富春堂)刻书最多，大约不下百种。周姓以周曰校(字应贤，号对峰，室名万卷楼)为最著名。刻有《新刻校正古本大字音释三国志通俗演义》、《新刊大宋中兴通俗演义》、《新镌全像包孝肃公百家公案演义》、《新刊京版批评百将传》、《东垣十书》、《新刊举业利用六子拔奇》、《新刻沈相国续选百家举业奇珍》等书。

苏州书坊也有家族经营的特点，其中以叶氏和陈氏书坊最多。叶氏有叶敬池、叶敬溪、叶启元玉夏斋、叶昆池能远居、叶瑶池天葆堂、金阊书林叶瞻泉、叶华生；陈氏有陈龙山酉酉堂、陈长卿、陈仁锡。其中叶启元玉夏斋曾自主编刊《玉夏斋传奇》10 种，叶昆池能远居刻《新刻玉茗堂批点南北宋传》，叶敬池刻《石点头》、《醒世恒言》，陈龙山酉酉堂刻《奇赏斋广文苑英华》系列 5 种；陈长卿刻《古今医统大全》、《刘氏鸿书》、《文心雕龙》、《妇人良方》等；陈仁锡刻《三国志》、《石田先生集》、《陈白阳集》、《藏书》、《资治通鉴》等。除叶、陈两家之外，其他刻书书坊也不少。刻书较多的有金阊的拥万堂刻《古名儒毛诗解》16 种，《秘书》9 种，《吕东莱先生左氏博议》、《唐宋八大家文钞》等；金阊龚少山刻《新镌杨升庵批点隋唐两朝志传》、《新镌陈眉公先生批评春秋列国志传》；金阊大观堂刻《宋三大臣汇志》，以及吴县衍庆堂刻的《三言》、天许斋刻的《天许斋批点北宋三遂平妖传》、大来堂刻的《白雪斋选定乐府吴骚合集》等也很著名。

自永乐迁都北京之后，北京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不仅有发达的官刻，坊刻也兴起，成为北方的刻书中心。其可考的书坊将近 10 家：

汪谅金台书铺、永顺书堂、金台岳家、国子监前赵铺、宣武门内铁匠胡同叶铺、刑部街住陈氏、冯氏忠孝堂、金台鲁氏书林等。其中以汪谅与永顺书堂刻书最多。汪谅刻书仅见于其于嘉靖元年十二月所刻《文选注》卷末附刊的鬻书广告所列书目计有：翻刻司马迁正义解注《史记》一部，翻刻梁昭明解注《文选》一部，翻刻黄鹤解注《杜诗》一部全集，翻刻千家注《苏诗》一部，翻刻解注《唐音》一部，翻刻《玉机微义》一部，系医书，翻刻《五经直解》一部(刘寅进士注)，俱宋元板；重刻《名贤丛话诗林广记》一部，重刻《韩诗外传》一部(十卷韩婴集)，重刻《潜夫论》(汉王符撰)一部，重刻《太古遗音大全》一部，重刻《臞仙神奇秘谱》一部，重刻《诗对押韵》一部，重刻《孝经注疏》一册，俱古板。

永顺书堂刻书是1967年在上海嘉定一座明代宣姓墓中出土的，是明宪宗成化年间刻印的唱本传奇，共12种，包括《新编全相说唱足本花关索传》、《新刊全相唐薛仁贵跨海征辽故事》、《新编说唱全相石郎驸马传》、《新刊全相说唱包侍制出身传》、《新刊说唱包龙图断曹国舅公案传》、《新编说唱包龙图公案断歪乌盆传》、《新编说唱包龙图断白虎精传》、《新编说唱包龙图断赵皇亲孙文仪案传》、《新刻全相说唱开宗义富贵孝义传》、《新刊全相莺歌孝义传》、《新刻全相说唱张文贵传》及《新编刘知远还乡白兔记》等。这是过去任何目录都没有著录过的。现入藏上海博物馆。

总之，明代坊间刻书十分发达，不仅许多书坊历史悠久，世代相传，而且其分布区域甚广，刻书中心也较历史上发生了一些变化，刻书内容包罗万象，突出特点是面向民间，以供大众日常所需为主，除医书和科举用书、童蒙读物外，其他如小说、戏曲等民间文学读物出版也很多，再就是书坊开始不限于刻书而兼及编书与售书，实现编、刻、售一条龙经营方式。书坊刻书主要以营利为目的。明初取消了书籍税，这是明代书坊发达的原因之一。但明代书坊刻书的质量又是历代书坊刻书中最差的，其中不少书坊为了谋利，或在刻书时剪头去尾，或冒名顶替，伪造古书甚至有些书贾常用挖补年号、伪造牌记等手段，冒充宋元善本。这就严重影响了坊刻本的质量，降低了其使用价值。但坊刻书比起官刻书、私刻书来以其售价低廉，能满足下层人士的购求需要，尤其是通俗读物的出版，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普及文化的作用。

二、清代的书坊印书

清代的刻书以官刻和家刻特为强盛，尤其在清前期的康、雍、乾三朝，坊刻则相对较弱，难以与之抗衡。但官刻和家刻主要集中于皇帝钦定之书以及前朝经史子集方面，而坊刻则另辟蹊径，选定科举用书、蒙学课本、生活

日用和通俗文艺类书籍，以及接受官家、私家的委托刻印。同时坊间也不专以刻书为业，而转向以销售经营为主，刻书反而成为副业。

北京、南京、苏州是清代书坊比较集中的地方。

琉璃厂和隆福寺是北京书坊的集中地。琉璃在北京南城，本名海王村，自明代起，其地即有书肆，至清而大盛。据孙殿起辑《琉璃厂小志》引翁方纲《复初斋诗集》注云："乾隆癸巳（1773年）开四库馆……每日清晨，诸臣人院，设大厨，供茶饭。午后归寓，各以所校阅某书应考某典，详列书目，至琉璃厂书肆访之。是时，浙江书贾奔辏辇下；书坊以五柳居、文粹堂为最。"①显然由于《四库全书》的纂修，带动了琉璃厂书肆的发展。然而琉璃厂书肆以书籍经营为主，自营刻书的不多。据记载，清时琉璃厂书坊先后达120余家，其中刻书的仅30余家，每家刻书种数亦不多，多者几十种，一般仅数种而已，且多数刻书在清中叶以后。引文中提到的五柳居，其主人陶正祥，字庭学，江苏苏州人，乾隆年间设肆于琉璃厂路北，以精通版本学知名学界，以经营旧书为主。陶正祥于嘉庆二年（1797年）卒于京师肆中，由其子陶珠琳（字蕴辉，号琅轩）继承父业，在琉璃厂及苏州两地经营古书业，并开始刻书，刻书有《十三经注》、《抱朴子》、《太玄经集注》等。

与五柳居齐名的文粹堂，清李文藻《琉璃厂书肆记》称"五柳居陶氏……与文粹堂皆每年购书于苏州，载船而来"，又说，"书肆中之晓事者，惟五柳之陶，文粹之谢，及韦也。韦，湖州人，陶、谢皆苏州人"。文萃堂于嘉庆六年（1801年）刻有巾箱本、三节版蒙汉文对照《新刻校正买卖蒙古同文杂字》，上、下节是对照文字，中间是图，收录的是当时习用的会话用语。还刻有满、汉、蒙文对照的《三合便览》。

《琉璃厂书肆记》中所说的"韦"，是鉴古堂主人。其刻书有吴之振《辑宋诗钞》。

清代坊间刻书最多的是于道光年间设肆于琉璃厂东门内路南的善成堂。其主人为汤祥瑟，共刻书达49种之多，计有《监本书经》、《新增算法统宗大全》、《唐诗三百首补注》、《说唐全传》、《徐氏十二种》、《证道秘书十种》、《第一才子书》、《古文辞类纂》、《南北宋志传》、《诗义折中》、《幼学故事琼林》、《本草原始》等。

琉璃厂外，隆福寺也集中一批书肆，其中著名的有刘英烈聚珍堂，陈氏老二酉堂、高致平文成堂、李兰芳宝书堂、龚宜古三槐堂等也间或刻书。

除上述外，北京厂寺的印书，多在清中期以后，而且多数是重印或影

① 孙殿起. 琉璃厂小志[M]. 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32.

印，自主编刻的不多。

清代南京的书坊中，有一些历史较为悠久。如郑氏奎壁斋、周氏大业堂、唐氏世德堂都是由明入清的老书坊；新设书坊有芥子园、萃文书屋、李光明庄等。新设书坊大多在清中叶以后。南京书坊刻书大多集中在通俗小书、诗文选本等方面。

苏州书坊上承明代的强势，继续保持在全国的领先地位。根据各种资料记载有名号可考清代苏州书坊在70家左右，且家家有刻书的记载。如由明末至清的金阊赵氏书业堂，自康熙至道光年间，先后刻有：《花镜六卷图》、《新评龙图神断公案》、《说呼全传》、《豆棚闲话》、《新刻批评绣像西游记》、《芥子园画传》、《英云梦传》、《景岳全书》、《韵综》等。清初金阊书林尤氏宝翰楼，康熙至道光间，先后刻有：《五朝诗七律英华》、《增订广舆记》、《中晚唐诗》21种，毛宗岗评《四大奇书第一种》(即《三国演义》)、《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真本》、《李卓吾评忠义水浒全传》等数十种。与书业堂、宝翰楼并称清初三大家的绿荫堂，康熙时刻有《百名家诗钞》100卷、《江右三大家诗钞》9卷、《平妖传》等。

苏州三经堂以刻佛经、善书为著名，先后为禅兴寺桥沈氏刻《金刚经》，为青浦文昌宫刻《念佛切要》，为娄六善庆庵刻《欲海回狂》，为锄金堂吴氏刻《人佛问答》，为乍浦沈义丰刻《感应篇说定》，为常州吴氏刻《阴骘文广义》，为盘门张义芳刻《关帝胜迹图》，为上海唐恒美刻《训俗遗规》，为江西徐白舫刻《劝孝篇》，为南翔井氏刻《雷霆显警录》等。

清代苏州书坊以席氏扫叶山房最为著名。其初，乾隆间席世臣设肆于苏州，清末又在上海、汉口、松江等地设分支机构长期从事刻书活动、并增添铅印、石印设备，到民国初年还出版过《文艺杂志》。它是清代经营时间最长久、影响最大的民间书坊。扫叶山房出版经史子集以及笔记小说、村塾所用读本，多至数百种。所见最早的是补刻汲古阁本《十七史》中的《旧唐书》、《旧五代史》；其次是乾隆六十年(1795年)所刻宋王偁《东都事略》、宋叶隆礼《契丹国志》、宋宇文懋昭《大清国志》、清邵远平《元史类编》，这四种书世称“四朝别史”。嘉庆二年(1797年)刻明钱士升《南宋书》，嘉庆五年(1800年)又刻《唐六典》、《东观汉记》、《吴越备史》。以上各书字体皆仿汲古阁本，是坊刻中的佼佼者。

整体而言，清代书坊刻书自中叶以后逐步退出了历史舞台，这是因为西方先进的铅印、影印等印刷技术在我国广泛应用之后，我国传统的雕版印刷已不适应时代的需要。这是必然的结局。但是它的历史功绩，却不能因此而抹杀。新的事物代替旧的事物，既是历史的必然，也是时代的进步。

第十三章　明清官私藏书全面兴盛

第一节　明代官府藏书

一、明代文渊阁和其他宫廷藏书

官府藏书的建立　朱元璋早在反元起义大军向元朝统治者进行斗争时，就为将来建立封建专制政权作了充分的准备。一方面，多方吸收知识分子，壮大自己的力量；另一方面，命有关部队注意收集散于各地的图书。据《明史纪事本末》载，元顺帝至正二十六年(1366 年)夏六月，朱元璋命有司访求古今书籍，藏之秘府，以资览阅。明洪武元年(1368 年)建都南京后，徐达等北伐元大都，全部接收元皇室藏书，“命大将军收秘书监图书，太常法服，祭器，仪象版籍”(《国史经籍志·序》)。元奎章阁、崇文阁等秘室图书，尽载南京。既定燕，又诏求遗书于民间。同年，十一月辛丑，“建大本堂。取古今图籍充其中，召四方名儒教皇太子诸王。”洪武三年(1370 年)三月，置秘书监，掌内府书籍。此后，续有收书和修葺国子监旧藏书板之举。总之，朱元璋在立国初年，通过征集元代遗留典籍，收罗民间藏书，承袭元代秘书监制度，建立了官府藏书体系，即包括供政事参考的国家藏书文渊阁，供宫廷阅览用的皇宫藏书大本堂，初步奠定了明代官府藏书的体制。

但是，朱元璋为了集王权于一身，削诸大臣的政治权力，于洪武十三年(1380 年)七月，罢秘书监，使官藏管理统归翰林院典籍执掌，实际上削弱了官藏的管理力量，导致了明代官府藏书管理不善，典籍散失，馆阁徒有其名的严重局面。

明代官府藏书得以迅速发展是在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以后。永乐四年(1406 年)，明成祖视朝之暇，常到便殿阅览图书，曾问及文渊阁藏书情况，

解缙回答说，尚多阙略。朱棣即谓："士庶家稍有余资，尚欲积书，况朝廷乎？"(《明史·艺文志》)于是选派熟悉典籍的官员，到各地购求典籍，并批示他们，书籍不可计多少价钱，只要有奇书，尽量满足持书者的要求，这样才能搜访得罕见之书。当时委派礼部尚书郑赐遣使访购，收书颇多。故在《永乐大典》编成后，成祖曾称，"购募天下遗籍"(见《明会要·书籍》)。永乐六年(1408年)，《永乐大典》编成，贮于文渊阁。永乐十九年(1421年)，迁都北京，南京文渊阁图书大量北运，"诏修撰陈循取文渊阁书一部至百部，各择其一，得百柜，运致北京"(《明史·艺文志》)。《永乐大典》迁至北京，藏于文楼。

明仁宗以后，皇宫藏书续有扩建。"仁、宣二世，世既升平，文物益盛"(钱大昕《文渊阁书目跋》)。宣德八年(1433年)，宣宗朱瞻基命杨士奇、杨荣于馆阁中择能书者数十人，取五经、四子及《说苑》之类副本，分储广寒、清暑二殿及琼花岛，用于观览。"当是之时，典籍最盛。"又有通集库、皇史宬，主要收藏档案，也有一些书籍。中央政府的各种机构，如翰林院、两京的国子监、各部署郎曹，也各有所储，官府藏书体系已经建立和完善。藏书数量也很可观，如明宣宗时，"秘阁储书约二万余部，近百万卷，刻本十三，抄本十七"(《明史·艺文志》)。正统间，杨士奇编《文渊阁书目》只有书名而无卷帙数，文渊阁藏书即达43 200册，估计在10万卷以上。

明代中后期，官府藏书处所未有新的设置，早年积累的藏书，又因缺乏严格的管理制度，无定期的整理加工，藏书散失严重，官府藏书逐步趋于衰落。

二、明代官府藏书系统

明代官府藏书系统，大致可分为二。其一，宫廷藏书，明初，建都于南京，永乐年间，迁都于京师(北京)，故两地均有宫廷藏书，见于记载的有文渊阁、大本堂、华盖殿、东阁、皇史宬、司礼监、通集库等。因为收藏的重点不同，所以，各个藏书处管理方法亦有区别。其二，中央政府机构藏书，如翰林院、国子监、行人司等。翰林院有南北两院，国子监亦分南监北监。洪武十三年(1380年)取消秘书监制度，只在翰林院设典籍，故明代综合性藏书处所相当于国家藏书的文渊阁，各项事务由翰林院管理。

1. 文渊阁

宫廷藏书中心。明初南京建宫殿时只有文渊阁。洪武三年(1370年)置秘书监，管理内府图籍。明太祖攻克元都，徐达缴获元大都典籍运至南京人藏文渊阁。明成祖永乐年间，修纂《永乐大典》，充分利用了文渊阁所藏典

籍。永乐十四年(1416 年),明成祖还查问文渊阁藏书,当知道藏书还不完备时,立即命令郑赐等广泛征集图书。永乐十九年(1421 年)迁都北京后,《永乐大典》和其他重要典籍都运往北京,但南京文渊阁留存大量书籍,其提供参考、阅读的职能仍然存在。(京师)文渊阁作为朝廷藏书中心,屡屡受到朝廷最高统治者的巡视,明宣宗"临视文渊阁,亲披阅经史,与少傅杨士奇等讨论,因赐士奇等诗。是时秘阁贮书约二万余部,近百万卷,刻本十三,抄本十七"(《明史·艺文志》)。又明英宗正统六年(1441 年)杨士奇编有《文渊阁书目》,他曾称当时对文渊阁书籍"逐一打点清切",《文渊阁书目》记载,其藏书按《千字文》排次,自天字至往字,各橱内容如下:天字五橱,收藏明朝历代君王御制御定文集等书;地字四橱,收易、书、诗、春秋、周礼、仪礼、礼记等书;玄字一橱,收礼书、乐书、诸经总类等书;黄字三橱,收四书、性理、经济(附奏议)等书;宇字六橱,收史部之书;宙字二橱,收史附、史杂之书;洪字一橱,收子部之书;荒字一橱,收子杂、杂附之书;日字三橱,收文集之书;月字二橱,收诗词之书;盈字六橱,收类书之书;昃字一橱,收韵书及姓氏之书;辰字二橱,收法帖、画谱等书;宿字一橱,收政书、刑书、兵法、算法之书;列字二橱,收阴阳、医书、农圃等书;张字一橱,收道书;寒字二橱,收佛书;来字一橱,收古今志书;暑字三橱,收旧志;往字三橱,收新志。以上共 20 号 50 橱,共有 7 297 号,即有7 297种书,50 000 多卷。又有文献称:正统六年从南京迁来之《永乐大典》曾入藏于文渊阁。正统十四年(1449 年),南京文渊阁火灾,藏书损失殆尽。嘉靖三十六年(1557 年),京师宫中发生大火,明世宗一夜下了三四道命令,要把《永乐大典》抢救出来。嘉靖四十一年(1562 年),宫中又传火警。文渊阁藏书的损失如何,《永乐大典》是否保存下来,都是研究者探讨的问题。

2. 大本堂

洪武元年(1368 年)建,综合性藏书处,供皇族子弟使用。

3. 皇史宬

嘉靖十三年(1534 年)建,档案库,主要收存皇朝《实录》、《宝训》和重要档册。嘉靖四十一年(1562 年)至隆庆年间,朝廷经过六年重录《永乐大典》一份,据称曾存于皇史宬。

4. 司礼监

明宫内刻书机构,主要收藏由司礼监刻出的内版书,相应的也少量收藏有作为底本的图书,特别是《佛藏》、《道藏》、《番藏》等典籍。

5. 国子监

南京国子监于洪武十五年(1382年)建成。国子监作为朝廷教育的最高学府，由于教学和学习之需，都收藏各类图书，并有典籍掌管。国子监还附刻图书，亦收藏书版。南京国子监一方面保存了明初攻入元大都时徐达所收得的大量书版，如称为“眉山七史”的南北朝时史书书版。另一方面也有自刻的《史记》等史书。南京国子监所印“二十一史”，称南监本，影响书林甚巨。北京国子监建于永乐元年(1403年)，永乐十九年，改称京师国子监。京师国子监亦担负提供师生阅读的任务，但也刻有书籍，一般称为北监本。

三、明代官府藏书的管理和利用

1. 官府藏书的管理

明官府藏书，只重视收书，不重视保管，更无校书活动，故官府藏书中宫廷藏书管理不善，中央机关部署郎曹藏书，也因无专人管理，散失严重。

英宗正统年间，杨士奇等编《文渊阁书目》，曾论及当时官府藏书，他说：“本朝御制及古今经史子集之书，自永乐十九年(1421年)南京取回来，一向于左顺门北廊收储，未有完整书目。近奉圣旨，移储于文渊阁、东阁，臣等逐一打点清切，编制字号，写完一本，总名曰文渊阁书目。”(《文渊阁书目题本》)实际上，这次清点是在立国近一百年后，可见，在此之前文渊阁藏书管理是比较混乱的。

原来内阁的藏书保管有序，特别是宋元旧籍“装用倒折，四周外向，虫鼠不能损”。到了弘治、正德以后，藏书多有缺残，且因地处卑湿之地，不宜于收藏图书，故有人曾多次建议修建新馆，派官员整理图书，加强管理。但封建官僚机构重叠，办事不力，虽委派官员整理，收效甚微。明正德十年(1515年)，因内阁并东阁藏书有残阙，故令原管主事李继先等次第修补。但藏书管理上制度不严，任意取拿，李继先监守自盗，精本善本损失很多。阮葵生曾谓：“当时杨廷和在阁，升庵挟父势屡至阁翻书，攘取甚多。又典籍刘伟、中书胡熙、主事李继先奉命查对，而继先则盗易宋刻精本。”《明史艺文志序》在总结明中后期官府藏书情况时，曾称：“其后(指弘治以后)内阁诸书，典司者半系赀郎，于四部之旨懵如，且秩卑品下，馆阁之臣假阅者，往往不归原帙。值世庙而后，诸生多不知文，不复留意查核，内阁之储，遂缺佚过半。”万历间，张萱等编《内阁藏书目录》，“视前所录，十无二三。所增益者仅近代文集、地志，其他唐宋遗编，悉归子虚乌有”。

2. 官府藏书的利用

明官府藏书的利用，大致有三：其一，提供历朝皇帝阅读。如明初几个

皇帝，都有利用宫廷藏书的记载，朱元璋谓："治国以教化为先。""古先圣贤立言以教后世，所存者书而已。""读书穷理，于日用事物之间，自然见得道理分明，所行不至差谬，书之所以有益人也如此。"明成祖曾谓："金玉之利有限，书籍之利岂有穷也。"他们或直接利用文渊阁藏书，或于宫廷中别置藏书处所，究其目的在于就近阅读方便，利用藏书提供政事参考也便利得多。其二，利用藏书培养统治阶级人才。如永乐二年(1404 年)，命解缙等选新科进士中优秀者修撰曾启，编修周述、周孟简及庶吉士杨相等 28 人，就学文渊阁。这些人由司礼监给纸笔，光禄寺给朝暮馔，礼部月给膏烛钞人三锭，并由工部择近宅居之。明翰林院是安插文人学士的"储才重地"，通过文渊阁进修结业后，可升皇朝重要职务或外放地方官。宫廷中的藏书，如大本堂者，则是培养皇太子诸王的重要课堂，"诸儒专经面授，分番进直，迭班侍从"。授课老师皆选勋旧大臣兼领，可看出其在宫廷中之地位。其三，提供典籍，为修撰和编辑《永乐大典》等类书服务。清全祖望《钞永乐大典记》谓"若一切所引书皆出文渊阁储藏本"似属当然，否则这部"包括宇宙之广大，统会古今之异同，巨细精粗，粲然明备"的《永乐大典》，如何能于五年之内完成并抄就呢?

3. 明代翰林院统管典籍

朱元璋立国后，采取分封制，企图加强皇室统治。明初中枢政务设中书省，故元代秘书监制度仍然保留。洪武十三年(1380 年)，废丞相制度，撤销尚书省，由六部尚书分任国务，直接对皇帝负责，以期权力高度集中。又有内阁协助皇帝，兼任顾问和秘书的职务。明内阁设学士，故有华盖殿大学士、谨身殿大学士、文华殿大学士、文渊阁大学士和东阁大学士之称。据此，明文渊阁作为朝廷中枢机关，其阁职不是藏书机构专门人员，而是一种殿阁头衔。

明初开始设翰林院，洪武十三年(1380 年)废秘书监，将前代秘书监、史馆、著作局、起居郎、舍人等职能统入翰林院。洪武十八年(1385 年)设学士、侍读学士、侍讲学士为正官，侍读、侍讲、五经博士、典籍、侍书、待诏为属官，修撰、编修、检讨为史官。这是就全院设置官员而言。翰林院学士负责词翰礼文，起草诰敕，详正图籍，考议制度，以文学备顾问，出入侍从，参谋议，官属正五品。与华盖殿等三殿、二阁大学士，居同等品位，担负的职责也相似。典籍守古今四库书籍。翰林院设"典籍"二人，官属从八品。史官负责修国史，有修撰、编修、检讨等官，从六品至从七品。

明代翰林院官员，其中"典籍"主要从事藏书具体事务，提供书籍服务于朝廷；凡朝廷中重要书目编制，一般均由翰林院学士主持进行，如宣德正

统间杨士奇等编制《文渊阁书目》。殿阁大学士和院内官员，可以提出对典籍管理保存的意见。如万历中的中允（左右春坊皆称中允，属詹事府官员）焦竑，在论及修史事的四件事时，其中有“书籍之刍议”一条，论及修史需要参考材料，才能圆满完成，建议收集当代典籍。就其执掌范围而言，翰林院主要掌管政府机构藏书事宜。明代宫廷藏书管理，在詹事府内置司经局，有洗马、校书、正字等官。洗马掌收储经史子集，刊辑图书，立正本副本储本以备进览，校书、正字掌缮写装潢，并铨其讹谬，调其音切，以助洗马。从这些官员执掌的范围来看，主要是太子的官属，所以可看成是宫廷藏书的管理官员。

第二节　清代官府藏书

一、清代前期官府藏书的发展

1. 清初对藏书的收集与整理

清王朝建国后，除政治、军事上镇压汉族人民的反抗外，文化思想上也加以严密的控制，大兴文字狱，杀戮大批知识分子，强化和巩固封建专制统治。与此同时，提倡理学，举博学鸿儒，网罗明代遗臣，纂辑各种图籍，企图统一言论。故立国初年，不断收集前代遗书，广泛收罗四方典籍，建立皇朝藏书体系。

清王朝首先承袭了明宫廷全部藏书。清初政府藏书有内阁、翰林院，国子监等亦有藏书。康熙时宫廷藏书处为昭仁殿。清初为了编纂多种图籍，如校勘《十三经》、《十七史》、纂修《明史》和前代各种诗文总集，需要参考各种图书，故屡次搜访朝廷各部及各地遗留图籍。康熙四年（1665 年）八月谕礼部，因修《明史》，征集明天启年间实录，并称：“其官民之家，如有开载明季时事之书，虽有忌讳之语，亦不治罪。”但当时因朝廷禁例甚严，且有各种文字狱之先例，一般士民皆藏匿不献。当时有人称：“当顺治康熙之间，凡明季遗老及当时文人著述，凡有涉及明季三藩之事及年号者，皆有干厉禁。”（《桐城方戴两家书案》）故凡有藏书涉及明事和有碍于统治阶级的各种文字，“争相焚弃”（钱林《文献征存录・朱彝尊传》），“悉付一炬成焦土”（方栄如《义门墓志铭》）。康熙二十五年（1686 年）四月广泛征求典籍，曾下诏：“通都大邑，应有藏编，野乘名山，岂无善本？今宜广为访辑……务令搜罗罔遗，以付朕稽古崇文之至意。”闰四月他强调：“今搜访藏书善本，唯以经学史乘，实有关系修齐治平，助成德化者，方为有用，其他异端稗说，

一概不准收录。”(《东华录》卷十三)并规定由各省督抚征集后送至礼部汇集，如无版刻者催人缮写，交翰林院进呈，有自行呈送者，交礼部汇缴。这种种手段，名为“稽古崇文”，实为加强思想统治，总结统治权术。

2. 乾隆建宫廷四阁和江南三阁

清王朝从康熙开始，注重文治，乾隆即位后，继承前代帝王手法，一方面，高唱崇古右文，另一方面查禁有碍于王朝统治的图籍。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乾隆组织人员从《永乐大典》中辑出300多种图书，并从全国各省大量征集图书，点名要一些藏书家献出自己的藏书，并在书籍市场上补充缺藏的典籍，在此基础上对这些图书进行审定、删改、重编，最后便编成一部大型丛书，因为包罗广泛，篇幅巨大，收录种数达3 000多种，故称为《四库全书》。早在《四库全书》开始编纂时，乾隆从“彰千古同文之盛”出发，准备把《四库全书》分别藏于不同地方，所谓“用昭石渠美备，并以嘉惠艺林”。乾隆四十年(1775年)，称：“凡事预则立，书之成，虽尚需时日，而储书之所，则不可不宿构。宫禁之中，不得其地，爰于文华殿后建文渊阁以待之。”(《文渊阁记》)这是内廷建阁之始。并先后建成文源阁、文津阁、文溯阁。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四库全书》第一份钞成。四十七年七月乾隆发出谕旨说：“因思江浙为人文渊薮……兹《四库全书》允宜广布流传，以光文治。如扬州大观堂之文汇阁，镇江金山寺之文宗阁，杭州圣因寺行宫之文澜阁，皆有藏书之所；着交四库馆再缮写全书三分，安置各该处，俾江浙士子得以就近观摩誊录。”(《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乾隆四十七年七月初八谕》)，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六月，又再下诏书说：“所有江浙两省文宗、文汇、文澜三阁，应储全书，现在陆续颁发藏度。……从前曾经降旨，准其赴阁检视抄录，俾之搜讨。”(《四库全书总目·卷首》)并称：恐地方官吏对图书管理过严，一般士子无从借阅，故明令准许士子到馆抄阅，但不能私自携带回家。总之，江南三阁是向公众开放的。

二、清代官府藏书系统

清初，明代宫廷和政府机构藏书得以保存，清代宫廷藏书就在明代藏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乾隆时，因为收藏《四库全书》陆续建成文渊阁等宫廷四阁，又因为将藏书在江南开放而在江苏、浙江建成江南三阁，同时，在宫廷中为了保存《四库全书》的缩编本《四库全书荟要》，也有专门收藏的藏书处所。此外，翰林院保存全国各地呈送的和采进的各种图书，全国最高学府国子监也收藏图书。这样，在乾隆年间就建立起了官府藏书的完整体系。

1. 宫廷四阁

所谓宫廷四阁，是指收藏《四库全书》的四个宫廷藏书楼，即建于内廷的文渊阁，离宫中的文源阁，承德的文津阁，盛京的文溯阁。其中文渊阁是整个官府藏书体系中的藏书中心，通称是国家藏书，犹如现代通称之国家图书馆。

文渊阁　乾隆四十一年(1776 年)建成，四十七年(1782 年)入藏第一份《四库全书》。因为文渊阁建于内廷，配置管理官吏和其他工作人员，有完善的图书整理和阅览的规则，其直接对象是统治阶级高层官吏，实际上担负着以前秘书省的工作职能，所以，文渊阁是所有宫廷藏书的首位，也是官府藏书系统的核心。

文渊阁的建立，完全是因为收藏《四库全书》的需要。《四库全书》被乾隆帝推崇为“古今数千年，宇宙数万里，其间所有之书虽多都不出四库之目”。因此，有书则要有楼加以庋藏，乾隆四十年(1775 年)，正是《四库全书》编撰进行期间，他出于“凡事预则立”的考虑，在文华殿后增设文渊阁，并规划在其他地方也建立藏书处所。

文渊阁是在乾隆三十九年(1774 年)调查了天一阁式样后，参考天一阁的建筑，按内廷传统建筑的要求而建立的。“阁三重，上下阁六楹，层阶两折而上，瓦青绿色。阁前甃方池，跨石梁，引御河水注之。左右列植松桧，阁后叠石为山，山后垣门一，北向。门外稍东，设直房，为直阁诸臣所居。”(《国朝宫史续编·宫殿三》)文渊阁入藏《四库全书》后，其全楼的布局大致是：一层中三间放置《古今图书集成》和《四库全书总目》，左右间放置经部图书 20 架。二层全部放置史部图书，共 33 架。三层中间放子部书，22 架，左右间放置集部书 28 架。据统计，全楼共有图书 103 架，6 144函，36 275 册。为了便于检阅，经部书面绿色，史部书面红色，子部书面蓝色，集部书面灰色，目录书面则用黄色。

为了加强文渊阁的管理，乾隆四十一年(1776 年)六月，内阁借鉴宋代馆阁管理经验，并考虑到清代宫廷藏书多处的情况，提出由文渊阁统一管理朝廷藏书事务，其他宫廷馆阁不另设立官职。当时拟定的文渊阁管理章程中明确说明《四库全书》分藏于各阁，“非徒广金匮石室之藏，将以嘉惠艺林，启牖后学，公天下之好也”。因此，将阁中图书“特许臣僚借读”。在章程中，他们提出了文渊阁官员的职责分工，文渊阁与内府管理的关系，以及每年的曝书制度等。至于图书的借阅，“如翰林及大臣官员内欲观秘书者，准其告之领阁事，赴署请阅。有愿持笔扎就署抄录者，亦听之。其司籍之员，

随时存记档册，点明帙数，不许私携出院，致有遗缺”①。

乾隆五十二年（1787 年），乾隆在阅读文津阁《四库全书》时，发现书中“讹谬甚多”，所以，要求各馆全面复校《四库全书》。文渊阁和文源阁藏书最早进行复校，同年，复校结束。1925 年，文渊阁《四库全书》为故宫博物院管理。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20 世纪 80 年代，台北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全份。

文溯阁　乾隆四十六年（1781 年）兴建，位于盛京故宫，第三年入藏《四库全书》一份。盛京是满族在东北兴起后的都城，在这里建阁是希望满族子孙不要忘记祖先创业之艰难。文溯阁体制和文渊阁相似，收藏的《四库全书》经部书面用青绢、史部书面用赤绢、子部书面用白绢、集部书面用黑绢，全书 36 000 册，共装成 6 179 函，目录和考证 32 函。文溯阁没有专门官吏，只有九品催长一人、无品级催长一人，负责阁书的保管，乾隆五十二年（1787 年），文溯阁藏书曾经复校。乾隆五十七年（1792 年），当文津阁书又发现错误时，原来在文溯阁校过书的陆锡熊自请到文溯阁校书。1949 年，文溯阁《四库全书》由辽宁省图书馆管理，1966 年，移藏甘肃，现在保存完好。

文源阁　乾隆三十九年（1774 年）兴建，位于圆明园内之水木明瑟，乾隆四十八年入藏《四库全书》一份。乾隆在《文源阁记》中说，“以水喻之，则经者文之源也，史者文之流也，子者文之支也，集者文之派也。流也，支也，派也，皆自源而分”。他说这段话的意思实际上就是要人们去重视典籍，推崇儒学。文源阁的《四库全书》曾于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和文渊阁的书一起复校。咸丰十年（1860 年），圆明园被英法联军焚毁，文源阁也荡然无存。

文津阁　乾隆四十三年（1778 年）兴建，位于承德避暑山庄，乾隆五十年（1785 年）入藏《四库全书》一份。乾隆五十二年（1787 年），文津阁书曾与文渊阁书一起复校。1913 年，文津阁《四库全书》拨交京师图书馆管理，后归北京图书馆。2003 年，文津阁《四库全书》因为保存完整，部分图书内容比文渊阁本更有特色，由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

2. 江南三阁

所谓江南三阁，是乾隆为了把《四库全书》分散收藏于江苏、浙江而建立的三阁藏书楼。由于其藏书可以公开阅览，提供士子利用，所以，江南三阁是清代官府藏书向公众公开的藏书机构。

---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纂修四库全书档案[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527.

文汇阁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兴建，位于江苏扬州，乾隆五十二年入藏《四库全书》一份。李斗曾经描写过文汇阁的藏书情况："文汇阁者，凡三层……下一层中供《古今图书集成》，书面用黄色绢。两面橱皆经部，书面用绿色绢。中一层，尽史部，书面用红色绢。上一层，左子右集，子部书面用玉色绢。集部用藕合色绢。其书帙多者，用楠木作函储之。其一二本者，用楠木板片夹之，束之以带，带上有环，结之使牢。"(《扬州画舫录》)文汇阁书毁于咸丰三年(1853年)的战火。

文宗阁　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兴建，位于江苏镇江金山寺，乾隆五十二年入藏《四库全书》一份。文宗阁毁于咸丰四年(1854年)的战火。

文澜阁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兴建，位于浙江杭州西湖孤山圣因寺内，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入藏《四库全书》一份。文澜阁的体制和其他各阁相似。但是，由于文澜阁在江南三阁中，保存时间最长，并为很多藏书家利用，故社会影响较大。咸丰十一年(1861年)，太平军进入杭州时，文澜阁藏书散失颇多，当时杭州藏书家丁丙等人多方抢救得万余册，送还给文澜阁保存。从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浙江和杭州的一些官吏、学者和藏书家，对文澜阁藏书进行补配，使文澜阁保存的《四库全书》基本完好。现在文澜阁《四库全书》由浙江省图书馆管理。

3. 其他宫廷及其藏书

天禄琳琅　内廷昭仁殿藏书，收藏宋、金、元、明版善本图书。

摛藻堂　即御花园中藏书之处，乾隆时从《四库全书》中选出精华，辑为《四库全书荟要》，抄写两份，一份存于摛藻堂。

宛委别藏　收四库未收之书，亦内廷藏书处。

味腴书屋　圆明园之长春园内宫廷藏书，收储《四库全书荟要》一份。

武英殿　宫廷刻书处，亦收藏各类图书。

4. 属于政府机关的藏书

翰林院　清翰林院是闲散职务之所在，修《四库全书》时留下的底本，收藏于翰林院。此处藏书可供核对文渊阁等之正本。

国子监　朝廷最高学府，供应师生阅读，亦有藏书，并设典籍掌管。

至于其他官署，如内阁等亦有藏书，提供政事参考。

三、清代官府藏书管理和利用

1. 清代官府藏书管理机构

清代官制在雍正、乾隆两朝比较稳定，官府藏书因内外七阁，特设官府藏书的管理机构——文渊阁职。下有领阁事、直阁事、校理、检阅、内务府

办事司员等官。文渊阁的职能似前代的秘书省，故其下属官员分别担负着秘书监、少监、丞、郎、校理、正字等的工作，大致分工如下：

文渊阁领阁事，满汉各1人，以大学士、协办大学士、翰林院掌院学士兼任。“掌总领秘书典司册府”，即管理朝廷(宫廷)图籍的总管。但文渊阁领阁事与内阁之文渊阁大学士等衔是不同的。

文渊阁提举阁事，1人，以内府大臣兼任。“率内务府官属以综理阁务”，即内阁藏书之实际负责者。

文渊阁直阁事，满汉共6人，以内阁学士、詹士、侍读、侍讲学士等官兼任。“掌典守厘辑之事，以时与校理轮番人值，凡春秋曝书，则董率而经理之。”即文渊阁的具体负责者。

文渊阁校理，16人，“分掌注册点验之事”。

文渊阁检阅，8人，“掌排次清厘之事”。

以上两种官员，犹如现在的图书整理与书库管理。又有文渊阁内务府司员四人，笔帖式4人，“掌一切收发启闭扫除及稽查宿直之事”，即事务工作人员(以上参见《东华续录》乾隆八十三)。

清代文渊阁的各种官员和他们的职责，虽然看来分工很细，但实际上从事工作的只有内直阁事、校理、检阅等常任官员。其工作范围，包括了朝廷各藏书阁的日常事务，故可称为朝廷的藏书管理机构。因为内务府奉宸苑管理皇家园苑，如圆明园等设有管理大臣，便没有对园中文源阁再设专人管理。清代翰林院职能下降，除撰写极少部分的应制文章，一无所事。翰林院保存很多典籍，由典簿一官管理。国子监因收藏典籍颇多，设有典籍一人，“掌经史以备诸生诵习”，也属藏书管理的官员。

清代江南三阁的管理，没有固定的机构和官员，如文宗阁、文汇阁，由两淮盐运使兼管。杭州文澜阁，则由司事、训导等兼管。这些藏书楼没有专门的官员，主要是因为他们的藏书由朝廷颁发，如有问题也由朝廷组织人员校对，一些集中性的工作，如秋季曝书则可临时调集人员处理。

2. 官府藏书的利用

清代官府藏书中，如果从典籍借阅和提供资料两方面看，藏书利用是达到相当程度的。

首先，提供皇帝及近臣阅览，这是宫廷藏书楼的首要任务。康熙帝在回忆他的读书生活时说：“端居乾清宫，取六经之书发而读之，以求契夫古人之心，将以致其用而未能也。又上下古今，盱衡数千载，思昔人之所以致其用者，而求之乎纪志表传编年纪事之文，将以致其用，而知其心之所存，朝斯夕斯，怡然忘倦。”(《国朝宫史·宫殿二》)当然，不同抱负的君王，他们

的读书兴趣、爱好是千差万别的，如果出于政治目的的阅读，那对书籍的结论就完全不一样了。乾隆帝在宫内读书，曾经写过不少对书籍的意见，但是，在编纂《四库全书》时，他对于四库馆所送的各地藏书家的呈献本，各地所送的缴送本所发表的批示，则明显地表现出维护皇朝正统、推崇儒学的思想，对于贪恋故国前朝，对于历史上少数民族的评论，无论是诗文或著作都一律加以严厉批驳，并要馆臣加以删节，甚至予以查禁。当然，宫廷藏书为皇族子孙服务也是经常性的工作。

其次，利用藏书编纂、出版各类图书，这是官府藏书中非常重要的任务。清代官府藏书用于编纂出版活动方面，成绩是非常显著的。如修《四库全书》时，利用明代留下的《永乐大典》从中辑出大量前代失传的稀有典籍，共整理出著作 300 多种。武英殿用这些辑出的著作编成《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出版，这些书籍不仅补充了官府藏书的缺书，而且也是对中国古代典籍的保存。还有，利用馆藏资料编纂新的图书，也为文化积累作了贡献。如朝廷曾组织编纂有大型类书《古今图书集成》、《子史精华》、《佩文韵府》，大型诗文总集《佩文斋咏物诗》、《唐宋诗醇》、《历代诗余》、《历代赋汇》等。乾隆甚至曾经命令馆臣参考明代《历代名臣奏议》编成续编《钦定名臣奏议》。此外，还利用各种典籍编纂会要、政典、地理书和谱牒等类著作。通过整理、校勘，编成新的丛书，或利用这些典籍提供的资料编成新的著作形式，这对封建社会时期的官府藏书来说，应该是物尽其用了。

再次，江浙三阁开放为士子服务，是官府藏书为社会文化学术发展作出的重要贡献。江南三阁中，文澜阁在江浙士子中影响最大。我们查阅了江苏藏书家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发现他的藏书中，经部有大量文澜阁传抄本，计易类有 16 种、书类有 3 种、诗类有 5 种、礼类有 6 种、春秋类有 5 种，说明这个藏书家发现自己缺藏这些书籍，通过抄写的形式补充藏书。像这类情况，还可在其他藏书家书目如陆心源的《皕宋楼藏书志》看到。此外，江苏藏书家钱熙祚编选《守山阁丛书》，因当地找不到善本，便邀集了钱熙泰、顾观光和平湖钱熙咸、嘉兴李长龄、南汇张文虎等六人去文澜阁抄书，他们六人计校书 80 余种，抄书 432 卷。又有藏书家朱绪曾，钱泰吉称他"钞文澜阁宋元人集，已得十之七八"(《曝书杂记》)。像朱绪曾等把文澜阁藏书充分利用的读书人是值得称道的。

第三节　明代私家藏书

明初，明太祖采取了一系列恢复社会经济，缓和阶级矛盾的政策。明成

祖定都北京后，对文化教育的提倡使文化学术得以发展。明中叶后，南方各沿海省份，城市经济繁荣，对外贸易发达，产生了多样的文学艺术著作；由于市民日常用书的需要，商业、手工业、农业、科学技术等方面的著作大量出现，加上印刷术的不断改进与提高，造纸法的普遍改革，形成了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图书出版的繁荣局面。官刻、私刻，特别是坊刻的盛行，为明代私人藏书的积累和传播提供了物质条件。可以这么说，宋元私人藏书的风气，直接影响了明代的私人藏书。而明代文化学术发展的需要，印刷技术的提高，又为私人藏书的兴盛保持了活力。明代私人藏书在中国古代藏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明代私人藏书家的队伍是相当宽泛的。作为社会的上层，有皇室的后裔，即各地分封的藩王藏书家，也有大量朝廷的重臣、高官，而数量较大的是士大夫阶层和乡村地主。因为收藏兴趣、爱好的不同，形成了不同的藏书特色，又因为藏书进行整理、利用的不同，致使藏书质量差别很大。明代中叶，胡应麟曾把当时私人藏书家分为数等。“列架连窗，牙标锦轴，务为观美，触手若新，好事家类也。枕席经史，沉湎青缃，却扫闭关，蠹鱼岁月，赏鉴家类也。至收罗宋刻，一卷数金，列于图绘者，雅尚可耳，岂所谓藏书哉?”(《少室山房笔丛·经籍会通》)

一、发展缓慢的明初私家藏书

明初，虽然结束了长期分裂的局面，又回归到以汉族为主体的封建中央集权的统治。但是，恢复和发展社会的经济和文化，仍需相当时日，因此，从明太祖至明宣宗时，即13世纪中后期至14世纪初期，南北各地的私人藏书发展是比较缓慢的。明初私家藏书首推明室诸藩，明初分封皇室子弟于各地，各地藩王虽然政治上受到压制，但经济上实力雄厚，故他们可以进行各种文化艺术活动，也进行图书编纂、印刷，以至进行典籍的收藏与整理，这样，就使他们在刻印书籍、典籍收藏、学术研究及艺术创作上都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如洪武时封于开封的周藩，永乐时朱有墩，其藏书中以戏剧著作最有特色。传至六世孙朱睦㮮，有万卷堂，藏书更多。又有永乐时的宁藩朱权，藏书也以戏剧著作著称，他还创作了不少戏剧作品。又有封于太原的晋王，也有藏书为世人所重。这些藩王的藏书，因为有比较稳定的经济来源，所以具有连续性。又因为他们的兴趣爱好的关系，所以他们藏书的专门性很强，这些藩王藏书一直到明末才消亡。

明初较有影响的藏书家是宋濂(1310—1381年)。宋濂是明代朝廷大臣，曾奉命修《元史》，博学多才，是散文名家，后迁居浦江(今属浙江)，藏书

数万卷。与宋濂同里的还有郑澜，其家世代藏书，达8万卷。此外，如杨士奇，亦好藏书。其先世藏书数万卷，杨士奇做官后，南北收书甚多。江苏昆山藏书家叶盛，藏书楼称菉竹堂，藏书皆手自雠校，每到一地，则携钞胥钞书，并用官印识于卷端。钱大昕称其"藏书之富，甲于海内"。其书橱铭云："读必谨，锁必牢，收必审，阁必高，子孙子，惟学敩，借非其人亦不孝。"可见其对藏书之珍惜。与叶盛同时的还有太仓陆容，长洲吴宽等藏书家。

二、明中期迅速发展的私家藏书

明英宗正统至明神宗万历初年，一般称为明代中期。其时，皇朝统治开始衰落，朝廷政治腐败，宦官专权，土地兼并日趋激化，封建剥削极其苛重。与此同时，南方地区的经济相对得到发展，沿长江、运河沿岸的杭州、苏州、镇江、扬州和南京等城市经济发达、市场繁荣、交通便利，这些城市印刷技术也相对发达，书市兴旺，这就为当时江南的私人藏书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所以，江南即包括浙江、江苏、安徽和福建、江西是私人藏书发达的地区。

明宪宗成化以后，江南诸省藏书家众多。属江苏境内的如苏州的朱存理、杨循吉、都穆、文征明、钱同爱、张寰、顾元庆，华亭的徐献忠、何良俊、朱大韶，上海的陆深、黄标。嘉靖、隆庆年间，武进有唐顺之，太仓有王世贞，长洲有钱谷、刘盛，海虞有杨仪，均是藏书名家。属浙江境内的如归安茅坤，乌程沈节甫，嘉兴项元汴，兰溪胡应麟，其中以明州范钦最为有名。

嘉靖年间建于宁波的天一阁，是明兵部右侍郎范钦的藏书楼。范钦喜欢读书、聚书、藏书，并能蓄书。他购置了浙东丰道生万卷楼藏书之剩余，并广泛购抄，罗致海内奇书，注意当时各地出版的地方志和明代文献，藏书达7万卷以上。所建天一阁，建筑宏伟，并注意隔离住宅，以避水火之灾，成为浙东第一藏书楼。为了保存好楼内藏书，范氏子孙相约订立族规，规定其书不出阁，不借人，子孙有志读书者，就阁读之，不许夜登书楼，不嗜烟草，以免发生火灾。并规定书楼钥匙分房掌管，禁书籍下阁梯，非各房子孙齐至不开锁。子孙有私自开门者，罚不与祭三次，私领亲友入阁及擅开书橱者，罚不与祭一年，擅将书借出外房及外姓者，罚不与祭三年。典押事故者，除追惩外，永行摈逐。正是由于这样严密的管理制度，使天一阁藏书得以保存下来。

这些藏书家不仅家中富有藏书，而且其藏书的利用也很突出。如唐顺之、王世贞、茅坤等都是有名的文学家，他们利用所藏典籍从事学习与写

作，并利用藏书作为编辑书籍，进行学术研究之用。王世贞为胡应麟作《二酉山房记》，谓胡应麟藏书至42 384卷。且称赞胡应麟不仅藏书多，而且藏书能发挥作用，即聚与读相结合。王世贞认为："世有勤于聚而倦于读者，即所谓聚天下书，犹亡聚也。有侈于读而俭于辞者，即所谓读天下书，犹亡读也。"这可以代表当时正确的藏书主张。

三、明后期的私家藏书

明万历以后，各地私家藏书更为普遍。江苏金陵有焦竑，江阴有李仲翀、朱承爵，华亭有陈继儒，上海有王圻、施大经、宋懋澄、俞汝辑。尤以海虞藏书家特多，如赵琦美的脉望馆，钱谦益的绛云楼，毛晋的汲古阁。浙江的藏书家由浙西向浙东发展，著名的藏书家如山阴祁承㸁的澹生堂，余姚钮石溪的世学楼、黄宗羲的续钞堂，宁波陈自舜的云在楼、陆宝的南轩。他们在藏书积累和利用上都富有特色。一些藏书家兼有藏书和著作、出版等多种能力，对当时和以后的学术文化发展贡献很大。

汲古阁是明末毛晋(1599—1659年)的藏书楼。毛晋是乡村地主，性嗜卷帙，刻意收罗宋元名刻秘抄，并不断积累当代文献。他为了收集宋元版本，标示于门外曰："有以宋椠本至者，门内主人计叶酬钱，每叶出二百。有以旧抄本至者，每叶出四十。有以时下善本至者，别家出一千，主人出一千二百。"于是湖州书舶云集于七星桥毛氏之门。邑中谚语说："三百六十行生意，不如鬻书于毛氏。"(荥阳悔道人撰《汲古阁主人小传》，转引自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七)毛晋收书达84 000册，构筑汲古阁、目耕楼收藏。毛晋藏书兼刻书，还影钞宋元珍本，刻印《十三经》、《十七史》、唐诗人小集、宋词人集和明代传奇作品集《六十种曲》，并编纂《津逮秘书》丛书，成为很有名的刻书家。此外，毛晋家还抄录各种珍贵典籍，"毛钞"成为藏书家珍重收集之物。

澹生堂是明末浙江祁承㸁(1592—1628年)的藏书楼，祁承㸁好读书藏书，成年后，游宦所至，辄收集书籍，并力事抄写，手录古今四部，自称"十余年来，馆谷之所得，饘粥之所余，无不归之书者，合之先世，颇逾万卷"(祁承㸁《澹生堂藏书约》)。以后虽经火灾，但始终收集补写不辍，最终积累了八万卷之数。他的藏书不以宋椠元版为贵，注意收集地方文献和俗文学，多抄本校本，总之注意实用，讲求图书内容的准确，故藏书质量好。祁承㸁怕藏书散失，与子孙相约，订出条规为："及吾之身，则月益之，及尔辈之身，则岁益之。子孙能读者，则以一人尽居之。不能读者，则以众人递守之。入架者不复出，蠹啮者必速补。子孙取读者，就堂检阅，阅竟即入

架，不得入私室。亲友借观者，有副本则以应，无副本则以辞。正本不得出密园外。书目视所益多寡，大较近以五年，远以十年一编次。勿分析，勿覆瓿，勿归商贾手。”（祁承㸁《澹生堂藏书约》）祁氏藏书世代相传，其子彪佳等能恪守所藏，并收集了大量戏曲作品，其藏书室称远山堂。直至第三代祁理孙，不仅能保护祖藏，并有所增益，又建奕庆楼。祁氏三代成为浙东有名的藏书世家。

万历以后，福建也有不少藏书家，如连江陈第，闽县徐𤊹，又有陈暹、马森、林懋和、谢在杭等。

第四节　清代私家藏书的发展

清朝于1644年立国，1911年灭亡，共268年。就私家藏书的数量而言，当推各代首位；就质量而言，更是集中国古代典籍之大成。清代私家藏书种类多样，分布南北，在学术研究、文化发展和普及知识、提高社会文明水平诸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一、清初承继明末遗风，藏书集中于江浙

藏书之传承关系是很特别的。不仅表现为家庭之传承，即父继祖业、子承父业之遗产；而且因藏书集散，大多先在本地运作，当地藏家迭起收罗，共同构成一种藏书网。这一特点在清初顺、康年间是相当明显的。

清乾隆时杭州藏书家汪启淑曾描述过清初及作者当时藏书家的情况。他说：“江浙藏书家，向推项子京白雪堂、常熟之绛云楼、范西斋天一阁、徐健庵传是楼、朱竹垞曝书亭、毛子晋汲古阁、曹倦圃古林、钮石溪世学堂（楼）、马寒中道古楼、黄明立千顷斋、祁东亭旷园。近时则赵谷林小山堂、马秋玉玲珑山馆、吴尺凫瓶花斋及予家开万楼。”（《水曹清暇录》）汪启淑说的这段话告诉我们，上面他所举的那些藏书家，基本上集中在江浙一带，这是因为这些地区明代就曾经出现过大量的藏书家，他们的藏书流传于世，就为后来的藏书家继承下来。而有些藏书家则代代相传，从明代发展到清代，仍然是以藏书名显于世。当然，世事变迁，也有一些新的藏书家出现。

日本学者岛田翰撰《皕宋楼藏书源流考》时，曾称江浙藏书发达的原因是明末藏书的兴盛与清初之承继。

就江苏而言，清初藏书家首推常熟一地最为有名。明末，常熟一地有赵琦美之脉望馆、钱谦益之绛云楼、毛晋之汲古阁最著。钱谦益（1582—1664年）是江苏常熟著名藏书家，其楼名绛云楼。钱先得明刘子威、钱功父、杨

五川、赵如师四家书，更不惜重资购觅。最后积至大椟七十三，藏书数量和质量在江南称第一。绛云楼失火后，钱谦益追记藏书，编成《绛云楼书目》。曹溶曾评论钱氏藏书，说他太偏性，首先所收必宋元版，不取近人刻本钞本，收藏种类不当。其次好自矜啬，如别人无有，则片楮不肯借出，故有好些书得不到流传。这种评论是符合钱氏藏书实际的，说明了封建时期藏书家的严重局限性。钱谦益将烬余遗书赠与族孙钱曾。钱曾(1629—1701 年)的藏书楼称述古堂。钱曾得祖先历代图书，自己 20 年食不甘味，衣不完彩，屏当家资，悉于典籍中。自称生平所嗜，宋椠本为最。此外，又得江南各家遗书，其中赵氏脉望馆遗书价值甚高。并借钞江浙著名藏书家吴伟业、吴涓、金俊明、叶树廉、陆贻典、曹溶、毛晋父子等的珍本秘籍，故其藏书数量多、质量高。钱曾藏书编成《述古堂书目》、《也是园书目》。所撰《读书敏求记》是所藏善本的解题目录，对古籍版本研究富有参考价值。

钱谦益的绛云楼遭大火后，其部分藏书转至钱曾之手，而钱曾的藏书活动范围已超出常熟一地。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清初经过一段休整后，文化活动有所恢复，当然，范围仍是江南太湖地区。康熙年间，钱曾藏书部分流入泰兴季沧苇，常熟一地藏书队伍逐渐消沉。

南京在清代称江宁府，清初颇有影响的是黄虞稷之千顷斋，藏书 8 万多卷，素有“藏书甲金陵”之誉。黄虞稷与心太平庵藏书主人丁雄飞，不仅有互通藏书之“古欢社”，而且因编撰《千顷堂书目》而著名。

浙东宁波天一阁，清初仍保存完整，管理严密。余姚黄宗羲(1610—1695 年)藏书楼称续钞堂，他注意明代史料的搜集，广泛地收罗经史百家之书。全祖望称其“愤科举之学锢人生平，思所以变之。既尽发家藏书读之，不足，则抄之同里世学楼钮氏、澹生堂祁氏，南中则千顷斋黄氏，吴中则绛云楼钱氏，穷年搜讨。游屐所至，遍历通衢委巷，搜鬻故书。薄暮，一童肩负而返，乘夜丹铅，次日复出，率以为常”。他的读书、抄书活动得到一些藏书家的支持，天一阁虽禁例甚严，黄宗羲得以借观，他为之写《天一阁藏书记》，感叹藏书之难。又收得钮氏、祁氏之遗散图书。黄晚年益好聚书，又抄自天一阁、丛桂堂、倦圃、传是楼等藏书家，并戒学者曰：“当以书明心，无玩物丧志也。”(以上均见《鲒埼亭文集 · 梨洲先生神道碑》)黄宗羲的藏书，内容十分丰富，据称藏宋元文集极多，又家藏明文集约五六千本，藏书后散失。康熙年间，同乡郑氏二老阁收得约 3 万卷。其子黄百家所编家藏书目《续抄书堂藏书目》著录有若干万卷。他的藏书有力地支持了他的著述编纂活动，他编纂了《明儒学案》、《明文海》等文献汇编，并协助编纂《明史》。

清初浙江杭州私人藏书楼很多，且向周围地区扩散，形成与江苏苏南地区相接的江南藏书圈。嘉兴一地有曹溶(倦圃)、朱彝尊(曝书亭)较著名。

曹溶(1613—1685年)，浙江秀水人，藏书处称倦圃，明时曾任御史，入清后任御史、学政，以至广东布政使等职。藏书多宋元文集，家藏目录《静惕堂书目》著录宋徐铉《骑省集》以下196家，元自元好问《遗山集》以下139家。其藏书乐与其友共读，他反对藏书家"以独得为可矜，以公诸世为失策"的做法，主张藏书家之间互观目录、抄书交换，互补缺藏。朱彝尊(1629—1709年)，浙江秀水人，藏书楼名曝书亭。朱彝尊少年时喜爱书籍，中年以后，其收罗更为广泛。50岁时，举博学鸿词科，在京任职时，抄书史馆，曾因抄书被朝廷罢官，仍然矢志不改。由于他多方收集典册，故家藏书达8万卷。其家藏目录《潜采堂宋金元人集目》著录宋人文集160种，金人文集6种，元人文集150种。他充分地利用藏书，编成《经义考》300卷，是一部取材丰富、体例完善的专科目录。杭州有赵氏小山堂、吴氏瓶花斋，也是著名的藏书楼。

清初北方藏书家如京城弘晓之乐善堂，陆心源称其藏书大楼九楹、积书皆满，并称其藏书来自于徐乾学和季沧苇，而徐、季两人之藏书大半来自虞山钱曾和毛晋，而钱曾和毛晋的藏书又是集江南地区藏书之精华，这实际上可看成是南方藏书之北迁。至于其他省份，其中以山东省藏书家最著名，如清初文坛领袖新城王士祯，其池北书库著称于世。至于孔尚任之藏书、赵执信之藏书也是名重一时。德州卢见曾雅雨堂，不仅以收藏善本著名，而且藏书注意校勘，也为世人所瞩目。

从清初私人藏书发展情况看，应该说基本分布是集中在南方江苏、浙江两地。而且因处于两朝交替的转变时期，所以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首先，可能是受朝代更替的影响，清初藏书家集中在大都会的较少，小都市则较多，其中以江苏常熟、浙江宁波较著名。其次，由于南明抗清影响和一部分明朝遗民的情感寄托，清初收集明末史料，以至明代史料、地方史料的藏书家不乏其人，在这一点上，说明私人藏书家保存文化遗产的特殊作用非常突出。再次，承继明代遗风，清初部分藏书家讲求宋元旧刻、明刻精印和精校精钞本风气形成。这方面的传统影响于后世，形成藏书家中的鉴赏家。

二、《四库全书》编纂与私家藏书的发展

乾嘉时期，我国文化发展别开生面。一方面，朝廷动员人力物力组织编纂类书、丛书、文集；另一方面，民间学术研究全面繁荣。正是在这种文化学术背景下，清代私家藏书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乾嘉年间，社会经济的发展，国内政治局势的稳定，文化教育事业的提倡为私人藏书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条件，特别是适应文学、语言、史学、地理学等研究的需要，私人藏书得以迅速发展，开展目录、校勘、训诂、辑佚之学的研究，促进了图书出版业的兴盛，私人刻书广泛涉及各个学术领域。这时，藏书之家众多，藏书家因目的、兴趣和收藏范围、品种以及对藏书的利用等不同，从而形成了不同的藏书家类型。洪亮吉归纳为："藏书家有数等：得一书必推求本原，是正缺失，是谓考订家，如钱少詹大昕，戴吉士震诸人是也；次则辨其板片，注其错讹，是谓校雠家，如卢学士文弨，翁阁学方纲诸人是也；次则搜采异本，上则补石室金匮之遗亡，下可备通人博士之浏览，是谓收藏家，如鄞县范氏之天一阁，钱塘吴氏之瓶花斋，昆山徐氏之传是楼诸家是也；次则第求精本，独嗜宋刻，作者之旨意纵未尽窥，而刻书之年月最所深悉，是谓赏鉴家，如吴门黄主事丕烈、乌镇鲍处士廷博诸人是也。又次则于旧家中落者，贱售其所藏，富室嗜书者要求其善价，眼别真赝，心知古今，闽本蜀本，一不得欺，宋椠元椠，见而即识，是谓掠贩家，如吴门之钱景开、陶五柳，湖州之施汉英诸书估是也。"(洪亮吉《北江诗话》卷三)所谓考订家、校雠家、收藏家、赏鉴家，大致说明了当时藏书家的不同类别。

清乾隆年间，著名藏书家孙庆增撰《藏书记要》一书，概述了清初以来各地藏书家的状况。他说："大抵收藏书籍之家，惟吴中苏郡、虞山、昆山，浙中嘉、湖、杭、宁、绍最多。金陵、新安、宁国、安庆及河南、北直、山东、闽中、山西、关中、江西、湖广、蜀中亦不少藏书之家。"(孙庆增《藏书记要·鉴别》)缪荃孙把该书收入《藕香零拾》丛书中时注云："江浙而外，以山东、福建为最，四川则绝无矣。"孙庆增当时只是从藏书交往中和各种文献及私藏目录上，估计出全国藏书家集中于江、浙等地，缪荃孙则集中说明只有江浙两省藏书家最集中。此外，还有山东、福建等地也有藏书家。

乾隆三十七年(1772 年)，乾隆帝通过征集天下图籍，进行一种政治上的统治，实际目的则是"寓禁于征"。他说："今内府藏书，插架不为不富，然古今来著作之手，无虑数千百家，或逸在名山，未登柱史，正宜及时采集，汇送京师，以彰稽古同文之盛。"(乾隆三十七年正月初四日上谕)但是，当通令各地一段时间，反应寥寥以后，他立即把收集重点指向一些藏书家，并称："遗籍珍藏，固随地俱有，而江浙人文渊薮，其流传较别省更多……闻东南从前藏书最富之家，如昆山徐氏之传是楼，常熟钱氏之述古堂，嘉兴项氏之天籁阁、朱氏之曝书亭，杭州赵氏之小山堂，宁波范氏之天一阁，皆

其著名者，余亦指不胜屈。并有原藏书目，至今尚为人传录者。”（乾隆三十八年三月二十九日上谕）当征集图书取得一定成绩后，乾隆又采取了一些安抚措施。“今阅进到各家书目，其最多者如浙江之鲍士恭、范懋柱、汪启淑，两淮之马裕四家，为数至五六七百种……鲍士恭、范懋柱、汪启淑、马裕四家，着赏《古今图书集成》各一部，以为好古之劝。又如进呈一百种以上之江苏周厚堉、蒋曾莹，浙江吴玉墀、孙仰曾、汪汝瑮……亦俱藏书旧家，并着每人赏给内府初印之《佩文韵府》各一部，俾亦珍为世宝，以示嘉奖。”（《四库全书总目》卷首・三十九年五月十四日上谕）

从乾隆修书时征集图书的情况看，大致可看出各省藏书之家甚多，藏书之数量也是可观的。据黄爱平所作《各省进呈书籍总数统计表》，《四库全书》修书期间江苏进呈书籍达 4 808 种，浙江 4 600 种，江西 1 042 种，安徽 516 种，山东 366 种，直隶 238 种，福建 213 种，河南 113 种，陕西 103 种，百种以下不计①。

如果以《四库全书总目》所著录的献书人名字，分析当时藏书家的情况，也是很有意义的。从《总目》著录中献出百种以上者的地区分析，如下几个地区为最多。

浙江省：

范懋柱，天一阁主人，《总目》著录 95 种，存目 378 种；鲍士恭，知不足斋主人，《总目》著录 250 种；存目 129 种；孙仰曾，寿松堂主人，《总目》著录 26 种，存目 108 种；汪启淑，开万楼主人，《总目》著录 59 种，存目 201 种；汪汝瑮，振琦堂主人，《总目》著录 33 种，存目 123 种；吴玉墀，绣谷堂主人，《总目》著录 52 种，存目 112 种；汪如藻，裘抒楼主人，《总目》著录 90 种，存目 56 种。

江苏省：

马裕，丛书楼主人，《总目》著录 144 种，存目 225 种；周厚堉，山舟堂主人，《总目》著录 7 种，存目 155 种。

京城：

副都御史黄登贤，万卷楼主人，《总目》著录 48 种，存目 89 种；编修程晋芳，《总目》著录 15 种，存目 169 种；兵部侍郎纪昀，《总目》著录 62 种，存目 43 种。②

《总目》中收入某省藏书家之献书越多，说明从该省收书次数越多，收

① 黄爱平. 四库全书纂修研究[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37-39.

② 郭伯恭. 四库全书纂修考[M]. 上海：上海书店，1992 年影印本：259-266.

罗的程度也越彻底。从《四库总目》中所列举藏书家的情况看，江浙两省藏书家最多，这是不争的事实。

三、遍布南北形成特色的私家藏书

乾隆时期，私家藏书几乎遍布各地，因为从《四库全书》编撰中各省征书情况看，江苏、浙江最多，江西、福建次之，云南、奉天最少，而甘肃、四川、贵州等省则未有进书。由此可见，当时我国文化中心一直停于东南。

乾嘉时期，江苏藏书家以苏州地区最多。当时，苏州有所谓四大藏书家，即长洲周仲涟(水月亭主人)、元和顾抱冲(小读书堆主人)、吴县袁又恺(五研楼主人)和吴县黄丕烈(士礼居主人)。苏州一地藏书家还有红豆山庄主人惠周惕、兹兰堂主人朱奂，他们可称与四大藏书家并美之藏书家。

黄丕烈(1763—1825年)，号荛圃，苏州吴县人。因求得宋版《士礼》，故藏书处称"士礼居"。另因得宋版书百种，又称藏书处为"百宋一廛"。又藏宋版陶集两种，又称书屋曰"陶陶室"。由此可见黄丕烈藏书兴趣和收藏特色。黄丕烈称自己是佞宋主人，独嗜宋刻，长期的积累和研究，使他成为著名的版本行家。同时期的王芑孙称他对于宋版书"非惟好之，实能读之。于其版本之后先，篇第之多寡，音训之异同，字画之增损，及其授受源流、翻摹本末，下至行幅之疏密广狭，装缀之精粗敝好，莫不心营目识，条分缕析"(《藏书记事诗(附补正)·黄丕烈》)。黄丕烈通版本，精校雠，值得重视的是他在校勘图书时，往往做到广集异本，仔细校理，并征求同行，相互切磋。故其藏书经过长年整理，质量都相当高。王大隆在评价黄丕烈校书成绩时说："盖荛圃有竹汀、茂堂、匪石、涧薲以助其校勘，兔床、香岩、抱冲、寿阶以互为通假，兼以独具卓识，鉴别不差毫厘。"(《荛圃先生年谱补》)黄丕烈最后以写题跋的形式，对各式藏书的版本价值、校书经过和讹误之处、校改根据都列之甚详。故其《荛圃藏书题识》(或称《士礼居藏书题跋记》)成为学术上的重要成果，受到学者的重视。黄丕烈不仅藏书，还刻书，他刻书注重选择流传较少的典籍，并选印经过仔细校勘的藏本。故其所刻《士礼居丛书》受到书林重视。

周锡瓒(1742—1819年)，字仲涟，号香严，苏州吴县人。藏书处所称水月亭。周是黄丕烈在苏州书林中的故友，因为他们的爱好接近，追求宋元旧刻，又注重图书的校勘，日夕相处，可以称之为"同志之友"。段玉裁曾说："乾隆嘉庆以来，吴中之能聚书者，未有过于周子者也……周子以笃好聚物，自明季诸君以及何氏、朱氏之善本，每储偫焉……周子非仅以聚书鸣也，实能读书。"并称周锡瓒，"终日以古为徒，雠校不倦"，并称"其于古版

今刻源流变易，剖析娓娓可听”(《藏书纪事诗(附补正)·周锡瓒》)，可见周是乾嘉时之学者型藏书家，家藏宋元本、抄校本约二千余种，惜其书后散失殆尽。又有袁廷梼(1762—1809年)，字又恺，号绶阶，吴县人，藏书处称五研楼，蓄书数万卷，皆宋槧元刻，秘籍精钞。袁对典籍“点勘考索不少休”，故袁名重一时。钱大昕称其藏书“凡先世遗迹流转他姓者，辄重价购归，弆之斯楼。生平笃好文史，聚书数万卷，多宋元旧槧及传抄秘本，暇日坐楼中，甲乙校雠，丹黄不去手”(《潜研堂文集·五研楼记》)。袁的藏书活动中，不仅与黄丕烈等藏书四友相交甚善，经常交换求书校书心得，互相借钞珍本秘籍，且与当时学问家钱大昕、王鸣盛、段玉裁、江声等交往，研经考史，故称得上藏书大家。苏州境内元和县还有称藏书四友之顾之逵(1752—1797年)，字抱冲，藏书处称小读书堆，顾之逵“性好藏书，家多宋元以来善本”。他与黄丕烈等过往甚密，得到诸友朋的帮助，且其藏书得到顾广圻的校勘，故藏书质量颇高。他把校勘过的图书整理成《艺苑捃华》出版，共收录秘本48种。由于均为罕见之本，又有顾广圻帮助校勘，故甚为书林看重。从以上所谓苏州藏书四友的活动就可看出：由于宋元典籍流传稀少，故藏书家中出现以收藏宋元秘本旧钞的专门收藏家，又由于乾嘉年间讲求实学，藏书、读书、校书一体，凡是收藏典籍，都注重版本考究，篇章、文字的校雠，并运用目录之学，编出多种藏书目录。同时，从文献流传和保存的目的出发，藏书家也整理藏书、编辑成文集、丛书，为文化传承作了多种努力。

常熟在清初是著名藏书之地，一度沉寂后，乾嘉期间，又兴起多个藏书家，如称“藏书二友”的陈揆、张金吾。他们的稽瑞楼、爱日精庐与叶树廉的朴学斋，可谓异军突起。此外，江北扬州历来是交通要冲，当时盐商汇于此地，有些富商亦喜藏书，如小玲珑山馆主人马曰琯、马曰璐兄弟，就因献书而受朝廷赏赐。还有程晋芳，积书至5万卷。南京文人袁枚藏书达30万卷，孙星衍之孙氏祠堂也都名重一时。

浙江藏书家在乾嘉期间为全国首屈一指，如海宁藏书家吴骞，人称与黄丕烈齐名，积书60余年，藏善本甚多。海宁陈鳣藏书楼称向山阁，藏书10万卷。杭州藏书家有赵氏二人，即赵昱和赵信，有小山堂藏书，其藏书得山阴祁氏之遗留。鲍廷博的知不足斋，汪启淑的开万楼，皆为《四库全书》修书之呈献大户。而杭世骏的道古堂、何元锡的梦花馆，也都著称于世。浙江藏书家中又有“东西两抱经”之说，这是指清代乾隆年间浙江杭州有卢文弨抱经堂、鄞县有卢址抱经楼，这两个藏书家的藏书活动，反映了当时众多藏书家的藏书风尚。卢文弨(1717—1795)，字绍弓，人称抱经先生。中进士

后，历任编修、学政等职，晚年讲学钟山、龙城等书院。卢文弨一生积书，又一生校书。他自称：“第使古人之遗遍完善，悉复其旧，俾后之学者亦获得见完书。”这是他的心愿。钱大昕称：卢抱经先生“精研精训，博览群书。自通籍以至归田，铅椠未尝一日去手，俸禀修脯之余，悉以购书。遇有秘校、精校之本，辄宛转借录，家藏图籍数万卷，手自校勘，精审无误”(《潜研堂文集·卢氏群书拾补序》)。卢文弨校定之书，如《春秋繁露》、《经典释文》、《逸周书》、《荀子》、《颜氏家训》、《吕氏春秋》、《大戴礼记》、《方言》、《白虎通义》、《风俗通义》等，学术界评价甚高，段玉裁称其所校书，“皆使学者诶正积非，蓄疑涣释”。以后又将所校书汇辑成《群书拾补》丛书，又刻《抱经堂丛书》。总之，正是因为卢文弨在校勘学方面的贡献，洪亮吉称卢文弨为校雠家类型的藏书家。鄞县卢址(1725—1794年)，字丹陛，卢址一生未任过官职，是以藏书、读书终其一生的藏书家。人称其“博学嗜古，尤善聚书；遇有善本，不惜重价购之；闻朋旧得异书，宛转借抄，晨夕雠校；搜罗三十年，得书数万卷”(钱大昕《潜研堂文集·抱经楼记》)。其同郡黄家鼎记述卢址藏书之经历云：“先生悬重价求善本，以故叶氏菉竹堂、丰氏万卷楼、毛氏汲古阁、祁氏澹生堂、汪氏古香楼、金氏文瑞楼诸旧藏，如水归壑。”(《藏书纪事诗(附补正)·卢青厓》)有《抱经堂藏书目录》，著录九万卷。因鄞县有天一阁，故卢址之抱经楼，从楼房建造以至藏书管理之法，都仿照天一阁。抱经楼藏书保存完好，民国初年散失后，为嘉业堂刘承干所得甚多。至于宁波天一阁主人范懋柱献书四库馆，更是名重一时。

清代乾嘉年间，北方藏书家兴盛。其主要因素是首都建于北京，受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的直接影响，使在京官吏积书方便。同时，因为科举考试，文人集中京都，自然会流散图书，为京都藏书家荟萃图书提供便利。还有书市的繁荣，为文人积书提供了条件。如前述岛田翰之称河北，实指北方藏书家就有沽水草堂的安岐，据称藏书多为传是楼遗书。又有梧门书室主人法式善藏书万卷，且多古今人诗集。大兴朱筠，聚书数万卷。他的万卷楼和宝苏斋，更以藏书丰富著名，宝苏斋以收集苏轼书帖和《施注苏诗》而起名。他还有“三万卷斋”的书室等。此外，山东藏书家不仅活跃于京都，且多方集聚图籍，使山东也出现浓重的藏书风气。如益都李文藻访书琉璃厂，济南周永年聚书京都，他们回到家乡后，建立起的书楼影响深远。周永年倡议的“儒藏”，虽未能付诸实施，但其宣传是有积极意义的。

总之，从乾嘉时期全国各地私人藏书情况看，首先，清廷修《四库全书》对全国的影响很大。朝廷出于政治需要，收缴了大量图书，直接影响了私人藏书的发展，但四库修成，七阁建立，也有力地推动了私人藏书的发

展。朝廷的提倡与民间的推动在一定历史年代是文化发展的共有条件，清代在这方面的表现是很典型的。其次，明末以至清初学风的转变，使清代考据、校勘、辑佚之学迅速形成，藏书、版本、目录之学蔚成风气。乾嘉时期，私家藏书中注重宋元旧刻、明代精刊及名家手抄，讲究藏书特色的藏书家非常普遍，讲求校勘与精抄精刻的风气有力地提高了藏书质量，并形成地区特色。再次，由于清代建国后经过休整，特别是康熙几十年的休养生息政策，使乾嘉出现了所谓“承平日久”的景象，因而藏书之风遍及全国，尤以北方直隶(今河北)、山东、山西等省最为兴盛，使长期以来私人藏书风气以江南为主的格局有新调整。北京藏书家纪昀、曹秀先、王际华、陆锡熊等就是例子。

第十四章　书院和宗教刻书与藏书

第一节　宋元的书院刻书与藏书

一、宋元书院的发展

书院是北宋到清末的一种重要教育组织，它在封建社会的政治、教育和文化发展中都曾占有重要的地位。书院作为一种教育和文化的中心，必然发展刻书与藏书事业。

书院之名起于唐代，如唐开元时宫廷中有丽正殿书院、集贤书院。但这种书院实际上是宫廷藏书、修书的地方，并不是后来含有教学、讲学内容的书院。自宋以后，书院发展成为一种读书、讲学的新的教育组织，它的目的在于自由研究学问，讲求身心修养，是理学家或学者讲学之所，也是生徒学习、进修的地方。

两宋时，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印刷术的进步，统治阶级只重科举而不振兴学校，于是，具有读书与讲学功能的书院有了兴起的可能与必要。为适应理学的发展和抵制反对学派的影响，理学大师仿效儒家讲经办法，利用书院授徒讲学，这样，书院就得到发展。如朱熹对南宋书院的发达起了重要作用，并对后世书院制度的发展有深刻的影响。他于南宋孝宗淳熙八年(1181年)，主持兴复了白鹿洞书院旧址，直接推动了南宋书院的发展。他为书院确定了条规，名为《白鹿洞书院揭示》，对书院的宗旨、目的以及修身、待人处事作了系统而详细的规定。后世的书院大多是照此模仿。朱熹不仅亲自主持书院、亲自讲学，开名儒大师在书院讲学之风，还邀请理学另一学派的大师陆九渊来书院讲学，组织开展学术论辩，奠定了书院“讲会”制度的基础。

宋代，各地私人兴办书院，朝廷也奖励设立书院，以笼络人心，凡大书院皆受朝廷褒奖，并捐赠书籍，分置学田维持书院生计。以后中央政府明令地方兴办，把书院逐渐纳入封建统治者的控制。宋代全国设立多少书院，各书统计不一。陈元晖等《中国的古代书院制度》引曹松叶统计，宋代书院有397所，白新良统计为500所以上①，而邓洪波等统计则为720所，其分布范围，北及今山东、河北、陕西、山西，西达四川、贵州，南抵海南岛，尤以江南地区比较密集，其中江西最多，浙江、福建、湖南次之②。据全祖望考证，北宋之四大书院是嵩阳、睢阳、白鹿、岳麓，南宋之四大书院是岳麓、白鹿、丽泽、象山③。大致北宋初期书院曾一度兴盛，后期较衰落，南宋时又大盛。当时书院活动主要有三项：藏书、供祀、讲学。

元代书院的发展，上承唐宋下启明清，书院设立不少。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宋亡以后，一部分汉族知识分子不愿出仕，躲在乡里办学建书院、进行私人讲学活动；另一方面，元在统一中国后，由朝廷提倡兴建，政府控制书院，这样也兴建了一部分地方书院。王颋认为元代书院的发展到至元以后一段时间最为重要④。据《历代书院名录》统计，元代计建有书院296所，加上宋代流传下来的书院，数字就更可观。据统计，元代建复书院之数达到406所之多，密集地区仍在江南，但总体分布上呈现北移西进之势，北京、河北、山西、陕西、云南、贵州等原来书院较少甚至没有的地区，书院也渐渐多了起来，而且成为当地颇受关注的学术文化中心。

二、宋元书院的刻书与藏书

书院开始是民间办学的形式，既要学习，学生当然需要一定的参考书籍，同时又因讲学之风，当然更要参考书籍，因此，一般地说，有书院之设，即有藏书之举。

唐五代时，一些士人创办书社、读书院，即在其中设置书藏，供生徒学习之需，如《光绪江西通志》称："乐林书院在德安县，唐义门陈衮建，聚书千卷，以资学者。"又江西庐山白鹿洞，原来也是藏书之地，唐李渤与其弟李涉读书其中，称精舍，以后在此基础上建白鹿书院。考之宋代四大书院，

---

① 白新良．中国古代书院发展史[M]．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1995：4-10.

② 邓洪波．中国书院史[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4：122.

③ 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四五）·答张石痴征士问四大书院帖子（四部丛刊本）[M]．上海：商务印书馆，1919-1936.

④ 王颋．元代书院考略[J]．中国史研究，1984(1).

都是富有藏书的。早在北宋初期，四大书院开始兴建之时，各书院主持人和地方官员就为聚集书院藏书而努力经营，朝廷和私人都纷纷赐(赠)书给书院。南宋魏了翁在四川蒲江建立鹤山书院，他在《鹤山集·书鹤山书院始末》中称："堂之后为阁，家故有藏书，某又得秘书之副而传录焉，与访寻公私所板行者，凡得十万卷，以附益而尊阁之，取《六经阁记》中语，榜以'尊经'，则阳安刘公为之记。"①尊经阁中藏书10万卷，其规模之宏富实为宋代各书院之首。宋代书院藏书规模扩大，品种呈多样化，有手抄本、拓本、手稿本等，但仍以印本为主。书院藏书的目的是为师生提供研习之资，服务、服从于其教学与学术研究工作，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公共性与开放性。

宋代书院藏书事业发达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雕版印刷术的推行，书籍得以大批量生产，书院开始自行刊刻图书，宋版书中就有"书院本"。书院刻书大体分为两类：一是配合课程教学的教材、参考读物；二是配合教学管理的书院文献。当时如丽泽书院、象山书院、泳泽书院、龙溪书院等的刻书都很有名。如丽泽书院重刻司马光《切韵指掌图》2卷、吕祖谦《新唐书略》35卷；象山书院刻袁燮《絜斋家塾书抄》12卷；泳泽书院刻大字本朱子《四书集注》19卷；龙溪书院刻陈淳《北溪集》50卷、《外集》1卷；建安书院刻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100卷、《续集》10卷、《别卷》11卷；以及鹭州书院刻《汉书》120卷等。这些刻印图书都是宋代有名的"书院本"，至今享有很高声誉。

元代书院藏书的规模继续扩大，远远超过宋代。如太极书院8 000余卷、伊川书院万卷、东庵书院19 000卷、武昌南阳书院经史子集八架、锦江书院万卷，河南许昌颍昌书院"自六经传注子史别集，以致稗官杂说，其为书凡若干万卷……师生有欲借之者，则具姓名列书目，而以时谨其出纳"。元代蒙古族有识之士对藏书事业的发展也做出了重大贡献。如蒙古族太监达可建成都草堂书院，致力于丰富藏书事业，从全国各地搜集图书，藏书竟达到27万卷之多。元代书院藏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藏书建设开始进入正规化、制度化，设置专人管理院中图书，形成图书借阅制度，编制院藏图书目录，方便了读者检索、阅读。在有关元代书院的文献中，有《杜洲书院书板书籍目录》、《共山书院藏书目录序》、《西湖书院书目序》，这些是现存最早的中国书院的藏书目录和书目序②。

元代书院刻书事业在宋代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并达到了相当发达的程度，几乎所有书院都有刻书活动，最著名的有大德广信书院刻《稼轩长短

① 魏了翁. 鹤山集卷四一[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 傅璇琮，谢灼华. 中国藏书通史[M]. 宁波：宁波出版社，2001：501.

句》12 卷，泰定西湖书院刻《文献通考》，武溪书院刻《新编古今事文类聚》，宗文书院刻《五代史记》，象山书院刻《北史》等。叶德辉《书林清话》所记尚多。元代全国各州县都有书院学田，其收入除供师生的用度外，其余多充作刻书经费，在经济上提供了出书的保障。顾炎武《日知录》谓："宋元刻书皆在书院，通儒订之，山长主之。"他还认为元代书院刻书有三大优势：一是山长勤于校对，保证了书籍的质量；二是不惜费，而工精；三是版不在官府储存，易于印行。所以元代书院刻书发达，雕印精美，版本繁多，其传本多于宋代数倍。书院刊印书籍以增加院藏数量，并不是其唯一的目的，如西湖书院这样的承担国家出版主要任务的大型机构，所出之书除了自藏及供其他各地书院收藏之外，还大量流布民间、官府甚至寺观，支持着国家文化事业的发展。除旧版重印之外，西湖书院还新刊《文献通考》、《国朝文类》等当时学者所纂之大型图书。可见，元代书院刻书事业对保存和传播传统文化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第二节　明清的书院刻书与藏书

一、明清书院的发展

明代书院走了一条曲折的发展道路：前期不受重视，后期屡遭禁毁。前期由于政府看重官学、重视科举，非官办学校出身者不准应试，生员们纷纷进入官办学校，作为私家讲学之所的书院遭到冷落。这样的情况持续了 100 余年后，随着官学制度败坏和科举考试中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教育出现了空白地带，一批有见地的士大夫纷纷兴复和创建书院。嘉靖年间，经过王守仁、湛若水等一代学术大师的提倡，书院又迅速发展起来，甚至大大超过了前代，但到末期又遭到禁毁的命运。据统计，明代书院总数达 1 962 所，其中新建 1 707 所，修复 255 所。分布范围扩大，西及今甘肃、云南，北达今辽宁、吉林，仍以江西最多，广东、福建、浙江分居第二、三、四位①。纵观明代书院的藏书事业，呈现相对低平之态，藏书数量较少，宋元以来书院藏书兴旺发达的势头尽失。明代书院大体分两种类型：一种是考课式的书院，与官学差别不大；另一种是讲会式的书院，重视讲学。

清代的书院藏书事业走出了明代形成的低谷，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管理更为完善，藏书也更为丰富。清初，时局还不稳定，反清复明的呼声甚

① 白新良. 中国古代书院发展史[M]. 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1995：107.

高，统治者害怕汉族知识分子集合讲学，议论朝政，对书院加以压制。雍正时，统治者鉴于统治秩序已经建立，且书院的影响也难以限制，故改而公开提倡。雍正十一年(1733年)就曾发布上谕称："建立书院，择一省文行兼优之士，读书其中，使之朝夕讲诵，整躬励行，有所成就，俾远近士子观感奋发，亦兴贤育才之一道也。"出于"化导士子"的目的，朝廷规定各省省会设立书院一所，书院经费由政府拨给，书院山长由各省督抚学政聘请，学生由各省道员和布政司会同考核，私创书院须申报官厅查核。这样，实际上把书院逐步办成了官学①。由于清统治者采取积极控制的办法，清代书院几乎遍及各省通都大邑以至穷乡僻壤。陈元晖等统计，清代设立书院达1 900多所，大部分控制在政府及其官员手中。

清代书院大致有四种类型。一为以讲求理学为主的书院。二为以博习经史辞章为主的书院，这类书院在清中叶大盛，对于社会学术文化发展影响很大。三为以考课为主的书院，这种书院也很普遍。第四种为近代人士举办的学习西洋科学的书院。

书院从宋代发展至20世纪初，随着新式学校的兴办，逐步失去其意义，因而衰落。同治以降，尤其是光绪年间，中国社会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再加上外国教会书院所带来的冲击与影响，晚清书院开始了近代化的进程。

二、明清书院刻书

明代书院注重刻书，其刻书范围遍及经史子集各类。较著名的如晋藩养德书院刻《文选》，东山书院刻《文选补遗》，鳌峰书院刻《侯鲭录》等。其中白鹿书院刻的《史记集解》根据南监集解单行本翻刻，在当时正文注疏合刻盛行的年代，这种单行本非常难得。另外，广东崇正书院刻的《通典》，底本优秀，校勘认真，也是宝贵的善本。私人文集在书院刻印的更多，如瀛山书院刻《金粟斋先生文集》，云丘书院刻《双江聂先生文集》，大梁书院刻《于肃愍公集》，义阳书院刻《何大复先生集》，其中正谊书院刻《铁崖先生文集》更是有名的善本。有些书院刻书规模很大，如江宁尊经书院藏有《国学经济》、《二十一史》书版，到清代才毁于火(《嘉庆江宁府志》卷十六)。

清代书院刻书较多，不能尽列。其中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以经史训诂为主的书院，因它们办院的目的就是汇集学者研究学术、发展学术，所以十分重视图书的收集，而且重视整理有关书籍，刻印自己学者的著作，汇印有学术价值的书籍。它们实际上成为一种图书馆和出版机构而推动清代学术的发

① 陈元晖，等. 中国古代的书院制度[M].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91.

展。阮元创立的诂经精舍和学海堂，刊有《诂经精舍文集》八集，学海堂刊印书籍如《学海堂经解》180 种，《学海堂文集》90 卷，共收集了 500 人的著作。南菁书院刻《续皇清经解》和《南菁书院丛书》，都是很有影响的书籍。其他书院刻书亦连绵不绝，如紫阳书院连续刻印《铁桥志书》二卷、《文嘻堂诗集》三卷、《婺源山水记》二卷，都是清刻本中的善本。一些书院刊印重要文集、丛书，为我们保存了大量的古代文献。

三、明清书院藏书

明代书院藏书规模不大，究其原因：一是明代的统治者推崇科举制度，书院受其影响，藏书面相当狭窄，主要是些应付考试的通用教材；其次，大理学家王、湛二人标榜“心学”，重悟性而轻积累，钟情于书院的讲学、会讲，不太讲求藏书，以至于学生们终日空谈心性而不读书，藏书也就越来越不被重视。然而，明代的书院藏书仍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主要表现在明代形成了一套完整而独具特色的藏书管理制度，包括图书征集、整理、分类、编目、保管、借阅等。明修书院志中常有院藏图书目录，如李梦阳《白鹿洞书院新志》卷八《书籍志》，分经、史、子、集四部，著录正德年间院藏图书 83 部凡 1 038 本，以反传统的四部分类顺序，将子部提到史部之前，说明对于子部书的重视。在分类上，许多书院有推陈出新之处。如江苏常熟孙慎行、张鼐的万历《虞山书院经籍志》，将藏书分为圣制、典故、经部、子部、史部、理学部、文部、诗部、经济部、杂部和类书 11 个类目，著录图书 265 部，突破了甲乙丙丁四部分类法，去掉了集部，增加了典故、理学、经济、文部、诗部等类目，为我国古代目录学的发展和创新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清代由于书院兴办多所，生徒众多，对书籍的需要量更大，故书院藏书数量和管理制度逐步完善。清代书院藏书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藏书分布广，书院藏书受到普遍重视

藏书和讲学、祭祀一起，历来被称为书院的三大事业。到清代，人们则认为图书和师长、膏火同样重要，“三者固缺一不可”(《郾城县志》卷三〇)。凡建书院则谋求藏书，这在当时已成为共识。据统计，各地藏书确有数目可考的书院就有百余所之多①，超过唐、宋、元、明四代之总和。从地域上看，在 19 个省都建有书院，最东的为今台湾鹿港文开书院，最南的为今海南澄迈天池书院，最西的为今云南腾冲来凤书院，西北角上的为甘肃山丹仙堤书院，最北的为黑龙江齐齐哈尔的卜魁书院。

---

① 邓洪波．清代书院的藏书事业[M]//朱汉民编．中国书院．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89．

2. 藏书管理严格，自成体系

书院包括资金筹措、图书征集、登记、编目、借阅、赔偿、保管等各个环节的图书管理，对后世的藏书建设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1)藏书购求广泛

书院利用各种渠道广泛征集书籍，从来源上看，主要有朝廷赐书、书院募集、接受捐赠、自行刊刻等方式。用公银为书院购书是清代特有的一种御赐方式。“乾隆元年议准，各督抚于省会书院，应将《十三经》、《二十一史》诸书，购买颁发，令士子熟习讲贯。其动用存公银两，仍报部查核。”(《光绪安徽通志》卷九十二)即由各省购置书籍送到书院，统一汇总报销。以后各朝，各省督抚曾不时动用公银为书院添购书籍，充实了书院藏书。另外，朝廷出于思想统治的需要，主动赠送图书给各地书院，所赠图书，一般都是御纂、钦定或官刻正经正史书籍。书院作为一地之教育基地，也会多方动员当地官员捐赠图书，或动员本地在外做官者捐赠图书。书院山长是学术上有地位的学者，也通过多种渠道募集图书。书院自刻书籍大多为本院学习、讲学所需参考之书，有些则是本院学者自著之书。清代，一些书院刻书已有赢利性质，通过经营书籍，作为书院经费来源之一。这些自刻书籍，也充实了书院藏书。

(2)认真登录，按类分书，编辑了大量藏书目录

搜集到图书后，书院随到随登录，详细注明来源、收购日期、卷册数，书目积少成多后，随时发布。立即登录，保证藏书的完整性，便于反映藏书概况，也易于查找。随时发布，可以表示对捐书人的表彰和感谢，并对学生们广而告之，以便于他们学习。乾隆年间完成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书院藏书产生了深刻影响，多数书院藏书按经史子集四类分类、排列。相当多书院都编写了藏书目录，如《岳麓书院新置官书总目录》、《安徽芜湖中江书院藏书目》等。清代书院藏书目录被大量编辑、刊印，流传至今还能辑录到的就有 66 种之多①。

(3)书院藏书由专人管理，有完备的保管、借阅制度

如文正书院规定藏书“立斋长以专责成，所藏书籍，整齐卷页，谨守管钥，统归经理，无事不得擅离，有事回家，须禀明山长，择人庖代。每逢夏季六月，在书院检出暴晒，必亲自监管，以防遗失”②。此外，大梁书院则

---

① 任继愈．中国藏书楼[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1539.

② 兴化文正书院藏书凡例[M]//李希泌，张椒华编．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82：76.

有“司书吏”一人，经管书院书籍管理与使用。也有于学生中选择人员管理的，白鹿洞书院管书者又有称“管干的”。

书院藏书一般为就室（院）借阅，当然也有允许借回家中阅读的。借阅方法上，规定了借阅日期、卷册数，借书时必须当面点清，如有残破或污损，勒令限期补齐或赔偿。对随意圈改点评者，以后不予借书。借阅内容上，规定哪些书可借，哪些书可在阅览室内阅读，哪些书不借。如中江书院规定：“史（记）汉（书）三国（志）及各种类书，只准偶尔翻查，不准借出。”“至于孤本、抄本，尤不准借。”借书手续是：生徒阅书院藏书楼编目，知道某书有无，然后填写于阅书簿，取得书籍后，记明某月某日取某书几卷几本，下面书押借书者姓名和斋长姓名。还书时，司书吏记明某书某日交还。一次只许借书一种，不超过五卷，十日为期。有些书院借书出院，需具保呈县，由县付条至斋长处取书，还书时，凭斋长给条至县销结。这是作为特殊情况处理的。书院藏书每年年终催书，无论用完与否，都得归还，每一季度，司书吏要将阅书簿呈监院官阅，年终还要送山长阅。

3. 教育性和社会性

书院藏书继承前代的传统，主要供院内生徒使用，比国家书库和私人藏书楼的服务对象都要广泛得多，体现了书院藏书的教育性和社会性。书院作为教育和文化机构，由于学术研究和教学的需要，普遍建立了藏书，书院藏书是我国封建社会各种藏书类型中比较重要的一种。结合书院教学活动，书院藏书提供学者和生徒使用，必然要求藏书门类齐全，品种多样，从而促进了书院藏书建设的发展；又因配合教学进度和学习要求，藏书管理制度也比较严格，制度也较为完善，比之公私藏书在使用上和管理上都有较开明之处。另一方面，书院中的学者或山长讲究如何指导生徒学习，一些书院学规学则中指定学习阶段应读的书目，可以看成是一种导读书目。书院强调学生自己学习钻研，写读书心得，评点图书内容，也必然促使学习内容的深化与学习方法的改进。书院藏书对学习参考、对书目的利用、对阅读的指导都积累了一些可以总结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第三节　宋元的宗教刻书与藏书

一、宋元佛教刻书与藏书

佛教的发展经历了唐朝的鼎盛时期，到宋辽金元时期继续受到各朝统治者的推崇，得以继续发展。宋王朝除了徽宗在一段较短的时间内排佛外，其

余君主都采取扶助佛教的政策。我国北方的辽朝是以契丹族为主体的社会，契丹贵族吸收汉族文化，对儒释道三教兼容并蓄，金代帝王皆信佛教，元代不专重某一种宗教，对基督教、伊斯兰教、汉传佛教、藏传佛教都有重用，形成元代宗教文化多元并存、同时发展的局面。

宋代的佛教译经始于北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80)，“五年正月……河中府沙门法进。请三藏法天译经于蒲津。守臣表进。上览之大说，召入京师始兴译事。”(《佛祖统记》卷四十三《法运通塞志》第十七之十)。从太平兴国七年至政和初(982—1111)，译经总数达 284 部，758 卷①。北宋译经一直持续到宋徽宗宣和初年间(约 1119)才最终停止。到了公元 12 世纪初，印度佛教在伊斯兰教和印度教的夹击下逐渐走向灭亡，不仅没有新经问世，东来传译经典的印度或西域学僧亦稀少，佛教的译经事业就这样结束了它的历史进程②。

宋代的译经活动虽规模不大，但也表现了一些时代特色：(1)宋朝译场的组织制度更加完备。宋赵彦卫《云麓漫钞》卷三载：“本朝有译经院，凡得西域书，令晓蕃语通文义人充译语官。”此译经院设在太平兴国寺，由三堂组成：中间为译经堂，东为润文堂，西为证义堂③。宋代所译的佛典，都在这里完成。而宋朝译经分工明确，组织严密的情况从《佛祖统记》卷四十三对九种译经职位的描述中可见一斑。(2)注重翻译人才的培养。天息灾主译时期，“集京城出家童子五百人以选之，得惟净等五十人”接受梵文训练(《大中祥符法宝录》卷三)。由于参译人员受过梵文的训练，故宋代译场一直未设“传语”之员④。(3) 所译佛经以补历代缺漏为主。如宋太宗曾诏令以新刻大藏经目录对勘，拣目录中不全的经籍进行翻译，使我国的汉译梵经更加完整和全面。

随着传译的佛经数量不断增加，佛经目录（简称“经录”）的编纂亦随之产生。经录最初只是按译出年代简单著录译经，后来逐渐形成考校缜密、分类严谨的佛教大藏经目录——“入藏录”。佛教目录按编制目的和功能可

① 吕澂．宋代佛教[M/OL]//中国佛教协会主编．中国佛教(第一辑)．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80．[2009-03-28] http://doorway. fjnet. com/fojiao/07zgfj/zhgfjshinue10. htm.

② 李富华，何梅．汉文佛教大藏经研究[J]．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36.

③ 吉广舆．宋初九僧事迹探究[M]//吴言生主编．中国禅学(第一卷)．中华书局，2002.

④ 曹仕邦．中国佛教译经史研究余沈之二[EB/OL]．[2009-04-01]．贝叶(8)：8-14．http://ccbs. ntu. edu. tw/FULLTEXJ/JR-MAG/magq3512. htm.

分为译经目录、藏经目录和大藏经目录。宋元明清时期是经录的演变阶段，其最大特点是出现了大藏经目录及指导大藏经阅读的解题目录①，且佛经目录完全依照佛教思想进行分类。另外，还出现了藏满佛教经典的目录、藏汉佛典的对勘目录等。自宋开宝四年（971）于四川雕印《开宝藏》以来，刻本大藏经都有目录。宋元时期常见的经录有北宋的《大中祥符法宝录》、《天圣释教录》、《景祐新修法宝录》及元代的《至元法宝勘同总录》。而北宋的《大藏经纲目指要录》、《大藏圣教法宝标目》和清代的《阅藏知津》被誉为史上著名的三部佛经解题目录。

佛教典籍由翻译、汇集、编目，最后逐步形成庞大的汉文大藏经。汉文大藏经是汉文佛教文献的总集，它的内容既包括自我国两汉之际始，历代对古代印度“佛教原典”② 的翻译，也包括我国历代僧俗佛教学者对佛教教义理论、佛教流传与发展历史等方面的阐述之作。从南北朝起至木板雕印术发明之前，佛教经典主要以抄本形式在各大寺院和佛教徒中流传。北朝时期，由于统治者一度下令废禁佛教，佛教徒还想方设法把佛经刻在石上。房山石经的雕刻就是其中的著名事件。刘侗《帝京景物略》载：“北齐南岳慧思大师，虑东土藏教有毁灭时，发愿刻石藏，瞥封岩壑中，以度人劫。岳坐下静琬法师，承师傅嘱，自隋大业，迄唐贞观，大袢睟经成。”这就是关于静琬刻经起因的记录。房山石经由静琬大师创刻于七世纪的隋唐时代，经过辽、金、元、明历代跨时千年的续刻，共刻石经一万五千余片，佛经近千部之多③，虽然还不是一部完整的大藏，但足以令人叹为观止。房山石经成了木刻大藏经的先声，到宋代开始将雕版印刷术用于佛经印刷，雕版大藏经的版式整齐划一，装帧形式统一，一般是根据某种目录汇集一批佛经，集中雕版印刷而成。从北宋的《开宝藏》起到清朝的《龙藏》止，历代刊刻的汉文大藏经共有十七种，分为官刻和私刻，其中宋元朝共刻有十种。

《契丹藏》的雕刻是辽地佛教的一件大事，它是仅晚于《开宝藏》的我国第二种官版木刻大藏经。辽朝在兴宗至道宗年间先后雕造完成了两种版本的《契丹藏》，它们同属一个目录体系，区别在于一是卷装大字本，一是依

① 日本目录学家小见山寿海在《书志学》一书中说：“解题是一书一书的记载，比较的详细。也就是每种图书的品题解说。”又说：“解题即品题，即解说，即介绍，即批评或评价。”

② 佛教原典是指包括经、律、论“三藏”的佛教经典。

③ 刘俊熙. 佛教大藏经及其刻印述略［J］.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1).

大字本复刻的小字册装本①。卷装本发现于山西省应县辽建佛宫寺释迦木塔中，小字册装本发现于河北省丰润县辽建天宫寺塔。另外，在北京近郊的大觉寺还发现了《契丹藏》印经的碑文，在山西大同大华严寺发现了专门庋藏《契丹藏》的“薄伽教藏”遗构及碑文。

宋代三百余年间，官私刻藏一共五次。第一种为官刻《开宝藏》。它是我国第一部木刻本大藏经，此后成为一切官私刻藏的共同准据，契丹藏也以此为底本。该藏最初在汴京太平兴国寺内设印经院印经，公元1071年将经板赐予显圣寺圣寿禅院印造，一直印刷流通到宋徽宗时期，后来经版毁于宋金战争，其印本也几乎散失殆尽。第二种是福州私刻《崇宁藏》，它是第一部由寺院雕刻的大藏经。《崇宁藏》开创了音释的先河，从《崇宁藏》起，音释已成为刻本大藏经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该藏的印刷流通在全藏尚未刊竣时就已经开始，经版雕就后存放于新建的“藏院”供印制流通，从现存印本的情况来看，有的有明确的印造时间和请印人名，有的铭有某寺大藏经或某人收藏的印记。第三种是福州私刻的《毗卢藏》。它依照《崇宁藏》的规模刻成，全藏总595函，其印本流传至今已八百余年，国内已无全藏，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记载，零散经本合计约460卷，收藏于各图书馆、博物馆及寺院。第四种是南宋两浙道湖州（今浙江省湖州市）私刻的《圆觉藏》（后来称为《资福藏》）。经版在刷印了百年以后，于公元1239年和公元1250年对残缺经版进行了增补，其印本曾陆续传到日本，各寺所藏甚多。第五种是南宋平江府碛砂延圣院私刻《碛砂藏》。其刻本于20世纪30年代在陕西开元、卧龙二寺被发现。该藏的刊印跨越宋、元、明三个朝代，一直印刷至明宣德七年（1432年），历经二百多年。明代印刷的《碛砂藏》出现了湖州吴兴妙严寺、天龙寺等多种刻本，是因为《碛砂藏》中四大部经的经版到明时多已漫漶残损，补入了各地经本。

至金朝，由于文献残缺，大藏经的雕刻大事竟未见于记载，直到1934年才于山西赵城县广胜寺发现《赵城金藏》的印本，并引起了当代学者的注意。在金代，自该大藏经经版运至燕京弘法寺后，有明确记载的印经活动至少有过两次：一次是金大定二十九年（1186年），“闻京师弘法寺有藏教版，当往彼印之……”（赵沨撰《济州普照寺照公禅师塔铭》）；另一次是金大安元年（1209），文见于《金藏》“奄”帙《千臂千钵大教王经》卷三之印经墨记。金末元初，部分经版毁于兵火。

---

① 李富华，何梅. 汉文佛教大藏经研究［M］.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140.

元代的佛经刻印仍是社会文化生活中的大事业。元代完成了金代开始的《赵城金藏》，并于元太宗、元世祖时校补过《金藏》，而现存《金藏》即为元世祖中统初年校补后的印本。而《元官版大藏经》（简称《元官藏》）是一部鲜为人知、在国内未见著录的元代官刻大藏经。该藏于1982年底才在云南图书馆被发现，仅存32卷，据记载知其刊造于卜答失里为皇太后及太皇太后期间，由徽政院主持完成。元代民间刻藏主要有两种，一是杭州余杭县白云宗南山大普宁寺雕刻的《普宁藏》，其现存印本数量较多，有年代可考的印本包括：山东灵岩寺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印本，陕西开元、卧龙二寺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印本，陕西岐山法寺和古邠（今彬县）洪福寺、河南汴水兴国寺大德元年（1297年）印本，山西太原大显圣寺大德二年（1298）印本，山西介休抱腹山大德八年至皇庆三年（1304—1314年）的印本等，不详年代的印本亦不下少数。《普宁藏》的雕印历经九十余年，伴随了元朝的兴衰，元末经版与寺俱毁。由于大藏经部帙浩繁，雕刻不易，各地就有雕刻或印造四大部小藏之举，就是以《大般若经》600卷、《大宝积经》120卷、《华严经》81卷（唐译80卷附《普贤行愿品》1卷）、《大涅槃经》40卷、总841卷为一小藏，元延祐年间陈觉琳募缘的《再刻毗卢藏》就是一部小藏经。《再刻毗卢藏》印本现存地有福州鼓山涌泉寺、山西太原崇善寺等。

由以上大藏经的雕刻史可知，宋元时期，佛教所藏典籍开始以雕版印刷品为主，特别是以大藏经为主。大藏经收录了我国历代佛教的主要经典，反映了佛教典籍在我国的流行情况。官版大藏经内容权威，装帧华丽，价值较高，因而常被当做礼物颁赐寺庙或有功之臣加以收藏。然而，官方编写的大藏经重视收录译经，不重视收录中国僧人佛学著作，因此所收录的佛书数量往往少于当时社会上流通的实际佛书数量。另外，中国僧人的撰著只能以别藏的形式编辑出版，由于别藏的地位远远不如正藏（大藏也称正藏），寺院收藏也以正藏为主，别藏只能自生自灭，难以编辑再版，保存至今的数量不多。宋元以来，已流行按佛教经典本身的内容特征来建立大藏经分类结构体系与排架方式，并统一采用千字文的编次顺序来组织佛教藏书。有的学者①曾评价千字文帙号“是我国现存最古的排架号。”史载两晋始，佛典收藏已逐渐集中到寺院，两宋时期，寺院藏书更加蓬勃发展，寺院及藏书数量超越前代，僧众人数有增无减。两宋时期，仅杭州一地，梵刹就星罗棋布。《西湖游览志馀·方外玄踪》载：“杭州内外及湖山之间，唐以前为三百六十

① 王重民. 中国目录学史论丛［M］. 北京：中华书局，1984.

寺，及钱氏立国，宋朝南渡，增为四百八十，海内都会，未有加于此者也。”寺院既多，寺院藏书亦盛，大的寺院往往藏书达万卷左右。国家宗教藏书方面，除藏有官版佛教大藏经外，其藏书管理活动中的书目著录也可反映出其佛教藏书的规模。如记载北宋国家藏书的官修目录《崇文总目》将道经、佛经正式列为子部的两个类目，能反映出北宋官方所藏之佛、道图书数量。

二、宋元道教刻书与藏书

宋辽金元时期，道教进入不断繁衍创新的发展阶段，儒释道三教合一的趋势已十分明显。道教在辽朝的力量和影响比佛教要小得多。宋朝道教却颇为兴旺，北宋国力羸弱，南宋偏安江南，因此，统治者大力提倡道教，以固皇权，定民心。北宋真宗与徽宗尤其崇道，使道教影响迅速扩展。元朝道教继续繁荣与流行，元代统治者一方面扶持道教，以稳定对汉族地区的统治，一方面又再出现冲突时进行暴力镇压，缘于佛道之争，元代发生过两次焚毁道经的事件。

伴随着道教各宗派教义的重大变革，道教著述创作也源源不断，产生了一批重要的道教典籍。宋张君房收集《大宋天宫宝藏》之精华撰成道教类书《云笈七签》122 卷，它不仅包括了北宋以前的《道藏》，而且保存了部分佚失道书的篇章，《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此书“类例既明，指归略备，纲条科格，无不兼该，《道藏》精华亦大略具于是矣”。宋郑樵撰成《通志・艺文略》，将道书分 25 种，不仅记载书名卷数，还撰有作者传记，共收录道书 1 323 部，3 706 卷①，较《宋史・艺文志》、《崇文总目》、《秘书目》著录道书都更多。

《道藏》是汇集道教典籍的一部大丛书。道藏编纂始自唐玄宗时期的《开元道藏》，收道经道书 3 744 卷，之后唐肃宗、代宗诸帝亦多次诏令搜寻整理，但遭唐末五代纷争之乱，道书亡佚大半。宋元时期，各朝又诏令搜集整理道书，重修《道藏》，仅北宋一朝就达五次之多：太宗时期徐铉、王禹偁等修《道藏》，得 3 737 卷。真宗时期王钦若重修，得 4 359 卷，该藏目录名为《宝文统录》，据宋张君房《云笈七签序》载：“（真宗）在先时，尽以秘合道书，太清宝蕴，出降于余杭郡……俾成藏以进之”，此藏当由皇室秘阁和太清宫中的道书汇集而成。真宗时期又令张君房修得《大宋天宫宝藏》4 565 卷，《云笈七签序》载：“……臣于时尽得所降到道书，并续取

① 陈国符. 道藏源流考［M］. 台北：祥生出版社，1975：146-147.

到苏州旧《道藏》经本千余卷，越州、台州旧《道藏》经本亦各千余卷，及朝廷续降到福建等州道书《明使摩尼经》……”该藏共抄录了七部。徽宗时期刘道元重校《大宋天宫宝藏》，并增加822卷，得《崇宁重校道藏》5387卷。仍为徽宗时期，元妙宗、王道坚再次校订，黄裳负责役工镂板，刻成《政和万寿道藏》5481卷，这是道藏最早的雕版印本，然该藏在靖康之乱（1126—1127）中散佚，至金代已残缺。以上五种道藏今已基本无存。南宋孝宗时期，临安府太乙宫抄录福州闽县报恩光孝观所度《政和道藏》，在540函的基础上加入数种道书，纂成《琼章宝藏》，曾抄录数藏颁赐予各道观，南宋末，不少南方道观免于兵燹，其道藏得以保存至元代。金朝章宗时期令孙明道等主持镂补《政和道藏》，成《大金玄都宝藏》6455卷，章宗泰和二年（1202）经版毁于天长观火灾，经版虽毁，但仍有印本留存：“（金末）丧乱之后，图籍散落无几，独管州者（今山西静乐县）仅存。”①元太宗至定宗时期宋德方及其弟子秦志安据管州所存金藏，搜罗遗逸刻成《玄都宝藏》7800余卷，经版存于平阳（今山西临汾）玄都观，元初佛道相争，于至元年间被焚毁。

宋元时期道教典籍的浩繁促进了道教藏书的鼎盛，而道教藏书又以宫观为主，以《道藏》收藏为中心，各代重修新建的众多道观宫阁，历代均有藏书，只是数量多寡不一。北宋除了秘阁藏有道藏外，京都东京（今河南开封）是当时政治文化中心，该地宫观林立，道经收藏盛行。宋英宗治平年间，“有诏即建隆观给官本（道藏）以足其传。”（范镇《道藏记》，转引自《嘉庆四川通志》卷三十八）西岳华山的休粮院有文载在太宗绍兴年间，被赐经一藏。崇宁五年（1106）建成的茅山元符万宁宫“经有阁”，徽宗“又为书《道藏经》数卷及亲画老子像赐”。北宋也有藏书较富的道士，据宋薛致玄述《道德真经藏室纂微开题科文疏》卷一云：“真人姓陈氏，讳景元，字太初，玄号碧虚子，家世建昌，”“所藏内外书数千卷，皆素所校正。”南宋时期，仅《琼章宝藏》的收藏记载就极为丰富：高宗绍兴十四年（1144）建的四圣延祥观，有“藏殿曰琼章宝藏”，又有轮藏。孝宗淳熙四年（1177）建成的龙翔宫的南真馆内有“藏殿，曰琅函宝藏”。淳熙六年（1179），道士童思定、胡志清在鄞县望春山蓬莱观中兴建了轮藏，请得一部抄本藏于其中。余杭县大涤山洞霄宫于孝宗淳熙八年（1181）赐得该藏。仙居县凝真宫于淳熙九年（1182）也获得一部。南宋首府临安府太乙宫和理宗绍定年间重建的佑圣观都藏有《琼章宝藏》。度宗咸淳四年（1268）建的宗阳宫，亦有“蕊简

---

① 金元好问《遗山文集》卷三十一《通真子墓碣铭》。

之楼，琼章宝书”。

在金朝，除了中都大兴府（今北京城西南）的天长观和玉虚观藏有道藏外，可考的藏道经记载还有：金海陵王天德年间（1149—1153年），都监田子文与副运韩元英修亳州太清宫太极殿及转轮大藏，印《政和道藏》庋藏其内；金章宗泰和七年（1207年），当时的元妃曾经施两藏，一送真人丘处机得道之所栖霞太虚观，一送真人王处一之所圣水玉虚观。元太宗六年（金哀宗天兴三年，1234），皇后也赐给清和尹志平所居的长春宫道经一藏，此三藏都是《大金玄都宝藏》的刻印本或抄写本，近二万余卷。

递至金末元初，连年战争，我国北方的宫观藏书多毁于兵火，且元初因佛道斗争的缘故，道教遭受两次焚经之祸，一次始于元宪宗五年（1255年），一次始于元世祖至元十八年（1281年）（《佛祖通载》），藏经因此亡佚许多。南方道藏，却因多数道观未经兵燹，颇多由南宋流传至元代，直至元末才毁于兵火。天台山桐柏宫司马承祯所整理的《桐柏道藏》，杭州佑圣观、茅山、庐山太平兴国宫、新建建德观、阁皂山崇真宫、庐陵玄妙观、南丰紫霄观、武当山五龙灵应宫、龙溪玄妙观等处所庋的道藏都是由南宋保存至元代的①。除此之外，元世祖时期，高唐州（今山东省聊城市高唐县）惠云观、须城县（今山东省东平县州城镇）万寿宫、终南山（今西安市户县祖庵镇）全真祖庭重阳万寿宫、元初大臣商挺增修的华清宫皆藏有道藏。元代私藏道书甚丰的有浙江著名道士杜道坚（1237—1318年）的览古楼，聚书达万卷，其弟子周德方藏书也不下数千卷。另据《集虚书院记》载，道士孟宗宝亦蓄书数千卷，等等。从以上列举的道教藏书记录来看，宋元时期道教藏书蔚为壮观，已成繁荣之景。

第四节　明清的宗教刻书与藏书

一、明清佛教刻书与藏书

明清时期，佛教著述逐渐衰减，其原因有二：一方面，佛教在其发源地印度已经枯竭，无法再为中国佛教注入新的活力。国内佛教又提倡教内“禅教合一”，教外“儒释道合一”，使佛教从价值观念到思维方式都丧失特色，对士大夫阶层逐渐失去其特殊的吸引力，研究佛教的著述自然减少。另一方面，僧侣的文化素质不断降低。至清末，尽管僧尼人数随人口总数的增

① 陈国符. 道藏源流考［M］. 台北：祥生出版社，1975：169.

加而膨胀（据太虚《整理僧伽制度论》估计约为 80 万卷），出家者却多为衣食无着的贫苦农民。然而，明清时期佛教典籍的整理、汇刻活动却未中止。明清继承了前代大藏经雕刻之传统，共雕造大藏经七种，特别是在明初的几十年间就先后雕造了三部官版大藏经，这在中国大藏经的雕刻史上是空前绝后的。

明朝洪武年间由僧录司官员净戒等在《碛砂藏》的基础上雕刻成官版《洪武南藏》（又名《初刻南藏》）7 000 余卷，经版收藏于京城（今南京）南关天禧寺，永乐元年（1403）开放流通（《释鉴稽古略续集》卷三）。永乐六年（1408）僧人本性纵火烧了全寺，经版毁灭无存（《金陵梵刹志》卷三十一），印本流传极少，直到1934 年才在四川崇庆的上古寺被发现，该印本是永乐十四年（1416）蜀献王赠送的，略有残缺，有少数复本，现收藏于四川省图书馆。明永乐年间，由僧善启等主持又刻成官版《永乐南藏》（又名《再刻南藏》）6331 卷，该藏藏于在天禧寺旧址上动工重建的南京大报恩寺，供应各地请印，因印刷便利，现各处存本较多。继《南藏》之后，永乐十九年（1421）又在北京开雕了一部大藏经 6 361 卷，称《永乐北藏》，该藏总目名为《大明三藏圣教北藏目录》。全藏刻成后藏经版于祝崇寺内的汉经厂，由朝廷印刷、颁赐各地寺院，因此传世不多。据李圆净《历代汉文大藏经概述》① 载，“今南通狼山教寺，镇江超岸教定慧等寺，均存有全藏”。

此外，民间私刻大藏经在明代也较盛行。约在明永乐二十年前后杭州地方民间人士集资刻成《武林藏》，该藏直到 1982 年才被发现，仅残存 17 卷，系 9 种经籍的零散卷册。而《万历藏》6 234 卷乃由明惠王选侍王氏、高官陆光祖等组织雕刻而成的，直到 1983 年才在山西发现其尚完整的全藏，该藏原藏于广西全州金山寺，后移藏于山西宁武县延庆寺，1979 年初转藏于宁武县文化馆，藏经印本扉画右下角有“南京桥卢巷内街□□□印造”字样，为南京坊印。《径山方册本大藏经》是晚明开雕的私版大藏经。明代官刻《南藏》岁久腐朽，《北藏》请印不易，方册本易印也易保存，因此佛教大师紫柏（真可）发起刻藏。这部藏经先在各处分刻，最后集中将板片储藏于径山（现浙江省余杭县境内）化城寺，它的版式改变了向来沿用的繁重的经折装而采用轻便的方册，因此得名《径山方册藏》。此藏后来全部由嘉兴楞严寺经坊印造流通，所以又称《嘉兴藏》。该藏分为正藏、续藏、又续藏三部分，共

---

① 李圆净．历代汉文大藏经概述［EB/OL］．［2009-06-28］．南行（6），1948．上海南行学社编印．http://www.cbeta.org/data/budadata/hisutra.htm.

12 600余卷，收集了大量的藏外著述，保存了大量的中国佛教著述。方册本藏经因为印刷便利，所以流通较广，现在江浙地区还存有它的好几部印本。

清《龙藏》是一部仅用四年时间就刻成的官版大藏经，正藏和续藏两部分共7168卷，作为颁赐全国各大寺院之用。经板最初存放在宫内武英殿，后来因请印不便遂移置柏林寺，在乾隆四年(1739年)至1993年的250余年中，曾有过四次大规模的印刷流通及零散的请印，总计印藏290余部①。该藏经版是自宋代以降遗留下来的唯一一副大藏经版，现仍完整保存在北京柏林寺中。

虽然明清时期佛教著述逐渐衰减，但由于雕版印刷术的发达，且方册本大藏经流通便利，寺院藏书得以继续发展。明朝寺院藏书颇丰，超越前代。清朝虽然汉文大藏经雕刻数量较少，但由于历史的积淀，各寺院藏书还是相当丰实，朝廷的赐经活动频繁，推动了寺院藏书的发展。以浙江为例，明朝山阴柯樀禅寺于正统十二年(1447年)向英宗请赐得一藏(《明英宗实录》卷一百五十)。普陀山普济禅寺、法雨禅寺于明万历年间五次获赐大藏经，其中普济三次，法雨二次，都有敕文。杭州上天竺寺于正统十年(1445年)获赐《永乐北藏》。清代前期，大批佛寺得到重建或修复，浙江寺院藏书得到恢复。杭州灵隐寺莲镫阁藏有大藏经论及中华撰著1894册。大昭庆律寺在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请得一部奉于藏经阁，雍正时曾得大藏670函。净慈寺于乾隆二十年(1755年)受赐《龙藏》一部。其他见之文献记载的还有杭州净慈、理安、云栖寺、宁波七塔寺、阿育王寺、仁和海潮寺、临安禅源寺等。除经济发达地区的佛寺之外，名山胜地的佛寺藏书资源亦十分丰富。山西五台山从东汉建立佛寺之后，便逐渐成为我国佛教圣地之一，其寺院林立，可考的历代藏经记载甚多。明清两朝，五台山狮子窝、菩萨顶、菩萨真容院、普思禅寺、文殊寺、东西南北四台、台麓寺、罗喉寺、玉花池、寿宁寺、般若寺、镇海寺、七佛寺、法禅寺、三泉寺皆有经书收藏的记载。在寺院内，一般在大殿之后建有藏经阁，作为专门藏经之所，或在获赐藏经时，专门新建经阁或经楼来供奉藏经。明清时期，山西太原的元泉寺、净因禅院、白云寺都有建经阁的记载。

明清时期佛教藏书已形成僧、俗、官、民共同参与的局面。寺院所藏佛教图书，通常来源于自译、自著、自抄、自刻、购买、请赠、配补、信徒施经和政府颁赠等，特别是官刻藏经，多颁赐天下各大寺观，这使得寺院藏书

---

① 李富华，何梅．汉文佛教大藏经研究[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530.

能够得到长足发展。其原因大致为佛教的教义适合中国的社会心理和文化，其寻求解脱生老病死等痛苦之道无论对士大夫还是普通百姓都有吸引力，因而藏书发达昌盛，除此之外，僧俗及其信仰者普遍形成一种功德心理，导致对佛教经典的崇拜，他们不仅参与佛事，还捐献钱物用于寺院的刻书事业，有相当一部分还亲自编刻佛经，以示功德。另外，佛经装帧形式与中国一般书籍有所不同。我国古代书籍装帧形式经历了编简、卷轴装、旋风装、经折装、蝴蝶装、包背装和线装等的变迁。今天所使用的册页装及矩形开本等基本形式就是起源于我国的五代末北宋初年兴起的“蝴蝶装”①。总体来说，蝴蝶装在宋元时期盛行，包背装在南宋后期出现，元明清时期盛行，这两种装帧多用于一般书籍，经折装则多用于佛道经书，例外者仅为少数，如在河北省丰润县辽建天宫寺塔发现《契丹藏》是以“蝴蝶装”册装书的形式面世的②，以及晚明时期的为方便佛教典籍传播而兴起的方册线装《嘉兴藏》。

二、明清道教刻书与藏书

明代道教继承宋元的传统，在明中叶之前仍能持续发展。明世宗较迷信道教，重用道士，使道教兴旺一时。明中叶以后，官方道教日趋衰微，正统道教的声势和教团势力日益减弱，道教开始转入民间发展。明清道教虽然逐步衰落，但仍有大批道教典籍问世，或对以前的经典进行诠释注疏，或对道教教义进行演化。明初武当派创立者张三丰撰《三丰全集》，阐述武当道教教义。清初正一派道士娄近垣撰《黄篆科仪》，总结清代斋醮仪文等。而正统、万历年间编纂刊刻的正、续《道藏》，对保存和传播道教典籍发挥了重要作用。明成祖即位之初至明英宗正统十年(1403—1445 年)刊刻成官修《正统道藏》，明神宗万历三十五年(1607 年)进行续补，得《万历续道藏》，正、续两藏 512 函，5 485 卷，经版 1 215 189 页，共收书籍 1 473 种。明以前所编《道藏》皆毁，唯明版《道藏》仅存，入清以后，经版庋藏于京城大光明殿，但 1900 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大光明殿被烧，经版无存，其印本存者也寥寥可数，所幸北京白云观仍有收藏。1923—1926 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借用北京白云观所藏，以涵芬楼名义影印，缩改为六开小本，共 1 120 册。

继明代《道藏》之后，清康熙年间进士彭定求明《正统道藏》中选出 200 余种道书，编成《道藏》的精要本——《道藏辑要》，更易于流行和使用，后

---

① 刘国钧，郑如斯. 中国书史简编[M]. 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1：73.

② 李富华，何梅. 汉文佛教大藏经研究[M].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157.

人又补充不少明清时期新出道书，据莫尼卡考证①，《道藏辑要》有两个不同的版本：一是嘉庆年间(1796—1802年)由蒋元庭编辑并刻板印刷的版本，增加明版《道藏》未收道经79种；一是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贺龙骧、彭瀚然于四川成都二仙庵以《重刊道藏辑要》为名编纂出版的本子，据称包含各类道书共319种。明清两代，作为道教道德信条通俗化形态的各种劝善书在民间广为流行，成为儒家伦理的重要补充和民间风俗淳化的重要手段。成于宋代的《太上感应篇》，不仅自发在民间传布，而且得到皇帝、王公大臣、名儒文士的关心和推动，如顺治帝为其作《劝善要言序》，众多学者为其作注、作序或作疏，各地多有捐资印施的。《道藏辑要》所收的《关帝觉世真经》、《文昌帝君阴骘文》、《吕祖功过格》、《文帝孝经》等，皆是当时盛行于世的劝善书。

与前朝相比，明清时期的道教藏书明显衰落。浙江道观藏书也远不如佛寺藏书之景，可考有道藏的寺观较少。明代藏有道藏的道观有杭州吴山火德庙、杭州三茅宁寿观，清朝藏有道藏的道观有钱塘佑圣观、鄞县冲虚真观等。在山西，明清朝得赐道藏的有：太原元通观于洪武十二年(1379年)得道藏一部，正统年间，又得道藏一部；永济通元观于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赐得道藏一部；恒山九天宫于同年亦赐得道藏一部；阳城紫微宫，贮明赐道藏经；乾隆年间浑源恒山九天宫所藏道藏齐全，有目录，道藏藏于寝殿之东西石窟中，并有经目留于《恒山志・经志》。湖南衡阳的玄都观、三元宫、西湖观等道观均有收藏明代雕印的道藏。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神宗谕旨重建崂山太清宫，并敕旨颁赐《正统道藏》一部，太清宫特建藏经楼，以六只乌木柜分储供奉，各柜均80函，此藏一直被奉为太清宫镇山之宝。因太清宫藏有《道藏》，新中国成立前大批文人儒士都前往请经阅藏，请阅史料俱有记载。但由于社会混乱和管理不善，今崂山太清宫藏明版道经已缺几百卷，多为请出检阅，后又隐匿不归或携带到观外。1911年前后，《道藏》全本的数量在中国不过七部，分藏于沈阳太清宫、北京白云观、南阳玄妙观、武昌长春观、成都二仙庵、上海白云观等处②。

道教与佛教皆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的精神支柱之一，然而综观佛道宗教藏书的历史概况，可知道教藏书还是稍逊于佛教藏书：首先，道教藏书事业的参与人员不如佛教的广泛。《道藏》的搜集与整理多在帝王诏令之下完成，

---

① 莫尼卡. 道藏辑要——清代《道藏》简介[EB/OL]. [2009-07-19]. http://www.daozangjiyao.org/DZJY_C/Daozang_Jiyao.html.

② 陈国符. 道藏源流考[M]. 中国台北：祥生出版社，1975.

而佛教大藏经不仅有官方组织，民间大藏私刻的例子也不在少数。《碛砂藏》的刊刻历时百余年还能坚持下来，可见民间的对佛教藏书的恒心与热情。其次，道藏编修次数亦少于佛教大藏经汇刻次数。由上文统计可知，宋至清朝汉文大藏经的版本有 17 种之多，而道藏版本仅为 10 种。还有雕版印刷术应用于道藏刊印的时间亦晚于佛藏，后者比前者竟提早了 140 年。但古代道藏藏书事业亦有其自身特色，例如道教典籍的分类从“三洞分类”到“七部分类”再到“十二部分类”，形成其独有的分类体系。历代道教藏书所收藏的道教典籍内容也极为丰富，包罗万象，除了道教经、论、戒律类经典，道教有关炼丹、修身、法术方面的道书，包含了大量化学、医学知识，具有很高的科技价值，这是其他宗教藏书所不及的。

第六编

机械印刷兴起时期的书刊和图书馆
（1840—1911）

第十五章　近代书刊的出现

第一节　铅印术的采用与图书出版

一、西方印刷术的传入和书籍形式的变化

印刷术本是我国劳动人民的伟大创造发明，并由我国传播于世界各地。但是，由于我国长期处于封建统治下，生产力得不到应有的发展，各项科学技术的发展受到了极大的阻碍，印刷术也不例外。然而，我国的印刷术，尤其是活字印刷术传到西方以后，西方国家结合他们的文字特点和机器工业，很快地进行了改进，并广泛应用。印刷事业完全工业化，成为一项与国家文化有密切联系的工业。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向外扩张，19 世纪初期，西方印刷术开始传入我国，并且逐渐发展而代替了雕版印刷术，成为图书出版的主要方法。这是我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中国图书和图书馆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事。

首先将铅字印刷术传入我国的是英国传教士马礼逊。马礼逊 1807 年来我国澳门，为了传教需要刊印汉文《圣经》，开始雕刻汉文字模，准备铸造汉文铅字。因受到地方当局的禁止，刻工惧祸，将字模焚毁。1814 年，马礼逊在马六甲开设印刷所，继续从事雕刻汉字的工作。在我国工人梁亚发和蔡高的配合下，终于在 1819 年印成了第一部铅活字的汉文书——《新旧约圣经》。这是最早的汉字新式铅印书。

制造汉文铅活字是将西方印刷术应用于中国印刷业的重要步骤。1838 年英国人台约尔在新加坡制成一套汉文铅字，1842 年运到香港。这套活字颇为风行，被称作“香港字”。1844 年，美国人谷玄在澳门设花华圣经书房，利用台约尔的这套铅字经营铅印业务。1845 年，花华圣经书房迁到宁波，

改名美华书馆；1859 年又迁往上海。这一年，该馆技师美国人姜别利改进了汉文活字规格，定出了七种标准，提高了铅印书的质量。

1860 年以后，资本主义国家加紧侵略中国，清朝政府向它们屈服，中国人民的苦难越来越深重，反抗斗争也越来越强烈。许多初步具有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知识分子想通过出版物来宣传革新思想，他们要创办报纸和杂志，也要出版介绍西方自然科学知识的书籍。这在客观上符合广大人民要求增进新知识和掌握科学技术的愿望，而我国固有的雕版印刷术已不能适应这种需要，这样，西方印刷术便陆续被采用了。初期的铅印书籍和杂志在形式上仍完全模仿雕版书籍的传统方式，版面构造、格式与雕版印刷书完全一样，栏、界、中缝齐全，双叶单面刷印，乃至装订也是线装。随着印刷技术的发展，铅印书籍生产率不断提高，书籍的形式也逐渐起了变化，西式装订和横排的中文书(当时主要是教科书)开始出现。

西式装订是指我们今天所用的精装和平装的书籍装订方法。书籍装订形式的这一变革，与印刷用纸有很大的关系。由于外国新闻纸的传人，书籍开始采用新闻纸、铜版纸等，出现了单页两面印字的书籍，使版式发生了变化，不适于线装了。李文裿在《中国书籍装订之变迁》一文中指出：“晚近印刷大昌，所有书籍多趋重于所谓铅印，除刊版书籍尚须用线装外，余则半皆改为包背装矣。其包背装之精者，则用厚纸面敷以皮或布，或烫金字，或印黑字，俗称之为‘精装’。次者不用厚纸面，仅以各式之书皮纸，或印就之封面，作包背装，俗呼之为‘平装’。”这两种装订方法沿用至今。

二、新式出版印刷机构的建立和图书出版事业的繁荣

最初的铅字印刷所都掌握在外国人手中，铅印书籍多为宣传宗教的读物，其他书籍较少。显而易见，传教士设立新式印刷所的目的，绝不是为了促进中国民族文化的发展，而是为了传教的方便。1842 年，鸦片战争后，香港割与英国。此后，宁波、上海逐渐成为帝国主义势力的活动基地，铅印术也就在这些地方，特别是上海逐渐流传开来。在外国人的影响和刺激下，我国也开始采用现代印刷技术，创办印刷机构，从事出版印刷事业。1902 年以后，新式学校的建立，教科书、地图和教学参考资料为群众所普遍需要，加上各种商业印刷品，如证券、股票、广告、月份牌等也随着商业的发展而增多，更使新式印刷术得到巩固和发展。20 世纪初，机械化印刷术已成为我国印刷事业中的主流，而印刷业也逐步形成了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工业企业。除上海之外，汉口、广州、天津等许多地方都有了铅印厂。同时，在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激荡之下，报纸、杂志和书籍出版机构也相继出现，

这些出版物都不能不采用新式印刷方法，而新式印刷方法的逐渐盛行，又引起新的印刷机构的产生。在彼此互相刺激、互相影响下，新式印刷业和新式出版业就发展起来了，其中以我国资本经营的商务印书馆和文明书局在促进出版事业的发展上最有成就。

1897 年创办的商务印书馆是当时我国出版印刷业中的巨擘。它最初专营印刷，主要印商业用品的名片、广告、簿记、账册之类，故名“商务”。1900 年以后才致力于出版图书。1902 年成立编译所，开始编制中小学、师范、女校等各类学校教科书，并编辑政治、法律与其他各种参考图书、杂志，终于成为新中国成立前我国最大的私营书店，并拥有一个设备齐全、技术先进的印刷所。1902 年创办的文明书局也有自己的印刷所，由于印刷设备完善，成为当时印刷地图、图画的最好的印刷所。商务印书馆和文明书局都设在上海，它们的资本比较雄厚，经营又得法，出版品种多、质量高，为这一时期的出版印刷事业作出了很大贡献。此外，一些大报馆，如申报馆、时报馆、新闻报馆等，也都采用先进的印刷术，在促进我国出版印刷业的发展方面有积极影响。

1911 年辛亥革命之后，报纸、杂志和介绍新知识的图书出版量都有所增加，资本主义出版印刷业也有所发展。1912 年成立的中华书局拥有一个设备良好的印刷所，与以前的商务印书馆、文明书局、中国图书公司互相竞争。随后，中国图书公司并入商务印书馆，文明书局并入中华书局，扩大了印刷力量，于是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成为当时最主要的出版印刷机构。

出版印刷事业的发达和新闻事业的需要，使出版物内容不断丰富，出版物类型也不断增多。从出版物内容来看，除宣传宗教、介绍东西洋学术和论及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战争的政史著作外，还出现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其中以小说的出版量最大，取得的成就最高。晚清的小说被称为中国小说史上最繁荣的时代。对晚清小说的种数，始终没有很精确的统计。书目上收录最多的，是《涵芬楼新书分类目录》的文学类，共收翻译小说近 400 种，创作小说约 120 种。另外，杂志《小说林》所刊“东海觉我丁未小说界发行书目调查表”仅 1907 年一年著译的统计，就有 120 余种。而阿英在《晚清小说史》一书中提出，晚清小说至少在 1 000 种左右。同时，出版物的类型也有了较大的变化。从出版形式上看，有图书、杂志、报纸、地图等；从出版目的来看，有教科书、翻译书、通俗读物和理论专著等。其中，以教科书的出版发行量最大。据上海专业商会出版的《图书月报》第 2 期登载，到 1906 年为止，已有 22 家出版单位以出版教科书为主要业务，如文明书局、开明书局、点石斋、商务印书馆等。仅此也可见当时图书出版的繁荣景象之一斑。

第二节　西书的译介和报刊的出现

一、西书的译介

译书对于开拓中国人的视野，沟通中外文化的往来，打破封建传统思想的桎梏，起着重大的影响。西方著作翻译为中文，始于16世纪后期的天主教传教士。他们来中国进行宗教活动，为了传教的需要，就从事翻译工作。在其后的近两个世纪中，先后有80名左右的各国传教士译书400多种，其中半数为宗教类著述，其余是自然科学，人文科学著作。18世纪末19世纪初，随着资本主义对中国的扩张，西方传教士的活动逐步加紧，继续通过翻译书籍进行宗教宣传和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介绍，译书的范围、内容和数量不断扩大。除宗教宣传品外，自然科学的书籍增多，随后社会科学、政治、文学作品也开始被翻译成中文。除外国传教士及外国人在中国开设的翻译机构从事译书外，中国政府和私人也从事译书活动，并出现了著名的翻译家。政府从事翻译工作开始于1839年，当时林则徐在广州组织人员翻译西方的书刊资料。1862年在北京成立的同文馆，1867年在上海江南制造局设立的翻译馆，就是当时政府从事翻译工作的主要机关。

同文馆是一所语文学校，培养翻译和外交人才，除教学工作外，也从事翻译活动。同文馆所译书籍涉及国际公法、外交、世界史、数学、化学、物理学、生物学等各个方面，其中出版最早的是丁韪良所译的《国际公法》(1864年)，这是我国最早的一本讲国际关系的书。但该馆成立40年中，只译出26部著作。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前后历40年，出书也很多。据1909年出版的《江南制造局译书提要》统计，共翻译书籍178种，这在当时是很可观的。所译的主要是工艺制造和自然科学，特别是关于武器和船舶制造方面的书，也有少量医学、外国历史、地理和国际公法方面的书。其中有一些是很著名的科学著作，如《几何原本》(10卷本)，以及侯失勒的《谈天》等。译书出版最早的是1871年的《运规约旨》和《开煤要法》。参加译书的外国人有英国的傅兰雅、伟烈亚力，美国的林乐知、金楷理等，中国人有徐寿、徐建、华蘅芳、李凤苞、郑昌棪、赵之益、李善兰、顾觐光等，他们在介绍西洋科学方面有一定的成绩。

此外，从事译书的机构还有广州的方言馆、福州的水师学堂等。这时期的翻译重点是工艺制造和自然科学，特别是数学、物理和化学，在社会科学领域内只有外国历史、地理以及国际关系的书受到关注，这与当时洋务派推

行的政策是分不开的。

从 19 世纪末期开始我国学者由注重于自然科学，转而热衷于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主要代表人物和著作有：冯桂棻的《校邠庐抗议》，薛福成的《出使四国日记》、《庸庵文集》，以及 1894 年中日战争前后，何启的《新政真诠》、陈炽的《庸书》、郑观应的《盛世危言》、陈虬的《救时要义》、汤寿潜的《危言》。由于他们主张政治改革，因此比较注意西方社会科学书籍的翻译出版，特别重视关于西方资产阶级议会制度的书籍。这就使他们与洋务派有所不同。随着立宪运动逐渐展开，他们已注意到西方的社会、经济、财政、政治各种制度了。在这个时期，译书的范围由自然科学扩大到社会科学。1887 年成立的上海广学会(原名叫基督教及普及学识传布会)所出的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给中国维新派议论变法、改革政治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同时翻译书的原著从英、法文扩大到俄、日文。梁启超在《西学书目表·序例》中曾明确指出："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子欲自立，以多读西书为功。"在这方面身体力行并走在最前面的是严复，他先后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原富》、孟德斯鸠的《法意》和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即《社会学原理》)等书，比较系统地介绍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学说。其中，《天演论》是震动全国的一部名著，为改良主义者和民主革命派提供了理论基础。当时《民报》的文章指出："自严氏之书出，而物竞天择之理，厘然当于人心，中国民气为之一变。即所谓言合群，言排外，言排满者，固为风气激发者多，而严氏之功盖亦匪细。"另外，卢梭的《民约论》、穆勒的《名学》(即《逻辑体系》)，也出现了中译本。

此时，文艺书籍的翻译，特别是小说的翻译，也受到重视，被作为政治和社会改造的武器。林纾是这方面的翻译大家，仅他一人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即有 167 种之多，包括美、英、法、俄等许多国家的名著。其中以 1895 年第一次译出的法国小仲马名著《巴黎茶花女遗事》和 1901 年译出的《黑奴吁天录》最为有名，影响也最大。除林纾外，还有吴梼、陈冷、包天笑、周瘦鹃等也是当时的翻译家。从此以后，小说及其他文艺著作得到大量的翻译，提高了我国知识界对文学的认识。

日本经明治维新向西方学习，取得了成效，于是中国人也想向日本人学习，从 1902 年至 1904 年间的译书比例来看，所译日文书占全部译书的 50% 以上。①

---

① 杨寿清. 中国出版界简史[M]. 上海：上海永祥印书馆，1946.

二、近代报刊的出现

我国古代虽有“邸报”和“辕门抄”一类，但无论就其内容的深度和广度来说，都还不能与近代出现的报刊相比，而且也无甚继承关系。近代初期的报纸和杂志在版面形式、刊载方式和出版周期等方面，还没有明显的差异。许多杂志载有新闻报道，而报纸也常常载有论著或专著。据当时所编的一些日报杂志目录所载，往往把杂志称为“丛报”或“册报”。

近代报刊分为两类：一类是外国人办的报刊；一类是我国自办的报刊。

外国人办的报刊又分为：在我国境外出版的用中文刊载的报刊，如《察世俗每月统计传》(*Chinese Monthly Magazine*)，1815 年 8 月 5 日由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在马六甲创办，这是用中文出版的最早的一种月刊；此外尚有《特选撮要每月计传》(*Monthly Magazine*)、《天下新闻》(*Universal Gazette*)、《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Eastern Western Monthly Magazine*)等。在我国境内发行的外文报刊，以葡萄牙文为最先。葡文《蜜蜂华报》(A. Abelha da Chine 1822—1824 年)是在中国境内(澳门)出版的第一份外文报纸。在中国境内出版的第一份英文报纸是 1827 年出版于广州的《广东纪录》(*Canton Register*)。鸦片战争以后，上海、汉口、天津、北京等大城市都有英文报刊，而且逐步发行中文版。其中以《字林西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出版的时间最长，发行最广，影响也最大。它创刊于 1850 年，原名《北华捷报周刊》(*North China Herald Weekly*)，1863 年改名并改为日报，直至 1951 年才停刊。另外，德、法、俄、日各国也在中国发行外文报刊。在我国境内出版发行的中文报刊，如在香港出版的《遐迩贯真》、《香港新闻》，在上海出版的《六合丛谈》、《上海新报》(《北华捷报周刊》的中文版)、《申报》、《新闻报》，其中，上海的《申报》是我国近代出版时间最长的报纸，也是我国境内最早的日报，在我国影响很大。1876 年，它附刊一种文字较浅显的《民报》，是为报纸副刊的起始，1884 年又附刊《瀛寰画报》，是为报纸图画副刊的开始。《小孩月报》则是我国最早的儿童刊物，也是最早的画报。

我国自办的近代化的中文报刊，以 1858 年伍廷芳在香港创刊的《中外新报》为最早。在内地，则以 1872 年在广州创刊的《羊城采新实录》和 1873 年 7 月在汉口由艾小梅主编的《昭文新报》为最早。1874 年 1 月 5 日王韬创办于香港的《循环日报》，则是第一份传播资产阶级政治改良思想的报纸。甲午战争以后，我国报业大兴。1895 年，康有为、梁启超等在北京成立强学会，同年 8 月 15 日创办《万国公报》，因为与广学会所出之《万国公报》同名，遂于年底改名为《中外纪闻》。上海强学会则发行《强学报》。两报都不

收费，以宣传维新变法为主张，但不久被清政府取缔。上海强学会不得已改为时务报馆，于1896年8月9日创办《时务报》，影响甚大。1898年5月5日增出《时务日报》，记载中外大事，评论时政得失，分栏编辑，用新闻纸两面印刷，开始具备了现代报纸的格式。1898年7月26日起，《时务报》为清政府所接收，改为官办。而《时务日报》自同年8月17日起更名《中外日报》，至1911年春停刊。

辛亥革命以前，资产阶级革命派也办了不少报纸。它的第一个机关报是1900年孙中山在香港创办的《中国日报》。他们利用报纸，揭露清朝的腐败统治，传播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政治主张，推动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发展。在《中国日报》的带动与影响下，革命知识分子在日本、上海和全国各地纷纷创办报刊，宣传革命主张，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唤起人民的觉悟。章太炎等于1896年在杭州发刊《经世报》，是鼓吹民族革命的刊物。严复于次年在天津发刊《国闻报》，是维新派的报纸，也是当时北方报纸最佳者，但仅一年，就被迫停刊。1896年6月26日，胡璋在上海创办《苏报》。最初该报内容无聊，无所主张，于1898年出售于陈范，由吴稚晖、汪文溥、章士钊等主笔，宣传种族革命。后因刊登和推荐邹容的《革命军》和章太炎驳斥康有为政见的论文，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震动，引发了著名的"苏报案"，成为当时一起重大的政治事件。1904年日俄战争期间，蔡元培等在上海创办《俄事警闻》，揭露帝俄侵占东北的罪行，后改名为《警钟日报》，是继《苏报》而起的重要革命的报刊之一。同时，具有进步思想的杂志也纷纷出现。如1900年在日本横滨出版的《译书汇编》和《开智录》，专门译介西方资产阶级学者的政法名著，宣传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平等学说。在帝国主义不断侵略的刺激下，这些论著激发了当时我国在日本的留学生的爱国革命思潮，也办起了各种刊物。如1903年便出现了《湖北学生界》(后改名为《汉帜》)、《浙江潮》、《江苏》等。

在这期间，以科学技术、工商、农业和以教育、外交为主要内容的报刊也相继出现。如1897年出版的《实学报》、《农学报》、《求是报》，1898年出版的《格致新闻》、《工商学报》、《商务报》，以及1900年以后出版的《外交报》、《东方杂志》、《教育杂志》等，在当时都有一定的影响。另外，还有一些专门性杂志。如专刊文艺小说的《新小说》、《小说林》等；有关妇女问题的《女子世界》、《中国女报》等；以儿童为对象的《蒙学报》、《蒙学画报》等；还有供一般民众阅读的白话文报刊，几乎遍及每个省，成为白话文运动的先声。

第十六章　近代图书馆的兴起

第一节　西方传教士在上海的图书馆活动

1842 年中英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签订了《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被迫割让香港，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作为通商口岸。于是，传教士便将基地从南洋迁到中国东南沿海，开始了晚清西学传播史上的新阶段。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以后，清政府又被迫签订了《天津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通过这些条约，外国人获得了从东南沿海直到中国内地的活动自由，传教自由也得到了条约的肯定，西方文化开始向中国腹地渗透。与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多聚集北京，且以北京为传教和文化学术活动中心不同的是，晚清时期的西方传教士多聚集上海，并且以上海为传教和进行文化学术活动的中心。于是，上海亦成为西方传教士图书馆活动的中心和西方图书馆观念的传播中心，并由此而奠定了上海近现代图书馆的基础。

一、徐家汇天主堂藏书楼

"现代的图书馆之在上海出现，则始于第 19 世纪中叶（清道光末）上海开港以后。"①而徐家汇天主堂藏书楼则为其嚆矢。

1842 年（道光二十二年），耶稣会传教士重来中国，乃将其文化重心，移到上海。起初，天主教耶稣会士临时居住在上海青浦横塘。1847 年 3 月（清道光二十七年二月），天主教耶稣会会士南格禄（Claude Gotteland,

① 胡道静．上海图书馆史（上海市通志馆期刊抽印本，后同）[M]．上海：上海市通志馆，1935：1.

1803—1856)委派梅德尔(Mathurin Lemaitre，1816—1863)司铎于徐家汇购得基地一方，兴工建筑耶稣会修院总院。同年7月(清道光二十七年六月)总院竣工后，耶稣会传教士遂从青浦横塘的临时寓所移驻徐家汇，并随即开始搜集图书以备参考，是为徐家汇天主堂藏书楼的雏形和起始。① 从此以后，耶稣会会士不断罗致中西要籍，徐家汇天主堂藏书楼的藏书渐臻完备，并成为晚清时期上海最大的图书馆。总的来说，徐家汇天主堂藏书楼的特点和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在藏书楼的规模上，徐家汇天主堂藏书楼是晚清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藏书中心。据胡道静在20世纪30年代时记载②：徐家汇天主堂“藏书楼是一所广敞的二层屋子，下藏中文书，上藏西文书”。其中：

> (中文书库)列架一百余，每架十二格，分列经、史、子、集、丛书、圣教书，共约120 000册。另有书柜置各省有名碑帖，又藏中西古钱很多。中籍中以地方志搜集得最多，居公藏地方志第五位。东方图书馆毁后进第四位……方志以外，收藏著名报纸杂志亦很完备：《申报》、《新闻报》、《时报》、《东方杂志》、耶稣会所出各种期刊以及关于教育方面的多种杂志，都保存着自创刊日起。中国的现代新闻纸这藏书楼是眼见着它们降生和长成的，并且替它们好好的保存了可贵的史迹。
>
> (西文书库)书架亦一百余具，每具十二格。有希腊、拉丁、法、英、德各国文字写的书，古本书甚多，各国所出的著名百科辞典及重要杂志均备。共约80 000册。‘中国学’架中，庋藏十三经及三民主义等书的拉丁、英、法三种文字译本。
>
> 除天主堂藏书楼外，徐家汇一带各天主教组织，如耶稣会修士院、大修院及小修院、天文台、博物馆、徐汇公学、徐汇师范，也各有专门的或小规模的图书馆，大约共有中西书籍80 000册；合计徐家汇那一圈地方的存书计300 000册左右。

因为徐家汇天主堂藏书楼拥有如此丰富的藏书，加之其历史较长，所以它在晚清社会中，尤其是清政府官僚和士绅之中具有相当的知名度，以至不少出洋使臣在经上海出洋的往返途中大多会到此一游，借以了解“洋情”。

在藏书楼的管理上，徐家汇天主堂藏书楼又相当于西方传教士在上海的

---

① 葛伯熙. 徐家汇藏书楼简史[J]. 图书馆杂志，1982(2)：69-70.

② 胡道静. 上海图书馆史[M]. 上海：上海市通志馆，1935：57-60.

“中心图书馆”。徐家汇天主堂藏书楼隶属于徐家汇天主堂耶稣会总院；在徐家汇一带各天主教组织，如耶稣会修士院、大修院及小修院、天文台、博物院、徐汇公学、徐汇师范等，又各设有专门的或小规模的藏书；此外，耶稣会在徐家汇之外所属上海各天主堂还设有藏书，如后来“知名的就有董家渡大修院图书馆、董家渡小修院图书馆、洋泾浜圣若瑟学堂图书馆、虹口圣芳济学堂图书馆、罗家湾震旦大学院图书馆等”。与此相应的是，在1875年以前，徐家汇天主堂藏书楼的主管人员都是上海的耶稣会会士；而在1875—1949年，徐家汇天主堂藏书楼及其兄弟馆，每年都由耶稣会直接调配主管人员。① 由此可见，在一定程度上，徐家汇天主堂藏书楼与徐家汇地区其他各天主教组织的藏书和徐家汇以外上海各天主堂的藏书已经具有三级管理架构的意味，这也正是天主教组织相对比较严密的一种反映。

在藏书楼的利用上，徐家汇天主堂藏书楼则是传教士的专门图书馆。徐家汇天主堂藏书楼“本专供耶稣会会士研究参考之用。后来有所发展，凡教会中人，或由教会中人介绍，经藏书楼主管司铎同意后，亦可入内阅览，但为数极少”。② 虽然徐家汇天主堂藏书楼“是一所广敞的二层屋子，下藏中文书，上藏西文书”。③ 但是“库内仅有阅览台一、二张，坐椅数只。至于即期报章杂志和一般图书，则放在司铎休息室(la Salle des Pères)内，任凭选阅。中文库内除几张办公桌外，还有一张带有半截书架的写字台，一张装订修补工作台和一张特制的书根书写台”。④ 由此可见，徐家汇天主堂藏书楼并不注重藏书的开放利用，尤其是不向上海市民开放。

在藏书楼的名称上，徐家汇天主堂藏书楼则开了我国最早使用“藏书楼”这个中文名称的先例。徐家汇天主堂藏书楼肇于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其初的外文名称是“Bibliotheca Zi-Ka-Wei”⑤(中文可译意为“徐家汇图书馆”)。从目前可见的史料来看，徐家汇天主堂藏书楼可能是自明末以来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第一个正式以西文“Bibliotheca”(图书馆)一词来命名的藏书处所或机构。虽然徐家汇天主堂藏书楼究竟何时开始正式使用“藏书楼”这个中文名称，现在还无法得到明确的史料佐证，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

---

① 葛伯熙. 徐家汇藏书楼简史[J]. 图书馆杂志，1982(2)：69-70.
② 葛伯熙. 徐家汇藏书楼简史[J]. 图书馆杂志，1982(2)：69-70.
③ 胡道静. 上海图书馆史[M]. 上海：上海市通志馆，1935：57-60.
④ 葛伯熙. 徐家汇藏书楼简史[J]. 图书馆杂志，1982(2)：69-70.
⑤ 胡道静. 上海图书馆史[M]. 上海：上海市通志馆，1935：57.

个中文名称的使用应该在戊戌变法以前。葛伯熙曾言："徐家汇藏书楼或称天主堂藏书楼，全称'上海徐家汇天主堂藏书楼'，也有人称为'汇堂石室'的。由于它一向没有挂过牌，所以许多人称它为藏书室或大书房的。""现在，我们可以从它的藏书印鉴上了解到它的名称的变化。该楼所藏中文古籍，早期多用小圆印。印文是 Zi-Ka-Wei Reservata Bibiotheca（译意为徐家汇藏书房），并有耶稣会的专用标记 IMS。后来多用大方印，印文是篆体阳文'上海徐家汇天主堂藏书楼印'。另有大方印一颗，印文相同，为期较晚。再后来的藏书印鉴有三种：一种是圆形章，四周是拉丁文字：'Zi-Ka-Wei Bibliotheca Major'，中部汉文：'徐家汇大书房'，多见于欧文藏书；一种是腰圆章：上边是'上海徐家汇'，下边是拉丁文'Bibliotheca Zi-Ka-Wei'，中部是汉文'藏书楼'三个大字，多见于中文藏书；再有一种腰圆章：四周是法文字：'Zi-Ka-Wei Biblionthèque de Mission'（译为徐家汇天主堂藏书），中部是汉文'徐家汇天主堂'六个字，但在藏书中并不多见。"①徐家汇天主堂藏书楼虽然没有挂过牌，但是，由于它在晚清具有相当广泛的影响，因此，在人们开始了解和学习西方图书馆的过程中借鉴徐家汇天主堂藏书楼将西文的"图书馆"一词译为中文的"藏书楼"的译法应该不足为奇。

二、Shanghai Library（上海图书馆）

Shanghai Library（以下译称为"上海图书馆"）是晚清时西侨社会在上海租界最早开办经营的一个私立图书馆。虽然它不属于西方传教士图书馆活动的范畴，但是由于它是由西方侨民创办的，且与西方传教士创办的图书馆有某些相似之处，所以，亦将其列入此章进行论述。

"上海图书馆"肇于 1849 年（道光二十九年），起初是上海租界的西方侨民自发地组织的一个"Book Club"（书会）。后来，该"书会"在不断兜揽其主顾的基础上逐渐壮大，到 1851 年（咸丰元年）时便改名为："Shanghai Library"（上海图书馆），并继续延用"书会"的管理方式："由纳费会员支持，每个会员所纳的年费是二十五元，会员中选出董事来管理图书馆事务。"②到 1854 年（咸丰四年）时，"上海图书馆"已有图书 1 276 册，杂志和报纸 30 种。③ 其后，"上海图书馆"因经常陷于经费恐慌，乃不断地向工部局寻求

---

① 葛伯熙．徐家汇藏书楼简史[J]．图书馆杂志，1982(2)：69-70.

② G. H. Bondfield. *Historical Notes on the Shanghai Library*[M]//胡道静．上海图书馆史．上海：上海市通志馆，1935：10.

③ 胡道静．上海图书馆史[M]．上海：上海市通志馆，1935：10.

支持，并从此逐渐由“私立”转向“公共”，大约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时正式更名为“Public Library，S. M. G.”（译意为“工部局公共图书馆”或“工部局公众图书馆”），最后成为一所“公众图书馆”。

由于“上海图书馆”起源于“书会”，其经费主要来自“会员”的会费和社会（工部局）的支持，所以，它具有十分典型的西方近代公共图书馆的意义。从美国近代公共图书馆的产生来看，其最早的公共图书馆即诞生于早期的“工会图书馆”。美国早期的工会图书馆最初也是由工人以会费的方式集资办理，后来逐渐改变为免费图书馆（free library）和公共图书馆（public library）。“上海图书馆”所经历的正是这样一个发展过程，而这个过程包括了西方近代公共图书馆的绝大部分内容和观念。

其一，“工会图书馆”的观念。“上海图书馆”源于最初的“书会”，在其后的发展中也曾长期保持着“书会”的特色。这种“书会”颇类似于美国早期的“工会图书馆”，是一种近代化的西方图书馆观念。这种观念在晚清中国具有相当的先进性。《申报》在1877年3月22日（清光绪三年二月八日）曾刊载过一条标题为《藏书便读》的新闻说：“本埠西人，设有洋文书院，计藏书约有万卷，每年又添购新书五六百部。阅者止须每年费银十两，可随时取出披阅，阅毕缴换，此真至妙之法也。”胡道静对此做过这样的论评：“这不止是介绍一个图书馆，言下大有鼓吹这种制度的意思。”又说：“我国人对于这种在本地方的文化事业的新制度的接触，像那所上海图书馆，恐怕是要在它创设后二十多年才稍稍地普遍知道一点。”①

其二，公共管理的观念。“上海图书馆”在转为“工部局公众图书馆”之前，一直采用从“会员中选出董事来管理图书馆事务”的方式进行管理。②虽然其董事会属于私立性质，但是，它仍然不失“公共管理”的意义。应该说，这在晚清时是一种相当先进的图书馆管理方式和观念。

其三，公共图书馆的观念。由于经费的困难，“上海图书馆”曾不断寻求社会的支持，迫于社会的压力，“上海图书馆”又不得不一步一步地走向“公共图书馆”。例如，“上海运动事业基金委员会在1878年（光绪四年）助以赠款五百两，并且继续赠与二年或三年之久，以图书馆公开为条件”。“在1881年（光绪七年），工部局赠款规银二五〇两，约定该馆应该‘保持对于公众每天免费的开放几小时’。次年，赠款减至一〇〇两。此后的八年间

① 胡道静. 上海图书馆史[M]. 上海：上海市通志馆，1935：1-2.

② G. H. Bondfield. *Historical Notes on the Shanghai Library*[M]//胡道静. 上海图书馆史. 上海：上海市通志馆，1935：10.

每年都照这个数目赠给。"①于是，在经费和社会的压力下，"上海图书馆"开始走向"公开"。

1893年2月7日(光绪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上海图书馆名誉秘书德罗蒙(W. H. Drummond)致书于工部局秘书韬朋(R. F. Thorbum)报告该馆一年间工作的进展时说：

> 本图书馆董事会命余陈述下列之报告，表示彼等去年为谋公众之广大的利益努力于造成此图书馆如"公开的书林"(Free Public Institution)之情况，以答谢工部局捐金六百两支持其前进之仁惠。
>
> 其一，是年之最早的布置为董事会规定全日开放本图书馆成一公共阅览室介于晨九时至晚七时之间。
>
> 其二，三月间，曾遣送定单回国按期订购(自1892年6月1日起)周报一五种(包括四种美国的)，其中极普遍者七种订有双份，以便利陈列于阅览室之桌上。
>
> 其三，主要之警务署三处，即中央、虹口与老闸，已经免费供给图书阅览，一七一册曾送至中央警务署，四六册至虹口，又三〇册至老闸，总数为一九三。
>
> 余更受命陈述，董事会将继续奋勉彼等之力，冀本图书馆有益普通的公众；但如图书馆经济之现状，彼等不能更事增加新闻纸或杂志之供应，而若干种则确所需要也。②

其四，巡回文库的观念。巡回文库是近代西方公共图书馆的一项十分重要的社区图书馆服务。早在"1891年(光绪十七年)，工部局预算案付于纳税人年会讨论时，下列的修正案由波唐(Purdon)的提议和华尼莱脱(Wainewright)的附议经通过，'预算表中上海图书馆的补助费应增至六百两'。在建议这修正案时，波唐就提出注意，即假如这增款经通过赠给，他建议该书馆应在各个警务署兴办'免费的巡回文库'(free circulating libraries)"。③ 后来，纳税人年会通过了工部局的预算案，"上海图书馆"便开始了巡回文库服务。1893年德罗蒙报告中"主要之警务署三处，即中央、

---

① 胡道静. 上海图书馆史[M]. 上海：上海市通志馆，1935：11.

② 胡道静. 上海图书馆史[M]. 上海：上海市通志馆，1935：11-12.

③ S. M. C. Report，1891：196-197[M]//胡道静. 上海图书馆史. 上海：上海市通志馆，1935：11-12.

虹口与老闸，已经免费供给图书阅览”等语此即是指其巡回文库服务。由此可见，“上海图书馆”是我国较早采用巡回文库的图书馆。

其五，图书馆委员会的观念。图书馆委员会是近现代西方图书馆的普遍管理方式之一。由于“上海图书馆”“始终是陷在经费恐慌的袭击中；它于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要求工部局增给年费五百两，未得允准”。① 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上海图书馆”又再次请求工部局给予经费支持，“上海图书馆”的名誉秘书李飞(L. N. Leefe)在给工部局写去的信函中特别提出为了拟将“上海图书馆”归并于“较大之学会”和“随时移权于工部局”的意向：

> 此乃吾董事会所自信者，并愿工部局分其目光回忆本图书馆近年升腾之迅速，与继续猛晋之不已，将自胚胎，以成巨构；必有求于工部局加意抚持其生长与存在，此所以请求补助今兹不足之数也。将俟来日机运遇合，本埠居民有较大之学会之组织，本馆即拟形成彼之一部，以供中外居民教育娱乐之需，则必蔚为租界中优异卓越之特征矣。
>
> 吾董事会又愿作为随时移权本馆于工部局之准备，以确定此组织之肇端与告竣。彼等常怀自信，协助维持此组织，以俟如是机缘之临遇，倘一日工部局眷顾为适宜支持之物也。②

“这几句话露出了飘絮谁属的意思，又成了上海图书馆归宿的谶语”。③ 1913年，工部局在得到纳税人会授给的权力后取得了“上海图书馆”的管理权，并且遵照“上海图书馆”前董事会的意旨，委请达文德(C. E. Darwent)、奥斯丁(W. C. P. Austin)和欧贝(H. S. Oppe)“三位有兴趣的居民”组织了“图书馆委员会”(Library Committee)，以“监督它的工作并作为它的一切事务的顾问团”。④

“上海图书馆”图书馆委员会的成立虽然发生在民国初年且亦非国内之首倡，但是就上海而言它是最早的图书馆委员会，所以仍不失为新图书馆观念的引进。

---

① 胡道静. 上海图书馆史[M]. 上海：上海市通志馆，1935：12.

② S. M. C. Report，1903：331[M]//胡道静. 上海图书馆史. 上海：上海市通志馆，1935：13.

③ 胡道静. 上海图书馆史[M]. 上海：上海市通志馆，1935：13.

④ S. M. C. Report，1903：331[M]//胡道静. 上海图书馆史. 上海：上海市通志馆，1935：14.

综上所述，“上海图书馆”在晚清时期比较全面地引进和实施了西方的公共图书馆观念，这在晚清时创办的所有新式藏书楼或图书馆中都是绝无仅有的。但是，由于“上海图书馆”在本质上乃是“洋人”（西方侨民）在上海“租界”所办的一所为部分“洋人”（交纳会费的西方侨民）服务的“洋文图书馆”（一本中文书也没有），所以，与其说“上海图书馆”是上海的一所新式公共图书馆，还不如说它是上海的一所“洋人”公共图书馆。正因为“上海图书馆”是一所完全向中国民众封闭的所谓“公众图书馆”，所以，在晚清时，“上海图书馆”所引进和实施的所有新的图书馆观念对西方图书馆观念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近现代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影响甚微。对此，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得到佐证：

首先，中国民众对“上海图书馆”知之甚少，甚至连“上海图书馆”的名称都不清楚。“上海图书馆”一直使用的是外文名称“Shanghai Library”，中国民众根本就不清楚它的中文名称。胡道静在1935年时曾就其“名称的问题”做过这样的专门说明：

> 这个图书馆，在私立时代的名称是“Shanghai Library”译意为“上海图书馆”。及至归公办后，改名为“Public Libray，S. M. G”，译意为“工部局公共图书馆”，或“工部局公众图书馆”；最近，它自己标出的华文招牌是“公众图书馆”。再说，它的经过是这么的长久，而一向并没有规定的华文名称，一般地提到它时，就有许多很奇怪的“俗称”，或至今而未消灭，现在把这些“俗称”写在下边：
>
> 洋文书院：因为从前这个图书馆中收藏的都是西文书，那时“图书馆”的名词又未为一般所习用，所以把它弄了“洋文书院”的雅号。这样的称呼起源很早，而且迄今未已，如一九三四年（民国二十三年）冬季的上海电话公司电话簿上还是这样地写着呢。
>
> 洋文书馆：从第一个变化来的。不过这称呼有和亚洲文会图书馆的俗称有缠夹的危险，所以一般也不常用。
>
> 市政厅图书馆：因它自1903年至1930年是住在市政厅里的，所以得着了这个名称。照现在图书馆名词的定义，“市政厅图书馆”是指专备地方官厅政治上参考之用的图书馆，所以拿这名称来叫公众图书馆是并不妥当的。①

① 胡道静．上海图书馆史[M]．上海：上海市通志馆，1935：17-18.

其次，虽然“上海图书馆”是一所拥有诸多近现代西方图书馆观念的新式图书馆，但是由于它不过是西方侨民所办的一所独立于中国社会之外的“私立”图书馆，所以，从整个中国近现代图书馆的发展历史来看，它又具有相当的封闭性、保守性和落后性。这种封闭性、保守性和落后性在中国近代公共图书馆尚未普遍兴起的晚清时代并不彰显，但是到了民国时期则显得异常突出，并且因为它与中国的近现代公共图书馆格格不入，而不断受到批评和抨击。

例如，“工部局图书馆委员会”第一任主席委员、上海有名的牧师达文德(C. E. Darwent)在1919年写 *Shanghai* 一书时，曾高度地赞扬这所“公众图书馆”说：“这图书馆是很完善的一个，它的藏书数在12 000以上……和它的人口相仿……伦敦要有12 000 000卷书在它的公共图书馆里才能够有这同样的比率。”①对此，胡道静曾做过这样的批评：“公众图书馆果然值得这样抬举吗？不，达文德把立场完全弄错了。这个图书馆既归工部局直接经营，在社会上的地位，绝对不再是一个小范围享用的外侨社会的私立图书馆了；工部局每年动用了公共租界内大部分中国居民和极小部分外国居民缴纳的市税来维持这个给市民应用的图书馆，而这图书馆里反而是一本中文书也没有！这戋戋一万二千本书又怎么够得上和公共租界内中外居民人数来分配?”②

再如，为了反击类似达文德的这种“乖理”，1928年9月下旬，上海图书馆协会曾专门致函“纳税华人会”，抨击“公众图书馆”的腐败与落后，并敦促工部局对该图书馆进行改革：

> 纳税华人会执行委员会公鉴，启者：工部局年耗钜万之公款以维持市政厅图书馆(原注：即洋文书院)经费，考其内容之腐败，经营之不当，中国评论周报言之屡矣。以纳税华人之血汗供其挥霍，而图书馆中曾不能得一中文书籍，宁非世界之怪事！尝闻欧西各大图书馆，巴黎之国家图书馆，莫不遍收中文图书，珍藏馆内，供欧西人士之参考。上海为中华大埠，世界通都，而图书馆腐败至此，宁非市民之羞！他若书籍之陈旧，经营之不适，不特不合图书科学之原理，抑且使阅书者有无书可阅之痛苦；虽有阅览室，只限于少数之入会会员，而数十年前之旧字

① C. E. Darwent. *Shanghai*. 1919：125[M]．胡道静．上海图书馆史．上海：上海市通志馆，1935：14.

② 胡道静．上海图书馆史[M]．上海：上海市通志馆，1935：15.

典，犹高置案头，其他种种腐败情形，不暇枚举。敬请贵会顾市民之公意，讨论彻底改革方案，是所至祷。①

从此以后，“公众图书馆”才开始逐渐有所变化，但是，那已经是中国近现代公共图书馆比较发达的时候了。毫无疑问，“上海图书馆”可以称得上是晚清，甚至明末以来，西方传教士和侨民在中国开展图书馆活动而鲜能对西方图书馆观念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近现代图书馆的发展产生影响的最典型例证之一。

三、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图书馆

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图书馆（Library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Royal Asiatic Society）大约创办于 1871 年（同治十年），其创办人为伟烈亚力牧师（Rev. Alexander Wylie，1815—1887）。

1847 年（道光二十七年），伟烈亚力受伦敦会的派遣来到上海，从事圣经等宗教书籍的印刷工作。由于他在英国伦敦时对于中国语言和中国的情况已有了比较深刻的研究，所以到了上海以后，除了献身宗教事业以外，还旁及法、德、俄、满、蒙等语言的研究。1857 年（咸丰七年），伟烈亚力创办了“上海文理学会”（Shanghai Literary and Scientific Society），以专门研究东半球的文化。1858 年，英国皇家亚洲文会将“上海文理学会”吸收为其在上海的一个分会，于是，“上海文理学会”遂改名为“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1868 年，英国政府将其在上海博物院路的一块土地“赠给”“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1871 年，“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在此建立了专门的会所，其中“里面有一个在中国境内最好的东方学图书馆”。②

在创办之初，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图书馆的“基本的关于东方之书籍的集合”主要来自伟烈亚力个人收藏的 718 卷图书和小册子，以及该会已有的一些书籍，其总数约为 1 300 卷。③ 总的来说，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图书馆的规模并不大，直到 20 世纪 30 年代初，也就是在其创办 60 年后，其藏书

---

① 申报．[1928-09-30][M]//胡道静．上海图书馆史．上海：上海市通志馆，1935：15.

② Britains Share in Shanghais Growth[M]//胡道静．上海图书馆史．上海：上海市通志馆，1935：45.

③ Henri Cordier. Preface of the Catalogue of the N. C. B. R. A. S. (1st edition)[M]//胡道静．上海图书馆史．上海：上海市通志馆，1935：45.

总数大约只有16 000册，其中“用欧洲各国文字写的15 000册，中国文字写的1 000册，内容多半是专述东方事情，特别是涉及宗教、语言、科学、艺术、史地者”。①

1860年，清政府被迫签订《北京条约》以后，西方传教士获得了到中国内地自由旅行的许可，于是，伟烈亚力就代表大英圣书公会在中国的本部18省走遍了17省。

虽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图书馆的规模一直不大，但是，在采用卡片目录、《杜威十进分类法》、《卡特著者号码表》等美国先进的图书馆技术方法方面，它不仅可能是上海各图书馆的最早者，而且还可能是中国图书馆的最早者。1907年，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图书馆“经过审慎的思考后，决定要编一本新的目录，把图书馆里所有的书籍，向来是分做‘博物院组’‘中国组’等等的，现今包括在同一组目录之中；最后决定要采用一种最新式的分类法。经过美国波士顿鲍尔通君(Mr. Bolton of the Athenaen, Boston)有力的推荐，就决定制一个‘字典式的目录’，在卡片上，按照杜威十类法分类和索引，并用卡脱氏著者号码；1908年，这个目录编竣”。② 但是，如同其他的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创办的图书馆一样，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图书馆的服务对象亦仅限于其会员，所以，它所采用的这些先进的图书馆技术方法也没有对中国近现代图书馆事业发生过特别的影响。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在采用卡片目录后曾说：“自从用了这种卡片制后，它的无限止展拓的可能性，包括的广大，和其他的长处是非常的明显的。可是不好处也不少似这样，对于这些不住在上海的会员，虽然图书馆里有了这个完备的目录，他们竟是仍然不晓得。因此决定另把它印成书式的分类目录。”③由此可见，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图书馆也是在一种相对十分封闭的环境中使用美国的先进图书馆技术与方法的。正因为如此，“一般对于这个图书馆常称为‘老洋文书馆’，有的时候爽性把‘老’字拿掉”。④

四、圣约翰大学罗氏图书馆

圣约翰大学罗氏图书馆(Low Library, St. Johns University)是美国圣公会传教士在上海创办的一所教会学校图书馆，它发轫于1894年(光绪二十

① 胡道静. 上海图书馆史[M]. 上海：上海市通志馆，1935：45-46.
② 胡道静. 上海图书馆史[M]. 上海：上海市通志馆，1935：100.
③ 胡道静. 上海图书馆史[M]. 上海：上海市通志馆，1935：103.
④ 胡道静. 上海图书馆史[M]. 上海：上海市通志馆，1935：47.

年)约翰中学校落成之时。校长卜舫济(Rev. Dr. F. P. Hawks Pott)“乃于西北隅二层楼，辟为约翰学校藏书室”；把施约瑟主教(Bishop S. I. J. Schereschewsky)所藏的数十部中文及圣公会之西文图书，和文惠廉主教(Bishop William Jones Boone)宅内所藏美国圣公会英文宗教书几种，并合一处，由神科毕业生吴聿怀负责掌理，“始具图书馆之雏形”。①

1904年(光绪三十年)秋，思颜堂新屋落成，约翰学校藏书室迁入思颜堂之西南隅，并正式命名为罗氏藏书室(Low Library)，以纪念美国纽约罗氏兄弟捐款建造此堂。1911年秋，罗氏藏书室又迁至新购的兆丰园内，“占屋凡三间”，“其时，英文已达五千余本，中文则394部，凡4 432本”。② 到1914年建立独立的馆舍以后，罗氏藏书室(Low Library)遂发展成为真正的圣约翰大学罗氏图书馆。③

圣约翰大学罗氏图书馆在晚清时期规模不大，且管理人员多为该校的毕业生，但是，由于它是上海最早的学校图书馆，并且能够供学生所使用，所以，相对而言，它在西方图书馆观念的传播上仍然能够起到一定程度的作用。

五、格致书院藏书楼

格致书院是英国人傅兰雅(Dr. John. Fryer)和华人徐寿主倡并邀集中西绅商捐资于1875年(光绪元年)在上海英美公共租界北海路开办的，而格致书院藏书楼的创设则是清末新政时期的事情。傅兰雅(Dr. John Fryer)是英国人，理事者潘慎文(Rev. A. P. Parker)是美国人。

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格致书院西董傅兰雅及华董等发起成立格致书院藏书楼，并聘监理会潘慎文(Rev. A. P. Parker)牧师主持，华人徐楚亭助之。“这藏书楼的目的是在促进中国的教育，藏书都是中文的，其中三分之二是四部旧籍，余为东西学译本书。”“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春，潘慎文回国，各董事举广学会季理斐牧师(Rev. Dr. D. McGillivary of the Christian Literary Society)继其任。”④民国以后，虽有所发展，但后来因在迁址以后曾

① 黄维廉·约翰大学图书馆沿革. 录自：圣约翰大学一览(1923年)[M]//李希泌，张椒华编. 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 北京：中华书局，1982，2：504-511.

② 胡道静. 上海图书馆史[M]. 上海：上海市通志馆，1935：65.

③ 黄维廉·约翰大学图书馆沿革. 录自：圣约翰大学一览(1923年)[M]//李希泌，张椒华编. 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 北京：中华书局，1982：504-511.

④ 申报. [1908-03-19][M]//胡道静. 上海图书馆史. 上海：上海市通志馆，1935：47.

遇火灾，便一蹶不振了。

格致书院藏书楼的规模在清末时并不大，例如，1907 年(光绪三十三年)时，只有藏书 1 400 种，报章 24 种。① 同时，其管理的技术方法也基本上来自中国本土，并没有采用多少西方图书馆的先进技术与方法。例如 1906 年编制的《格致书院藏书楼书目》所采用的“分类法体系”基本上是糅合了当时中国人已有的图书分类法体系，其分类体系如下②：

一、经部(子目从略)
二、史部(子目从略)
三、子集(子目从略)
四、集部(子目从略)
五、丛书部
六、东西学书：科学、算学、格致学、化学、电学、声学、光学、力学、重学、名学、天学、地学、医学、物理学、家政学、伦理学、教育学、体育学、哲学、女学、道学、史志、传记、交涉、法律、政治路政、矿政、工政、农政、商政、财政、兵政、船政、通论、杂著。

表面上看来，上述格致书院藏书楼的图书分类体系共设有经部、史部、子部、集部、丛书部和东西学书 6 个大部类，但是，它实际上是古与今或中与西或新与旧“两张皮”的简单拼凑。就古书、中书或旧书而言，它采用的是经、史、子、集、丛的五分法，这种方法与张之洞的《书目答问》的分类方法是完全一致的。就今书、西书或新书而言，其“东西学书”的 35 个大类又基本上没有超出梁启超《西学书目表》3 个大类和 28 个小类的范围，只是在具体类目上的有所增补而已。相对于徐树兰《古越藏书楼书目》的分类体系来说，尽管《格致书院藏书楼书目》的产生还要晚好几年，但是，它明显地要逊色得多。

再如，《格致书院藏书楼观书约》第一条云：“楼上藏书名目，俱一一标明粉牌，悬挂楼下，凡遵约登楼观书者，请先认定某书某卷，以便检交。”这似乎有点“卡片目录”的味道，但是，在中国人眼里它充其量也不过是“一件很有趣味的事情”而已。所以，胡道静说：“看这情形，所谓‘书名

① 申报. [1908-03-19][M]//胡道静. 上海图书馆史. 上海：上海市通志馆，1935：47.

② 胡道静. 上海图书馆史[M]. 上海：上海市通志馆，1935：91-92.

粉牌'仿佛有点和小学校里的学生名牌相象；推想它的功用，倒也和卡片目录差不多，因为增加和改正极为容易；不过这样真是太占地方而且也太笨拙了。"①

但值得注意的是，与前面所述的传教士在上海所创办的其他图书馆不同的是，格致书院藏书楼并非专门供"洋人"使用，它向中国人开放。这样一来，它就使得中国人有机会接触到外国人在中国创办的图书馆，虽然它并不怎么先进。对此，胡道静曾做过这样的评述："到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上海才有第一所为谋华人读者便利的图书馆成立，那便是格致书院藏书楼。"②因为这所"为谋求华人读者便利的图书馆"的创办人傅兰雅(Dr. John Fryer)是英国人，理事者潘慎文(Rev. A. P. Parker)是美国人，所以，陈洙在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为《格致书院藏书楼书目》写序时，既是感佩又是感叹地说："上海向有格致书院，近由西士傅君兰雅商诸各董，添设藏书楼，延潘君慎文主持之，县、城、镇之力亦有所不能。然则居今日而欲裨益学术，光我文治，抗衡欧美，度非地方公建之藏书楼不为功矣。上海处东大陆交冲，文明程度，高出内地。各都邑比年学堂、学会接踵林立，独藏书楼之建，自海上书藏旋作旋辍外，惟兹楼幸观厥成。虽由中西绅宦捐助书册，足资扩充，然非傅君等组织经营，成效曷能如此之速！吾知登斯楼者，既佩诸君之热诚毅力以惠我士林，而尤不能不为国内士夫愧且望也！"③

综上所述，虽然徐家汇天主堂藏书楼可视为上海现代图书馆的起点，"上海图书馆"可以算作上海最早的公共图书馆，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图书馆可以称为上海最早的专门图书馆，圣约翰大学图书馆也是上海最早的学校图书馆，但是，它们全部是为外国人服务的图书馆，对中国近现代图书馆事业和学术的发展并没有产生实质性的影响。胡道静对此曾做过这样的评述："在这初期的四十多年间，在上海境内一起有了上述的四所现代的图书馆，它们都是由外侨创办的，同时和我国人民所发生的影响极为轻微，固然除了约翰大学图书馆以外，其余三所创设的目的，并非是着眼于为谋华人的利益。我国人对于这种在本地方的文化事业的新制度的接触，像那所上海图书馆，恐怕是要在它创设后二十多年才稍稍地普遍知道它一点。"④

① 胡道静. 上海图书馆史[M]. 上海：上海市通志馆，1935：99-100.

② 胡道静. 上海图书馆史[M]. 上海：上海市通志馆，1935：2.

③ 陈洙. 上海格致书院藏书楼书目序(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M]//李希泌，张椒华编. 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 北京：中华书局，1982：503.

④ 胡道静. 上海图书馆史[M]. 上海：上海市通志馆，1935：1-2.

虽然只有格致书院藏书楼才勉强可以称得上是外国人在上海创办的“第一所为谋华人读者便利的图书馆”，但是，这也已经是清末公共图书馆运动兴起时的事情了，相对于中国人自己创办的图书馆来说，它仍然要逊色得多。1904 年，邓实、黄节、刘光汉等在上海发起成立旨在“庋藏古今载籍，搜罗秘要图书，分别部目，以供本会员及会外好学之士观览”的国学保存会藏书楼，是为国人在上海经营的第一所图书馆。同年，上海商务印书馆附设涵芬楼，后来张元济将涵芬楼发展成了“上海最伟大的公开图书馆‘东方图书馆’”①，在全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由此可见，晚清西方传教士在上海的图书馆活动的确远远不如中国人后来在上海的图书馆活动那样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第二节　学会与学堂藏书楼

维新派强学会虽然成立不久即遭封禁，但是由于“新学之风既倡，民智渐开”，“各省从风”“已有不可抑压之势”②，再加上《时务报》宣传影响，各地学会学堂犹如雨后春笋次第设立。据不完全统计，在 1896—1898 年的几年内，全国共成立学会 87 所，学堂 131 所，报馆 91 家。③ 各地学会学堂，因受到“康梁”变法维新思想的影响，尤其是强学会“开大书藏”的影响，亦纷纷搜集新学西学文献，供同志阅览使用，于是，各地的学会学堂亦设立了一些藏书楼或阅览室，而学会学堂藏书楼的设立和发展又进一步推动了新的图书馆观念和学术思想的传播与发展。

---

① 胡道静. 上海图书馆史[M]. 上海：上海市通志馆，1935：3.

② 梁启超. 强学会封禁后之学会、学堂、报馆[M]//陈学恂主编. 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上册).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417-418.

③ 谢灼华. 维新派与近代中国图书馆[J]. 图书馆杂志. 1982(3)：70-73.

陈学恂在《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中说：“关于戊戌变法时期学会的史料见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卷七《改革起原》附《强学会封禁后之学会学堂报馆》，列举学会共三十五个。胡思敏：《戊戌履霜录》卷四《二十一省新政表》，列举学会共三十七个，均失之过略。汤志钧在《戊戌变法时期的学会和报纸》一文(见《戊戌变法史论丛》)，考订学会组织共四十九个，在《戊戌变法史》(1984 年版)中再详细考证，列举学会共五十四个。张玉法在《清季的立宪团体》一书中列举各种学会七十八个，但资料尚有若干不准确或误列处……”见：陈学恂主编. 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上册)[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418.

一、苏学会

1897年7月20日，章钰、张一麐、孔昭晋等在苏州发起成立苏学会，苏学会拟“多购书籍，以增智慧，定期讲习，以证见闻，不开标榜之门，力屏门户之见，远师亭林有耻博文之宗旨，近法校邠采西益中之通论”。① 立会大意有三：(1)以因时制宜为主，取其互相讲习，振起人才，为将来建立学堂张本。(2)“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以中学包罗西学，不能以西学凌驾中学”。(3)“专以学问相砥砺”，勿议朝政。②

苏学会认为“藏书庋器之所”是学会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所以，苏学会在其“会章”中明确提出：“会中讲堂及藏书庋器之所，必不可无。惟今当创始之时，尚无此项经费，暂借宽敞房屋作为学会公所。”并将设立“藏书庋器之所”列为苏学会应办的八件事之一。③ 为了筹措设立“藏书庋器之所”的经费，苏学会在其所规定的七个入会条件中专门列出了三个有关设立“藏书庋器之所”经费的入会条件④：

其一，“凡入会者须出会费银五圆，作为购置书籍等一切经费。入会者于报名时先将会费交出，随由报名处发给收条即取书凭摺一扣，其会费由报名处陆续缴送协理登簿”。

其二，“凡近城镇乡有愿入会者，照出会费五圆，惟书籍觅寄既难，又不能克日缴到，须本人自觅妥友代寄，邮费自理，但须照看书章程办理”。

其三，“凡官长绅富如有愿助成斯举者，或捐书籍，或捐银钱在十元以上者，准借阅本会书籍，惟须照会中看书章程办理。十元以下者只发给收条。其有慨助巨资以昌斯举者，尤彰盛德”。

从上述入会条件来看，《苏学会简明章程》体现了以下三个方面的新的图书馆思想观念：第一，读者类型。苏学会实际上依照入会条件的不同将其

---

① 苏学会公启．时务报．第33册[N]．光绪二十三年六月二十一日．

② 苏学会简明章程．录自国闻报[N]．第316号七月二十日，光绪二十四年(1898)[M]//李希泌，张椒华编．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82：102.

③ 苏学会简明章程．录自：国闻报．第316号七月二十日，光绪二十四年(1898)．[M]//李希泌，张椒华编．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82：101-102.

④ 苏学会简明章程．国闻报．第316号，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九—三十日[M]//李希泌，张椒华编．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82：102.

读者分成了三个类型，即：本埠会员读者、近城镇乡会员读者和非会员读者。虽然这还称不上是读者研究，但是，从其能够依照各类读者的不同特点提出现场借阅和邮寄借阅等不同的服务方式来看，这已经具有现代图书馆读者研究与服务的基本意味。第二，借阅证件。在书籍借阅的管理上，苏学会提出了向每个会员发放“取书凭摺一扣”的办法。所谓“取书凭摺”也就是今日所言的“借书证”或“图书馆证”，而“借书证”乃是近代图书馆的重要方法之一。从目前所见史料来看，我国最早提出“借阅证”及其使用办法的可能是苏学会。第三，邮寄借阅。苏学会提出对于“近城镇乡入会者”采取邮寄借阅的服务方式。虽然目前尚缺乏史料佐证苏学会是否真正实施过邮寄借阅，但是，仅从这种计划或者思想来看，它已涉及了近代公共图书馆的读者服务观念。如果说 1921 年成立的上海通信图书馆是我国最早专门采用邮寄借阅方式开展服务的图书馆的话，那么，或许可以说，早在 24 年以前，苏学会就已经提出了这种邮寄借阅的基本观念。

值得注意的是，苏学会还拟定了比较详细的《看书章程》，其内容包括以下七条①：

一、购买书籍由经理会同协理等量会费之多寡，核要开单，共同议定。

一、本会所购之书分为六门：曰史学、曰掌故学、曰舆地学、曰算学、曰农商学、曰格致学，其余训诂辞章概不备。

一、书籍当依类编目，易于检寻。写书目三份，一存经理处，一存会中，一存管书处。俟藏书既多，再刊书目单分送同人。

一、书籍每日由协理轮查一次，如有损坏遗失等情，须由管书人追根赔补。

一、每逢五逢十为发书之期，以五日为一限期，能多阅者每期发书两本，少者一本，上期取去，下期缴换。

一、会友欲看何书，须先向管书处挂号，以先后为序，不得争执。本会发有取书印折一扣，各人每逢发书之期，持摺取书。第一期发书几本，第二期收回前期之书，再发书几本，均注明摺上，钤以管书人私印以后准此，一期不缴，以后不发。惟在近城镇乡不在本城者，展限五日，以十日为期，一期不缴，以后不发。

---

① 苏学会简明章程. 录自：国闻报. 第 316 号七月二十日，光绪二十四年 1898 [M]//李希泌，张椒华编. 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 北京：中华书局，1982：102.

一、看书借书如有涂抹缺失等事，在会中本人罚缴书值，本数少者倍之，不缴者将名除去。不入会而有捐款者以后不借。”

从上述《看书章程》来看，它包含了如下图书馆管理的基本观念：第一，管理架构。苏学会采取的是经理、协理和管书人这种管理架构，这里姑且不论这种管理架构与古代藏书机构在管理上的差异，仅就其职位的名称而言已经是迥异于过去的新名称，而且这种名称直到20世纪20年代仍然有图书馆使用。第二，书目体系。苏学会的书目共有三份，其中“一存经理处，一存会中，一存管书处”。存经理处者类似于今日的“内务目录”，存会中者类似于今日的“财产目录”，而存管书处者则类似于今日的“公务目录”或“读者目录”。不仅如此，苏学会还提出“俟藏书既多，再刊书目单分送同人”。这也颇有几分今日所谓的“新书通报书目”或“专题报道书目”的意义。所以，虽然其目录的形式仍然是书本式而非卡片式，但是，可以说，苏学会的书目体系已具有了近现代图书馆目录体系的架构和特征，这是十分值得重视的新的图书馆目录观念。第三，借阅制度。除了前面所述的“取书凭折”和“邮寄借阅”以外，苏学会还制定了借阅手续、借阅期限、赔偿方法等借阅制度。这些制度不仅已经具备了近现代图书馆借阅制度的特征与意义，而且还具有切实可行的操作性。

二、扬州医时学会

扬州医时学会发起成立于1898年，具体情形不详，但是《国闻报》上可见其刊发的《扬州医时学会章程》共有以下三条：

第一，“会中以广购书籍为第一要义。现当开创之始，倡议同人咸出其所有之书，移入会中庋藏，由经理人出具收条，将来仍可收回，不作会中公用。至会中备购之书籍，自应永远存储，不得任意分散”。

第二，“本会除购买书籍外，各种报章皆宜广搜博采，以新耳目而开智慧，如《昌言报》、《中外日报》、《农学报》、《蒙学报》、《申报》、《新闻报》俱各备一份；置诸会中，共同浏览”。

第三，“会中经费，现由倡议之人公同筹措，其未备之书籍，亦当次第购买。后之来者，经同人议定每人酌出入会之资，充为经费。会中所有书籍，皆可随时阅看，惟不得任意取回并糟蹋污损。”①

① 扬州医时学会章程．录自国闻报．第363号光绪二十四年(1898)九月十九日[M]//李希泌，张椒华编．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82：103-104.

从该"章程"来看，与其说扬州医时学会是一个"学会"，还不如说它就是一个"图书馆"。因为扬州医时学会不仅"以广购书籍为第一要义"，而且其"章程"的全部内容也都属于"图书馆"的范畴。

三、两粤广仁善堂圣学会

圣学会由康有为和唐景崧、岑春煊、蔡希邠等于1897年在广西桂林发起成立，因"借广仁善堂供孔子"，所以称为"两粤广仁善堂圣学会"。康有为在其所撰《两粤广仁善堂圣学会缘起》中说："今欲推广专以发明圣道，仁吾同类，合官绅士庶而讲求之，以文会友，用广大孔子之教为主。"①《两粤广仁善堂圣学会章程》共有五条，即：庚子拜经，广购书器，刊布报纸，设大义塾，开三业学(指农工商三业)。其中第二条"广购书器"说：

> 辛卯之岁，马中丞奏开桂垣书局，翻引经书，遍购经史子集，四部书籍略备，刊发章程，准士子就读，甚盛意也。惟其地太偏僻，士人就读为难，且官局森严，乡间士庶，每逡巡而不敢进。惟善堂地处要冲，易于走集，广购图书，便于会讲。近年，西政西学，日新不已，实则中国圣经之义，议院实谋及庶人，机器则开物利用，历代子史百家，著述亦多有之。但研求者寡，其流渐湮，正宜恢复旧学，岂可让人独步。今之聚书，务使人士知中国圣人穷理之学，讲求实用，无所不备。泰西通都大邑，必有大藏书楼，即中国图籍亦藏庋至多。今拟合中国图书陆续购钞，而先搜其经世有用者。西人政学，及各种艺术图书，皆旁搜购采，以广考镜而备研求。若世家大族，名士硕儒，出其藏本，嘉惠本堂，敬当世袭珍藏，公之同志，与捐资者一例登报，以扬美德。其各省书局所印，及西学时务有用书，皆可存堂中代售。②

因为《两粤广仁善圣学会章程》也是出自康有为之手，所以其"广购书器"与《上海强学会章程》中的"开大书藏"在文字和内容上基本雷同。

四、通艺学堂

通艺学堂，原名西学堂，由张元济与陈昭常、张荫棠、何藻翔、曾习

① 康有为. 两粤广仁善堂圣学会缘起. 知新报. 第18册[N]. 光绪二十三年四月十六日.

② 康有为. 两粤广仁善堂圣学会缘起. 知新报. 第18册[N]. 光绪二十三年四月十六日.

经、周汝钧、夏偕复等于1896年在北京筹设。1897年2月12日开馆，初有学生20余人，先习外国语言文字，所需中西书籍，多由上海汪康年代为访购。1897年9月20日，张元济等呈请立案，校名定为通艺学堂（“通艺”之名由严复所取），校址设在北京宣武门内象坊桥，总理衙门接据张元济等原奏后于同年12月17日将原片具陈，并于“同日奉朱批：依议，钦此”。戊戌政变后，张元济于1898年10月8日被革职，永不叙用，张元济遂将通艺学堂结束，并把校产交给了京师大学堂。①

虽然通艺学堂从筹设到结束只有两年多的时间，但是其图书馆的筹设，尤其是其《图书馆章程》在晚清西方图书馆观念的传播上却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大约在通艺学堂开馆之初，张元济等就已经拟定《通艺学堂章程》，张元济在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897年1月26日）《至汪康年书》中云：“学舍亦已赁妥，简始（陈昭常）、梅夏酌定章程数十条，容后录呈台阅。”②《通艺学堂章程》所定的宗旨有三条：“第一条：国子之教，六艺是职，艺可从政，渊源圣门，故此学堂名曰通艺。第二条：欲开风气，必先首善，欲宏造就，必资儒流，故此学堂设于京师，以待晋绅与其子弟之有志于此者。第三条：欧美励学，新理日出，未知未能，取资宜博，故此学堂专讲泰西诸种实学。”③在学堂的机构设置中包括图书馆、阅报房等，其章程中还附有《读书规约》和《图书馆章程》，其中《图书馆章程》共有如下12条：

第一条　本馆专藏中外各种有用图书，凡在堂同学及在外同志均可随时入馆观览。

第二条　中国书籍专择其有关政教者藏之，其琐碎芜杂者概不收录。

第三条　中国翻译西书，凡同文馆、制造局及各教会所印行者，现已购备全份，其最要各种并多备数部，以供众览。

第四条　西文图籍现择其浅近切要购备参考，余俟同人学业所造，乃尽添购。

① 张元济．戊戌政变的回忆[M]//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388.

② 汪家熔．两件图书馆史料[M]．图书馆学通讯，1983(2)：89.

③ 通艺学堂章程[M]//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386.

第五条　本馆设馆正一人，即由同学兼理，专司搜采，检查等事仍由司事襄办。另用书佣一名，每日将看书人数暨借出缴还书数登簿，呈交司事查验。馆正暨总理随时抽查，如有遗失，责成书佣赔偿。

第六条　书籍概存柜中，另设书目，分类登载。来阅者即可取馆中所备提单，开明卷数，签名其上，交书佣提取。阅毕交还，始准将原单收回。

第七条　同人取阅书籍如有遗失，应偿原价二倍。若仅污损，则偿原价，仍将原书交还。俟补购到日，即将此书给予本人。

第八条　凡同学之不驻堂者，准将书籍借归阅看。此外不得援例办理。

第九条　西文图籍，现议概不得借归阅看。

第十条　借书归阅，卷帙不得过两册，时限不得过四日。违者罚书价四分之一。

第十一条　在外同志愿来馆读书者，应请同学作保，再由本馆赠一凭单。凡得有凭单者，本馆一律优待。惟此凭单不得转借转送。

第十二条　应备图书甚多，现因经费支绌，未能广为收罗。尚望四方宏达之士随时投赠，庶臻美备，并扩见闻。①

从上述《图书馆章程》来看，它有如下几个特点：其一，这个章程是我国近代的第一个《图书馆章程》，它不仅比苏学会的《看书章程》要早约半年之久，而且还第一个正式地使用了《图书馆章程》这个名称。其二，从现有的资料来看，通艺学堂图书馆可能是我国第一个正式使用“图书馆”名称的图书馆。其三，张元济等在呈请立案时曾言：“一俟筹款稍充，再行延洋教习，广购仪器，分建藏书、译书等馆，以期考核精审，温故知新，并遵照光绪二十一年五月总理衙门议覆刑部侍郎李端棻推广学校章程，选派优等学生游历外国，扩其才识，或再入各国大学堂肄业，期底大成。”②可见，通艺学堂图书馆及其《图书馆章程》乃是受李端棻 1896 年 6 月 12 日所上《请推广学校析》影响的结果。其四，通艺学堂《图书馆章程》比较简洁，只有 12 条，475 字，已将整个图书馆的活动、情况、采购重点、制度概括无遗。

---

① 汪家熔. 两件图书馆史料[J]. 图书馆学通讯，1983(2)：89.

② 刑部主事张元济、工部主事夏偕复、内阁中书陈懋鼎、内阁中书王仪通呈请设立通艺学堂文[M]//陈学恂主编. 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上册).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384.

五、其他学会学堂藏书楼

金陵劝学会(1898 年)："金陵风气大开。寒畯士子，笔研耕耘，仅堪糊口，无力购买书籍。近因上谕乡会科岁等试改考策论，知非多读书不为功。有某君邀集同志多人，每人各出鹰洋十元，凑成巨款，购买中西有用之书，藏于公所。除凑股之人任凭观览外，其有未经入股有志读书者，准其出资租阅，如曩代春明坊借书之例。昨已妥定章程再禀府署，恳请转禀极峰准拨尊经阁代为藏书之所。盖以阁地宽敞，可容百余人团坐观书之故。又因此举志在劝学而起，故名之曰劝学会，一俟批准，即将尅日兴办矣。"①

湖州崇实学堂章程(1898 年)："比者叠奉谕旨，劝设学堂，京师而外，省会郡邑，次第踵兴。吾湖乃独阙知，甚非所以开风气，广学术也。爰集同志，创设学堂，择中西有用之书，分门讲习，严定课程，以期精进，广购图籍，以备研求。远师安定经义治事之遗规，近法校邠采西益中之通议，志学之士，当乐从焉。"②

上海《南洋公学章程》(1898 年)："第一章　设学宗旨　第一节　西国以学堂经费，半由商民所捐，半由官助者为公学。今上海学堂之设，常费皆招商、电报两局众商所捐，故定名曰南洋公学。""第七章　藏书译书　共二节　第一节　公学设一图书院，调取各省官刻图籍。其私家所刻，及东西各国图籍，皆分别择要购置庋藏。学堂诸生阅看各书，照另定收发章程办理。第二节　师范院及中上两院学生，本有翻译课程，另设译书院一所，选诸生之有学识而能文者，将图书院购藏东西各国新出之书课令择要翻译，陆续刊行。"③

广州《时敏学堂章程》(1898 年)(第一条)：

> 一、购书：学子读书，本期致用。今所购者，一以经济之书为主，中学之书，除《四书》、《五经》人所共有外，若历代地理，历朝掌故，本朝掌故，近代名臣奏议，及时贤新著之书，不嫌博采。其经史子集，

① 金陵开劝学会．录自：国闻报．第 324 号光绪二十四年(1898 年)八月初八日[M]//李希泌，张椒华编．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82：103.

② 湖州崇实学堂广购图籍．录自中外日报．第 3 号光绪二十四年(1898 年)八月十九日[M]//李希泌，张椒华编．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82：104.

③ 南洋公学章程(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四日)[M]//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312-314.

但取其有关经济者购之。西学之书：曰天算、曰地舆、曰格致、曰制造、曰政书、曰史志、曰交涉、曰公法、曰农矿工商兵刑诸书，分类广购，以扩见闻，而资讲习。①

一、设借书以便观览：堂内诸君，居处不同，境遇各异，岂能尽人入堂肄业。且房舍有限，或不能容，拟设借书部一卷，分送同人，俟捐款缴清，取有回条，再凭回条至学堂换借书凭部一本。凡借书还书，须据部到掌书处，给回收发字样。省城限三日为一期，四乡限十日为一期，上期还书，乃借下期，逾期不还，掌书催之。延至三期，永远不借，或有遗失污损一册者，酌议赔值，或令抄回三册。以上照全书原值赔偿，另购新本，其旧本仍充公籍。不赔者亦永远不借，不与会者不借。②

一、捐书籍以期美备：经济之书，浩如烟海，本堂或多未备。诸君于捐银外，如有家藏善本，欲公众览者，请列书目，交掌书处查对，除辞章帖括等书外，无论多少，概刊入题名记，以志盛德。③

湖南长沙南学会：筹议于1898年冬，正式开会则为1898年2月21日，是资产阶级改良派谭嗣同、唐才常等在湖南巡抚陈宝箴等支持下组织成立的一个救亡御侮的政治组织。维新变法时期，湖南是“全国最富朝气的一省”，“南学会尤为全省新政之命脉”。④ 南学会设立有藏书处，搜集“古今中外有用之书”，书籍来源多系捐助，捐书人姓名、书种，在《湘报》刊出，并订立了《藏书处章程二十四条》⑤，略具地方藏书楼的规模。

衡州任学会章程(1898年)：“九、拟设格致书室一所，以开民智，任人观看。”⑥

---

① 时敏学堂章程(光绪二十四年)[M]//陈学恂主编. 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上册).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408.

② 时敏学堂章程(光绪二十四年)[M]//陈学恂主编. 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上册).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410.

③ 时敏学堂章程(光绪二十四年)[M]//陈学恂主编. 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上册).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410.

④ 汤志钧. 康有为与戊戌变法[M]. 北京：中华书局，1984：217.

⑤ 藏书处章程二十四条. 湘报. 第44、46号，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六、八日[M]//汤志钧. 康有为与戊戌变法. 北京：中华书局，1984：221.

⑥ 衡州任学会章程(节录). 录自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五月初一日《知新报》第五十六册[M]//李希泌，张椒华编. 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 中华书局，1982：105.

第三节　清末新政与公共图书馆运动的兴起

一、清末新政

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不仅使整个国家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也使统治集团本身几乎陷入了一场灭顶之灾。在穷途末路之中，慈禧太后不得不于庚子(1901年)十二月在西安宣布要“变通政治”，实行“新政”。在此后几年中，清政府相继采取了一些“变法新政”的措施，如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为外务部，成立商部、制定商律、奖励公司、废除科举、开办学堂、选派留学、裁汰绿营、组练新军等。正如陈天华在1903年时所说，清朝廷“及到庚子年闹出了弥天大祸，才晓得一味守旧万万不可，稍稍行了些皮毛新政”。①

在这种情况下，“革新之机”又渐渐“萌发于下”，“有志之士翻译欧美及日本之书籍、研究其宪法者渐众”。1905年日俄战争爆发，君主立宪的小日本打败了君主专制的俄国，在朝野士大夫的心目中，“非小国能战胜于大国，实立宪能战胜于专制也”。于是，立宪的呼声不断高升。载泽、端方等大臣纷纷奏请朝廷立宪。1905年，清政府决定派载泽、端方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外国宪政，拉开了清末预备立宪的序幕。

清末预备立宪自1905年开始酝酿，到1911年清王朝灭亡为止，大约经历了6年的时间。在此期间，清政府于1905年设立了考察政治馆，命政务处筹订宪法大纲。1906年宣布预备立宪，同时改革官制，将六部扩充为外务、民政、陆军等11个部。1907年改考察政治馆为宪政编查馆。1908年颁布《钦定宪法大纲》，以是年至1916年共9年为预备立宪时期。1909年设立各省咨议局，次年又设立中央咨议机关——资政院。同时迫于立宪派的请愿活动，宣布提前于1913年召开国会。然而，清政府的宪政改革并没有挽救清王朝的灭亡，1911年，辛亥革命彻底地推翻了腐败的清政府，预备立宪随之结束。

虽然清末“变法新政”、“预备立宪”是清政府为形势所迫，不得已而进行的一场改革，并因此在态度和政策上既具有积极的一面，又具有消极的一面，且总的倾向是保守的；但是，清末新政并非完全是“一场政治骗局”，

① 钟叔河．关于“五大臣出洋”[M]//戴鸿慈．出使九国记(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长沙：岳麓书社，1986：271．

因为虽然慈禧太后和清政府推行清末新政的主观动机是为了挽救摇摇欲坠的腐败统治，但是在客观上清末新政涉及了一些根本制度的变革，因此它对于中国社会的发展具有一定的作用。正如王晓秋所言："晚清的几次改革高潮，客观上都是中国近代化(或称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环节。"①"清末改革则进一步引进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与法律，实现了废除科举，建立新军，起草宪法，设立资政院、咨议局等重大改革，成为中国近代化进程中重要一环，也为辛亥革命后民国时期的近代化建设打下了基础。""清末改革""废除了科举、建立新军、预备立宪，推动了中国工业、政治、军事、教育近代化。正是由于有了这一系列的变革，才有可能出现壮大的中国资产阶级、工人阶级和大批具有新思想的青年学生、留学生、新军官兵，才有可能在革命形势和条件成熟时，一举实现推翻清王朝的辛亥革命和最终取得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的胜利。"②

正是因为清末新政在客观上具有上述积极的一面，所以，它在客观上对于推动自鸦片战争至戊戌维新以来学习西方图书馆与创办近代图书馆也具有积极的意义。由于清政府的提倡，西方的图书馆观念在清末新政时期得到了更加广泛的传播，并由此形成了一场"公共图书馆运动"，为民国时期的"新图书馆运动"奠定了基础。

二、清末新政与图书馆

清末新政开始后，清政府于光绪二十七年八月(1901 年 9 月)通谕各省设大学堂、中学堂和小学堂，次年二月又再次谕令各省妥速筹划学堂，并将开办情形详细具奏。在清政府的一再督促下，各省创办了不少各类新式学堂，截至 1903 年，全国各类学堂已达 769 所，在校学生 31 428 人。③

在新式学堂不断建立的同时，清政府亦开始建立新的教育制度。光绪二十八年七月(1902 年 8 月)，清政府颁布张百熙所拟的《钦定学堂章程》，提出了中国新的系统完备的学制，即"壬寅学制"，但此学制基本上没有付诸实施。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1904 年 1 月)，清政府再次颁布张百熙、荣庆、

① 王晓秋，尚小明主编．戊戌维新与清末新政——晚清改革史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5.

② 王晓秋，尚小明主编．戊戌维新与清末新政——晚清改革史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4.

③ 汤钦飞．清末新式教育行政机构的建立及其运作[M]//王晓秋，尚小明主编．戊戌维新与清末新政——晚清改革史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176-177.

张之洞合订的《奏定学堂章程》，并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是为“癸卯学制”。虽然“癸卯学制”大多仿自日本，但是其影响较大，清末民初的新学校教育制度，主要都是以此为依据。

《奏定学堂章程》对于大、中、小学堂图书馆的行政、业务和职员等具有比较具体的规定。如《大学堂章程》“屋场图书器具章”第4节规定：“大学堂当附设图书馆一所，广罗中外古今各种图书，以资考证。”“教员管理员章”第1节为大学堂所设立各项人员，其中包括“图书馆经营官”，第20节称：“图书馆经营官，以各分科大学中正教员或副教员兼任，掌大学堂附属图书馆事务，秉承于总监督。”《高等学堂章程》规定：各种学堂应设图书馆，设掌书官，掌一切图书仪器等项，均听命于教务长。是为清政府设立新式学堂图书馆的“官制”之始。

光绪三十一年八月(1905年9月)，清政府“谕令停科举以广学校”，废除了在中国实行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同年底，清政府设立学部，作为主管全国教育的最高行政机构，并开始建立较为完备的新的教育行政管理体系。

光绪三十二年四月二十日(1906年5月13日)，学部拟定学部官制职守，学部下设：总务司、专门司、普通司、实业司、会计司共五司。专门司下设专门教务科和专门庶务科，其中专门庶务科，设员外郎一员，主事一员，办理科务，凡关于图书馆、博物馆、天文台、气象台等事均归办理。会计司下设度支科和建筑科，其中建筑科，设员外郎一员，主事一员，办理科务，掌本部直辖各学堂图书馆、博物馆之建造、营缮，并考核全国学堂图书馆等之经营、建造是否合度。①

同时，学部又拟定了《各省学务详细官制及办事权限章程》，改学政为提学使司，统辖全省学务，归督抚节制，又改学务处为学务公所，以辅佐提学使筹划学务及备督抚咨询。学务公所分为六课：总务课、专门课、普通课、实业课、图书课、会计课。其中图书课掌理编译教科书、参考书，审查本省各学堂教科图籍，翻译本署往来公文书牍，集录讲义，经理印刷，并管图书馆、博物馆等事务。②

① 学部．奏酌拟学部官制并归并国子监事宜改定额缺折(光绪三十二年四月二十日)[M]//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586-588.

② 学部．奏陈各省学务官制折(光绪三十二年四月二十日)[M]//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590-593.

清政府通过新式教育行政机构的设置和职能分工，第一次确立了从中央到各省的图书馆管理机构和管理官员，这既有利于图书馆的管理，又有利于推动图书馆的发展，同时还具有政府提倡设立图书馆的积极意义。

三、预备立宪与公共图书馆运动

1906年，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1908年又宣布以是年至1916年共9年为预备立宪时期。为了预备立宪，学部于宣统元年闰二月二十八日(1909年4月18日)上《奏报分年筹备事宜折》制定了各项分年筹备事宜。其中，宣统元年(1909年)——预备立宪第二年的筹备事宜中有："颁布图书馆章程"、"京师开办图书馆(附古物保存所)"两项；宣统二年(1910年)——预备立宪第三年的筹备事宜中有："行各省一律开办图书馆。"①也就是说，清政府计划在预备立宪的头三年内计划完成京师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和各省图书馆的设立工作，并通过颁发图书馆章程规范全国的图书馆管理。虽然，在主观上，预备立宪是清政府不得已而为之的改革，但是，在客观上，预备立宪期间有关图书馆"官制"的建立和在全国设立图书馆的计划的确是一个了不起的庞大计划。它表明了清政府积极倡导设立图书馆的姿态和意向，也说明了自鸦片战争，尤其是戊戌维新以后，宣传西方图书馆观念、倡导设立新式图书的思想与活动已经从民间的呼吁上升到了官方的提倡，从地方士绅的个人行为上升到了清政府的国家行为。

正因为如此，在清政府的倡导下，一批地方官吏纷纷开始奏设图书馆，例如：

1906年，《湘抚庞鸿书奏建设图书馆折》(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初一日)；

1907年，《安徽巡抚冯煦奏采访皖省遗书以存国粹折》(光绪三十三年)；

1908年，《奉天总督徐世昌等奏建设黑龙江图书馆折》(光绪三十四年)；

1908年，《两江总督端方奏江南图书馆购买书价请分别筹给片》(光绪三十四年)；

1909年，《山东巡抚袁树勋奏山东省创设图书馆并附设金保存所折》(宣统元年)；

---

① 学部. 奏报分年筹备事宜折(宣统元年闰二月二十八日)[M]//陈学恂主编. 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上册).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742-744.

1909年，《山西巡抚宝棻奏山西省建设图书馆折》(宣统元年)；

1909年，《署归化城副都统三多奏创办归化图书馆片》(宣统元年)；

1909年，《云南提学司叶尔恺详拟奏设云南图书馆请准备咨立案文》(宣统元年)；

1909年，《浙江巡抚增韫奏创建浙江省图书馆归并扩充折》(宣统元年)；

1910年，《广西巡抚张鸣岐奏广西建设图书馆折》(宣统二年)；

1911年，《请改杭州行宫为图书馆疏》(袁嘉谷，宣统三年)。

由于地方官吏的直接参与，在晚清历史上出现了一个创办新式图书馆的热潮，并由此形成了一场公共图书馆运动。这场公共图书馆运动，包括公共图书馆的创办、图书馆管理体制的建立、图书馆管理制度的建立、公共图书馆观念的广泛传播、西方图书馆学术的翻译介绍等内容，奠定了我国近现代图书馆发展的基础。①

从各地奏设图书馆的情形来看，清末预备立宪时期兴起的公共图书馆运动在6年中仍然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自1906年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到1908年是公共图书馆运动的前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各地奏设图书馆大抵是自发的，相对而言具有一定的主动性。自1909年学部制定"颁布图书馆章程"、"京师开办图书馆"和"行各省一律开办图书馆"②计划至1911年预备立宪结束是公共图书馆运动的后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各地奏设图书馆基本上是照章办事，相对而言具有更多的被动性。正因为在1909年的前后各地奏设图书馆呈现出主动和被动的差别，所以，其公共图书馆观念也就具有不同的意义。

与清末新政以前公共图书馆的创设所不同的是，预备立宪时期公共图书馆的创设总的来说是一场自上而下的有组织的公共图书馆运动，其创办公共图书馆的主体不是开明士绅，而是各地的封疆大吏。

四、学部的京师图书馆思想

因为京师图书馆具有国家公共图书馆的性质，所以，京师图书馆的创办是晚清预备立宪时期公共图书馆运动，乃至我国近代图书馆史中的一个重大

① Cheng Huanwen. The Impact of American Librarianship On Chinese Libraranship In Modern Times(1840—1949)[J]. *Libraries & Culture*, Vol. 26, No. 2, Spring 1991, 327-387.

② 学部. 奏报分年筹备事宜折(宣统元年闰二月二十八日)[M]//陈学恂主编. 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上册).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742-744.

历史事件。京师图书馆的创设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1896 年李端棻上《请推广学校折》(1896 年 6 月 12 日)首倡创设京师图书馆；1906 年罗振玉增广李端棻之说，提出创设京师图书馆的具体办法；1909 年学部奏筹京师图书馆，京师图书馆遂告正式设立。在这三个阶段中，李端棻、罗振玉和学部分别就京师图书馆的创设做过论述，构成了晚清的京师图书馆思想。

为了预备立宪，学部于宣统元年闰二月二十八日(1909 年 4 月 18 日)在《奏报分年筹备事宜折》中提出了在宣统元年"京师开办图书馆"的筹备计划。后"几经斟酌"，学部于七月二十四日(1909 年 9 月 8 日)拟定了《学部奏筹建京师图书馆折》，鉴于宣统元年六月以后，清末新政的主角张之洞因严重的肝疾终至一病不起①，"学部虑公(张之洞)有不讳，此举必败于垂成，遂于二十五日入奏"。同年八月初五日学部"奉旨依议"，并"派编修缪荃孙充监督，学部郎中杨熊祥充提调"②，京师图书馆遂告正式设立。

《学部奏筹建京师图书馆折》所阐述的京师图书馆思想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 "供多士之研求""昭同文之盛治"

《学部奏筹建京师图书馆折》开篇即言："奏为筹建京师图书馆，拟恳天恩赏给热河文津阁所藏《四库全书》，并饬下奉宸苑内务府拨与净业湖暨汇通祠各地方，以便兴建而广文治，恭折仰祈圣鉴事。伏查本年闰二月，臣部奏陈预备立宪分年筹备事宜，本年应行筹备者，有在京师开设图书馆一条，奏蒙允准，钦遵在案。自应即时修建馆舍，搜求图书，俾承学之士，得以观览。"③也就是说，学部奏筹建京师图书馆乃是"照章办事"。但是，事实上，如同清政府在"举步维艰，外患日棘，民穷财尽，百废待兴"的时刻试图通过预备立宪以"自强不息"、"转危为安"一样④，筹建京师图书馆也是学部企图挽救腐败的清王朝的一项文化措施。

学部在《学部奏筹建京师图书馆折》中说："京师创建图书馆，实为全国儒林冠冕，尤当旁搜博采，以保国粹而惠士林。"宣明创办京师图书馆的目的是"保国粹而惠士林"。但是，实际上，学部筹建京师图书馆还有着更深

① 冯天瑜，何晓明著. 张之洞评传[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212.

② 许同莘. 张文襄公年谱[M]//李希泌，张椒华编. 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 北京：中华书局，1982：132.

③ 学部奏筹建京师图书馆折(宣统元年八月初五日)[M]//李希泌，张椒华编. 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 北京：中华书局，1982：132-133.

④ 冯天瑜，何晓明著. 张之洞评传[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213.

层次的目的。学部认为："惟是图书馆为学术之渊薮，京师尤系天下观听，规模必求宏远，搜罗必极精详，庶足以供多士之研求，昭同文之盛治。"由此可见，学部奏筹建京师图书馆的目的其表在"保国粹而惠士林"，其实在供"天下观听"和"昭同文之盛治"。或者说，学部认为创办京师图书馆可以起到供"天下观听"和"昭同文之盛治"两个方面的作用。

作为"国家图书馆"，京师图书馆必然是中国文化学术的重要标志之一。学部能够把对京师图书馆地位和作用的认识上升到"尤系天下观听"的高度，这固然值得肯定，但是，学部在京师图书馆"尤系天下观听"认识的背后还有另一种意义。《学部奏筹建京师图书馆折》说："至图书馆开办以后……将见琳琅美富，蔚为大观。上以赞圣朝崇文之化，下以餍士林求学之心。窃谓裨益于全国教育者，良非浅显，似亦维持世道人心之一大端也。"①也就是说，京师图书馆建成以后可以起到"上以赞圣朝崇文之化，下以餍士林求学之心"的全国性示范教育作用，进而达到"维持世道人心"，挽救清王朝的目的。

所谓"供多士之研求，昭同文之盛治"，也就要再现清王朝昔日的"同文之盛治"。《学部奏筹建京师图书馆折》说："我国家稽古右文，远迈前代。圣祖仁皇帝，世宗宪皇帝临雍讲学，特颁图籍，藏之成均。高宗纯皇帝开四库之馆，荟萃载籍，建阁储藏，著录之数，综十六万八千册。又于热河及镇江、扬州、杭州等处，并建藏书之阁，颁给《四库全书》各一份，士子就阁读书，得以传写，所以嘉惠艺林，启牖后学者，至周至渥。"②在学部看来，筹设京师图书馆具有与修建"四库七阁""昭同文之盛治"同等重要的意义。虽然"四库七阁"确实是"乾隆盛治"的重要标志之一，但在"嘉惠艺林，启牖后学"方面，"四库七阁"并非"至周至渥"。为此，许多维新人士对"江南三阁"不事开放的保守历史均做过这样或那样的批判。显然，只要比较一下学部与戊戌维新人士在"四库七阁"认识上的明显差别，我们就不难理解学部筹建京师图书馆以"昭同文之盛治"的真实意义。

2．"修建馆舍""规模必求宏远"

由于京师"图书馆为学术渊薮，京师尤系天下观听"，所以，学部认为"修建馆舍""规模必求宏远"。但是，迫于"举步维艰，外患日棘，民穷财

① 学部奏筹建京师图书馆折（宣统元年八月初五日）[M]//李希泌，张椒华编．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82：133-134.

② 学部奏筹建京师图书馆折（宣统元年八月初五日）[M]//李希泌，张椒华编．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82：133-134.

尽”，学部在“修建馆舍”的具体建议上基本是因陋就简。

在京师图书馆的选址上，学部认为：“至建设图书馆地址，必须近水远市，方无意外之虞。”可见，学部在京师图书馆的选址上只考虑了防火等意外因素，并没有考虑士林阅览的因素，即重“保国粹”而轻“惠士林”。这与罗振玉的京师图书馆选址观念有着明显的区别。

根据“必须近水远市，方无意外之虞”的图书馆选址原则，学部在派员“于内城地面相度勘寻”的基础上认为：“惟德胜门内之净业湖与湖之南北一带，水木清旷，迥隔嚣尘，以之修建图书馆，最为相宜，尤足以昭稳慎。”并提出了具体的建设方案：其一，“拟于湖之中央，分建四楼，以藏《四库全书》及宋元精椠”。其二，“另在湖之南北岸，就汇通祠地方，并另购民房，添筑书库二所，收储官司刻本、海外图书。毋庸建造楼房，以节经费”。其三，“其士人阅书之室、馆员办事之处，亦审度地势，同时兴修”。鉴于“净业湖、汇通祠两处，向归奉宸苑暨内务府经理”，学部建议：“拟恳天恩，饬下奉宸苑暨内务府，将净业湖、汇通祠各地址移交臣部，以便尅期兴筑。”又因为“该处水面颇宽”，学部“并拟督饬该馆会商奉宸苑随时疏浚，以期上无碍于水源，下不虑其淤塞”。①

从上述有关京师图书馆选址和建筑的观点来看，学部的图书馆建筑思想完全是一种十分传统的中国古代藏书建筑观念。这种传统的藏书建筑观念的典型代表是宁波范氏天一阁。天一阁因“天一生水，地六成之”而得名，其要在于防火避灾和严密保守，以至数百年维持不辍。清乾隆年间因袭其制而修建“四库七阁”，于是天一阁的建筑范式亦成为有清一代藏书建筑的主流。显然，学部的京师图书馆建筑观念亦源于此。学部的这种观念与罗振玉的图书馆建筑观念可谓是大相径庭：罗振玉主张京师图书馆的“建筑式样，宜调查各国成式而仿为之”，② 即应该广泛借鉴各国图书馆建筑之长，设计新的图书馆建筑式样，而学部则主张因循中国旧制。这种区别可以说也是“新学”与“旧学”、“西学”与“中学”交锋在图书馆建筑观念上的一种反映。

3. “搜求图书”“必极精详”

由于京师“图书馆为学术渊薮，京师尤系天下观听”，所以，学部认为

① 学部奏筹建京师图书馆折(宣统元年八月初五日)[M]//李希泌，张椒华编. 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 北京：中华书局，1982：134.

② 罗振玉. 京师创设图书馆私议[M]//李希泌，张椒华编. 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 北京：中华书局，1982：123.

"搜求图书""必极精详"，只有这样才"庶足以供多士之研求，昭同文之盛治"。①

学部奏筹建京师图书馆正值清王朝"举步维艰，外患日棘，民穷财尽"摇摇欲坠的时刻，其时清政府的"江南三阁""悉毁于兵，私家藏书，往往流播海外"，"各省疆臣，间有创建图书馆，购求遗帙，以供众览者"。其中"江宁省城经调任督臣端方首创盛举，不惜巨款，购置杭州丁氏八千卷楼藏书，存储其中。卷帙既为宏富，其中尤多善本。并购得湖州姚氏、扬州徐氏藏书数千卷，运寄京师，以供学部储藏。并允许仍向外省广为劝导搜采"。学部对于官私藏书竞相散佚，或流落市井，或流散海外，辗转不已的现状亦是忧心忡忡，认为："若不设法搜罗保存，数年之后，中国将求一刊本经史子集而不可得，驯至道丧文敝，患气潜滋。此则臣等所惴惴汲汲，日夜忧惧而必思所以挽救之者也。"由此可见，学部奏筹建京师图书馆搜求图书亦是学部"所以挽救"藏书衰败局面之举。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学部对于官私藏书的破落"惴惴汲汲，日夜忧惧"，但是学部并不愿意承认这是清政府腐败无能以至民不聊生的结果，相反将其责任归咎于士子，认为"秘籍善本，多为海外重价钩致，捆载以去"是"士子近时风尚，率趋捷径，罕重国文"的结果。②

虽然学部认为"搜求图书""必极精详"，但是，鉴于"无如近来经籍散佚，征取良难，部款支绌，搜求不易"，学部只提出了三种搜求图书的办法：一是调集热河避暑山庄文津阁《四库全书》及各殿座陈设典籍。学部说："窃查中秘之书，内府陪都而外，惟热河文津阁所藏尚未遗失。近年来曾经热河正总管世纲、副总管英麟查点一次，与避暑山庄各殿座陈设典籍，一并查明开单具奏在案。"为此，学部一方面"拟恳圣恩俯准，将文津阁《四库全书》并避暑山庄各殿座陈设书籍，一并赏交臣部只领，敬谨建馆存储，庶使嗜奇好学之士，得窥石室金匮之藏，实于兴学育才，大有裨助"。另一方面又"祈饬下热河督统，将臣部所请书籍检齐，赍送到馆，以备尊藏"。二是咨取各省官书局刻本。"至各省官局刻本，即由臣部行文咨取，藉供搜讨。"三是鼓励民间献书。学部说："至图书馆开办以后，如有报效书籍及经费者，拟请援照乾隆时进书之鲍廷博、光绪时进书之广东高廉道陆心源奖励成

① 学部奏筹建京师图书馆折(宣统元年八月初五日)[M]//李希泌，张椒华编. 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 北京：中华书局，1982：133.

② 学部奏筹建京师图书馆折(宣统元年八月初五日)[M]//李希泌，张椒华编. 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 北京：中华书局，1982：133.

案，由臣部视其书之等差，及款数之多寡，分别请奖，以示鼓励。如蒙俞允，即由臣部咨行各该衙门暨各省督、抚遵照办理。并督饬该馆监督、提调等，迅速筹办，冀得早日观成。”学部认为依此三种收集图书的办法“将见琳琅美富，蔚为大观”。① 显然，仅有上述三种办法不可能做到“搜求图书”“必极精详”，也无以“昭同文之盛治”。值得注意的是，《学部奏筹建京师图书馆折》强调的是“保存国粹”，对于外国书籍或西学书籍的收集则只字未提，这是学部与罗振玉在京师图书馆藏书建设思想上的另一个重要区别。

综上所述，虽然学部筹设京师图书馆“经划已久”，《学部奏筹建京师图书馆折》“亦几经斟酌”②，但是，学部所阐述的京师图书馆思想基本上只有“修建馆舍”和“搜求图书”两个方面的内容，这些内容基本上没有超出罗振玉的京师图书馆思想范围，由此可见罗振玉《京师创设图书馆私议》的影响。1896年李端棻上《请推广学校折》首倡创设京师图书馆，但是，在其后的十年中，李端棻关于创设京师图书馆的建议一直没有得到清政府和社会人士的重视。1906年罗振玉撰《京师创设图书馆私议》重提创设京师图书馆，很快引起了清政府的注意和重视，学部亦因此而于1909年正式创设了京师图书馆。由此可见，京师图书馆的创建实际上乃是维新变法以来向西方学习、宣传西方图书馆观念的结果。

① 学部奏筹建京师图书馆折(宣统元年八月初五日)[M]//李希泌，张椒华编．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82：133-134.

② 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M]//李希泌，张椒华编．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82：132.

第七编

机械印刷发展时期的书刊和图书馆（1912—1949）

第十七章 民国时期的书刊出版

第一节 民国初期的书刊出版

一、书刊出版概况

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领导中国人民，以坚决和勇敢的革命精神，联合一切反清的力量，领导和发动革命起义。1911 年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政制度。1912 年，中国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制国家——中华民国。然而，历史进程是复杂和曲折的，辛亥革命没有从根本上推翻封建主义和解决反帝国主义的任务，使孙中山先生为之奋斗 40 年的共和制和三民主义，无法在民国时期得以实现。辛亥革命以后的 38 年，中国历经了军阀割据、日本军国主义入侵和内战等灾难，使中国社会处于剧烈的动荡和变化中。而觉醒了的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继承并发扬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事业，终于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在推翻帝制的斗争中，孙中山等革命者深知“鼓吹民气、唤醒社会最为切要”①。1912 年 9 月 2 日，孙中山在北京报界欢迎会的演说中明确提出：“盖我国此次革命，全赖报界鼓吹之功。今共和告成，建设伊始，报界之力量较前日为宏，而报界之责任较前日尤重。上而监督政府，下而开导人民，为全国文明进化之导引线。”②与此同时，20 世纪初开始的新式知识分子的成长和集结，众多新型社会科学学科的出现，以及中国自然科学的转型与重

---

① 孙中山全集(第 6 卷)[M]. 北京：中华书局，1981-1986：578.

② 孙中山全集(第 2 卷)[M]. 北京：中华书局，1981-1986：434.

建，特别是民国建立后，民间文化学术团体纷纷建立，使辛亥革命后中国的出版事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据黄埔军校展览史料所载，黄埔军校先后出版大量刊物，仅1926年1月至8月，共出版刊物达千万份以上，例如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出版《黄埔日刊》等。发行地点已有三四千处，几乎遍及全国各省和东西洋各大阜。

辛亥革命以后，一时报纸、杂志出版风起云涌，据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统计，当时报纸出版"全国达五百家，北京为政治中心，故独占五分之一"，这些报纸中，有一部分为外国人所创办经营，其余多属于各政治党派和各省的地方政治团体。由于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袁世凯所攫取，故当时的绝大多数报纸对袁世凯的统治都持反对态度，以致很多报纸被封禁，北京只剩下二十几家，上海除外国人办的报纸外，只余5家，汉口只余2家；有的还被袁世凯或其党羽所收买，用来鼓吹恢复帝制，其中以《亚细亚报》最为突出，遭到了全国大多数人的反对。反对者中又以上海《民国日报》的报纸影响最大，直至袁世凯失败后，报业才稍有转机。

民国初期，杂志出版也十分活跃。辛亥革命前出版的杂志此时多数已经停刊，但新创刊的杂志却不断产生。

政治性期刊主要有章士钊主编的《独立周报》（1912年），梁启超主编的《庸言》（1912年），国民党创办的《国民》（1913年），章士钊主编的《甲寅》（1914年），梁启超主编的《大中华》（1915年）等，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提出了反对袁世凯称帝的主张。而对后来时局影响最大的则是1915年创办的《青年杂志》（1916年改名为《新青年》），以及1918年创办的《每周评论》，它们是我国最早接受俄国十月革命影响，表现最为进步的刊物。

学术性期刊主要有《科学》、《太平洋》、《北京大学月刊》、《清华学报》、《新教育》、《观象丛报》、《中华医学杂志》、《工程师会报》、《电界》等。

文艺小说刊物主要有《小说月报》、《小说时报》、《小说丛报》、《中华小说界》以及《民权素》、《礼拜六》等，"鸳鸯蝴蝶派"的小说，在这一时期最为流行。

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19世纪70年代江南制造局编印的《西国近世汇编》中介绍巴黎公社情况，音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名词。资产阶级改良派康有为、梁启超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1898年在上海广学会出版的《泰西民法志》（胡贻谷翻译）中，第一次提到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及其学说。广学会是英、美基督

[新]教传教士在上海创立的出版机构，1899 年 2 月到 4 月，广学会主办的《万国公报》月刊连续刊载了一篇在当时很有影响的文章叫“大同学”，它是由李提摩太节译、蔡尔康撰文的。文章在中国的刊物中首次提到“马克思”、“安民新学”（即社会主义）及《共产党宣言》的一段文字。在同年出版的《大同学》一书的第八章，恩格斯的名字也被提及。书中写道：“德国讲求养民学者，有名人焉，一曰马克思，二曰恩格思（即恩格斯）。”这是马克思的名字在我国最早出现。

1902 年 4 月，上海广智书局出版了日本社会主义研究会会长村井知至著、罗大维译的《社会主义》，这部译著对马克思生平及学说进行了比较系统的介绍。马克思著作的最早传人，见于赵必振译著《近世社会主义》（[日]福井早藏著，上海广智书局 1903 年出版），书中有两段《共产党宣言》中译文。同年 10 月，日本著名社会主义运动组织者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由中国达识社译为中文。

1896 年孙中山旅居伦敦时，就开始了探讨社会主义理论，也曾学习和研究过《共产党宣言》，并知道了马克思。他敦促留学生研究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并阅读了当时的社会主义书刊。在孙中山的影响下。1903 年至 1906 年朱执信、宋教仁、叶夏声、廖仲恺等先后著文大力宣传《共产党宣言》思想。

1904 年 5 月 6 日，马一浮离开美国回国，将马克思的《资本论》英译本带回中国，马一浮是在国外自费购买马克思《资本论》将马克思著作传入中国的第一人。

1906 年 1 月，在日本东京中国同盟会出版的《民报》月刊第二号上，登载了蛰伸（朱执信）的《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介绍了马克思和他的学说，并且摘译了《共产党宣言》的 10 大纲领。以后，一些刊物上开始译载单篇的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等均部分地翻译成中文。

伴随着革命运动而兴起的中国新文化运动，发生于五四运动的前夜，《新青年》杂志是它的主要思想阵地，它提出了“民主”和“科学”的口号，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在新文化运动中，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李大钊则是最杰出的代表人物。

李大钊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最早传播者之一。他于 1913—1916 年留学日本，留学期间开始阅读和研究有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欧洲社会主义思潮的著作。

1918年1月，李大钊受聘于北京大学，任图书馆馆长兼经济学教授。同年10月，他在北京中央公园发表题为《庶民的胜利》的演讲。同年11月发表著名论文《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他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热情欢呼十月革命的胜利，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这两篇文章是我国无产阶级及先进知识分子最早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拥护俄国十月革命的标志。

1914—1918年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作为胜利国之一的中国，却在巴黎和会上又一次遭受丧权辱国的屈辱，中国的知识分子对于帝国主义列强和军阀政治深恶痛绝，爆发了1919年的五四运动，这是一次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在这次运动中，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起到了领导作用。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革命从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进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五四运动的发生，使我国人民产生了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和了解苏俄实际情况的迫切要求。1919年5月9日至6月1日，北京《晨报》在“马克思研究”栏里，连载《劳动与资本》(即马克思著《雇佣劳动与资本》的日译本)。在五四爱国运动的高潮中，李大钊主编了《新青年》月刊第六卷第五号“马克思主义研究号”，在这个“专号”中，他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系统地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尔后，《资本论》、《哥达纲领批判》、《国家与革命》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译文和译著亦陆续在刊物上出现。人们对于社会主义的研究成为当时的一股热潮，它明显地反映在出版物上，据统计，1920年新出版的各种报刊，在所能找到的400多种之中，带有不同程度的社会主义倾向的刊物有一半稍多①。

1920年12月，李大钊等9人发起成立“北京大学社会主义研究会”，其宗旨是“集合信仰和有能力研究社会主义的同志互相的来研究，并传播社会主义思想”；其研究方法是：“1. 文字宣传：A、编译社会主义丛书；B、翻译社会主义研究集；C、发表社会主义论文；2. 讲演。”②与此同时，上海、巴黎等地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研究小组、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等也相继建立起来。于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书刊纷纷出版。

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于1919年7月创刊，该刊以传播新的革命思潮为目的，引起读者对当前实际问题、国内外政治问题发生兴趣，宣传彻底

① 中央团校青运史研究室.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青年运动简史[M]. 北京：内部印刷，1982：18.

② 北京大学社会主义研究会报告[R]. 北京大学日刊，[1920-12-06].

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思想，歌颂十月革命的胜利，鼓吹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在当时成为国内最有力量、见解最新的一种刊物。同类性质的刊物有《共产党》月刊、《星期评论》、《每周评论》等。

五四前后是我国刊物出版的兴盛时期，各派政治力量都利用刊物宣传自己的主张，因此，期刊的种类繁杂，从全国范围来看，由于进步力量的蓬勃发展，刊物的主流是奔赴进步方向，受到了当时广大人民的欢迎。

1920 年，新青年社在上海发起组建，开始发行用中文出版的马克思主义书籍。1920 年 8 月，陈望道所译的《共产党宣言》全译本第一次在中国出版，它是我国出版的第一本中文版马克思主义书籍。该书出版后，许多地方翻印，北伐战争时期印得更多，随军散发。

此后相继出版了《社会主义史》(1920 年 10 月初版)，英国克卡朴著，李季译；《马克思资本论入门》(1920 年 9 月译)，马尔西原著，李汉俊译自日文；《阶级斗争》(1921 年 1 月初版)，考茨基著，恽代英译。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翻译出版，使中国的革命者获得了最有力的思想武器。

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新文化运动，开展革命活动中，各地书社的创立发挥了一定作用。1919 年秋，恽代英等在武昌创办利群书社。1920 年 7 月，毛泽东等在湖南创办文化书社。文化书社是一个公开发行马克思主义书刊的机构，服务对象包括湖南广大知识青年、工人和各界进步人士。书社明确宣称：建社的目的是使湖南人民"思想得了进步，因而产生出一种新文化"，"务使新书报普播湖南省"，提出"世界新思潮之必须研究，而研究必须有良好材料，则新出版物之介绍机关，必不可少"(《关于长沙文化书社的资料》)①。《新俄国之研究》、《科学方法论》等各地出版的新书刊因此而得以最迅速、最简便地推销。该社成立不到一年，《社会主义史》、《马克思资本论入门》等著作销售量在 100 本甚至 200 本以上。《劳动界》杂志每期发行 5 000份，《新青年》发行 2 000 份，《新生活》发行 2 400 份。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党和团的机关刊物《向导》周报、《中国青年》、《先驱》以及新青年社出版的《马列主义丛书》等书刊，发行量很大。文化书社编印的《工友们》、《农友们》、《一个士兵的生活》等书，也深受工人、农民欢迎。买书的人，以学界为多，但如《劳动界》等小册子，劳动者所购的也不少。

此外，方志敏创办的南昌文化书社，还有重庆的唯一书社，开封的文化书社，云南的新亚书社，太原的普华书社等，在当时都进行了较广泛的革命

---

① 张静庐辑．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丁编下卷)[M]．北京：中华书局，1954-1958：407，410.

活动，宣传和推销国内外进步书刊，并吸引青年前往阅读，给青年输送新的精神食粮，在宣传新文化方面起了巨大作用。

当时国民党在上海办的《民国日报》、《建设杂志》、《星期评论》，以及进步党在北京办的《晨报》、在上海办的《时事新报》、《解放与改造》等报刊也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的一支，经常大力介绍和讨论。于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成了当时的时代潮流。

三、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出版事业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同年9月，根据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人民出版社成立，由党的宣传主任李达亲自负责，分别在上海、广州编印书刊。人民出版社主要出版马克思、列宁的理论著作和其他理论性书籍。一年多时间内，出版了《马克思全书》3种：《工钱、劳动与资本》（袁让译）、《共产党宣言》（陈佛突，即陈望道译）、《资本论》（即《初版序言》，李漱石译）；《列宁全书》4种：《讨论进行计划书》（成则人译）、《劳农会的建设》（李立译）、《劳农政府与之成功与困难》（墨耕，即李梅羹译）、《列宁传》（张亮译）；《康明尼斯特丛书》（即共产主义丛书）4种：《俄国共产党党纲》、《共产党底计划》、《国际劳动运动中之重要时事问题》、《第三国际议案及宣言》。此外还出版了通俗宣传册子数件。

上海书店成立于1923年11月1日，负责出版发行党内所有对外宣传的书刊，在3年左右时间内，共出版30多种书籍，包括瞿秋白著《社会科学讲义》、恽代英著《反帝国主义运动》、施存统译《资本制度浅说》以及一峰、辟世合编的《马克思主义浅说》等。《马克思主义浅说》深入浅出地介绍了什么是资本等问题，受到广大读者欢迎，该书1925年3月印第1版，同年12月已印第8版。当时，上海正处于五卅运动的高潮，上海书店的出版物在配合反帝反封建和宣传马列主义、共产主义方面，起了很大作用，产生很大影响。军阀孙传芳对上海书店十分仇视，遂于1926年2月将其封闭。

为了更广泛进行革命书刊的出版发行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党中央决定再建立一个公开的出版机构。1926年11月，长江书店在武汉成立，由瞿秋白负责，苏新甫等主持具体工作。虽然长江书店因汪精卫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只存在了半年。但它正处于中国革命风云变幻、迅猛激烈之际，新出和重印书刊50余种，其中包括毛泽东著《湖南农民革命》，即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全文。该书对我国革命中十分重要的主题——农民问题进行了精辟论述，瞿秋白为之写了序言，热情地赞扬了这篇报告。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至1927年大革命时期，为了向广大群众进行革命宣

传教育，先后成立了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新青年社等四个出版发行机构。在出版工作中密切结合形势，结合党在各个时期的中心任务，结合群众关心的问题，以多种多样的方式宣传马列主义，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出版物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在革命斗争中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了革命统一战线，全国工农运动迅速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及时通过书刊从理论上解决当时革命斗争中急需解决的一系列根本问题。毛泽东主持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时曾编印《农民运动丛刊》等书刊，其中包括萧楚女著《社会主义教授大纲》、毛泽东著《中国佃农生活举例》以及《列宁与农民》、《俄国农民与革命》、《苏俄之农业政策》等。省港罢工委员会编印出版邓中夏著《省港罢工概观》、恽代英著《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萧楚女著《社会科学概论》等。

四、五四运动前后我国书刊业的发展

五四运动的风暴以及新文化运动的高涨，使我国图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变化。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图书内容大力冲破了传统封建思想意识和文化的束缚。反映不同主张的书刊大量出版，范围广泛，包括政治、社会、哲学、科学、文艺等不同领域。进步书刊和革命书刊的出版是这个时期图书发展的重要特征。当时，除了共产党出版书刊宣传共产主义，介绍苏俄情况以外，孙中山、朱执信、廖仲恺等革命家也十分重视利用书刊宣传革命主张。他们克服重重障碍，出版了《孙文学说》和《建设》杂志、《国民》等书刊。在《建设》杂志第二卷第五号，态度鲜明地提出：“非有关‘新文化运动’者，主张军阀主义者，辩护资本主义者，概不交换。”

在新文化运动中，广大觉悟了的知识分子表现出了巨大的热情。他们组织各种学术团体，探索国家前途，在反抗、打倒旧文化的同时，讨论建设新文化。

文学研究会是中国新文学运动史上最早最大的文学团体，由茅盾、郑振铎、郭绍虞等发起，以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为宗旨。文学研究会的主要工作是改革了《小说月报》，使它成为新文学运动中最重要的刊物；出版会刊《文学旬刊》，该刊刊行400余期才停刊。文学研究会还翻译了近代俄国、法国及北欧的名著，介绍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高尔基、易卜生等作家的作品。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文学研究会丛书》，共有80余种，包括瞿秋白著《新俄国游记》；叶绍钧著《稻草人》、《火灾》；冰心著《超人》、《繁星》；汪馥泉、张闻天译王尔德著《狱中记》；鲁迅译阿志

巴绥夫著《工人绥惠略夫》；郑振铎选译泰戈尔著《飞鸟集》、《新月集》等；谢六逸编《西洋小说发达史》等。

创造社由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张资平等4人发起，是出版文艺刊物而组织的文艺作家自由结合的团体。创造社曾编印多种书刊，如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创造季刊》5期、《创造周报》一年，同时在上海《中华新报》出版副刊《创造日》100期。由泰东图书局出版的《创造社丛书》，包括郭沫若著《女神》、《星空》，郁达夫著《沉沦》，张资平著《冲积期化石》等。创造社于五卅运动后，由于冯乃超、朱镜我等的参加，从前期的浪漫派主张转而提出"文学革命"的口号，他们的文学主张和创作实践，曾给当时的文学界和知识青年以深刻的影响。

1918年4月，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他第一篇用白话文写的短篇小说《狂人日记》，激烈地抨击了中国封建家族制度和旧礼教，成为五四文化革命的一声号角。这一时期他还撰写小说多篇，其中包括中国现代文学史和世界文学史上最杰出的作品之一《阿Q正传》。五四运动后的鲁迅，一直不倦地、勇猛地同一切反动势力进行斗争。

新文学运动引起了它的大敌——封建复古主义的抗拒。首先以卫道者自任，反对新文学运动的林纾(琴南)，发表文章、书信、小说，对新文学运动进行谩骂，他们也出版书刊宣传复古主义，如《学衡》杂志、《甲寅》周刊，以及北京大学守旧派学生编的主张"保存国粹"的《国故》月刊等。但是，由于李大钊、鲁迅、茅盾等与复古主义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复古主义终于失败。

第二，科学书刊大量出版。五四运动前后，文化教育得到进一步发展，高等院校1922年为19所，1927年增至52所。大学中成立编译处(室)、各学科研究处(室)，以及各类学术团体，文理各学科学术研究空气渐渐浓厚。继《科学》、《清华学报》等刊物之后，五四前后相继出版了《北京大学月刊》、《数理杂志》、《理化杂志》、《电气工业》等学术性刊物，发表了《X射线与原子内部构造之关系》、《安斯顿(爱因斯坦)相对论》、《几何学之基础》、《以图像研究三次方程式之根之性质》等早期我国科学家的学术论文，推动了我国学术研究的发展。

科学技术书籍的出版也得到了很大发展。当时民智书局、中西书局等均经营农艺科技图书的出版发行工作。1923年中西书局经营工艺和应用书籍达四五百种之多。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出版发行的教科书也增加自然科学和应用科学的内容，1919—192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矿物学》、《自然科学》、《地质学》、《农业化学》、《解析几何》等。据统计，商务印书馆

1921—1930年共出版自然科学和应用技术类图书585种。

社会科学书刊也有所发展。1919—1925年，哲学、教育、法政、社会学、经济、新闻等学科均出版书刊。商务印书馆1921—1930年出版哲学、社会科学类图书共1426种，其中《大学丛书》有关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律学等学科著作达98种之多。

第三，其他类型图书的发展。印刷技术的发展，白话文运动的推动，先进知识分子开始注意深入发动工农群众，这些因素促进了各类型图书的发展。通俗易懂的报刊图书开始出版发行，例如何叔衡、谢觉哉主编的《湖南通俗报》，一律用白话文和标点符号，字旁加注音字母，报导内容包括工农生活，普及科学知识，使一般文化水平很低的人都能看懂。又如湖南农民协会印行、曹典琦编的《成人读本》；上海书店出版的恽代英编的《平民千字课》(全四册)；卓恺泽编、恽代英改正的《青年平民读本》(全四册)等，提供各地兴办的平民夜校青年工人学习之用。这些书刊对宣传革命道理，提高工农大众文化水平起到了推动的作用。

1918年《北京大学日刊》出版歌谣专刊，发表该校征集的民歌民谣。1926年汉口长江书店出版了李求实编的《革命歌集》(封面题图"革命歌声")，其中收入了《国际歌》、《农工歌》等15首革命歌曲，是我们目前所能看到的革命歌曲汇编最早的一本。

连环图画(小人书)的产生和大量出版，成为广大识字不多的儿童和一般民众的精神食粮。最初的连环图画是1908年文益书局出版的《三国志》。1916年上海出版的《猿政府画史》，因讽刺袁世凯做皇帝，受到反动政府查禁。1921年世界书局出版大量连环图画。连环图画的内容最初根据京剧及通俗小说改编，1920年以后，出现了民间故事、武侠神怪等各种题材的连环画。上海、广州等地街头巷尾出现了无数租赁连环画的小书摊，销路很好。当时，一些画家以自己的进步作品开展宣传教育工作，但是也有不少连环画内容反动荒诞，粗制滥造，对读者产生不良影响。

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成就之一，是广泛提倡白话文并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清末曾出版有《白话报》、《白话丛书》。第一次应用新式标点符号，是严复1904年著的《英文汉诂》一书。五四运动前后，不少知识分子大力提倡白话文，报刊也刊登白话文文学作品。鲁迅的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是中国新文学的第一座丰碑。《新青年》1918年第4卷1号完全改用白话文，用新式标点符号。以后《新潮》、《每周评论》、《北京法政学报》等刊物，以及北京大学出版的《大学丛书》、《模范文选》、《学术文录》等书籍也多用新式标点。1920年后，亚东图书馆的标点本古典小说《水浒》、《三国演义》、

《红楼梦》、《西游记》、《儒林外史》等陆续出版，这些小说发行量较大，有的再版多次。鲁迅认为这批“亚东版”中国古典小说“大体是有功于作者和读者的”(鲁迅《望勿“纠正”》)。给予了肯定的评价。

在书刊版面编排方面，1915 年创刊的《科学》杂志已采用横排。《科学》杂志当时被认为是最有价值的传播科学知识的刊物。

第二节　书刊出版法令法规的制定与执行

一、民国初期的法令法规

民国初期和北洋政府时期，有关书刊出版的法令法规陆续公布。由于有关法令法规违背民意，影响书刊出版事业发展，引起了出版界的严重不满，联名上诉或拒不执行，致使有些法令被迫废止，有些法令形同虚设。

1914 年 4 月 2 日，北洋政府公布《报纸条例》34 条。该条例规定 9 项内容报纸不得登载。《报纸条例》一公布，立即受到报界强烈反对。《北京日报》等报馆于 5 月 7 日致函国务总理，质问：“试查世界各国，无论如何束缚言论之国，有一如此不合情理之报律者乎?”报界要求政府详加解释，明定范围。6 月 20 日陆军部为解释报纸条例，拟定军事秘密范围，由大总统批令要求报界遵守军事秘密范围条款。立即遭到报界同志会的反对，8 月报界同志会致函政府，认为“陆军部束缚言论，辱蔑报界，碍难遵守”。并指出“近日大自由报、醒华报竟相继被宪兵勒令停版，拘捕编辑发行人，以致报馆等人人自危”。可是北洋政府一意孤行，仍于 1915 年 7 月 10 日，公布修正《报纸条例》，坚持规定报纸不得登载的内容。由于报界继续斗争，该条例无法执行，被迫于 1916 年 7 月 21 日宣布废止。

1914 年 12 月 4 日，北洋政府公布第一部《出版法》。《出版法》共 23 条款，内容包括出版的定义、出版的关系人、出版的管理办法等。该法令规定 8 项不得出版的文书图画，包括：淆乱政体者；妨害治安者；败坏风俗者；以及未经公判的预审案件；揭载军事、外交及其他官署机密者，但得经官署许可时不在此限；攻讦他人阴私、损害其名誉等。1917 年 10 月 3 日，内务部通行各省长都统，强调著作、出版二法，一基于权利之证明，一基于警察之作用，鉴于出版物呈报寥寥无几，要求由警察机关布告人民，所有在《出版法》公布以后，未经备案者应即一律各赴该管警察机关依法补行呈报。报界同志会各报馆不满陆军部有关军事秘密范围的规定，向北洋政府质疑，后者就此分别作了答复。

著作权是出版界十分关心的问题。1912 年 9 月 21 日，内务部通告，著作物暂照前清著作权核办。1915 年 11 月 7 日公布《著作权法》。该法共 5 章 45 条款，内容包括：总纲；著作人之权利；著作权之侵害；罚则；附则。

民国成立之初，法国等西方国家要求我国加入“国际版权公约”，要求外国书商享有我国著作权。提出我国翻印美国课本销售侵夺版权，违犯法律。内务部于 1914 年 1 月 21 日致函财政部，我国不加入“国际版权公约”。1914 年 7 月 27 日上海书业商会会董俞复等人上书内务部，指出英美两国书商在上海设万国出版协会，拟将所有出售的书均向我国注册，享有著作权。要求政府对此竭力驳拒。认为必须视乎本国文化及其著作物流布于国外与各国相等与否，如果允许外国人享有我国著作权，则损权病民贻害甚巨。1920 年 11 月该商会又致函内务部，认为我国需要欧美书籍灌输研究，而西方原版图书价格昂贵，购之不易，因此书业翻印西文书廉价发售，以便于灌输文化。不加入版权公约，翻印外文书给中国人民利用，则不在条约不准翻印之列。鉴于此，外交部于 1920 年 11—12 月发文拒绝法国驻华公使商请我国加入“国际版权公约”。

20 世纪 20 年代，我国曾加入国际禁止淫刊公约（1925 年 10 月），以杜绝海淫出版物贸易；为沟通文化于 1925 年 12 月公布加入国际交换出版品公约。

二、1927 年后的法令法规

1927 年大革命失败，国民党政府在发动政治和军事围剿的同时，在文化战线上进行了文化“围剿”。国民党政府宣布了一系列查禁进步出版物的法令法规，使许多革命作家和进步作家、文化工作者遭受迫害，进步出版物遭到查禁。

1927 年 7 月 27 日南京戒严司令部检查邮政委员会抄报《检查邮政暂行条例》，提出 6 种邮件需抽出汇送委员会主任复查，其中指明有关于共产党宣传的邮件。1935 年邮电检查改归军统局统一办理。

1927 年 6—8 月国民党政府秘书处、南京戒严司令部等就查禁《讨蒋特刊》往来行文，惊呼学校发现共产党的印刷品甚多，要求从速取缔，并派员前赴邮局严密检查。1928 年 11 月至 1929 年 3 月，国民党中央秘书处等通令查禁共产党的刊物和进步刊物，查封《白日新闻》等报刊。

1928 年 5 月 14 日国民党当局颁布《著作权法》，规定著作物“显违党义

者"或"其他经法律规定禁止发行者"，内政部拒绝注册①。1929 年 1 月 10 日，国民党颁布《宣传品审查条例》，明确规定凡含有"宣传共产主义及阶级斗争"的宣传品为"反动宣传品"。经审查后"反动者查禁封查或究办之"。"各发行所，各书局，各杂志社所出宣传品，经审查后令饬修正或停止出版发行而抗不遵办者，加重其处分。"②对于进步书刊的查禁，对出版机关的查封，及对负责者的究办，由国民党中央交政府令主管机关执行。

1930 年 3 月 17 日颁布的《出版法》，对于报刊、书籍、其他出版物的限制，多达 44 条，甚至包括传单和标语的印行，也严加控制。《出版法》颁布后，很多进步刊物，例如，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拓荒者》、《萌芽》月刊等，很快就不能继续出版。1935 年 10 月，又颁布了《出版法施行细则》，共 25 条，对《出版法》中的原则和办法，加以具体的规定，1937 年又颁布《修正出版法》，条款增至 54 条，而且将查禁书刊的权力下放到市、县政府。

1932 年 11 月，国民党中宣部公布《宣传品审查标准》，凡宣传共产主义，被认为是"反动"；凡批评国民党不抵抗政策，要求抗日，被认为是"危害中华民国"；凡对国民党当局稍微有些不满，被认为是替共产党张目，一律严加禁止。1938 年 7 月，国民党中宣部压制抗战言论，公布《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1940 年，国民党政府公布《战时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1934 年 6 月，公布《图书杂志审查方法》，规定一切图书杂志应于付印前将稿本送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审查，否则"予以处分"。该委员会可以随意删改稿件，印出后如果发现没有照改，又要"予以处分"。这样一来，全国出版物被压制和阉割得不成样子，有的面目全非。

据《出版法规汇编》(上海学林出版社出版)统计，1927—1949 年颁布出版法和施行细则的解释共 26 项；图书呈缴、审查法规共 56 项；新闻检查和取缔的法规 24 项。1929 年 6 月连续颁布了查禁革命书刊法令 3 项：《查禁反动刊物令》、《取缔销售共产书籍办法》和《取缔销售共产书籍办法令》。1933 年国民党政府教育部转发行政院《关于注意学生思想与查禁普罗文学刊物的密令》，"密令"中宣称，"此辈普罗作家，能本无产阶级之情绪，运用新写实派之技术……攻击本党主义"，"煽动力甚强，危险性甚大"，"其为祸之烈，不可言喻"。"密令"中附普罗文学作家名单，命令对普罗书刊"严

①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文化(一)[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70.

②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文化(一)[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75-76.

密查扣，禁止流传”，“毋使漏网”。1934 年 12 月 ~ 1937 年 5 月，多次训令禁止国外出版发行的进步书刊进口。

国民党当局采取种种合法和非法手段，查禁了大量书刊。1927 年广州邮局曾扣《语丝》、《莽原》等刊物。据国民党中央宣传部 1929 年的《查禁书刊情况报告》，该年度查封共产党刊物达 148 种，被检举的报纸达 187 种，占当年出版报纸的 23.4%。1929—1936 年国民党中宣部每年都以宣传马克思主义、鼓吹无产阶级革命等理由取缔大批社会科学书刊，查禁文艺书籍 548 种，其中包括 1934 年查禁的普罗文艺书籍 149 种。据国民党长沙市党务整理委员会“工作报告书”所载，1931 年该市查禁书刊 228 种。1934 年北平国民党政府焚毁进步书刊 1 000 多种。据 1936 年国民党中宣部印发的秘密文件中统计，1936 年国民党当局通令查禁文艺部分以外的社会科学书刊 676 种，1936 年 11 月—1937 年 6 月查禁报刊 130 种。据“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1941 年印发的《取缔书刊一览》，1938 年 10 月—1941 年 6 月，查禁 961 种书刊，被查禁的大部分是革命和进步书刊。1943 年被查封的抗日报刊达 500 余种。

第三节　抗战前后的书刊出版

一、书刊出版概况

我国图书出版发行工作一般由书店兼营。规模较大的书店大都设总店和分店，总店兼有编辑、印刷和发行业务。

1925 年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将力量凝聚在军事上，农工商学等皆成为军事和政治的附庸。1925 年 7 月在广州成立的国民政府规定要受国民党“指导监督”，实行一党训政，剥夺人民的各种自由。当时蔡元培、胡适等学者曾寄希望于国民党政府尊重人民的言论、出版等自由，对当时国民党政府机关和党部机关严重侵害人民的身体、自由及财产著文指责，并提出由人民监督并限制国民党党权。对于这些指责，国民党亦不能容忍，采取查封刊物、著文批判、提出警告等手段，1929 年 10 月 1 日行政院训令教育部，“将中国公学校长胡适撤职惩处”①。

1931 年以后，随着日本加紧侵略中国，救亡的呼声日高，执政的国民

①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文化(一)[M].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404-405.

党于是推行“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法西斯主义。蒋介石曾在1931年5月5日开幕的国民会议上，对法西斯主义加以推崇，提出施行法西斯主义有效能的统治，完成中国统一。在蒋介石的示意下，在1932—1936年，鼓吹法西斯主义的书局有拔提书店、文化书店、前途书局、正中书局、新生命书店等。宣传法西斯主义的报刊有《中国日报》、《晨报》、《中国革命》、《社会主义月刊》、《文化建设》等。它们的宣传重点是法西斯独裁，要求文化教育思想方面也以三民主义为依据，加以规划和控制。进步图书出版事业首当其冲遭受迫害。

1931年2月国民党当局枪杀优秀作家柔石等。1932年秋，上海反帝同盟被破坏，全部到会者被当场枪杀。1933年夏，参加反法西斯大会的150人被押送南京杀害，同年还逮捕潘梓年、丁玲等人并迫害鲁迅。不但如此，主张抗日的国民党员杨杏佛、《申报》主持人史量才也惨遭国民党当局杀害。

1929年国民党当局查封创造社。1931年以出版“左联”机关刊物为理由查封了上海现代书店，同年还查封了北新、群众、乐群等书店。1933年冬，良友图书公司、神州国光社、光华书局等先后遭捣毁。

1937年8月国民党当局为了控制言论，公布《书籍杂志查禁暂行办法》。1938年7月又公布《战时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进一步摧残出版事业。1938年10月生活书店西安分店经理张锡荣被捕，1939年4月21日到1940年4月5日，被查封或被迫停业的书店有生活书店的16处分店，新知书店的9处分店。皖南事变后，生活书店仅剩重庆一处分店，有的分店家具、存货被没收，被捕职工，有的惨遭杀害，有的病死集中营。

抗日战争期间，图书出版事业损失极大。文化工作者流离失所，国民党当局的检查制度成了一只扼杀文化的黑手，加之印刷困难，物价飞涨，使图书出版事业遭受严重打击。

日本对华的文化侵略从九·一八事变后变本加厉。首先是对关内报纸严厉封锁。私自拥有和阅读关内报纸，轻者毒打拘捕，重则逮捕处刑。沈阳规定推销内地报纸者处8年以上徒刑。中国人创办的报纸被日军扫荡殆尽。伪满洲国为彻底控制舆论，推行严格的新闻检查制度，东北原有30余家报纸，经严查后仅剩10几家。其余全部停刊。1935年日本关东局发布《满洲输入出版物取缔规则》，中国关内出版的《大公报》、《申报》等36种报纸均在被禁之列。

1932年11月伪满傀儡政权公布《出版法》，同年12月成立“满洲国通讯社”，日本经其伪满政权规定有关政治、国际的消息一律来源于日本的“同盟社”和“共同社”，不许有其他途径。1936年伪满政权又成立“满洲弘报协

会”，满铁弘报系编制散发了大量宣言传资料，颠倒是非，欺骗舆论，为日军侵略东北摇旗呐喊。从此东北沦陷区的报刊舆论完全彻底日本化。

七七事变后日本通讯社大举入侵我国。据1940年日本东亚研究所编是《日本在支文化事业》一书所载，当时日本在华通讯社在全国各地设立支局，雇员数百人，仅“同盟通讯社”一家雇员235人，在全中国设立21家支局。

新闻通讯社的设立与报刊的出版发行往往连为一体。七七事变后，日本人在中国办的报刊明显增多，据王向远著《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一书所列，日本在华(不含东北地区)操办的报纸近百种，有的发行量多达四、五万份，内容广泛，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艺等。仅大连日军侵占期间，截至1945年曾先后出版发行报纸42种，期刊253种。为了对华文化侵略的需要，除了出版报刊外，还出版歌颂日本侵略，宣传奴化思想，提供侵华服务的图书资料。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日本政府级有关的团体、机构纷纷对中国进行全范围情报收集工作。各种“调查部”、“调查会”、“研究会”、“研究所”利用各自的优势收集各种情报，编辑出版图书资料。东亚研究所成立至日本战败前夕，除了编辑出版上百种有关中国的图书外，还编辑大型资料集——《东亚研究所资料》，总数多达400余种，内容与规模大致包括中国的政治社会、军事、矿产资源、交通运输、民政、宗教、商业物产、乃至气象等，研究非常细致。该所资料课1941年编辑的《东亚研究所日文图书目录》分上下卷，可见规模之大。

1906年日本在东北设立“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下同)，总部设在大连，这是日本最大的对华经济侵略的机构，同时也是一个对华文化侵略的重要机构。其中属下专门对华进行情报收集、研究与宣传的“满铁调查部”等情报机构全盛时员工多达两千多人。40多年出版图书资料、连续出版物数千种，包括“研究志”、“统计年报”等资料，提出调查报告6 000多份，平均一天半提交一份。“满铁”曾重点收集研究华北地区情报，1936年至1938年连续出版《北支经济资料》30多辑，出版《北支经济提要》5期。

在沦陷区，日本帝国主义向出版机构施行统制出版事业的暴政。上海一天之内查封了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大东书局、开明书局、兄弟杂志公司(即生活书店)等17处书店和印刷所。仅商务印书馆一次被没收的图书就多达462万余册，事后只收回21.3万册，损失图书达95.4%。检查时，只要发现“日本”、“苏联”、“国难”等字样，不管上下文义如何，一律没收，查禁的图书被送往造纸厂废料仓库，准备销毁造再生纸。除查封书店、没收图书外，日本军部还征用上海各家书店印刷厂的部分存纸和铅字，

其中商务印书馆被征用活字铅料多达50余吨。对于书店出版图书，日本宪兵队更严加检查，造成书店不再出售重要新书，只能以存书维持门面，使沦陷区出版事业受到了严重摧残。

抗日战争中书店损失很大，有的失去印刷所，有的解散了编辑所。“一·二八事变”，上海商务印书馆工厂设备以及编译所全部毁于战火，损失达1 000万元，新中国书局除纸版原稿外，全部被毁，学海书局存货被劫，出版合作社、民治书店全部被掠被焚。

当全面抗战开始，国共合作形成后，中国的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的出版业也发生剧烈变化。国民党政府中的一些部门以及地方政权开始采取开放民众运动，促进抗战的措施，对书刊的出版总的来说也较为宽松。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同意中共中央出版两份刊物，抗日根据地也逐步编印一些报刊。

对于抗日御侮等民众读物的发行寄发，当时的教育部也指示各邮局予以优先考虑。在全面抗战的推动下，一批批抗日救亡的书刊、小册子在全国破冻而出，从七七事变到1937年12月不到半年，仅上海、南京等10多个省会和大城市抗战救亡刊物创刊达100多种。

随着战事的推移，我国的出版机构和出版物的发展由沿海和大城市转向内地。据统计，桂林在战时拥有出版发行机构220家，印刷厂上百家，月出书40种左右，期刊多达近300种，报纸41种。重庆在抗战时期为陪都所在地，也成了战时我国的出版中心。1942年重庆出版各类图书1292种，占全国总数33.3%，期刊151种，占全国总数28.6%：1943年4月至8月半年中，重庆出版图书1974种，期刊534种，约占全国出版物的1/3。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当局一面准备进攻解放区，一面对人民实行镇压，扼杀出版、言论自由，他们继续施行《出版法》、《管理收复区报纸、通讯社、电影、广播事业暂行办法》、《非常时期报纸、杂志、通讯社登记管制暂行办法》、《邮电检查制度》等一系列法令，使非官办的出版物完全失去合法存在的地位。国民党中宣部直接控制的新闻、图书杂志审查处，对报刊图书任意实行扣压、删改。为了阻止进步书刊出版，国民党当局制造纸荒，高价大量收购白报纸，囤积纸张，迫使民营出版业因印刷成本提高而关门停业。邮政检查中经常检查没收进步书刊，有的被当做废纸卖掉，有的被整批烧毁，有的被转卖给特务自己开办的书店，用做诱捕进步人民的钓饵。

此外，国民党当局还利用特务扣书、抢书，用暴力捣毁报社书店，以至秘密捕人。1946年，西安《秦风工商日报》首先被查封。5月，北平77家报刊、通讯社被查封，广州的书店、报馆被捣毁。6月5日，广州的宪兵警察

联合出动，搜查10多家书店，20多个报摊，有些书店被查抄一空，30余种，10余万册书刊被押送广东省保安司令部政治部。6月29日，更以查禁书刊名义封闭了被列上黑名单的所有报社、书店和印刷厂。8月，昆明的49种刊物，上海109种期刊均被查禁，一些书店被查抄。据统计，仅1946年1—8月，北平、上海、广州、西安、昆明、重庆等地被封闭的报刊、印刷所、民营广播电台达263家。

1947年1月，《新华日报》营业部第二次遭暴徒捣毁，2月底《新华日报》被强制撤返延安。同年6月，三联书店经理仲秋元在重庆被捕，关押在渣滓洞，直到1949年3月底经民盟营救才获释出狱。1948年2月，国民党上海市执行委员会发出“借‘共匪’宣传机构名义”查封生活、读书、新知书店的密令。

国民党当局对新闻出版事业的统治，使我国出版事业又一次遭受严重摧残。据统计，1935年仅上海就有书店259家，但在1949年解放初期，全国图书出版机构只有312家。

国民党当局一方面迫害进步图书出版事业，另一方面通过自办书店，自办刊物发行书刊，企图垄断宣传工具为他们的政权服务。他们依仗资本雄厚，办了很多出版社和书店，例如正中书局、中国文化服务社、拔提书店等。同时把可供印刷用的一切纸张控制在手，划出一部分以极低廉的售价，专供自己出版用，即所谓官价纸。他们用这种手段出版大量品种多、价格低廉的图书。进步书店只能买价格高出几倍乃至几十倍的纸张。

国民党当局对文化事业实行高压政策，加上财力所限，使我国无论书刊出版的品种还是销售量，一直都比较落后，大部分出版经营中小学教科书，或翻印稿费不多的旧书。社会各方面需要的农、医、建筑、造船、航空、艺术等书籍出版很少，每种书销售量好的不过几千册，销售量低的不到100册。1936年出版图书9 438种，其中包括《万有文库》在内、以大部丛书为主的种类图书占42%；包括教科书儿童读物在内的社会科学类图书占28%；自然科学和应用技术类图书各占不到5%。

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图书出版事业高度集中在上海，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和世界书局出版量占全国一半以上，其中商务印书馆创办最早。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夏瑞方等人在上海创办商务印书馆。初期收购日本印刷所，吸收外资，1913年收回国外股份，成为华人自办企业。商务印书馆很重视改进和提高印刷技术，编辑出版了许多学术书刊和教科书，1915年出版的《辞源》是我国新式辞书的开始。

商务印书馆在推动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方面做了不少工作。1925年5

月该馆曾致函全国各图书馆，征集文件(如章程、规则、目录、组织概况)，以便汇齐陈列，供众研究。1926年3月再次征集，于5月24日举行图书馆文件展览会。商务印书馆为了提供图书馆基本的图书收藏，1929年4月出版《万有文库》第一集2 012册，1934年9月出版第二集2 028册。《万有文库》的内容包括中外各科重要书籍与治学门径的图书。版式一样，书脊按顺序编号，并附有卡片，以方便图书馆利用。当时教育部曾经以8322号文令各省县市机关图书馆购买一部，出版后全国以这套书而成立的图书馆多至千余所。

据统计，作为中国首屈一指的出版企业的商务印书馆，1931—1940年出版图书5 377种，7 221册，其中社会科学类占30%，自然科学类占10%，应用技术类占12%。1941—1950年上半年出版图书1 800种，2 119册，其中社会科学类占35%，自然科学类占9%，应用技术占12%。书刊的出版量也大大减少；新中国成立前夕以实力雄厚著称的商务印书馆也变得朝不保夕，只能靠陈叔通、张元济等人勉力维持。

继五四运动之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得到进一步发展。进步力量研究社会、改造社会的运动推动了社会科学深入研究。应当指出，当时出版界为了冲破国民党政府的重重阻力，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因此，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仍出版了一批进步书刊。各书店不顾国民党的镇压，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其中有马克思著《哲学的贫困》、恩格斯著《自然辩证法》、艾思奇著《哲学讲话》等。国民党中宣部1929—1931年查禁的书刊中，这类著作共262种，占被查禁书刊数(366种)的71%。据《新思潮》杂志1930年统计，1929年社会科学类单行本译著共151种，当时研究新社会科学的兴趣达到高潮，对于苏联社会研究的著作，经济学、历史等学科的著作，以及译自俄文的唯物辩证法的译本出版不少。一些书店按计划出版各种社会科学丛书，如现代书店《社会科学丛书》、南强书店《新社会科学丛书》、南华书店《苏俄研究小丛书》等。这些书籍的出版，促进了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发展。

随着革命运动的发展，社会科学从学院式脱离实际的研究，转为服务于革命斗争和民族解放事业。抗日战争中，上海出版了大量适应抗战需要的书刊，各地也出版了《新华日报》、《救亡日报》、《抗战生活》等大量宣传抗日的报刊。书刊成了当时促进全面民族革命战争的有力武器。

在翻译和介绍外国文学著作中，苏联文艺作品始终占重要地位。1930年5月统计，共翻译苏联小说107种，还出版5种苏联短篇小说集。反法西斯战争爆发后，不少苏联小说巨著纷纷翻译出版，其中包括获得1941年斯大林文艺奖金一等奖的A. 托尔斯泰名著《彼得大帝》和《保卫察里津》，奥

斯特洛夫斯基的《从暴风雨中所诞生的》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苏联反法西斯战争的著作也及时翻译出版，其中有《复仇的火焰》、《虹》、《人民是不朽的》等。高尔基的作品远在1907年已开始介绍到中国，《东方杂志》小说栏中，译载了他的《忧患余生》，1928年出版了《高尔基小说集》，1930年以后出版量更大，据统计，截至1949年，高尔基的作品及其研究著作单行本达125种，并曾出版刊物《高尔基研究》。高尔基作品反映了作家对黑暗的抨击，对光明的赞颂，为人民呼喊，故而能在中国流行。

从事自然科学和应用技术的研究，需要大量实验设备和条件，然而1927年以来国民党政府忙于内战，科学研究经费极为缺乏，大大影响了科学研究工作的开展。其结果是反映科学技术研究进展和成果的出版物很少，出版量远远少于社会科学和文学类书刊，在科学家集中的高等院校，理科的论著也很少，只有少数大学出版学术刊物。较著名的有清华大学1929年后陆续出版的《工程季刊》、《理科报告》、《气象季刊》、《土木工程学会会刊》、《机工月刊》等。北京大学《自然科学》季刊于1930年复刊。这种状况一直到1949年以后才得到改善。

二、进步书刊出版概况

面对国民党当局的文化"围剿"，进步文化出版工作者没有被吓倒，更没有屈服，而是在进行艰苦的斗争。他们组织了进步文化团体，其中作为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的主力军，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左联)在1930年3月成立，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社会科学研究会、新闻记者联盟等团体亦相继成立。

为反对国民党摧残进步文化的图书杂志审查制度，为争取出版自由，文化出版界人士进行了长期斗争。邹韬奋、叶圣陶等文化界人士以及上海杂志公司、生活书店等出版社纷纷发出呼吁。昆明文化界也发出争取出版自由宣言，一致要求"审查检阅制度除有关军事机密者外不应再行存在，人民应享有的言论、出版等自由应及早恢复"。"人民有经营通讯社和报纸杂志、印行书籍的绝对自由。""立即撤销各地图书杂志审查处。"①

为了满足人民精神食粮的需要，唤醒人民，团结人民，宣传进步，宣传革命，中国共产党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建立党的出版机构，从事出版发行工作。继长江书店以后，1929年曾以浦江书店、中华书店及无产阶级

① 张静庐辑注. 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丙编)，1937-1949年[M]. 北京：中华书局，1957：71-72.

书店等名义，出版马列主义著作和党的重要文献。又在上海成立了华兴书店，1931 年华兴书店被禁，改称启阳书店(又称春耕书店、春阳书店)。华兴书店出版了《中外研究学会丛书》，包括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等著作；《上海社会研究学会丛书》，包括潘文鸿编的《马克思主义之基础》等。

1931 年 9 月，北方"人民出版社"成立，地点设在保定、北平等处。该社出版发行的书籍，包括内容较通俗，易为人民大众接受，能半公开发行的《人民文化丛书》和《大众文化丛书》；内容属经典著作，或带指导性的纲领及党的文件、决议案等，列为《左翼文化丛书》，其中有《土地农民问题指南》(包括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案和第五次劳动大会决议案等)、《国际政治法典》(即《第三国际议案及宣言》新订本)、《政治问题讲话》(即苏联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斯大林的政治报告)等著作。北方"人民出版社"的出版物，一部分是新出版的书刊，同时重新校订和编排广州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和华兴书店等党的出版机构的优良出版物。如《国家与革命》、《社会科学概论》等。这些书籍除供应北方读者外，还同时寄往上海。

1932 年 7 月，国民党当局镇压保定师范学生，通缉人民出版社负责人，该社在保定的出版活动被迫结束。

中国共产党机关刊物《向导》周刊 1927 年被查封，但革命报刊仍以各种方式继续出版发行。1927 年出版《布尔什维克》周刊，由瞿秋白主编。1928 年出版《红旗》周刊。以后陆续出版《红旗日报》(1930 年)、《共产国际》月刊中文版(1930 年)、《红色中华》(1931 年)、《实话》(1932 年)、《新华日报》(1938 年)、《共产党人》(1939 年)等。这些刊物以各种方式报导革命根据地的真实情况，揭露国民党当局的反共反人民的政策，宣传抗日主张，动员人民群众参加革命斗争，成为革命运动强大的思想武器。

在反对文化"围剿"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强、湖风、生活、读书、新知等出版发行机构成为当时出版界革命的、进步的主要力量。生活书店从 1932 年 7 月成立到 1937 年，出版的期刊从 1 种增至 10 种，图书发展到 400 种，成为当时出版界新型的、在进步读者中影响最大的出版部门。

生活、读书等书店受到中国共产党的关怀和爱护，周恩来曾在 1942 年、1944 年不止一次听取生活、新知、读书等书店的工作汇报。不少书店的负责人是党的得力干部。同时书店获得社会人士和广大读者的热情支持。书店以私人事业的名义出版了大量革命的进步的书籍，掩护革命同志，完成党交给的各项任务。其中不少同志为了革命的出版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

20 世纪 20 年代末至 40 年代末，有不少进步书店和出版社遍布全国各地，如开明、大江、海燕、平明等书店。陈望道等创办的大江书铺在短短 5

年中，出版进步书刊，宣传马克思主义著作，翻译介绍先进文艺理论等，活跃在上海的出版界，成为推动当时左翼文艺运动的一个重要据点。1930 年大江书铺出版了鲁迅编辑的《文艺研究》季刊，这是我国第一部研究无产阶级文艺理论的刊物。他们出版的进步文艺作品和社会科学著作，始终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他们经历了艰苦斗争，为进步的文化出版事业作出了很大贡献。

尽管国民党当局对进步出版事业政治上迫害，经济上打击，但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步出版事业仍然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第十八章　民国时期的图书馆

第一节　民国初年至抗战前的图书馆

辛亥革命对我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影响是巨大的，对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也不例外。1905 年同盟会成立前后，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在批判改良派的同时，逐步在各地发展革命团体，其中值得重视的是革命团体的藏书楼和阅览室的发展。革命派重视图书报刊的作用，倡办各种形式的图书馆和阅览室，使一些革命党人的革命活动和图书流通密切相关，而图书流通又与革命思想的传播紧紧联系在一起。由于宣传革命思想的需要，在藏书内容和管理方法上，改变了当时藏书楼的“存古”传统，着力于“开新”的变革。读者对象大部分是作为革命党人的士兵、学生等，就这点来说，也是与封建藏书楼有区别的。因此，辛亥革命前革命派的图书活动，为辛亥革命后图书馆工作的变革创造了一定的条件，其影响是深远的。

一、民国初期的图书馆

辛亥革命的胜利，促使清末以来建立的各省省立图书馆逐步开放，并陆续举办各种公共性质的图书馆，基本上完成了省会公共图书馆系统的建设。同时，有关图书馆的法令、规程的颁布也成为我国图书馆立法的开端。加上一批图书馆界先驱的努力，我国近代图书馆事业有了比较迅速的发展。而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使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发生了质和量的变化。

1. 公共图书馆概况

1904 年初，湖南、湖北两省分别创办图书馆，并于当年对外开放，是我国最早设立的省级公共图书馆，同时建立的还有江南图书馆。1904 年，长沙知识界创办湖南图书馆兼教育博物馆。1906 年，湖南巡抚庞鸿书认为

图书馆"庋藏群籍，输进文明，于劝学育才，大有裨益"①。于是拟定章程，拨给经费，委派监督，分设缮校、收掌、提调官员，改称湖南图书馆，开始使用"图书馆"命名。1907年，安徽巡抚冯煦奏采访皖省遗书，以备图书馆之用，是为主张省图书馆收藏地方文献之始。1909年，吉林、黑龙江、河南、山东、陕西、云南等省相继建立公共图书馆。到1914年为止，全国除山西、甘肃、江西、新疆等省外，共创建了省级公共图书馆18所。

辛亥革命前后相继建立的各省图书馆，发展情况也不一样。其中陕西、浙江、江苏等省省立图书馆规模较大，藏书较丰富；但西北地区有些省立图书馆仍未成立，一些馆舍年久失修，图书馆工作开展困难。四川省立图书馆自1914年成立后，时办时辍。黑龙江省立图书馆因经费支绌，曾于1920年并入教育厅办理，至1925年再度成立。因此曾有人著文感叹："中国之省立图书馆，每被一般政客，视为位置人员之处，不以人才为前提；且内争不息，经费时为军人所占，更无发展可言，良深惋惜。"②

鉴于各省公共图书馆的建立，迫使清政府于1909年12月正式颁布《京师图书馆及各省图书馆通行章程折》，规定图书馆建立的目的是"保存国粹，造就通才，以备硕学专家研究学艺，学生士人检阅考证之用。以广征博采，供人浏览为宗旨"，并对图书馆的收藏范围、职责、管理制度以及图书管理与流通的方法等均作了详明的规定，这是我国图书馆的第一次立法。可见，真正奠定我国近代图书馆事业基础的，是我国各省公共图书馆的正式建立。

通俗教育以启发一般民众普通必需的知识为主，它所采集的图书，以人民所必需且易明了者为宜。教育部于1913年筹建京师通俗图书馆(首都图书馆前身)。该馆设于宣武大街租赁的民房内，除阅览室外，附设公共体育场与新闻阅览处一所，1913年10月21日正式开馆。后经费稍宽裕，又添设儿童阅览处一所。鲁迅关心图书馆的发展，他认为通俗图书馆采购的图书，"小说大应选择；而科学书等，实以广学会所出者为佳，大可购置，而世多以其为教会所开而忽之矣"③。鲁迅自己常去通俗图书馆，并介绍别人去通俗图书馆看书。此外，据1916年4月《教育公报》统计，当时全国21个省有公私立通俗图书馆237所。拥有图书馆30~45所仅奉天、湖北两省，尚有

① 李希泌，张椒华. 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151.

② 金敏甫. 中国现代图书馆概况[M]. 广州：广州图书馆协会，1929：62-63.

③ 鲁迅书信集. 致许寿裳书(1918年8月20日)[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

14 个省不足 10 所；藏书 9 000 ~ 20 000 部仅湖北、山东两省，福建等 7 个省全省的通俗图书馆藏书不足 1 000 部，其他省通俗图书馆藏书总数不足 10 000部；以湖北、山东、河南、奉天等省通俗图书馆的读者为最多，日平均为 1 000 ~2 000 人次，有 7 个省的图书馆不足 100 人次。①

1919—1927 年，全国各类型图书馆以公共图书馆较多。据中华图书馆协会统计，1925 年全国 502 所图书馆中，公共图书馆 259 所，占 51.6%；学校图书馆 171 所，占 34%，其中大学图书馆仅 7 所；机关、团体及其他类型图书馆 72 所，占 14.4%。

县市乡图书馆以东南各省较多，尤以江苏最发达，各县设一个或多个图书馆。当时苏州、无锡、南通等县立图书馆的规模较大，尤其是南通县图书馆藏书 10 余万卷，馆舍大小 67 间。但是县市图书馆超过 10 所的省份仅 7 省，其中江苏省 56 所，其他各省为数甚少，或 1 ~2 所，或 4 ~5 所不等。

2. 学校图书馆概况

辛亥革命后，随着教育事业的发展，学校图书馆也有所发展。主要集中在北京和东南沿海城市，例如南京中央大学图书馆(前身为南京高等师范图书室)、金陵大学图书馆、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暨南大学图书馆、浙江大学工学院图书馆、广东国民大学图书馆等，有的创建于民国初期，有的新建或扩建了馆舍，有的藏书有较大增长。学校图书馆数量仅次于公共图书馆，据统计，1927 年全国大学图书馆 70 所，中学图书馆 92 所，小学图书馆 9 所。

私立大学受经费限制，图书馆规模不及公立大学，但也比较注意搜求图书，招聘专业人才。例如 1921 年创办的厦门大学图书馆，聘请裘开明当图书馆主任，直接受校长领导。南开大学图书馆主任是毕业于武昌文华图书科的王文山。据调查统计，1919—1927 年，上海私立大学图书馆藏书超过 3 万册的不多，但比较有重点地入藏图书，同时多采用新分类法。大夏大学图书馆藏书 30 882 册，以教育类图书为主，上海法学院力山图书馆藏书 19 378 册,以社会科学为主。上述图书馆均采用杜定友的《世界图书分类法》，藏书 2 万册以上的大同大学图书馆和光华大学图书馆则采用《杜威十进分类法》。

教会大学图书馆为数不多，但成立较早，比较注意管理工作的改进。广州岭南大学图书馆成立于 1907 年，1918 年藏书 14 000 册，1926 年入藏书

① 李希泌、张椒华. 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256-257.

刊达 68 000 册，仅次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和清华大学图书馆，居全国第三位。上海约翰大学图书馆于 1915 年已采用开架制度，1922 年开设分馆，修订借书规则，增加流通量。此外，藏书较多，比较著名的还有南京金陵大学、武昌文华大学、上海沪江大学等学校图书馆。

中学图书馆以上海及东南各地数量较多，其中较著名的有上海的南洋中学图书馆。该馆始建于 1915 年，收藏以中文图书为主，方志入藏量也很著名。1926 年夏，该馆建成专用馆舍，为上海各中学图书馆之首。南洋中学图书馆为合理处理中、西学馆藏图书，自拟图书分类法。1919 年 7 月，该馆陈乃乾编制《南洋中学校藏书目》，即按该馆拟制的分类体系排列，分书 14 大类，包括周秦汉古籍、历史、政典、地方志乘、天文算法、医药术数等，对几千年来我国以经部为首的分类体系作了较大的突破。除南洋中学图书馆外，上海的澄衷中学、浦东中学等图书馆 1926 年藏书均在 1 万册以上。

辛亥革命后发展比较快的大学图书馆中，比较有影响的有：

(1)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

1898 年京师大学堂章程第一章第六节指出：“学者应读之书甚多，一人之力必不能尽购……京师大学堂为各省表率，体制尤当崇宏，今设一大藏书楼，广集中西要籍，以供士林浏览而广天下风气。”①1902 年，张百熙以京师大学堂为基础，奏办京师学堂，以端正趋向，造就通才为宗旨，曾分别提取各省的官局书籍或购买民间旧本，时务新书，已译未译西书，归入藏书楼。这是北京大学图书馆前身，也是我国高等学校图书馆历史最久的一所。

1912 年 5 月京师大学堂改称北京大学堂，重新开学。北京大学所藏中外文书籍原有十数万册，因管理不善，颇多散失。1914 年初开始对图书馆大加整理，将所有书籍详细清查，重新编订目录。此外还增设中、西书籍阅览室各一处，将常用书籍开架陈列，每日上午 8 时至晚上 10 时开放，师生均可自由阅览。

1920 年《北京大学现行规程》中规定：图书委员会为常设委员会，协助校长谋图书馆之扩张与进步。图书部主任为当然会员。学校设置图书部，下分登录课、购置课、编目课、典藏课。据 1923 年 9 月 30 日统计，北京大学图书馆藏书，汉文书约 140 000 册，西文书约 26 356 本，日文书 2 480 本，杂志(中西日文)共 15 172 本，总计 184 008 册。编有中西文分类、著者和书名字顺的卡片目录，其中西文分类目录以《杜威十进分类法》为基础，根

① 国闻报. 第 248 号，1898 年[M]//李希泌，张椒华编. 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106.

据馆藏略有变通，分为总类、哲学、宗教、科学、工艺、美术、言语、文学、社会、史地10大类；中文分类目录沿用经、史、子、集4大类的传统习惯。图书馆已经成为学校的第二课堂。

（2）北京高师图书馆

1912年，北京高师接收了前清优级师范的图书室，当时藏书甚少，而且分散在各部预备室。1917年夏，经史地部主任王桐龄及其助理张之轩赞助，着手收回散置各处的图书，改组阅览室，并由学校聘请刘宝廉为图书馆主任。同年12月，图书馆正式成立。到1920年止，共有中文书籍665部959册，中文新书2 305部3 424册；英文书籍3 336册；日文书籍2 336部2 863册；德文书籍101册；法文书籍22册。西文书已改用当时通行的《杜威十进分类法》分编，中文书仍用四库分类法。

（3）清华学校图书馆

清华学校图书室创办于1912年，当时隶属于庶务处之下。1914年夏，由于学生增加，课程增多，图书室开始脱离庶务处而自成为学校行政之一部。1919年3月，新馆落成，改称清华学校图书馆。图书馆除主任和副主任外，下设6个部：即参考部、购置部、编目部、出纳部、登录部、装订部。至1921年4月止，馆藏西文书16 066册，中文书41 000册，共计57 066册。该馆于1917年和1919年分别制定了《图书馆规则》和《图书馆借书规则》。

3. 专门图书馆

专门图书馆主要包括研究学术机构图书馆、政府部门图书馆、宗教图书馆等。这类图书馆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南京三市。

1905年，袁世凯在天津设立工艺总局，附设工业学堂考工厂及教育品陈列所。教育品陈列所罗列中外各种教科书、仪器标本、模型、设立藏书室，这是比较早的专业图书馆。

创建于1916年8月的中国科学社图书馆属中国科学社领导。1922年正式开馆。制定有图书馆总章和暂行流通书籍章程、办事细则等，服务对象主要为中国科学社社员。图书来源以捐赠、寄藏、征求和购置为主；图书类别包括教科书及参考书，期刊和其他出版物、图谱等。凡重要书籍，无论本馆能否购置，都必须让读者知晓，并将该书的内容写出提要在目录中予以反映，以便读者检查及日后择购之用。

4. 图书馆经费来源

民国初期由于军阀混战，国民经济受到破坏，对文化事业的发展无暇顾及，使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受到很大影响，最突出的是图书馆经费来源很

困难。公共图书馆经费规定由教育经费支出，而教育经费尚无定款，图书馆经费则更难以保证。学校图书馆经费一般由学校经费拨出，然而各校没有充足活动经费，只好向学生征收图书馆费，每年每人征收1～6元，有的学校向外界募捐，但所得捐款很少。

据调查，1919年全国图书馆经费为82 836元；1922年约为21.5万元；1924年为305 296元。

上述经费分配给各省图书馆，最多的不超过10万元，例如河北省分配到89 316元，最少的是云南省的图书馆仅分配到1 700元。1万元以上只有7个省，其余各省全都只分配到几千元。所得经费连维持费也不够。学校图书馆则以学生缴纳的图书馆经费作为购书费，学校负责图书馆职员的薪金，以及图书馆设备经费的支出。个别学校独立划出图书馆经费，但为数甚少。

1923年，韦棣华发起以美国退还庚子赔款“推广”图书馆事业，为此她两次往返中美之间，“与国会两院议员各个面洽，陈述理由”。1924年美国决定由中美双方组成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分配退还的庚子赔款用途。1925年6月董事会举行第一次会议，决定利用一部分款项“促进有永久性质之文化事业，如图书馆之类”①。与此同时，英、日等国效法美国，竞相退还庚子赔款。帝国主义退还庚子赔款，是为了操纵和控制我国文化事业。因此早在1923年已有人提出：“如为他们来越俎代谋，把我国文库都收集操纵，那就很危险了。”②

事实上，从1925—1932年，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对图书馆事业的补助只有9次，用于国立北平图书馆建设100万元，其他用作补助武昌文华图书科。从1926年起三年内按年补助该校教席金和助学金。

5. 图书馆事业的特点

这一时期的图书馆事业具有以下特点。

(1)图书馆的作用

早在19世纪末期，梁启超已载文提出图书馆的八点功用，称图书馆为“开进文化一大机关”。③ 清末民初，图书馆逐渐开放，但尚限在知识阶层人士。由于教育机关提倡图书馆，直至五四运动前后，图书馆的社会作用才

---

① 台湾“中央图书馆”编印. 中华民国图书馆年鉴[M]. 台北：“中国出版公司”，1981：360.

② 唐轶康，我国的图书馆事业[J]，学灯，1923-8-17/18.

③ 梁启超. 论图书馆为开进文化一大机关. 清议报. 1899. 5(17)[M]//严文郁. 中国图书馆发展史. 台湾：枫城出版社，1983：14.

开始受到重视，从典籍保存趋向图书使用。当时有人提出，图书馆是根本的、永远的教育机关。图书馆的性质在于普及国民教育，适应地方人民需要。因而主张除通俗图书馆应不断增加外，其他类型图书馆也应向社会开放。此后，1922 年成立的上海总商会商业图书馆，向社会开放，该馆杂志及一般参考书采取开架制度。1926 年东方图书馆实行开放；同年上海商科大学图书馆也允许校外读者借阅，成为上海第一个向社会开放的学校图书馆，但 1927 年以后不对外开放。

图书馆工作中，阅览工作开始与图书入藏整理工作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有关阅览室的设置和工作规则、阅览时间、阅览人数等问题均列为各图书馆工作报告的重要内容。当时图书馆一般需要阅览券才能利用图书馆藏书，而到馆阅览者多为政、学、军、警各界的“中上等人”，商人和工人较少。虽然如此，在图书藏与用方面的深刻变化是应该肯定的。

(2)图书馆的读者服务

由于图书馆向平民开放，尤其是通俗图书馆的建立，使图书馆逐渐面向社会。图书馆的读者包括社会各界市民、妇女、儿童、学校师生等。公共图书馆内根据本馆的读者对象开展各项服务，例如馆内，除设置普通阅览室外，还根据需要设妇女、儿童阅览室。最早的儿童图书馆于 1917 年由天津社会教育办事处开办，为 8 ~ 12 岁儿童提供图书和玩具，组织讲演会、展览会等，图书馆阅览券不收费。为方便读者阅览，一些学校图书馆除增设阅览室外，还在各系设阅览室。民国初年广州开始出现流动图书馆，当时称巡回书库，由广州市督学创办，1921 年由广州市教育局接管，图书馆雇专人肩挑书箱或手推车送书到居民区，后根据广州水上市民特点，增加船型文库，为水上居民提供借阅服务。①

(3)图书馆藏书的变化

图书馆的馆藏随着出版物内容与类型的变化以及读者的需要，从过去以古籍为主，变为重视搜求国内外各种图书报刊，例如 1922 年创办的地质调查所图书馆，征集世界地质图书及有关的科学画报。大学图书馆尤其重视外文书刊的收集。1923 年北京大学图书馆共入藏中外杂志 15 172 册，阅览室内中外杂志达 370 余种。公共图书馆建馆时一般以入藏古籍为主。五四运动前后，由于报刊出版增多，读者借阅新书和学术杂志、报纸的人数大大增加，公共图书馆开始注意到“各种月刊杂志，最开拓知识，增广见闻，供诸

① 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编著. 羊城录旧[M].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209.

阅览，裨益良多”，于是大力进行国外期刊的收集。“至于国内一切杂志月刊，倘有发行，尤必争先订购，经费即或不敷，亦可摊派分期，总期旁搜博采，俾臻完善。”①

图书搜求是我国图书馆历来比较重视的一项工作。1920 年，当时的内务部曾通知各县立图书馆“应将公私藏书，及旧刻板片、印刷器物，一律切实搜求，以保存之”。1926 年，当时教育部令：“凡商店出版，及私人著述图书，应以四部送各省教育厅署，由厅分配，以一部呈部，转发国立京师图书馆，一部分寄国立编译馆，二部分存各省立图书馆，及各该地方图书馆。”②但是由于经费缺乏，图书馆藏书数量很少，据统计，1927 年全国图书馆藏书总数共约 3 192 250 册，在世界各国列于第 20 位以后。馆藏图书 20 万册以上全国仅 3 所，10 万～20 万册仅 5 所。藏书最多的地区是北平，各馆藏书量共 439 345 册，最少是贵州省，仅 5 260 册。藏书量较多的图书馆有东方图书馆 23 万册，陕西省立图书馆 22.7 万册，北京大学图书馆 22.2 万册。列为当时全国十大图书馆之一的东南大学图书馆，藏书仅 5.1 万册。

(4)图书馆的管理制度

五四运动前后，图书馆的管理制度发生了很大变化。

首先是图书馆法令的公布与实施。1915 年 10 月 23 日教育部同时公布《图书馆规程》、《通俗图书馆规程》。《图书馆规程》共 11 条，内容规定“各省各特别区域应设图书馆，储集各种图书，供公众之阅览”“公立私立学校、公共团体或私人，依本规程所规定，得设立图书馆”。规定要求图书馆设置时需上报馆名、人员、经费等。《通俗图书馆规程》共 11 条，内容大致与《图书馆规程》相同。

在图书馆业务管理方面，图书分类开始打破经、史、子、集四部分类，西文图书多采用《杜威十进分类法》。中文图书有的按新书和旧书分别处理：新书依学科分类，旧书依经、史、子、集、丛书分类；有的则在四部之外根据图书内容增加文学、理学、法学、实业、杂志等类目，个别图书馆使用《美国国会图书馆分类法》。

我国最早采用卡片目录的是上海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图书馆。该馆 1908 年编制成卡片目录，卡片著录内容包括《杜威十进分类法》分类号和索

① 李希泌，张椒华．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277-278.

② 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编．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丙编，教育概况[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789.

引款目、卡特著者号码等。1917 年京师通俗图书馆改用卡片目录。1918 年武昌文华公书林亦赶制卡片目录。由于卡片增删方便，又便于保存，卡片目录于是逐渐得以推广使用。东方图书馆于 1926 年开放时，已制成目录卡片 40 余万张。

开架阅览逐步推广。李大钊早在 1919 年就主张开架阅览，并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施行。至 1921 年不少图书馆已部分或全部采取开架阅览，以方便读者，节省借阅时间。1919 年开始出现馆际互借业务，当时京师图书馆与分馆订立交换阅览图书简则，以推广图书，方便阅览。1916 年县图书馆采用巡回文库的方式，将读者必需而易懂的各种图书送到农村，限期收回。1918 年京师学务局仿照上述办法举办小学教员巡回文库，开展图书流通业务。

综上所述，五四运动前后，我国图书馆事业从服务范围到管理制度，已有很大进步。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图书馆活动

1. 李大钊、毛泽东在图书馆的活动

1918 年 1 月，李大钊由章士钊推荐，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同年 12 月当选北京图书馆协会中文书记。1922 年 12 月辞职。李大钊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期间，以北京大学图书馆作为研究和传播马列主义、领导革命活动的重要阵地；同时，对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学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这期间，北京大学图书馆大力入藏马克思主义著作及介绍苏联十月革命书刊，如《共产党宣言》、《资本论》、《马克思主义》，以及外文期刊《苏维埃俄罗斯》等。并曾开辟介绍俄国革命经验的专题阅览室。当时青年学生经常找李大钊请教和讨论问题，李大钊除了解答他们提出的问题外，还向他们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刊，指导他们阅读。1919 年 7 月，少年中国学会正式成立。1920 年 3 月，北京大学秘密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李大钊参加筹建并热情帮助。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李大钊曾从北京大学图书馆借出一批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会员学习，为后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做了准备。

李大钊非常重视和关心图书馆工作，到任后，首先从整理工作着手，积极编制馆藏目录，改进藏书工作，开展开架借阅。1918 年 7 月，图书馆设立西文、中文、古物美术三部，下分登录、编目、购书、典书四课，并附设打字处、装订处。图书馆的日、西文图书采用美国《杜威十进分类法》，并编制卡片目录。图书馆设有阅览室，各学科设分阅览室，可随时向图书馆调

取图书，供研究之用。开馆时间每日达20小时。

经过李大钊的努力，到1920年，北京大学三个院都开设了阅览室，各书库管理有条不紊。外文书籍增加一倍多。据统计，该馆1920年有中文图书123 651册，西、日文图书19 826册。鉴于当时图书馆的学生激增数倍，北京大学图书馆出现久借不还，影响图书流通的现象，而图书馆采用近似于藏书楼的文库式借书，又使馆内人员忙于出纳工作。李大钊多次召开会议，倾听师生意见，对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分析，并在很大程度上得到解决。北京大学教授刘复曾说："我的朋友李守常(即李大钊——编者注)先生，自从做了图书馆主任以来，没有一天不是很诚恳的，很刻苦的想法改良，而且还曾经开过几次会议，请校内几位注意收藏事业的教员，帮助他设法改良。"①

李大钊十分重视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教育的发展。早在1919年李大钊在北京高等师范图书馆二周年纪念会上发表演说时，就提出"图书馆和教育有密切的关系。想教育发展，一定要使全国人民不论何时何地都有研究学问的机会"，"想达到这种完美教育的方针，非依赖图书馆不可"。认为现代图书馆是教育机关，其任务不但要保存图书，"还要使各种图书发生很大的效用"②。李大钊提出学校图书馆和教授法之间有密切关系，随着教育教授法的改变，学校图书馆的工作应发生相应变化。首先要收藏许多参考书，主张增加复本，以鼓励学生研究的兴趣，其次主张开架借阅，提出图书馆实行开架式管理"是图书馆的新趋势"③，同时主张以分类目录作为开架目录。

李大钊十分重视图书馆干部培养，在上述演说中，呼吁设立图书馆专科或简易的传习所，使管理图书者都有图书馆教育的知识，认为"这是关系中国图书馆前途的事情，也是关系中国教育前途的事情"④。他亲自到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讲授图书馆学。1921年12月在《晨报》发表《美国图书馆员之训练》，详细介绍了美国图书馆学校从1878年到1895年的发展情况。

此外，李大钊还曾撰文呼吁："劳工聚集的地方，必须有适当的图书

① 刘复．对于改良北京大学图书馆的意见[N]．北京大学日刊，[1920-07-28]：1.

② 李大钊．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图书馆二周年纪念会上的演说词[M]//李希泌，张椒华编．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169-171.

③ 李大钊．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图书馆二周年纪念会上的演说词[M]//李希泌，张椒华编．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169-171.

④ 李大钊．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图书馆二周年纪念会上的演说词[M]//李希泌，张椒华编．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169-171.

馆、书报社，专供人民的休息时间来阅读。"①积极倡导设立图书馆，作为提高工农大众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的工具。

李大钊有关图书馆工作的研究和实践，是我国现代图书馆事业史的宝贵遗产。

毛泽东青年时代十分重视利用图书馆。早在1910年他在湖南省湘乡县东的高等小学堂读书时，就成了学堂后斋藏书楼的常客，经常借阅其中的书籍。1912年夏，毛泽东曾在定王台湖南图书馆度过半年自学生活。每天一开门，他总是第一个走进图书馆，中午也不休息，直到晚上闭馆才离去，风雨无阻，天天如此。1913—1918年夏，毛泽东就读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借书于藏书丰富的学校图书馆，坚持自己的读书计划。由于他借书频繁，与图书管理员熊光楚成了好朋友。在图书馆，他大量借阅史地图书，收集史地方面新出版的报刊资料。

1917—1918年，毛泽东同志担任湖南第一师范校友会总务兼教育研究部长，据《一师校志》载，由毛泽东提议通过的校友会工作6项决议，其中之一是设立图书馆，购置新书杂志。

1918年9月，毛泽东第一次到北京，不久认识李大钊，并被安排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员，在沙滩红楼第二阅览室登记新到报刊和阅览人姓名，管理15种中外报纸。虽然工作平凡琐碎，待遇菲薄，但毛泽东利用这种良好的学习环境，如饥似渴地学习，参加各种学术团体，研究各种"主义"，批判和鉴别各种知识，寻求真理。就在这时，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开始学习、研究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在北京大学的半年期间，毛泽东积极帮助新民学会会员和湖南学生开展赴法勤工俭学活动，并几次去长辛店机车车辆厂向工人宣传革命道理，了解工人疾苦，向工人学习。

1920年，毛泽东在湖南开始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他在长沙创办湖南青年图书馆，杨开慧为该馆负责人之一。湖南青年图书馆组织青年阅读进步书刊，发展团的组织，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阵地和青年之家。1921年8月，毛泽东创办湖南自修大学，附设一个藏书丰富的图书室。1926年，毛泽东在广州举办农民运动讲习所，附设图书报刊阅览室。这两所图书室收集了大量进步书刊，供读者借阅，并经常召开座谈会，讨论和研究马克思主义。

2. 中国共产党早期创建的图书馆和进步的图书馆

五四运动以后，各地创办了不少新型图书馆。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

---

① 李大钊．劳动教育问题[N]．晨报，[1919-02-14]，[1919-02-15]．

工农革命运动日益高涨，当时创建的工农图书馆(室)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紧密配合政治斗争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启发工农群众的觉悟，为人民大众服务。进步图书馆活动为我国图书馆事业揭开了新的一页。

(1)亢慕义斋的图书活动

邓中夏、黄日葵等人秘密组织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21 年 11 月公开宣布成立。他们利用举行讨论会、讲演会、成立研究小组等方式，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研究会将搜集、采购马克思主义文献作为第一项重要活动，19 个会员筹集 120 元，先后购买英、德、法三种文字《马克思全集》各一套。他们一方面在国内搜集，一方面向国外购买。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的有力支持下，短短几个月，研究会已收集到相当数量的马克思主义原著及研究著作，据《北京大学日刊》1922 年 2 月 6 日所载，收藏中文书籍 20 多种，英文书籍 40 余种。中文书籍包括陈望道译《共产党宣言》、恽代英译《阶级斗争》、李汉俊译《马克思资本论入门》、李达译《马克思经济学说》、李季译《社会主义史》等，英文包括《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据现在发现的文献中，有部分德文书由成立于 1919 年 3 月的共产国际出版机构出版，如汉堡共产国际出版社，莱比锡共产国际西欧书记处等。当时，马克思列宁主义书刊是北京军阀政府严厉查禁的对象，研究会及时收到共产国际的出版物，可能是通过各种途径秘密订购的。

1922 年 12 月，研究会已收藏中、英文图书报刊数百部。中文有《共产党》、《先驱》、《工人周刊》、《劳动周刊》等，英文有《苏维埃俄罗斯》、《国际共产党》、《亚细亚》等。在李大钊、蔡元培的支持下，上述书刊集中在藏书室。藏书室取名"亢慕义斋""(即英文 Communism 译音——编者注)。藏书均盖有"亢慕义斋图书"的印章。所有书刊供研究会员和非会员借阅。非会员经许可后，须交纳保证金，限期归还。藏书室有较为健全的图书借阅制度，并曾公举共产党员范鸿劼为图书经理，负责图书的管理工作。这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以收集马克思主义著作为使命的图书馆。

(2)天津及唐山工人图书馆活动

1922 年前后，北方工人运动的中心——天津出现了天津工人图书馆，该馆附设于 1921 年由马克思主义者安体诚创办的天津河北工余补习学校第一校园。它以"增进工人觉悟为目的"，是针对当时补习学校因教育经费不足，不能尽量接纳工友及许多工友不能得到受教育机会而设立的，"以供天津一般工友之观览"，扩大新文化新思想的宣传。据《觉悟》杂志 1922 年 6 月 9 日所载，天津工人图书馆章程规定：为增进工人知识，促进工人觉悟，

“设备各种书籍、报纸、杂志等，以供工人阅览”，工人图书馆不但供工人阅览，“如座位有空隙时，虽非工人亦可阅览”。

当时唐山也有工人图书馆，劳动组合书记部指导工人运动的总机关报《工人周刊》曾刊载唐山工人图书馆简章、阅览室规则、借书规则、工人图书馆干事会议简章等文件。1923 年，唐山制造厂工人邓培于唐山市建立“工人阅报室”，供工人阅读各种书报，并通过阅报教育组织唐山市的工人从事革命斗争。工人阅报室成了唐山市的工人运动中心，其他地区如济南、汉口等地区也先后建立了工人图书馆。

(3)工农革命运动中的其他图书馆活动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工人运动高涨，全国各地先后建立工人俱乐部，工人补习学校，对工人进行革命教育，活跃工人的文化生活，为了将革命理论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工人俱乐部大力开展图书活动。

1921 年冬天，李立三根据毛泽东指示，在萍乡煤矿创办工人补习学校。学校辟有阅报室，备置《工人周刊》、《劳动周报》等刊物和几种日报，供工人业余阅览。1921 年邓中夏领导下的长辛店工人俱乐部成立，通过工人俱乐部和它的阅览室，开展进步书刊流通活动。《工人周刊》、《劳动周刊》等刊物，第三国际通讯社寄来的有关各国工人运动的资料译文，以及《五月一日》、《工人胜利》、《海员大罢工》、《开滦大罢工》等图书曾在工人中流通。1923 年“二七”大罢工后，长辛店工人俱乐部遭到北洋军阀政府的破坏，许多进步书刊被烧毁、查封，然而各种进步图书照常在工人中流传，鼓舞工人阶级的斗争。

此外安源、济南等地工人俱乐部，也开展图书活动，通过进步书刊的传播，提高工人阶级觉悟和文化水平，成为革命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随着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开始出现农村图书馆(室)。北伐战争时期，各地农民协会相继开展图书活动，当时湖北省黄冈地区各县一般设有图书馆，每个农会设立图书室，陈列了许多革命书刊供广大农民借阅。其中有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蔡和森的《社会进化史》及《唯物史观》、《共产主义 ABC》、《社会发展史》等图书，《新青年》杂志、《向导》周报以及宣传俄国十月革命的各种小册子和农会的报纸等，农村图书室的进步书刊流通活动，对于教育农民，提高农民的革命觉悟起到了一定作用。

(4)上海通信图书馆

上海通信图书馆成立于 1921 年 5 月 1 日，是当时一个进步的文化团体，也是上海第一个真正开放的公共图书馆。

上海通信图书馆“创立宣言”中提出建立图书馆是为了“成为远近人们底

藏书库，只以邮筒往还，便能以余暇读爱读的书报，不受制于路途，不受制于经济，不受制于职务，也不受制于时间"；"为大规模的'上海图书馆'底先导"①。1925 年五卅运动后，更进一步明确提出图书馆"旨意在使得无产者有得书看"②。

上海通信图书馆办馆目的明确，"没有图书馆以便利群众，则书报只能流通于有产阶级"(《上海通信图书馆创立宣言》)，该馆建馆之初，图书馆的读者对象规定为图书馆成员，以后决定开放，不论什么人都可以借书，不收费用，不收保证金。同时采用通信借书的方式，收到读者寄来的邮寄费后，即将藏书寄出，提供读者利用。几年间，不但读者人数增加很快，而且借书范围不断扩大。1924 年读者约 3 000 人，1925 年约 5 000 人，读者从上海发展到全国 20 个省区，远及南洋群岛、日本、美国和法国。图书馆为了宣传图书，指导阅读，还出版《上海通信图书馆月报》，刊登每月新书目、书报介绍、各地通信等。它的服务方式大大方便了各地有志读书而经济困难的读者。使他们可以不离开工作岗位而能阅读到各种书籍。因此，得到当时图书馆界和文化界的赞誉，称道"它的宣言以无限的光芒升腾放射出来"(陈独醒《书为什么要流通》)。

上海通信图书馆的应修人联合上海钱业界的职业青年，组织成上海通信图书馆共进会，用以联系各地爱读书而不能多买书的人。应修人后来于 1925 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共进会成员大多是图书馆的工作者和积极支持者，其中包括恽代英、郭沫若、郑振铎、钱俊瑞、叶圣陶、郁达夫、楼适夷、汪静之等。一些会员利用业余时间，义务担任图书馆的日常业务工作。共进会成员均需交纳会费，这是图书馆经费来源，用以搜集和流通图书，同时，图书馆还接受团体或个人赠书。赠书单位先后包括新青年社、中国青年社、文学研究会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上海书店曾于 1925 年赠书 12 种，创造社于 1928 年赠书 112 种，商务印书馆曾赠书 290 种。郭沫若亦于 1926 年赠书 40 种。

上海通信图书馆藏书发展很快，创办时有书 300 册左右，到 1926 年 8 月已增至图书 2 496 部，期刊合订本 323 部，期刊零本1 093部③。藏书内容为"有时代思想的各种学术文艺书报"④，而且规定"大凡一切反动复古及褊

---

① 上海通信图书馆书目[R]. 第 6 版.

② 上海通信图书馆月报[J]. 第 1 期.

③ 时事新报[N]. [1926-08-26].

④ 上海通信图书馆书目[R]. 第 6 版.

狭的主义学说之有危害于民族的，以及无伟大的学术上的价值的，概予拒绝”，“对于思想落后或复古，或反革命性的刊物，一经觉察，自然毅然剔除，不能以私人关系徇情收留”(《上海通信图书馆月报》第 2 期和第 1 期)。入藏书刊包括《共产党宣言》、《通俗资本论》、《共产主义 ABC》及《向导》、《中国青年》、《前锋》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革命书刊。进步书刊的大量入藏，是上海通信图书馆的藏书特色。

上海通信图书馆设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作为执行和监督机构，执行委员会下设总务、文书、会计、买书、编目、出借、保管等科。图书馆的业务活动除办理借阅外，还通过借书人卡了解读者的读书倾向，每周星期四晚上举办交谊会，派人接待来访读者。

1926 年，由应修人组织编制的《S. T. T. 图书分类法》(S. T. T. 是上海通信图书馆的罗马拼音文字缩写)发表。分类法为十进制。类目的设置主要根据馆藏图书内容，其特点是：(1)设立一些当时少见的类目，如“青年运动”、“工人运动”、“民族运动”、“殖民政策”、“经济侵略”等；(2)中国问题的图书优先反映，区域划分顺序与《杜威十进分类法》大不相同，依次为世界——中国——亚洲——欧洲——美洲。虽然由于十进制和时代所限，类目设置不尽合理，但它与当时国内发表的图书分类法相比较，其进步性是显而易见的。

上海通信图书馆开展的进步图书馆活动，终于为国民党当局所不容，1929 年 5 月 4 日被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以“反动嫌疑”为理由查封，后归上海市教育局接收，1930 年改组为上海市立流通图书馆。

三、抗战前的图书馆事业

1936 年以前，我国图书馆事业处于发展时期。从数量上看，20 世纪 20 年代末，各省市创办许多新图书馆，据《全国图书馆调查录》(许晚成 1935 年编制)一书有关资料统计，浙江、安徽、江西、湖南、四川、河北等省 60% 的图书馆创办于 1928 年之后。青海、西康全部、察哈尔绝大多数图书馆均创办于 1928 年以后。南京、上海、江苏、湖北、广东等省市的图书馆创办于 1928 年以后的也占 40% 以上。政府当局提倡民众教育，普及通俗图书馆，各省市新设大量民众教育馆，加上民众教育馆内设置的图书部以及学校图书馆，1936 年全国拥有图书馆的数量为 1925 年的 10 倍，为 1916 年的 17.7 倍，成为民国时期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最高峰(见表 18-1)。

表 18-1　　1912—1936 年我国图书馆发展情况统计表

年份	图书馆数量(所)	资料来源
民国初年	20 余所(不包括大学图书馆)	《中国近六十年来图书馆事业大事记》
1916	293 所(包括巡回文库)	《中国现代图书馆概况》
1918	176 所	《中国近六十年来图书馆事业大事记》
1921	170 余所，通俗图书馆 286 所	同上书
1925	502 所	《中华图书馆协会》
1928	① 642 所	同上书
	② 557 所(缺甘肃等 7 省区、汉口等的数字)	《中国近六十年来图书馆事业大事记》
1929	① 1 428 所	《中华图书馆协会》
	② 1 131 所	《中国近六十年来图书馆事业大事记》
1930	① 2 935 所	《申报年鉴》1935 年
	② 1 428 所	《国民党教育工作报告》
1931	① 1 527 所	《中华图书馆协会》
	② 1 625 所	《国民党教育工作报告》
	③ 2 953 所	《全国图书馆调查录》
1934	1 816 所，民教馆 1 002 所	《中华图书馆协会》
1935	① 2 520 所(缺东北三省、热河的数字)	《全国图书馆调查录》
	② 2 935 所	《国民党教育工作报告》
	③ 4 032 所	《中国近六十年来图书馆事业大事记》
	④ 5 828 所(缺西藏的数字)	《申报年鉴》1935 年
1936	① 2 840 所(缺西康、新疆的数字)	《中国近六十年来图书馆事业大事记》
	② 5 196 所	《第二次教育年鉴》

注：由于调查的方式方法，以及取舍标准等不同，同一年份不同资料来源的统计数字有的差异较大，现均列出，用①②……区别，便于分析、参考。

在增加图书馆数量的同时，图书馆的扩建和改建工作也有所进展。例

如，1929年11月30日广州第十次市政会议上，教育局提议会议通过拨款100万元建筑市中山图书馆，市政府令财政局分期拨款约50万元，会后赴美洲募款妥觅馆址，新馆于1933年建成。湖北、山东、宁夏等省馆新馆也相继落成。大学图书馆新馆舍建设进展更显著，北京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京中央大学，广东中山大学以及四川大学等均进行图书馆新建或扩建。

由于留学人员纷纷学成回国，国内图书馆学正规教育和业余教育的发展，图书馆专门人才有较大增加。各图书馆注意聘请图书馆学专家主持，图书馆业务人员水平也逐步提高，各图书馆开展许多服务工作，例如，编印出版书目、刊物，增加馆藏，举办各种类型和内容的展览，加强流通阅览服务等。

大学图书馆经费较之公共图书馆稍为充裕，但是，1931年南京政府派人视察北平各大学后，教育部不得不承认："设备非常缺乏，机器间有损坏，图书馆亦大半有名无实。经费方面，薪金往往占全预算十分之八以上，而设备费则在十分之一以下。"①北京大学每年图书馆经费仅7.5万元，除工资外，其余一切图书设备行政诸费用仅1.5万元。武汉大学1931年12月和1932年1月完全领不到经费，2月份领到的经费不足30%。1933年出版的《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指出："宏大之图书馆，以搜罗图书刊物，供学生之参考，为文法科切要之设备，现在各校文法科，亦多无此项充实之设备也。"1933年交通大学图书馆年购书费2.4万元，同济大学图书馆1.6万元。

国立大学图书馆经费较多，注意聘任学有专长的图书馆学专家，如杜定友、洪有丰、戴志骞、袁同礼等。因此，图书馆藏书规模，馆舍建筑及业务工作，均较其他类型图书馆有成绩。1933年申报年鉴社调查，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藏书23.49万册，清华学校图书馆藏书25.79万册。

1927—1936年，学校图书馆藏书发展较快。为师生提供阅读条件，不少学校除建设校图书馆外，还设立分馆或在各院、系开展图书建设与服务工作。私立南开大学木斋图书馆原为1913年设立的书报室，1919年扩充为图书馆，1928年新馆落成，1933年藏书达15.3万册。北平燕京大学图书馆1919年成立时藏书不及200册，馆址不过一间房。1933年统计，入藏中日文图书187 730册，西文图书19 050册。25万册藏书中，方志藏量居全国第八位。书目服务方面，私立岭南大学图书馆藏书13.1万册，该馆1935年出版《中文杂志索引》，收录1930年以前期刊105种，论文依标题排列。

---

① 教育部训令[N]. 北京大学日刊，[1931-02-21]：2.

但是，大学图书馆发展很不平衡。据统计，1931 年全国公私立大学及学院六七十所，共有图书 2 700 313 册，平均每校约45 600册，其中藏书 20 万册以上 3 所，占全国大学及学院总藏量 1/4，藏书 10 万至 20 万册 6 所，不足 5 万册 36 所，1 万册以下 13 所。专科学校图书馆问题更为突出，1931 年全国公私专科学校 30 所，共有图书 368 195 册，平均每校藏书量仅10 273 册，其中福建法政专门学校 4.5 万册，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 3.6 万册，两校藏书量占全国专科学校总量 1/4 强。申报年鉴社统计全国 36 所大专院校图书馆，1933 年藏书共 2 964 994 册，较 1931 年有所增加。1912 年至 1936 年，全国新建的大规模的图书馆共 30 所，其中大专学校图书馆 18 所，占 3/5。

中学图书馆也有所发展，除上海外，福建等地中学图书馆也随着当时教育事业的发展而有所增加。如厦门市集美、双十、大同、中华等学校图书馆历史较长，设备亦较完善。集美学校图书馆成立于 1920 年，以博文楼为馆舍，面积 7 191 平方米，有普通阅览室、报刊阅览室、史地研究室、中日问题、南洋问题研究室以及晒书台、装订课等。据 1933 年统计，该馆入藏中外图书及期刊合订本13 746种，42 917 册，根据蒋希鲁自编的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进行分类编目。

应该指出，即使在图书馆事业发展较快的战前时期，经费不足、管理落后的问题也十分严重。当时有人指出，国民党政府用于教育的经费极少，用于社会教育者甚微，用于社会教育中之图书费者，更属微中之微。据四川省教育厅调查，1935 年全省 138 所图书馆，藏书共 93 万册，全年经费 91 182.6 元,平均每图书馆仅得 660.7 元。据浙江省立图书馆调查，年经费 2 万元以上的省馆仅 9 所，1 万元的 11 所，青海省馆 1 800 元，西康省馆仅 260 元。浙江省金华县立孝顺民教馆图书馆，经费竟少至 16 元，藏书 102 册，而且“所藏多系从前书院旧物，每多不合时代及不切民众需要之古书，甚至新备了许多低级趣味文艺书及复本等”①。

研究机构所属图书馆发展缓慢。1936 年以前，中央研究院有 4 个研究所成立了图书馆，此外，广东法科学院图书馆，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图书馆及 9 所分馆，北平人文科学研究所图书馆等相继成立。但这些图书馆规模小，藏书量都不大。

我国学术研究机构图书馆为数不多，比较著名的有：

北平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该馆成立于 1925 年，1927 年公开阅览。藏书

① 陈训慈．二十年来我国之民众图书馆及其展望[J]．教育辅导，1936(2):8-9.

13 436 种 302 041 册。以清代史料档案及善本闻名，包括文渊阁《四库全书》和《四库全书荟要》等；中央研究院各研究所均有图书，历史语言研究所图书馆于 1929 年开办，以善本拓片最为丰富，1947 年新增中日文图书 27 万册，并接收北平的人文科学研究所及其图书，改为图书史料整理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图书馆成立于 1928 年，入藏公报资料最多，抗战胜利后，收回被敌伪劫走的图书 1 万多册，心理研究所图书馆成立于 1929 年，地质调查所成立于 1922 年，成立不久已入藏地图和地质图 2 万余幅，到 1947 年藏书 12 万册，其中地质学类图书 7 万册，地质地形图 10 余万幅。

国民政府及考试院、立法院、铁道部、外交部等院部，以及地方政府的下属机构大多设图书馆(室)。教育部图书室创建于 1912 年 6 月，当时集清学部所有图书局、名词馆的中外图书，旁及审定科所存参考书，略依四部之例，次为部居，共计中文书 81 000 余册，东西文书 6 000 多册，并编有书目，标明书名册数，附以版本及著者姓名，便于检索。该室藏书专供本部职员阅览之用，但北京各学校及各学会的职员或学生，持有机关介绍信者，也可请求阅览。1947 年交通部图书馆藏书达 7 万册。这些图书馆(室)不对外开放，只提供各院部所属人员阅览。

上海总商会图书馆，1922 年成立，1932 年藏书近 6 万册；中华书局图书馆成立于民国初年，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图书馆藏书将近 10 万册，1925 年间该馆请杜定友规划，将馆藏图书以科学方法重新整理，使之更便于利用。

我国私立图书馆多是由一些商界人士及知识界人士办起来的。如松坡图书馆就是梁启超为纪念蔡松坡(蔡锷)而设立的。馆藏分本国书和外国书两大部分。本国书凡四库所有者，务必设法搜罗完备。除购置外，还有私人惠赠的家藏善本最受欢迎。外国书英、法、德、俄、日文分橱庋藏。各种科学、文学名著也广为采置。对于新出版的书，则随时购取。

1904 年，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张元济着手筹建图书馆，名为涵芬楼。他搜罗会稽徐氏、长洲蒋氏、太仓顾氏诸家散出藏书，以供编译参考之用。不久，清宗室盛氏、丰顺丁氏、江阴缪氏诸家藏书继续散出，张元济又各购得数十百种，使图书馆粗具规模。此后 20 余年间，搜求未辍。张氏每次去北平，必定捆载而归，仅方志一门，已得 2 100 余种。日本欧美名家撰述和每年出版的新书，数量也不少。藏书区分为 8 门，以“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排序，“天”字为旧书，“地”字为教科书及参考书，依次排列东文书，英文书，日报、杂志、章程，地图、挂图、杂画，照片、明信片，碑帖。1924

年商务印书馆鉴于上海尚无完备的公共图书馆，决定将涵芬楼改名东方图书馆，仍是私立图书馆中规模最大者。新馆舍于3月落成，在新馆三楼，专辟一室储藏善本，仍用旧称涵芬楼。

东方图书馆于1926年5月3日开幕，公开阅览，涵芬楼10多万册藏书全部移置该馆。1928年增设儿童图书馆，为社会服务。1929年设置的流通部，采购新书数万册，读者交纳保证金后，均可凭证借书，并可借出馆外阅读。1930年阅览人数达36 800人次，借阅图书45 517册。

该馆藏书丰富，据统计，新馆落成时已有20余万册，其中中文图书16万册，日文图书15 000册，英文图书2万册，中西文杂志800种约1万册，中西文报章30余种约1 500册，地图2 000幅，各种照片约1万张。1931年底藏书达502 765册，其中中文图书398 765册，善本书籍3 745种，35 083册。除5 370册存于金城银行保险库外，善本均藏该馆珍藏善本陈列室，包括宋元明各朝珍本，《永乐大典》21册等，该馆所藏全国府厅州县志藏量仅次于国立北平图书馆和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居全国各图书馆第三位。此外，还藏有15世纪以前西方古籍，以及大量中外杂志。

该馆设馆长、副馆长各1人，分设总务、中文、西文、流通、研究各部，每部设部主任1人。聘王云五为馆长，总理馆务。馆内书刊管理工作较有条理，图书采用王云五的《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四角号码检字法》进行分类编目，设置卡片目录。全部旧书改为精装直立排架，以方便读者。

1932年1月，日本飞机轰炸上海，东方图书馆五层楼舍焚毁一空，中外文书刊损失惨重。据统计损失普通中文图书268 000册，西文图书8万册；善本书3 203种，29 713册；何氏善本书约4万册；方志2 641种，25 682册;5万套图书卡片；同时包括许多报刊的孤本或珍本，如初版德国《化学药学年鉴》(Libige Annalen der Chemic und Pharmazie)全套，1832—1851年香港出版的《中国汇报》(Chinese Repository)等。1933年商务印书馆董事会决定成立东方图书馆复兴委员会，同年6月该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推选张元济为主席，开始募集图书，筹建馆舍。至1935年共收集中外文图书数万册。馆舍因抗日战争爆发而没有按计划动工兴建。

鸿英图书馆前身为1925年3月创立的甲子社人文编辑部，称人文图书馆，为由黄炎培、史量才等发起组织的人文社所建。1929年筹办，1932年计划建筑馆舍，因经费所限，决定“如有私人独立捐助者，以其人之名命名此图书馆”。实业家叶鸿英捐赠价值约100万元的财产，设立鸿英教育基金董事会，该董事会与上海人文图书馆筹备处商定合并办法，以40万元作为图书馆基金。人文图书馆全部图书归该会，更名鸿英图书馆。1929年筹办，

1933 年成立。1934 年该馆已入藏书刊 42 200 册，选辑史料 939 824 片。图表 155 幅，报刊要目索引卡片 109 682 张。1936 年藏书 150 453 册，日报 136 种。

该馆经多年筹备，于 1942 年暑假后建成新馆正式开放。筹备期间馆内工作一直在进行，分事务、史料、图书、索引四部。该馆藏书为社会科学，以历史类为主，尤以近代史料最为丰富。据统计，该馆搜集人文类日报资料，从辛亥革命到 1946 年底，多达1 813 166件，经剪贴、排比、审定，装订成了 3 526 册，来源于国内各地著名日报。其中《时报》、《申报》等自创刊号起基本完整无缺。到 1946 年底，该馆入藏杂志 3 604 种，107 227 册，自 1930 年起编制论文索引，按期刊登在《人文月刊》上。该刊出版至 1937 年，1948 年 4 月复刊。该馆入藏图书 5 万余册。

私立图书馆往往由学会、会社、团体或个人举办，资金较充裕，收藏各有特色，管理工作也有一些创造，但大部分只对本团体或机构成员开放，有些图书馆要收保证金，使读者受到很大限制。

第二节　抗战时期和战后的图书馆

一、图书馆事业概况

1. 抗战时期的图书馆

抗日战争期间，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文化事业进行了疯狂的破坏和掠夺。图书馆设施毁于日军炮火中，被劫掠者不计其数，大量珍藏图籍散失，遭受水火之灾。“七七事变”后许多著名大学，如南开大学、上海暨南大学、长沙湖南大学等全毁于日军炮火。湖南大学 1935 年藏书已达 8 万册，1938 年日军在该校上空投下约 50 枚炸弹，20 分钟内学校炸成废墟，全部藏书亦化为灰烬。1940 年清华大学图书馆运往重庆的全部宋元版、雍正本《古今图书集成》、《大清会典》以及县地方志等馆藏古籍精华，遭日机轰炸北碚，全部珍本被火海吞噬，学校员工仅从灰烬中抢出残本 2000 余册。该校一整套中国近代史料，在战火中全部焚毁。南开大学图书馆于 1937 年 7 月被日军炮火全部夷为平地。浙江、上海、南京、广西、汕头等地省市立图书馆的馆舍与藏书或全毁于战火，或遭严重损失。1939 年甘肃省立图书馆被炸，损失惨重。

据资料所载，抗战一年来全国图书馆损失 2 166 所。详见表(18-2)：

表 18-2 抗战一年全国图书馆损失表

南京	53 所	上海	173 所	江苏	300 所
浙江	377 所	安徽	111 所	北平	96 所
天津	36 所	河北	176 所(不计一年前冀东 22 县所失)		
青岛	12 所	山东	276 所	威海卫	5 所
山西	127 所	河南	392 所	察哈尔	13 所
绥远	19 所				

南京 53 所图书馆中，43 所共损失藏书 1 712 238 册，平均每馆约 4 万册。上面所列 2 166 所图书馆即使平均每馆藏书 4 万册，损失藏书即达 866.4 万册。① 1942 年全国图书馆数锐减为 1 135 所(《中华年鉴》1948 年)。

内迁或疏散的图书馆，在辗转迁徙途中。大批图书散失。山东大学、上海医学院、唐山工学院等大学图书馆，以及安徽省立图书馆均遭此厄运。中央大学图书馆内迁前藏书 40 余万册，1937 年迁四川，途中沉没 10 余箱，并遭日机轰炸。该馆到 1948 年藏书只有 18 万册。广东省立图书馆原有藏书 3 万多册，多为罕见珍本，1945 年疏散途中，损失一半。广州中山图书馆 1938 年馆舍被日本海军武官府霸占，馆内近 10 万册书刊被日军劫掠而去。

公共图书馆有的馆舍与藏书全毁于战火。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藏书丰富，到 1935 年达 20 多万册，其中多为宋元明清历代珍本，以及钱塘丁氏藏书 8 000 卷。抗日战争期间，该馆寄存在苏北兴化县的木刻图书及各省方志 6 803 册全被日本侵略者焚毁。清朝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历代非常有历史价值的江南各官署档案，已经清理的 6 486 宗，未清理的 60 多大篓；片纸不存。该馆印发的馆藏稿本、宋元书影等，1937 年尚存数万册，也被敌伪劫掠一空。1927—1937 年的各种日报 1894 大册又 19 本被焚毁变卖。浙江省立图书馆藏书有清朝文澜阁《四库全书》及许多善本书籍。1937 年至 1944 年，该馆为保存《四库全书》，历尽艰辛，迁徙于浙、黔、川等省。因馆舍被毁不能使用，藏于龙泉的善本、方志，以及留在杭州的报纸、合订本杂志等，多被盗卖，或散落于外省。广西省立桂林图书馆 1937 年有藏书 20 多万册，其中新旧图书各占一半左右。1944 年日军侵入桂林，该馆仅保存比较重要的图书 7 万余册，其余 20 万册书刊均遭损失，馆舍全部被焚毁。由于

①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第五辑. 第二编 · 教育(一)[M]. 367-369.

遭此浩劫，该馆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仅有藏书8万多册。江苏省立镇江图书馆1935年藏书11万册，1947年仅为4 200册。安徽省立图书馆1935年已有藏书17 657种，196 161册，包括本省方志80多部，以及春秋楚器718件，价值昂贵。抗日战争期间，该馆将图书分藏各地区，由于战乱，1943年荡然无存，馆务工作被迫停止，1947年藏书31 430册。

私人藏书楼也成了日本帝国主义劫夺的对象。上海王绶珊的杭州九峰旧庐入藏地方志3 000多种，吴兴嘉业堂刘氏、常熟铁琴铜剑楼、苏州滂喜斋、天津木樨轩等著名私人藏书也都遭到劫掠。

1940年4月24日美国调查委员会关于日本在华文化侵略种种罪行的一则新闻报道："中国损失书籍达1 500万册，其中若干为稀有之古版，以及手抄之古书。日本在华出版华文报纸100种，华文刊物及小册子教科书900余种。"

图书馆的破坏，严重影响图书馆工作的开展。北京大学图书馆在北平沦陷时全部藏书几乎陷于敌人手中，清华大学抢运出来的部分图书途中遭轰炸，损失严重，其结果，1937年至1938年两校与南开大学在长沙会办长沙临时大学(后改西南联大)时，中外文图书仅有6 000册，无法满足教学需要，不得不与南迁长沙的北平图书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书籍管理部门商定供书办法。8年抗战，西南联大收藏的中外文图书总数不过48 000册，其中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外文期刊合计不足百种，学生借阅必读参考书也十分困难。

日本侵华战争是我国图书馆事业的一场浩劫。在沦陷区，日本帝国主义疯狂掠夺我国珍贵文物图书，派出所谓"科学调查团"(由日本的各种科学家，包括图书馆学和版本学家组成)到处进行抢劫活动。日本宪兵和警察到各图书馆搜查，凡属进步书刊全部烧毁，珍贵文物图书则劫走。南京是当时国民政府所在地，中央研究院、中央图书馆、国学图书馆以及各政府部门均收藏大量图书文献。南京沦陷后，大量图书文献成了日本侵略者掠夺的对象。据日本《赤旗报》1986年8月17日载文揭露，当时日军上海派遣军特务部长命令"立即检查南京市内的重要图书，准备接受。"于是派员检查了南京可能有重要书籍和文献的地方共70处，派出特工人员、士兵近700人，雇用劳工800多人；共动用卡车310辆次，花费一个月时间，将88万册图书劫运日本。被劫运的图书包括日本侵华战争以前种类齐全的中国政府中央和地方的公报。当时最新的对中国经济产业的调查和事业计划，还有3 000多册清朝历代皇帝《实录》。比当时日本最大图书馆帝国图书馆藏书还多3万册。因此日本人也认为是一场"文化大屠杀"。被劫夺的图书仅有少量于抗

日战争胜利后追回，绝大部分荡然无存。不少珍贵古籍善本流落外国。清华大学 1939 年春遭日本陆军野战医院一五二病院进驻，图书馆成了医院本部。图书馆约 30 万册书刊，分别被日本军部、满铁北支经济调查所等劫取。西文贵重图书多运往日本，1945 年陆续收回部分书刊，已损失过半。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在我国东北地区实施殖民统治长达 14 年之久，图书馆遭受日军炮轰、焚毁、占为兵营，整个东北地区图书馆数量由 1930 年的 137 所减少为 1931 年的 95 所，减少大 31%。据伪文教部档案记载，1932 年 3—7 月，日伪在东北地区焚书达 650 万册之巨。

据有关资料统计，北平沦陷期间被掠夺和焚毁的公共图书馆和高校图书馆藏书达 448 957 册，私人藏书 137 471 册；上海地区截至 1947 年公共藏书损失 264 715 册，私人藏书 25 726 册；南京沦陷期间公共藏书被毁被掠 459 579 册。日军炮火所及，铁蹄所到之处，图书馆均遭受馆舍图籍焚毁之灾。

在扫荡毁灭我国宝贵的文化资源的同时，日本众多的图书情报机构进行的大量情报资料和书刊的搜集整理研究工作，构成了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全方位的文献信息资源体系。而利用日本及其帮凶出版发行书刊，设立图书馆宣传、实施奴化教育，妄图长期占领中国，它的作用不容低估。

南满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于 1906 年在大连设立，它与关东军司令部是日本早期对我国进行殖民统治和经济掠夺的两大主要机构。满铁成立第二年(1907 年)即在调查部属下设立图书室，1919 年 9 月建成新馆舍，10 月正式向社会开放。命名为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图书馆，1922 年改称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大连图书馆。据有关资料，1907—1919 年满铁共建立图书馆 14 所，到 1935 年增至 29 所，大部分集中在大连及铁路沿线。除了南满大连图书馆，还建立了满铁哈尔滨图书馆、满铁奉天图书馆、南满洲长春图书馆等图书馆(室)，形成了完备的收藏、利用中国情报资料的系统。

满铁会社明确规定，满铁大连图书馆为“会社业务参考图书馆，兼代公共阅览。”它的业务范围是：搜集整理有关整个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历史、文化、教育、社会等各个领域的文献资料，并进行相关的调查研究，以满足满铁对所需文献情报资源的利用。

通过采购、社会征集和公开掠夺等手段，满铁大连图书馆入藏的文献资料至今还没有准确数字，仅 1937 年 12 月—1938 年 3 月该图书馆派员赴沦陷后的上海、南京等地“接管”和“整理”的文献资料即达 80 多万册。到 1945 年日本战败投降前，该馆已形成完整的藏书体系，包括：

中文古籍20多万册，其中囊括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1 662个县的古代方志2491种；舆图1 200多种5 000多幅；清代内阁大库档案资料原件2 051件。

日文书刊资料179 416册，主要包括对中苏等调查资料4 000多种，调查地域北抵黑龙江，南至海南岛，中国东北地区地方文献设"满蒙文库"专门入藏；日本问题研究文献资料2.8万多种，不少资料日本国内缺藏；有关东南亚地区和中东地区文献资料，设东南亚文库专门入藏。

西文书刊3万多册，包括远东文库收藏的6 705种有关东西方关系史料，18世纪西方出版的有关中国研究的书籍。还入藏约3万册俄国人研究中国东北地区、蒙古和西伯利亚地区的俄文书籍。①

创设于1911年的满铁上海事务所调查课曾收集有关中国共产党的资料25万册。1920年、1937年满铁和日本图书馆协会曾两次在大连举行日本全国图书馆大会。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满铁图书馆所掠夺的我国文献资源在交接前后，被大量盗运散失或暗自焚毁。抗战期间，日本掠夺我国文化典籍的机构遍及华北、华中和华南。日本的华中占领地区图书文献接收委员会在南进地区掠得图书达88万册。

在沦陷区，日本还建立了许多图书馆，进行对华情报的搜集整理，比较主要的有：

北京近代科学图书馆。该馆是日本在华设立的最大的图书馆，隶属日本外务省文化事业部，分设"本馆"和"分馆"。"本馆"设立于1936年，地址在东城王府大街9号；"分馆"设立于1938年6月，地址在西城小酱坊胡同。该馆藏书31万册，杂志600余种，报纸40余种，基本是日文书刊。除了从事图书情报业务外，还负责编写日本在中国的日语教学及教材。

上海近代科学图书馆。该馆也是设立于1936年，隶属日本外务省文化事业部，地址在四川路149号。该馆藏书13万册。

东亚考究会图书馆。该馆设立于1920年11月，地址在上海欧阳路二二一女校内，主要搜集入藏与东亚有关的图书资料，包括地方志等。

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使我国图书馆事业遭受了一场浩劫。然而，我国广大图书馆工作者同仇敌忾，坚守岗位，为了挽救祖国文化遗产而历尽艰辛，忍受搬迁之苦，有的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广西省立南宁图书馆馆长和7名馆员将全部图书10余万册从南宁运往百色。安徽、湖南、湖北等8

① 郭铁桩，关捷主编. 日本殖民统治大连四十年史(下册)[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第17章日本对大连的文化侵略.

个省立图书馆都曾在省内迁移，并争取为民众开放阅览。陕西省立第一图书馆为提高人民抗日情绪，曾于1932年3月19日专门开设抗日图书研究室，提供图书利用。在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一些大学图书馆也仍千方百计为师生提供教学图书。西南联大图书馆同仁在严文郁先生的领导下，到后方采购，向国外索求，严先生曾写信给当时驻美大使胡适，寻求海外捐赠。在图书馆员的共同努力下，西南联大图书馆的馆藏得以不断扩充，入藏的六七千册外文书籍主要由牛津、剑桥、哈佛等大学捐赠，英国李约瑟教授访华时也赠送不少生物学书刊和缩微胶卷，校内的教授也将自己的藏书提供学生使用，学校的图书馆和各分馆、系图书馆(室)也积极开展借阅服务，以保证西南联大教学工作的开展。

2. 抗战胜利后图书馆概况

1945年8月15日日本侵略者无条件投降。国民党当局为了维护和巩固其独裁统治，在美国支持下，一方面玩弄和平阴谋，一方面准备发动大规模内战。当时各式各样的“接收大员”借接收之名，大肆搜罗珍本古籍，私吞盗卖，任意破坏。但是，许多图书馆界和文化界人士为恢复和发展我国图书馆事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抗战胜利后，当时的上海东方经济研究所所长邓葆光通过汤澄波，接收了上海日本领事馆的图书档案资料，伪满铁上海办事处和上海日本工会议所的图书和秘密资料，以及汉奸周佛海、梁鸿志等20万册藏书，以此为基础，于1947年7月9日成立上海东方经济研究所上海东方经济图书馆。其中日本领事馆档案内有大批抗战期间共产党地下活动的材料。同时还包括《明实录》一套500册，《清实录》10册，是伪满洲国编辑的清朝重要档案。新中国成立前夕，邓葆光不畏国民党特务软硬兼施甚至暗杀的阴谋，几经转徙，终于将其中由中共地下党员占自佑整理并珍藏的共产党地下活动情报，以及珍贵图书7万册，包括大量善本书籍，秘密运回到人民手中。邓葆光为保护珍贵图书和资料作出了重大贡献。

此外，广州市立图书馆于1945年恢复后，接收伪市立图书博物馆图书10余万册。湖北省立图书馆1945年将迁往恩施的图书大部分运回武昌并接收敌伪图书16万册，其中包括收藏齐全的华中各县通志等珍贵图书资料，1947年藏书增至30万册。贵州省立图书馆亦于1945年12月开始征募图书、各界人士在离黔回乡时，纷纷将方志和其他图书捐赠该馆。广东省立图书馆1946年迁回广州后，努力进行图书的收集工作，先后接收敌伪时期广东省立图书馆藏书75 095册，汪精卫私人住宅藏书12 712册。包括全套《大清实录》和《图书集成》，在香港收回前意大利领事罗斯授予台湾总督府的广东专

藏100箱，共27 466册，以后又陆续接收和收回1万多册图书，这些藏书充实了图书馆的馆藏。

当时很多战时内迁疏散的图书馆相继迁回图书馆所在地，并开展了一些整理和流通工作。但在回迁过程中，由于缺乏交通工具，行动非常缓慢。国立北平图书馆存放在四川、云南的图书直到1947年才逐渐运到北平，存放在上海的图书到1948年还无人问津。其他图书馆困难更大，使图书受到更大损失。

战后经济危机空前严重，但国民党当局一方面加强对文教事业的控制，另一方面还要维持其庞大的军政开支，一再压缩文化教育经费。用于图书馆事业的经费更少得可怜，不仅各图书馆无法弥补战争中的损失，而且连日常工作也很难开展。大批图书馆不得不停办闭馆，图书馆工作人员大批失业。向达在《战后两年来的国立图书馆与博物馆》一文中指出："经费困难，使得各图书馆经日愁眉苦脸，一筹莫展，其中又可分为两点，一是因为无钱，于是兴修建筑不能开始或完工，以致影响到全部工作的推行和发展。二是因为无钱，于是眼看着有许多古代的文物书籍，应该保存，值得保存的，流落市尘，慢慢转到私家，或竟人异域。"

据《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全国公立图书馆经常费及藏书一览"所列资料统计，1947年全国省市县单独设置的图书馆418所，附设于民众教育馆和机关社团的图书馆792所，包括大中小学在内，学校图书馆1 492所，全国共有图书馆2 702所，仅为1936年一半多一点①。其中机关团体附设的图书馆遭受战乱损毁最严重，数量跌降最大，从1936年的2 542所减少到1947年的76所。

经费枯竭不但造成图书馆数量减少，而且影响仅存的图书馆工作的开展。广东省立图书馆1946年1至8月全部购入新书仅43册。1947年，湖北省立武昌图书馆(即湖北省图书馆)全年仅购置图书91册，期刊582册，报纸35份。四川省图书馆藏书1935年为166 120册，1947年仅为52 155册，1949年补充的图书、报刊总数为69册。上海市的图书馆从抗战结束到解放前夕，每天到馆阅览的读者平均人数最多时为150人左右，最少时仅40～50人，在将近四年中。领取借书单借书的人数不到1万人。

抗日战争胜利后，一些大学图书馆藏书有所增加，但发展很不均衡。据《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统计，1947年全国公私立大学及学院115所，各校图书馆藏书量平均54 288册，但事实上馆藏量低于平均数的达82所，占学

① 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M]. 823-824.

校总数70%以上。每个学生拥有图书量从1931年的84册下降为54册。专科学校情况更为严重，1947年全国60所私立专科学校，各校平均藏书量从1931年的10 273册下降为7 605册，实际藏书量不足平均数者多达48所，占学校总数80%。大学中藏书最丰富的北京大学图书馆，藏书从抗战前30万册增至50万册左右，但藏书内容以古代历史、文学方面线装书居多。五四以来新书入藏很少，自然科学书籍多为外文图书，有的学科内容稍多一些，如力学有10种，每种5，6册，有的就很少，如动物学有的仅入藏1种1、2本，而且往往被教授助教借用，学生很难借到。武汉大学1936年藏书已达14余万册，1947年藏书较1936年只增加1万册，复员后两年，图书馆才全部开放。私立大学如广州岭南大学图书馆1949年统计，藏书达275 000册。

此外，一些馆舍被占用，如1948年7月—9月，国民党陆军整编第十师司令部借驻湖北省立武昌图书馆，使大量馆藏版片被损毁。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但由于历史原因，民族地区图书馆事业一直处于落后状态。民国时期在民族聚居的地区，仅有图书馆14所，广西壮族自治区8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3所，吉林、湖北、云南各1所。

上述事实说明，抗战后我国图书馆事业呈现一派没落衰败景象。

二、图书馆法令的制订与实施

民国成立后，中央和各级政府对于各时期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曾制订、公布了一些法令和措施。

1912年8月2日，临时大总统公布修正教育部官制12条，其中第9条社会教育司执掌事务第2项为关于博物馆图书馆事项，第8项为关于通俗图书馆巡行文库事项。同年5月，直隶总督张金波公布城镇乡村均应设图书馆之命令。

1913年9月18日，教育部公布教育部图书室规则10条。湖南省教育司长唐联璧提出扩张教育的9条措施，其中第3条拟于省城设立通俗图书馆及巡回书库。

1914年教育部在直隶巡按使申请立案的通俗图书馆章程中，删除收费一语，教育部认为通俗图书馆应以不收费为原则。

1915年10月23日，教育部颁布图书馆规程11条。通俗图书馆规程11条。

1916年3月6日，教育部通令“……凡国内出版书籍，均应依据出版法，报部立案，而立案之图书，均应以一部送京师图书馆庋藏，以重典策，

而光文治……"11 月 20 日，教育部通咨各省，请各省通饬各省县图书馆于搜藏中外图籍之外，尤宜注意于本地人士之著述，以保存乡土艺文。

1918 年江苏省第三届教育行政会议议决规划社会教育进行案，第二条甲项设置图书馆等，经教育厅通令各县施行。

1920 年 4 月 2 日，浙江省教育厅制定通俗图书馆章程、通俗图书馆阅览规则及通俗图书馆职员办事细则等，教育部准予备案。同年 5 月内务部通饬"……各县立图书馆，应将公私藏书，及旧刻板片，印刷器物，一律切实搜求，以保存之……"

1923 年国民政府公布教育部组织法 24 条。第 10 条社会教育司职掌第六项为关于图书及保存文献事项。

1924 年 2 月 23 日，教育部公布国立大学条例 12 条，第九条规定国立大学校设图书馆……

1927 年国民党政府设立大学院，作为全国教育行政及研究学术的机关。大学院下设教育行政处，该处下分 6 个部门，其中有图书馆组、国际出版品交换组。图书馆组负责国立图书馆、学校图书馆、公立图书馆以及保存文献等工作。同年 12 月大学院公布《图书馆条例》共 15 条，《新出图书呈缴条例》共 4 条。

1928 年 7 月 16 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修正通过"取缔各种社会教育机关违背党义教育精神通则"，对于所谓"违背党义教育"的言行者，"应严格取缔分别惩处"。据教育部 1930 年 10 月 27 日的文件解释，图书馆属于社会教育机关，因此也需受到各级国民党党部的监督纠正。

1929 年湖南省教育厅提经省府议决成立全省各县民众图书馆，并以省款预购《万有文库》84 部作为各县图书馆的基本藏书。

1930 年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颁布《新出图书呈缴规程》6 条、《图书馆规程》14 条和《私立图书馆立案办法》。规定"各省及特别市应设图书馆，储集各种图书供公众阅览。""各省市县所设之图书馆，称公共图书馆，私法人或私人所设者，称私立图书馆"。"公立图书馆除搜集中外各种书籍，应负责收集和保存本地已刊、未刊各种有价值之著作品。"同年 9 月 22 日教育部公布"华侨商会倡办民众图书馆或附设民众书报阅览处办法"10 条，"以启迪侨胞知识，宣传祖国文化"。该办法对民众图书馆和民众书报阅览处大沽组织管理、馆藏设备等作详细规定。同年 7 月 1 日，教育部训令"教会学校图书馆不得陈列宗教书报及画片"。10 月 30 日教育部修正公布鉴定禁运古籍须知。

1932 年 2 月 2 日，教育部公布"民众教育馆暂行规程"，其中第 8 条规

定省市及县市立民众教育馆需设立阅览部包括巡回库、民众书报阅览所等，书报杂志图表公开阅览。

1933年教育部公布《中学规程》120条。第44条规定中学应具备的重要场所中，第5项为图书馆或图书室。

1939年教育部颁布《民众教育馆辅导各地教育办法大纲》，规定省立图书馆有辅导民众教育的责任。《社会教育机关协助各级学校兼办社会教育办法》中，规定各省市县图书馆应协助本地区各学校兼办社会教育，介绍并借予各学校兼办社会教育之教材：办巡回文库，借给各学校所兼办之民众学校及家庭教育班读物。

1939年7月22日，教育部公布《修正图书馆规程》33条。规程中对省市立和私立图书馆的设置、组织机构人员要求等作出了详细规定。1947年4月1日又公布内容基本相同的《图书馆规程》，规程仅增加图书馆会计事务的有关条款。在《修正图书馆规程》和《图书馆规程》中，详细规定了省市县立图书馆的机构设置、馆长及各级负责人的资格、工作时间、经费分配、计划与工作报告等各项内容。

1939年7月24日，教育部依据《修正图书馆规程》第8条和第9条规定，制订并公布《图书馆工作大纲》，大纲共18条，详细规定了图书馆的任务，服务对象，各级图书馆中各部门的工作内容，工作实施与考核等。根据《修正图书馆规程》和《图书馆工作大纲》，同年还公布《图书馆辅导各地社会教育机关图书教育办法大纲》。这一系列图书馆法令的公布，与当时“战时教育”方针的实施有一定关系。

为了普及全国图书教育，提高文化水平，1941年教育部公布《普及全国图书教育办法》，1943年、1944年进行修正。该办法规定县市图书馆及乡镇书报阅览室选购图书的原则，首先是“阐扬三民主义”，其时的所谓“三民主义”，实际上是国民党实行的“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法西斯主义。当时正值国民党在全国又一次掀起反共高潮，这一办法的公布，目的是利用图书馆藏书进行反动宣传。同年还公布《各级学校及各机关团体设置图书馆(室)供应民众阅览办法》。

1944年教育部公布《图书馆工作实施办法》，该办法根据图书馆规程，详细规定了各级图书馆业务部门的工作内容、辅导工作的范围等。

1948年教育部公布《大学法》，其中规定“大学图书馆规模完备者，得置馆长一人，由校长聘任。”

国民党政府制定一系列图书馆法令，其目的是为了加强对图书馆事业的控制，但是，由于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和经济危机，图书馆事业和整个文化教

育事业一样，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因此，虽然国民党政府公布了不少图书馆法规，但其实施效果距离法规的要求相差甚远。

三、图书馆事业的组织管理

自清末至民国时期，图书馆的行政管理一直隶属于教育部门。

光绪三十二年(1906 年)，清政府创设提学使司作为新式省一级教育行政机关，受学部和省督抚领导。提学使司下设学务公所，学务公所下分六课：总务课、专门课、普通课、实业课、图书课、会计课。

1912 年国民政府成立，图书馆属教育部主管。1914 年 7 月颁布“教育部官制”，规定总务厅负责“学校、图书馆博物馆等修建事项”。社会教育司负责“博物馆图书馆事项”和“各种通俗博物馆、通俗图书馆事项”①。1918 年 12 月《教育部分科规程》中，规定总务厅下属庶务科负责“本部所辖学校图书馆博物馆等修建事项”和“调查公立私立学校图书馆博物馆等设置及图案事项。”社会教育司下属第一科(图书博物科)负责“博物馆图书馆事项”。第二科(通俗科)负责“通俗图书馆巡回文库事项”。1928 年 6 月颁布《修正中华民国大学院组织法》，规定大学院下设文化事业处，负责“图书馆及保存文献事项”。大学院直接管理的国立学术机关中包括中央图书馆。1928 年 5 月，浙江、江苏等省首先执行《修正大学区组织法》。江苏中央大学区设扩充教育处，负责公立图书馆事务。1929 年 1 月教育部颁布的《各司分科规程》中，规定社会教育司第一科负责“关于本部图书馆事项”，第二科负责“图书馆事项”。1931 年 7 月颁布《修正教育部组织法》，规定教育部下设社会教育司，负责“图书及保存文献事项”。

大学区取消后，恢复省教育厅制，规定教育厅负责“图书馆、博物馆、公共体育场事项”。为此，湖北省教育厅第三科负责“图书馆博物馆等事项”。在县教育局的条例中，规定县教育局负责“学校图书馆博物馆……及其他文化事业。”

关于图书馆内各级机构的设置及其职能范围。1939 年公布的《修正图书馆规程》及《图书馆工作大纲》中均有详细规定，省市图书馆管理机构为：

总务部　文书、会计、庶务及其他不属于各部的事务。

采编部　选购、征集、交换、登记、分类、编目等业务。

阅览部　阅览、库藏、参考、互借等业务。

特藏部　金石、舆图、善本、地方文献等业务。

① 见《第一次教育年鉴》甲编教育总述[M]．34-37.

研究辅导部　调查、统计、研究、实验、视察、辅导、图书馆工作人员之进修与训练及各项推广事业。

县市立图书馆设置总务组、“采编组、阅览组、推广组，前三组的工作范围与省市立图书馆所属各部相同，推广组负责演讲、播音、识字、展览、读书指导、补习学校及普及图书教育等业务。

地方自治机关、私法人和私人设立的图书馆，其内部组织及职员资格，按规定应对照县市图书馆。

事实上各省市图书馆的组织机构除总务部门外，其他业务部门简繁不一。江苏省立第一图书馆分设保管、编辑、阅览、传抄、访购、印行六个部。浙江省立图书馆则设中国文、外国文二部。山东省立图书馆设编藏部、阅览部和图书委员会。江西省立图书馆则设典藏股、编目股、阅览兼推广股。上海市图书馆成立时，设立征集部、编藏部、流通部、参考部。

四、国家图书馆

1936 年以前已建两所国家图书馆：国立北平图书馆和国立中央图书馆。20 世纪 40 年代先后有以下 3 所地域性国家图书馆成立或筹备：国立西北图书馆、国立西安图书馆和国立罗斯福图书馆。

1. 国立北平图书馆

国立北平图书馆前身是清末学部的京师图书馆，1909 年，学部奏建京师图书馆，称“图书馆为学术渊薮。京师尤系天下观听，规模必求宏远，搜罗必极精详，庶足以供多士之研求，昭同文之盛治”（见《学部奏筹建京师图书馆摺》）。遂定该馆址为什刹海的广化寺，并决定把热河文津阁藏《四库全书》，内阁大库旧藏及《永乐大典》残本移交图书馆，又购求湖州姚氏、扬州符氏等藏书家的书籍送交该馆庋藏，以充实馆藏，著名目录学家缪荃孙被任命为该馆正监督。当时，革命风暴正在酝酿，清王朝面临崩溃，该馆虽经筹建，但未开放。1912 年 7 月馆长江翰呈报教育部批准京师图书馆阅览章程 18 条。同年 8 月 27 日正式对外开放。1913 年 2 月，江瀚调任他职，教育部派社会教育司司长夏曾佑负责管理该馆。1913 年 10 月，教育部以京师图书馆什刹海广化寺馆址地处偏僻，交通不便，读者寥寥，同时，地势潮湿，不宜保藏书籍为理由，决定该馆暂时停办，图书等物品移储教育部，酌留馆员数人在分馆借地办公，另行筹觅馆址。

鲁迅在 1912—1926 年任职北洋政府教育部期间对京师图书馆的建设和发展，留下不可磨灭的功绩。

首先，在组织管理方面，京师图书馆 1913 年 10 月 9 日停止阅览，但各

项工作在鲁迅的指导下，均照常进行。鲁迅在该馆停止阅览之际，督促馆员将所有藏书均“分别部类，编列号数，刊印标签，逐册粘贴，依序陈列，以便收发检查”。鲁迅特别关心该馆所藏的古本书籍，为保护古籍免遭焚毁，他叮嘱馆员要勤加修补，以便保存。

其次，鲁迅为京师图书馆的丰富馆藏奠定了基础。京师图书馆开办时的藏书量，共计5 424部，151 375卷，52 326册，其中善本藏书880部，28 412卷，10 822册，阅览书4 544部122 963卷，41 504册。另外，还有敦煌石室唐人写经长短卷计8 662卷。鲁迅为了充实馆藏，多次以教育部的名义向全国征集图书资料。1912年，教育部咨调各省官书局所刻书籍入藏该馆。当时，直隶、奉天、吉林、黑龙江、山西等十余省均陆续将官刻书籍缴送该馆。1913年9月，教育部拨给该馆一部《古今图书集成》。鲁迅为了给京师图书馆开辟永久的、固定的书源，于1916年4月曾以教育部的名义，通过政事堂，取得内务部的同意，通知京内外，凡经内务部立案出版的图书均应分送京师图书馆一份庋藏，但尚未实行。1917年3月，又以教育部名义咨呈内务部，请其申明前案。同年4月，内务部咨复教育部已通知京内外，认真办理。从此，国内出版物呈缴京师图书馆一份有了明文规定，并一直沿袭至今。

此外，地方志和金石拓片等的重要资料也以教育部的名义大批征取，请各地转交该馆。鲁迅还经常将书刊赠与该馆，包括古今中外的书籍和刊物，如他自己辑录的《会稽郡故书杂记》，章太炎所著《小学问答》的自写精刻本等。同时，经过鲁迅的力争，《永乐大典》和《四库全书》入藏京师图书馆，成为北京图书馆馆藏的两部举世闻名的珍贵典籍。

在京师图书馆改组期间，鲁迅同工作人员积极做好重新开馆的准备工作，几经周折，最后决定安定门内方家胡同的清国子监南学旧址为京师图书馆馆址，并于1917年1月26日举行开馆仪式。开馆后由于政局不宁，经费艰绌，仅能维持，10年间停滞不前。

1925年10月，教育部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订立合办京师图书馆契约，成立京师图书馆委员会，聘梁启超、李四光为正副馆长。由于时局与财政支绌等因素，契约未能履行。1928年7月18日，大学院行文，京师图书馆改名为北平图书馆，隶属大学院，并派陈垣、马裕藻、马衡、陈懋治、黄世晖五人为筹备员，成立北平图书馆筹备委员会，1929年6月教育部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决定，国立北平图书馆与北平北海图书馆合并，称国立北平图书馆，合聘蔡元培为馆长，袁同礼为副馆长，订立合组国立北平图书馆办法9条，后又公布国立北平图书馆委员会组织大纲10条。1931年6月

25 日，国立北平图书馆新馆举行落成典礼，前北平图书馆与北海图书馆均迁入。

国立北平图书馆一直是国内规模最大，藏书最多的国家图书馆。1929—1935 年，该馆每年入藏书刊 2.7 万册～4.8 万册，据该馆《国立北平图书馆概况 1929 年 10 月》“藏书”数字统计，馆藏为 367 661 册(件)，《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务报告》所载数字统计，1936 年 6 月止藏书 411 647 册(什)，1938 年 6 月止，藏书 438 150 册(件)。据许晚成编《全国图书馆调查录》(1935 年出版)所载，该馆藏书达 70 万册。其中包括全部《四库全书》文津阁藏书，清翰林院、国子监、内阁大库等旧藏善本，金石拓本、明清内府舆图等，以及私人藏书家和中外人士寄存的善本古籍。此外，与北海图书馆合并前，两个图书馆入藏的普通图书各有侧重，合并后，该馆藏书亦拥有相当数量的自然科学书刊。

国立北平图书馆从 1930 年开始着手建立全馆总目录，聘请刘国钧主持编目工作，谢国桢协助，新目录主要是卡片目录。与此同时，进行中文编目条例的修订工作，扩充为 14 章 98 条，对著者、书名、版本等项目和著录方法作详细规定，使之成为当时国立图书馆仅有的编目条例。

国立北平图书馆比较重视书目索引的编制工作。1929 年编制并出版《北平各图书馆馆藏西文图书联合目录》，共 4 册。第四册为期刊目录，共收北平 29 所图书馆及一些学术机关馆藏西文书籍 85 000 余种，卡片 10 万多张。1936 年 1 月国立北平图书馆开始每周发行印刷目录卡片，同年 10 月编为书本目录，分期发行，由于战局影响，此项业务于 1937 年 7 月份中止。1936 年全年编制专题书目 59 种。

国立北平图书馆的组织机构，由正副馆长与七名委员组成一个图书馆委员会，主持全馆工作。下设购书委员会、编纂委员会和八个部：采访部、编纂部、阅览部、期刊部、金石部、舆图部、善本部、总务部等。部下设业务组，例如中文编目组、外文编目组、中文期刊组、外文期刊组、阅览组、索引组。

1936 年以前，国立北平图书馆编辑出版的出版物，包括《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务报告》(年刊，1926 年 3 月—1938 年 6 月)，《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1928 年 5 月创刊，曾用《北京图书馆月刊》、《北平北海图书馆且刊》、《国立北平图书馆月刊》等名，1930 年 4 卷 1 期起用现名)，《图书季刊》(1934 年 3 月创刊，七七事变后停刊)。此外，还出版许多目录、索引和图书，如 1933 年出版的《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等。

1937 年 7 月北平沦陷，沦陷期间，北平图书馆员工为保护图书设备，

恪尽职守，尽量减少损失。1937 年该馆派员南下，馆务分北平、南方两部分。1938 年春北平图书馆长沙行馆奉命迁移昆明，与西南联大密切合作，由双方合组图书馆，该馆派工作人员参加工作，所订购的西文期刊及各种书籍，凡属该大学需要的皆送往该校借用，以供研究。并与该校图书馆共同编制“中日战事资料”等索引、汇辑。1938 年冬，北平图书馆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合办“中日战事史料征集会”。北平图书馆与西南联大的合作直到 1939 年底结束。1940 年春在重庆沙坪坝设立办事处，办理采访工作。为了协助全国图书馆的复兴，北平图书馆联合中华图书馆协会向国外征集图书，于 1938 年 1 月派员赴香港筹设通讯处。

北平图书馆所有图书大多存于北京。沦陷期间，日伪曾强行提取图书 30 箱，生物书 460 余种。迫令迁让部分馆舍，该馆曾将特藏英国印刷珍本 100 多种运往南京寄存，被日军劫取。前京师图书馆特藏清内阁大库舆图共 18 箱 277 种，均属珍品孤本，1936 年运南京存于故宫博物院，南京沦陷，被日军劫持，由于保管不善，舆图均受损霉湿，抗战后被运往台湾。1941 年 10 月，北平图书馆将宋元明善本中最精部分挑选 2 720 种 20 738 册，包装 102 箱启运美国，寄存于华盛顿国会图书馆，1943 年国会图书馆将全部精藏拍摄成显微胶卷，1965 年 11 月运往台湾“中央图书馆”。1945 年 10 月教育部派员接收北平图书馆，该馆进行了为期两年多的接收整理工作。主要是增设书库、阅览室；增加馆藏；编撰工具书等。据有关资料 1948 年藏书概数约 115 万册。1949 年约为 140 余万册。由于购书费严重不足，北平图书馆自 1940 年后馆藏增加很少，每年仅为 3 500 ~7 000 册。

1948 年 12 月 20 日，馆长袁同礼飞离北平，王重民代理馆务。王重民翌日赴任时，立即在致全馆员工的公开信中，提出当前的急务，一是保护馆产和图书，二是共谋同仁的安全和福利。1949 年 1 月 28 日的公开信的第一句话是：“北平将要随着和平而全面解放了！我们图书馆的情况，也将要随着解放而改善，我们同仁和工友们维护本馆，努力工作的情绪和速率，也将要随着改善而增加和猛进。”要求“从现在起，更应该加紧工作，加强工作，加紧加强到不浪费一点办公的时间，不剩下一点自己所能使用出来的劳力！”1949 年 2 月 13 日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文化接管委员会正式接管国立北平图书馆。

2. 中央图书馆

1912 年(民国元年)南京临时政府筹备建立中央图书馆，后因政府迁北平而停止。1928 年 5 月全国教育会议决议案中，通过筹备中央图书馆案；大学院所拟建设之中央图书馆应迅速筹款购置国内外历年出版专门研究学术之

各种杂志及贵重图书，以供各地专门学者参考案。同年6月大学院拟定的施政大纲也提出筹设中央图书馆问题。在修正的大学院组织法中，规定中央图书馆和中央研究院同为直属院长、副院长领导的国立学术机关。

1929年1月，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一次年会通过“督促政府建设中央图书馆于南京”的提案。1931年4月成立的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补助中央图书馆建筑费用30万元。1933年决议拨150万元为该馆建筑费。1933年1月21日，教育部派蒋复璁为国立中央图书馆筹备委员，筹备中央图书馆。同年4月8日任命为筹备处主任，在南京租民房办公。教育部核准筹备处暂行组织大纲七条，设总务、图书二组。与此同时派蒋复璁等接收国学书局，后改为筹备处印刷所。并要求筹备处迅速印行《四库全书》中尚未印行或已绝版的珍本。1934年10月，教育部批准各出版单位呈缴国立北平图书馆和国立中央图书馆的图书，直接寄该馆。1937年7月成立国立中央图书馆建筑委员会。

国立中央图书馆自筹备处成立后，立即开始图书馆的各项业务工作。

采访工作：1933年1月蒋复璁赴北平将教育部留在北平的重要书目及档案运中央图书馆保存。同时通过党政机关、学会和世界各国学术团体征求出版物。1934年7月中央研究院附属出版品国际交换处也并入中央图书馆，便于该馆开展书刊交换工作。同时，该馆重视善本和西南各省地方文献的收集。1940年蒋复璁将中英庚款董事会补助的建筑经费，收购善本书籍。

国立中央图书馆筹备处成立以来，以教育部拨给北平档案保管处藏书46 000余册为基础，向国内外征集出版物：奉教育部令接办国学书局后，用书局的存书与欧美各国交换；加上按照教育部“新出图书呈缴规程”征收，以及购买等各种途径进行书刊收集，至1935年藏书99 332册。1937年入藏中外图书及期刊达18万册。抗日战争前后，该馆有计划地收购古籍10余万册，包括吴兴张氏适园，刘氏嘉业堂，苏州邓氏群碧楼，番禺沈氏藏书等。金石拓片和古今舆图的收集也较丰富，1934年购入天津孟氏金石拓片1 500种，1942年购入番禺商氏金石拓片700余种。

抗日战争期间，国立中央图书馆筹备处于1937年11月奉命西迁，携出图书130箱，同时移送南京故宫博物馆重要书籍262箱，1938年迁抵重庆。1940年中央图书馆重庆分馆开放阅览，展览期刊、善本、拓片3 000种。1939年迁至江津县白沙镇，1940年8月1日中央图书馆正式成立，10月蒋复璁被任命为馆长，国民政府公布国立中央图书馆组织条例13条。1945年政府公布新修正之组织条例共14条，规定该馆设出版品国际交换处。

1945年中央图书馆自重庆搬迁回南京，1946年复馆，馆址在成贤街。

同年根据新修正之组织条例在南京成立出版品国际交换处，在上海设办事处。至1947年，中央图书馆藏书达947 780册(件)，其中善本达139 282册。1946—1947年中央图书馆接收日本从香港劫运东京，原存放于冯平山图书馆的线装书35 000册。1948年中央图书馆将其中善本古籍各重要图书分3批运往台湾。

书目与出版工作：1936年国立中央图书馆编印藏书印刷目录卡片，每月编印一组，除自用外，兼供各图书馆购买。抗战期间，停止印行。该馆于1936年在《学觚》上公布暂行中文图书编目规则。1940年《国立中央图书馆中文图书编目规则》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1935年该馆曾出版馆藏图书目录。期刊目录和呈交图书目录，以后还出版了各种书目和联合目录。1941年奉命编制全国同时总目录。此外，该馆于1934年影印《四库全书》珍本初集221种，1 960册，并照《四库全书》原样印制经史子集图书各1种6册。出版《学觚》、英文书林季刊、馆刊等刊物。

3. 地域性国家图书馆

20世纪40年代我国先后筹建3所地域性国家图书馆。它们是西北图书馆、西安图书馆和罗斯福图书馆。

1942年9月，国民政府第三届国民参政会议通过创设国立西北图书馆的议案。1943年2月提案获教育部批准，颁发证书，聘请刘国钧、陈东源、袁同礼、蒋复璁等人组成筹备委员会，刘国钧出任筹委会主任。3月筹委会第一次会议上，决定了设馆兰州，讨论了该年度工作任务。同年6月，教育部颁布了《国立西北图书馆筹备委员会组织章程》，并责成筹委会从速办理开馆事宜。经刘国钧的四方奔走，多方求援，于次年租定馆舍，聘请员工28人，组织完整的机构。入藏图书1万多册，地方文献200余种，还有金石拓片、汉简等。1945年4月10日国民政府公布国立西北图书馆组织条例，但由于战事，该馆奉命1945年7月暂行停办，所有图书文卷移交甘肃省立兰州图书馆，器具移交西北师范学院。1946年9月教育部下令恢复，暂借甘肃省立兰州图书馆后楼办公。1947年2月，国立西北图书馆更名为国立兰州图书馆，1948年国民政府公布国立兰州图书馆组织条例。由教育部拨各种图书约10万册。刘国钧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不断完善组织机构，增加经费，扩大馆舍，充实馆藏，1947年底，馆藏图书达12万册，成为西北的中心图书馆，发挥国家分馆的作用。1949年8月26日兰州解放，9月1日兰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国立兰州图书馆。

1946年10月，国立西安图书馆筹备委员会奉教育部令成立，聘刘季洪、王友直等8人为委员，先后聘任刘季洪、杜元载、杨健钟为主任委员。

1947年2月召开的一次委员会，12月筹备委员会组织规程获行政院批准备案。同年教育部将南京上海无主图书30余万册拨交4所国立图书馆和7所大学图书馆，至1948年3月，西安图书馆获拨发图书35 956册，分别存放在南京上海、徐州3地。由于图书凌乱残缺，该馆征集组不得不全力从事残缺图书的整理，编制"残缺书目"等工作，同时需整理现存于西安的3万多册书刊，编制图书目录。在此期间，筹委会还进行书刊的征集与购置工作。至1948年3月，西安图书馆藏书为69 493册。唯因馆舍狭小，工作局于一隅，始终未能成立和开放阅览。

1946年7月，国立罗斯福图书馆筹备委员会成立，主任委员由教育部长朱家骅兼任，筹备委员有蒋梦麟、王世杰、陈立夫、胡适、蒋廷黻、傅斯年、袁同礼、蒋复璁、沈祖荣、严文郁等，后补聘张群、朱必谦、晏阳初、杨子惠为委员。馆址设于重庆，11月筹委会接收中央图书馆重庆分馆馆舍，及藏书1万余册。1947年5月1日罗斯福图书馆正式开放。同年该馆接收教育部拨发近9万册图书，该馆筹建之始，即被联合国指定为其资料寄存馆。由于重庆是抗战时的"陪都"，罗斯福图书馆成为我国抗战文献收集最全、保藏最多和最完整的图书馆。重庆解放后，该图书馆改名为重庆图书馆。

第三节　图书馆事业的杰出人物

辛亥革命后，我国图书馆界出现了第一代具有现代图书馆知识的专门人才，他们都曾接受西方教育，其中不少人曾留学外国，专门研修图书馆学，同时对中国传统目录学等也有所研究。这批图书馆专门人才中，1914年沈祖荣作为留学美国研修图书馆学的第一人，他和袁同礼、洪有丰、戴志骞、胡庆生、李小缘、李燕亭7人先后获得美国纽约州立图书馆学校图书馆学士学位；刘国钧获美国威士康星大学图书馆学士、哲学博士；杜定友获菲律宾大学图书馆学士；1926年桂质柏赴美研修，1930年获哥伦比亚图书馆学博士，成为我国第一位图书馆学博士。他们回国后有的长期为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而努力工作，如袁同礼、蒋复璁、戴志骞等；有的专门从事图书馆人才的培养，如沈祖荣等；更多的则既从事图书馆实际工作，又积极从事教学和学科理论研究工作，如杜定友、刘国钧、李小缘、洪有丰等。他们以自己的学识和才能在图书馆事业中辛勤耕耘，很多人为此献出毕生精力，他们在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其中蔡元培、袁同礼、蒋复璁是影响较大的人物。

一、蔡元培(1868—1940)

蔡元培，字鹤卿、孑民，号孑农，绍兴山阴(今越城区)人。少年时曾在绍兴古越藏书楼校书，得以博览群书。光绪十五年(1889) 举人，1890 年会试贡士，未殿试。1892 年补殿试，为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1894 年补翰林院编修。甲午战争后，开始接触西学。

蔡元培于 1908 年赴德意志帝国留学。民国元年 (1912) 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是临时政府第一任教育总长，蔡元培曾在国外多年，有感于各国社会教育的发达，因此竭力提倡社会教育，也十分重视图书馆的社会教育职能，关心图书馆事业的建设。1912 年清皇室派总长世续与蔡元培商议创设一所图书馆，将内廷所存《四库全书》全数捐赠，这套书后经鲁迅多方奔走，终于全部移交京师图书馆。

1912 年，蔡元培经当时教育部参事兼译学馆教授许寿裳介绍，聘请鲁迅任教育部部员，兼任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主管图书馆等文化艺术事业。在此期间，鲁迅积极从事京师图书馆的改组、迁馆、建立分馆以及开展业务工作。

蔡元培任职期间，教育部于 1915 年颁布了《通俗图书馆规程》和《图书馆规程》，提出各省市县应设立通俗图书馆和图书馆，收集图书，供公众阅览。这两项规程颁布，对于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产生很大影响。同时，蔡元培还亲自四处奔走，提出《拟联合同志除请各国退还庚子赔款专供吾推广教育事业意见书》。意见书第五项内容为供给“北京、南京、四川、广东四处之图书馆、博物馆等费。”为北平图书馆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中争得一笔经费。此外，蔡元培为解决北平图书馆的馆舍，署名批覆将居仁堂拨旧京师图书馆使用。

蔡元培 1916 年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他十分重视图书馆建设，1917 年 1 月 9 日在他的《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中，提出到校仅数日，首先计划的两件事之一，就是“添购书籍”。认为“本校图书馆书籍虽多，新出者甚少，苟不为购办，必不足供学生之参考。刻拟筹集款项，多购新书，将来典籍满架，自可旁稽博采，无虞缺乏矣。” 同年聘任年仅 30 岁的李大钊为图书馆主任。在任期内，蔡元培改革北京大学的措施中，包括图书馆工作，例如整理各系图书室，使学生在教员指导下，切实用功，同时广购图书杂志，给学生以自由考察的工具。① 北京大学亢慕义斋的图书馆活动蔡元培也曾给

① 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J]．上海东方杂志，1931：1．

予支持。

1927—1928 年，蔡元培任大学院(即教育部)院长期间，在大学院设立了图书馆组，同时公布了《图书馆条例》及有关图书馆事项的政令。

1928 年 5 月大学院召集全国教育会议，邀请图书馆专家参加，会议议决案中有 14 件内容属于图书馆及出版物组，其中有：要求规定全国图书馆发展步骤大纲；大学院通令全国各学校均需设置图书馆，并于每年全校经费中拨 5% 以上为购书费，奖励科学著作等。同年 6 月大学院拟定的《训政时期施政大纲》第十条博物馆及图书馆，规定(1)调查全国博物院、图书馆、儿童图书馆及其他通俗教育机关状况；(2)整理现有博物院、图书馆及其他通俗教育机关；(3)制订博物院、图书馆及其他通俗教育机关条例；(4)筹设中央博物院、中央图书馆、中央儿童图书馆及中央通俗教育馆；(5)培养图书馆及其他社会教育需用人才。同年 3 月大学院令各大学区各省市教育厅制定表格查报公私立图书馆。7 月大学院改国立京师图书馆为国立北平图书馆。8 月公布安徽省图书馆规程 31 条。9 月通令全国广设民众阅报处。

1929 年 8 月—1938 年，蔡元培兼任北平图书馆馆长。他认为“欲保存旧有文化，务须保存旧图书；欲发展新文化，则须以外洋文化为借鉴”，“择其可以消化者而吸收之。”对于 1929 年酝酿北平图书馆和北平北海图书馆合并一事，持积极支持态度。经教育部和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签订协议书，在确保教育部对图书馆的行政管理权的前提下，同意两馆合并。蔡元培任北平图书馆馆长期间，对于馆舍建设作出巨大贡献。新馆舍于 1928 年 9 月破土，1931 年 6 月落成。蔡元培专程从上海到北京主持开馆仪式，并撰文《国立北平图书馆记》，刻碑纪念。

蔡元培对图书馆事业的关心，与他关心教育事业有密切关系。1931 年北京大学通过蔡元培获得了美国文化教育基金的补助，中华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自 1931—1935 年与北京大学合作，双方每年各提款项 20 万元，其中一部分作为购置图书仪器和建筑设备之用。北京大学利用这笔款项的一部分，加上全校师生募捐，于 1931 年开始筹建图书馆，新馆于 1934 年建成，有容纳 500 座位的 4 间阅览室，供教授使用的 24 间研究室，书库设置防火防潮设备。

蔡元培关心图书馆事业，还体现在他亲自参加图书馆的一些活动。1925 年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蔡氏被选为协会董事。1929 年教育部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合聘蔡元培为国立北平图书馆馆长。1933 年蔡元培受聘于鸿英教育基金董事会，该董事会接收人文图书馆筹备处，成立鸿英图书馆。1935 年上海市立图书馆临时董事会成立，蔡元培任董事长。

蔡元培1940年3月5日在香港病逝。他的一生，对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有不可磨灭的贡献。毛泽东特发唁电：“学界泰斗，人世楷模。”

二、袁同礼(1895—1965)

袁同礼，字守和，河北徐水人。191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预科，即在清华大学图书馆参考部工作，成为我国最早的参考工作者。1917年任清华学校图书馆主任。1918年当选为北京图书馆协会会长。1920年由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资助赴美国深造，在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州立图书馆专科学校学习，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文学士、纽约州立图书馆学校图书馆学士学位。后赴英国伦敦大学及法国巴黎大学文献学校研究，被美国匹兹堡大学授予名誉博士学位。1934年曾赴欧洲考察图书馆事业，1944年赴美考察文化教育事业，对欧美图书馆事业较为了解。

袁同礼1923年归国，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他是国内图书馆界第一批具有现代图书馆学知识背景的专才，在任北大图书馆主任三年期间，他积极采用西方新式管理方法，组织人员清理大量积压的西文书刊，编辑馆藏书本式目录，使北大图书馆在艰苦的条件下能够维持局面，并有所发展。后任国立广东大学图书馆馆长。他还先后于1925年、1927年、1929年、1934年被聘为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副馆长，专门整理影印善本，刊行丛编。

袁同礼的全部精力和时间，都用在北平图书馆。1925年国立京师图书馆委员会成立(后改名北平图书馆)，袁同礼任图书部主任，1927年被聘为副馆长，同年馆长范源廉病逝，由袁同礼主持工作。在此期间，袁同礼任北平北海图书馆代理馆长，积极参加北海图书馆馆舍(即现在北京图书馆文津街馆舍)的建设工作，是该馆建筑委员会五委员之一。

1929年6月—1945年，袁同礼任国立北平图书馆副馆长，1945年—1948年12月任馆长。任职期间，袁同礼一直主持馆务工作。1946年曾担任国立罗斯福图书馆筹备委员会委员，194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中国委员会，袁同礼担任委员。1948年12月国民党政府派飞机将他从北京接运南京，在国民党政府撤离大陆时，袁同礼赴美定居，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工作，编著了许多书目，对国内外治学及参考均有帮助。1965年袁同礼退休不及一月，于2月8日逝世。

袁同礼在抗日战争期间，曾南下湖南，以国立北平图书馆名义与长沙临时大学合作，同时兼任临时大学图书馆馆长，开展图书馆服务工作。1938年3月，袁同礼随临时大学迁往昆明，设立北平图书馆昆明办事处，积极从事抗战活动，与西南联大共同组织中日战争史料会，大规模搜集有关抗日战

争的资料。在此期间，袁同礼曾致函周恩来，请求支持搜集抗日史料工作，得到周恩来热情支持。1939 年 3 月 16 日，周恩来派人访问袁同礼。同年 4 月 10 日，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驻陕办事处林祖涵致函李乐知，请转交北平图书馆所征集书籍 50 册。同年 7 月该集团军重庆办事处又致函北平图书馆馆长："兹有周副部长交下书籍，大多是 1938—1939 年解放区出版的书刊文献，至足珍贵。"①此后，北平图书馆昆明、重庆两办事处直接与延安解放社、延安新中华报出版社、延安新华书店、重庆新华日报社建立了经常性征集书刊、日报的业务联系。北平图书馆开始公开入藏中国共产党早期出版的书刊文献。袁同礼在这一工作中起了很大作用。

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使我国图书馆损失惨重，为了复兴图书馆事业，袁同礼于 1938 年以中华图书馆协会理事长的名义，分别致函欧美各国图书馆协会，痛陈日军暴行，并广泛征集图书，得到美英各国图书馆界的援助，捐赠的图书陆续运往香港。为顺利接受赠书，袁同礼亲往香港，参加图书验收和运送事宜。抗战胜利后，袁同礼曾参加接收敌伪文物图书的工作。

袁同礼热心图书馆学术交流，积极促进图书馆协会的成立。在 1918 年成立的北京图书馆协会(后因故停顿)，1924 年成立的北平图书馆协会中，袁同礼均被推选为会长。袁同礼认为："默察图书馆事业，非群策迈进，不能有大功"②。在北平图书馆协会成立后，他与蒋复璁先后南下联络各地图书馆协会，倡议成立中华图书馆协会。1925 年 4 月 5 日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袁同礼被选为协会董事、董事部书记。1926—1929 年被选为执行部长，负责协会方针的制定，编制预算决算，执行董事部决议，组织各项委员会等事项。1930—1937 年多次任执行委员会主席，1937—1944 年任协会理事长。此外，还曾先后担任协会分类委员会、图书馆教育委员会、会报编辑部、建筑委员会等机构的领导工作。

为了推动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袁同礼在中华图书馆协会年会上，提出各大图书馆应搜集有清一代官书及满蒙回藏文字书籍，搜集金石拓片，全国各图书馆应注重自然科学书籍等提案，并要求政府调查及登记书板及档案，必要时移送图书馆保存。

袁同礼关心我国图书馆教育事业，1925 年，中华图书馆协会与国立东南大学联合组织图书馆学暑期学校，袁同礼担任该校图书馆学术史、分类

① 杨宝华，韩德昌编．中国省市图书馆概况(1919—1949)[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24.

② 宋建成．中华图书馆协会[M]．台北：台湾育英社，1980：16.

法、目录学等课程的教师。此外，袁同礼为纪念其母，并培养图书馆专门人才，从1933年秋开始，在武昌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设纪念奖学金学额一名。

袁同礼对于图书馆学、目录学研究颇深，曾在刊物上多次发表有关宋明清私人藏书、《永乐大典》考证及“国立北平图书馆之使命”等论著。

三、蒋复璁(1898—1990)

蒋复璁，字慰堂，浙江省海宁人。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早年即从事图书馆活动，1922年北京松坡图书馆筹备成立，蒋复璁被聘编制外文书目。1924年6月松坡图书馆第二馆成立，蒋复璁在该馆任职。1926年，蒋复璁被聘于国立北平图书馆。1930年赴德国德国柏林大学图书学研究所留学，并任普鲁士邦立图书馆客座馆员。回国后，1933年被教育部委任筹备中央图书馆。从北平运往南京部属重要图书档案，接收国学书局，经蒋复璁整理后改为中央图书馆筹备处印刷所，并着手印行《四库全书》中尚未印行或业已绝版的珍本。同年11月，商务印书馆开始影印《四库全书》珍本，共选印231种，2 000册。

抗日战争期间，蒋复璁领导中央图书馆筹备处迁馆四川，建立中央图书馆重庆分馆。1940年中央图书馆正式成立，蒋复璁被任命为馆长。同时在四川江津县白沙镇设立民众图书馆，继续开展图书馆活动。在此期间，蒋复璁与郑振铎、张元济、张咏霓、何柏丞、张凤举等人成立文献保存同志会，提出自今以后，决不听任江南文献流失他去。有好书，有值得保存的书，必为国家保留之!

1940年，蒋复璁为搜购战争中散失的善本，赴沦陷区筹设机构，用中英庚子赔款董事会补助中央图书馆的尚未动用的建筑经费法币约百万余元，从上海、香港两地秘密收购善本，运往重庆。至1946年底. 中央图书馆入藏中日文书754 551册，善本书153 414册。金石拓片和古今舆图则尽量征购。1942年购入番禺商氏所藏金石拓片700余种。后经长年积累，该馆金石拓片多达11 139件。

蒋复璁除任中央图书馆馆长外，1944年还兼任中央设计局图书馆主任，罗斯福图书馆筹备委员会委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委员会图书及博物院委员会委员等。

1948年赴台后，蒋复璁于1954—1966年担任台湾中央图书馆馆长，并曾兼任台北图书馆馆长、“国立故宫博物院”院长等职。受聘与赖永祥、王振鹄等规划起草大学文学院图书馆学系课程。

蒋复璁热心中华图书馆协会工作，早在1924年即与袁同礼为筹备中华

图书馆协会而南北奔忙，在他们的努力下，1925 年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蒋复璁被聘为协会执行部干事。在历次年会中蒋复璁分别担任分类编目组、图书馆行政组等论文分组会议负责人，并在会议宣读有关论文。1934—1937 年，蒋复璁任协会执行委员，1937 年以后，任协会理事会理事。

蒋复璁在图书馆学理论方面有一定研究，其论著主要是结合图书馆工作实际，研究图书馆管理与利用等问题。主要有：《中国图书分类论》、《图书室分类法》、《图书馆管理法》、《图书馆》等。

第四节　西方列强侵华对图书馆事业的影响

一、日本侵略者对台湾的掠夺与破坏

西方列强侵华使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受到了严重的影响，日本人觊觎中国可上溯到 16 世纪。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后日本先后占领我国台湾和租借辽东半岛。1924 年日本通过《对支文化事业特别会计法》，决定在北京设立人文科学研究所及图书馆，在上海设立自然科学研究所。1928 年两所全部有日方独立运作，它们在搜集整理研究中国图书馆资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七七事变后日本通过政府和民间有关机构搜集中国情报资料和书刊的工作更加重视，为日本侵华提供重要信息。

1894 年甲午战争后，台湾省和澎湖列岛被割让给日本，日军占领台湾后，即设立台湾总督府，实施殖民统治。日俄战争后，日本从沙俄手中夺走了我国辽东半岛的租借权，以及长春至大连的南满铁路，把辽东半岛改为“关东州”，开始了对华的侵略与掠夺。文化侵略和掠夺是其中的重要部分，图书馆的建立与发展则成了文化侵略与掠夺的工具。

台湾的图书馆事业深受日本殖民政策及“皇民化”运动的影响，日本在台湾开办的图书馆和资料馆，成了日本进行殖民统治和奴化教育的机构。

台湾第一所公立图书馆是总督府设立的台湾总督府图书馆，该馆成立于 1914 年，成立后负责图书馆人员在职训练，培育地方图书馆服务人员，辅导台湾各地图书馆业务。1923 年台湾总督府公布《公立私立图书馆规则》，共 6 款，其中规定“各州厅市街庄，或联合两个以上之街庄，乃至私人，为搜集图书，提供民众阅览，得设立图书馆”。1927 年成立台湾图书馆协会，1929 年秋，日本全国图书馆协会大会在台湾召开。

1932 年底，台湾公私立图书馆共 70 余所，1943 年增至 93 所，其中公立图书馆 89 所，私立图书馆 4 所，各馆藏书 1 000 余册至 4、5 万册，均以

日文书刊为主。抗战胜利前夕，总督府图书馆藏书达20万册。1945年台湾光复，该图书馆改名台湾省长官公署图书馆，简称台湾省图书馆，1948年改称省立台北图书馆。台湾大学是日本开发台湾、侵略南方的调查研究机关之一，该校图书馆当时是台湾最大规模的图书馆，藏书已达50余万册。1945年光复后，国立台湾大学接收日本的台北帝国大学，其附属图书馆亦改为台湾大学附属图书馆，该馆藏书47.4万册，设总馆、医学院分馆和18个系图书室。1949年12月更名为台湾大学图书馆。

1945年台湾回归祖国，由于战争，图书馆大多处于停顿状态。当时国民党政府当局颁布《台湾省各县市立图书馆组织规程》，作为各级图书馆建立组织的依据。于是台湾的省、市、县立图书馆相继设置，但由于当时财政困难，文化事业没有受到重视，因此图书馆事业得不到发展。据有关资料统计，1946年县市图书馆12所，镇图书馆仅在台中和新竹共有12所。据1948年9月出版的《教育研究》第110期称："台湾光复之初，计有图书馆省立二所，县市立五所，但因经费问题，且各地图书馆的图书封存百分之九十，几乎无法开门……"

为配合日本帝国主义南进政策和北进政策，日本在台湾设立南方资料馆作为日本向华南各省、南洋入侵以及北进政策提供调查研究和咨询的机构。南方资料馆入藏的8万余册图书资料都是日本南侵所必备的资料。1946年南方资料馆并入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图书馆。南满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于1906年在大连设立，它与关东军司令部是日本早期对我国进行殖民统治和经济掠夺的两大主要机构。满铁成立第二年（1907年）即在调查部属下设立图书室，1918年命名为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图书馆，1922年改称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大连图书馆。据有关资料统计，1907—1919年满铁共建立图书馆14所，到1935年增至29所，大部分集中在大连及铁路沿线。

满铁的所谓业务就是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和资源掠夺。它属下图书馆的"主要任务就是用所藏图书，配合当时的形势发挥作用"①。满铁大连图书馆的规则明确规定"要广泛搜集古今中外的图书资料，供给'会社'业务上参考"②。满铁图书馆在东北经营近40年，以各种手段掠得图书70余万册，其中大连图书馆掠得40余万册。创设于1911年的满铁上海事务所调查课曾

① 张海齐．伪满铁图书馆的图书搜集方式及其危害[J]．图书馆学研究，1983(6)．

② 杨力生，王泯虬．日本侵略东北时期伪满铁大连图书馆史料[J]．图书馆学研究，1982(6)．

收集有关中国共产党的资料25万册。1920年至1937年，满铁和日本图书馆协会曾两次在大连举行日本全国图书馆大会。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满铁图书馆所掠夺的我国文献资源在交接前后，被大量盗运散失或暗自焚毁。抗战期间，日本掠夺我国文化典籍的机构遍及华北、华中和华南。日本的华中占领地区图书文献接收委员会在南京地区掠得图书达88万册。

日本侵华战争是我国图书馆事业的一场浩劫。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在我国东北地区实施殖民统治长达14年之久，图书馆遭受日军炮轰、焚毁、占为兵营，整个东北地区图书馆数量由1930年的137所减少为1931年的95所，减少了31%。据伪文教部档案记载，1932年3—7月，日伪在东北地区焚书达650万册之巨。

据有关资料统计，北平沦陷期间被掠夺和焚毁的公共图书馆和高校图书馆藏书达448 957册，私人藏书137 471册；上海地区截至1947年公共藏书损失264 715册，私人藏书25 726册；南京沦陷期间公共藏书被毁被掠459 579册。日军炮火所及，侵略者铁蹄所到之处，图书馆均遭受馆舍书籍焚毁之灾。

二、英国管治下的香港图书馆事业

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与当地社会(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教育诸方面)的发展与需求，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香港也不例外。它的特殊的社会环境，也反映在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上。

鸦片战争后，香港，南海岸边这个小小的渔村受到西方列强的重视，1841年英国开始强占香港，通过3个不平等条约，割占和租借了香港岛、九龙和新界。英国政府从一开始就十分重视对香港实行政治上的统治以及人员的培养。图书馆是文化教育的重要部分，同时要为港英政府提供统治所需的文件资料。英国政府于是拨款在香港建立了一批图书馆。

香港图书馆产生于19世纪60年代，据有关资料记载，最早的图书馆嘉诺撒圣心书院图书馆建于1860年，由政府拨款兴建，该馆140多年来，每年有购书经费，人藏中英文书刊，至今仍然向学校师生开放服务。除了学校图书馆外，19世纪60年代创建的图书馆是Johson Stokes and Master Library，该馆是一所律师行图书馆，专门收藏17—19世纪的法律报告、文件以及相关的报刊等。19世纪创建的图书馆还有3所：司法机构图书馆，政府化验所图书馆和皇家香港天文台图书馆，均为香港政府机构图书馆。19世纪末，葡萄牙人创办了葡萄牙俱乐部的“葡萄牙图书馆”，为经常在香港聚会的葡萄牙名流提供图书服务。这些私人图书馆均不对外开放。

至20世纪40年代末，在英国强占香港100年的历史中，香港的图书馆仅40所，其中大专院校图书馆4所，中小学校图书馆27所。这些图书馆经费的大多数是英国政府拨款或资助。除学校图书馆外，政府机构图书馆5所，专门图书馆5所，宗教图书馆3所，向香港公众开放提供流通阅览服务的公共图书馆1所也没有。

三、葡萄牙管治下的澳门图书馆事业

澳门位于我国珠江口西岸，从1553年开始被葡萄牙人入住，达400多年之久。1999年12月20日，澳门回归祖国怀抱。据考古发掘，新石器时代中华民族的祖先已在澳门一带劳动生息，到明代渔民定居日多，成为澳门的最早居民。1553年葡国商船以晒晾货物为借口，贿赂当时的中国官员，在澳门入住。鸦片战争刚结束，1843年葡国当局派出代表与清朝政府多次谈判，要求由葡兵驻防整个澳门半岛，从此葡萄牙通过不正当手段占据了澳门。

澳门在明清时期曾是历史文化名城，1588年已利用西方新型印刷机印刷书籍。19世纪初，不少印刷及出版公司在澳门开设，出版物内容已不再以宗教为主，很多外国人学习中文的教科书相继编印出版。历史上第一部《华英字典》六大本于1815—1823年出版，该字典英译《康熙字典》收进的汉字4万余字。1823年澳门出版中国第一份外文报纸《蜜蜂华报》(*A Abelha da Chine*)，1824年出版周报《澳门报》，1827年创刊于广州的第一份英文报纸《广州记录报》(*The Canton Register*)于1839年迁到澳门出版，1843年6月迁往香港，改名《香港记录报》(*The HongKong Register*)。19世纪30年代先后创刊的有《广州杂录》(*The Canton Miscellany*)(1831年)、《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1832年)、《澳门钞报》(*Chronica de Macau*)(1834年)等。这些报刊有的在澳门出版，有的则在澳门印刷。

澳门的图书馆事业是随着宗教的传入而发展起来的。1565年由耶稣会创办的圣保禄公学已经存在，1594年圣保禄学院正式注册成立，该学院设有图书馆，收藏4 200册书籍。18、19世纪先后成立的圣若瑟修道院、东印度公司、澳门陆军俱乐部等也设立图书馆。但在其后几百年里，相当数量的珍贵典籍遭受虫蛀、遗失、火烧、转卖及各种人为损毁。例如1835年圣保禄学院图书馆全部书籍资料毁于一场大火，1870年4月建立的澳门人俱乐部图书馆和1873年建立的澳门人图书馆的藏书均随着图书馆的消失而散佚。据1898年1月27日《澳门报告》，当时澳门只有3所图书馆：附属于利宵中学的澳门国立图书馆、联合俱乐部图书馆和军人图书馆。

为各种职业人士提供开放服务的公共图书馆出现于19世纪末期。此前的1873年12月27日，当时的澳门总督曾通过第92号训令，公布名为“澳门图书馆”社团的组织章程，该团体由20位股东出资建立，属于私人资助，主要宗旨为“通过阅览本国和外国书籍给组织成员提供教育和娱乐”。这样一个不是向公众开放的图书馆仅仅维持了10年。在这期间有关人士不断在报纸上，指出澳门政府从没有在澳门创建公共图书馆的任何举动，一再呼吁创办一个名副其实的公共图书馆。

1893年7月27日葡萄牙国王宣布，王室已发布命令，命令的第12条中提及建立“澳门国立图书馆”。图书馆附属于利宵中学。图书馆此后30年经历了馆舍屡次搬迁和资金短缺等困境。正如1915年9月12日《进步》周报的报道，图书馆没有人去光顾，也不能去。因为它只有少得可怜的100来本毫无价值的图书，摆放在破旧的书架上，馆舍设在利宵大楼一间狭小、活动不便、不通风的房间，该周刊指出：“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这座图书馆或这类图书馆，尽管取名为国立图书馆，或被称为公共图书馆，实际上，它称不上是图书馆，更谈不上是公共图书馆！”

1925年以后，澳门政府宪报公布有关公共图书馆发展的一些法规，包括1925年第8号立法条例，澳门国立图书馆改名为公共图书馆；1930年公布第一套澳门公共图书馆规章；1931年公布澳门图书馆由公共教育监督官员负责监督，馆员职别与博物馆相同；1941年公布规定所有企业、出版社或印刷机构的业主、管理者或经理必须呈送两册由他们印刷的各种刊物或书籍给公共图书馆，这一法律规定对于缺少资金购买书籍的图书馆有益；1945年公布澳门公共图书馆的管理委员会及馆员的职务。20世纪30年代开始，澳门主要图书馆的结构和法律状况开始明朗化，图书馆的事务也开始以不同方式运作。

辛亥革命和教育事业的发展推动了澳门图书馆事业的发展。20世纪初，在澳门从事反清活动的人士，通过向民众提供书报，传播革命思想。例如1906年同盟会香港分会派成员刘樾航等到澳门，在荷兰园和隆街21号成立了“乐群书社”，开放给市民阅读报刊，该书社成为了澳门第一所中文的公共图书馆。同时在伯多禄局长街近国华戏院对面开设书室。1911年同盟会澳门支会在南湾街41号成立濠江阅书报社，开放民众阅读，这些书报室主要是让识字的民众认识革命的思想，以唤起民众。

辛亥革命后澳门的学校教育开始普及，中小学纷纷创办，据统计，1932年澳门中小学达97所，当时学校比较重视图书设备。特别是抗战时期，不少广州的学校迁校澳门，据统计，1942年澳门小学达140所，学生人数4

万余人，中学及专科学校30余所，学生人数3万余人，大学亦有近10所。许多学校搬迁时，图书馆的藏书也运抵澳门。例如，广州协和中学1937年12月迁校到澳门，并重建图书馆，共两个阅览室，可容50个读者，1941年藏书13 424册(中文图书7 914册，线装书4 075册，西文书1 435册)，该馆采用王云五的《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1938年广州培正中学、广大中学、培英中学均在澳门开办分校，内设图书馆。培正中学澳门分校图书馆1939年出版目录所载，该馆藏书达12 630册，图书馆修正了图书馆规程，有完善的管理机构，明确的分工，积极向校友募捐图书，该馆1940年藏书增至14 447册。培英中学图书馆于1941年修订图书馆规则共17条，决定延长开放时间，严格阅览规则。太平洋战争爆发，澳门亦受波及，不少学校相继结束，图书也大量流失。抗战胜利后，学校教育继续得到发展，许多学校图书馆藏书不断增加，例如广大中学图书馆藏书从1940年的674册增至1947年的6 045册，期刊20余种。1948年图书馆接受校董陈伯年捐赠全套国民教育文库。

第十九章 图书馆学研究与图书馆学教育

第一节 中华图书馆协会

一、中华图书馆协会沿革

我国图书馆的学术组织，最早由京师图书馆发起，于1918年12月召开大会，通过会章，成立北京图书馆协会，但因教育部不批准，加之经费困难不久即停顿。

1921年冬，全国教育界成立中华教育改进社，宗旨为调查教育实况，研究教育学。鉴于图书馆对于教育的重要性，特设图书馆教育组。

1922年7月中华教育改进社召开的第一届年会上决定，成立图书馆教育研究委员会，宗旨是研究图书馆教育问题。这是最初的图书馆学研究组织。下设4组：图书馆行政与管理、征集中国图书、分类编目研究、图书审查。

1923年召开的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二届年会通过“组织各地方图书馆协会案”，提出建立地方图书馆协会的理由为：(1)研究适中管理法，因当时同一地方图书馆管理方法及手续均不一致；(2)节省图书馆经费，同一地方的图书馆可合作购置新书，搜罗旧籍；(3)促进图书馆学研究，同一地方的图书馆员应有一种组织，借以互相研究。

中华教育改进会敦请戴志骞发起，与袁同礼、蒋复璁等共同组织，1924年3月30日成立北平图书馆协会，这是全国最早的地方性图书馆联合团体。协会成立后，致函各地图书馆员，希望分别从速发起成立各地图书馆协会。同年4月以后，浙江、开封、南阳、天津、上海、南京、江苏等省市图书馆

协会相继成立。次年（1925 年）广州、苏州、济南等地图书馆协会亦告成立。

由于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新式图书馆经营的需要，要求图书馆界加强联系；而地方图书馆协会纷纷成立，互相联络，又促进了全国性图书馆协会的产生。经过多方协商讨论，1925 年 4 月 25 日在上海召开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大会，6 月 2 日在北京举行成立仪式。

《中华图书馆协会组织大纲》中宣称，协会的宗旨是“研究图书馆学术，发展图书馆事业，并谋图书馆之协助”①。协会第一任董事长梁启超在成立会演说中，进一步阐述了协会的宗旨，提出建设“中国图书馆学”，认为适合中国图书馆应用的图书馆学，应该是在研究外国图书馆学的基础上，应用现代图书馆学的原则去整理中国的图书，为中国学术界开辟出新发展的途径，并产生一种有系统的理论。

中华图书馆协会设董事部和执行部，分别负责会务工作。董事部部长梁启超，书记袁同礼；执行部部长戴志骞，副部长杜定友、何日章。执行部负责筹组委员会，共同研究学术或处理特别问题。首先成立分类、编目、索引、出版、图书馆教育五个委员会。1936 年 7 月分别改名监事会和理事会。理事会相当于执行部，协会决定在北京设立总事务所，在上海设立分事务所（实际上未曾设置），由两地干事分担事务。其他地方暂以干事一人负责事务。协会会员分：以图书馆为单位的机关会员，个人会员，捐助协会经费 500 元以上的赞助会员，以及在图书馆学或事业的有特别成绩的名誉会员。

协会成立之初，董事部曾组织财务委员会筹划基金，因时局影响，工作未能积极进行，全靠私人或机关团体捐集。由于经费支绌，各种计划未能实行。

二、中华图书馆协会的活动

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之初，没有如期举行年会活动，仅开展以下几项学术活动。

1925 年协会与南京东南大学、中华职业教育社、江苏省教育会等合办暑期学校，设图书馆学组，进行短期讲习。

1925 年协会委托刘国钧出席美国图书馆协会 1925 年年会。1926 年派正在美国的裘开明、桂质柏、韦棣华三人，国内派郭秉文、寿景伟出席美国图书馆协会成立 50 周年及美国建国 150 周年的年会。同时收集有关图书馆建筑设备的影片参加费城世界博览会图书馆展览。1927 年韦棣华代表中国图

① 宋建成．中华图书馆协会[M]．台北：台湾育英社，1980：276.

书馆协会，参加英国图书馆协会成立50周年纪念大会，并参加国际图书馆协会(IFLA)发起大会。

中华图书馆协会参加发起并筹备国际图联的工作。1929年起加入国际图联。同年派沈祖荣参加在罗马和威尼斯召开的第一次国际图书馆及目录学会议，1936年派汪长炳参加在西班牙马德里举行的第二次国际图书馆及目录学会议。裘开明、胡天石等也曾代表协会参加国际图联召开的会议。

协会设有出版委员会从事编辑出版工作，于是出版费成了协会支出的一大笔经费。为传达全国或地方图书馆协会的消息，加强联络，进行学术研究和交流。协会于1925—1926年，先后创办《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和《图书馆学季刊》。《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刊行时间长达20多年，至1948年中断。《图书馆学季刊》侧重于学术研究性质，创刊号曾发表全国图书馆调查。该刊成本昂贵，订阅者不多，遂于1937年6月第11卷第2期后停刊。

中华图书馆协会附设图书馆负责搜集有关图书馆学研究的各种书刊。限于经费，藏书靠各有关方面捐赠。同时以协会出版物与国外进行交换。据1926年协会会报所载，交换对象广及英、美、法、德、比利时、西班牙、捷克、苏联、日本等国。

地方图书馆协会以上海开展活动较多。1924年上海协会成立后，曾开展读书运动，介绍阅览，开放学校图书馆，创办《图书馆杂志》，编辑丛书，与上海国民大学图书馆学系共同设立图书馆学图书馆。同时还参加中华图书馆协会的筹备工作。

其他地方协会主要是发行《会报》及《图书馆学季刊》，以及各种书目索引，提供会员参考。中华图书馆协会自1925年成立后，由于图书馆界人士的共同努力，进行了一系列的卓有成效的开创工作。此后在1927年至1937年这十年的时间里，中华图书馆协会的发展颇具生气，成绩斐然。1937年以后，活动受到了较大的限制，建树不多。

1927—1949年，中华图书馆协会主要开展了下列几个方面的活动：

1. 年会活动

1929年1月28日至2月2日，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一次年会在南京召开，到会会员173人，大会主席蔡元培。会议分组进行讨论，并宣读论文，共分6组：编纂组、图书馆行政组、分类编目组、建筑组、图书馆教育组、索引检字组。大会收到论文24篇，会上宣读5篇。

会议分组议决的内容包括：(1)要求防止古籍外流，禁止出口，调查登记全国善本书籍，编制目录，搜求各类型出版物，交换复本杂志，图书馆流通及互借，以及图书馆事业发展中的具体问题；(2)编纂图书馆年鉴，制定

中国图书馆学术语，出版图书馆学丛书，编制各种书目索引，出版图书馆刊物等；(3)关于人才培养问题；(4)图书馆建筑设备问题；(5)规定分类原则，制定标准编目条例，组织标题编纂委员会；(6)加强汉字排检法研究。

1933年8月28日至31日，第二次年会在北平举行，到会会员及来宾200余人，年会议题以经费和民众教育为中心，指出各地图书馆皆感经费困难，内地图书馆更甚。至令“数载以还，图书馆在数量上，固已渐胜于前，而经费不定，故障丛生。或则奄奄一息，靡由进展，或难胜暴力，卒尔夭折”(见第二次年会开幕宣言)。呼吁当局拨款扩充图书馆事业，在北平设立图书馆学专科学校。会后派代表向行政院、教育局面洽，但实际上会议决议并没有得到圆满实施。

1936年7月20日至24日，第三次年会在青岛举行，到会会员及来宾150余人。年会期间举行图书馆用品展览会。鉴于第一、二次年会许多提议无法实现，因此这次年会提出要求会员不必提出“过于理想”的提案，讨论内容限于图书馆部门的工作，例如，要求协会编制全国图书馆各种联合目录，推广馆际互借；统一图书分类法，制定图书分类标准和统一分类办法；编印中国图书年鉴等；规定统一索引检字法；等等。

1938年、1942年、1944年第4~6届年会均在重庆举行，都是配合中国教育学术团体联合办事处主持的联合年会而举行的。这几届年会准备匆促，参加人数不多，代表性不广泛，讨论问题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尤其是第6届年会，出席者仅60余人，纯属“联络感情”性质，会议仅举行半天，连会务问题也来不及商讨。

2. 各项图书馆事业活动

中华图书馆协会除召开年会以外，主要开展以下6方面的活动：

(1)图书馆事业建设方面

为使庚子赔款用于图书馆建设，协会一再向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提出建议，拟用美国退还庚子赔款三分之一建设中国图书馆。但得到的答复是：“业经提出讨论未得通过”，建议落空。①

1932年协会曾为邮票涨价问题向行政院力陈“此对原以见绌经费之图书馆，影响颇巨”，希望“收回成命”；但是提高邮资的办法照样执行。②

1934年协会曾为私人图书馆发展问题向立法院力争，希望得到奖励或

① 见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J]. 1925, 1(4): 16-17.

② 宋建成. 图书馆协会[M]. 台北：台湾育英社，1980: 130-131.

补助，结果是不了了之，得到的回答仅是“交法制委员会备考”。①

上述活动由于国民党当局对图书馆事业不重视而全部落空。

抗战期间，协会曾致函欧美各国图书馆协会、学术团体和出版商，征求图书，但捐赠者不多。美国 1938 年底赠送的书刊小册子不过 1.1 万余册。由于“国币”狂跌，协会无力支付国外书籍的运费及起卸费用，不得不求助于北平图书馆每月补助 100 美元。

(2)图书馆人员培养方面

协会仅于 1925 年与东南大学合办一期暑期学校，以后曾决定联络各省教育厅办理暑假讲习会，但从未进行。

(3)图书馆业务工作的改进方面

协会曾就图书分类、编目、索引法、检字法则等问题举行多次讨论，提出不少改进意见，但一直未能就上述各项工作的统一问题取得一致意见。

(4)调查工作方面

协会曾分别对全国、各省、重要城市及中学图书馆进行调查。抗战期间，曾调查全国图书馆被毁状况。同时，协会在各城市图书馆和大学的协助下，对全国书店进行调查，调查结果刊载于协会会报。此外，协会曾进行版片调查，《永乐大典》及善本调查，期刊调查等工作。

(5)参加国际图书馆活动

协会是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Library Association，IFLA)发起单位之一，曾派韦棣华参加发起大会，同时参加 1929 年、1936 年举行的国际图书馆及目录学会议。

此外，协会与美国图书馆协会多次往来，并曾派代表赴英参加英国图书馆协会活动。但由于经费困难，严重影响国际间合作交流，一些活动不得不请外国人或我国驻外人员代表参加。

(6)编辑出版工作

协会曾出版期刊、丛书、调查报告等出版物。丛书主要是论文索引、联合目录、现代作家笔名录等。

对于中华图书馆协会的评价毁誉不一。从它的活动来看，在推动我国图书馆学研究的发展，加强学术交流方面，协会通过年会活动和出版书刊做了一些工作，起到一定作用。但是自成立之初，协会经费一直困难重重，为筹措经费，协会不得不乞助于募捐或补助。时局动乱及社会不重视，使协会提出的许多发展图书馆事业的设想和建议仅为一纸空文，一直无法实施，以致

① 宋建成. 中华图书馆协会[M]. 台北：台湾育英社，1980：131-132.

协会后来的年会活动流于形式。应该指出，中华图书馆协会虽属民间学术团体，但一些活动依附于国民党党部，自1929年以后，国民党中央党部、中宣部每年的补助费是协会最大的一笔收入。国民党要人陈立夫、陈果夫以及北平党务整理委员等，均曾亲自参加协会的年会活动，在会上发表演说。有关地方图书馆协会的决议等均专门报请国民党中央党部。因此协会的一切活动“始终秉承政府政策”①，按国民党的旨意行事，直接受国民党控制。

第二节　图书馆学研究

辛亥革命至五四运动时期，外国图书馆学传入我国，沈祖荣、胡庆生分别于1914年、1917年相继赴美研习图书馆学，回国后奔走呼吁兴办图书馆。他们在1917年出版的《仿杜威分类法》是我国第一部现代图书分类法书籍。

1919年至1927年，由于图书馆学教育的兴起，图书馆事业的发展，8年间图书馆学论文多达582篇，按年度统计，1926年发表最多，达160篇，1927年论文骤减为69篇。按类统计，8年中论述公共图书馆文章最多(86篇)，次为学校图书馆(68篇)，图书馆学(65篇)。关于图书馆业务工作研究的论文，以分类编目最多(48篇)。有关图书馆学教育的论文过去只有一两篇，这个时期发表17篇。

图书馆学书刊的出版工作有所发展。辛亥革命至1925年，图书馆学专著出版约20种。上海图书馆协会1925年开始编辑丛书，当年出版杜定友的论著《图书分类法》、《图书目录学》、《汉文排字法》、《著者号码编制法》等。洪有丰著《图书馆组织与管理》(1926年)一书，是第一本总结中国图书馆工作经验及教授心得写成的专著。图书馆馆刊的出版以浙江公立图书馆年报最早，创刊于1916年。此后相继创刊的有《河南第一学生图书馆馆报》(1922年)、《上海通信图书馆月刊》(1925年)、《成都草堂图书馆周刊》(1926年)、《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1927年)、《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27年)、《图书馆学季刊》(1926年)等。但这时图书馆专业期刊出版尚属少数，学校图书馆则只有校刊，没有专门刊物。

图书馆学研究比较集中在图书分类、编目和检字法方面。图书分类仿效《杜威十进分类法》，陆续编制出各种适合我国当时国情的图书分类法，其中杜定友1922年编成《世界图书分类法》，后详加增订，于1925年以《图书

① 宋建成. 中华图书馆协会[M]. 台北：台湾育英社，1980：247.

分类法》为名出版，还详细论述有关分类法历史原理等，共400多页。与此同时，王云五按东方图书馆图书编成《中外图书馆统一分类法》，1926年陈伯逵(天鸿)编成《中外一贯实用图书馆分类法》。这些分类法的编制，打破了我国封建社会长期沿用的四部分类的体制，适应出版物的发展和图书馆工作，无疑是一进步。但其思想及结构体系均系类似《杜威十进分类法》，且只靠一两人的力量编制，自行其是，互相之间缺少研究探讨，因此不可避免地存在各种局限性。

与图书分类法相联系的著者号码表的编制工作也有一定的进展。1922年杜定友首先发表著者号码表编制方法的著述，建议增补百家姓，按汉字检字法依次排列，使每姓有固定号码。这种编制法为各处相继采用。1925年杜定友出版专著《著者号码编制法》。中文图书编目法以杜定友《图书目录学》论述较详细。此外，查修、黄维廉等亦有所论述。

辛亥革命后，我国图书馆学研究主要受日本影响，其中《图书馆小识》一书影响最大。该书原为日本图书馆协会出版，1917年通俗教育研究会译成中文。1918年顾实撰《图书馆指南》出版，该书与上书内容出处相同，但在每章之末，介绍欧美情况作参考。于是有人认为这是日本图书馆学传人时期。

1921年前后，由美国回国的图书馆专业人才渐多，他们重视欧美图书馆的经营管理方法，同时又发现日本的图书馆事业亦受美国影响。1925年左右，我国图书馆界从学习日本转而效法美国，推行新图书馆运动，其主旨是保存文化、建设文化，其内容主要是关于庚子赔款用于图书馆事业建设问题。在这期间，美国人鲍士伟曾代表美国图书馆协会，于1925年来华考察图书馆状况，提倡推广通俗图书馆等。1928年全国教育会议大会通过，请当时的大学院(相当于教育部)通令各学校均需设置图书馆，每年从全校经费中提取5%以上作为购书费，于是新图书馆运动向全国发展。但是由于经费困难，无力购置图书，加上管理人才缺乏，新图书馆运动困难重重。

1927年至1949年图书馆学研究，经历了从发展到衰落的不同时期。

1927年至1936年10年间，有关图书馆学著作单行本及期刊论文达4 065件，其中1935年发表671件，数量上超过1912年至1927年16年的总和。

从统计数字来看，有关图书馆事业内容的著作，以论述公共图书馆的文章居首(716件)，原因是普及社会教育的公共图书馆是图书馆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社会的关注。但从内容上分析，这些文章主要是工作报告和规章制度，新建或扩建计划等。学校图书馆方面次之(410件)，内容多是大学

图书馆的使用和儿童图书馆等方面。有关中学图书馆文章甚少。图书馆业务部分，以分类编目方面文章居首(421件)。由于传统的四部分类法无法适应图书馆入藏书刊的内容，影响图书馆工作开展，这个时期各种新编制或改订的图书分类法纷纷出版，有关分类原则与方法，图书编目条例及方法，标题法的理论等书籍和文章大量发表。这个时期出版界、学者和图书馆界对书目索引工作比较重视，关于这方面的著述不少，达255件，包括索引的编制理论和方法、汉字排检法等，此外，关于文献书目的著述也不少。

图书馆学理论部分主要是图书馆学(291件)和目录学(127件)著作，有关图书馆学专著主要有徐能庸《图书馆学九国名词对照表》(1928年，商务印书馆)；刘国钧《图书馆学要旨》(1934年，中华书局)；程伯群《比较图书馆学》(1935年，上海世界书局)；俞爽迷《图书馆学通论》(1936年，南京正中书局)；袁同礼《中国之图书馆(英文本)》(1936年，中华图书馆协会印行，收论文9篇)；喻友信《实用图书馆学》(1937年，上海中国图书馆服务社)；陈训慈《图书馆学函授讲义》(1937年，商务印书馆)等。目录学方面专著也很多，一些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至今仍一版再版。如汪辟疆《目录学研究》，杜定友《校雠新义》，姚名达《目录学》等。

抗战期间，由于战争影响，图书馆学研究发展缓慢。每年发表论文及专著不足100件，1938—1945年8年只有510件，1945年仅29件。其中比较著名，有一定学术水平的著作，有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1938年，商务印书馆)，卢震京《图书学大辞典》(1940年，商务印书馆)，余嘉锡《目录学发微》，这些论著至今仍受到学术界重视。

抗战胜利后图书馆事业的衰败，导致图书馆学研究进入最低潮，1945年至1949年发表的论文和著述仅205件，1949年竟少至7件。有关图书馆管理等方面研究的论著空白。

第三节　图书馆学教育

一、图书馆学学校教育

据资料记载，1913年美国图书馆专家克乃文(Harry Clemens)主持金陵大学图书馆，他在该校文科开设图书馆课程①，这是目前已知在我国最早开

① 张锦郎，黄渊泉．中国近六十年来图书馆事业大事记[M]．中国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4：9-10.

设的图书馆课程。

1919 年李大钊提出要“使管理图书的都有图书馆教育的知识”。然而当时我国只有少数几个人到国外（主要到美国）研修图书馆学，直到 1920 年我国才开始创办图书馆学学校教育，几年内，除了文华大学图书科和上海国民大学设图书馆学系外，开始出现多种形式的图书馆业务人员培训。这一时期国内对图书馆事业处于仍不甚了解的状态，愿意从事图书馆工作的人不多，图书馆学教育发展仍不普遍。文华大学图书科 1922—1926 年毕业生仅 32 人，平均每年不到 7 人。专门人才也很少，全国包括沈祖荣、杜定友、刘国钧等在内，专门从事图书馆学、目录学研究的专家不过 20 人左右。而受过短期训练的职工总数不过 500 人，远远满足不了图书馆事业发展的需要。

1920 年 3 月，文华大学图书科（Boone Library School）成立，开始了我国图书馆学学校教育。创办人为美国人韦棣华（Mary Elizabeth Wood，1862—1931）女士、沈祖荣、胡庆生。沈祖荣（1884—1977）字绍期，湖北宜昌人。1914 年留学美国纽约公共图书馆学校，1916 年学成回国，是我国第一位图书馆学学士学位获得者。1927 年文华大学暂时停办，该科改名华中大学文华图书科。1929 年 8 月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立案，由沈祖荣主持，成为我国第一所独立的图书馆学校（简称文华图专，下同）。

文华图专前期的经费来源主要是学校基金及年息。办学之初，韦棣华、沈祖荣等先后募得海内外人士捐赠，建立了学校基金。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即美国庚子赔款补助费）、美国圣公会、美国妇女问题研究会等一年补助费约 35 000 元，用以支付经常费用、教师薪金等。直到 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社会捐助仍占学校收入近 70%。

学校开设的课程包括 20 学时的课程和 40 学时以上的课程，40 学时以上的课程有：中国目录学、中文参考书举要、西文参考书举要、西文书籍选读、西文书籍编目学、西文书籍分类法、现代史料、图书馆经济学、各种图书馆之研究、西文打字法、各种字体写法、特别演讲及实习等共 16 门课①。

学校专门设置“特别演讲”课，1933 年改为百科性的“群育讨论会”。许多著名学者、教授应邀为学生演讲有关学科的进展、专科书目研究等问题。这些演讲使学生开阔视野，启迪思维，为学生的文化科学知识打下扎实基础。

20 世纪 20—30 年代，文华图专的教师以外籍教员为主。当时美国图书馆协会每两年轮流派教师到文华图专授课。德文、法文教师均为外国人。中

---

① 武昌文华图书科季刊[J]. 1929，1(2).

国教师有沈祖荣、毛坤、胡庆生、徐家麟等。

文华图专对学生严格要求。校长沈祖荣每天早上亲自带领学生操练，检查学生的每张作业卡片，深入宿舍巡视。学生毕业后，学校仍关心他们的工作，有时还派人到学生的工作单位了解他们的情况。

文华图专的办学特色，其一，重视教学设备和图书的建设。建校之初，已具备公开图书馆(实习用)、实习室、古物陈列室等设施。图书馆内人藏中文图书14 834册，西文图书22 077册。至1934年藏书达48 208册，据当年《教育年鉴》的有关统计，文华图专的馆舍、图书和设备等在全国私立专科学校中均名列前茅。其二，重视教学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创办不久，沈祖荣先生于1921年12月曾亲自带领学生到北京清华学校清理该校所购图书。其三，采取既办学又办馆的办法培养人才。当时的文华公书林既是实习图书馆，又是公开图书馆，是韦棣华于1903年筹办，1910年正式成立，采取开架借阅的公开图书馆。学生利用该馆的参考工具书实习，每周星期六下午两名学生负责巡回书库借还图书。1929年秋开始，沈祖荣先生将公书林旧有中国图书40余箱分类整理，组织编目股，由学生轮流当股长。

为了培养适合于现代中国图书馆专门人才，该校除上课和实习外，学生还开展问题讨论，参观图书馆等活动。为了促进我国图书馆学理论和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开展学术交流，1929年1月20日，《文华图书科季刊》创刊，1932年改名为《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季刊》。该刊主要报道学校的教学活动，我国图书馆界动向。许多图书馆学家、文华图专的校友均曾在该刊发表不少质量较高的图书馆学论文，该刊于1937年第9卷第2期停刊。文华图专还出版了一批专著和教材，例如《文华图书科丛书》、《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小丛书》、沈祖荣的《中国图书馆应用标题总录》等。

文华图专1931年以前仿照美国纽约州立图书馆学校制度，只招收各大学毕业生或肄业二年以上大学生，修业二年，进行图书馆专业训练。1932年起，根据教育部决定，招收高中毕业生，肄业二年。文华图专在学制课程方面完全仿效美国，入学的学生很多是燕京大学、华中大学等校毕业、肄业的学生。毕业后大部分服务于中国各大型图书馆。据1930年统计，该校毕业生中，33人在国内图书馆任职，任馆长的29人，占总数90%。

1938年沈祖荣、汪长炳、毛坤等率领全校教职员迁校重庆。1941年夏，校舍被炸，片瓦无存。在此期间，师生们克服种种困难，坚持上课。抗战期间，由于沈祖荣校长及全校教职员的努力，学校一直维持原有规模，学生来源有所保证。1940年文华图专改学制，开始招收高中或同等学力毕业生，同时扩大办学规模。同年经教育部批准成立档案管理科，成为我国第一所开

办档案教育，培养档案专门人才的学校。1946年文华图专自四川迁回武昌，校长仍为沈祖荣。1947年秋季，文华图专学制改为3年。据统计，1922—1941年，文华图专本科毕业生共127人；1942—1947年专科毕业生共72人；1930—1938年，讲习班学生共29人。在此期间，我国图书馆高级专门人才中大半为该校毕业生。

1925年间，上海国民大学在教育科内设立图书馆学系，这是我国第二个图书馆学专业，学生毕业可授予学士学位。杜定友任系主任。任课老师有杜定友、胡朴安等，沈祖荣、刘国钧、李小缘、洪有丰等均曾担任临时演讲。该系成立后受到社会的注意，《上海时报》曾于1925年底请该系主持编辑时报索引，这是我国第一次编制报纸索引。该系开设课程包括：图书馆学概论、图书馆原理、图书馆行政、图书馆管理法、图书选择、图书编目法、分类法、图书馆行政、图书参考法、研究法、目录学、古书校读法等。还到图书馆实习参观。

杜定友(1898—1967)，广东南海人。1918年赴菲律宾大学学习图书馆学，1921年毕业获文学、教育学、图书馆学3个学士学位。早在1921年杜定友在他的大学毕业论文中就提出中国要有中国的图书馆学校的观点。1926年他发表了《图书馆学的内容和方法》一文，系统地论述了关于图书馆学教育的理论和方法。这是我国早期图书馆学教育的经典性著述。文中分析比较了英美各国和中国图书馆学教育的状况，论述了图书馆学校的宗旨、种类和组织，图书馆学校入学资格与试验，图书馆学校的课程、入学程度、年限、学位等。该文对发展我国图书馆学教育具有重大意义。上海国民大学图书馆学系的设立，从办学思想到课程体系的建立，充分体现了杜定友的图书馆学教育思想。

该系实行学分制，学生凡修满160学分者，授予学士学位；凡修毕图书馆学必修课程者，发给该系修业证书。杜定友深感图书馆人才缺乏，为了普及图书馆学教育，他很重视图书馆工作人员的在职培养。他主持的国民大学图书馆学系设立特别学生名额，方便图书馆工作人员深造，并将各门专业课程完全安排在星期六和晚上。1926年国民大学停办，图书馆学系亦随之结束。

1927年金陵大学成立图书馆学系，系主任为李小缘，李小缘(1897—1959)原名李国栋，是我国20世纪20—30年代新图书馆运动倡导人之一，1921年留学美国，在纽约州立图书馆学校和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攻读，获社会教育学硕士学位。1925年学成归国，任金陵大学图书馆馆长兼图书馆学系主任。金陵大学图书馆学系成立后，自编图书馆学专业教材，由万国

鼎、刘国钧、李小缘等人讲授。开设的专业课包括：图书馆学大纲、参考书使用法、目录学、分类法、编目法、流通法、杂志报纸政府公文、图书选择之原理等。为了普及图书馆学知识，该校首先将图书馆学课程列为全校学生选修课。

金陵大学图书馆学系创办后不久停办，1929 年续办，10 余年中续续停停。1940 年，金陵大学迁至成都后，在文学院设立图书馆专修科，科主任曹祖彬。只办两届即停办，毕业生 16 人。

1930 年，江苏省立教育学院设民众教育系，招收高中毕业生，内分六组，其中包括图书馆组。学生在三年级开始分组学习。1945 年 9 月，该学院迁回无锡，设社会教育系，下分四组，图书馆教育组是其中之一，肄业四年。

1941 年 8 月，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成立于四川璧山，该院设立图书博物馆学系，首任系主任汪长炳及教授多数毕业于武昌文华图专。该系修业年限为四年，第三年开始学习专业课程，第四年上学期实习，下学期写毕业论文，毕业后授予教育学学士学位。1945—1947 年，该系毕业生人数共 62 人。抗战胜利后，学院迁至南京，部分系在苏州上课，仍设图书博物馆系。该系学生需同时学习博物馆与图书馆课程。图书馆学课程有：图书馆学通论，图书馆行政与设计，图书馆史，特种图书馆学，图书编目法，分类学，资料整理法，图书馆经营法，图书选择与订购，图书馆推广，打字，目录学、各科名著介绍，版本学，参考书及参考工作，检字索引法，问题研究方法等。

1947 年，国立北京大学文学院附设图书馆专修科，科主任王重民。王重民(1903—1975)字有三，号冷庐主人，河北高阳人。曾任北京图书馆副馆长。校内各院系学生均可加修图书馆学课程，加修满 32 学分，成绩总平均 70 分以上者，可加发图书馆科毕业文凭。各院系课程在图书馆科规定课程之内，已经修习者，可以免修，学分可以计算入内。

除专门设置系科外，一些大学亦开设图书馆课程供学生选修。例如东南大学、大夏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河南大学、中华大学和一些师范学院等。东南大学由洪有丰讲授图书馆教育，顾实讲授目录学，陈钟凡讲授诸子书目。厦门大学由陈乃乾讲授目录学，内容包括中文书籍分类史及目录书的应用方法。上海大夏大学由陈友松讲授图书馆学。这些课程的开设，有利于在大学生中普及图书馆学知识。

与此同时，图书馆专业中等教育和初级教育亦有所发展。

1922 年 7 月，中华教育改进社在山东济南举行第一次年会，会上建议

组织图书馆教育研究委员会，并建议政府当局在师范学校增设图书管理科。广州市市立师范学校校长杜定友首先在该校增设图书馆学课。1924年、1926年江苏二师在高年级开设图书馆学课，每周2学时，由杜定友讲授。很多学生毕业后服务于大、中、小学图书馆，有的继续深造后专门从事图书馆工作。上海广肇公学等一些中小学也讲授图书馆利用法。

1925年四川成都草堂图书馆开馆后，曾办图书馆专门学校，秋天开学，1926年春天毕业。1926年穆耀枢曾在四川创办四川图书馆专科学校，但很快便停办了。

1929年广州市立职业学校增设图书管理科。

1930年秋，安徽省立职业学校设立图书馆专班。

1932年上海创新中学添设女子部图书馆科。

1934年，上海图书学校开办，由中国国际图书馆李石曾等与世界书局合办，分图书、出版、印制、组织四科。图书及出版科修业期限6年，其他二科3年。学生程度分初中毕业与高中毕业两种。采用半工半读制度。

此外1937年7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函授学校设图书馆学科，科主任徐亮，校长王云五。1947年4月，上海文化函授学校增设图书馆学系，系主任钱亚新。上海图书馆协会曾举办图书馆函授学校达7年之久。但图书馆学中等教育的规模很小，毕业生也不多，是图书馆学教育的薄弱环节。

图书馆学教育在抗战前和抗战时期，虽有一定的发展，但图书馆学教育仍不受重视，毕业生人数很少。据《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统计，1927—1947年文华图专历届毕业生人数：本科生94人，专科生65人，讲习班49人，21年内仅培养各级人才208人，平均每年不足10人。国立社会教育学院1945—1947年毕业生仅62人。除文华图专外，其他大学如金陵大学、北京大学等所设图书馆学科，一般在开设两三年后即停办。由于图书馆专家太少，满足不了国家需要，以致一些新图书馆建成后，无人能编制应备的书目。

在教学内容、课程设置等方面，一直没有形成适应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需要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图书馆学教学体系，直接影响了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二、图书馆学在职教育

20世纪20年代，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仅个别人能接受图书馆学正规教育，远远不能满足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需要。为了使管理图书馆的人员都有图书馆教育的知识，图书馆界有识之士以多种形式开展图书馆业务人员

的培训。在职培训的特点是：(1)属短期培训，培训时间均在半年以内，且多在暑期进行；(2)培训形式多样，包括定期研究、举办讲习会(班)、训练班、函授、夜间训练班等；(3)对学员除授予图书馆学知识外，重视实习和参观；(4)一般由各省、市办班培训本省或本地区图书馆在职人员。办培训班较多的省、市有上海、南京、广州、湖北、四川、浙江等。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有以下各类在职培训。

1920 年 8 月，北平高等师范应各省要求，开设暑期图书馆学讲习会，第一次对图书馆在职人员进行业务培训。参加听讲人员要求是从事图书馆学教育，或中等学校以上毕业生而有志研究图书馆学教育者。各省立及学校图书馆职工 78 人(其中女职工 9 人)参加听讲。讲课人员有李大钊、沈祖荣、戴志骞、李贻燕、程伯卢等。讲习内容包括图书馆教育、图书馆组织及管理法、图书馆编目及分类等。活动内容包括参观调查。所用讲义由戴志骞编译，刊载于《教育丛刊》第 3 卷第 6 号"图书馆学术研究号"中。

1922 年 3 月，杜定友在广州创办广东图书馆管理员养成所，为期 24 天，对象为全省中等以上学校教职员，共 60 余人。由杜定友、穆耀枢、陈德芸等讲授。共 20 多门课，每日授课 6 小时，其中一半时间用于实习。

南京东南大学于 1923 年、1924 年开办暑期图书馆讲习科，由洪有丰主讲，在孟芳图书馆实习，第一次讲习科听讲人数达 80 多人。1925 年该校与中华图书馆协会合办图书馆学暑期学校，由洪有丰、杜定友、李小缘、刘国钧讲授。课程包括图书馆学术辑要、图书馆行政、学校图书馆、儿童图书馆、分类法、编目法等。课外分组实习，参观图书馆。1926 年相继开办讲习科，颁发毕业证书，由洪有丰、刘国钧、朱家治等讲授学校图书馆、分类等课程，王云五讲检字法。在孟芳图书馆实习，毕业学员 20 余人。

1924 年夏，河南开封小学教员讲习会设图书馆管理课程，为期 3 周，由杜定友主讲，听众达 200 余人。1927 年、1931 年湖北举办了两期暑期讲习班。

1928 年 7 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开办暑期图书馆讲习班。由王云五讲授检字法、编卷法、中外图书馆分类法等，并在上海图书馆协会内推请孙心磐、陈伯逵、陈友松等五人，演讲图书馆学及其他应用技术。各机关、学校职员共 146 人参加讲习班。

1930 年 10 月，安徽省立图书馆办图书馆专班，修业 6 个月毕业。

1930—1931 年，江苏省立教育学院社会教育暑期学校设民众图书馆学。

1931 年 7 月，浙江省教育厅举办教育服务人员暑期进修讲习会，由大夏大学马宗荣讲授图书馆学课程。同年夏，湖北省教育厅等举办暑假图书馆

学科讲习会。

1932年夏天，河北省教育厅在天津举办图书馆讲习会。同年山东省立民众教育馆举办图书馆学讲习会。

1935年，湖北省教育厅举办中小学教员讲习会，次年举办全省民众教育馆讲习会，均设图书馆课程。

1941年11月，四川省教育厅委托省立图书馆举办中等学校图书管理员讲习班，以改进中等学校图书管理工作，训练专门人才。学员共25人。由省教育厅调派、聘请当时入川的专家刘国钧、李小缘、戴安邦等讲课，并以金陵大学图书馆为主要实习场所。第1期学员结业后，又继续开办第2期讲习班。

1942年，中央图书馆举办图书馆学补习学校，教学时间共10周。

据有关资料所载，1920—1949年全国各地举办的图书馆学讲习会(班)、养成所等共30多次。杜定友、刘国钧、李小缘等专家不辞劳苦，到全国各地培训图书馆业务人员，接受培训的人达1 000多人。

综合上述，民国成立后，我国图书馆事业无论从性质上、形式上和技术上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图书馆学研究已从分散发展到有组织地进行，图书馆教育已开始为我国培养专门人才。但是，内战频繁，经费缺乏，使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受到种种限制。因此在这一时期内，整个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尚属形成阶段。1927—1936年，图书馆事业进入了一个较全面兴盛的发展时期。然而日本侵华，以及抗战胜利后的内战，我国图书馆事业、图书馆学研究和图书馆学教育均处于停滞不前的境地。

第二十章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苏区、解放区的图书和图书馆事业

（1927—1949 年）

第一节 中央苏区的图书与图书馆事业

一、中央苏区的图书出版

1931 年 11 月 7 日，中国共产党在江西瑞金的叶坪召开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中央政府所在地称中央苏区。

中央苏区非常重视图书出版事业的发展，设有中央出版局发行部，统筹图书报刊的出版发行。中央政府总务厅下设出版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下设出版局，中央政府办起中央印刷厂，中央军委开办军委印刷所。少共中央局、中央军委、教育部，都有自己的出版机构和发行网，面向广大工农干部和群众送书籍报纸，红军战士则以半价优惠供应。苏区的各种出版物是在战争年代里出版的，仅据《红色中华》等报刊的报道，当年中央苏区政府、中央军委、中央教育部、中央出版局等部门出版了 200 余种图书。这些书籍包括了马列经典著作、政治读物、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书籍、各种教科书、文艺作品、普及读物等类型。在纸张和印刷设备都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中央政府和各级组织想方设法出版书刊，没有铜版纸用土造纸，没有印刷机，用石印、油印或木板印刷。瑞金就曾用木板印刷了《共产党宣言》，还有如列宁的《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国家与革命》、《左派幼稚病》、《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以及毛泽东的《才溪乡调查》、《关于中央执行委员会报告的结论》、《相持阶段中的形势与任务》等多部经典著作。这一时期还出版了

一些政治理论书籍，如《列宁主义概论》、《帝国主义与中国》、《少共国际小史》等。教科书如《成人读本》、《识字课本》、《列小算术教科书》、《体育规则》、《社会常识教科书》、《步兵教程》、《筑城学草案》等都是在这种情况下印刷出版的。此外，有些地方党组织也力所能及地印制了一些介绍马克思主义，介绍科学社会主义的小册子。兴国县委就曾翻印了《马克思主义浅说》，闽西列宁书局出版过《社会主义浅说》、《土地问题讲授大纲》、《红军军事概要》等。这些书籍在配合苏区的马克思主义宣传，配合苏维埃建设，配合反围剿的军事斗争，以及在培养党的理论干部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苏区报纸杂志的出版，是提高干部群众理论水平，配合红军扩大队伍，发展苏维埃政治经济工作的重要工具。中共中央局和中央政府都非常重视报刊的作用。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成立之初，就创办了机关报《红色中华》，并配备了专门的出版发行机构。其他还有中共中央局机关报《斗争》、军委总政机关报《红星报》、少共中央机关报《青年实话》、少先队中央总队部机关报《少年先锋》、中华全国总工会报《苏区工人报》以及军团和地方省级报纸杂志 34 种。这些报纸杂志，配合苏区的军事、政治斗争，介绍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及时提供党的决议，领导人的指导性文章，有力地推动了各根据地的苏维埃运动。其中如《红色中华》发行量达四五万份。《斗争》只在江西苏区发行，每期至少销 27 000 多份。《红星》发行 17 000 多份。《青年实话》发行 28 000 份。① 此外，如《战斗》、《猛进》、《苏区工人报》、《少年先锋》、《红色江西》、《省委通讯》都发行 4 000 ~ 7 000 份。② 苏区的出版事业，密切结合了中国革命的斗争实际，对革命的胜利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在书籍史上是值得称颂的。

由于当时国民党军队对苏区进行残酷的“围剿”和封锁，上海等地出版的进步读物和地下党组织出版的马列经典著作运送到苏区的数量很少，而苏区的印刷条件又很差，很难满足群众需要。在书籍供应比较困难的情况下，苏区干部群众为了学习革命理论，充分利用现有的书籍资料，有的一字一句地抄写，有的则在战争环境中多方搜求。毛泽东阅读的上海版的《反杜林论》译本，就是 1932 年 4 月红军攻克福建漳州时，他亲自在城里找到的。

二、苏区图书馆的发展

苏区的文化教育事业和出版事业的发展，为图书馆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

① 红色中华. 红色中华第二次全苏大会特刊[N], 1934-01-26(3): 9.

② 进步日报. 史学周刊[N], 1951-08-10(31).

战争环境的残酷，物资条件的艰难，都没有阻挡苏区图书馆的发展，苏区图书馆的生命力是顽强的。苏区图书馆的发展，从整体来看，是随着革命战争的节节胜利，苏区经济文化的发展而发展的。1931 年秋红军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扩大了中央苏区，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各级机关、学校为培养革命战争和苏维埃建设的干部，开展各项工作，纷纷成立图书馆，文化宣传、书籍出版也迅速发展。到了 1932 年秋冬之际，中央政府成立周年纪念，在向全体选民的工作报告书中进一步提出大力发展军事教育和文化教育，各级机关为发展苏维埃文化教育，创办报刊，出版发行书籍。各级学校也纷纷扩建，并建新校，扩大招生。各类型的藏书机构(图书馆、图书室、资料室等)纷纷建立。1934 年是中央苏区和几个解放区大发展的新阶段。这时期苏维埃图书馆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而更加深入地发展。不仅中共中央、中央政府、红军军委各部各机关，而且各地区的机关、团体、学校，甚至各厂矿企业都开展了文化建设运动，图书馆在掀起的扫盲运动、俱乐部运动、列宁室运动中迅速全面深入地发展。国家机关、工厂企业、农村乡镇都可以看到文化建设运动中讲书、读书、藏书的活动。苏区图书馆的发展形成了高潮。

中华苏维埃中央图书馆是无产阶级政权下的第一个大型图书馆，它对苏区图书馆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中华苏维埃中央图书馆建于 1932 年 4 月，馆址选在瑞金叶坪村中央所在地，毗邻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是中央政府的附属机构，它担负着为整个中央苏区的党政军机关服务，为苏维埃建设服务，为革命战争服务的任务。它的服务对象主要是中央政府各部门的工作人员，以及中央苏区的干部群众、红军官兵和社会团体。它有比较完善的组织机构，实用、方便、严密的图书整理、保管、借阅的管理方法和制度。图书馆对图书的阅览、出借以及图书馆制度的贯彻执行非常重视，曾在红色中华报上多次登载阅览和借书的规则以及督促读者遵守制度的启事①。图书馆藏有《马克思选集》和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著作，以及政治理论、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文学艺术等书籍2 000多册。还广泛收集了中央苏区出版的各种报纸 30 余种。图书馆白天晚上都开放，开放时间从上午九点十五分至下午四点。晚上从七点到八点半止。借书期限无论团体和个人均限定两星期，可以续借。只要有单位证明，就可以借到图书。还可以邮寄借书，只需机关证明，并附足邮票，即可出借。借书手续简便，中央政府工作人员凭证

① 刊载于《红色中华》1932 年 9 月 6 日第 32 期，第 5、8 版中缝。1933 年 1 月 28 日第 48 期，第 2、3 版中缝。1934 年 3 月 3 日第 157 期，第 2、3 版中缝。

章，其他机关人员凭证明，在图书馆借书登记簿上登记，即可借书。由于书籍复本较少，图书馆对借还图书的期限要求严格，定有处分规则，直至停止借书权。根据需要图书的迫切程度，订有临时收还图书制度，这样既保证了重点读者的特殊需要，也照顾了广大读者对书刊的需求，而且图书周转迅速，借书方便。总之，中央图书馆的一切工作都是适应当时革命战争的环境，创造性地开展工作，都是从服务读者、方便读者出发的。中央图书馆紧密联系广大读者，发动群众扩大书源，积极动员中央苏区各机关团体和个人向图书馆捐赠或出售图书、报刊来解决书籍补充渠道不畅的问题。中央图书馆几次向各团体发函或在报刊登载启事，号召各团体为建设苏维埃图书馆做贡献，并号召个人向图书馆出售书刊。由此而获得许多宝贵的书刊资料，如：中央局发行部的《左派幼稚病》、《职工运动指南》，少共中央局的《青年实话》，第一军团的《簿记学》、《粮秣经理教程》、《野战筑城教范草案》，中央苏区反帝总同盟的《反帝斗争与武装保护苏联》、《反帝战线》，以及红军学校和少先队总队捐赠的书刊①。以后，随着革命斗争形势的发展，中央图书馆于 1933 年 4 月迁往瑞金沙洲坝，设在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住房的右侧。1934 年 8 月 6 日迁往云石山。1934 年 10 月中国工农红军离开瑞金，该馆随中央红军转移，1935 年 10 月到达陕北。1936 年 6 月在保安重新开放。

中央图书馆之外，中央苏区还有不少图书馆。仅中央一级，就有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博物馆、国家银行技术研究会等单位，均有一定数量的藏书供工作参考之用。这些图书馆的性质不完全相同，有的从提供阅读参考，提高政治理论水平出发，收藏各类参考书，属机关图书馆性质，如中央宣传部即是如此；有的从保存革命历史文物方面收藏反映各个时期的革命斗争史的书籍，尽管也提供研究参考，但较多具有资料馆性质，如中央博物馆的藏书；而有的则纯粹是专业性质的收藏，如国家银行技术研究会在其征书启事中提出："为要广泛的研究各种会计和统计，帮助建立于改进苏区内各种系统的会计制度起见"，征求与此有关的参考书②。这些图书馆尽管流通范围有一定局限，但仍以各种方式服务革命战争，服务于苏维埃建设，是苏区图书馆的重要组成部分。

苏区还有一些类型的图书馆。如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图书馆（称"文库"），《红色中华》报图书馆（称"材料部"）以及苏维埃大学图书馆。这些图书馆

---

① 《红色中华》1932 年 11 月 7 日第 39 期 5、8 版中缝。1932 年 11 月 28 日第 42 期 2、3 版中缝启事及 1934 年 7 月 21 日第 217 期 1、4 版中缝。

② 《红色中华》1934 年 7 月 26 日第 219 期 2、3 版中缝启事，及散见的征书启事。

(或资料室)属于机关团体或学校图书馆类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是苏区的学术团体，经常在瑞金公开举办演讲会，出版研究资料。它是苏区党政军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中心，苏区领导人张闻天等经常为研究会做公开演讲，撰写文章及指导会员。研究会设三个部，编译部负责“管理文库事项”。图书馆是研究会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基地。《红色中华》图书馆(材料部)是中央政府机关报的后勤部，图书馆的设立是《红色中华》报飞速发展的产物。《红色中华》报自创刊以后几经改版，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成为苏区的主要报刊之一，各种消息、社论、专栏文章的报导，需要各种参考资料，由此而建立的报社图书馆，为报纸的出版，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苏维埃大学图书馆则是为着“创造大批的苏维埃建设的各项高级干部，来适应革命发展的需要”①而设立的。这些图书馆虽然大多规模不大，藏书不多，但其工作人员为了革命战争和苏维埃建设的需要，有的献出私人的珍藏，有的则号召前线战士在战斗中缴获，并且几乎每个图书馆都在利用集体的力量，登报征求各机关团体和个人的部分藏书，来供给广大读者，在这些图书馆的藏书中，甚至还发现字迹工整的手抄书籍，这也许是个人的馈赠，也许是图书馆工作者的手笔。总之，它是革命战争年代艰苦创业的珍贵记录。这些图书往往是这些图书馆藏书的重要来源。另外就是中央苏区各出版局、出版处以及各级机关组织出版或翻印的书籍。除了书籍，根据地出版的报刊，也是图书馆的重要馆藏。

中央苏区除机关团体和学校图书馆外，还有军事机关图书馆和军事院校图书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出版局，总政治部都有自己的藏书，甚至各方面军总部也有自己的藏书。这些机关的图书馆，大多可供公众使用。藏书大部分也是来自战斗结束后的多方搜求。这种在战争间隙中建立起来的机关藏书，在战争中所发挥的作用是巨大的。这些图书馆使广大红军机关的官兵在战争环境中，有条件学习理论、军事技术和时事政治，能够为革命工作提供一些参考。红军中的军事学校图书馆，如 1931 年在瑞金开办的中央工农红军学校和到 1933 年发展扩大的红军大学，以及红军卫生学校等，都有不少藏书或建有独立的图书馆。这些图书馆主要是为学校的教学服务。红军学校图书馆除有自己出版的图书收藏外，还收藏着苏联等国的军事著作以及红军高级指挥员的著作。其他政治读物，文学作品以及报刊也是红军学校图书馆的馆藏。这些书刊配合学员的训练学习和提高政治理论水平发挥了很大作用。红军学校图书馆在战争年代书籍来源供不应求的条件下，为培养军事人

① 《红色中华》1934 年 3 月 13 日第 161 期 1 版、4 版中缝“征求文件图书启事”。

才，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三、苏区俱乐部与列宁室的图书活动

自从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成立，到1934年1月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召开，短短的三年时间里，中央苏区不断发展、巩固、壮大。苏区的俱乐部活动和列宁室活动就是这种形势发展的结果。俱乐部活动遍及整个苏区，列宁室活动不但在苏区而且在红军连队中也生根、开花。仅中央苏区的部分统计，到1934年3月中央苏区的江西、福建、粤赣、瑞金等地俱乐部就有1 917个，参加这些俱乐部文化活动的固定会员，就达93 000余人。在各种机关团体、红军连队中，文化生活成为工余战后的重要部分，每个组织都附设有列宁室，开展群众性的文化教育工作。

俱乐部的组织在苏区也成为群众文化生活的统一组织，它是城乡广大群众自己创办，得到苏维埃政府的积极鼓励和推广而普及的群众文化运动。俱乐部有读书团、体育委员会、墙报委员会、晚会委员会和新剧团等。高尔基戏剧学校为俱乐部运动培养了大批文化干部，使俱乐部运动更加发展。在俱乐部里经常举办各种形式新颖、内容丰富的活动，如讲解形势、讲故事、演戏、举行各种文娱晚会等。其中经常开展的活动是读报和识字，帮助群众了解时事政治，学习文化。有组织地学习报纸的社论、新闻、生产知识、好人好事。俱乐部的读报活动，对苏区扩大红军队伍、拥军优属、购买战时经济公债，以及配合革命战争和苏维埃建设的各项工作，发挥了很大作用。许多苏维埃的模范县区乡镇通过俱乐部的读书读报活动，提高了群众的政治觉悟，纷纷集体参加红军，超额完成军粮军需的供给工作。苏区的城乡俱乐部是苏维埃建设中文化教育战线的有效的组织形式，它团结了广大工农群众，成为革命战争中一支生力军。

列宁室活动在苏维埃政府的机关团体、工厂企业、学校和红军连队里开展得比较广泛。它是各机关单位和红军中基层的文化教育组织，是文化园地和群众活动中心。各机关单位和红军中组织群众、发动群众的活动都在这里或以列宁室的名义举行。由此可见它在群众中享有的威望。列宁室活动得到中共中央、苏维埃政府和红军军委的支持。1933年9月红军总政治部发布了"关于列宁室工作的命令"①，红军连队中普遍开展了列宁室活动。列宁室除开展文娱、体育和其他活动外，还备有图书、报刊，并根据图书、报刊的学习内容，开展墙报活动。红军中的列宁室，是部队的战斗力量，红军走

① 红星报[N]. [1933-09-04].

到哪里，列宁室就出现在哪里。行军时，列宁室的同志背着图书，边走边讲，介绍书刊内容，讲时事、讲故事；部队宿营，列宁室的同志更加活跃，一本本书刊在战士手中传阅。这种特殊的图书流通形式，是战争年代红军中主要的图书活动形式。由于列宁室的工作，使红军战士及时了解党、苏维埃以及总政治部的决议与战略方针，更深刻地理解党的方针、政策、决议的精神。苏维埃国家工厂的列宁室，是广大工人的参谋部。在列宁室读书读报活动和墙报活动的影响下，工人们为革命战争，为苏维埃的建设争先恐后地出力献策。他们在得到前线的捷报后，义务加班劳动，争先拿出积蓄购买战时公债，捐献物资。有的自带口粮义务劳动，有的动员亲属参加红军。列宁室的图书活动使工人们打开了眼界，捐款支持白区工人兄弟的革命斗争，声援国际工人运动。

由于战争的残酷，国民党五次围剿中央苏区，使1934年以后发展的苏区大好形势遭到破坏，红军撤出中央苏区，转战各地，中央苏区发展着的图书馆事业走上艰苦的道路。

第二节　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的图书和图书馆事业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于1937年1月进驻延安。中国共产党在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建立了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政治中心。随着经济、文化建设的发展，解放区的图书和图书馆事业得到了空前的大发展。

一、陕甘宁及其他解放区的图书出版事业

新的解放区的建立和中国共产党对图书出版事业的高度重视，使解放区在几年的时间内，报刊图书的出版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的报刊通讯和发行网络。解放区出版的大批马列著作和革命书刊播撒到全国各地，使延安和解放区成为宣传马列主义理论、宣传抗日救国真理的图书出版中心。1937年初，中国共产党成立了中央党报委员会。1939年3月改建为中央发行部(后正式命名为中共中央出版局)。到了1943年又统一组建中央宣传委员会，指导全国解放区的宣传工作和图书出版事业。

1. 陕甘宁解放区的图书出版

从1937年到1947年3月中共中央机关离开陕北止，陕甘宁边区由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解放社、新华书店、大众读物社、青年知识社等出版机构和边区教育厅、各个编译研究机构出版了大量图书。仅中央印刷厂印刷，由解放社及新华书店发行的书籍就约300种，大约百万册。马列经典著作、各

类丛书、通俗读物和文艺书籍的出版，使解放区的图书出版呈现出缤纷的色彩。

(1)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出版

从1937年开始，解放区就把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出版作为工作重点。《解放》周刊于1937年4月至1939年8月共推介延安出版的新书128种，其中近半数是马列经典著作。1938年5月5日在马克思诞辰120周年纪念之际，中共中央在延安创建马列学院，其编译部和后来组建的翻译校阅委员会确保了马列著作的翻译和译文质量。抗战期间，延安共翻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著作32种，重印了大量经典著作单行本。从1938年起，在中央党报委员会的组织下，解放区的专家学者通力协作，完成了“两大丛书”(《马克思恩格斯丛书》和《抗日战争参考丛书》)与“两大选集”(《列宁选集》和《斯大林选集》)的编辑出版。解放社从1938年到1942年陆续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丛书》包括：《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政治经济学论丛》、《马恩通信选集》、《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资本论〉提纲》、《哥达纲领批判》、《拿破仑第三政变记》、《法兰西阶级斗争》等10种。由八路军军政杂志社出版的《抗日战争参考丛书》包括：《马克思列宁主义论战争与军队》、《恩格斯军事论文选集》、《新德意志帝国建设之际的暴力与经济》(即《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1870—1871年普法战争》等多卷。解放社于1939年还出版了《斯大林选集》5卷以及从1938年到1946年陆续出版《列宁选集》18卷。这“两大丛书”和“两大选集”的出版是我国马列著作出版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所有著作、文章几乎都是首先在延安出版发行，再传播到各解放区和全国的。例如《论持久战》、《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新民主主义论》等。

(2)各类丛书的出版

陕甘宁解放区的丛书出版是这一时期图书出版的一大特色。1937年由解放日报社率先出版了《列宁丛书》，收录了列宁的《两个策略》、《左派幼稚病》、《从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国家与革命》，斯大林的《论反对派》、《列宁主义概论》、《列宁主义问题》以及《共产国际纲领》等。接着又出版了《革命历史丛书》和《鲁艺丛书》。其他丛书有：中共中央西北委员会编辑的《西北丛书》；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编辑的《抗日战争丛书》；时事问题研究会编辑的《时事问题丛书》以及《抗战中的中国》等。

(3)通俗读物的出版

陕甘宁解放区在建设和发展中非常重视民众教育和文化普及工作，编辑出版了各种中、初级通俗读物。1937年出版了青救会文化教育部编《500字

课本》和青年呼声编委会的《国难算术讲习用书》，石印出版了《救亡歌集》。1938年出版了《政治常识》、《社会科学概论》。自1939年以后陆续出版的通俗读物逐年增加，涵盖了知识学习、文化教育、劳动生产、卫生常识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例如：《大众哲学》、《通俗经济学讲话》、《妇女问题讲话》、《世界知识读本》、《中国常识》、《政治课本》、《战士政治课本》、《国语课本》、《算术课本》、《历史课本》、《地理课本》、《自然课本》、《新文字的发音方法》、《老百姓的故事》、《中国历史讲话》、《自然常识》、《怎样养娃娃》、《怎样种菠菜》、《从猿到人》、《大众词典》、《日用杂字》、《庄稼杂字》、《识字课本》、《卫生常识》、《怎样写新闻通讯》、《怎样种瓜》、《怎样种西红柿》、《生产经验谈》、《菜园手册》、《种菜常识》、《秋收以后做什么》、《连队工作》、《黑板报》、《农村应用文》等。

(4)文艺图书的出版

陕甘宁解放区的稳固和发展促进了文艺事业的繁荣，解放社在1942年出版了《世界名著选》和巴尔扎克、高尔基、契诃夫等世界名家名作十余种。1943年出版多种中外名著以及《小二黑结婚》、《刘志丹》等文艺读物。中共中央出版局曾在《解放日报》刊登启事征求《水浒》、《红楼梦》等书，计划出版我国古代名著。

2. 陕甘宁解放区的报刊出版

从1937年到1945年解放区出版各种报纸近百种，期刊60多种。在出版的报纸中，除先后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的《新中华报》、《解放日报》外，还有各种地方报纸、部队报纸和机关团体报纸。地方报纸由中共县委宣传部主办或地方报社主编。据1944年10月统计，报纸发行21 500份，平均每70人就有1份定期报纸。全区为报纸写稿的通讯员有1 952人，平均770人就有1个通讯员①。这样的群众性和广泛性是解放区新闻出版事业的重要特征。部队报纸有23种，大部分由兵团或旅、团政治部主办，印数达8 700份，按当时的部队建制，平均每班有3份报纸。此外还有区政府、中直机关、总政、编译局、中央党校、抗大等机关团体、各级学校主办的报纸。在门类齐全的刊物中有文艺期刊24种，以及时事政治、文化学习、音乐美术、医药卫生、教育普及、抗战论坛等类型的刊物。

其中中央政府、中共中央、八路军军政总部创办的主要报刊有：

(1)《新中华报》　其前身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1931年12月11日在江西瑞金创刊。1935年11月25日在陕北瓦

① 赖伯年．陕甘宁边区的图书馆事业[M]．西安：西安出版社，1998：229.

窑堡（今子长县）复刊。1937 年 1 月 29 日更名为《新中华报》。1941 年 5 月 15 日终刊，改由日报——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接替。

（2）《解放日报》　1941 年 5 月 16 日在延安创刊，是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创办的第一份日报型的中共中央机关报。共出版2 139期，1947 年 3 月 27 日停刊。

（3）《解放》周刊　中共中央的政治理论研究刊物，于 1937 年 4 月 24 日创刊，至 1941 年 8 月 31 日终刊，共出版 134 期。

（4）《共产党人》　中共中央主办的党内刊物，1939 年 10 月 20 日在延安创刊，1941 年 8 月停刊，共出版 19 期。

（5）《八路军军政杂志》　1939 年 1 月 15 日创刊，八路军军政杂志社编辑出版，由毛泽东等五人组成编委会。1942 年 3 月停刊，共出版 39 期。

（6）《前线画报》（月刊）　八路军总政治部主办。1938 年 7 月 1 日创刊，1945 年 5 月 15 日出版第 32 期后停刊。

中央所属群众团体、边区党政机关创办的主要报刊有：

（1）《中国青年》（半月刊）　该刊原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刊物，1923 年 10 月在上海创刊，1927 年 7 月停刊。1939 年 4 月 16 日在边区安吴堡复刊，由全国青年联合会延安办事处宣传部主办。先为半月刊，后改为月刊，1941 年 3 月停刊。

（2）《中国工人》（月刊）　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主办。1940 年 2 月 7 日在延安创刊，1941 年 3 月停刊。

（3）《中国妇女》（月刊）　中共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主办，延安中国妇女杂志社编辑出版。1939 年 6 月 1 日创刊，1941 年 3 月终刊。共出两卷，第 1 卷 12 期，第 2 卷 10 期。

（4）《边区群众报》　1940 年 3 月 5 日在延安创刊，是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机关报。1948 年 1 月 10 日更名为《群众日报》。

其他还有设在延安的专业文化团体创办的报刊如：《大众文艺》、《中国文化》、《文艺战线》、《文艺月报》（以上均为月刊）、《草叶》、《谷雨》、《诗刊》、《民族音乐》等。

这些报刊大部分是由机关团体创办的铅印报刊，印数由几百份到几千份不等。反映出在艰苦的条件下，解放区报刊出版发行事业的勃勃生机。

3. 其他解放区的图书报刊出版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各个解放区的日益巩固，这些解放区的图书报刊出版也随之发展起来。

晋察冀边区是继陕甘宁边区之后建立起来的抗日根据地。边区出版的报

纸到1940年已出版了20多种，如《抗敌报》、《晋察冀日报》、《救国报》、《战斗报》、《边政导报》、《抗敌三日刊》、《工作通讯》、《部队生活》、《火线》等。主要杂志有《新长城》、《群众杂志》、《边区文化》、《抗敌周报》等。晋察冀边区的图书出版工作发展迅速。延安、绥德等地出版的图书很快就在这里翻印、发行。边区的出版印刷从边区初建时用油印和石印出版一些小报和小册子，发展到1940年初铅印出版各类书籍。毛泽东在抗日军政大学讲课的讲稿首先在晋察冀边区出版发行，其印刷出版的效率可见一斑。

晋冀鲁豫边区的报刊图书出版是在艰难困苦中发展起来的。边区的新华日报社自己造纸，用松烟和蓖麻油制作油墨出版《新华日报(华北版)》。还出版了《华北文艺》、《华北青年》、《新大众》等杂志。边区的图书最初是油印出版的，精美的设计，套色的封面，使这些图书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如高尔基的《鹰之歌》、《海燕》，鲁迅的《阿Q正传》、《狂人日记》、《朝花夕拾》以及《第四十一个》、《和列宁相处的日子》、《世界名歌选》等20余种图书都是这样出版的。新华日报社还出版了许多列宁、斯大林的著作和毛泽东著作，如《毛泽东选集》(两卷本)和《论持久战》、《论新阶段》等单行本。其他出版机构如“太行文化教育出版社”，“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教育厅”以及八路军一二九师的编辑机构和印刷厂也都利用木刻水印、铅印等方式印刷了各种教材和部队官兵的读物。

晋绥边区的图书报刊出版最初也是从油印发展起来的。起初，中共晋绥边区党委曾组织油印科印行《新民主主义论》、《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等著作和《看图识字》、《庄稼杂字》等通俗读物。他们用六色套印版油印的地图，如《远东战略形势图》、《苏德战争地图》等，非常精致，深受读者赞赏。1940年7月以后，晋绥边区的出版工作迅速发展，不但有铅印的报纸《晋西大众报》、《抗战日报》、《战斗报》，还出版了《中国青年(晋西北版)》、《大众画报》、《人民时代》、《人民画报》、《战斗画报》、《通讯研究》等杂志。并且铅印出版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论列宁主义基础》、《国家与革命》、《新民主主义论》等理论书籍和各种通俗读物。

其他解放区如山东抗日根据地、华中抗日根据地也都是在艰苦的条件下，采取各种方法出版图书报刊。这些抗日根据地出版的书刊，少则几十种，多则一二百种，发行量达几万至几十万册。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创造了历史上的奇迹。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和其他解放区的图书报刊出版工作是中国图书史上光辉的一页。它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为全国人民的团结抗战，为巩固抗日统一战线做出了杰出贡献。同时也为解放区图书馆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坚

实的物质基础。

二、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的图书馆事业

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图书馆建设的基础非常薄弱。陕甘宁边区在建设初期恢复了几个原在江西瑞金建立的图书馆，如中央党校图书馆、中华苏维埃中央图书馆等。随着形势的发展，根据地的巩固，从1937年到1940年边区的图书馆事业得到较快发展，已建的图书馆被充实、扩大；新建立一大批图书馆和民众教育馆。从1941年到1945年边区的图书馆在调整中发展、提高，进入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一直到1945年8月抗战结束。

1. 陕甘宁边区的图书馆事业

陕甘宁边区广大军民以极大的热情拥抱新生活，迸发出前所未有的创造力。短短几年的时间，边区的图书馆建设已经粗具规模。公共图书馆、机关团体图书馆、干部学校图书馆、军队图书馆、中等学校图书馆、儿童图书馆、医学图书馆和民众教育馆等类型齐全，数量众多。据统计各类图书馆(室)100个以上(其中包含合并或改名的图书馆)①，加上活跃在广大城乡、工厂、连队的俱乐部、读报组、“救亡室”等基层图书馆，其分布遍及整个解放区。

(1)公共图书馆

陕甘宁边区的公共图书馆规模较大，影响较广泛的有中山图书馆、鲁迅图书馆和绥德子洲图书馆。

中山图书馆是延安规模最大，影响最广泛的公共图书馆。该馆成立于1937年5月，1938年遭受敌机轰炸，馆务曾一度停止，1939年秋经整顿复馆。1939年12月中山图书馆重新整顿并扩大建设新馆，1940年7月7日正式开放。此后为适应学习研究需要，曾几次扩大规模。1941年以后扩大规模的组织机构分为：材料、读书顾问、编刊、阅览四部，设有图书室、参考室、阅报室、杂志室和材料室。1942年又开辟馆外阅览室，增设了少年图书部。中山图书馆在成立之初就建有理事会。1939年扩大建馆时修订了图书馆章程，扩建了理事会，聘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徐特立、李昌等17人为理事，推举林伯渠兼任馆长，李昌为馆主任。1940年在召开第二次理事会时增聘王林、胡乔木为理事，推举艾思奇、何思敬、周扬、王林、胡乔木为常务理事，负责领导与处理馆务，决定图书馆的方针、任务。馆主任改由胡乔木担任。此后又由武衡、童大林相继担任馆主任。图书馆藏有政

① 赖伯年. 陕甘宁边区的图书馆事业[M]. 西安：西安出版社，1998：2.

治、经济、哲学等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等方面的书籍。解放区出版的书籍，苏联出版的中文、俄文书籍使图书馆藏书具有解放区图书馆的特色。图书馆图书收藏，至1940年就达5 000余种约1万册，收藏的报刊除各解放区出版的以外，还订购了大后方的各种报刊，共约百种。

中山图书馆建立之初，是以纪念孙中山，发扬孙中山的救国理论，为完成抗日的一切准备，用文化理论武装广大民众为其宗旨的。随着抗日战争的发展，中山图书馆为贯彻中共中央的各项方针、政策，紧密配合党与边区各个时期的各项政治运动、生产运动而开展工作，做出了出色的成绩。如为配合宪政问题的研究，开辟宪政问题材料室，收集宪政材料供研究参考，并编辑《宪政论文选集》、《宪政论文索引》为读者服务。为了配合各个时期的革命斗争，还定期出版了《事实资料》、《每月全国报纸杂志论文索引》、《世界大事表》三种刊物，紧密配合了抗日战争时期党领导的各项运动。图书馆为配合抗日前线的军事斗争，响应边区中央局拥军劳军的号召，向前方战士赠送了大批书籍，为向八路军战士祝捷，图书馆为获胜的359旅将士送去图书，为战士们增加了精神食粮。

中山图书馆积极为读者服务。为方便读者，图书馆就近开辟书报阅览室，免除读者爬山之苦。为了使读者更好地利用图书馆，工作人员自编了能类分马列著作的分类简表，建立了卡片目录。图书馆在借阅制度与开馆时间方面积极改进，开放时间改为星期二至星期六的下午，星期日全天开放。在借阅制度方面改变缴纳保证金制度，凭机关介绍信发给个人借书证，团体借书发给集体借书证，凭证借书。个人借书限一册，借期为两星期。团体借书则另有规定。并规定珍贵书籍就室阅览，概不出借。还规定了逾期借书和丢失损坏图书的惩罚赔偿办法。这些措施保证了图书馆为更广泛的读者服务，使图书馆不断发展，日臻完善。

在图书馆建设方面，中山图书馆从创建之初就得到中共中央、边区政府、延安各界团体及各地团体个人的支持赞助。毛泽东、彭德怀等党政军领导人积极捐款资助。1939年该馆扩建新馆，一月时间就接到各方捐款近千元和捐赠的大批图书。1942年重庆中华书局一次捐赠图书140多种。此外，图书馆还陆续收到香港、巴黎和东南亚各国的国际友人及华侨寄来的书报杂志。在各方的支持下，中山图书馆不断丰富了馆藏，到1943年，图书馆藏书已达3万册。

鲁迅图书馆的前身是中华苏维埃中央图书馆。1935年10月，中央图书馆随中共中央机关到达陕北。1936年6月，中共中央进驻保安后，中央图书馆重新开放。鲁迅逝世后，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决定“改苏维

埃中央图书馆为鲁迅图书馆”①，1937年1月鲁迅图书馆随中共中央机关迁入延安。1937年9月20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后转为陕甘宁边区教育厅辖属。

鲁迅图书馆重建初期规模较小，藏书不多。1939年12月边区教育厅决定扩建新馆，补充设备，添购新书。图书馆扩大后设有图书室、阅览室和材料室，于1939年底重新开放，成为当时面向社会开放的规模较大的图书馆。图书馆的主要服务对象是边区政府系统的干部。图书馆扩建以后读者人数急剧增加，后经1941年底的整顿，改进了管理制度，调整了组织机构，由图书馆主任主持馆务，调整后的图书室、阅览材料室设干事专人负责，并健全了登记、分类、编目等制度。对读者构成和图书流通都有了准确的统计。藏书量增加到1万多册，包括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各门类图书。图书馆开放时间也做了调整，由每星期两天改为每星期三天，读者人数由1941年4月的不到200人，发展到1942年年底的684人，1943年2月统计又增加到770人。由于图书馆执行抗战时期“干部教育第一，国民教育第二”的教育方针，图书馆的读者中，干部读者占到90%以上。图书馆的图书利用率很高，仅据1942年4—12月的统计，共借出图书4 104册。

鲁迅图书馆在建设发展中得到了各级政府以及各界人士的支持和帮助，毛泽东和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捐赠资金。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把在中国搜集到的外文图书全部赠给图书馆，并且担任她创办的图书馆外文部的对外联络员，西班牙驻上海领事和一些国际友人寄来的宣传品和书报，由她转给图书馆和延安的机关学校。香港人士也向图书馆捐赠图书1 000多册。鲁迅图书馆自重建以后就成为延安和解放区对外宣传的窗口，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1936年就曾利用过图书馆，并在《西行漫记》中刊载了题为“红色图书馆阅览室”的照片。英国物理学家威廉·邦德参观图书馆时，看到图书馆收藏的美国共产党的刊物《今日之中国》，感到非常惊讶和高兴。

绥德子洲图书馆的前身是绥德县立图书馆，是由陕北共产党创始人李子洲在1925年倡导修建的。为纪念革命先烈，1942年夏，由绥德县参议会提议，经陕甘宁边区政府批准，将绥德县立图书馆改名为子洲图书馆。

子洲图书馆初成立时，只有图书1 000多册。在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机关、学校、社会团体、书店、工厂、商店以及边区各县的大力支持下，图书馆藏书建设发展很快，到1945年10月，已“有藏书6 000多册，杂志报

① 共产党中央、苏维埃中央政府为追悼鲁迅致国民党中央、南京政府电. 红色中华，1936-10-28(3).

章160余种"①。几年中图书馆得到大量捐款、捐书。绥德西北抗敌书店为支援子洲图书馆，确定凡是延安版新书刊每种捐赠两本，大后方版书刊每种捐赠一本，使子洲图书馆有了可靠的供书渠道。图书馆藏书中有马恩列斯和毛泽东等人的著作；有边区和各根据地出版的政治理论书籍和大量适合社会大众阅读的小说、戏剧、歌曲、鼓词等读物。还有《解放日报》、《边区群众报》、《晋绥日报》、《新华日报》、《抗敌报》、《大众报》等报纸以及从全国各地和海外寄来的书报杂志，边区编印的抗敌宣传资料。

图书馆的读者服务工作非常活跃，"阅览室每天平均有40人左右前往阅读书报，书籍每月流通达270册"②。图书馆经常组织时事报告会、文艺晚会、秧歌演唱、美术展览等活动。图书馆还开办了补习学校，推进民众教育工作。每逢春节假日，图书馆与抗敌书店共同举办灯谜晚会，猜中者给予书籍奖励。这些活动吸引了广大干部群众，既有效地开展了图书馆工作，又宣传了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提高了干部群众的政治文化水平。

(2)机关团体图书馆

中共中央在进驻延安后，为研究和制定政策以及其他工作需要，各机关相继建立资料室和材料室。此后随着形势的发展和需要，进行了改组或合并。延安中央研究院图书馆和中共中央图书馆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具有相当规模的机关团体图书馆。

中央研究院图书馆是在原马列学院图书馆的基础上建立的。研究院既设有为全院服务的图书馆，又有各个研究室设立的资料室。在研究资料非常稀缺的情况下，研究人员也加入了资料搜集和整理工作。馆藏图书主要有俄、英、法、德、日等文字版本的马、恩、列、斯著作和马列学院编译室翻译、解放社出版的经典著作中译本；延安出版的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人的著作和范文澜、艾思奇等编写的理论书籍；大后方出版的各类书籍以及线装古籍的收藏使藏书达到2万余册。为适应研究的需要，中共中央宣传部规定凡延安出版的理论书籍都要送中央研究院。中宣部还不时把从大后方集中采购的新书分配给图书馆。图书馆也通过各种途径购买所需图书，并订购了大批报纸、期刊，使藏书的品种与规模都不断扩大。藏书由两个窑洞增加到三个窑洞。

---

① 子洲图书馆热心社教，文化补习学校办得好[N]. 解放日报，1945-10-20(2).

② 子洲图书馆热心社教，文化补习学校办得好[N]. 解放日报，1945-10-20(2).

中央研究院图书馆的图书管理卓有成效。图书馆原采用王云五图书分类法，为了适应馆藏图书的分类需要，图书馆编出“改王”图书分类法，突出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类目，扩充了社会科学类目，以适应研究院的宗旨和各研究所的设置。在流通工作中，采用科学管理方法。利用书袋卡追询书踪，有效满足了各种需求。利用黑板报道新书动态，建立馆际互借关系，提高了图书利用率和周转率，部分解决了缺少图书的困难。各个研究室的资料工作是结合各自的研究项目而具体实施的，每个室都有详细工作计划，明确的任务、要求、分工以及检查落实的制度。并完成了诸如《思想方法论》、《苏维埃运动史稿》等一系列研究项目。1943 年 5 月中央研究院图书馆和各研究室的图书资料在中央机构实行精简时划归到新成立的中共中央图书馆及中央党校图书馆。

中共中央图书馆是 1943 年由毛泽东提议，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的，隶属中共中央研究局。中共中央图书馆是在中央研究院图书馆的几万册藏书的基础上，集中了中央秘书处材料科、中央政治研究室资料室、中宣部材料室、中组部训练班图书馆、中财部图书室的部分图书资料组建的，由此成为当时延安馆藏最为丰富的图书馆。这些藏书除马列经典著作，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的著作，中共中央的历史文件集，各个历史时期的党报、党刊外，还有大量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类书籍。其中大部分是解放社、延安新华书店、华北书店、八路军军政杂志社、吕梁文化教育出版社等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的出版物，以及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生活新知书店等大后方的出版物。许多中央领导人也纷纷向图书馆捐赠图书，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颖超、徐向前、陈毅等都给图书馆送去自己的收藏。此外不少国内外友好人士、进步团体也给图书馆赠送书籍。因此图书馆收藏了古今中外各个学科的一些重要著作，体现了中央图书馆的重要地位。图书馆还有丰富的报刊资料收藏。包括中国共产党早期出版的刊物、延安和其他解放区出版的报刊。此外，图书馆还搜集有国民党统治区各党派、社会团体、报刊社出版的报刊，以及苏联、美国、英国、日本等国家出版的外文报刊，其收藏总量在 200 种以上。

中共中央图书馆是在新的基础上组建起来的，馆舍建设，图书管理都有了较丰富的经验，其管理也体现出新的水平。馆藏图书分为 16 大类，大类以下作了细分。编有卡片式目录和书本式目录，开辟了阅报室。书本式目录不但著录馆藏中文图书 6 000 多种，还著录了延安其他图书馆的藏书 2 000 多种。图书馆制定了详细的规章制度。工作人员对图书十分珍惜，甚至登报寻找读者丢失的图书。图书馆在为中央领导和中央机关服务的同时，也向延

安其他机关、学校的读者发放借书证。图书馆还做了大量的剪报资料和专题索引，及时提供给中央领导和读者。

机关团体图书馆先后还有中央党报委员会材料室，《新中华报》社资料室，《解放日报》社资料室，新华社资料室、青年流通图书馆、中共西北局图书室、中国文艺协会图书馆、边区银行延安总行图书馆等。

(3)干部学校图书馆

陕甘宁边区的干部学校是在抗战时期“干部教育第一，国民教育第二”的方针指导下蓬勃发展起来的。学校图书馆成为干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干部学校图书馆也成为陕甘宁边区图书馆事业的一支主力军。这些图书馆包括：中共中央党校图书馆、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图书馆、陕甘宁边区党校图书馆、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图书馆、延安马列学院图书馆、延安自然科学院图书馆、延安大学图书馆等。图书馆在解放区的形势发展中也在不断变化。有的学校图书馆合并后规模扩大了，有的学校图书馆升格为新学校的图书馆，有的学校图书馆随着学校的改变完成了其历史使命。但是，这些学校图书馆在各个历史时期发挥的作用却是永存世间的。许多学校在合并后形成学科齐全的综合性学校，图书馆的藏书也丰富了许多。以下重点介绍几所学校的图书馆。

① 中共中央党校图书馆是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最早恢复建立的图书馆。其前身是在江西瑞金创办的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1937 年 1 月，中央党校迁到延安。图书馆经过几年的发展，藏书具有一定的规模。马列经典著作和党的文献相当丰富，《马克思恩格斯丛书》、《资本论》、《列宁选集》、《斯大林选集》、《毛泽东选集》等都是当时的完整收藏，还有经典著作和其他领导人著作的各种单行本以及《红色文献》、《整风文献》、《两条路线》和解放区、重庆出版的各类报刊。由于不断有其他学校或单位合并进来，图书馆收藏图书的种类不断增加，除党校总部有图书馆外，其各个分部也都建立了分图书馆或资料室。这一时期图书馆的藏书约有几万册。

中央党校图书馆的管理工作很有特色。按图书分类法改编了新的大类分类表，报刊阅览后及时装订成册。为了方便教学，图书馆经常参照教学计划把教学参考书送到教研室，甚至送到学员手上。利用黑板公布到馆新书，转抄剪报张贴，这些服务深受读者欢迎。

② 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是由 1933 年创办于瑞金的中国红军大学恢复改建，1937 年 1 月迁入延安后正式命名的，简称“抗大”。抗战八年中，抗大总校共举办 8 期，培养学员近 3 万人，加上各分校培养的学员，总数达到 10 万多人。抗大是一所革命战争时期的特殊学校，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发

展壮大。抗大成立初期，学校还没有图书馆，只有各种形式的阅读书报活动，例如先后出现的“列宁室”、“救亡室”、“读书会”以及学员利用自备书籍进行周转和调剂的“流动图书馆”。在抗大成立后的三年里，图书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迅速发展起来，到1939年底图书馆藏书已达到2万多册。

抗大图书馆由于学校的特殊性而形成独特的工作方法。图书馆随学校转移办学，工作人员将随馆转移的两万多册藏书按前后方分工，在新开辟的办学校区开展工作。部分工作人员在校区临时阅览室负责开放图书的就室阅览，以及订购报刊、资料剪辑工作。遇到紧急情况，还要拿起武器，保护装箱驮运的图书随校部安全转移。大部分工作人员负责后方书库的图书保护以及图书采购，借还图书工作。这些书库则远在50里外渺无人迹的山洞里！工作人员像保护眼睛一样珍藏这些图书。他们把图书分成军事、政治、文化科学三大类，下分各个小类。图书编有分类号和目录卡片，并装入木箱。木箱上面和左右两面均注明箱子编号和内藏图书的起止号，目录卡片上也注明相应的箱号。这些匠心独具的方法，保证了图书馆在这样的环境下正常开放。

③ 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培养艺术干部的艺术院校，简称“鲁艺”。1938年图书馆初建时，规模不大，藏书很少，设备也很简陋。有人为当时的图书馆画像配诗：“储书窑洞面朝阳，洞外草棚阅览房；绳子几根代报架，疑看被单与衣裳。”1939年8月后，图书馆的条件大为改观，藏书也增加到1万多册。其中鲁艺编辑出版的文学、美术、音乐、雕塑等方面的教材和文学丛书、文学刊物、画刊、画报等书刊100多种成为图书馆的特色收藏。此外中外文学、艺术类图书和鲁迅著作以及鲁迅研究类图书也十分丰富，成为图书馆的收藏特色。学院的各个系还设有材料室，通过征集和搜集活动，获得了丰富的民间艺术形式和艺术素材，编辑整理出许多民间艺术作品，如民间音乐、民间传说等。到1945年图书馆藏书已达3万多册。从1938年3月到1945年11月的近8年时间里，鲁艺共培养艺术干部685人，一大批优秀的文艺工作者都曾在这里学习或任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著名作家冯牧回忆道：鲁艺有一个藏书非常丰富的图书馆。在那样边远偏僻的山沟里，居然拥有即使现在看来也应当算是相当完备的关于文艺方面的藏书。你在那里几乎可以找到当时国内已经出版的大部分的新文学书籍和报刊，包括二三十年代出版的许多最早的新文学刊物。

④ 延安自然科学院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培养科学技术干部的教育和科研并重，以教学为主体的机构。从1940年到1941年，在边区财政经济非常困难，物质匮乏的条件下，中共中央投入经费和力量，建设图书馆和

科学馆。延安的图书资料中适合理工科的自然科学书籍极其缺乏。科学院曾在重庆《新华日报》连续刊登26期征求科学图书仪器启事，在《新中华报》上，后来又在《解放日报》上刊登征求、征购以及鸣谢启事许多次。这些做法得到国内外人士和机构的响应，许多外文的科学著作，包括《细胞学》、《植物形态学》、《新生物学》、《普通物理》、《初等化学》、《电学原理》、《高等数学分析》等各类科学书籍和一些杂志纷纷寄到科学院。此外科学院还多次派人到西安、重庆、上海、香港等地采购图书。周恩来始终关注科学院的建设。建校之初，曾专门从后方的大学里搜集英文原版教材送到延安。后又委托专人从桂林、柳州、广东曲江等散落科技图书较多的地方搜购各类中外文图书。到1943年图书馆藏书增加到几万册，中外文的理工农医各类图书蔚为大观。

⑤ 延安大学是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创办的第一所综合性大学。在1941年由泽东青年干部学校、陕北公学、中国女子大学合并而成，是在更加明确的办学思想和办学方针指导下建立与发展的规范化的高等干部学校。建校之初，由三校部分图书合并建立的延大图书馆约有藏书2万册。图书馆设备齐全，工作人员经验丰富。图书的登记、分编、管理、流通、阅览工作进行得井井有条，还开展了新书介绍、剪报、专题索引和解答咨询等业务工作。时任校长的吴玉章想方设法保证图书馆的经费，使图书馆能购置新书，添置设备。1943—1944年相继又有延安自然科学院、鲁迅艺术文学院、民族学院、新文字干部学校和行政学院并入延大。此后延大成为包括行政学院、鲁迅艺术文学院、自然科学院三院十系，两千余名学生的学校。到1945年图书馆藏书已达10万册。延大除学校图书馆外，每个系都有研究室。所有的收藏，包括中外各学派、各党派的书籍报刊，都允许公开阅览。图书馆还经常举办时事报告会、诗歌朗诵会、美术展览等活动，接待来延大访问的中外友好人士。

(4)其他类型图书馆

陕甘宁边区的图书馆还有诸如军队图书馆、中学图书馆、儿童图书馆、医药卫生图书馆等。此外在广大的工厂农村还有许多基层图书馆。

① 军队图书馆　军队图书馆是广大指战员在紧张、严酷的战争环境中，根据部队战斗生活的特点，动员和依靠各方面的力量，采取简单易行、灵活多样的形式建立的。在环境、形势和任务允许的部队里建立图书馆的有：一一五师晋西留守处图书馆，河东部教导队图书馆等。从现今保存的历史遗存书籍的印章上，我们知道“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政治部”、“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第一二零师锄奸部”等机关也有藏书。《解放日报》曾多次报道

“连队图书馆”的情况：某旅干部教导大队图书馆的大幅墙报对部队“起了极大的鼓动作用”，以及连队图书馆的购书情况。还报道了两个军分区政治部设立“军民阅读室”和创办连队“流动阅览室”的情况。军队图书馆的建设得到朱德总司令的大力支持，延安的中山图书馆、鲁迅图书馆以及华北书店、新华书店等单位，纷纷向前线支援书报，前后有上万册图书、报刊送到战士们手中。

② 中学图书馆　中学图书馆中米脂中学图书馆、延安中学图书馆是比较著名的。

米脂中学图书馆成立于 1939 年。1940 年年底，边区政府教育厅接办米中后，学校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到 1941 年，图书馆已有藏书 4 000 多册，报纸 10 余种，杂志 30 多种，大部分是边区出版的各类书刊。图书馆从中学教学的特点和学生的培养出发，围绕教育目标和教学任务，通过报刊宣传、新书介绍、编制学生阅读书目、组织读书小组和开展读书竞赛活动，为学生们办起了第二课堂。

延安中学是 1944 年 8 月由延安师范与延安大学中学部合并而成的。延中成立时，图书馆集中了原边区中学、鲁迅师范、边区师范、鄜县师范、延安师范、延大中学部在不同时期保留下来的图书，有三四千册。图书馆的藏书，有很多是延安出版的政治理论著作和社会科学类书籍，有各类教材和教学参考资料，文学书籍主要是中文的苏联小说和鲁迅的作品，还有一些科普读物。图书馆因陋就简自己制作目录卡片，把卡片挂在一排排可用作钉子的枣刺上，每书一卡，按卡借书。图书馆把卡片装入冠有教职工和学生姓名的借书袋中。图书馆不仅及时推介新书，还积极配合老师，向学生推荐教学参考书和读书治学的书籍。延安中学作为延安唯一的中学，培养了一大批中共中央和军队领导人以及革命烈士子女。

③ 儿童图书馆　延安先后有第一保育院图书馆、延安少年团儿童图书馆、中山图书馆少年图书部、八路军抗属子弟学校图书馆和第一保育小学图书馆等。

第一保育小学是由八路军抗属子弟学校和第一保育院小学部合并成立的。合校后的图书馆，有几千册图书。藏书中有教学用书、文艺书、故事书、连环画，还有生理卫生、科学常识方面的书籍。图书馆的书标和目录卡片是学生们动手制作的。图书馆用黑板报道新书，摘抄劳动模范和抗日英雄的事迹，供学生们写读后感和读书讲演活动。

④ 医药卫生图书馆　延安先后有延安边区医院图书馆、中央医院图书馆、医药图书馆、延安中医图书馆、延安卫生人员俱乐部图书室等。这些图

书馆都是在各方支持下为满足医护人员业务进修和伤病员阅读需要建立起来的。中央医院图书馆就是在院长傅连暲的各方联络、宣传之下，获得国内外一些友好人士、进步团体的积极支持；他们给中央医院捐助药品器械和医学书刊。公益服务会医疗队曾用飞机将联合国救济总署、中国福利基金会及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各国红十字会捐赠的药品、器材、书籍共3.5吨送到延安，支援抗战中的中央医院。其中就有国内外最新出版的医学杂志和书籍。通过各方面的努力，中央医院图书馆搜集到医务人员急需的各种书刊，像葛氏第16版《解剖学》，外文版《手术学》、《药物学》以及《战争外科学》、《护病学》、《生理解剖学》、《诊断学》、《传染病学》、《细菌学》等。这些图书馆为战争时期的医疗保障发挥了重要作用。

⑤ 基层图书馆　基层图书馆是在边区经济大发展的形势下出现的新事物。到1942年初，边区工厂发展到82个，有工人1万多名。在各级党组织和工会的领导下，一些工厂纷纷成立了俱乐部和图书室，开展多种形式的阅读活动。像边区印刷厂工会文教部、延长县交口镇工人俱乐部、延安兵工厂工人俱乐部、延安摩托修理厂俱乐部、西北军区制药厂第一分厂、光华制药厂、八路军制药厂都有图书室。边区印刷厂工会文教部图书室还得到毛泽东的题词表彰。广大农村地广人稀，居住分散，多少年来很少有文化的阳光普照到这块地方。民主政权的建立，以及对群众文化教育工作的重视，使农村出现了学习文化，开展文娱活动的新气象。特别是到了1944年，群众性文化活动出现了大发展的局面。一些文化基础好、识字人数多的地方，开始组建自己的图书馆。米脂县民丰区姜新庄村就成立了农民图书馆。有的农村以“流动图书馆”的形式解决农民阅读书报问题，乡干部下乡公干，把图书散发给沿途的农民，待返乡时顺路收回。这种形式曾被《解放日报》报道推广。读报组和黑板报也是农民创造的开展群众性文化教育的好形式。

(5)民众教育馆

陕甘宁边区民众教育馆(简称民教馆)是边区社会教育事业的一部分，也是边区图书馆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到1941年年底，边区民教馆发展到25所，基本达到了每个县都有民教馆。延安市民教馆开展了识字组、读报组活动，组织工人补习班，举办商人时事座谈会，建立街口永久性阅报栏，还创办了大众图书馆。据《解放日报》1941年12月31日统计，到延安民教馆阅览室和图书馆的读者“全年达8 000余人次”。此后民教馆又创建了大众俱乐部，开展娱乐活动。陕甘宁边区的民教馆普遍设有阅览室，广泛搜集报刊书籍向群众开放。读者既可就室阅览，又可以借出馆外。民教馆还开展新书宣传、文摘、剪报等工作，并辅导读者阅读。由于这些特点，使人们也称

民众教育馆为民众图书馆。

2. 陕甘宁边区图书馆的协作组织

1941 年 7 月 20 日陕甘宁边区图书馆的协作组织——延安图书馆协会正式成立。协会的成立标志着边区图书馆事业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协会的工作内容比较广泛。第一，协会担负着对延安地区图书馆的馆藏文献资源调查和统计的任务。第二，组织图书馆之间馆际协作、馆际互借、资料互借等工作以及赠送书籍和交换资料的协调工作。第三，组织各图书馆统一制定普通参考书流通办法，开展业务讨论，经验交流，进行业务辅导。第四，开展图书馆学的理论研究，如分类法的研究、联合目录的编制以及图书馆的科学管理等。第五，出版“延安图书馆协会会刊”，指导延安地区图书馆的工作。其他还有募集图书等工作。延安图书馆协会前后召开了两届会员大会。在协会的组织下，边区的图书馆事业更加蓬勃发展。

3. 其他解放区的图书馆事业

1940 年，晋西北抗日民主政权正式成立。1942 年 10 月改为晋绥边区行政公署。随着根据地的巩固和扩大，文化教育的普及，边区的图书馆逐渐发展。1943 年以后，晋绥边区出现了晋绥图书馆等大型图书馆和一些民教馆图书室。

1943 年 9 月在边区党委和行署的支持下，开办了晋绥图书馆。图书馆的主要读者是边区党政和各机关团体的干部。图书馆由董事会具体领导，制定方针，处理馆务。董事会成员大部分都是党政军机关的领导人和干部，如贺龙、续范亭等，并聘请王修任馆长。图书来源除由政府拨款购买外，还通过捐献、调配和寄存等方式，有效地利用了分散的图书资料，部分解决了战争年代艰苦条件下书源不足的困难。图书馆编有藏书目录，不定期向读者推荐新书，图书馆的工作卓有成效。

晋绥边区还有一些机关办有图书室、资料室，如晋西大众报社资料室等。边区政府还在各县镇举办民教馆，为基层提供书报阅览服务，如临县盘塘民教馆、神府马镇民教馆、岢岚民教馆的图书室等。

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图书馆的发展遍及各个根据地，除陕甘宁边区、晋绥边区外，还有晋察冀、晋冀鲁豫、山东、华中等解放区的机关学校图书馆、民教馆图书室等。

第三节　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的图书与图书馆

1945 年 8 月，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广大解放区迎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

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解放区军民从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建设，进行土地改革、整风运动，巩固人民民主政权，实行民主改革，发展生产，发展人民的文化教育事业。这一时期解放区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

抗日战争胜利至全面内战爆发前（1946 年夏），随着解放区的巩固和扩大，解放区的图书出版、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以及文化事业中的图书馆活动都有了较大的发展，开始出现了大发展的趋势。但是国民党政府挑起了全国内战，解放区面临着严峻的考验，解放区进入战时阶段，部分文化教育事业暂时受到一些挫折。由于某些地区被国民党军队侵占以及为了适应战争环境，有些事业被迫停止进行，有些则缩小范围，变得比较灵活了。到了 1948 年 5 月下旬，人民解放战争连续胜利，解放区恢复和扩大了。晋察冀解放区和晋冀鲁豫解放区连成一片，合并为华北解放区，并于山东和晋绥解放区相衔接。9 月中旬，东北根据地展开大规模的冬季攻势，解放了东北及热河 90% 以上的土地。随着解放区的不断扩大，人民的文化教育事业又有了蓬勃的发展，直至解放全国，我国进入新的历史时期。

一、各解放区的图书出版事业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根据地不断巩固发展，各根据地的图书及出版工作，已出现了大发展的趋势。各根据地的图书出版发行机构，由偏僻的、物资条件贫乏的山区，距铁路、城镇较远的边区，逐步转入物资条件较好的平原、城镇和铁路沿线。印刷条件由油印、石印，使用土造纸，改用铅印，使用质量较好的新闻纸、道林纸等。出版发行机构也不断扩大。1945 年前后，陕甘宁解放区经过几年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换来了全边区政治、经济、文化欣欣向荣的大好局面。出版了大量的马列经典著作和毛泽东著作，各种政治理论书籍和文艺作品，如《共产党宣言》、《帝国主义论》、《列宁主义问题》、《马恩文选》、《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整风文献》、《干部必读》（十二本）以及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陈云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和文艺作品《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王贵与李香香》等各类书籍。老根据地如陕甘宁、晋察冀、晋冀豫、晋鲁豫（与前者合称为晋冀鲁豫边区）、晋绥、山东和华中等解放区出版发行工作得到迅速发展。晋鲁豫新华书店在 1944 年春季由《晋鲁豫日报》社分离后独立创办编辑出版、发行业务，不但设有编辑部、营业部，还附设两个印刷厂，由平原深处的秘密机构一度转入菏泽、济宁等城市，大量出版图书报刊，甚至出版了精装十六开本的《毛泽东选集》。自 1945 年前后至 1946 年 7

月，华北、华中、华南19个解放区①的图书出版事业都获得了很大的发展，每个区都成立了编辑出版机构，有的附属于报社，有的由新华书店等发行机构领导。1945年8月15日以后回到祖国怀抱的东北解放区，也积极发展图书出版事业。这些解放区纷纷在解放的中小城镇建立出版、印刷机构，出版量、发行量急剧扩大，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形势。新解放区的图书发展，如华中解放区的苏皖边区，从1945年冬至1946年12月累计出版图书达167种，共648 500册。这些书籍绝大部分是翻印延安和其他解放区的图书②。1945年收复的东北解放区，除翻印延安和各解放区的出版物外，还出版了反映东北解放区斗争生活的《暴风骤雨》、《政治委员》、《无敌三勇士》、《动荡十年》、《翻身农村风光好》等各种书籍。并且出版了影响全国的东北版《毛泽东选集》。这部五卷合订精装一千余页码的巨著，从1947年开始准备，1948年5月在哈尔滨出版，它是解放区图书史上的一个壮举。东北解放区仅新华书店的出版发行系统在1947—1948年两年里就出版了592种书刊，发行量达1 400万册，并出版了总数达600余万册的中小学教科书③。东北光华书店的出版发行系统还影印出版了《鲁迅全集》和《资本论》等著作。

1949年，随着我人民解放军三大战役的胜利，东北、山东、晋察冀等解放区的大批干部，随军南下，在北京、天津、南京、上海等地发展新解放区的图书工作。他们不但组织了数以万计的解放区出版的图书投放新解放区，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还在新解放的城市，如北平(北京)、上海、蚌埠、淮南等地出版印刷书籍，供给新解放区。图书出版发行事业的大发展，为解放区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创立了有利的条件。

二、各解放区的图书馆事业

解放战争时期各解放区的图书馆事业，可分为老解放区和新解放区两个部分。

1. 老解放区图书馆的阶段性发展

抗日战争胜利前后，陕甘宁等解放区的图书馆在图书出版等各项文化事

---

① 至1945年这19个解放区是：陕甘宁区、晋察冀区、晋冀豫区、冀鲁豫区、晋绥区、冀热辽区、山东区、苏北区、苏中区、苏浙皖区、浙东区、淮北区、淮南区、皖中区、河南区、鄂豫皖区、湘鄂区、东江区、海南区。

② 华应申. 关于华中新华书店[M]//书店工作史料：第1辑. 北京：新华书店总店，1979：188-189.

③ 卢鸣谷. 东北新华书店在战斗中成长[M]//书店工作史料：第1辑. 北京：新华书店总店，1979：215-217.

业的推动下，在数量和藏书方面较前一段时期均有所发展，主要表现在藏书量的增加，图书馆工作的广泛开展，各级各类图书馆的不断充实完善。1946年6月，国民党军队挑起全面内战，调集130余万军队大举进攻各解放区。当国民党军队全面进攻被粉碎以后，又改为对山东解放区和陕甘宁解放区的重点进攻。在这种形式下，人民解放军采取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在运动战中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1947年3月人民解放军撤出延安。遭到敌人进攻的各根据地的图书馆活动，有的停止了，有的缩小了工作内容，图书馆的发展处于停顿阶段。随着人民解放军转战各地的不断胜利，不但收复了各个根据地，并且扩大了根据地的范围。这时各根据地图书馆又开始了新的发展。1948年3月米脂县开办了斌丞图书馆，这标志着边区图书馆事业即将迎来新的发展时期。1948年4月22日，人民解放军收复了延安，5月11日，陕甘宁边区政府重返延安城。恢复重建了中山图书馆，随后鲁迅图书馆恢复开放，西北党校、延安大学、延安中学、延安保育小学的图书馆迁回延安后也陆续恢复开放。1948年6月又新开办了延安大学洛川分校图书馆和西北财经学校图书室。边区其他地区的图书馆如子洲图书馆、米脂中学图书馆也重新整理开馆。这一时期各个老解放区的图书馆活动，为了适应战争环境，基本上都是阶段性地发展，直至迎来了全国解放。

2. 新开辟的各解放区图书馆的新生和发展

新解放区的图书馆的发展基本上属于两种情况。一种是接收与改造旧有图书馆，如哈尔滨市立图书馆、黑龙江省立图书馆、山东省立图书馆、西安市图书馆以及这些地区学校、厂矿企业、机关团体及民教馆图书室等类型的图书馆。这些图书馆经过整顿改造，清除敌伪反动书刊、查清馆藏，增加解放区的新书刊，配备新干部，整顿图书馆干部队伍，建立新的规章制度，以全新的面貌重新开馆。如黑龙江省立图书馆等，经过合并整理，在新的基础上开始新的工作。另一种则是根据形势的发展，为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而建立的新馆，如东北图书馆、承德市图书馆、长春市图书馆、张家口市图书馆、冀中群众图书馆、山东潍坊特别市市立图书馆等。这些图书馆是适应广大群众需要，合理布局，为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而创办的。图书馆一边积极建馆，一边想方设法开展活动，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这些图书馆中比较典型的是东北图书馆。

东北图书馆从1947年8月开始在哈尔滨市筹建，并接收了伪哈尔滨市立图书馆、长春伪“皇宫”的藏书以及各单位在土改、解放战争中送来的大批图书，于1948年8月15日正式开馆。同年11月又接收了国民党“国立沈阳博物院筹委会图书馆”、“辽宁省立图书馆”，并将东北图书馆迁往沈阳，

于1949年2月在沈阳重新开馆。这时馆藏已达68万册。这些藏书中，有解放区出版的图书5 000册，有文溯阁《四库全书》、宋元明清各代的善本、抄本、写本等珍贵古籍11万册，日文、西文书籍5万册，中文各类图书28万册，还保存了清代内阁大库明清档案及其他各种档案、官署卷宗270万件（辽宁省图书馆编《辽宁省图书馆十年》）。图书馆在积极收藏各种书籍的同时，利用丰富的馆藏支援解放战争，配合“土地改革”和生产建设开展各项工作。图书馆积极开展读书活动，开辟“泽东文库”、“鲁迅文库”等专藏供读者阅读，并组织读者学习讨论会，设立儿童阅览室，积极开展服务工作。为了图书馆学理论研究工作的需要，该馆积极改编新分类法。《东北图书馆图书分类法》为我国图书分类法的编制提供了创造性的尝试。为了发展各解放区的图书馆工作，根据图书馆总结的工作经验，编辑出版了《东北图书馆概况》一书，为解放区的图书馆工作提供了可贵的经验。

三、解放区书店系统的图书借阅活动

解放区书店为了配合迅速发展的解放战争，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介绍老解放区的状况，积极开展了图书借阅活动。早在1945年11月东北书店正式建立以前，就在沈阳马路湾门市部摆开书桌让读者自由阅读、选购，后来人民解放军主动撤离沈阳，东北书店迁往吉林省海龙县开设门市部营业，为解决读者无钱购书的困难，另辟阅览室供读者阅览。以后又在佳木斯、哈尔滨的门市部旁成立了阅览室和借书处。从此这成为东北书店的一项新业务，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东北书店除建立门市部外，还开设借书处和阅览室。书店组织读书报告会，请作者或专家进行读书辅导，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每次读书报告会，几百人、上千人参加听讲，提出书中的疑难问题，进行讨论，请专家或作者解答。这种形式的活动，大大提高了读书的效果，成为东北书店的优良传统。1947年在哈尔滨开展的借书业务，由收取押金发展到免费借阅，每月的基本读者，由200人增至900多人，出借图书达2万余册。无疑是一个相当规模的图书馆的流通量。此后，东北书店每当跟随解放大军进驻一个城市，在建立门市部之后，便很快成立阅览室或借书处，先后在长春、沈阳、北平开设阅览室和借书处。此外淮北解放区的雪枫书店还成立了图书馆和书店阅览室，并在部队组织流动阅览。山东解放区的新华书店，华中新华书店五分店等都附设有图书馆。

总之，解放战争时期，各解放区的图书馆与革命战争胜利的发展同步进行，随着解放大军由北向南，在解放了的土地上为新中国的图书馆事业打下了基础。

主要参考文献

一、书史部分

[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
[2] 陈梦家著．殷墟卜辞综述[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6.
[3] 陈梦家著．汉简缀述[M]．北京：中华书局，1981.
[4] 李零著．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M]．北京：三联书店，2004.
[5] 沈颂金著．二十世纪简帛学研究[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3.
[6] [美]卡特著．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M]．吴泽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
[7] 张秀民著．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8] 张秀民著．中国印刷史[M]．韩琦，增订．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
[9] 潘吉星著．中国造纸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10] 钱存训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纸和印刷[M]．北京：科学出版社，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11] 钱存训著．中国古代书籍纸墨及印刷术[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
[12] 曹之著．中国印刷术的起源[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
[13] 叶德辉撰．书林清话[M]．北京：古籍出版社，1957.
[14] 陈彬和，查猛济著．中国书史[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
[15] 孙毓修著．中国雕版源流考[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
[16] 刘国钧著．中国书史简编[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
[17] 李致忠著．中国古代书籍史[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18] 李致忠著. 历代刻书考述[M]. 成都: 巴蜀书社, 1990.
[19] 郭伯恭著. 四库全书纂修考[M]. 上海: 上海书店, 1992 年重印本.
[20] 方汉奇著. 中国近代报刊史[M].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1.
[21] 杨光辉等. 中国近代报刊发展概况[M]. 北京: 新华出版社, 1986.
[22] 任继愈主编. 中国版本文化丛书[M].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2-2003.

二、图书馆史部分

[23] 祁承㸁撰. 澹生堂藏书约[M]. 上海: 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7.
[24] 孙庆增撰. 藏书记要[M]. 上海: 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7.
[25] 丁申撰. 武林藏书录[M]. 上海: 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7.
[26] 谭卓垣著. 清代藏书楼发展史, 续补藏书纪事诗传[M]. 徐雁, 译.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8.
[27] 叶昌炽著, 王欣夫补. 藏书纪事诗(附补正)[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28] 李希泌, 张椒华编. 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29] 许晚成编. 全国图书馆调查录[M]. 上海: 龙文书店, 1935.
[30] 金敏甫撰. 中国现代图书馆概况[M]. 广州: 广州图书馆协会, 1929.
[31] 宋建成著. 中华图书馆协会[M]. 台北: 台湾育英社, 1980.
[32] 陈登元撰. 古今典籍聚散考[M]. 上海: 上海书店, 1983.
[33] 严文郁著. 中国图书馆发展史[M]. 台北: 枫城出版社, 1983.
[34] 卢荷生著. 中国图书馆事业史[M]. 台北: 文史哲出版社, 1986.
[35] 傅璇琮, 谢灼华主编. 中国藏书通史[M]. 宁波: 宁波出版社, 2001.
[36] 任继愈主编. 中国藏书楼[M].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2001.
[37] 程千帆, 徐有富著. 校雠广义[M]. 济南: 齐鲁书社, 1988—1998.
[38] 杨宝华, 韩德昌编. 中国省市图书馆概况[M]. 北京: 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5.
[39] 赖伯年主编. 陕甘宁边区的图书馆事业[M]. 西安: 西安出版社, 1998.
[40] 胡道静著. 上海图书馆史[M]. 上海: 上海通志馆, 1935.
[41] 北京图书馆业务委员会编. 北京图书馆馆史资料汇编[M]. 北京: 书目文献出版社, 1992.

[42] 张升著. 明清宫廷藏书研究[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43] 陈国符. 道藏源流考[M]. 台北：祥生出版社，1975.
[44] 李富华，何梅. 汉文佛教大藏经研究[M].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
[45] 牟钟鉴，张践. 中国宗教通史(下卷). 修订版[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